苏联科学院主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

第一卷

（供内部参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

第一卷

(1945—1949)

A·Г·米列依科夫斯基編
张瑞祥、张志等譯

(供內部參考)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5年·北京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ТОМ
1
(1945—1949 гг.)
Редактор
А. Г. МИЛЕЙ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2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 1962 年版譯出

·供内部参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

第 一 卷

(1945—1949)

A·Г·米列依科夫斯基編

张瑞祥、张志等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圓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五) 4.00 元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張 $29\frac{5}{8}$ · 插頁 2 · 字数 682,000
1965 年 2 月第一版　1965 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 · 720

序　言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是依据现时代的性质而发展的。苏共綱領认定现时代是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斗爭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崩溃、殖民体系消灭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

这部三卷本的著作的任务就是要透彻而全面地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特点，分析人类这一最重要的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发展規律和主要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不仅具有早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所揭示的規律性，而且还具有因世界舞台上阶級力量的配置和对比发生根本变化而产生的新的現象和新的規律性。

国际关系上的許多"古老問題"現在已有新的解决办法。这首先指的是战爭与和平問題，而这个問題是关系到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現一代人和以后若干代人的命运的。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現了現实的可能性，使人类可以摆脫破坏性战爭的迷魂陣——这种破坏性的战爭是会导致新的、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流血战爭的。

欧洲和亚洲許多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促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

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巩固表明了被压迫人民解放的时代的到来，它成为殖民体系危机和新的民族独立国家誕生的决定性因素，促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千千万万人民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

資本主义全面削弱了，資本主义总危机更加尖銳化了，世界資本主义的經济和政治不稳定性大大加剧了，劳动和資本之間的斗爭更加剧烈了，資产阶級的政治和意識形态危机更加深化了。

尼·謝·赫魯曉夫說过："世界正在經历一个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反帝的民族解放革命，人民民主革命，广泛的农民运动，人民群众爭取推翻法西斯制度和其他暴虐制度的斗爭，反对民族压迫的一般民主运动——所有这一切汇合成一个統一的破坏和摧毁資本主义的世界革命过程。"①

世界革命过程，过去和現在一直是在生产力巨大发展、两种世界体系大規模經济竞賽、以及給資本主义造成无法收拾的社会后果的空前科学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向前发展着。

所有这一切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因素，对于国际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的变化，不能不发揮其作用，对于国际关系的內容和形式、对于国际关系的性质和特点，不能不发生影响。

战后时期，国际关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显著地增长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苏共綱領才如此重視現代国际关系問題。

当然，社会发展的进程最終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阶級斗爭以及每一国家在經济和政治方面发生的內部演变过程。决定社会发展的全部力量，不是直接表現在国际关系的范围。但是，如果不考虑到国际关系日益增长的作用及其新的規律性，就不可能对現代世界发展的趋势作出任何眞正的科学分析。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72 頁。

千千万万人的命运从来沒有像現在这样以主要的国际問題，首先是以战爭与和平問題的解决与否为轉移。

大規模毀灭性武器頃刻之間可以到达地球任何角落，它的出現和完善推翻了一切陈旧的战略标准。世界上現在已沒有达不到的安全地带了。前綫和后方这类概念已經过时了。如果失去理智的帝国主义者再次挑起世界战爭，那末，整个地球都要成为毀灭性武器的目标。

防止热核战爭之所以成了人类生命攸关的大問題，原因就在于此。防止热核战爭是一切进步的必要条件，是发展世界文明和解决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和民族問題的极其重要的前提。

值得人类庆幸的是，各国人民順利解决避免毀灭性世界战爭的任务，为历史发展准备了前提。現在世界上已經形成了而且正在壯大着足以防止世界战爭的力量。虽然由于世界帝国主义的存在而产生的战爭危险还沒有消除，但各国的爱好和平力量依靠社会主义体系的强大力量和对帝国主义侵略者保持必要的警惕，就能够保障和平。这是現代国际关系的极其重要的特点。

一国內部阶級斗爭的进程和結局，从来沒有像現在这么取决于普遍的阶級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的状况。

国际反动派的"神圣同盟"能够不受制裁地对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进行警察鎮压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欧洲和亚洲各国节节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表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反革命輸出的可能性現在已經縮小到何种程度。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遏制好战的反革命势力，这一点成了决定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一系列国家和平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对劳动人民維护切身社会利益的阶級斗爭极其有利的新形势业已形成。在两个体系共处和竞賽的条件下，帝国主义国家統治阶級不得不在它們先前动用武力的地方实行让步和进行一些

改革。

国际关系已成为极其强烈地影响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因素。殖民地国家和附属国人民不得不独自对压迫他們的帝国主义进行力量悬殊的斗爭的时期，已經过去了。如今，他們在爭取独立的斗爭中依靠着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持，并同它結成共同的反帝战綫。

各国革命、民主力量的国际团結，极其沉重地打击了一切压迫者的"分而治之"的陈腐原則。抵抗帝国主义及其战爭政策和奴役各国人民的政策的力量的团結，正在发展和巩固。

群众对于对外政策从来沒有起过象現在这么积极、广泛和直接的影响。

过去，帝国主义資产阶級是国际关系的万能立法者，世界政策都是在伦敦、巴黎、华盛頓、柏林"制定"的。如今，人民——历史的眞正創造者，已經有权干涉对外政策了，而国际工人阶級已經成了世界政策的最有影响的力量。

爭取和平的斗爭，使国际关系范围成了人民群众日常关心的所在和政治活动的重要舞台。他們积极参与解决对外政策問題成了战后国际关系的特点，这不仅仅是由于新战爭会給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灾难。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資本主义体系危机的加深在全世界所引起的巨大社会改革，也促进了广大群众对国际关系影响的加强。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产生的結果，使占地球居民三分之一的大量的人获得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权利，他們眞正成了一切方面的名副其实的历史創造者。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是眞正人民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由共产党制訂的，而对于共产党来說，沒有任何东西比劳动群众的利益更为宝貴的了。

伴随着大批独立国家的成立，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促使

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群众奋发起来，推动过去实际上被排除于政治之外的千千万万人投入到积极的政治生活中去。

由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成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因素，資本主义各国的广大群众也卷入了积极的斗爭。这些群众越来越有成效地解决着卡·馬克思早給工人阶級提出来的任务："精通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①。

二

战后时期，国际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量的历史事件反映了这一时期国际关系性质上的新內容。然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却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

如果說，过去国际关系基本上是受資本主义的規律的支配，那末，現在国际关系却越来越在社会主义的規律的影响下发展了；两个体系的共处、竞賽和斗爭，就是現在的国际关系的主要內容。

社会主义以新型的国际关系对抗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对外政策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根本区别，是基于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在其本性、性质和內在規律上的最深刻差别。

当資本主义成为一个統治一切的无所不包的社会經济体系的时候，国际关系的实质一直是，不仅对"本国"人民，而且对别国人民肆行暴虐、殘杀和掠夺，殘酷的經济竞爭和爭夺世界霸权的角斗以及无休止的战爭。帝国主义一向把战爭看作解决爭端的"当然"手段，看作实現本国侵略的对外政策計划的最有效工具。

---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版第362頁。

但是，十月革命一胜利，一个新的、到处是民族平等和友爱、到处是劳动与和平的社会主义社会，就起而对抗充滿經济奴役、充滿阶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充滿战爭和暴虐的旧社会，社会主义反对把侵略战爭作为政策手段，而确立了和平原則。列宁曾經指出："我們的理想就是結束战爭，实現国际和平。"

除了統治和征服、压迫和剝削，帝国主义心目中沒有其他国际关系。而社会主义所依据的原則却是：民族平等和自决，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以及必須对經济不发达国家提供兄弟般的援助。

帝国主义认为建立使其能对其他一切民族和国家随意实行强制的"实力地位"是对外政策的基本目的。相反，社会主义則根本否认"强权法則"，反对侵略和扩张的任何表現，反对干涉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內政，不管这种干涉是在什么形式下进行的。

帝国主义外交的主要方法是軍事政变、訛詐、阴謀、秘密勾結、收买、暗杀。社会主义外交与此毫无共同之处，社会主义外交采用的是誠实和人道的方法，信守自己的义务，光明磊落地对待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待各国人民。

現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一般的历史发展一样，其主要內容、主要方向和最重要的特点，都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由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来决定了。

新型的国际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中表現得最明显、最充分。

尼·謝·赫魯曉夫在向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綱領的报告中說道："社会主义建立了国与国之間、人民与人民之間的新型的經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全面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互助，各主权国家的完全平等，这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关系的主要特征。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消灭了多少世紀以来的民族之間的对抗，各国人民兄弟友好的

原則获得了胜利。"①

社会主义国家在經济上的友好联合，是建立在彼此的社会經济基础的同一性的基础上，建立在社会主义陣营范围內极其适当的国际分工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济关系，明晰地显示了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經济的榜样。在未来世界社会主义經济中，全世界人民兄弟般合作互助的关系，将起而代替資本主义所固有的竞爭和互相敌对。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关系，是由国家制度的同一性、由維护社会主义胜利果实的一致利益、由建成共产主义的共同的伟大最終目的結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思想一致的基础在于，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占統治地位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而領导和指导的力量是共产党和工人党。

社会主义陣营中的国际关系，与任何历史上有名的資产阶級国家同盟或联盟所常有的关系根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沿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前进的各国自由人民在社会、經济和政治上的友好联合，使他們結合起来的是共同利益和目的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际团結的密切关系。

現在，苏联所一貫遵循的社会主义对外政策原则，首先是維护和平、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尊重一切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內政等原则，不仅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基础，同时还受到国际上越来越广泛的承认，成为現代国际关系的实践。

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年輕主权国家的关系中，也有所表現。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无私地帮助他們消除經济落后状态，全力支持它們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斗爭。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崇高的解放思想和爱好和平思想，在其中的許多国家內得到了特别热烈的反应和理解，同时在它們的对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90—291頁。

外政策上也得到了反映。

列宁所奠定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基础的和平共处原则，越来越得到国际上的广泛承认。在象联合国宪章、万隆会議决議和一系列国际会議的决議等十分重要的国际法文件中，都反映了这一原则。

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在許多重要的国际政治問題和国际法問題的解决中，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例如，由于苏联所坚持的立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媾和工作，特别是关于解决边界、同法西斯德国前盟国訂立和約、惩办战犯等問題，都处理得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截然不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合国和許多国际会議上所提出的、关于全面彻底裁軍和关于消灭殖民主义的提案，都得到了絕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这样的支持，是国际生活中一个嶄新的現象。

最后，世界社会主义的加强还反映在帝国主义陣营内部的关系上。自然，这个陣营的国家之間的联系和相互关系仍然以帝国主义本质上所固有的范疇为基础。可是，由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已大大受到限制。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已失去了先前那种随意强制較弱小較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可能性了。帝国主义势力越来越难于使用象殖民战爭这种过去所慣用的、并被視为"正常"的帝国主义政策手段了。同时，在世界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帝国主义者也越来越难于利用战爭作为解决帝国主义者之間矛盾的传統手段了（这种战爭会在世界社会主义面前大大削弱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

自从党消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及其在各个方面、包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有害后果以来，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苏联对外政策的积极作用大大提高了。

同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性质、原则和基础格格不入的个人迷

信，导致了对一系列国际生活現象估計上的主观主义态度，給苏維埃国家对外政策活动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困难。党坚决譴責了个人迷信，采取了各种必要的措施，来糾正具体外交活动上所犯的許多錯誤。根据苏共中央的倡議，把由于斯大林采取主观主义专横行动而恶化的与某些国家之間的关系，恢复了正常；不顧教条主义者和空論主义者的反对，同奥地利締結了国家条約，并順利地解决了其他許多复杂的国际問題。从1953年开始，特别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們党的中央委員会遵循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原則，展开了十分积极的对外政策活动。苏联外交的方法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其中特别重視扩大各国政治領导人之間的接触。所有这些，在整个国际局势上起了极好的影响，增大了社会主义对外政策影响世界发展的可能性。

*　　*　　*

力量对比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国际关系上社会主义原則越来越广泛的适用，决定了对战爭与和平問題的煥然一新的提法。

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創立了最符合現代生产力状况的国际关系，因为它的本质就排除了战爭在經济和政治上的必要性。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成了全人类为各国人民的进步与和平、为各国人民的幸福和安乐而爭取利用科学技术革命的巨大可能性的堡垒。

現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增加国民財富和合理利用我們行星上的資源，开辟了空前远大的前途。超速运輸工具和超远通訊器械的創造，改变了空間和时間之类因素的意义。我們的地球似乎已經变小，生活在上面的各国人民都成了近邻。国际分工、劳动产品交換以及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的潜力已經增大。但是这一点正受到帝国主义侵略集团的阻撓，它們迫使科学技术革命为自己的战爭机器服务。

馬克思論及同創立机器生产密切相关的十八世紀工业革命时指出，本来可以成为社会巨大福利源泉的生产革命改造，由于用資本主义方式利用机器的結果，就把人类天才的創作变成了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变成了各国人民的新禍根。这一評述也可以适用于說明生产力方面的巨大进步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帝国主义把生产力的发展利用于完善已具有空前破坏力的杀人武器。資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伴侶——战爭，越来越变成毀灭性的了。

帝国主义利用科学技术进步来进行軍备竞賽，并未挽救也不可能挽救帝国主义灭亡的命运。历史的辯证法就是这样。恩格斯关于帝国主义注定要灭亡的天才預見，并不单純是推測，而是从馬克思主义奠基者所发現的社会发展規律得出来的合乎邏輯的結論。历来帝国主义挑起的战爭，都强烈地加剧了資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对抗性矛盾，加深了因資本主义內部矛盾而成熟了的革命危机，加紧了滋长軍国主义的社会制度的沒落和瓦解。

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垄断集团，对自己的未来滿怀恐惧，曾企图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消灭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为帝国主义收复其一失不可再得的陣地。担負起这个任务的是几个主要法西斯国家，而它們的反苏計划則得到了全世界反动派的完全贊同和支持。然而，恰恰是在从帝国主义基本战略方針的观点来看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个方面，反动派的計划遭到了最慘重的失敗。战爭的結果，由于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反革命的突击力量一敗塗地，帝国主义的鎖鏈全面断裂。法西斯主义身上特别明显地体現了帝国主义的駭人听聞的殘暴性质，它的潰敗給了整个帝国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以最慘重的打击。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由于軍

队的技术装备对生产力全面发展水平的依賴而产生的又一个重要規律，其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經济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可超越的成就，从而創造了显然使任何帝国主义侵略行为都注定必遭失敗的防御手段。这样一来，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一向同迷信武力相联系的传統对外政策方針，也就失去了它本身的基础——"实力地位"。

实力的优势已經破天荒第一次不为濫用这种优势危害社会和践踏起碼社会道德准則的剝削阶級和剝削社会集团所占有，而为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利用这种实力謀求和平和国际正义的各国人民所掌握。

其結果是：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危机，它的最明显的表現是：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派的"遏制"共产主义的企图，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企图，复辟作为过去国际关系基础的包罗万象的帝国主义掠夺和帝国主义压迫制度的企图，全部破产了。

現在，在社会主义正在取代历史注定其必将灭亡的資本主义的条件下，任何資本主义国家妄想确立世界霸权——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最終目的——都是不可能实現的，这两者之間不可解决的矛盾，已經看得特别清楚了。

苏联和整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經济上、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强大，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及其日益增长的威力，是制止战爭威胁、保障各国人民和平与安全的主要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但是，有助于防止新的世界战爭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形成广大"和平地带"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年輕主权国家的爱好和平政策；国际工人阶級，它的一切队伍和組織，首先是它的先鋒队共产党为保障国际安全而进行的斗爭；摧毀着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基础的各国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政治总結

第一章　苏联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击溃法西斯主义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 5

一、帝国主义反动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政治和战略阴謀的破产 …… 6

二、苏联在反希特勒联盟的胜利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15

三、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条件的創立。資本主义世界中解放运动的高漲 ……30

第二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給資本主义国家带来的經济后果 ……41

一、法西斯侵略者的經济战略及其失敗 ……42

二、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竞爭。市場和資源在战爭过程中的重新分配 ……48

三、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增长。帝国主义国家經济上的变化 ……59

四、帝国主义世界的战后經济发展綱領的制訂和准备工作。战时締結的国际經济协定 ……63

第三章　資本主义国家中阶級斗爭的尖銳化。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漲 ……75

一、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75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反法西斯斗爭。抵抗运动 ……78

三、各国共产党影响的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高涨……89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运动……99
一、在战争条件下的殖民地和附屬国經济……101
二、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主义基础的崩溃……105
三、为政治独立而斗爭。战后发展綱領……110

第二篇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

第五章　1945—1949年苏联在經济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綫……117
一、战后头几年苏联經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总結……117
二、战后头几年苏联为爭取和平共处与国际合作的斗爭……124
三、列宁的社会主义对外政策原則和战后的历史情况……135
第六章　中欧和东南欧国家革命的胜利以及这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的新作用……155
一、中欧和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产生以及它們对外政策主要原則的形成……155
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同苏联的政治經济合作。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形成和巩固……162
三、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內政、为爭取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爭……173
第七章　中国的人民革命及其国际意义。亚洲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登上世界舞台……187
甲、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陣地的一个致命打击……189
一、中国的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189

二、人民解放軍轉入反攻。革命的胜利 …… 196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 199
乙、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和印度支那的国际关系 …… 208
一、1945年的八月革命 …… 208
二、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 …… 212
丙、1945—1949年国际关系中的朝鮮 …… 220
一、苏联为民主解决朝鮮問題所作的努力。美国政府分裂朝鮮和控制南朝鮮的方針 …… 220
二、北朝鮮和南朝鮮社会政治方面的发展。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 227
第八章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国家間新型的經济和政治关系 …… 233
一、社会主义国家間眞正的平等和同志式的互助关系的客观基础 …… 233
二、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对外政策的主要規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 …… 240

第 三 篇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所起作用的变化

第九章 东南亚各国人民爭取自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緬甸、巴基斯坦和某些其他国家获得独立 …… 251
一、印度摆脫殖民地依附地位和印度、巴基斯坦自治領的成立 …… 253
二、克什米尔事件和印巴冲突。克什米尔問題在联合国 …… 260
三、爭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緬甸 …… 268
四、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的解放战爭 …… 276

第十章　近东、中东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 288
一、战后最初几年国际关系中的近东和中东 …… 288
二、美帝国主义在土耳其和伊朗发动进攻和建立軍事基地 …… 295
三、委任統治制度。阿拉伯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 306
四、巴勒斯坦战爭。以色列国家的建立 …… 311
第十一章　非洲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关系 …… 316
一、意大利各殖民地和委任統治地的归宿 …… 318
二、非洲在帝国主义的經济和軍事—政治計划中的地位 …… 324
三、殖民主义者的策略手段和非洲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 329
第十二章　1945—1949年的拉丁美洲 …… 334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拉丁美洲各国的影响 …… 334
二、墨西哥会議、旧金山会議和美国的立場 …… 338
三、西半球各国軍事—政治集团的建立 …… 341
四、拉丁美洲經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尖銳化 …… 345
五、波哥大会議及其后果 …… 347

第　四　篇
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及其对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資本主义世界經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 …… 358
一、資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阶段 …… 358
二、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战后恢复平时生产的問題。經济的軍事化。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經济上的結构变化。帝国主义陣营中力量的新配置 …… 363
三、殖民体系的瓦解及其对世界資本主义經济的后果。不发达国家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分工的帝国主义基础的摧毁 …… 373

四、帝国主义国家爭夺市場和投資場所的新阶段的开始 …… 382
五、国际經济关系中的国家壟断趋势的发展。超国家的經济組織是帝国主义之間竞爭的新領域 …… 389
第十四章　美帝国主义变为反动和侵略势力的主要中心。1945—1949 年美国的对外政策 …… 394
一、美国在被削弱的資本主义世界中作用的加强。美国壟断資产阶級在国內外的反共主义 …… 394
二、美帝国主义夺取世界霸权的斗爭綱領 …… 406
三、"实力地位"政策被提升为国家的对外政策理論。"原子战略"和"原子外交" …… 414
四、"冷战"的发动。"杜魯門主义"的宣布 …… 422
五、共产主义"遏制"論的宣布。美帝国主义反民族解放运动的斗爭。在資本主义世界內部确立美国領导权的路綫 …… 430
第十五章　英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改变。英国在 1945—1949 年間的对外政策 …… 446
一、經济状况和阶級力量的配置 …… 446
二、英国在 1945—1949 年間的对外政策 …… 451
三、英国在战后初期的对外政策的总結。英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 …… 463
第十六章　法国在 1945—1949 年期間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 …… 470
一、从战爭过渡到和平期間的法国 …… 470
二、战后的法美关系和法英关系 …… 476
三、法国政策中的德国問題 …… 480
四、法国与帝国主义国家軍事政治集团的形成 …… 486
第十七章　意大利 1945—1949 年間的国际关系 …… 495
一、意大利人民的反法西斯民主革命和美英的政治战略 …… 496
二、和約問題和意大利在战后最初年代中的作用 …… 506

三、意大利加入帝国主义国家的經济和軍事—政治集团 …… 515

第 五 篇
在战后安排的基本問題上两种方針——民主方針和帝国主义方針的斗爭

第十八章　战后和平安排的基本原則和从1945—1949年的德国問題 …… 523
一、德黑兰会議、雅尔塔会議和波茨坦会議 …… 523
二、战爭結束后西方大国的反波茨坦方針 …… 536
三、苏联为履行波茨坦协定所作的斗爭 …… 542
四、从建立双占区到西德单独实施币制改革 …… 550
五、华沙会議和社会主义陣营国家的新建議 …… 552
六、"柏林危机"和外长会議巴黎会議 …… 554
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完成德国的政治分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 …… 559
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 563
第十九章　远东的战后和平安排和日本 …… 566
一、日本的被击溃与和平安排問題 …… 566
二、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权的确立 …… 570
三、莫斯科三外长会議。苏联在远东委員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員会爭取日本民主化和非軍国主义化的斗爭 …… 573
四、日本的政治和經济改革 …… 578
五、中国解放运动的胜利和美国在日本的政策 …… 581
六、战后头几年对日和約問題 …… 584
第二十章　对德国前盟国和約的准备工作 …… 586
一、对德国前盟国和平安排的特点 …… 586
二、历次外长会議上所进行的和約草案的准备工作 …… 589
三、巴黎和会 …… 592

四、和約的政治条款 …… 594
五、和約的領土問題 …… 597
六、和約中有关賠償和其他經济問題 …… 601
七、一九四七年和約 …… 607
第二十一章　联合国組織的成立。1945—1949 年联合国的活动 …… 610
一、成立联合国的准备工作 …… 611
二、旧金山会議和联合国宪章 …… 615
三、联合国的活动 …… 622
四、圍繞联合国宪章原則的斗爭 …… 630
第二十二章　战后最初年代的裁軍問題 …… 640
一、战爭的結束和裁軍問題 …… 640
二、苏联爭取禁止和銷毀原子武器的斗爭 …… 643
三、"巴魯克計划"——美国的世界原子独霸計划 …… 650
四、美国原子壟断的破产 …… 655
五、苏联爭取裁減常規軍备的斗爭 …… 657

第 六 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冷战"拼凑帝国主义軍事集团

第二十三章　"馬歇尔計划"。美国統治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动力量的打算 …… 667
一、"馬歇尔計划"的主要目的 …… 667
二、"馬歇尔計划"和美国在西欧的經济政策 …… 674
三、"馬歇尔計划"的軍事战略作用 …… 684
第二十四章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軍事集团的方針 …… 691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性质和特点 …… 691

二、美—英—加拿大軍事合作的恢复 …… 695
三、美洲国家間互助条約 …… 698
四，英法敦刻尔克条約。布魯塞尔条約的签訂和西欧联盟的建立 …… 700
五、美国和西欧联盟。范登堡决議 …… 707
第二十五章　大西洋集团——帝国主义扩張和侵略的主要工具 …… 710
一、北大西洋集团建立前夕 …… 710
二、北大西洋公約——美国帝国主义集团侵略政策的工具 …… 717
三、北大西洋集团战略主張的制定。美国軍事援助的第一个綱領 …… 722

第七篇
1945—1949年的国际关系和意識形态的斗爭

第二十六章　在战后国际关系中意識形态斗爭的作用的加强。帝国主义集团所挑起的反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心理战" …… 734
一、在国际关系中意識形态斗爭的作用不断加强的基本原因 …… 734
二、"心理战"，其机构及基本方針 …… 746
第二十七章　資产阶級思想家对于1945—1949年国际关系特点和实质的伪造 …… 759
甲、現代資产阶級著作中研究对外政策問題的目的、方針及方法 …… 759
乙、資产阶級历史編纂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結論的歪曲。为帝国主义的战后世界計划而辯护 …… 769
一、对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伪造 …… 769

二、帝国主义的"美国世界"的宣傳 …… 774
三、英帝国統治阶級的战后奢望 …… 785
四、反动集团对于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合作政策、雅尔塔
协定和波茨坦协定的抨击 …… 788
丙、"冷战"的辯护者反对和平共处政策的斗爭 …… 798
一、資产阶級关于"冷战"起源的理論 …… 798
二、反动的思想家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过程的歪曲 …… 802
三、对和平共处原則的歪曲 …… 810
四、为帝国主义的战后侵略政策辯护 …… 815
参考书目 …… 833
名目索引 …… 872
人名索引 …… 891

第 一 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政治总結

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垮的結果，引起了世界革命过程的扩大和加深。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正是同这一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集团发动这次战爭，不但是为了重新分割或保存自己的統治范圍，而且还打算鎮压全世界的革命力量，使世界恢复到資本独霸的时代。但是，帝国主义政策和战略的这一主要方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完全失敗了。生活又一次证明：帝国主义要利用战爭来制止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解决壟断資本主义所固有的足以引起革命的极其尖銳的阶級矛盾，这是办不到的。

社会主义苏联在反法西斯主义战爭中的举足輕重的作用和参加反法西斯联盟的各資本主义国家人民对于打垮国际反革命主力所作的貢献，促进了世界舞台上阶級力量的对比发生根本的变化。战爭使許多国家的劳动人民遭受空前的貧困和痛苦，这种处境促使群众产生了新的革命毅力，产生了一种願望：不但要鏟除侵略的直接根源——法西斯主义，而且还要消灭产生帝国主义冒險行动的社会制度——資本主义。

战后时期国际关系的主要趋向，要不是在国际反动派的突击力量法西斯主义和世界一切进步力量的先鋒队社会主义之間的这

場大搏斗过程中酝酿成熟，就是同这場搏斗的結局有着密切联系。因此，为了正确地理解和闡述現代国际政治的发展，就要对战爭的过程和結局所发生的那些进展和变化，予以深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評价。研究战后时期的国际关系，必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結果以及大战給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带来的后果加以分析。

本书論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政治总結这一篇的作者們，給自己提出的正是这样一个任务。他們要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要剖析当时两个帝国主义集团的当权人物作战的目的，同时揭示苏联以及資本主义各国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群众所抱的宗旨。作者在本篇中研究了当时可能成立反希特勒联盟的条件（这一联盟把当时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在反对法西斯国家集团的斗爭中团結在一起），还研究了决定这一联盟发生內部矛盾和在战后瓦解的原因。对战爭时期作了研究之后，就有可能判明全世界范圍內各种阶級力量配置的具体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軍事战略总結在本篇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因为这个問題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

在战爭中进行較量的两个主要資本主义集团的反动派，都指望苏联将在这次战爭中被消灭或拖得精疲力竭，从而使战爭能以帝国主义的和平而告結束。至于談到这个和平的条件，則两个集团的帝国主义力量，首先是德国和美国，彼此都打算打垮对方并保证确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但是，战爭的实际結果却决定于苏联在击溃希特勒德国、法西斯意大利、軍国主义日本及其仆从国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决定于采取抵抗运动形式的反法西斯武装斗爭的发展，决定于法西斯主义在軍事、經济和政治上的破产。苏共綱領中指出："苏联把人类从法西斯奴役下拯救出来。"① 在战略上，苏联經过第二次世界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6 頁。

大战变得强大得多了。这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主要目的的失败。

第一卷第一篇說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因此而产生的社会震蕩在現代資本主义經济和政治中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在战爭过程中和战后，資本主义国家經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更加严重了。許多国家因战爭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对战后国际关系起了重大的影响。世界資本主义的經济在結构上有了极大的变动。

資本主义在战爭結束时大大地遭到削弱，无論在經济方面或在政治方面，都处于一蹶不振的境地。因为一系列幅員广大、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国家脫离了資本主义，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不得不在縮小了的范圍內发展。帝国主义这种产生法西斯主义和战爭的社会制度，在人民心目中已經威信扫地了。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以及在日本，壟断組織的政权都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殖民体系日益加剧的瓦解过程开始了。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比第一阶段更加严重的資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阶段的开始。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由于經不起它所发动的战爭的考驗，在世界范圍內又一次遭到失敗。

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民主运动的高漲，成为战爭期間和战后年代中世界政治发展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点之一。抵抗运动对于战胜法西斯主义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它促进了民主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发展。在一系列国家中，抵抗运动常常越出了反法西斯斗爭的范圍，提出了深远的社会改造任务。

在战爭过程中和在战后最初年代里，在世界舞台上出現了組織性比战前更强得多的民族解放运动。正是在这些年代里，民族解放运动的跃进才漸漸酝酿成熟，它在以后十五年中实际上导致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

所有这些头緒紛繁的过程都影响到战爭末期的国际关系的发

展，并且影响到战后和平安排的問題。西方国家打算实現凡尔賽类型的帝国主义和平的企图之所以破产，首先就是因为苏联忠于苏联人民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之付出了重大牺牲的民主和自由的宗旨，而坚决反对美英統治阶級的这一政治路綫。由于革命运动的成就和人民民主革命在一系列欧洲和亚洲国家中的胜利，帝国主义在有关战后和平安排的問題上施展阴謀詭計的可能性就大为減少了。人民群众政治上的日益成熟和对資本主义各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实际影响，在粉碎帝国主义陣营的計划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反希特勒联盟主要参加国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的三边国际会議，反映了这个联盟內部和全世界范圍內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力量的对比，这一对比是由苏联在战爭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得到各国广大社会力量支持的苏联对外政策的坚定性和原則性决定的。这就排除了西方国家操纵会議的可能性，排除了它們在战后安排問題上将帝国主义政策强加于苏联的可能性。

苏联积极参加了这些会議，并且在大多数場合爭取到使这样一些建議作为盟国的共同政策而得到通过，这些建議如果眞正能够实現，就可以为根除德国法西斯主义、消灭德国帝国主义的經济基础、建立爱好和平的民主德国、消灭經常存在的危險策源地和巩固欧洲和平，打下良好的基础。

战爭的主要結果是全世界范圍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这种結果不但使美国壟断集团想要巩固世界資本主义陣地的政治和战略的主要盘算落空了，而且还使战后时期国际关系的整个体系受到深刻的影响。資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阶段以其历史規律性，使帝国主义迅速失去它在世界舞台上的控制作用。帝国主义永远丧失了过去的行动自由。帝国主义所固有的規律性不再是决定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国际关系发展的因

素了。

如果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只是摧毁了帝国主义国际关系鏈条上的一个环节，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两个体系的力量对比发生根本的变化，帝国主义所建立的国际关系体系已发生了总崩溃的現象。反映社会主义規律性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人民民主革命获胜的欧亚两洲的广大地区占了主导地位。产生一整批既不屬于帝国主义体系、又不屬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的先决条件形成了。資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作用，大大地限制了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爭的政策的可能性。

所有这一切，为苏联对外政策和以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疆域以外大大扩大影响，創立了有利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取得了更加无比广闊的物质、政治和道义的基础，于是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便逐步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际关系发展的性质和道路。

第 一 章

苏联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击溃法西斯主义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能够对后来世界发展的进程发生影响，不仅是决定于这場席卷五分之四以上人类的軍事冲突的史无前例的規模。这一影响首先是决定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战爭的性质及其結局取决于新、旧世界各种社会力量、阶級力量的搏斗，首先是取决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上最富有侵略性的

帝国主义集团即法西斯同盟之間的武装冲突。

一、帝国主义反动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政治和战略阴謀的破产

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誕生的时候起，帝国主义的政客和战略家就以扑灭社会主义的希望聊以自慰。但是摧毁着資本主义、置旧社会制度于死地的新生力量却不可避免地誕生出来，以回答帝国主义反动派为阻撓社会进步所采取的每一个冒險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事态发展也是循着这一方向进行的，不过这一次是具有世界历史的規模。

战爭剛开始时是帝国主义性质的。它是壟断資本主义的世界性經济政治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資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資本主义体系矛盾的尖銳化，加剧了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斗爭，使資本主义国家形成了两个敌对集团。无論是法西斯侵略者的集团或是所謂的“西方民主国家”集团，每一个集团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級都直接为爭夺市場和投資場所、归根到底即为爭夺世界霸权而斗爭——这就是产生战爭的經济基础。法西斯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企图、它們特别富有侵略性的政策路綫，則直接导致战爭的爆发。

帝国主义者想要通过爭夺世界霸权的战爭来解决它們之間的矛盾的企图，受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自己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对資本主义国家劳动群众起了革命化的影响作用。社会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保卫和平的政策在資本主义国家广大居民中贏得了同情和支持。因此，苏联不但使重新瓜分世界的任何計划、而且使一切侵略政策都难以实现。在那个时期形成的两大帝国主义联盟，都把战爭看成这样一种手段，即通过它不但可以消灭妄图取得世界霸权的对手，而且还可以摧

毁或极力削弱社会主义国家，鎮压本国革命运动以及殖民地与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巩固資本主义的基础。

法西斯国家是发动重新瓜分世界的战爭的罪魁禍首，同时也是世界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解放运动斗爭中的堡垒。法西斯統治者在抛棄了資产阶級民主幷在自己国內确立了公开的恐怖制度以后，便揚言，自己的目的是把法西斯暴政推广到全世界，首先推广到苏联境內，他們打算在那里用武力来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剝夺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成果，迫使他們淪为奴隶。《反共协定》① 的使命是促进两大互相竞爭着的集团的統治阶級在思想上接近起来。

法西斯侵略者不无根据地指望，他們的竞爭者即英国、法国和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对社会主义的仇恨将会削弱三国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抵抗。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在对苏联的态度上尽管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它們的政治战略却有共同之处。每一个集团都十分希望首先牺牲苏联来解决自己的矛盾。

虽然深刻的矛盾使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壟断資本家同他們的德、日、意竞爭者有所疏远，但是他們大家都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同社会主义作斗爭的突击力量。例如在劳合勛爵所写的一本小册子(該书前言是由著名国务活动家哈里法克斯勛爵写的)中就明显地反映了那个时期英国統治阶級的情緒。劳合在战爭开始时曾这样評价希特勒的政策："不論他的方法多么恶劣，他的外交手腕多么背信棄义，他对欧洲其他国家人民权利的蹂躪是如何不能容忍，但是他可以指望被看做整个欧洲利益的保护者，而这一点无論在什么时候都可以作为其他同样决心不将自己的傳統制度去为世界革命牺牲的民族同他达成相互諒解的基础。"② 正因为如此，西方

---

① 《反共协定》是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在反对共产国际的口号下，于1936年11月25日在柏林签訂的条約。——譯者

② *Lloyd of Dolobran.* The British Case. New York, 1940, p. 83—84.

国家不但促进了法西斯匪徒政权的巩固，而且还为他們的侵略开辟了道路。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不但纵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进行战爭的准备，而且还破坏苏联所坚持的組織集体安全体系的活动。直到最后的时刻，他們还指望将法西斯侵略的鋒芒指向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国际关系史有許多事实反映了西方国家挑撥反苏战爭的政策。①为了实現这一政策，"西方民主国家"就把中欧和东欧国家一个一个地送到法西斯侵略者手中，并使后者面向苏联。慕尼黑阴謀便是这一政策的最高峰。借法西斯竞爭者之手削弱或摧毁苏联，然后猛击被战爭削弱了的帝国主义竞爭者，并确立自己的世界霸权——这就是"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战略。它使得苏联不能建立巩固的集体安全体系，因而不得不在1939年8月23日签署了德国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約。

"西方民主国家"反动的上层人物未能使希特勒侵略的鋒芒仅仅指向苏联，也未能为联合进行的"反布尔什維主义的十字軍远征"創造前提。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們挑撥性的阴謀遭到破产。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在当时条件下压倒了使两个对立集团互相接近的力量。苏联对外政策由于充分估計到两个集团的竞爭，便打乱了組織反社会主义的"十字軍远征"的計划。

德国法西斯匪徒和日本軍国主义者出于自己的政治和战略需要的考虑，决定了对敌打击的先后次序問題。希特勒认为苏联是比較强大的敌人，因此首先襲击西方国家。至于日本軍国主义者，則正像尼·謝·赫魯

① 参見《Истори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1—1945 гг.》, Т. I. М., 1960, стр. 131—173, 以及 *В. Матвеев.* Провал Мюнхен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938—1939 гг.), М., 1955; *А. Батурин.* США и Мюнхен. М., 1961。

曉夫在同日本《朝日新聞》主編的談話中指出的："日本当时进攻美国，而沒有进攻我們，这是按照日本参謀总部的意图而进行的，即打算首先击溃中国和美国，然后当我們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爭中拖得精疲力竭的时候，再来猛击苏联。"①

西方国家領导集团中的慕尼黑分子在欧洲战爭开始以后仍旧遵循着以前的政治路綫。他們不止一次地試图将已經开始的战爭引到另一条軌道上，将战爭的鋒芒指向苏联。戴高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时法国一些有势力的集团"对于如何打击俄国……比如何对付德国更为关心"②。当时在英国議会中曾公开談論，英国政府的主要宗旨是"将对德战爭轉到俄国身上"。这就可以解釋1939—1940年英法反对法西斯德国所进行的"奇怪的战爭"的整个过程，可以解釋英法参謀总部在那些年代里經过深思熟虑而酝酿成熟的通过土耳其（"魏剛計划"）和芬兰来进攻苏联的挑衅性阴謀。当英法軍队在西方战場上按兵不动的时候，希特勒就可以收拾波兰和它們的其他盟国。

結果，法西斯德国能够比較迅速而无須特别費勁地占領了或控制了一系列的欧洲国家。德国軍队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間就占領了波兰。在两个月內完全占領了挪威，一天之內占領了丹麦。法西斯德国在十九天之內征服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后来用四十四天击溃了法国。东南欧各国都被德国控制住了。这就是不体面的慕尼黑政策的結局。使英国也陷于溃退边緣的敦刻尔克，只不过是慕尼黑的一个合乎邏輯的結局而已。

因輕易得胜而得意忘形的侵略者认为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是同竞爭者达成协議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基础。

中欧和西欧的資本主义国家被击溃了，于是法西斯德国决定开始向苏联进軍。德国法西斯的領导当局不无根据地指望，苏联

---

① *Н. С. Хрущев.*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и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М., 1958, стр. 99.

② 戴高乐：《战爭回忆录》第1卷（召喚·1940—1942）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27頁。

的失敗，将为迅速而又彻底的击溃英帝国創造一切前提。

在叙述 1940 年 7 月 31 日在貝尔格霍夫举行的德国高級領导人会議的材料时，加尔德尔将軍在自己的日記中引述了希特勒的下面一段話："英国的依靠是俄国和美国。如果失去对俄国的指望，那么美国也会不去理睬英国，因为击溃俄国的結果将是日本在东亚无限的加强……。"① 战胜苏联后的进一步行动計划在 1941 年 6 月 11 日希特勒給德国軍队各兵种司令的第三十二号命令中有了发展。这些計划包括以下內容：1941年在整个欧洲大陆上确立德国和意大利的軍事統治，1942 年两国的武装力量即将經过土耳其和伊拉克而开往近东，占領北非、西非的基地和大西洋各島，最后，在英国登陆并"完成大不列顛已經形成的崩溃。"② 除此以外，根据1941 年 2 月 17 日加尔德尔日記中的記載，希特勒統帅部当时还打算占領阿富汗，并开始侵占印度。

法西斯侵略者給許多国家、其中也包括英国、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民族利益，甚至給他們的自身生存都造成了致命的威胁。

早在进行"奇怪的战爭"的日子里，德国外交部就拟定了一項关于战胜法国和英国后世界經济改造的秘密备忘录。其中規定建立"大德意志經济范圍"，在这个范圍中除了包括已被占領的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領土以外，还要包括新被占領的国家（最先是比利时、荷兰、挪威和卢森堡）。希特勒匪帮計划把西欧人民迁移到东欧和东南欧，并打算事先歼灭所有的斯拉夫居民。

在 1941 年 4 月 2 日的罗森堡备忘录中写道："应当考虑一下关于迁移丹麦人、挪威人、荷兰人以及在战爭胜利結束以后迁移英国人的問題，以便在一代或两代人的过程中将这片領土作为德意志化了的国家而并入德国本土。" 1941 年由希姆萊領导的部門制定的"东方"总計划中，曾打算将成千成万的欧洲居民进行肉体消灭或将他們迁移到西伯利亚西部、北高加索

① «Поражение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д общ. ред. генерал-майора *Н. Г. Павленко*. М., 1960, стр. 75.

② 参見«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61, № 6, стр. 87—89。

以及南美和非洲。①由于在欧洲被占领国家中建立希特勒的“新秩序”和“死亡工厂”，使得这些秘密計划中的許多計划还在战爭年代就公諸于世。

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侵略阴謀說明了使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分道揚鑣的帝国主义矛盾是多么深刻和不可調和。西方国家中最有远見的政治和軍事活动家都能认清当时希特勒侵略所造成的威胁的規模。美軍参謀总长乔治·馬歇尔将軍在給陆軍部长的报告中写道，如果法西斯德国能够实現它对付苏联和英国的計划，那么美国人民“就势必要……在西半球上碰到一个已經統治大部分地球的敌人”②。

遭到侵略的各国人民都已体会到法西斯主义所带来的危險是多么严重。資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級和共产党反对法西斯主义和战爭販子的斗爭十分有利于反法西斯运动的形成。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是在团結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反对战爭和法西斯主义的口号下举行的。資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号召人民群众努力同苏联在保障集体安全方面采取共同行动。苏联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提出的采取反对法西斯侵略的集体行动的思想，已深入到千百万人的心坎中。

帝国主义之間矛盾的尖銳和不可調和，法西斯国家政策的性质的遭到揭露——迫使“西方民主国家”的統治集团也采取比較坚决的行动。劳动人民群众也越来越坚决地要求他們做到这一点。溫·丘吉尔政府接替了公开的慕尼黑分子。丘吉尔由于考虑到人民的情緒而宣称：“我們要为了把世界从納粹暴政的災难中拯救出

① 参見《Генеральный план 〈Ост〉. Публикац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60, № 1, стр. 83—98。

② 《The War Reports of General of the Army G. Marshall, General of the Army H. Arnold, Fleet Admiral F. King》.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1947, p. 149.

来而战斗”。在法西斯匪徒占領的国家中展开了抵抗运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几年里，中国人民抵抗日本軍国主义者的不可調和的解放斗爭加强了。波兰、南斯拉夫、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战斗展开了。在人民的影响下战爭便越来越具有反法西斯的、解放的性质。随着苏联的参战，战爭的政治性质也发生了深刻的质变。战爭轉变为解放的和反法西斯战爭的这一过程最終完成了。

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以后，“西方民主国家”的領导人不得不去建立有苏联参加的反希特勒联盟。法西斯侵略者不但威胁了苏联的生存，威胁了“西方民主国家”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也威胁了包括美国、英国和其他許多国家的壟断資产阶級在內的資产阶級中最有势力的集团。保护自己利益的必要性迫使这些国家的統治阶級去建立反希特勒联盟。虽然西方国家中許多有势力的代表还梦想同“反共协定”参加国共同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十字軍远征”，但实际上他們不得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突击力量即法西斯国家的战爭。

正如尼·謝·赫魯曉夫在 1957 年 11 月 14 日同美国合众社記者的談話中指出的，“有阶級——資产阶級和工人阶級——的利益，有民族的利益，还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形成了这样一种形势：資本主义国家被迫同苏联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富有侵略性的希特勒德国。”①

不言而喻，美国和英国的統治阶級并沒有因此而改变自己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看法。弗·伊·列宁曾經說过：“任何战爭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某个国家或某个阶級在战时所实行的政策，必然是它們在战前长时期內所实行的政策的继續，只不

---

① *Н. С. Хрущев.*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и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стр. 254.

过在行动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①

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絲毫也沒有消除它的社会主义参加国和資本主义参加国之間的思想意識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发表的一篇关于英国願与苏联結成联盟的广播演說中是用下面一番話来开始的："最近二十五年以来，沒有一个人比我更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② 但是以英美为一方、法西斯集团国家为另一方的帝国主义之間的竞爭迫使英美統治集团去建立反法西斯联盟。

然而在苏联参战以后，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級仍旧追求那些与抵抗法西斯主义的人民所渴望的民主解放理想全然不同的政治目的。在許多英美統治阶級著名代表的发言中曾一再談到資产阶級对战爭所抱的眞正目的。

例如，在战爭快要結束时担任副总統、后来又当上美国总統的參議員杜魯門所发表的一篇声明是尽人皆知的。1941 年 6 月 23 日杜魯門宣称："如果我們看到德国胜利，我們就应当帮助俄国，但如果俄国胜利，我們就应当帮助德国，这样让它們厮杀不已，杀得愈凶愈好"。这番話证实了英美統治集团想使苏联和德国打得两敗俱伤，从而为英美帝国主义者在战后世界的統治創造有利条件。

如美国副国务卿薩姆納·威尔斯在他向国会特别委員会所作的证詞中宣布的，美国領导人在1941年认为在战爭結束以后就将进入这样一个时期，这时将由"合众国和大不列顛組成的警察力量来行使职权"，直至包括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国际組織成立。这就是打算借助于这种力量来为根据美国帝国主义統治集团提出的条件安排战后世界問題奠定基础。

---

① 《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69 頁。

②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II. London, 1950, p. 331.

但是，在千百万人已被卷入的反法西斯战爭中，帝国主义資产阶級是不能决定事态的发展的。

社会主义国家的参战对战爭的过程和結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苏联把符合各国人民意願的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爭的明确的政治目的宣布出来，这一行动本身已經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苏联不只希望消除它所面临的千鈞一发的危險，它的目的还在于：

(1) 使欧洲和亚洲各国人民摆脱法西斯侵略者而得到解放，并帮助他們重建自己的民族国家；

(2) 让欧洲被解放了的人民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来自行决定其国家制度問題；

(3) 設法使一切法西斯罪犯——不管他們藏匿在哪一个国家——为他們所犯下的一切暴行而受到严厉的惩罰和处分；

(4) 在欧洲确立一种可以完全排除德国重新发动侵略的可能性的秩序；

(5) 为了恢复遭到希特勒匪徒破坏的經济和文化，必須建立欧洲人民以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为基础的长期的經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苏联所宣布并一貫加以执行的眞正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战爭目的，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并且也符合于全体爱好自由的人类的希望，这些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各国人民眞正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

同迅速击潰法西斯主义有着切身利害关系的各国人民对他們本国的政府施加了影响。反希特勒联盟中的資本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由于考虑到人民群众的情緒，由于希望抵消苏联所提出的政治綱領的国际影响，便于 1941 年 8 月 14 日发表了大西洋宪章和其他一些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虽然采取了隐隐約約的形式，但是

毕竟宣布了战爭的一些民主目的。

美国和英国政府签訂这些文件以后，对社会輿論不得不作一定的迁就。两国中最反动的集团都认为大西洋宪章只不过是他們对战爭与和平問題的眞正态度的伪装。尽管如此，发表这些文件的事实还是不能不意味着，美国和英国政府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必須考虑到战爭的反法西斯的解放的性质。

根据同苏联締結的协定，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承担一定的义务，即把反法西斯的战爭进行到最后胜利幷力求根据民主的原則来解决战后問題。参加反法西斯联盟的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热烈拥护战爭的民主目的。苏联人民的卫国战爭同各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爭取独立、爭取民主自由的斗爭有机地融为一体。在这种条件下，美国和英国的統治集团想把战爭引导到一般帝国主义政策的軌道上的一切尝試都遭到了失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反苏的政治战略計划之所以破产，首先由于它們严重地違反了世界社会发展的規律。法西斯德国及其同謀者所发动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战爭，絲毫不能同資本主义体系內部曾經进行的战爭相提幷論。在这次战爭中，不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存亡和国家独立，而且各国人民的民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权利都处在决定的关头上。苏联在战胜法西斯主义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爭取民主目的的忘我斗爭的范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人道主义思想对資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影响——所有这些都預先决定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意料不到的那种結果。

二、苏联在反希特勒联盟的胜利中所起的历史作用

由于反法西斯联盟中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取得了对法西

斯德国及其盟国的胜利。但是該联盟各个参加国在赢得胜利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这首先取决于每一个参加国对这一共同事业作出的軍事、政治和經济的貢献。苏联在击溃法西斯集团的主导力量即法西斯德国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在苏德战場上各个战役的失利而引起的德国法西斯主义战略和政治計划的失敗，决定了战爭的最后結局。

希特勒分子把自己的計划建筑在通过閃电式的襲击去依次击溃敌人上面，建筑在通过牺牲被奴役的国家来补偿德国所遭受的一切損失并为以后的战爭蓄积力量上面。"閃电战"的思想是德国帝国主义冒險阴謀的基础。当希特勒分子还沒有去进犯社会主义国家、而在向較弱的而且幅員不大的資本主义国家进攻的时候，这些計划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現。在欧洲进行战爭的两年中，希特勒德国得以用損失不大的代价（九万七千一百三十六人的死亡和失踪）攫取了实际上是整个西欧大陆的資源。在战爭第一年里，法西斯德国竟能将自己的陆軍和空軍增加一倍，大大增加了几种主要原料的开采和战略物資及武器的生产。希特勒匪徒采納了"巴尔巴罗斯"計划，打算迅速击溃苏軍，并打到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綫上，夺取苏联的資源。

1941 年 6 月 22 日法西斯德国突然用它所拥有的主要力量和物資猛烈攻击苏联。派了三百三十万人，即德国陆軍总人数（三百八十万）的 87% 到苏德战場上；将所有四个坦克兵团和德国拥有的五个空軍队中的四个都投到該战場上。① 法西斯德国及其僕从国出动了一百九十个师来对付苏联。

1939—1941 年希特勒分子在欧洲輕易得到的胜利使德国軍事机器享有不可战胜的名声。不但希特勒分子本身，而且还有許多英、美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也不怀疑德国法西斯主义会迅速战胜

① 参見《Поражение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стр. 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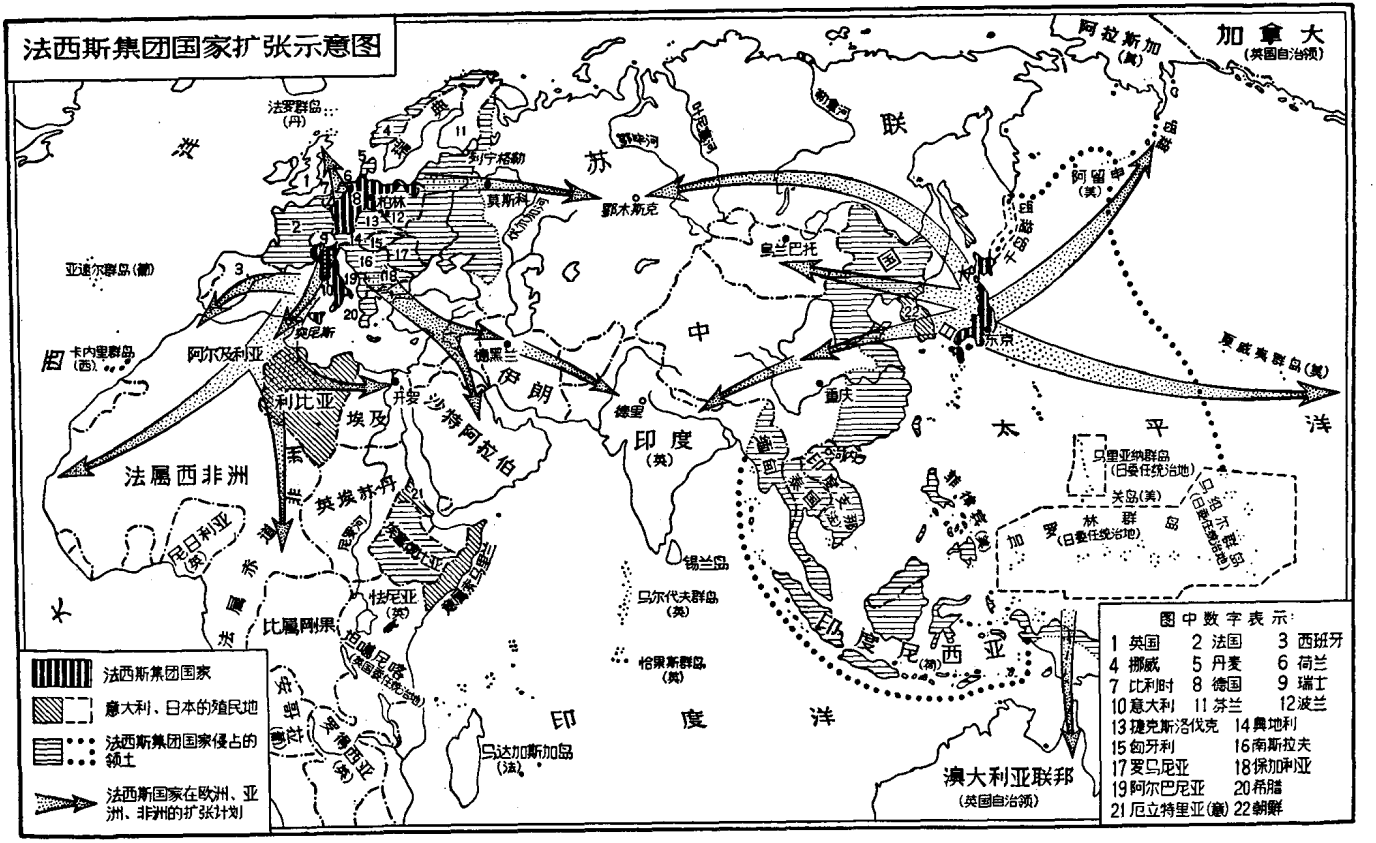
苏联。战爭的第一个时期对苏联及其武装力量来說是不利的。苏軍在战爭开始时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对于軍事政治形势的估計有很大的錯誤。

但是，苏德战場上后来的作战过程很快就使法西斯軍队丧失了"不可战胜"的名声。在这个战場上不但阻止了德国法西斯进一步扩大侵略的道路，而且还形成了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利于反法西斯联盟的根本轉折。資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軍队，即拥有进行現代战爭的丰富經驗幷以西欧所有大陆国家的物資和人力为支柱的一支軍队就在这里遭到了击潰。苏軍粉碎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突击力量，从而預先决定了整个世界大战的結局，决定了受到法西斯主义威胁的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命运。

苏联武装力量在紧張的斗爭中力图在战爭的第一个时期內使战爭发生轉折幷掌握战略上的主动，而这一斗爭是在远远超过西方各战場的广大地区上同敌人的优势兵力进行的。到 1943 年它們取得了幷且巩固了战略上的主动。1941年在莫斯科近郊、1942—1943 年在伏尔加河畔和 1943 年在庫尔斯克近郊的胜利，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阶段。

希特勒軍队在各次战役中牺牲极大。根据德国統帅部文件的統計材料，到 1945 年 3 月，仅以德国陆軍来說，在东方战場上因死亡、失踪、受伤和下火綫未归队而損失的达六百三十一万五千人。希特勒匪徒即使将其它战場上的軍队統統調空，也不能弥补这一巨大的損失。同苏联武装力量作战的兵力占希特勒陆軍总人数的 60% 到 80%。

甚至在 1944 年 6 月西欧开辟了第二战場以后，东方战場仍旧牵制了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人力和物資的主要部分。前駐西欧的希特勒軍队作战部部长Б·齐美尔曼写道："可以毫不夸大地說，东方战場拚命地从駐在西


法西斯集团国家扩张示意图
加拿大
(英国自治领)
阿拉斯加
(美)
法罗群岛
(丹)
冰岛
联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邦
列宁格勒
莫斯科
乌拉尔山脉
鄂木斯克
阿留申
群岛
(美)
千岛群岛
日本
东京
夏威夷群岛(美)
亚速尔群岛(葡)
卡内里群岛
(西)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的黎波里
开罗
埃及
沙特阿拉伯
德黑兰
伊朗
德里
印度
(英)
重庆
中
国
太
平
洋
马里亚纳群岛
(日委任统治地)
关岛(美)
加罗林群岛
(日委任统治地)
马绍尔群岛
(日委任统治地)
法属西非洲
尼日利亚
(英)
比属刚果
肯尼亚
(英)
埃塞俄比亚
锡兰岛
马尔代夫群岛
(英)
怡保斯群岛
(英)
印度尼西亚
(荷)
印
度
洋
马达加斯加岛
(法)
罗得西亚
(英)
澳大利亚联邦
(英国自治领)
法西斯集团国家
意大利、日本的殖民地
法西斯集团国家侵占的领土
法西斯国家在欧洲、亚洲、非洲的扩张计划
图中数字表示：
1 英国 2 法国 3 西班牙
4 挪威 5 丹麦 6 荷兰
7 比利时 8 德国 9 瑞士
10 意大利 11 芬兰 12 波兰
13 捷克斯洛伐克 14 奥地利
15 匈牙利 16 南斯拉夫
17 罗马尼亚 18 保加利亚
19 阿尔巴尼亚 20 希腊
21 厄立特里亚(意) 22 朝鲜

方的德国軍队中搜罗一切具有战斗能力的有生力量和武器。"①为了要恢复和补充被苏軍击溃的部队，德国法西斯統帅部不得不多次实行所謂的总体动員，并且不得不大量建立新編的軍队。但是，无論統帅部如何努力維持他們在苏德战場上的軍队的人数和战斗力，它还是做不到这一点。

苏軍以自己强大的打击拖垮了德国及其盟国的力量，到最后并使他們遭到彻底的失敗。德国法西斯軍队在东方总的損失达到了一个很大的数字——不下一千万人。② 据希特勒的将軍約德尔供认，这一損失到1945年1月把法西斯德国的后备力量完全消耗殆尽。

希特勒軍队在苏德战場上所遭受的損失和失敗以及被迫从其他作战地区和占領地区調遣大量的德国兵力，使得德国法西斯軍队在这些地区的作战行动遭到很大的困难。

1941年5月停止对英国进行空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德国把空軍調去进攻苏联。从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調走大批的德国空軍力量到苏德战場上就十分有利于英美統帅部保护自己的海上交通綫。前德国法西斯的海軍中将庫尔特·阿斯曼在他写的《海战》一文中指出，把空軍部队从地中海地区調到俄国去准备那里的1942年夏季攻势，使得英国人有可能恢复已經失去的海上霸权。③

同苏联軍队展开的紧張战斗使法西斯德国弄得如此的精疲力尽，以致到开辟第二战場时德国不得不全面轉入防御，既无人力、又无物資去防止美英軍队在西欧的登陆。正如美国資产阶級历史学家Ф·波居在自己的学术著作中所承认的，"在西方的敌軍……都体会到战綫拉得太长的不良影响，他們充当了东方战場上有生力量的后备軍，并且又由东方战役中被打

① *З. Вестфаль и др.* Роковые решения.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8, стр. 219.

② 参見《Коммунист》, 1961, № 8, стр. 20。

③ 参見《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ерев. с нем. М., 1957, стр. 171。

得精力衰竭的軍队来补充。"①

法西斯德国反对苏联的战爭使得它的物資消耗殆尽。德国在东方战場上損失了大量的武器，其中包括全部飞机的五分之三。結果德国經济已不能保证生产出战爭所需要的大量武器和物資。苏联軍队进攻行动的作用不但在于使德国法西斯軍队在人力和武器上遭受莫大的損失，而且这些进攻行动还縮小了法西斯德国的經济基础。

不管資产阶級学者如何散布英美空軍"轰炸的攻势"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傳說，絕不是这一点就决定了德国的失敗。据盟軍統帅部作战报告載称，轰炸远不能达到預期的效果。尽管进行了轰炸，德国的軍事生产到1944年年中为止仍不断在扩大。西方国家并沒有能够用轰炸来明显地削弱德国几种主要战略原料的生产。德国从1944年年中起生产开始下降的决定性原因是工厂从德国东方地区的撤退以及东欧的战略原料产地的丧失。②

苏軍的进攻迫使希特勒軍队离开它們业已占領的領土和国家，并且使法西斯德国从这些国家取得主要材料的軍事工业遭到破坏。德国經济学家汉斯·凱勒在战爭結束后指出："由于过去占領的地区停止供应，由于边境地区遭到威胁，因此工业生产处于危机状态。"③

苏联人民使法西斯主义遭到最慘重的道义上的失敗。苏联斗爭的胜利是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者压迫的各国人民开展解放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推动力。苏联的胜利，使得所有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斗爭的国家相信敌人是可以被击敗的。

在偉大的卫国战爭期間遭到击溃和歼灭的，不仅有希特勒德国的主力，而且还有它的欧洲盟国的主力。正是在苏軍的打击下，

---

① *Ф. С. Погью.* Верховное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9, стр. 191.

② 参見 *А. Лаговский.* Стратегия и экономика. М., 1957, стр. 138—141。

③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тр. 382.

同德国結盟的国家(意大利等国)才相继退出战爭。这就意味着法西斯集团政治上、經济上和道义上的基础遭到决定性和彻底的破坏，并且預先决定了德国帝国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最終失敗。

苏联在击溃德国法西斯主义中的决定性作用得到了当时美国和英国的政府領导人的承认。美国总統在1943年2月23日給苏联部长会議主席的信中指出："紅軍和俄罗斯人民已肯定地促使希特勒軍队开始走上彻底溃敗的道路，贏得了美国的永恒的欽佩。"①溫·丘吉尔在战爭年代中也被迫不止一次地承认苏联对战胜法西斯匪帮作出了巨大的貢献这一事实，虽然后来他多次試图歪曲这一明显的眞相。

1945年2月23日丘吉尔写道："紅軍正在胜利地庆祝建軍二十七周年。这种胜利使它的盟国称贊不已，这种胜利决定了德国軍国主义的命运。将来的人世世代代都会像我們这些活着看到这些輝煌的胜利的人那样无条件地承认受了紅軍的恩惠。"②

苏联在击溃日本軍国主义中也作出了巨大的貢献。日本統治集团将自己的战略計划建筑在指望希特勒德国在对苏战爭中获胜的基础上。

在日本参战前不久的一次有天皇出席的日本最高大臣会議上通过了一項关于《帝国政府在当代条件下的政策基础》的文件，在这項文件中就直接强調地指出了这一点。該文件載称："我們对德苏战爭的立場将根据三国公約的条款(同德国联盟的公約。——作者)。我們在若干时間內将不参战，但是要坚决进行反苏的战爭准备……一旦德苏战爭朝着有利于我們的方向发展，我們就利用我們的武装力量来解决苏联問題。"③

日本海軍主力在太平洋上采取了抗击盟国武装力量的行动。

① 《1941—1945年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苏联部长会議主席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版第56頁。

② 《1941—1945年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苏联部长会議主席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308頁。

③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61, № 6, стр. 59.

而日本陆軍的主要部队在整个太平洋战爭过程中都分布在中国的东北(苏联边界附近)、中国的南部和中部地区以及日本島屿上。[①]在整个卫国战爭过程中从后面威胁苏联的是一支极大的日本关东軍。这一威胁迫使苏联不得不在远东保持四十个师的兵力。日本統治集团由于准备向苏联进攻，同时在广大的战場上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战爭，便不能撥出足够数量的陆軍和空軍去同太平洋区域的盟国武装力量作战。

苏联使太平洋上的英美武装力量的行动得到很大的方便。

美国和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績还絕不意味着日本的失敗。在苏联参战以前，美国的軍事和政治活动家估計，击溃日本不会早于1946年秋天。[②] 苏联軍队歼灭了关东軍即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主要突击力量以后，便大大加速了日本的失敗及其无条件的投降。

苏联在战爭中所抱的政治目的，它为达此目的而使用的物力和人力，它的武装力量行动的規模、性质和結果——所有这一切使苏联在击溃法西斯国家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国家的軍事战略的性质和任务，它的唤起广大人民群众抗击敌人的能力，都取决于它在战爭中提出的目的。苏联所进行的是正义的和解放的战爭。它在战爭中的政治目的代表了全体苏联人的根本的和切身的利益，并且符合一切爱好自由人民的切身利益。在爭取达到这些目的的斗爭中，根本就談不到什么政治上的妥协和战略上的权宜手段，而这些是在战爭中追求帝国主义目的的西方国家的統治阶級代表所乐于采用的。

在苏德战場上不仅是进行着两大軍队、两大国家之間的激烈

---

① 参見《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гг.».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M., 1958, стр. 838。

②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 (The Year of Decision). New York, 1955, p. 416.

的战斗，而且这还是新的社会制度即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和最反动的帝国主义国家即法西斯德国之間的一場你死我活的斗爭。

希特勒分子公开把击溃苏維埃国家、摧毀世界社会主义提出来作为自己的任务。在德国最高統帅部的一項命令中（1941年3月13日的），公然指出了"在两个对立的政治制度之間进行斗爭的必要性"①。因此在希特勒于1941年3月30日召集的关于执行"巴尔巴罗斯"作战行动会議上指出，反对苏联的战爭将完全不同于在西方进行的战爭，这种战爭"应当用最殘酷的方法来进行"②。

在偉大的卫国战爭中显示了苏联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捍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的力量。弗·伊·列宁的这样一段話得到了充分有力的证实，他說："在任何战爭中，胜利屬于誰的問題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場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緒决定的。士兵們相信战爭的正义性并且意識到有必要为了自己弟兄們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們会提高斗志并且肯忍受空前沉重的負担。"③

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鼓舞者和組織者是苏联的列宁共产党。共产党所教育的苏联人們无論在前綫，或是在后方都表現出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充分动員起来的希特勒軍队既拥有进行現代战爭的丰富經驗，在武器上又处于优势地位，在他們的突然襲击所造成的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苏联軍队向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抗击。

---

① 参見《Нюрнбергский процесс》.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т. I. М., 1955, стр. 395。

② 参見《Поражение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стр. 76。

③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7頁。

策划着要对苏联发动他們曾經对西方国家进行的那种“閃电战”的希特勒战略家們，以为苏維埃国家在經过初步打击以后也会遭到与法西斯主义所占領的欧洲国家同样痛苦的命运。其他国家統治集团中相当大一部分人也同意这种意見。他們无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在同样条件下，遭受法西斯侵略的資本主义国家总是在短短的期間內就遭到失敗，而苏联軍队和人民的精神却始終是百折不撓的，他們的抵抗力量越来越增长。后来阿·約德尔将軍苦恼地承认：“我們常常由于对俄国的力量估計不足而吃苦头。但这情况不是由于参謀总部偵察机关的缺点而产生的。我倒覚得这是国家領导人的政治路綫的結果。”①

在暫时被德国法西斯軍队、希特勒匪徒占領的地区，无論他們怎样努力，都不能在苏联各民族之間播下不和的种子。他們在苏联也找不到在他們所占領的資本主义国家里所依靠的那种吉斯林②分子和拉伐尔③分子的“第五纵队”。

留在敌占区的苏維埃人同法西斯占領軍进行了无情的斗爭。敌后的游击战爭具有眞正全民的性质。在这里手持武器参加游击队和师团进行战斗的，大約有七十万苏联爱国者；成千成万的人在城市和居民点中同占領軍进行了艰苦的斗爭。④他們的活动以及游击队員的活动，如果沒有全民的支持是不可想像的。这样，苏联人民就表現了自己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赤胆忠心。

苏联偉大的卫国战爭又一次证明了弗·伊·列宁这段不朽的名言的正确性，他說：“这样一个民族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只要这个民族的大多数工人和农民都知道、感覚到幷看到，他們正在捍卫自

① 参見《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61, № 4, стр. 89。

② 吉斯林是挪威法西斯魁首，1940年协助希特勒匪徒占領挪威。1945年挪威复国后被判处死刑。从此欧洲人常把卖国賊叫做“吉斯林分子”。——譯者

③ 拉伐尔（亦譯賴伐尔）是法国的法西斯分子，法国人民的叛徒，法国复国后被处死刑。——譯者

④ 参見《Поражение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стр. 162。

己的苏維埃政权、劳动者的政权，他們正在捍卫这样一种事业，这一事业的胜利将保证他們和他們的子孙能够享用一切文化財富和人类劳动的一切創造。"①

苏共新綱領在談到这一时期的苏維埃国家的历史时指出："苏維埃制度在偉大的卫国战爭——历史上一切战爭中最慘重的战爭——时期經受了特别严酷的考驗。苏联人民在这場战爭中的胜利证明：世界上沒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②

在偉大的卫国战爭过程中，社会主义的經济組織显示了对資本主义經济組織的优越性。

在战爭前夕(1940年)苏联的生铁产量为一千四百九十万吨，鋼产量为一千八百三十万吨，采煤量为一亿六千五百九十万吨。在1940—1941年法西斯德国同被占領的国家出鋼量的总和为三千一百八十万吨，出铁量的总和約为二千万吨，煤的开采量总和为四亿零四百万吨。因此煤的产量差不多超过苏联的一倍半，鋼大約超过50%，生铁超过30%。③此外苏联經济还沒有轉上战爭的軌道。敌人占領苏联相当大一部分領土，使得上述数字比例对我国更为不利。到1941年11月，苏联在暫时被德国法西斯軍队占領的地区損失了采煤量的63%，出铁量的68%，出鋼量的58%以及全部鋁产量的60%。④1942年夏季苏联軍队在南方撤退以后，苏联国民經济的損失更大了。

但是我們社会主义国家高度的組織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們能在最短期限內最大限度地动員我們一切經济資源去抵抗敌人。在1941年用了三四个月时間基本上将工业全部轉上了战爭的軌道。撤往东方的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頁。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5頁。

③ 参見《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гг.》, стр. 847。

④ 参見 *Н.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Во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 1948, стр. 38.

工厂在1942年初已經开始提供产品(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英国,使工业轉入战时計划費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間)。①苏联的工业迅速地加快了軍需品生产的速度。1942年苏联工业生产了两万五千多架飞机,大約二万三千五百辆坦克以及三万四千門口徑为七十六毫米和七十六毫米以上的野战炮。在同年,尽管法西斯德国的經济有利条件比1940年增加了很多,但它只生产了一万四千七百架飞机,九千三百辆坦克以及一万二千門口徑为七十五毫米和七十五毫米以上的野战炮。②

苏联工业中軍事生产的增长有一个比較高的速度,就使得苏联工业在战爭最后几年能够在生产各种作战的技术手段方面大大超过德国工业。在战爭最后三年,苏联每年平均生产十二万門炮,四万架飞机,三万辆坦克。③德国在1942—1944年每年生产一万四千七百架到三万七千九百五十架飞机,九千三百辆到两万七千三百辆坦克。④苏联政府武装并装备了在苏联領土上組成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罗馬尼亚的部队。⑤

甚至在煤、鋼、铁和其他重要战略物資奇缺的情况下,苏联在战爭过程中所生产的战斗装备和武器也大大超过法西斯德国。阿·約德尔将軍在1943年11月給法西斯最高官員的报告中十分惋惜地指出:"对我們来說决定性的因素是:由于进攻到俄国境內情况不明的地区,我們发現敌人不但拥有大量的人力,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軍事工业的技术水平,这种水平使我們不得不进行总体战和在軍事工业部門加倍努力,而我們自己本来是不会这样做的……。"⑥但是,大家知道,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徒然的。

一些資产阶級学者在試图貶低苏联在經济方面也战胜了法西斯德国这一情况的意义时,硬說在苏德战場的武装斗爭的物质保证上起决定性作

---

① 参見 *А. Лаговский*. Стратегия и экономика, стр. 26。

② 参見《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гг.》, стр. 847—848。

③ 参見 *А. Лаговский*. Стратегия и экономика, стр. 90。

④ 参見《1939—1945年德国的战时工业》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32頁。

⑤ 参見《Поражение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вой войне», стр. 85。

⑥ 参見《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60, № 10, стр. 81。

用的是根据租借法案撥出的供应。例如，英国軍事史学家 Дж·富勒就肯定地說，1942 年秋天只有“英美物資經过阿尔汉格尔斯克源源不断的輸入”，才挽救了苏联，因为“俄国的經济情况恶化到了极点”①。但是从美軍参謀总长馬歇尔就1941年 7 月 1 日至1943 年 6 月 30日这一阶段向美国国防部长所作的第二个报告中可以看出，正是在那些年代里美国对苏联的供应是极为有限的。据乔治·馬歇尔将軍向国防部长报道，苏联那时从美国得到了三千多架飞机和二千四百辆坦克。②

在上述时期內苏联本国生产了数万架飞机和数万辆坦克。美国的供应在苏联的飞机和坦克的生产总額中所占的百分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偉大的卫国战爭期間，盟国提供給苏联的全部工业品的比重整个說来沒有超过苏联工业总产量的 4 %。③如以根据租借法案运入苏联的飞机和坦克的质量来說，則較之我們的战斗装备大为逊色。苏联学者不想貶低根据租借法案所提供的援助。无疑的，这种援助曾經起了良好的作用。但历史的眞相是：苏联击潰法西斯德国的主力，首先是依靠本国的武装和自己供应的物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向全人类表明，帝国主义国家最强大的联盟，尽管进行突然的和背信棄义的襲击，也不能摧毀社会主义。不是像战爭发动者和他們的唆使者所預期的那样把苏联消灭或削弱了，而是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对以后的历史进程发生深远影响的胜利。

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現代政治和軍事战略家試图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种結局的历史必然性，决不是偶然的。他們不希望人民把社会主义偉大胜利的基础看做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刻規律。他

① *Дж. Фуллер.*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гг.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6, стр. 248.

② «The War Reports…», p. 123.

③ 参見 *Н.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Во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тр. 74。

們散布战火可能"再起"的幻想来維护帝国主义。

例如，資产阶級学者竭力把法西斯德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国务和軍事活动家所犯的錯誤看做苏联胜利的主要原因。① 他們主要是用德国統帅部的錯誤来解釋德国法西斯軍队在苏德战場上的被击溃。（例如，他們把"中央"軍团右翼部队之投入基輔地区苏軍的包圍圈中，看作是 1941 年夏季对苏联的"閃电战"計划破产的原因。）

当然，希特勒政府和統帅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和进行过程中是犯了不少重大的政治性和战略性的錯誤，这当然影响了战爭的过程。其他交战国也犯了严重的錯誤。但是仅仅把这些錯誤看做法西斯德国失敗的原因——这意味着不考虑苏联因之而获胜、它的敌人因之而失敗的那些主要規律。

許多帝国主义思想家意識到，仅仅用苏联的敌人和盟国所犯的种种錯誤来解釋苏联所取得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是一件毫无希望的事情。所以他們蓄意歪曲历史事件的过程，貶低苏联在击溃德国帝国主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貶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的意义，在此同时却夸大欧洲第二战場、盟国海上和空中作战的作用，把英美軍队的一些次要的——同整个規模相比——战役說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杰出事件。②

大家知道，欧洲第二战場是在偉大的卫国战爭进行到第三年年終时才

① 例如，美国一位著名的学者 У·Д·普尔斯頓将以下几点列为决定苏联取得胜利的錯誤：希特勒的战略在俄国遭到失敗，丘吉尔拖延了进入大陆的时間，盟国在巴尔干的战略的失策，当时在华盛頓仿佛存在着的"亲俄"气氛，对德国提出"无条件投降"原則的錯誤。美国的資产阶級历史学家叙述的所謂"錯誤"的政治涵义是十分清楚的。普尔斯頓认为，如果希特勒实行比較聪明一些的战略，如果丘吉尔不拖延第二战場的开辟，如果盟国能比較勇敢地实現"巴尔干方案"，并采取一系列其他"明智的"政治和战略措施，那么，情况会与战爭快結束时全然不同。換句話說，根据普尔斯頓的邏輯，美帝国主义在同它的同僚合作下就会成为世界上的統治者，并且能够迫使被削弱的苏維埃国家接受自己的条件（«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February 4, 1955, p.107—139）。

开辟的，当时由于苏軍的一些重大胜利，法西斯德国及其东欧盟国的命运已經預先决定了。这时，我軍已經将侵略者完全驅除出苏联国境，并着手直接解放东欧和东南欧的人民。到欧洲第二战場开辟时，敌人在苏德战場上因死伤和失踪而損失了大約六百万名官兵。③換句話說，法西斯匪徒在三年战爭中的損失几乎超过了1941年6月22日侵入苏联境內的德国陆軍总数的一倍。

因此，到欧洲第二战場开辟时，法西斯德国的实力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击溃。更何况它的主力在西方战場建立以后仍在继續同苏軍作战。例如，在第二战場建立前在东方作战的有一百七十九个德国师和五个旅团。④在西方(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境內)那时总共部署了六十个德国师，在意大利部署了二十六个师。⑤到1945年1月初在苏德战場上共有一百六十九个德国师和二十个旅团。而在欧洲其他作战地区（西部和意大利地区）希特勒分子有一百零五个师和四个旅团。

資产阶級学者和政客們的各种"研究"都不能貶低苏联在击溃法西斯德国方面所作出的决定性貢献。尼·謝·赫魯曉夫說："有人想抹煞或是貶低这一胜利的意义。但是，誰也不能够从人民的記忆中、从历史上抹煞苏联人民的偉大的功勛！不仅我們同时代的人，而且我們的后代，都将永远神圣地怀念着在殊死的战斗中击溃法西斯匪徒的英勇的战士們，怀念着拯救了人类光明未来的那

---

② 前希特勒将軍提柏尔斯克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試图使讀者相信，盟国軍队在諾曼底登陆以后，战爭的重心就轉到了西欧(参見 *К. Типпельскирх.*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Перев. с нем. М., 1956, стр. 410)。美国布萊德雷将軍用盟国在阿登"获胜"的战略影响来解釋1945年多季紅軍在波兰和东普魯士进攻的偉大胜利(参見 *О. Брэдли.* Записки солдата.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7, стр.531)。

③ 参見《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60, № 5, стр. 80。

④ 参見《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гг.》, стр. 571。

⑤ 同上。

些人。"①

三、苏联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条件的創立。資本主义世界中解放运动的高漲

反动的帝国主义政客在战爭前夕和战爭初期企图使苏联四面受敌，但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組成的反法西斯联盟却使苏联得以解除这一包圍。英国和美国的統治集团在直接受到希特勒德国威胁的影响之下，被迫同苏联結成联盟，从而不由自主地推翻了他們的宣傳机关所散布的关于苏联及其对外政策的許多捏造。不管世界帝国主义反动派如何努力，結果被孤立和被击敗的不是苏联，而是帝国主义的突击力量——法西斯侵略者。

同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国断絕外交关系的国家越来越多了；到战爭快結束时德国几乎已完全被孤立。而苏联的国际威望則在提高；它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不断扩大起来。1941 年末，苏联同十七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而 1945 年末，苏联已經同四十六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一方面苏联国际威望在提高，另一方面最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力量在国际舞台上被孤立——这都是在苏軍胜利的直接影响下发生的。

1941—1942 年的冬季在莫斯科近郊的战役預先决定了"閃电战"計划的最終破产，粉碎了希特勒軍队"不可战胜"的神話。这次战役成为反法西斯联盟参加国之間建立同盟关系的重要前提：1942 年 5 月締結了苏英条約，6 月締結了苏美协定。值得注意的是，苏英条約不但規定苏联和英国在战爭期間的同盟关系，而

① 尼·謝·赫魯曉夫：《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4 頁。

且还規定两国为了維护和平和抵抗侵略者在战后也建立合作关系。[①] 苏軍于 1942—1943 年在伏尔加河畔以及 1943 年在庫尔斯克近郊的胜利标志着战爭过程中的根本轉折，它促进了反法西斯联盟参加国的进一步团結和苏联的势力和影响的继續增长。正是从1943年年底起开始了一系列的三国最高級会談(在莫斯科、德黑兰等地举行的会議)。在会談过程中苏联、英国和美国領导人协同一致地决定了最重要的軍事和政治問題。在战爭最后阶段苏联对制訂战后国际关系体系做出了决定性的貢献。

在苏德战場作战过程的影响下，其国內的統治集团起初同情法西斯国家的那些中立国家开始同法西斯国家断絕外交关系，甚至向它們宣战。苏德战場上的失敗使得法西斯国家联盟內部惊惶失措和思想混乱。在斯大林格勒胜利后，日本軍国主义分子不得不把"利用有利形势"来进攻苏联的方案埋葬掉。还在 1943 年，希特勒的欧洲盟国就已經开始秘密地試探着同英国和美国单独締結妥协的和約。

匈牙利、罗馬尼亚、芬兰、意大利的統治阶級的代表就采取了这种策略。他們企图同希特勒德国划清界綫并借助于美国和英国来維持自己的地位。在苏軍的打击下法西斯德国的欧洲盟国相继退出了战爭并且把枪口轉向希特勒分子。苏联对外政策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促进了反希特勒联盟的巩固，有助于粉碎英美反动集团想要同法西斯国家单独勾結的一切尝試，并且使战爭进行到彻底击溃法西斯主义。

还在战前时期苏联就力求建立不同制度国家的合作关系以共同制止法西斯侵略，而反希特勒联盟的建立便是苏联这种努力的合乎邏輯的結果。西方国家領导人事实上不得不承认苏联这一对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 М., 1946. стр.270—273。

外政策路綫的正确性。1944 年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說："假定在这次大战前夕，我們四国(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观点完全一致，那末德国人永远也不能向全世界发动进攻。"①

在战爭过程中苏联继續努力来孤立法西斯侵略者，进一步团結反希特勒联盟，贏得巩固的民主和平。例如，1941 年 9 月 24 日苏联政府在倫敦举行的盟国会議上所发表的宣言中强調指出："被迫进行强加于他們的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爭的所有国家和人民的任务，在于力求迅速和坚决地击潰侵略者……。"② 这一宣言补充了英美政府批准的关于战爭目的的大西洋宪章并和这个宪章一道成为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参加国的綱領即《联合国家宣言》形成的基础。③ 苏联外交依靠着苏軍的胜利，依靠着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資本主义各国人民群众的支持，利用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坚持要彻底实現这些目的。

苏維埃国家的性质和苏联对外政策的重要任务同战爭的反法西斯性质是完全一致的，这就决定了苏联在盟国关系上的立場。虽然存在着思想意識上的分歧，但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无論在作战方面，或是在解决重大政治問題方面，都能进行有效的合作。溫·丘吉尔就承认說："俄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而英国和美国則不是、也不打算成为共产主义的国家，但是这一事实并不妨碍我們为了共同的安全和正当的利益而制訂出良好計划。"④

---

① 引自 *W. P.* and *Z. K. Coates*. A History of Anglo-Soviet Relations, vol. II. London, 1958, p. 51.

②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 стр. 164.

③ 参見 *С. Борaтын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ериода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конференции 1941—1945 гг. Перев. с польск. М., 1959, стр. 152, 159。

④ 参見《1941—1945 年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苏联部长会議主席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1 卷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9 頁。

反法西斯联盟参加国合作的經驗证实了列宁关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是极其正确的。联盟中資本主义成員国的政府正式承认了这种共处和合作的必要性。在1945年雅尔塔会議公报中强調指出："唯有我們三国之間以及一切爱好和平（按条約原文是"自由"。——譯者）的各国之間继續增进的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現人类最崇高的願望——一种安全而且持久的和平。"①

随着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之間合作关系的发展，苏联人民和西方各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也迅速得到扩大和加强。苏联人民在軍事上和劳动中的功勋博得了这些国家社会輿論的欽佩。反法西斯联盟中資本主义国家統治集团內反动的、具有亲法西斯情緒的代表不得不暫时收斂起来。对民主組織和主張最坚决地击潰法西斯主义的共产党来說，已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民主的思想对反法西斯联盟中資本主义各国人民的影响增强了。

苏联在战爭中的政治目的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人民譴責那些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場的統治集团的政治伎俩，要求更广泛、更有效地帮助苏联人民进行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爭。

罗斯福在1942年4月給丘吉尔的信中指出："您的人民和我的人民都要求建立战場以減少对俄国人的压力。"②美国和英国人民群众的这种情緒和行动阻止了同法西斯国家的单独勾結（英国和美国的一些有势力的活动家是想要这样做的），促进了反法西斯联盟的进一步巩固及其軍事上的胜利。

希特勒匪徒在苏德战場上的失敗，苏联軍队的胜利，在精神上鼓舞了被法西斯主义奴役的欧洲爱国人士，并为他們的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甚至連前希特勒的将軍們也承认这一点。Л·倫杜利奇上将写道："每

① 参見《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7頁。

② 引自 *H. Feis.* Churchill-Roosevelt-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Princeton, 1957, p. 58.

当大家知道德軍在前綫失利的时候，游击运动就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并扩大了它的規模。"① 担負占領任务的希特勒的师，数目減少下来，它們被苏德战場牵制住了。仅仅在 1941 和 1942 年之交的冬季，德国侵略者就被迫把駐在西欧、中欧和东南欧被占領国家的师由五十六个減到四十三个。② 从 1942 年 12 月到 1943 年 2 月，即在伏尔加要塞附近击潰希特勒匪軍的时期內，由西欧国家抽調了二十七个师到苏德战場。

法西斯国家集团在苏軍的打击下遭到失敗，使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发生了轉折，結果在法西斯的后方，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大多数被占領的国家中，抵抗更带有群众性、組織性，并且带有武装游击斗爭的性质。希特勒的占領軍由于抽調了相当大一部分的部队到东方战場而遭到削弱，所以許多国家中的抵抗运动能够解放一部分領土或打击德国法西斯軍队的后方从而加速了解放。

"不可战胜"的希特勒打手在苏德战場上的慘敗，也对法西斯集团国家的人民群众发生了革命化的影响。几十万人在前綫的牺牲，战爭带給人民的痛苦，由士兵带給后方居民的对战爭的非正义性的认識——所有这一切在法西斯国家中造成、并加强了反战的情緒。

在德国国內，反战情緒也在增长，那里有日益增多的居民阶层开始感到法西斯主义发动的战爭是罪大恶极和前途渺茫的。当德国的战俘和德国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于 1943 年 7 月一同在莫斯科成立"自由德国"全国委員会以后，德国的反战和反法西斯运动便加强起来了。从 1943 年秋天起，这个委員会在德国展开了活动。

在同希特勒德国"結盟"的国家中，反战运动具有更大的規模。这些国家的人民不願意为与他們毫不相干的利益去战斗。他們仇恨他們的反动統

①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тр. 151.

② 参見«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гг.», стр. 839。

治者及其德国主子。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仇視战爭和軍事法西斯独裁的情緒特别加强起来。在意大利、罗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民的憤怒导致了推翻法西斯独裁的結果。

同法西斯主义的斗爭不能不削弱那些展开了抵抗运动的国家中的反动派的地位。抵抗运动的綱領的制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了苏联所宣布的战爭的民主目的的影响，因为正是苏联的軍队解放了被奴役的欧洲。战爭加剧了和暴露了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从而也就促进了群众的政治水平的提高，使他們觉悟到必須改变以前存在的秩序。弗·伊·列宁教导說："斗爭的經驗傳播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深，比在别的环境下宣傳几年的效果还好。"①

民族解放运动轉变为一个客观上也反对"本国"反动派的一般民主运动。在一些国家中，对法西斯主义的抵抗轉变为革命的民主运动。由于法西斯主义的被击溃以及因此而在世界范圍和在許多国家內部发生的阶級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資产阶級更加不能独立地抵抗日益增长起来的民主和进步力量。苏联人民的英雄范例以及他們所取得的对欧洲法西斯集团参加国的胜利，对亚洲人民首先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占領軍的解放运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苏共綱領在估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时强調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苏联的决定性的作用下，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軍国主义被击溃，这为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的人民推翻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权創造了有利的条件。"②

抵抗运动的民主性质使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感到惶恐不安。他們竭力設法鎮压革命的解放力量，阻撓人民群众爭取社会进步的斗爭，限制被法西斯分子占領的領土上的游击战爭的規模。

欧洲和亚洲人民的群众运动的发展使得美国統治阶級夺取世界霸权

① 《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7頁。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6—177頁。

的計划受到打击。在經过美国总統批准的軍事联合委員会1941年9月的报告中指出，美国主要任务之一，是"在欧亚两洲确立这样一种均势，它能最充分地保障这些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美国未来的安全以及在这一点得以实現的条件下确立对經济自由和个人自由有利的制度"①。换句話說，就是要保障壟断資本首先是美国資本在这些地区的活动自由。

英美統治者对人民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抱的敌对态度，在英美軍队在欧洲大陆登陆以后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西方国家統帅部对抵抗力量所采取的行动清楚地表明，随着盟軍登陆而来的是对革命斗爭的鎮压和反革命的輸出。英美軍事当局为了干涉被光复的国家的內政，竭力支持最保守、最反动的分子的政权。正如德·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他答应在1944年8月向戴高乐提供軍事援助（两个美国师），以便在起义的人民所解放了的巴黎"恢复他的权力并維持当地的秩序"②。

美国和英国領导人遵循帝国主义政策的一般准則，打算在被光复了的国家中，以依靠这些国家內部的反动分子的英美軍事行政机关的制度来代替德国法西斯的占領制度。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們首先必須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同即将来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隔絕起来而不发生任何接触，这支武装力量起了巨大的革命影响并堵塞了輸出反革命的道路。

美国和英国的統治集团試图防止苏联軍队向欧洲国家推进。早在1943年魁北克会議討論欧洲的政治和战略形势时，在英美領导人物的言論中，对美国和英国軍队开始进入法国以前可能产生"俄国人单独获胜"的情况，就已經显出了惶恐的情緒。③由于想"在中欧某些地区赶上俄国人"，想先于苏軍占領巴尔干半島，于是产生了丘吉尔提出的第二战場的"巴尔干方案"。

丘吉尔号召自己的美国盟友尽速向东方推进。1945年4月30日他在給哈·杜魯門的信中写道："几乎可以不用怀疑，如果你們的軍队光复布拉格和尽可能地收复捷克斯洛伐克西部更多的領土，就能够完全改变捷克斯

① 引自 *Ф. С. Поппо.* Верховное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стр. 19。
② *D.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New York, 1948, p. 297—298.
③ *J. Ehrman.* Grand Strategy, vol. V. London, 1956, p. 4.

洛伐克战后的局势，并且能影响到邻近的国家。"①

美国对欧洲的民主运动也追求着上述的政治和战略目的，虽然美国和英国领导人之間在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問題上存在着一定的意見分歧。

英美軍队既未能在柏林、在布拉格以及在东欧与东南欧其他国家的首都赶上苏軍，也未能在这些国家建立自己的占領制度。苏联解放了这些国家，就給它們的人民以充分的权利去自己决定关于国家制度的問題。

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特别是1944年5月8日的苏捷协定，对于說明苏联同被苏軍解放了的国家之間关系，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与长期拒絕将被光复的領土的管理权移交民政机关的在法国的盟軍統帅部不同，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統帅部立即将被解放了的領土上的全部权力（直接作战地区除外），都移交給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代表。②苏联不但使中欧一系列的国家摆脫了法西斯統治而得到解放，而且还創造了使人民能够毫无阻碍地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条件。③苏軍的到达就阻碍了东欧反动派对实行社会改造的力量进行武装抵抗，也阻碍了他們指靠外国武装干涉者的援助来发动国內战爭。

苏联一方面执行严格不干涉被解放国家的內政的政策，同时，也不容許其他国家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英美統治集团企图援助这些国家中的帝国主义力量并强迫人民接受反动的政府，对此苏联曾进行了抵制。苏联的坚定立場迫使美国和英国同意在波兰、匈牙利和东欧其他国家中建立有广泛的劳动人民代表参加的民主政府。因此国际反动派沒有能够阻止这些国家中的政权轉移到劳动人民手中，沒有能够阻止彻底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改造的进行。

---

①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VI. London, 1954, p. 442.

②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I. М., 1946, стр. 123—125。

③ 参見本书第六章。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对亚洲发生的事件的进程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和苏軍解放中国的东北，大大便利了中国人民的民主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朝鮮北部永远摆脱了殖民主义者的羈絆。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爭开始了新的阶段。早在 1945 年秋季，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就宣布了独立。法西斯国家集团的被击溃，动摇了整个殖民主义体系的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战胜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同謀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欧洲和亚洲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壮大了全世界的民主和进步力量。战爭的这种結局使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和世界解放运动的一切打算都落空了。快到战爭結束时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之間新的力量对比已經完全形成。

如著名的美国記者斯通后来所指出的：在 1945 年，“苏联的实力使得陆軍部和海軍部的許多官員都不胜惊恐”①。还在 1944 年 5 月 16 日美国參謀长联席会議就向国务院提出建議，該項建議确认了由于苏联实力的“非凡的增长”而引起的“在国家相应的軍事力量方面的革命的变化”。建議起草者断定，美国和英国反对苏联的战爭一旦爆发，“我們将不能够击敗俄国。換句話說，我們将陷入一場我們不能获胜的战爭之中”②。英国軍事領导人也作出同样的結論。1945 年 5 月 24 日英国阿倫布魯克元帅在日記中写道：“今晚我仔細研究了計划起草者关于如果将来同俄国的談判发生困难时我們将同它作战的可能性的报告。我們受命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不言而喻，关于这个問題的想法本身就是不切实际的。成功的希望等于零。无可怀疑，俄国今后在欧洲是万能的。”③

---

① *I. F. Stone.* The Truman Era. New York, 1953, p. 12.

② 《The Conferences of Malta and Yalta. 1945》,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1955, p. 107—108.

③ 引自 *A. Bryant.* Triumph in the West. London, 1959, p. 469—470。

如果把击溃資本主义世界中軍事力量最强大的法西斯国家集团的苏联，同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力量对比作一番清醒的估計，帝国主义者就应当了解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軍事冒險是毫无希望的事情。由于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同时也由于英国、特别是美国希望苏联参加对日战爭，因此使資本主义国家反苏統一战綫的建立发生了一些周折。所以当丘吉尔建議杜魯門"公开发表关于同苏联的分歧的联合声明"时，美国总統拒絕了。杜魯門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同苏联继續进行反对德国和日本的軍事合作的必要性使他深信，发表这种声明的"时机还沒有到来"①。

美国那时已經快要造出原子彈了，杜魯門指望，美国的原子壟断在最近的将来会大大改变美国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力量对比②，同时也将改变美国和英国之間的力量对比，从而可以遏制英国想要充当享有充分权利的伙伴的要求。但是在美国原子彈投在广島和长崎以后，美国的"原子外交"并沒有能够改变由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輝煌胜利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之間的新的力量对比。

尽管如此，西方国家还是試图建立甚至有希特勒德国参加的反对苏联的联合战綫。

溫·丘吉尔及其在英国和美国的同謀者还在1945年就企图同临死掙扎的德国停战而把枪口轉向苏联以便摧毁进步力量和取得世界霸权。1945年春季丘吉尔給蒙哥馬利元帅的命令是人所共知的，即收拾起希特勒分子扔下的武器以便日后同他們一起进行反苏斗爭。③接替罗斯福的哈·杜魯門向他的亲信說出了对苏联实行"强硬"政策的意图。④

①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 p. 25.

② *J. Daniels*. The Ma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1950, p. 266.

③ «The Times», 24. XI. 1954.

④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 p. 72.

这种情緒对希特勒分子来說并不是秘密的。所以他們直到最后一分钟仍继續进行毫无希望的抵抗，指望反法西斯联盟的瓦解，指望同英美进行单独的反苏勾結。后来希特勒的元帅凱特尔在受到苏联軍官的审問时供认："从1944年夏季开始，德国就进行了爭取时間的战爭，盼望那些本来应当发生但是沒有发生的事件的到来。"①

資本主义国家中群众的情緒也阻止了西方国家反动集团在战爭結束以后立即在对苏政策上公然来一个大轉弯。这些国家的人民在进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时，曾經为和苏联人民相同的目的而斗爭。人民群众在战爭中的这种合乎当代規律的作用，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英美帝国主义反动派未能使自己的数百万兵士的枪口轉向苏联。战爭使人民群众学到了很多东西，他們为彻底击溃法西斯主义、为爭取民主的胜利而行动起来。

在1944年底的美国总統选举中弗·罗斯福再度获胜并不是偶然的，原来他坚持将战爭进行到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为止。保守党在1945年7月的議会选举中的失敗也完全是理所当然的，該党战前在英国执政时，曾經由于同德国法西斯主义进行慕尼黑的勾結而弄得声名狼籍。

第二次世界大战說明了帝国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关于世界舞台上的現实力量对比和关于在当代可以对社会主义国家采用武装暴力的观念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帝国主义集团策划和发动世界大战时，是根据簡单的算术計算各国現有的物质力量。他們以为，帝国主义的突击力量即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其同謀者将击溃社会主义。但是，在战爭过程中，按照他們的估計比法西斯集团参加国要弱得多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却击溃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突击力量，摧毁了它的全部陣地。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的經济和政治力量（这决定了它对資本

① 参見《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61, № 8, стр. 69。

主义制度具有根本的质的优越性），共产主义的思想意識对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影响——这都是使帝国主义集团的打算落空的一些因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出現的、同以前根本不同的两个制度之間新的力量对比，使得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单枪匹馬地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世界舞台上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的时代已經开始。在世界上出現了一种新的力量即摆脫了殖民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对外政策的鋒芒在客观上是指向帝国主义政策的。人民群众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大为增长了。

世界舞台上新的阶級力量对比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发生了头等重要的影响，它拥有巨大的內在潜力和取之不尽的活动能力。它不但对国际发展有所影响，而且自己也朝着有利于世界社会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主要結果同时也成为决定战后一切世界进程的主要因素。

第 二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給資本主义国家带来的經济后果

1939—1945 年的大战給世界資本主义經济带来的后果之大，方面之多，使人們难以对它全面加以說明。沒有一个国际經济关系的范圍，沒有一个經济部門，沒有一个国家，同时在一国之內也沒有一个地区不是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直接或間接地受到战爭的影响。

苏联对法西斯侵略者的胜利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其后果来說最重要的政治經济結果，是資本主义世界疆域的进一步縮小。这个結果清楚地表明了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及其第二阶段的开始。这个新阶段的最突出的特点是，与过时的資产阶級世界相对立的已經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不断巩固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由于战爭及其所带来的后果，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資本主义世界內部也形成了新的力量配置。

苏联在战爭中的胜利，彻底动摇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基础，并使殖民体系开始瓦解。继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以后，这是战爭的第二个重要的結果，它对整个世界資本主义經济結构的改变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經济后果也是由战爭的巨大規模决定的。战爭要求以空前的規模动員后备的人力和經济資源，要求不仅使經济的个别部門，而且使整个国民經济都适应战爭的需要。在战火中消灭了这么多人的生命，这样大量由人的劳动創造出来的价值，以致因战爭而引起的荒蕪和損失对世界各国战后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結果作一番比較，就可以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牺牲和破坏的巨大程度（見第 44 頁的表格）。

战爭急剧地、飞跃地加剧了資本主义国家經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战爭給資本主义国家带来的經济后果是极大的。我們将要分析这些后果在具体历史实际中的表現。

一、法西斯侵略者的經济战略及其失敗

法西斯国家之所以发动战爭，是打算实現建立大帝国的計划。

法西斯侵略者的經济战略可归結为极簡单的强盜理論，即"以战养战"的理論。这是彻头彻尾的冒險主义战略。

希特勒德国在欧洲被占領的国家中夺取了它感到十分缺乏的物資，如石油、有色金屬、紡織品原料和食品的儲备。铁路机車車辆的不足依靠被占領国家而得到补充，汽車总数也因此而大大增加。規定的馬克对战敗国貨币的行市使得希特勒分子能够低价收购那些用强制办法征用不到的东西。除此以外，希特勒分子还广泛采用"划撥清算"。他們"购貨"不付現款，而将这笔錢数折成馬克記入被占領国在柏林銀行所开的帳戶。

德国帝国主义試图在战爭过程中不擇手段地实現关于把德国变成欧洲的工业中心，而让其他所有国家变成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的法西斯地緣政治的狂妄計划。这些計划实质上只是在宗主国和殖民地外圍之間进行帝国主义国际分工的旧概念的一种改头換面的做法。这里新的东西是：希特勒匪徒試图在工业的欧洲建立殖民地外圍，使欧洲的文明民族倒退到中世紀和野蛮时代。这是头等反动的帝国主义的荒謬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了使它必然破产的不可調和的矛盾。不能削足适履地把历史上形成的欧洲各国的經济結构完全納入德国"紊乱的經济"中。这些国家的許多經济部門都陷入瘫痪状态中。那些依靠海外提供原料和面向国外市場的部門，情况特别严重。法国、比利时、荷兰、捷克斯洛伐克、丹麦、挪威的工业不振幷开始衰落下去了。它們同傳統市場的历史联系完全被割断。这些国家的畜牧业由于失去濃縮飼料的进口而減产了，农业的其他部門也开始衰退。

起初对淪陷区的掠夺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法西斯国家的資源。但同时这种掠夺也破坏了历史上形成的各个經济部門的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从而也破坏了实現进一步掠夺的經济上的可能性。

两次世界大战中人的損失和物資的消耗

	1914—1918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39—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
交战国总数①	36		61
被动員到武装力量中的人数(以百万人为单位)①	70		110
死亡的人数（以百万人为单位）	10①		約50
所有交战国按照国家預算所撥出的軍事費用（以十亿美元为单位）	208.1②		—
交战国(苏联除外)按照国家預算所撥出的軍事費用(以十亿美元为单位)	—		925③
包括損失部分的价值在內的战爭費用（以十亿美元为单位）	260④		3,300④
軍事費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美国	15.5⑤		50(1941—1945年)⑥
英国	36.9⑤		51(1940—1945年)⑦
法国	25.6⑤		—
德国	31.6⑤		—
	1917年⑧	1918年⑧	
工业动員的程度（軍事生产在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			
(甲)按部門統計			
冶金工业	—	90	—
整个重工业	—	75—80	—
輕工业	—	50—70	—

（乙）按国家統計			
美国……	10	40	40（1944年达到的最高点为70）⑥
德国……	75	75	70（1944—1945年达到的最高点为85）⑨
英国……	60	65	50（1943年达到的最高点为74）⑦
法国……	70	75	—

	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	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生产出来的武器（以百万件为单位）		
大炮……	0.139⑩	1⑪
炮彈……	914⑩	1,758.3⑪
步枪……	28.9⑩	52.3⑪
机枪（輕机枪和重机枪）…	1.07⑩	4.4⑪
子彈……	30,600⑩	95,300⑪

① 参見《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гг.》, М., 1958. стр. 826。

② 参見 *А. М. Алексеев*. Военные финансы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М., 1952, стр. 60。

③ 苏联的軍事費用是357,000,000,000美元（参見 *А. М. Алексеев*. Военные финансы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тр. 60）。

④ 参見《Коммунист》, 1961, № 10, стр. 124; *S. B. Cloug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59, p. 442。

⑤ 参見《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в цифрах》. М., 1934, стр. 64。

⑥ 根据世界經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人員 В·А·基罗夫的統計。

⑦ 根据世界經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人員 З·М·索朗佐夫的統計。

⑧ 参見 *П. А. Белов*.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войны. М., 1951, стр. 65, 113。

⑨ 根据世界經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工作人員 Б·З·科諾紐克的統計。

⑩ 参見《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в цифрах》, стр. 38—40。根据七个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奧地利和俄国）計算出来的数字。

⑪ 只根据四个国家（苏联、美国、英国、德国）計算出来的数字。資料来源：《1939—1945年德国的战时工业》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А. Лаговский*. Стратегия и экономика. М., 1957; «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1946, №10, 11.

大家都知道，在斯拉夫土地上，納粹的掠夺和殖民政策以特别殘酷和无耻的形式得到推行。例如在規定要起德国农业殖民地作用的波兰，公开执行了取消工业化的政策。通过拆除机器設备、并将它运往德国的途徑来消灭紡織工业。采矿工业企业成为德国公司的分厂。所有依靠进口原料的重工业和輕工业工厂都被关閉。①

德国占領者在西方的經济政策基本上也是如此，虽然在这里他們表現了某种謹慎的态度，因为关于"統一的西欧"这种蠱惑性宣傳使他們必須这样做。請看英国資产阶級經济学家在 1941 年是如何評述荷兰的希特勒占領制度的(在那里希特勒是在"新秩序"的幌子下进行掠夺)："然而这番煞費心思的改組并不能掩飾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秩序'使生活水平发生惊人的下降。許多收入的来源枯竭了。对于荷兰极为重要的海上貿易当然停止了。向德国的輸出增加了两倍。向所有其他国家的輸出下降到微不足道的数額……只有那些对德国有利的工业部門才能获得原料。工人劳动条件比从前大大恶化。生活水平由于物价的上漲而下降。失业者差不多有二十万。"②

希特勒对夺取苏联的經济資源抱有很大的希望。根据进攻苏联前一个月內提供給元首参考的希特勒軍队参謀部經济学家統計的数字判断，在占領到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綫的苏联領土以后，依靠这块領土上的資源将可以保证德国在整个战时的需要，直至它胜利地結束。③

但是这些打算都落空了。第一、希特勒匪徒沒有能够跨过垂涎已久的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綫；第二、他們沒有能够把苏联工厂撤到西方，因为尽管他們进行突然的襲击，但是大量的苏联企业由于劳动人民奋不顾身的努力而被撤到东方，并且迅速地

---

① *L. L. Lorwin.*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1941, p.155.

② *H. S. Ashton.* The Netherlands at War. London, 1941, p.99, 102.

③ *A. Dallin.* German Rule in Russia. 1941—1945. London, 1957, p. 307

开始生产；第三、有相当大一部分由于某种原因沒有能够撤退的工厂被毁坏了，因此希特勒匪徒不能加以使用。

想在苏联淪陷地区实現“以战养战”的經济理論的尝試失敗了。沒有剝削阶級并且早就消灭了不自由的劳动的社会主义社会，其結构同在苏联淪陷地区安排法西斯帝国經济完全对不上口徑的，因为这种經济要保证侵略軍的需要，保证那些急于把国家的新殖民地攫为己有的新出現的地主和資产阶級发財致富的需要。

日本帝国主义在战爭中的經济战略，主要也是根据与希特勒德国的战略相同的原則。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建立了一个規模很大的殖民帝国，它从北部阿留申群島一直扩展到东部的夏威夷群島，包括了太平洋上广大的区域。在南部，它的边界紧靠着澳大利亚沿岸，而西部在侵占了緬甸以后，拥有石油、铁矿、錫、有色金屬和稀有金屬、橡胶以及各种种植园作物等丰富資源的整个东南亚，都归入了帝国的版图。

但是变成主要軍事工厂的日本本土，并沒有能够把那些經济是由世界資本主义市場历史上形成的多样化和多方面的需要来决定的国家和地区統一成一个經济整体。日本帝国主义者破坏了旧的經济联系，但是并沒有建立即使能維持淪陷区主要經济部門的簡单再生产的新的經济联系来代替它。

意大利帝国主义的經济战略并不像它法西斯集团中比較强大的伙伴的战略那样，給世界資本主义經济的战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后果。意大利对德国的依賴，使得它这个在經济上和軍事上比較弱小的盟国逐漸失去了它所追求的大部分欧洲的势力范圍。

法西斯国家企图破坏反法西斯联盟各国的軍事經济潜力，結果遭到了失敗。它們要想破坏苏联經济潜力的打算完全落空了。

希特勒的战略家們对在几个五年計划期間在烏拉尔和西伯利亚地区建立起来的第二个采煤冶金基地的作用估計不足。他們想像不出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甚至在遭到突然侵略的艰难条件下也能建成协調一致的战时經济。

希特勒軍队被苏軍击退时，在淪陷地区实行了"燒光"政策，毁掉了这些土地上能够恢复經济生活的一切源泉。但是这样做也未能使它免于新的失敗，而这些失敗导致了德国在軍事上的彻底崩溃。

对整个資本主义以及对它的战后发展来說，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有哪些經济和社会后果呢？

第一、在資本主义欧洲的一部分地区上，产生了一种眞正的新社会秩序来代替法西斯的"新秩序"：一系列国家脫离了資本主义而成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一部分。遭到法西斯占領的国家成为帝国主义鏈条中最薄弱的环节，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些国家中法西斯占領軍使帝国主义的一切矛盾发展到极其尖銳的地步。

第二、在日本殖民帝国的廢墟上出現了一个新亚洲。遭到日本占領的亚洲国家，由于在被占領的欧洲也表現出来的那些規律而成为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第三、資本主义国家內部的力量配置发生了变化。法西斯主义的崩溃在客观上动摇了所有这些国家中的反动派的基础。左派的力量到处成长和巩固起来。

二、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竞爭。市場和資源在战爭过程中的重新分配

战爭是資本主义世界的强国可以利用来排挤弱小国家、来跟自己的竞爭对手算旧賬的一个再方便不过的借口了。即使弱小国家是它們的軍事盟国，它們也絲毫不会因之手軟的。

战争为美国壟断組織的經济扩張創造了特别有利的环境。它立即开辟了广大的市場，造成了对武器和各种軍需供应的巨大需求。战争使德国和日本同它們与美国壟断組織进行竞爭的拉丁美洲市場断絕了联系。欧洲一系列国家的市場也成为美国壟断組織的战利品。

战爭使得美帝国主义者有机会給他們最强大的老竞爭对手英国的国外經济陣地以致命的打击。

在英国最困难的时刻，即当它受到德国入侵的直接威胁时，美国統治集团曾經当眞地思考过继承英帝国的問題。

1940年6月5日溫·丘吉尔写信給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說："我們不要让美国人对英国失敗的前途过分幸災乐禍，如果英国失敗，他們就会得到英国的海軍和对于除大不列顛以外的不列顛帝国的托管权……虽然总統是我們的最好的朋友，但是我們直到現在还沒有从美国得到任何援助。我們不指望它用軍队来援助我們，但是它对我們的斗爭甚至連一点应有的貢献——譬如派遣驅逐舰或飞机，或让他們的軍舰来訪問爱尔兰南部的港口——也沒有作出。"①

美帝国主义者中有一部分人曾經假設，英国如果投降，不列顛帝国就会像一个成熟的果实一样落在美国的脚下。由于这一假設沒有实現，所以他們决定設法利用对英国的援助来实現自己的目的。

美国企图利用英国处境的困难来建立对加拿大的軍事和政治监督。1940年8月18日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領导人在奥格頓斯堡（紐約州）签訂了一項关于成立一个由两国陆、海、空軍代表組成的常設联合国防委員会

①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I. London, 1954, p. 128—129. 丘吉尔还在5月中旬就請求罗斯福給英国提供四十至五十艘驅逐舰。罗斯福当时回答說，移交驅逐舰一事必須經过国会的批准，但是指望这一点是困难的。

的协定。《商业周刊》杂志写道："由于8月18日的协定，在經济关系上也和在政治关系上一样，加拿大和美国的联系将比它們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不管欧洲战爭的結局如何，加拿大在这个危机过程中自願在本半球之內建立商业联系，这种联系远远不会是暫时的。由于对付共同威胁的防御需要，本半球团結在一个以华盛頓为中心和以它为主要办事处的貿易集团中。继加拿大之后，在新大陆上的其他英国屬地也将接踵而来。"①

1940年9月2日美国同英国締結了一項协定，其內容是：将位于紐芬兰至英屬圭亚那之間的一大片地区上的英国屬地租让給美国九十九年，以建立軍事基地。美国把五十艘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即已造成的驅逐舰交給英国作为交換条件。②美国把关于加拿大防御的奧格頓斯堡协定和关于基地的协定看作是結束英国退出美洲海洋的漫长过程和消灭英国在西半球的旧有实力殘余的两大事件。③

在战爭年代中，美国在极短期間內对加拿大实行的經济幷吞，按其規模和結果来說，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过去想要使这个英屬自治領"美国化"的一切尝試。总之英国資本在加拿大的陣地在这一时期遭到了决定性的破坏。美国在加拿大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38年的62.7%增长到1945年的75.8%，英国所占的比重相应地从17.6%縮減到8.9%。美国在加拿大外国投資中所占的比重从1939年的60%增长到1945年的70%，而英国的比重相应地从35.8%縮減到1945年的25%。④这一变化反映了英国势力的衰落。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壟断組織在大战期間就担心同加拿大建立的經济联系在战后是否也能为加拿大所需要。1941年4月20日罗斯福和麦肯齐·金在海德公园（罗斯福的府邸）締結的协定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协定的实质是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工业的原料供应地。这项协定一签訂，

---

① «Business Week», August 31, 1940.

② 英国所得到的五十艘驅逐舰中，有六艘由英国轉交給加拿大作为加拿大舰队的一部分。

③ *F. Davis*. The Atlantic System. New York, 1941.

④ 参見 *А. Г. Милейковский*. Канада и 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М., 1958, стр. 389—390.

美国壟断組織就有机会利用国家軍事調整机关即有它們的代表参加的各种"联合委員会"来維护它們的利益。

美国壟断組織千方百計地企图利用英国对美国軍用供应的依賴来迫使它完全用尽外汇儲备并撤除它的国外投資。英国在参战时，大約有四十五亿美元以貨币形式或以折成美元而向美国投資的形式的儲备。"孤立主义者"要求在英国沒有用尽这些儲备以前，不要給它任何財政援助。但是英国資本家深深了解，美国壟断組織非常热中于对英提供軍用供应，因为这是它們主要的生財之道。所以英国資本家坚决进行討价还价，設法取得軍用供应，但不以撤除英国国外投資的要求作为条件。英国統治集团公然暗示，如果美援的代价是像华盛頓一些議員所力爭的那样要撤除国外投資、甚至还要让出殖民地，那么英国将不得不設法同德国达成妥协的和平。

美国財政寡头中最有势力的代表因此就坚持給英国无偿的援助，是因为他們知道从英国身上已經再也榨不出什么东西来了。美国政府根据华尔街的这一立場，还在 1940 年 12 月就向英国政府宣布，英国有权在美国进行总数为三十亿美元的定貨，而且它可以不为这笔定貨付款。① 这样就产生了租借的思想，即美国的軍用物資以"租和借"的形式提供給英国。

1941 年 3 月 11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总統把軍用物資以出卖、交換、租借或其它方式提供給总統认为其防御为美国安全所必需的任何一个国家。② 租借法案使美国政府变成美国壟断組織产品的最大主顾。这个法案使壟断組織有机会依靠国家

① 《The New York Times》, 19. XII. 1940.

②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II (July 1940—June 1941). Boston, 1941, p. 711—723.

提供資金来經营出口。因而产生了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变种。根据租借法案向它国供貨是美国壟断組織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上夺取新的陣地的强有力的手段。

租借法案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为战胜法西斯国家，同时为取得对美国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上的勁敌即英国的不流血的經济上的胜利所必需的限度內，向英国提供經济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租借法案的条文中有一些将英国从包括不列顛帝国的市場在內的国外市場排挤出去的措施。根据租借协定的規定，英国不得輸出其中包括哪怕是10%的、經由租借法案所获得的原材料制成的商品。1942年2月23日在美国和英国之間締結的租借补充协定也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补充协定規定，英国必須降低关稅和取消其它阻撓美国貿易的障碍。后来美国国务卿考·赫尔解釋說，这一协定規定英国在战后要放棄帝国关稅特惠制。①

租借法案在美国对外貿易扩張的发展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下面的表格可以說明这一点：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对外貿易②

（单位：十亿美元）

年　份	出口总額	其中根据租借法案的出口額	进口总額	流轉額	差　額
1939	3.2	—	2.3	5.5	+0.9
1940	4.0	0.7	2.6	6.6	+1.4
1941	5.1	0.7	3.3	8.4	+1.8
1942	8.0	4.9	2.7	10.7	+5.3
1943	13.0	10.3	3.4	16.4	+9.6
1944	14.2	11.2	3.9	18.1	+10.3
1945	9.8	5.5	4.1	13.9	+5.7

①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II. New York, 1948, p. 1614.

② 参見《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торговля》. М,. 1954, стр. 252。

到大战快結束时，根据租借法案向它国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总額，大約是四百六十亿美元。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大部分商品是为英国和不列顛帝国的成員国所得，它們获得了美国提供給盟国的全部武器、原料、粮食和工业制成品的69%。美国在英国进口中所占的比重在1943年达到58%。

美国壟断組織还广泛地利用租借法案来夺取投資場所。租借法案通过以后，美国壟断組織开始积极行动以夺取近东的石油資源。它們的目的是削弱不列顛近东石油帝国的基础，三大石油托拉斯即"英荷壳牌石油公司"、英伊(朗)石油公司和"伊拉克石油公司"是这个石油帝国的三大台柱。美国报刊开始证明，根据租借法案向英国提供石油使得美国本来就据說是少得可怜的石油資源迅速枯竭。1943年，哈·杜魯門領导的參議院軍事工业調查委員会建議英国将一部分由它管制的、已經勘測出来的近东石油資源交給美国，以补偿美国石油儲藏的枯竭。①

虽然英国进行了頑强的抵抗，美国石油托拉斯在战爭期間还是动摇了不列顛近东石油帝国的基础。美国資本在控制中近东国家石油开采方面所占的比重从1937年的13.1%增加到1945年的19.2%。②

在大战期間，英屬自治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落入美国經济扩張的范圍之中。这一情况的前提仍然是軍事援助。这些同英国隔离的自治領除接受美国的援助外别无其他选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战后都改为美国的軍备标准，这便是軍事援助的經济后果之一。因此美国軍火康采恩在供应軍备的壟断上已經有了保证，它們剝夺了英国竞爭者极为有利的銷售市場。

同时美国壟断資本的代表得以在英国太平洋自治領中的对外貿易部門和以前由英国資本独占地占据优势的經济部門，夺取了一系列的陣地。

① 参見A·A·山大洛夫：《帝国主义爭夺原料产地的斗爭》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207頁。

② 同上书第466頁。

1938—1939 年美国在澳大利亚进口中所占的比重是 15.1%，而在 1944—1945 年提高到 39.5%。美国在澳大利亚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 1938—1939 年的 3 %增加到 1944—1945 年的 19.8%。①美国在新西兰进口中所占的比重 1939 年为 11.4%，而 1944 年为 32.2%。②

在大战期間，华尔街为了在印度夺取势力范圍采取了积极行动。1941 年 11 月英国政府不得不同意让美国总統代表到印度去。1942年 3 月有大公司的代表参加的美国技术代表团被派往印度。

美国报刊在 1941—1943 年发动了一个反对英国对印政策的运动。它证明美国政府应当支持印度国大党关于独立的要求，因为战后的印度将成为美国工业品特别是机器制造业的产品的重要銷售市場之一。但是随着英国对美国依賴的日益加剧，而出現了一种印度即使沒有“解放”，美国資本也可侵入印度的可能性，华尔街就越来越失去了对印度“独立”問題的兴趣。

战爭期間美国在印度对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在 1938—1939年美国在印度进口中所占的比重总共只占 6.4%，而在 1944—1945 年已提高到 25.1%，在这段时期內，英国所占的比重从 30.5%下降到20%，美国資本严重地威胁到英国的壟断地位。③

在战爭年代里，美国資本在非洲的英国屬地也为自己打开了門戶，而这些地方在战前是关閉得特别严密的。1945 年从肯尼亚和烏干达向美国輸出的商品量比 1937 年增加了一倍以上，而从坦噶尼喀輸出的商品量增加了五倍。④

---

① 《The Official Year Book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1946—1947》. Canberra, p. 403, 405.

② 《New Zealand. Official Year Book. 1946》. Wellington, 1948, p. 857.

③ 参見 *А. М. Дьяков*. Индия во время 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9). М., 1952, стр. 53—56。

④ 参見 *А. Ю. Шпирт*. Африка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М., 1959, стр. 91。

从英美制造原子彈方面的“合作”史上可以看出，战爭期間美英之間的經济矛盾达到了何等尖銳、何等紧張的地步，以及美国壟断組織是如何企图依靠削弱自己的主要軍事盟国来保证自己的世界霸权。

到1940年英国在設計原子武器方面获得了相当大的成績。但是美国却利用了轉入战时經济軌道的英国工业基础缺乏制造原子彈所必需的后备力量的情况。1941年10月罗斯福总統向丘吉尔建議英美两国在制造原子彈方面的努力应該互相配合甚至共同来进行这一工作。到1942年6月，据丘吉尔說，在他和罗斯福之間已就制造原子彈的共同工作和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利用工作成果問題达成了秘密的协議。①

1943年8月在魁北克举行的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政府首脑会議上通过了将原子工业集中在北美的决議。②

在华盛頓成立了三国有关原子能政策問題的联合委員会。英国放棄独立制造原子彈的尝試并且派遣七十五名学者去美国和加拿大。

英国壟断資本家在比屬剛果拥有最大的鈾矿产地，而第二个重要的鈾矿产地是在英国的自治領加拿大，英国壟断資本家就打算利用这种情况作为他們可以在英美原子卡特尔中要求享受平等权利的貢献。

但是英帝国主义者关于共同生产原子彈的打算并未能实現。美国利用了英国的困难处境以及它对美国供应的依賴而将原子原料資源攫为己有。英国失去了对加拿大和非洲鈾矿原料产地的壟断权。同时美国的原子工业也不再需要英国的科学技术援助。

1945年8月，原子彈在广島和长崎的爆炸使英美原子卡特尔也感到震惊。美国拒絕把生产原子彈的秘密告訴英国。英国恢复已經中断了的制造原子彈的工作，重又利用自己暫时停閉了的企业和实驗室。

英国对外貿易的統計最能說明英国經济地位在战爭期間的整个削弱的情况。

① 参見詹姆士·艾倫：《原子帝国主义》世界知識社1954年版第5頁。

② 同上。

英国在战爭期間的对外貿易①

（单位：百万英鎊）

年　份	进口总額	其　中 武器进口額	出口总額	差　額
1939	886	—	485	−401
1940	1,152	—	437	−715
1941	1,145	—	378	−767
1942	1,206	209	402	−804
1943	1,885	652	350	−1,535
1944	2,360	1,053	345	−2,015
1945	1,517	413	485	−1,032

在战爭期間英国进口大大增加了，1944年达到了二十三亿六千万英鎊，而1939年只有八亿八千六百万英鎊。英国进口的增加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軍备的供应，在1943—1945年美国供应的軍备大約占进口的三分之一，并且大部分是根据租借法案进口的。

与此同时，包括再出口在內的出口，在战爭年代中減少了，1944年为三亿四千五百万英鎊，1939年为四亿八千五百万英鎊。貿易平衡的逆差为二十亿英鎊，达到英国对外貿易史上空前的紀录。按物量計算，英国的出口減少到1938年的31%。在許多历来得到英国商品的市場上出現的"眞空"，便为英国的竞爭者的商品、主要是美国的商品所填补。

美国壟断組織虽然能够对一系列英国資本的重要势力范圍实行經济并吞，但是它們毕竟未能完全实現自己"拆毀"不列顛帝国的計划。英帝国主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对美国的扩張进行了頑强的而且决不是徒劳的抵抗。

美国壟断資本家未能迫使自己的英国伙伴撤除他們的国外投資，华盛頓本来打算接收这笔投資作为对美国供貨的报酬。結果，在战爭期間英国的国外投資減少了不过四分之一，而且減少的是

① 参見《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торговля》, стр. 251。

收入最少的投資。英国統治集团由于接受了美国以租借形式提供的援助，因此有义务取消帝国特惠制，但是，如事态发展过程所表明的，他們絲毫沒有准备履行这項义务。

英帝国主义不但进行防御，而且还采取进攻，企图把势力范圍和一些地区作一番有利于自己的重新划分。首先它把賭注放在牺牲已經衰弱或退出竞爭的国家和它們的殖民地来巩固自己在欧洲的陣地上面。

英国著名的資产阶級历史学家卡尔教授在1942年写道："指望英国来領导的傳統至今在美国人的意識中还是根深蒂固的……在对待欧洲大陆方面尤其如此，对这一大陆美国人保留了自己的一切偏見，在那里他們特别不願意承担責任……欧洲毕竟还是危險的地区。大不列顛未来的实力和威信将直接取决于它如何对付欧洲問題。"①

統治集团之所以希望把英国变成欧洲的統治国家，还由于倫敦在战爭期間已成为被占領的欧洲的流亡政府的主要避难所。英帝国主义者竭力利用自己"房客"寄人籬下的地位，要求他們对自己受到的援助进行酬答。

溫·丘吉尔还在1940年当德国軍队侵入法国北部地区时，就向法国政府提出英法以及它們的殖民地联合起来的計划。丘吉尔的建議被拒絕了。英国資本竟以向法国提供"援助"的方式侵入了法国的殖民地。英国資本在战爭期間也正是这样才大大巩固了自己在比屬剛果的陣地。

英帝国主义者特别坚持要努力扩大在非洲的势力范圍和加强对非洲战略原料的开采。他們企图靠非洲来弥补他們在被日本人占領的东南亚殖民地的損失。在战爭期間从非洲国家的进口，就其增长速度而言，大大超过了向英国的整个进口的增长。1944年从非洲运进的商品比1938年增加了80%，但是进口总額到这个时候只增加了42%。②

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会晤时——在那里討論了关于未来的

① *E. H. Carr.* Conditions of Peace. London, 1942, p. 186.

② 参見A·Ю·施皮尔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非洲》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第14頁。

中国的問題——曾經达成了关于瓜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的势力范圍的协議。①在英国統治集团的贊同下为中国安排了一个美国的半殖民地的命运。英国希望以承认它在印度洋和地中海区域的統治作为这一"让步"的交換条件。

当英国对美国的逼攻进行防卫，并力图靠牺牲其他資本主义国家来巩固自己陣地时，它在剝削不列顚帝国的人民方面的小伙伴即旧的自治領，也明显地表現出"地方帝国主义"的傾向，也就是企图在不列顚帝国內部建立自己的小型帝国。因战爭而加剧了的經济发展不平衡更助长了这一傾向。自治領的壟断組織希望給自己迅速发展起来的出口部門保证一些可靠的市場，还希望获得新的原料資源和投資場所。

早在1940年春天南非联邦总理史末資首先公开表示了自治領对不列顚帝国內部的势力范圍的要求。1942年底史末資在一篇发表在美国《生活》杂志上的文章中，把自己关于在英国和自治領之間瓜分整个不列顚帝国的势力范圍的思想具体化了。他建議把殖民地合并成一些比較大的单位。按照他的建議，英国应当不是单独地、而是同自治領一道来实現对不列顚帝国这些扩大了的地区的权力。按照史末資的意思，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联邦都有权参加对不列顚帝国內与它們毗連的地区的管理。②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在战爭期間就宣布自己在太平洋西南部英国屬地上拥有特别权利。它們在不列顚帝国这一地区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影响。

加拿大承担了保卫紐芬兰和英屬西印度的国防的"責任"。在战爭年代中加拿大的資本和商品在这里排挤了英国的資本和商品。战后紐芬兰

①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VI (July 1943—June 1944). Boston, 1945, p. 233.

② «Life», December 28, 1942.

不再是英国的屬地，而作为加拿大的一省划入加拿大的版图，这不是偶然的事情。

由此可見，在参加反法西斯联盟的資本主义国家集团的內部，发生了一种特殊的、通过經济与政治压力和滲透的方法来实現的重新瓜分世界的現象。这种現象对战后力量的配置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在确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經济結果时不能不加以注意。

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企图用这种或那种形式来实現自己的經济扩張綱領。但是所有这些綱領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錯誤的前提上。它們所持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会削弱，殖民体系必然会留存和巩固。这些錯誤的估計注定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想在战爭中取得的东西与战爭最后造成的結局有着天壤之别。

三、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增长。帝国主义国家經济上的变化

战爭期間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之一，便是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空前加强。这是总体性质的战爭和整个經济完全轉入战爭軌道的直接結果。正如苏共綱領中指出的："世界大战和經济危机、軍国主义和政治动蕩，加速了壟断資本主义向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轉变。"① 帝国主义国家变成了軍备、軍用物資、粮食、战略原料和其他商品及劳务的一个最大的顾主。② 大壟断組織从一开始起就享有供应这种国家市場的特权。壟断組織通过听命于它的国家机关分得了全部軍事定貨中最大最好的一份，并对这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83 頁。

② 美国联邦政府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在 1944 年为全国产品总量的 41%，英国相应的指数为 54%，德国为 50%（*K. Knorr.* 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 Princeton, 1956, p. 238, 239）。

些定貨規定了能确保极大超額利潤的壟断价格。

一小撮壟断資本家通过国家把稀缺的原料和燃料的分配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轉訂合同制度使得他們可以支配一大批中小企业。战时經济之由国家壟断資本进行調整，导致了資本集中的极端加强，并提高了壟断組織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經济中所占的比重。

資本的集中引起了生产集中的急剧增长。依靠斂收重税而使国家預算猛然增加，这就促进了壟断組織的資本积累。不是由国家动員的全部資金都被焚于战火之中，或者說，都被用于非生产的用途因而脫离了物质財富再生产的过程。相当大一部分資金变成了生产資本的成分，增加了大壟断組織的生产实力。国家資金被广泛地用来直接輔助壟断組織。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由于国家企业的建立而使国家所有制得到的广泛发展，已成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所特有的一种形式，那些国家企业或者是以极优惠的条件租給私人公司，或者仍留給国家管理，然后再廉价卖給壟断組織。①

由此可見，帝国主义国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充当了大壟断組織积累資本、把資本集中在它們手中的直接帮凶。

依靠战爭而大发横財的壟断組織的超額利潤的激增，也加速了資本的集中。在战爭年代里美国大公司的利潤的动态有力地証明了这一点。

在战爭的五十五个月中美国大公司的利潤（在納税后）为五百二十亿美元。还必須估計到，相当大一部分的捐税作为完成新的軍事定貨的报酬归还了大公司。这就說明，为什么利潤額的增长在战爭期間像表中引用的数字所显示的那样迅速。当1942—1944年战时經济达到自己的頂点时，大公司的年利潤比它們战前的利潤高出了六倍到七倍。

---

① 例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生产了七十四万七千台机床，国家收购了五十五万台，其中大約30%規定給生产軍备的私人企业。在战时投到石油和石油加工工业的全部資本中大約有40%是由国家提供的。造船工业几乎完全依靠国庫而成长起来（参見*Дж. Блэр, Х. Хаутон, М. Роуз.*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48, стр. 196）。

美国大公司的利潤①

（单位：十亿美元）

年　份	納税前的利　潤	税　額	納税后的利潤		
			总　額	股　息	未分配利　潤
1938	3.3	1.0	2.3	3.2	−0.9
1939	6.5	1.5	5.0	3.8	1.2
1940	9.3	2.9	6.4	4.0	2.4
1941	17.2	7.8	9.4	4.5	4.9
1942	21.1	11.7	9.4	4.3	5.1
1943	24.5	14.2	10.4	4.5	5.9
1944	24.3	13.5	10.8	4.7	6.1
1945	20.4	11.6	8.7	4.7	4.0

巨大的积累使壟断組織有可能大大增加生产的規模。超額利潤成为壟断組織自己提供資金的来源，这种自己提供資金的形式是战后时期所特有的。在战爭期間有了巨大积累的壟断組織已經慣于依靠預算撥款来补充自己的貨币資金。

到战爭快結束时，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沒有一个大壟断組織不是完全为战爭而工作的。这种現象是战爭所引起的重大变化之一。它是壟断資本主义日益腐朽和寄生的經济基础的最清楚的写照。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工业仅仅实行了部分的复員，这不是偶然的。大壟断組織寻机以保持对它們有利的軍事生产和在有保障的国家市場上銷售产品。上述情况以及由于財政資本想要"甩掉"世界社会主义和恢复資本主义过去的稳定而产生的政治方針，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展开的新的軍备竞賽的最重要的原因。

在战爭期間由于軍事生产規模巨大，資本主义国家經济的整个部門結构发生了变化。数百种新的生产部門出現了。它們不是某种暫时的由于战爭局面而产生、因而在轉入和平經济以后应当不再发展下去的企业。許多这样的新部門已經扎下了深根，它們是十分具有生命力而能够順利发展

① 《美国劳工实况(1947—1948)》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5—16 頁。

的。它們狠狠地排挤了一些旧的經济部門并加深了它們的危机状况。

除此以外，由于战爭而特别加速了的技术进步，也引起了經济中的結构变化。在資本主义条件下，战爭常常为技术的急速发展創造比和平时期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一事实最清楚地說明了已經过时的資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的腐朽性。

当然，技术的发展是由于經常要改进武器的需要而产生的。国家对科学研究工作进行巨大的撥款促进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进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种新現象。除此以外，必須注意到，甚至純粹是在軍事方面的技术革新也总会得到某种經济上的采用。新技术在质上要求嶄新的材料。这就推动了一系列新生产的发展和旧生产的改进。

历史上形成的世界經济联系因战爭而遭到的破坏，对生产的部門結构发生了不小的影响。經济的自給自足傾向在某种程度上是所有交战的資本主义国家所固有的。根据美国經济学家K·克諾尔所引用的資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国对外貿易（根据租借法案的供貨除外）减少了42%，欧洲大陆（苏联除外）的对外貿易減少了46%，日本和东南欧的对外貿易減少了63%。①

在这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資本主义經济起了更加难以估計的深刻的影响。

經济自給自足的傾向以最强烈的方式在法西斯国家中得到了表現。希特勒預見到国外的原料供应必然会減少，因而早在战爭以前就夸耀地宣布："德国化学家的头脑会代替我們的进口。"人造的和合成的原料在德国并沒有能够代替进口給它的經济提供的一切东西。但是在自給自足經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部門在西德的战后經济上具有很大的意义。

在英国，供进口原料和粮食用的海运总吨位的不足，迫使它最大限度地利用內部資源。它不得不用本国质量低劣的铁矿砂来代替进口的质量优良的铁矿砂，以金屬制的支架代替木制的支架来建設煤矿井，不得不开垦草地和牧場来播种谷物。所有这一切使英国經济在战后时期的部門結构及其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上的作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① *K. Knorr.* 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 p. 202.

美国在日本占領了东南亚国家以后便同橡胶产地隔絕了，而美国是橡胶的最大消費者。这种情况迫使美国政府建造了五十个生产合成橡胶的工厂，因而根本改变了世界橡胶市場战后时期的行市。

战时在各个国家內部发生的經济部門之間的比例的改变也导致了形成战后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中新的对比关系的必要。在資本主义經济各个部門之間新比例的形成，总是会引起这些或那些部門危机的发生。旧部門和不发达国家便成为危机的牺牲者。它們經济的命运取决于一个或者几个部門的順利发展。这一規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清楚地表現出来。战后时期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发生了危机，这一危机波及許多旧工业部門。經济上依靠出口原料的一些落后国家受到了新部門的特别激烈的竞爭。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十分重要的社会后果。

四、帝国主义世界的战后經济发展綱領的制訂和准备工作。战时締結的国际經济协定

同法西斯国家进行斗爭的資本主义各国人民不希望战后的世界还是同 1939 年以前一样，那时，在黑暗的三十年代，到处籠罩着危机和大量失业，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囂張一时，以致引起了一場战爭慘禍。人民力求在战时就制訂出一个保证避免經济危机、避免失业和饥餓的經常威胁、摆脫来日沒有保障和动蕩不定的社会經济措施的綱領，并且加以实現。他們要求結束壟断組織的独裁和社会的不平等。

苏联的参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且把資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群众提出的社会經济改革的要求提到了新的更高的水平。

帝国主义国家統治集团千方百計地企图限制劳动人民的要

求，他們的借口是，战爭不可能沒有牺牲，只有到胜利以后才是进行改革的时候。資产阶級政府为了要稳定人民群众的情緒和麻痹他們的阶級意識，非常慷慨地向他們应許諾言，制訂了許多战后发展綱領。

这些綱領不外是一种社会蠱惑性的宣傳和对那些担負全部战爭重担的劳动人民施加心理影响的手段之一。壟断組織在制訂上述綱領的时候，还拟定了一些措施，以便能够避免战后发生危及資本主义的社会动蕩。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小心翼翼地唯恐发生資本主义将要付出昂貴代价的經济混乱、饥餓和通貨膨脹。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的情况相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資产阶級策略上的一个嶄新的手段。

美国資本有势力的集团，还在战前就把凱恩斯的新資本主义理論当作武器，他們在战爭的日子里加紧宣傳这一理論，把它說成是避免資本主义在战后时期可能遇到的一切不幸的最可靠的法宝。

1942年底发表在《幸福》杂志上的以《新世界中的美国。国內經济》为題的专刊中最明显地反映了这一趋势。①美国壟断組織的这一权威性的机关刊物宣布了能够排除"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无限的竞爭自由"的"民主資本主义"的发展綱領。"民主資本主义"的招牌掩盖了一种随意的杂拌，即：符合財政寡头利益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措施同許諾消灭失业、扩大工会权利、发展社会保險制度的籠絡人心的社会宣傳的混合。

罗斯福总統在散布一些对資本主义的幻想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这种幻想是說战后資本主义似乎会完全变样并且把自己革新得一尘不染。罗斯福在1943年1月7日致国会的咨文中答应保证战后充分就业，保证付給公道的工資和保证确立社会保險制度，使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生中能

① 《The United States in a New World. The Domestic Economy》(《Fortune》, December 1942, Supplement).

免受一切災难和經济上的不幸。①

根据总統宣布的这項綱領，国家資源計划局于1943年公布了一項冠以《新权利法案》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的文件。这个法案中的九点內容答应給予一切的福利和一切的自由，其中还包括最"神圣的"自由，即企业家进行活动和剝削的自由。采用凱恩斯原則被宣布为达到所提出的目的的保证，而这些原則就是：通过"国庫和貨币政策以及利用改善工业組織和消費需求的方法"来調整經济"以便使……活动的經济維持在生产和消費的高水平上"②。

罗斯福所拟定的改革和具有政府法律草案性质的《新权利法案》使美国劳动人民产生了很大的希望。一部分壟断資本家的报紙极其严厉地抨击改革和法案，更促进了这一情况的发生。这些报紙把总統应允的改革說成是威胁企业家自由活动的基础和可以依靠国家的控制和官僚主义来摧殘生意的吓人的东西。

英国劳动人民从战爭一开始起就充滿决心为社会經济改革而斗爭。工党参加丘吉尔的联合政府被保守党人看成是对人民要求的必要让步。

在制訂战后发展綱領上，英国的雄心并不亚于美国。而且当时这些綱領具有双重使命，即一方面充当进行国家壟断的改革的工具，同时又是社会蠱惑性宣傳的一种形式。著名經济学家貝佛里季制訂的战后时期的社会保險綱領，使英国劳动人民产生了很大的希望。这一綱領在1942年11月以报告的形式被提到議会。貝佛里季計划規定了包括各界人民的各种社会保險。国家应当規定对失业者、病者和老年人进行补助，并且对家庭供养人丧亡的无劳动能力者給予保障。③

政府答应在1945年——无論到这时战爭結束与否——实行这个社会

① *F. D. Roosevelt.* The War Messag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Washington, 1943, p. 35.

② *L. L. Lorwin.* Postwar Pla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43, p. 51—52.

③ *W. Beveridge.*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 London, 1942.

保險制度。① 到战爭快結束时貝佛里季又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一个战后改革的宣傳綱領。1944年他提出一个按照政府任务写成的、題为《在自由社会中充分就业》的报告，② 在报告中論证了使战后英国劳动人民摆脫失业災难的可能性。在同一年中，丘吉尔政府根据貝佛里季报告发表了关于就业政策的白皮书。③ 在白皮书中宣布战后开始实行凱恩斯的"可調整的經济"的原則。保守党轉到凱恩斯派的立場上来，这反映了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已經增长起来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为了保存資本权力需要进行某些改革的必要性已得到承认。

所有国家的資产阶級都准备全副武装地对付必然尖銳起来的阶級斗爭。他們知道，战爭已快結束，开出的支票很快就要到兌現的期限了，必須履行战时慷慨許下的諾言，哪怕是一部分也好。

美国、英国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制訂的一切战后发展計划，都把恢复平时生产問題即将經济从战时軌道轉入平时軌道的問題提到了首位。同时认为实現以下一些措施乃是天經地义的事：国家应当承担起恢复平时生产这样一个"危險性"的責任，战时建立的监督和調整經济的机关在战爭結束以后不应当立即取消。战时所制訂的一切战后发展綱領的突出特点是力图为国家壟断資本的調整經济进行辯护，并使它永远保存下去。国家应当最大限度地帮助实业渡过战后考驗的困难时期。

不但国家机关和政党制訂战后发展綱領，而且私人公司以及企业主組織也忙于这件事情。对它們来說，恢复平时生产問題就是要最灵活和对自己最有利地适应战后国內和国外市場上的情况。很清楚，只有那些既拥有后备能力和人才，又拥有物資和貨币的最大的壟断組織，才能进行这种恢复平时生产的准备。

早在战爭开始时，全国制造商协会就建立了战后問題委員会。1943年

①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 5 (1943—1946). December 9—16. 1944, p. 6863—6887.

② *W. Beveridge*.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1945.

③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 5(1943—1946). January 6—13, 1945, p. 6921—6925.

3月該委員会发表了一个关于商业界应当如何准备使战后国內市場上立即有一个高行情的报告。美国商会成立了一个研究它的战后經济問題的經济政策委員会。1942年这个委員会发表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也和全国制造商协会的报告一样，指出了利用战时积存下来的对消費品以及对工业設备的需求，可能是刺激战后"繁荣"的最重要源泉。如美国經济学家路易斯·洛文所指出的，商会要求政府在战后不要滲入任何一个私人企业可以順利地加以保障的实业部門①。

大商业的一批領导人和大公司的主管人成立了一个也是研究战后問題的經济发展委員会。領导該委員会的是汽車公司的总經理保尔·霍夫曼。該委員会的宗旨在于协助私人企业拟定战后綱領，这个綱領既要考虑到它們的利益，又要考虑到全国的利益。委員会建議各公司制訂从战时轉入和平时期的綱領，以便保证經济的稳定和就业的高水平。②委員会应当以最好的方式动員美国商业去为夺取战后市場而斗爭。

美国統治集团为了順利执行自己的綱領，便将維持国內"阶級和平"的职能，即为美国壟断組織制訂的龐大战后扩張計划保证后方的职能交給了工会运动的反动領袖。值得注意的是，当壟断組織在1942年已經制訂自己的战后发展綱領时，在1942年成立了战后問題委員会的美国劳联和产联的領导人提出的要求，并沒有超出采取措施消除大量失业和在免除失业的社会保險方面实行比較广泛的綱領。他們只是对資产阶級政府的反危机的措施寄以希望。

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对国家之間的关系，对整个資本主义世界战后安排問題的解决，都起了重大的影响作用。

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开始的时候起，就在准备能确保資本主义免于战后革命动蕩的国际协定，其中包括能保证資本主义在战后世界中进行統

① *L. L. Lorwin.* Postwar Pla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p. 24.

② 同上书第27頁。

治的"調整"世界經济的协定。

帝国主义国家制訂这些国际协定的草案和成立相应的国际組織，是在由战爭的反法西斯性质、苏联在战爭中的决定性作用、群众空前的政治积极性和他們要解决战后安排問題的願望所决定的局势下进行的。所有这一切对在战爭过程中制訂的战后国际綱領的性质和形式，起了相当大的影响。

西方大部分政治活动家都一致同意，一个应当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国际联盟的职能的組織，可以成为战后和平的基础。其中一些人把这个組織說成是世界政府，另外一些人把它說成是世界議会，还有些人把它說成是国家的集会場，总之，所有这些机构都应当保证主要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統治。

美国統治集团十分积极地准备成立这样一个組織。他們深信，战爭的結束将是"美国世紀"的开始，将是一个实現美国的世界霸权的时期。

华盛頓同样重視制訂一个国际經济和政治协定的体系，根据这些协定建立必要的机构以便于美国壟断組織对世界市場施加影响，幷干涉各国內政。

1943年5月在霍特—斯普临斯(美国)举行的联合国家关于粮食及农业問題的会議是实际解决战后国际經济問題的第一步。参加会議的有四十六个国家，其中也包括苏联。会議决定成立一个常設性的国际組織，以便制訂分配世界粮食資源和消除饥餓与营养不良的措施。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組織于1945年4月（应为10月。——譯者）在二十个国家签訂其章程后正式成立。① 1946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組織成为联合国的专門机构。

---

① «Constitution of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of United Nations (with annexes). Quebec. 16-th October 1945». London, 1946.

美国統治集团企图把粮食及农业組織当作这样一种国家間的机构，通过它可以控制世界粮食市場，同时可以利用輸出粮食和提供技术援助作为推行政策的工具。由于考虑到美国的这些企图，苏联沒有参加粮食及农业組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譴責这一組織的全部活动。

1943年11月在华盛頓签訂了四十四个国家关于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协定。善后救济总署是在恢复工业和农业生产、在安排保健事业、在安排被俘人員和迁民方面协助联合国的一个組織。美国統治集团也企图利用这一国家之間的机构作为实現經济和政治扩張的补充手段。美国在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活动，清楚地表現了它的政策的主要方向，这一方向后来在"杜魯門主义"和"馬歇尔計划"中得到了体現。

在战后經济調整問題中美国統治集团认为貨币和国际金融問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还在1943年美国财政部长的顧問У·А·怀特便按照部长Г·摩根索規定的任务制訂了成立联合国家稳定基金草案，它在战爭結束以后应当立即保障通貨的稳定和防止通貨膨脹及其危險的社会后果。美国的稳定基金草案不但考虑到有关挽救欧洲資本主义、使其不受革命威胁的整个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而且还企图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美国竭力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作为黃金主要持有者的优越性。到1943年底，美国黃金儲备达到了最高紀录，即二百二十五亿美元①，超过了整个資本主义世界黃金儲备的一倍。

美国統治集团企图通过稳定基金使美元对其它貨币的行市定得对壟断組織最为有利，并打算在竞爭中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利用貨币政策所設置起来的一切障碍拆除掉。

怀特所制訂的联合国家稳定基金草案遭到了英国猛烈的抨击，这不是偶然的，英国絕不願意容忍英鎊被廢棄，以及取消英鎊的世界貨币作用。英

① 参見 *Е. Варга.* План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валют. «Война и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1943, № 13, стр. 7。

国也在1943年公布了凱恩斯勛爵制訂的組織国际划撥清算联盟的草案。①該草案的基础主要是在划撥清算即在非現款清算的合同的基础上調整世界貿易和外汇行市。凱恩斯草案規定在联盟的范圍內保留排他性的貨币集团，如英鎊区。如果实現凱恩斯所建議的制度，英国就能够最充分地利用自己作为商品最大的进口商和殖民地原料独占的供应者的优越地位，对于支配这些原料的可能性在当时还沒有引起凱恩斯勛爵的怀疑。

1944年6月在布里敦森林（美国）举行了一个由美国財政部长Г·摩根索主持的、有四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会議，这个会議通过了关于成立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的决議，美国草案是該組織章程的基础。

在章程中当然也考虑到英国草案中所包含的关于国际貨币基金参加国的債务通过划撥清算互相抵銷的建議。国际貨币基金組織內各会員国的表决权是由它以黃金繳納的基金分摊額来决定的，这就牢靠地保証了美国在这个国际貨币金融調整机构中的統治地位。②

布里敦森林会議关于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的决議对英国以及对英国財政寡头要求保持世界金融中心的作用来說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英国財政寡头并不甘心失敗。英国拒絕批准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的章程，拒絕以穷亲戚的身份参加到該組織中。它設法爭取依靠美国的巨額借款来巩固自己的外汇儲备。以拒絕批准布里敦森林协議来进行威胁——这是英国在关于借款的长期談判中重要的論据之一。直到1945年12月美国同意給英国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巨額借款以后，英国才决定批准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的章程。

国际貨币基金組織是国家壟断趋势所特有的产物，它是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个新現象。誠然，国际貨币基金組織并沒有实現美帝国主义者对它所

---

① 《Proposals for an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Presented by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to Parliament》. London, 1943.

② 《International Conciliation. 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New York, 1945, p. 599.

抱的期望。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并沒有像华尔街头目所指望的那样，大到可以通过它在世界貨币市場上起作用。美国未能完全取消貨币限制，也未能取得牢靠的、对外汇行市的控制权。在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章程上規定的参加国在加入国际貨币基金組織五年以后必須彼此进行无关稅、无数量和无貨币限制的貿易的要求，并沒有实現。然而由于有了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的存在，美国壟断組織就可以在国际合作的幌子下对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济进行广泛的干涉，同时可以敏銳地观察世界資本主义經济的动态。美国通过国际貨币基金組織使一个異常龐大的和高度熟练的經济情报机构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一机构是依靠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的成員国納費来維持的，并且以联合国的旗帜来掩护自己的活动。

当然，在国际貨币基金組織中不但表現了美国的影响，而且也表現了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尽管美国在該組織的事务上掌握了控制权，但是它对其他国家也不能不加以考虑。

布里敦森林会議还成立了一个国家間的組織，即国际复兴开发銀行，它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1945 年 12 月 27 日关于国际复兴开发銀行的协定开始生效。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的会員国是該組織的成員国。国际复兴开发銀行当然也是充当本来打算通过国际貨币基金組織加以实現的同一个經济战略的工具。

国际复兴开发銀行所担負的任务是通过提供短期貸款来使支付平衡有赤字的資本主义国家避免通貨膨脹，以及在有关国家的保证下对各銀行向各个国家或公司提供的长期借款进行担保，或从本身的資金中提供这些借款，也就是保证資本輸入以消灭通貨膨脹的外因。

国际复兴开发銀行的成立，反映了在資本輸出方面的国家壟断趋势。为了壟断組織的利益，国家应当保障資本輸出商的利潤并对他們发生的意外情况进行保險，以承担受損失的全部風險。国际复兴开发銀行是以股份公司的形式組成的。很自然，向国际复兴开发銀行納費最多的美国，从一开始起就起了該組織主要股东的作用。国际复兴开发銀行提供借款和貸款，不但要监督它們的用途，而且还要监督实現撥款"計划"的整个过程。国

际复兴开发銀行因此就有机会强迫这些国家接受“技术援助”和外国专家及私人公司的領导。国际复兴开发銀行要求接受貸款的国家执行一定的經济政策，即不实行国有化，鼓励私人投資以对抗国家投資。①

国际复兴开发銀行对那些設法通过屬于联合国系統的机构来实行自己的經济扩張的美国壟断組織来說，是一个方便的掩护。由于有了国际复兴开发銀行的存在，美国壟断組織得到了一个推行自己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强有力的手段。

1945年8月21日杜魯門总統宣布廢除根据租借法案所訂的合同，这对美国在欧洲的資本主义伙伴們来說，是一个意外的打击。杜魯門总統通知盟国政府，向美国定购的二十亿美元的商品以及在其他国家仓庫中存放的十五亿美元的商品，只有通过买卖方式用現款才能提取。② 美国伙伴們支付平衡的出現赤字和外汇儲备的枯竭，使得它們必須采取紧急措施来使收支勉强达到平衡。

在租借法案停止生效以后，英法政府开始請求美国提供借款。它們之获得借款实质上是以經济上的投降作为条件的。1945年12月宣布給法国提供五亿五千万美元的借款③，1945年12月6日公布了关于借給英国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的协定。④ 美国实际上要求負債国同意它的“門戶开放”政策，即美国資本和商品可以无阻地进入它們市場的政策。借款是作为英法同意“鏟除”共产主义的預付款，作为願意在反苏軍事集团中充当美国的小伙伴的补偿費而提供的。

---

①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Prepared by the Staff of the Bank》. Baltimore, 1954.

②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Report. Salient Features of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1945—1947》. New York, 1948, p. 297.

③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VIII (July 1945—December 1946). Princeton, 1948, p. 641, 866.

④ 同上书第645—649頁。

租借法案廢除以后，既然英法两国来請求援助，美国壟断組織就能为自己的战后經济扩張获得另一条重要的陣綫。1945年9月24日美英两国之間在倫敦签訂了一項关于成立調整国际石油貿易的英美石油公司的协定。实际上这是国际石油卡特尔內部的新契約，这个契約从法律上保障了战时大为加强了的美国石油壟断組織的优势地位。

到战爭結束时資本主义世界內部力量的配置，首先取决于美国經济和軍事实力惊人的增长。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中取得了十分显著的优势，以致沒有一个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联盟可以与它对抗。

战爭将要結束时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差不多是全部产量的三分之二，在世界商品出口中它的比重大約占三分之一，在黃金儲备方面占了一半以上。虽然大部分資本主义国家的粮囤都已消耗殆尽，但是美国手中却集中了大批的粮食儲备。美国有最强大的海軍，它远远超过了英国曾經炫耀一时的那种海上霸权。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中拥有最大的陆軍，此外还暫时壟断了其他資本主义国家武器庫中所有的武器都不能抵御的原子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場上力量对比的改变，表明了經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下面的表格說明了这个問題：

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美国和加拿大在世界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52.5%，而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几乎完全停止出口，英国和法国的地位也大为削弱。战爭快結束时世界資本主义市場上的主要的竞爭者只剩下美国和英国。加拿大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个出口国。

美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經达到战时它在資本主义世界方面

各国在資本主义国际貿易中的比重①

（在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

国家	进口			出口		
	1937年	1945年	1946年	1937年	1945年	1946年
英国……	17.0	26.2	15.1	11.3	7.4	11.6
德国* ……	7.9	0.4	2.1	10.3	0.1	0.7
意大利……	2.7	—	1.9	2.4	—	0.9
加拿大……	2.9	6.4	5.4	4.4	12.4	7.1
美国……	10.9	18.1	14.2	14.2	40.1	29.9
法国……	6.1	4.8	7.6	4.1	0.9	2.7
日本……	3.9	—	0.9	5.2	—	0.3

* 1937年——整个德国；1945年8月—12月——英美占領区；1946年——整个西方占領区。

所提出的目的。它的最危險的即最富有侵略性的竞爭者——德国和日本——已被消灭。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实际上已受到美国占領当局的控制。日本及其在太平洋上的一些所屬島屿已成为美国独占統治的地区。

对美国来說，它的其他对手，在某种程度上也已不在話下。英国在战爭快結束时也被削弱了，在租借法案失效后已处于財政破产的边緣。法国經济遭到更大的破坏。法国壟断組織的暗中破坏行为使得法国的經济困难状况更加恶化，它們企图加剧經济崩溃，以便把責任推卸到当时参加政府的共产党人身上。遭受德国占領压迫之苦的其他发达的欧洲資本主义国家，在經济上也因战爭而远远落在后面。

美帝国主义者在維护和巩固壟断資本的地位上、在反对工人阶級的斗爭中，在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和破坏民主力量上对已經削

①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торговля», стр. 254; «Эконом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 1959, стр. 494.

弱的伙伴以及在軍事上已被击溃的敌人，提供了重大的援助。但是他們这样做也沒有能够巩固整个世界資本主义体系以及填补这一体系在战时被冲破了的缺口。

各种形式和各种表現的阶級斗爭——工人运动、民主运动、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漲，使資本主义制度遭到致命的打击。在各国人民反对由国际帝国主义产生的法西斯主义的斗爭中，反映了人民群众爭取建立新的、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和向前迈进决不后退的願望。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深入到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批又一批千千万万的群众之中。

第 三 章

資本主义国家中阶級斗爭的尖銳化。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漲

一、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战后政治力量的新配置，取决于世界革命过程的进一步广泛和深入的发展，特别是取决于資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重大发展。苏共綱領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資本主义开始发生总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欧洲及亚洲一系列国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展开了資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阶段。"①

資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2頁。

巩固和帝国主义遭到很大的削弱。导致資本主义制度的統治范圍的縮小，使其陣地进一步遭到摧毁的重大过程和事件是：法西斯主义即国际帝国主义的突击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局中遭到击溃；在战胜法西斯主义中起决定作用的苏联的实力大为增强，它的国际威信大为提高；由于中国、一系列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北朝鮮和北越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从而在許多新环节上冲破了帝国主义的陣綫；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中民族解放和反帝斗爭的取得成就；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資本国家中群众性的一般民主运动的高漲。

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資产阶級担造者援引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革命运动高漲的事实，試图"证明"共产党人为了推翻資本主义和实現社会主义革命而热中于战爭。但是，如果观察一下历史事实就不难相信，这种論点同事实毫无相同之处。在帝国主义所发动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中获得胜利的情况，絕不意味着走向革命的道路一定要通过世界大战。1960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声明中說道："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沒有认为，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要通过国与国之間的战爭。"①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在对待战爭与革命的問題上一向从以下的原理出发，而这些原理完全得到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踐的证实。

第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从来沒有企图使解放工人阶級的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在战爭的軌道中发展。

战前年代中国际无产阶級的整个斗爭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議中（1935年）指出："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代表大会坚决批駁誹謗性的論点，說什么共产党人希望战爭，期待战爭带来革命。一切国家的共产党人都已領导了維护和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頁。

平的斗爭……这证明了，共产党人是全力以赴地力图阻止新战爭的准备和发动。"①

第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一向认为，在这一个或那一个資本主义国家里发生的革命，不可能从外部鼓动起来，而是該国內部发展的結果，是資本主义社会經济和政治矛盾极其尖銳的結果。苏共綱領强調指出："革命是不能定做的。不能从外部把它强加于人民。它是由于資本主义的深刻的內部矛盾和国际矛盾而产生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級不能把任何取得幸福的办法强加于别国人民而不因此破坏它自己的胜利。"②

大家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十年是資本主义經济、社会和政治矛盾急剧加深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取得巨大成績的时期，是苏維埃国家国际威信日益增长、对資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斗爭起着巨大的革命化影响的时期。在这个基础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年，在資本主义世界許多地区，首先是在欧洲一系列国家、在中国、在西半球的一些国家中，就已經明显地出現了革命的工人运动、反法西斯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共产党是已經发展起来的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先鋒队。它們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上制訂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确定了爭取群众的最有效的斗爭形式和方法。

虽然共产党人在同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的斗爭中遭受了重大的損失，但是除苏联以外的党員人数从1928年的四十四万三千人增加到1935年的七十八万五千人③，而到1939年初增加到一百二十万人。在西班牙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人民群众的斗爭还在战前就已經发展为人民民主（或新

① «Резолюции VII Всемирн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М., 1935, стр. 39.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94頁。

③ «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1935, № 75—76, p. 1452.

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的工人运动、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高涨，共产党影响的增长，无产阶級在实行統一行动方面获得的进展——使得帝国主义資产阶級惊恐万分、怒不可遏。国际帝国主义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来制止已經成长起来的革命过程，使它們后退。西班牙共和国被法西斯主义和"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力量摧毁了。資本主义欧洲所有的共产主义大党都被打入地下。几万名共产党員遭到逮捕、受到磨折和殘酷的杀害。

但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两个集团在开始了战爭以后，便打开和加速了归根到底摆脫它們的控制、破坏它們的战略計划的战爭过程。广大的人民群众投入运动，拿起了武器，参加到斗爭中去，这場斗爭对他們来說是严酷的，但也是一个眞正的考驗。

同发动战爭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意志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換句話說，战爭虽然不是一系列国家中革命危机成熟的首要原因，但是却使危机加剧和尖銳化了。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反法西斯斗爭。抵抗运动

由于德国帝国主义及其盟国企图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肉体上毀灭欧洲无产阶級的优秀分子，摧毀他們的組織，因此，毫无疑問地它們是代表了世界上整个壟断資产阶級的利益和願望。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被德国占領的一系列国家的壟断資产阶級的政策，他們常常把德国的侵犯首先看成是摆脫革命危險、在本国建立他們用本身力量所不能确立的"强权"制度的良好机会。①

① 請看資产阶級政論家和共产主义的死敌雷·阿隆关于这一点是怎样写的："希望挽救軍队和反革命分子，企图'复兴国家'的将軍們，迫不及待地要夺取政权的政客們，关心社会制度、但不关心祖国得救的資本家們——所有这些人都决定投降"（*R. Aron.* De l'armistice à l'insurrection nationale. Paris, 1945, p. 25）。

后来，当希特勒德国彻底破坏被占領国家的民族独立并且着手从肉体上消灭它們的人民的时候，当反希特勒联盟成立、德国胜利的前途渺茫无望的时候，法国、比利时、荷兰、南斯拉夫、希腊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大資产阶級便根据他們的对外政策路綫而发生分化。

在被占領的欧洲国家中壟断資产阶級的重要集团直到1943年战爭发生决定性轉折的时刻，都一直充当占領者的直接同盟軍。中国統治阶級中同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直接勾結、并变成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第五纵队"的那一部分人（汪精卫等），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被占領的欧洲的大壟断資产阶級的另一部分人和大部分中等資产阶級以及国民党中国的統治集团，还有英屬自治領和拉丁美洲各国的資产阶級等等，都宁願把自己的命运同美英两国的壟断資产阶級联系起来，而后当他們认为反希特勒联盟必然会粉碎德国时，他們又把自己的命运同反希特勒联盟联系起来。这一点当然并不意味着这些資产阶級集团从而就放棄了反苏政策的旧路綫。必須估計到，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把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只是看作暫时的敌人和将来的盟国，而把自己的盟国却看作是将来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朝思夕虑的是如何不使群众革命的社会要求在战爭的过程中得到实現。为此目的，他們屡次牺牲共同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利益，牺牲本国的民族利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美英两国的統治集团以及被占領国家的大資产阶級都特别卖勁地設法不让旧的国家机器遭到摧毁。在被占領的欧洲国家中，投靠英美两国統治集团的反动資产阶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执行着臭名远揚的等待政策，他們劝說群众必須等待英美盟軍的到来，使群众相信，只有盟軍才会带来自由，而抵抗运动的使命仅仅是为盟軍的軍事需要服务等等。

这就是壟断資本主要集团以及与它有联系的政党和組織的政治路綫，即它們战前路綫的直接继續。这一政策是由于利己和狹

隘的阶級动机而产生的，它使得許多国家的大資产阶級走向民族叛变，走向政治破产，并把自己暴露为一种无能領导社会的反民族和反民主的力量。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爭取解放的、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趋势的增长，被卷入战爭的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日益成为武装斗爭的政党，它們力求作到在軍事上战胜法西斯主义。

共产党、而首先是站在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武装斗爭的前列的苏联共产党，把从軍事上和政治上击溃法西斯国家及其代理人、保障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实現这一目的既符合无产阶級的根本阶級利益和劳动人民的民主要求，也符合各国人民的民族利益。

在为实現这些目的的斗爭中，共产主义运动同一切力量乃至同美英两国壟断資产阶級中的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希望击敗法西斯帝国主义集团的人物共同行动。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中，由于战爭、特别是由于法西斯的占領，形成了阶級力量的新配置，工人阶級应当根据阶級力量配置的这种新情况，設法統一自己的队伍，并在自己周圍团結起民族中的一切民主和爱国力量，即农民、城市小資产阶級、知識分子和一部分資产阶級——其中也包括投靠美国和英国統治集团的一些資产阶級的阶层。

苏联的英勇斗爭是各国人民民族解放斗爭获得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苏联担負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战爭的主要重担，并且是反希特勒联盟的骨干。为爭取广泛的民族的和反法西斯的团結而斗爭，是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政策基础，并且也是民族解放战爭获胜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共产党是建立民族陣綫，即包括一切願意为反对希特勒主义而进行斗爭的政党、組織、团体、人民阶层在內的广泛的反法西斯和爱国联盟的倡导者。

被占領国家的共产党为加强人們反法西斯行动的积极性和群

众性而斗爭。它們展开了幷領导着反对占領軍及其走狗的武装斗爭，吸引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这一斗爭，幷且揭露欧洲等待主义分子的政策① 和亚洲一些民族資产阶級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結。英美两国的共产党人坚持不懈地爭取迅速开辟第二战場。

共产党人、工人阶級吸引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政治生活，把他們团結在无产阶級的領导之下来反对外国和本国的法西斯分子，武装群众，幷在战斗过程中建立起新的民主政权机关，从而为民族解放和反法西斯运动之轉变为反对产生法西斯主义和战爭的那个制度的基础的革命斗爭，准备了最重要的內在先决条件。

二十世紀最重大的革命运动之一，即抵抗运动，在客观上提出的和常常加以解决的，不仅有民族的反法西斯斗爭的任务，而且还有劳动人民社会解放的任务。

抵抗运动和民族革命战爭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席卷了大約三十个欧洲和亚洲的国家。这一斗爭在中国、意大利、法国、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希腊、比利时以及在越南、緬甸、馬来亚、菲律宾群島所达到的規模最大，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成熟的。在許多国家中抵抗运动轉变为人民民主革命或民族解放革命。

1936—1939年西班牙人民反对法西斯分子和武装干涉者的民族革命战爭，实际上就为欧洲人民武装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奠下了始基。尽管西班牙劳动人民失敗了，但这一革命战爭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发展上起了杰出的作用。②

1939年秋天，在波兰工人和士兵反对法西斯占領軍的英勇斗爭过程

① 在法共1942年5月1日告人民书中指出："法国人民不应当等待来自外面的救济，他們应当自己拯救自己，即用斗爭来拯救自己……对被奴役的人民来說，等待等于接受奴隶制度。"(《L'Humanité》, 1. V. 1942)

② 几千名前国际志願軍的战士，后来都成为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巴尔干半島上的抵抗运动的第一批队伍和組織的領导者。

中开始了波兰的抵抗运动。就在那个时候在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也产生了这种运动。1940年春天和夏天，在法西斯匪徒占領西欧和北欧六个国家以后，抵抗运动也在这些国家中首先在法国和比利时产生了。被法西斯匪徒占領的国家的工人阶級領导着抵抗运动。无产阶級的先鋒队即共产党在希特勒入侵期間差不多在各处都是本国唯一的一个仍保存着自己組織、并且继續在地下进行反法西斯斗爭的政党。①

法国共产党于1941年5月15日号召建立"广泛的民族解放战綫"，并宣布准备"支持任何法国政府，任何組織，及所有的人，只要他們的努力方向是反抗法国現在遭受的民族压迫和反对为侵略者服务的卖国賊的一种眞正的斗爭。"②1941年5月底，法共着手将一系列以无产阶級、知識分子中的先进阶层、农民为支柱的抵抗組織統一成一个在法国所有抵抗組織中最具有群众性的和最有积极作用的民族战綫。

在那同时，即在1941年5月，意大利共产党在告人民书中号召工人阶級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以拯救民族"，为反对德国在意大利的軍队、为推翻墨索里尼集团即德国帝国主义的奴僕、为立刻进行和平談判、为恢复劳动人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成果而斗爭。③

苏联在遭到希特勒德国及其僕从国家发动的强盜般的侵略以后的参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軍队所进行的坚决的抵抗，使得抵抗运动在政治和組織方面提高到新的更高的程度。苏軍牵制了德国帝国主义軍队的主力，从而为抵抗运动武裝部队的建立提供了方便条件。苏联人民英勇的反法西斯的斗爭，使欧亚两洲正在战斗着的人民加强了对自己力量和胜利的信心。这一斗爭也使抵抗运动得到蓬勃的发展、并使它的发展发生了质的跃进。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反法西斯武裝斗爭达到了空前的規模，斗爭的組織

---

① 1941年春天，《人道报》写道："当所有其他政党的領导人在德国大使館中追求施舍和听候指示的时候，对共产党来說，遭受占領当局的迫害是值得驕傲的和光荣的事……共产党以自己正在进行眞正的反侵略者的战斗而感到驕傲。"

② 莫里斯·多列士：《人民的儿子》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27頁。

③ 参見《30 лет жизни и борьбы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ерев. с итал. М., 1952, стр.481—485。

性加强了，反法西斯的团結得到了巩固，反法西斯联盟和抗敌机关紛紛成立，它們常常是被解放地区新的革命政权的萌芽形式。

1941—1942 年，人民武装斗爭席卷了巴尔干半島的大部分領土。在那里，抵抗运动从一开始起就是由共产党人領导。在南斯拉夫、希腊，而后又在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組織了人民解放軍以及由几十万名战士組成的游击队伍。总的政治領导是通过由共产党人倡議而成立的革命的反法西斯联盟来实現的(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統一陣綫于 1941 年夏天成立，希腊的民族解放陣綫于 1941 年秋天成立，保加利亚的祖国陣綫于 1942 年夏天成立，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解放陣綫于 1942 年秋天成立)。

从 1942 年 5 月起，波兰的游击队运动开始在異常复杂而艰难的条件下成长起来。1942 年 1 月成立的波兰工人党及其武装組織——人民近卫軍(即后来的人民軍)領导了这一运动。1941 年秋天，根据法共中央委員会的决議，成立了由国民軍事委員会領导的集中的軍事組織"法国义勇軍游击队"。

1943 年初伏尔加河沿岸历史性的胜利以后，开始了抵抗运动的新阶段，即准备全国性的武装起义、組織大規模的游击运动、吸收包括农民和城市中等阶层在內的广大群众参加斗爭和第一批法西斯傀儡政权遭到崩溃的时期。在那个时候抵抗运动在各处都成立了政权机关(其中也包括全国范圍內的政权机关)，并越来越經常地轉向解决社会性的任务。因此，在抵抗运动队伍中，革命者和等待主义保守分子之間的斗爭也加强了。

从 1943 年秋天起，即在墨索里尼政权崩溃以后，意大利的游击队运动产生并迅速地扩大起来。意大利共产党人、社会党人以及"行动党"中的小資产阶級激进人士在克服等待主义分子的頑强抵抗时，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組織了武装斗爭。到 1944 年夏天，仅仅在意大利北部活动的就有七万至八万名游击队員，其中大多数是在加里波的战斗队(1943 年 11 月由意大利共产党組織的)① 中进行战斗。同时在意大利淪陷区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員会——反法西斯政党同盟的机关，这些委員会在一些地方成了眞正

① 参見*P. Батталья.* История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Перев. с итал. М., 1954, стр. 357。

的政权机关。

从1943年春天起，法国共产党直接着手进行全国武装起义的軍事、政治和組織上的准备工作。1943年5月，共产党人成立了全国抗敌委員会，参加抵抗运动的一切政党和团体在委員会中都有代表。1944年初，抵抗运动的所有武装团体都統一在"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队伍中。法兰西内部力量有一半以上的战士(到1944年春天为十二万五千人)都是共产党人領导的"法国义勇軍游击队"組織中的成員。在1944年最初几个月中，法国的游击战斗和罢工继續在发展。在全国范圍内成立了地方的和省一級的解放委員会，它們負有領导武装起义的任务，并且常常是当地反法西斯的政权机关。

到1944年夏天，在意大利和法国开辟了第一批解放区。1944年4月共产党員参加意大利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政府这一事实，反映了共产党員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人民战爭和人民革命的火焰在东南亚越来越熾烈地燃燒着。

四个巴尔干半島国家的民族解放軍的軍队和游击队伍的战士到1944年已經超过五十万人(其中南斯拉夫有三十万人)。到1944年夏天，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大部分土地、南斯拉夫的相当大一部分土地从占領軍手中解放出来，游击队运动席卷了整个保加利亚。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共产党在反法西斯联盟中贏得了巩固的領导权。那些同德国人行动一致的反动的等待主义分子的武装力量，早在1944年以前就已經基本上被歼灭了。南斯拉夫(1943年秋天)、希腊(1944年春天)和阿尔巴尼亚在建立人民軍以后，成立了新的革命的全国性政权机关。

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欧洲反法西斯的人民武装运动达到了最高峰。1944年6月在法国开始了武装起义，这一起义是經过了反法西斯人士特别是法共整整四年的工作而酝釀成熟的。

"法国国内武装部队"的五十万軍队，不顾再次号召等待的等待主义分子的命令，到处襲击德国人。帮助这支軍队的，有在"爱国民警队"和其他群众性的抵抗运动組織中进行战斗的爱国分子。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独

立地解放了法国的一半领土，歼灭和俘虏了几十万个希特勒匪徒。

后来德·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承认："在法国全国范圍內，这支武装力量在战爭期間为我們建立了难以估价的功勛……如果沒有他們偉大的援助，法国的解放和西欧敌人的被击溃会需要更多的时間，并且要付出更大的牺牲。"①

正是法国人全国起义的規模粉碎了試图巩固反动势力的陣地的英美当局、等待主义者和投敌分子的反人民的計划。

起义的人民解放巴黎(1944年8月18—25日)是起义的最高峰。大約在这同时(1944年7月—8月)，在比利时也爆发了全国性的起义，到1944年夏天在那里約有5万个游击队員在进行战斗。

苏軍进入东欧各国使反法西斯和革命运动的力量加强了，胜利扩大了。1944年的夏天和秋天成为大多数东欧国家革命发展的决定性阶段：正是在那时，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爭轉变为人民民主革命，在另一些国家里，革命跨入决定性阶段或者取得完全的胜利。

1944年7月在波兰被解放的地区上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員会，即新波兰的革命民主政府。1944年8月23日，在罗馬尼亚爆发了共产党領导的反法西斯起义。安东尼斯庫的法西斯政体被推翻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解放运动也在扩大中：8月底斯洛伐克地区的居民举行了起义。这里大部分区域的政权已轉到各民族委員会和根据共产党人的倡議而建立的斯洛伐克民族議会手中。1944年9月9日成为保加利亚人民的胜利日。

1944年秋天，苏联、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軍队以联合行动肅清了包括首都貝尔格萊德在內的南斯拉夫整个东部地区上的法西斯侵略者。苏軍在巴尔干半島东部和中部的胜利，也为彻底驅逐阿尔巴尼亚的占領軍創造了条件。1944年11月，阿尔巴尼亚全部領土都从德国占領軍和反革命匪徒手中解放出来。临时的民主政府为共产党人所領导。1944年10月，

① *D. Eisenhower.* Crusade in Europe, p. 295.

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进步力量团結在匈牙利民族独立陣綫中。在苏軍所解放的領土上召开的临时国民議会組成了匈牙利临时政府，該政府即向德国宣战。

希腊人民沿着同样的道路摆脫了占領軍的羈絆，并且开展了人民民主革命。1944年10月，拥有十二万多战士的希腊人民解放軍将希腊从希特勒匪徒手中解放出来。但是由于1944年10月在希腊登陆的英国軍队的武装干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遭到破坏。从外部强加于希腊人民的是反动的半法西斯政权。

1945年4月，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战斗者在北部組織了胜利的起义反对德国占領軍。政权轉入民族解放委員会及其机关的手中。但是，英美軍队随即开进意大利北部已解放的地区，他們的統帅部实行了反革命的輸出。意大利北部被宣布戒严；軍事当局解散了民族解放委員会，并廢除了它的革命民主措施。①

1945年5月在欧洲抵抗运动史上写下了最后的光荣的一頁。在布拉格起义的捷克爱国者和前来支援的苏联坦克师，既粉碎了希特勒匪徒要同不屈的首都"算賬"的阴謀，又粉碎了捷克資产阶級反动派企图让英美軍队占領布拉格的如意算盘。

在中欧和东欧各国，革命解放的过程遵循着自己的內在規律而发展着。同时苏联軍队之进入这些国家，也保障了它們不受外国反革命势力的干涉。在这些国家中共产党人所領导的抵抗德国和本国法西斯分子的运动，迅速轉变为由工人阶級及其共产党先鋒队領导的社会革命。这一眞正的人民革命团結了全民族中起来反对統治阶級的絕大多数人，而統治阶級由于在民族受到严重考驗的年代中公然背叛民族或抱着犯罪的消极态度而使自己威信

① 参見本书第十八章。

扫地。

但是在西欧各国以及在希腊，英美武装力量成了反革命势力的支柱，并在很大程度上能阻止富有革命情緒的群众的爭取自身社会解放的斗爭。英美軍队所占領的国家的政权，基本上轉到同"倫敦抵抗运动"有联系的那一部分資产阶級手中。但是与敌人合作的那一部分資产阶級，很快就找到了同倫敦集团共同的語言，并且受到后者的庇护。在同富有革命情緒的群众进行斗爭的基础上，很快便恢复了統治阶級的完全統一。

在那些有英美軍队駐扎的国家里，民族中大多数的政治积极力量所跟随的工人阶級，不是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同新的占領者及其代理人进行着力量悬殊的武装搏斗（希腊），就是采取另一种和平的手段为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民主和社会革新而斗爭（意大利、法国）。

1945年的春天和夏天，亚洲的抵抗运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緬甸和菲律宾的人民解放軍（緬甸有二十万名战士，菲律宾有七万名战士）积极参加了为使本国摆脱日本侵略者的解放斗爭。在印度支那半島各国中展开了游击战爭。在同侵略者进行斗爭的过程中，反帝国主义的联盟建立了并且得到巩固，在一些国家中反帝联盟是由无产阶級及其先鋒队共产党領导的，在另一些国家中則是由民族資产阶級的爱国阶层的代表領导。抗日武装队伍和政治团体，十分坚决地反对在他們的領土上恢复战前的殖民秩序。在东南亚各国中掀起了民族解放革命的浪潮。

中国共产党領导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斗爭，对歼灭日本軍国主义者，对跟着到来的亚洲殖民体系的崩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共产党不但負起了抵抗日本占領軍及其走狗的主要重担，同时还要对那些封鎖解放区、实际上停止抗日的国民党人进行还击。国民党将軍的軍队經日本人同意，越过前綫来参加对付游击队的战斗。

但是由中国共产党領导的解放区，尽管被封鎖，尽管受到日本人和国民党人实际上的联合夾攻，尽管遭到巨大的牺牲，仍然形成了一支强大的力量。

共产党人由于执行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孤立那些走上民族投降道路的大地主和大資产阶級。中国共产党人贏得了几亿农民的无限信任，中国共产党組織和領导了农民进行反对日本占領軍的斗爭。过去被日本人占領的很大一部分中国領土到1945年春天都解放了。解放区的人口超过了九千五百万。解放区的政权都掌握在人民手中。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順利地发展起来。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但求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道路，巩固民族統一和防止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流血的內战。

美国資产阶級政論家怀特和雅各比都承认："共产党享有威望的眞正原因是它的武装抗日。"①1937年中国的人民軍队約有五万名战士，1940年人数增加了十倍，而到1945年春天在人民軍中参加战斗的有九十多万名战士。

1945年8月是亚洲抵抗运动的最高峰。当苏軍解放中国东北和北朝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領导的武装力量于1945年8月10日开始向日本人进行总反攻②，尽管日本人加以抵抗，尽管美国和国民党軍队进行阻撓，这支武装力量仍然解放了拥有五千多万人口的領土。

几天以后越南人民軍部队开始进攻河內；8月19日首都就轉到起义的人民手中。一星期以后，革命在越南全部領土上获得了胜利。

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即1945年9月2日，越南共产党和临时政府(于8月中建立)的領导人胡志明宣布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的

---

① *Г. Уайт и Э. Джекоби.* Гром из Китая.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48, стр. 207.

② 参見《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概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9—80頁。

成立。

同时在老撾的武装干涉者的政权也通过武装的方式廢除了。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宣布为独立的共和国。与此同时，人民民主革命在朝鮮展开了。从1930年起就在中国东北同日本人战斗的游击軍，于1945年8月返回祖国。在北部和南部各地产生了人民委員会，即人民政权机关。

由此可見，反动派企图巩固世界帝国主义的陣地或至少在資本主义世界恢复战前秩序的打算，最后以失敗而告終。在东欧、东亚和东南亚各国，通常是由共产党人領导的、各国人民积极的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运动，为各国人民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創造了內在条件。到1945年秋天，革命的火焰燃遍了許多国家。西欧的革命运动也在发展。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开始瓦解了。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大大地向前推进。由于群众的斗爭，在一系列欧洲和亚洲的国家中建立了人民政权。这些革命是1917年10月以后世界历史上的极其重大的事件。

正如尼·謝·赫魯曉夫所强調指出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成立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过程。"十月革命冲破了帝国主义鏈条上的一环。而后帝国主义的鏈条遭到全面的冲破。"①

三、各国共产党影响的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高漲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产生了发展資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性的一般民主运动的新条件。

在世界上所有的地区，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和取得成就特别明显和有力地证明了劳动群众的政治覚悟和积极性的提高，证明了

① *Н. С. Хрущев.* За новые победы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М., 1961, стр. 10.

社会主义思想的日益普遍地深入人心。在1939—1949年期間产生了或重新建立了十八个新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其中包括緬甸(1939年)、泰国(1942年)、伊朗(1941年)、多米尼加共和国(1942年)、錫兰(1943年)、摩洛哥(1943年)、巴拿馬(1943年)、尼加拉瓜(1944年)、朝鮮(1945年)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后来，建立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过程仍在继續中。

在战爭过程中共产党所遭受的損失比其他所有政党和团体所受損失的总和还要严重得多。虽然无数的共产党員在1939—1945年同法西斯主义、同国际和国內的反动派的战斗中遭到了牺牲，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党員总数到1947年时还比战前时期增加了四倍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总数和党員人数

	1939年	1947年
全世界共产党的总数……	61	76
全世界共产党的党員人数……	約4,000,000	20,000,000
其　中		
資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党員人数…	約1,500,000*	4,800,000

* 1939年的数字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資本主义世界的范圍。

欧洲和亚洲各国的共产党特别迅速地壮大起来。在美洲大陆的一系列国家中、在大洋洲和非洲，共产党的党員人数也有所增加。

在一些資本主义国家中，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在战爭結束以后成为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政治組織。威廉·福斯特在分析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引起的"欧洲局势中"新的"最有意义的方面"时写道，欧洲所有地区共产党的成长壮大决定了"这些党的力量的增大和党員人数比战爭前夕多到十倍甚至五十倍。在一些情况下，

資本主义世界若干地区的共产党党員总数的增长

	1939年	1947年
欧洲資本主义国家……	500,000*	4,000,000
亚洲資本主义国家……	20,000以上**	350,000以上
拉丁美洲……	90,000	450,000
非洲……	約5,000	20,000
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	約5,000	22,500

* 在四十年代中成为人民民主国家的不計算在內。

** 中国和越南的共产党不計算在內。

共产党成为有关国家內最具有群众性和最强大的政党。"①

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組織方面一般都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情况下，在那些战爭年代里被德国法西斯軍队占領并且在那里展开了共产党人領导的群众性的抵抗运动的国家里，有特别多的新党員加入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队伍。

共产党人在选举中的成就也证明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人民中影响的增长。例如，在1946年11月法国議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了五百五十万張选票，即全部选票的28.6%。1946年在意大利投票选举共产党人的有四百四十万选民，即差不多占全部选民的五分之一。在芬兰战后第一次选举中共产党人获得了全部选票的24%。

美国資产阶級杂志《西方政治季刊》所引用的資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这个杂志对西欧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选举运动的結果进行了比較并予以发表。

一系列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参加政府的工作，也說明了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威信和影响的巨大增长。1945—1947年，共产

① *W. Z. Foster.* The New Europe. New York, 1947, p. 34.

西欧若干国家的共产党党員人数

（以千为单位）

国　　家	第二次大战前（1939年）	大　战　后（1945—1947年）
奥地利	16*	132
比利时	9	100
英　国	17	50
西　德	60**	312
希　腊	数千	400以上***
丹　麦	3.5	55
意大利	15	2,250
卢森堡	0.3	3
荷　兰	10	60
挪　威	5	31
葡萄牙	1	6
芬　兰	1.5***	40
法　国	300	800以上
瑞　士	5	22
瑞　典	9	50****

* 1934 年的数字。

** 整个德国(1935 年)。

*** 1944 年的数字。

**** 1948 年的数字。

党人根据联合的原则参加了西欧九个国家(意大利、法国、比利时、丹麦、挪威、冰島、奥地利、芬兰、卢森堡)的政府、两个拉丁美洲国家(智利、古巴)的政府以及印度尼西亚和伊朗的政府。

由于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高漲，战后一系列群众性的新的国际民主組織紛紛成立，而这些組織在广大居民阶层中的影响也迅速增长。

还在战爭过程中，有許多国家就已經成立了或重新建立了强大的工会联合中心。1945 年 9 月，五十六个国家的工会組織代表

在选举中共产党人所得选票的百分比①

国　　家	1930—1933年期間的选举	1945—1947年期間的选举
奥地利	0.6	5.4
比利时	2.8	12.7
丹　麦	1.1	12.5
意大利	—	19
荷　兰	3.2	10.6
挪　威	1.7	11.9
法　国	8.3	26.2
瑞　士	1.5	5.1
瑞　典	3	10.3

大会，在巴黎成立了世界工会联合会。当时世界工会联合会就已經代表了六千七百万有組織的工人；以后这个数目又有所增加。

1945 年 11 月，联合好几千万人的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和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成立了。

战后合作化运动大大地扩大并活跃起来，参加这一运动的主要是劳动人民。战前加入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合作社把一亿人团結在自己的队伍中。② 到 1947 年，世界上的合作社社員总数大約增加了一倍③。

战后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級、广大的人民群众为剷除法西斯主义殘余、为消灭其社会經济基础而进行了积极的斗爭。

还在 1945 年 2 月，即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召开的前几个月在倫敦举行的四十二个国家工会組織代表会議上通过了关于安排战后和約、关

①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December 1957, p. 804.

② 参見*У. З. Фостер*. Очерки мирового профсоюз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6, стр. 494。

③ 同上书第 495 頁。

于战后經济恢复以及与此有关的工会要求等等的宣言。在这些文件中闡明了劳动人民在关于和約条款問題上和工人組織参加制訂这些条款的必要性問題上的立場。例如，在关于工会对安排和約的态度的宣言中强調指出："战爭是劳动者进行的，所以如果沒有他們的合作，如果在制訂和約条款的那些政府机关中沒有他們有效的参加，和約就不能制訂出来。"①

在倫敦工会会議通过的另一項文件——关于战后經济恢复問題和工人組織的迫切要求問題的文件——中指出，战后經济改造問題的解决必須有利于劳动人民，应当保证工人有权"不受一切形式的經济奴役，有权用自己的劳动掙得能符合他們需求的收入"。因此十分重視限制和控制壟断組織的权力的問題，并且宣布生产資料社会化的必要性。②英国职工大会、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的領导人以及欧洲大陆国家一系列的工会組織的右派領导的代表，也同苏联工会代表、法国、意大利、拉丁美洲各国和其他一系列国家的进步工会代表一样，参加了倫敦会議和1945年巴黎工会組織代表大会(并且在世界工会联合会成立的头几年参加了該組織的領导机关)。但是，在实踐上像西特林、儒奧和庫伯斯之流的工会官僚却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右派領导人一道竭力阻撓群众为实現生产資料社会化而展开积极坚决的斗爭，以便閹割国有化口号和群众的其他民主要求的革命內容。

虽然国际条件和許多資本主义国家里的其他客观情况不容許工人阶級取得政权，但是战后时期的阶級斗爭提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威廉·福斯特正确地指出："工人們显然下了决心，在他們未能完全消灭資本主义的地方，至少对貪得无饜的資本家的剝削加以一些限制。"③被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高漲吓得惊惶

---

① 引自《Report on Activity of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Milan, 1949, Appendix, p.8, 9, 11。

② 《Report on Activity of the World Federations of Trade Unions》, Appendix, p.14, 15.

③ 参見威廉·福斯特：《世界工会运动史綱》生活·讀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518頁。

失措的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資产阶級在战后不得不在工資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向劳动人民作出一些让步。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領袖和天主教政党的領导人为了比以前更广泛的欺騙人民群众，便玩弄了政治手腕和社会蠱惑性宣傳。

英国工党由于利用了社会主义的口号，許下了許多令人抱有幻想的进行改革的諾言。于是在 1945 年夏季議会选举中，在获得絕对多数选票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在西欧其他一系列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辞句和欺騙的諾言也帮助了右派社会党領导人在选举中获胜。右派社会党人在战后头几年領导了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斯堪的納維亚半島各国的政府。

英国共产党的一位著名活动家約翰·坎貝尔在揭露右派社会党人的"合营經济"、"全民福利"国家等概念和分析壟断資产阶級战后被迫作出一定让步的眞正原因时指出："我們絕不准备断言，工人阶級的状况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时期相比沒有改善。但是我們坚决认为，这些改善——資本家現在已經对它进行进攻——全然不能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如工党所肯定的那种'新的合营經济'。某些重大的社会改革，是英国統治阶級（它由于直到战爭开始一直执行慫恿法西斯主义的政策而使自己威信扫地）因导致战后工党政府成立的人民运动的高漲而感到恐惧时进行的。在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事业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在一系列过去由法西斯政府或亲法西斯政府执政的东欧国家中，成立了社会主义的政府。主要的殖民地已經摆脫了帝国主义的枷鎖。中国的革命一天天发展（而且不久就取得了胜利）。在主要的資本主义国家里，惊惶失措的統治集团在工人阶級和中产阶級广大阶层提出关于执行新路綫的要求的压力下，准备作些让步，这值得奇怪嗎？"①

① *Д. Р. Кемпбелл.* Некотор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ллюзии в лейборист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60, стр. 6—7.

但是資本家的这些被迫作出的让步具有局限性，而且是不可靠的。在这以后劳动人民不得不在殘酷的阶級斗爭中捍卫和保护这些成果。

战火中的最后几声炮响还沒有平息下来，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壟断資本就已經对工人阶級的切身权利发动进攻。企业主企图把資本主义經济由于战爭的破坏和战后的恢复平时生产所遇到的困难轉嫁于劳动居民阶层。在战爭結束以后，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通貨膨脹导致了生活費用的提高和实际工資的降低。在欧洲一些資本主义国家里还爆发了严重的粮食危机。

战后时期在一系列資本主义国家里失业有所增长，根据联合国官方資料制成的下面的表格就证实了这一情况：

1945—1948年資本主义国家失业現象的动态①

国　　家	1945年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美　国……	1,040,000	2,270,000	2,141,000	2,064,000
英　国……	120,400	391,900	281,000	307,800
意大利……	1,324,763	2,098,257	1,752,818	2,421,973

在战后的最初几年，无产阶級的罢工斗爭发展得不平衡。1945—1946年主要在沒有遭到战爭破坏的国家里即在美国、加拿大和瑞典发生了最大的經济罢工。

美国工人阶級对壟断組織向他們的切身权利和利益所发动的露骨的进攻进行了頑强的抵抗。

美国在1946年参加罢工的人数为四百六十万以上——超过了美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任何一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罢工波及到美国工业的一个、

①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nd World Trade Union Congress, 29 June—9 July 1949》, Milan, 1949, p. 616.

甚至立即就是几个重要的部門。例如，仅仅在1946年1月同时罢工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万劳动人民：其中有七十五万冶金工人，三十万汽車制造业的工人，二十万电业工人，二十六万多是肉品罐头工业的工人，此外还包括其他部門的工人。那时候大多数罢工都是以工人获得胜利而告結束，他們主要是要求增加工資。

1945—1946年，在被削弱的資产阶級还不敢对劳动人民的权利开始公开进攻的許多西欧国家里，阶級斗爭主要表現为其他的形式：1945—1946年意大利劳动人民在为共和国进行斗爭期間，举行了政治示威；在法国发生了尖銳的議会斗爭，这一斗爭使工人阶級取得了一系列的社会成果，并在立法上将它們固定下来，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形式。

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丹麦以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共产党人当时参加了政府，那里的工人阶級及其組織都主張国民經济的恢复，积极参加到"为生产而战斗"的行列中。在那里，无产阶級的阶級組織在那一时期基本上不进行罢工。1947年的情况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时西欧反动資产阶級蓄积了力量以后，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开始向工人阶級、向他們的革命政党和他們的阶級工会发动了公开的进攻。1947年春天，在美国統治集团的压力下，共产党人被驅逐出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的政府。西欧各国无产阶級和資产阶級之間进行尖銳的經济和政治冲突时期、群众性的罢工战斗时期便开始了。

在战后的五年中，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芬兰、日本，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以及其他的資本主义国家里，发生了大罢工。

战后时期在整个資本主义世界中，罢工运动总的水平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高得多，規模比战前要大得多。

群众性的政治罢工、示威和其他政治性的抗議形式的次数激增和規模大为扩大，是战后时期許多資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級的罢工斗爭以及整个阶級斗爭的一个特点。这种規模很大的政治罢工在战后时期曾經不止一次地在法国、意大利、日本和其他一系列資本主义国家中发生过。

資本主义国家里的罢工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后)①

国家	战前五年(1936—1940年)		战后五年(1945—1950年)	
	罢工人数(以千为单位)	罢工日数(以千工作日为单位)	罢工人数(以千为单位)	罢工日数(以千工作日为单位)
美国……	5,084	79,600	14,170	274,500
英国……	1,833	8,872	2,305	9,731
法国……	3,680*	—	15,525	56,050
意大利……	—	—	29,847	182,363**
日本……	164	—	4,899	28,103
加拿大……	228.7	1,803	529.9	10,522.2
比利时……	750.5	1,082.1	1,078.7	8,721.1
荷兰……	24	372	182	1,467
芬兰……	19.8	591.2	326.9	6,678.8
澳大利亚……	586	3,861	1,689	834.7
阿根廷……	176.5	2,556.5	1,279.7	11,215.8

* 仅仅是1936—1938三年中的数字。

** 工作时。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劳动人民群众也大大活跃起来。战后加强了的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提高了最先进和最革命的阶級即无产阶級在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全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加强了走在群众反帝运动的最前列的共产党人的影响。

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漲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促使国际帝国主义进一步試图采取各种形式的反革命輸出(例如战后头几年在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菲律宾和馬来亚的情况)。美国壟断組織在經济"援助"的幌子下实行扩張，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輸出反革命的形式之一。实际上这种"援助"的目的是要在世界上

① 必須注意到，資产阶級国家的官方統計第一是大大地縮小了关于罢工的数字，第二是完全不能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級罢工斗爭的重大质变。通常，在这种統計中不把包括政治罢工在內的劳动人民的政治行动計算在內。

有关的国家或地区保存和巩固資本主义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和西欧的壟断資产阶級由于害怕革命力量的加强和获胜，便成立了反动的联盟，締結一系列相互的条約，成立了軍事集团和軍事基地体系，以便对其他国家的內政进行軍事干涉，从而达到鎮压革命者的目的。資产阶級国家开始更广泛地借助于反共和反劳工的法律，着手取締共产党和大批解雇共产党員及富有革命情緒的工人，采用黑名单和对企业中劳动人民最先进的部分实行歧視等其他形式，并且依靠警察和軍队来鎮压罢工。

虽然在战后最初几年，工业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資产阶級由于依靠美国壟断資本的支持和利用社会改良主义者和教权派的援助，得以掌握了政治控制权，恢复和巩固了壟断資本的陣地，轉而向劳动人民群众发动进攻，但是这已經不能改变世界范圍內两种制度的斗爭和阶級力量对比的发展的主要趋势。这一力量对比日益有利于社会主义。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領导的工人阶級把人民中一切民主和爱国力量聚集在自己的周圍，向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爭，因为帝国主义已經走上越来越露骨的实行反动的对內政策和侵略的对外政策的道路，走上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也就是在資本主义国家內部阶級力量的这种配置的情况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 四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运动

战爭的反法西斯性质和苏联在战爭中的胜利，使殖民体系的

危机急剧地尖锐化并且引起了殖民体系的瓦解。旧殖民帝国在战争初期的失敗，接着"新殖民主义者"即法西斯国家的被击溃，使殖民主义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陷于破产。亚非人民深信，殖民主义能够而且必須被消灭。在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殖民主义无論在其种族理論方面，或是在其对被压迫人民的恐怖政策方面，都是同法西斯主义类似的一种制度。对法西斯主义的揭露使殖民主义声名狼籍。所以毫不奇怪，广大人民群众在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勇斗爭的鼓舞下都紛紛起来反对使他們永远处于政治上无权、貧穷、饥餓和死亡状态的殖民主义制度。

苏共綱領指出："世界正經历着暴風雨般的民族解放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压制了大多数国家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由，給他們套上了殘酷的殖民主义奴役的鎖鏈，而社会主义的产生标志着被压迫民族解放的紀元的到来。民族解放革命的巨浪在扫蕩着殖民主义体系，破坏着帝国主义的基石。在曾經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方，已經产生并正在产生年輕的主权国家"。①

現在，当日益加剧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已成为事实时，可以对殖民地世界在战爭时期所发生的变化的后果进行一番足够充分的估价，并且可以設想一下这些历史性变化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会起着什么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空前的規模把殖民地人民卷入了流血的演变中。亚洲、太平洋国家、非洲和近东的辽闊的地区都变成交战国的战場和战略基地，交战国的海、陆、空交通綫都从这些地区經过。殖民地的人力后备和經济資源都被投入战爭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爭主要是在欧洲战場上进行的，而殖民地的命运是在和会桌上决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98 頁。

战中情况却有所不同，它主要是通过直接占領殖民地領土来实現的。战爭所引起的荒蕪和破坏大大加重了殖民地經济所造成的負担。战爭使民族压迫变得令人难以容忍，特别是在殖民地世界的某些地区，在那里，除剝夺人的权利和損害人的尊严的旧形式外又增加了占領軍的横行霸道和大規模的恐怖手段。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的极其尖銳化，导致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漲。

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境內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个地方在战爭期間使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苏联在战爭中的胜利使中国主要的奴役者即日本帝国主义解除了武装，并削弱了压迫中国其他方面的压力。苏联的胜利促使中国人民巨大的革命毅力得到了发揮，他們在共产党的領导下获得了彻底的解放。中国、北朝鮮和北越的人民完全摆脫了帝国主义的压迫，脫离了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体系而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在民族解放运动不是由工人阶級而是由民族資产阶級領导的殖民地世界的地区中，这一运动的目的往往是比較狹窄的。它的宗旨首先是贏得政治独立、国家自主，而不是消灭資本主义制度以及同帝国主义完全断絕关系。但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帝国主义在这些地区也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在工人阶級、农民、民主知識分子以及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战斗的士兵和軍官的压力下，反对殖民主义的斗爭已越出了民族資产阶級企图限制的那个狹窄的范圍。

一、在战爭条件下的殖民地和附屬国經济

在許多殖民地[1]由于战爭而产生和发展了地方工业，工人阶

① 这一章主要注意力放在受反希特勒联盟国家控制的那些殖民地地区。

級的人数增加了，他們的組織性和政治覚悟提高了，民族資产阶級的作用和政治影响加强了。

宗主国千方百計地試图限制和压制殖民地工业的成长，不允許在殖民地发展竞爭的部門，想使殖民地仍旧处于农业原料附屬物的地位。但是战爭本身引起的必然过程不容許这样做。宗主国經济之轉入战爭軌道，引起了对殖民地的工业品出口的急剧縮减。它們出口的可能性也因为吨位的不足和交通的被破坏而受到限制。

例如，輸入印度的紡織品在1938—1939年为六亿四千七百一十万碼，在1940—1941年已經降为四亿四千七百万碼，1941—1942年为一亿八千一百六十万碼，1942—1943年为一千三百一十万碼，1943—1944年为三百七十万碼，1944—1945年为五百二十万碼。①

突然出現的日用必需品的不足，給殖民地輕工业各个部門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印度工业生产的总指数从1939年到1943—1944年度增长了26.8%，而棉花的消費增长了38.7%。②

除了紡織品以外，其他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也增加了。这种現象的发生是由于建立了許多新的企业，主要是一些規模不大和不需要复杂設备的企业以及比較充分利用現有生产能力的企业。③

紡織、縫級、烟草、皮革以及其他企业开始在非洲殖民地出現，在那里过去几乎沒有加工工业。例如，在1944年初，烏干达的第一个很大的棉紡織工厂开始生产了，这个工厂开始加工过去只是为出口而生产的当地棉花。在南罗得西亚建造了織布工厂。在战爭期間埃及的紡織工业发展起来了。

战爭时期在拉丁美洲最发达的国家(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里，

① «Capital», Supplement, January 1946, p. 19.

② 参見 *С. М. Мельман.* Экономика Индии и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1951, стр. 144。

③ 参見 *А. И. Левковский.* Некотор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Индии до 1947 г. М., 1956, стр. 323—324。

工业产量大約增加了一半，而在其他国家里差不多增加了三分之一。①在上述国家中棉布的生产增加了一倍以上。②

在这一地区，战略物資的开采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古巴开始开采鉻、鎂和鎳。在圭亚那，铁矾土的开采也大大地发展起来，圭亚那成为向美国和加拿大提供这一原料的唯一供应地。石油提炼厂的生产能力有很大的增长。③

战爭使帝国主义者不能继續禁止殖民地发展重工业。不以他們的意志为轉移的因素在这里起作用。但是帝国主义并沒有放棄它的奴隶主和殖民主义者的宗旨。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連建立某些工业部門的战略上的必要性，也不能迫使殖民主义者放棄它們摧殘殖民地工业发展的傳統政策。

印度《东方經济学家》杂志曾就战爭对工业发展的影响写道："在战爭期間我們接到了各种不同零件的定貨。但是从来沒有接到过整套生产的定貨，因此我們实际上做来做去只会做零件……我們什么都会造，也什么都不会造。我們只是一切东西的供应者，只是修补世界上所有东西的专家，而不会制造任何东西。我們沒有制度，沒有計划。更确切些說，是有一个計划，一个精心制訂的計划，也就是防止这个国家战后实現工业化的計划。"④

但是事态演变的邏輯要比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邏輯强一些。印度在战爭期間大大增加了它的工业品种，增加了产业工人的干部，从而为爭取本国的經济独立建立了一定的后备力量。在印度境內登記和营业的股份公司的数目，1939年为一万一千一百个，1945年增加到一万五千个。所有印度股份公司实繳的資本总数在1939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內从二十九亿零四百万卢比增加到三十八亿九千万卢比。⑤在印度企业中雇用的工人人

①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1948». New York, 1949, p. XVII.

② 同上书第8頁。

③ «The Caribbean Islands and the War», Washington, 1943, p. 49.

④ «Eastern Economist», August 31, 1945, p. 308.

⑤ 参見 «Проблемы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суверенных слаборазвитых стран Азии». М., 1960, стр. 339。

数从1939年的一百七十五万一千人增加到1944年的二百五十二万人。①

战爭推动了黑色冶金工业这一基本工业发展部門进一步向前发展。印度的炼鋼从1939年的一百零六万六千吨增加到1943年的一百四十二万五千吨。②工业动力基地扩大了。电力生产这一时期从二十五亿度增加到三十八亿度。③

战爭之所以促进殖民地发展工业，还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对矿产原料的大量需求。开采这些矿产原料，使得非洲許多过去很少参加或完全不参加世界市場流轉的偏僻地区——罗得西亚、塞拉勒窩內、尼日利亚、剛果和黄金海岸④等地——产生了新的工业基地。

虽然宗主国的壟断資本竭力不放棄对殖民地中已經发展起来的工业的控制，并且把这些工业中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大部分攫为己有，但是它毕竟不得不让当地資产阶級的某些阶层也参加利潤的分配。这些当地資产阶級也是靠战爭发了財，并且也寻求有利的投資机会。他們所遇到的限制使他們更加仇恨那些夺取一切最有利的投資場所的外国壟断組織。即使像持有外国公司的股票和有价证券这样一种"合作"形式，也不能阻止帝国主义壟断組織和民族資产阶級之間的矛盾的增长。

战爭使得宗主国和殖民地在財政和借貸方面的相互关系起了一定的变化。駐在殖民地境內的大量外国軍队的給养負担，都落在殖民地身上。其中印度和埃及承担了特别大的費用，它們应当从它們的預算中撥款供应駐扎在它們境內的英国軍队。这笔費用实际上在頗大程度內是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一种掠夺；官方把这笔費用說成是印度、埃及和其他国家提供給英国的貸款。这笔費用作为英国政府的債务記到这些国家在英国銀行的帳戶上，英国

① 参見帕姆·杜德：《今日印度》上册世界知識社1953年版第170頁。

② 《Statistical Yearbook 1958》,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58, p. 237.

③ 《Statistical Yearbook 1951》, p. 279.

④ 黄金海岸于1957年3月6日独立，改名加納。——譯者

政府应当在战后用英鎊来偿还。到1945年英国欠英鎊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債务达到二十三亿三千九百万英鎊。① 英国帝国主义者深信，战后这笔債务将会一笔勾銷，无須偿付。民族資产阶級对这一問題的态度却不是这样。他們决意要强迫英国履行它的財政义务。

二、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主义基础的崩溃

民族資产阶級的加强固然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恐惧，但更使帝国主义者惊惶失措的却是殖民地和附屬国工人阶級日益增长的积极性。工人阶級在自己的未来計划中提出了比民族資产阶級最激进的阶层所提出的更豪迈得多的綱領。在許多国家中第一次产生了工会，共产党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即工人阶級的主要政治同盟軍，也表現得越来越积极。

战爭給殖民地的农业(它們經济的主要部門)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状况，带来了相当大的变化。經济联系的断絕使殖民地对傳統市場的原料供应停止了，并引起了农业某些部門急剧的衰退。一些新的合成化学部門的出現也引起了同样的后果，这些部門的产品可以代替殖民地的原料。

殖民地农村所承担的供应軍用粮的沉重負担，是广大农民群众貧穷的根源。在被占領的国家里，除了通常的封建农奴制的剝削农民的方法外，还采取了軍事征用和直接掠夺的制度。但是就是在沒有外国掠夺者而自己的"旧主人"仍旧呆在那里的那些殖民地上，农民的状况也大为恶化。"必要产品"在繳納各种租金和捐税以后剩下給农民的仅够他們維持半饥半飽的生活，或者簡直就是挨餓的生活，在战爭期間从这些通常是很少的"必要产品"中，还要抽出新的額外捐税以供应軍队的需要。

---

① 《The Banker》, January 1946, p. 12.

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印度不但負有供应将近三百万的英印軍队的任务，而且还承担了供应在亚洲和非洲战場上作战的全部英国軍队的任务。同时，根本不考虑应当留多少粮食供給国內的需要。无限榨取粮食供应軍队是有利于那些靠投机勾当发財的农村封建上层和商人兼高利貸者的。不言而喻，在供应軍粮中充当主要中間人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就更是有利可图了。

由于执行这一政策，1943年在印度最大的省份即孟加拉省出現了极大的饥荒。根据最保守的統計，在1943—1944年期間由于饥餓以及与饥餓并发的流行病而死亡的共有三百五十万人。这个数目并不小于当时在流血最多的战役中牺牲的人数。

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同殖民主义者进行积极的斗爭，乃是战爭的重大后果之一。这就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給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带来了致命的打击。

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殖民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在号召士兵为大西洋宪章的崇高原則而战斗时，自己无意識地促进了殖民体系基础的冲毁。在1941年8月14日签訂的大西洋宪章中載称："两国(美国和英国。——作者)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擇其所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①

殖民地国家的公众把这一声明看成是賦与他們自由的諾言，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他們要求切实履行这一原則。由于害怕英帝国遭到瓦解的这样一个前途，英国首相溫·丘吉尔便于1941年9月9日发表了一項关于"印度、緬甸和英帝国其他部分"不受大西洋宪章約束的官方宣言。他解釋說："在大西洋会議上主要是考虑恢复現在正处于納粹压迫下的欧洲各个国家和人民的主权、自治和民族生活。"②

① 《国际条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337頁。

② 《The Times》, 10. IX. 1941.

但是英国保守党的这一立場只是方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英帝国范圍內的各国。如果不給殖民地人民任何对未来的希望，就不能动員他們去同法西斯国家进行斗爭。美国总統弗·罗斯福因此不得不正式"糾正"丘吉尔的話。1942年2月22日他在广播演說中宣布："大西洋宪章不但对世界上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地区适用，而且还适用于全世界。"①

战爭期間在殖民地領土上建立了大批的軍队，他們中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穿着士兵服装的工人和农民組成的。殖民地軍队中的士兵深信，战胜法西斯主义必然会使他們自己的国家得到独立。苏联参加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斗爭以及苏德战綫变成主要的战場使他們相信，战爭不可能以簡单的恢复旧的殖民秩序而告結束。关于一切民族享有主权和独立生存权利的新思想，已經深入到殖民地世界最偏僻的角落。它引起了希望，喚起了觉悟，促使殖民地人民参加政治斗爭。

殖民地軍队对抗击法西斯国家的战爭作出了相当大的貢献，但同时它們也为殖民地人民（其中也包括各"民主西方"帝国中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創造了前提。例如，印度大批軍队的建立，对英国在印度統治的崩溃就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二百多万印度人手中持有武器这一事实使得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具有嶄新的意义，这一运动是甘地本着印度民族資产阶級历来崇拜非暴力斗爭方法而組織的。

大批的軍队是由非洲（埃及、苏丹、肯尼亚、烏干达、坦噶尼喀②、罗得西亚和其他英国殖民地与势力范圍）的当地居民組成的。③被压迫民族中經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工人、农民、知識分子和其他阶层的代表，是英帝

① 《The New York Times》, 23. II. 1942.

② 坦噶尼喀于1964年4月26日与桑給巴尔組成联合共合国。1964年10月29日共和国改名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譯者

③ 参見 *В. Л. Тягненко.* Войны и колонии. М., 1957, стр. 113—115。

国各个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中的骨干。

领导英国殖民地黄金海岸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克瓦米·恩克鲁瑪写道："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軍人回到了黄金海岸；在他們有机会拿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加以比較之后，他們就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滿；任何路綫，只要能改善他們的处境，他們就准备采取。"①

在其他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欧洲国家的殖民地中也产生了类似的情况。虽然它們的殖民地沒有被敌人的軍队占領，但是殖民主义者也不能在那里維持他們旧的統治形式。1939—1940年在法国土地上为反对希特勒匪徒而战斗的一支四十万人的法国軍队中，有二十六万是北非人。②在法国被占領期間，法国正規軍之所以能够恢复过来主要是依靠利用殖民地的人力后备。丘吉尔在說明1942年局势时写道："同我們联合的法国軍队共有十万多人。大多数是受过很好訓练的土著軍队。"③1944年从"战斗的法兰西"部队中組成法兰西第一軍，其中一半以上是非洲人。

在比利时和荷兰軍队中服役过的殖民地人民，在本国展开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曾經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战斗的士兵在战后不甘心容忍殖民主义的存在，这是十分自然的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帝国主义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帝国和捍卫本土而被迫交到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手中的武器，最終却掉轉过来对付他們自己。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战爭的反法西斯性质，是由于苏联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而在全世界引起的重大变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淪为日本占領区的殖民地的命运更清楚地证实了这一規律。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泛亚細亚主义理論和关于"共荣圈"的蠱惑性宣傳，利用人民对他們旧的奴役者的仇恨，在最初竟得以拉攏被他們占領的国家的一部分居民。在南海沿岸各国的軍队中大約有五十万士兵。这些軍队是由印度人、泰国人、菲律宾人、馬来亚人和其他民族的人

① 《恩克魯瑪自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序言第3頁。

② «Revue militaire d'information», 25 mars 1956, p. 62.

③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London, 1951, p. 592.

員組成的①。但是这些軍队的士兵所获得的武器，最終不仅被用来对付老的殖民主义奴役者，而且还用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②。

游击队和民族解放軍軍备的补充来源，是从被他們赶走的日本占領軍手中夺来的武器。

在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者以后，当卷土重来的老殖民主义者企图恢复从前的秩序时，民族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便奋起捍卫自己的国家。反对这些老殖民主义者的斗爭在緬甸、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馬来亚和菲律宾展开了。

在战爭期間，中近东各国的人民也觉醒了，在許多場合，那里的工人阶級都是第一次出現在历史舞台上，它們的战斗行动是对被封建剝削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的一种号召。在土耳其、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中的殘暴的政治制度已开始动搖。被人民群众的运动弄得惊惶失措的土耳其和伊朗的統治阶級，不得不答应实行一些改革。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解放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这一运动使法国在这些国家中的殖民統治遭到破产。③

在战爭期間，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的軍事法西斯独裁垮台了。沒有一个存在着殖民制度或半殖民制度的国家在战爭期間不是向左迈进了一大步，沒有一个这样的国家的人民群众不是充滿着决心为自由而斗爭。④

帝国主义者以为，在那些民族解放运动由資产阶級領导的国家中，运动取得一些成績对他們来說还不是一切都完了。他們确信能够同民族資产阶級勾結以維持自己的統治（如果不是直接的

---

① 参見 *В. Я. Аварин.* Борьба за Тихий океан. М., 1947, стр. 363.

② 参見本书第十章。

③ 参見本书第十一章。

④ 参見本书第十三章。

統治，那末哪怕就是間接的也好）。

但是殖民主义者在那个时候沒有能估計到宗主国的壟断資产阶級和殖民地的民族資产阶級之間經济和政治矛盾的深刻程度。

苏共綱領中强調指出："民族資产阶級按其本性来說具有两面性。在現代条件下，殖民地国家以及过去的殖民地和附屬国的同帝国主义集团沒有联系的民族資产阶級，客观上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基本任务的实現有着利害关系。因此，它的进步作用和它参加解决全民族迫切任务的能力还沒有发揮完。"①

三、为政治独立而斗爭。战后发展綱領

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明显地向殖民地民族資产阶級表明，如果他們不取得政治独立，他們就不能保证自己的經济发展綱領得到实現。例如，英国甚至在战爭期間还执行着阻止印度工业发展的政策，这一政策禁止印度建立一些国家迫切需要的部門，因此在印度广大的民族資产阶級人士中引起了空前的憤怒。在反法西斯战爭进行的条件下，殖民主义者这种粗暴的专横行为特别明显地表明了他們永远不願放棄自己专制統治的打算。

賈瓦哈拉尔·尼赫魯把英国战时的这一政策作了以下的描述："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必要的机器仍不許进口……在印度既不缺乏資金也不缺乏熟练的人才，而只是缺乏机器，工业家們也正在为此喧嚷不休。但是尽管由于战爭局势的迫切需要，英国工业的未来需要总是随时被念念不忘的，认为将印度的任何可以在战后年代与英国工业竞爭的工业发展起来都是不适当的。"②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01 頁。

② 賈瓦哈拉尔·尼赫魯：《印度的发現》世界知識社 1956 年版第 543 頁。

正是在战爭年代里印度深信，在取得政治独立以后，能够建立本国自己的工业，并且决心实現国家工业发展的綱領。

到1943年年底印度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制訂战后发展綱領的运动。印度在这以前已經在英国銀行中所开的帳戶上积存了将近十亿英鎊的資产。打算利用这笔資产，乃是印度战后无須进行深刻的社会經济改革就可能实現龐大的工业发展綱領的主要理由之一。

战后发展綱領的宣傳对印度資产阶級来說，是爭取国家独立和夺取政权的一个手段。同时印度資产阶級企图利用这个綱領来安撫群众，使他們脫离阶級斗爭，使他們对美好的将来抱有希望。

1944年1月在印度报刊上发表了所謂的"孟买計划"，即国內大工业家制訂的印度战后工业发展的十五年綱領。国大党(代表印度广大的資产阶級人士的利益、其中也包括它的急进派系的利益的一个政党)也在1945年8月制訂了自己的印度战后发展綱領，該綱領規定某些工业部門实行国有，在农村中实行局部的土地改革并成立独立的民族政府。①

在印度反映得最为明显的趋势，也在其他的殖民地有所表現。实际上每一个哪怕是只有一点工业萌芽的殖民地，其本国的民族資产阶級也会提出爭取政治独立的斗爭綱領，而这一綱領通常是以战后时期本国工业发展的計划作为后盾的。殖民主义者在战爭期間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殖民地的民族資产阶級在战时所制訂的战后发展綱領已暴露出他們政策中的新方針。这一新方針表現在他們对发展国家資本主义抱有希望，而战爭異常加速了国家資本主义的增长。殖民地的資产阶級虽然在每一个步驟上都碰到种种限制，但是当根据政府的定貨供应商品的办法能为他們开辟按投机的高价来銷售商品

① *D. S. Nag.* A Study of Economic Plans for India. Bombay, 1949, p. 69—108.

的可靠市場时，他們还是能估計到国家資本主义的优越性。① 他們把国家資本主义不但看成是加速私人积累的手段，而且看成是使民族資本不受外国壟断組織有害的竞爭的擋箭牌。

在半殖民地和附屬国中，政权在形式上屬于当地資产阶級，但是帝国主义壟断組織在这些地方也保持着統治。他們掌握了經济命脉，并且还收买国家的地方机关。在这些国家里的民族資产阶級把經济独立的要求提到首位。他們认为只有經济独立，才能使他們被帝国主义殖民者搞得仅仅徒有虛名的政治主权成为現实的东西。

民族資产阶級領导人认为在国家积极干預的基础上实現的国家工业化是排除外国操纵的一个手段。这就是拉丁美洲国家民族資产阶級提出的战后发展綱領的实质。战爭期間，制訂工业化綱領的国家机关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出現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时期的綱領中首先規定发展重工业部門，而这一部門的发展是最受帝国主义壟断組織的阻撓的。在綱領中也特别注意到利用国家的矿物資源来发展民族經济。②

依靠国家資本主义这个可以使經济走上独立发展軌道的主要杠杆，已經成为拉丁美洲民族資产阶級信仰的象征。美国在战时发表的許多有关拉丁美洲的学术著作中都惶恐地指出了这一点。③

絕不能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資产阶級的战后发展綱領同高度发展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壟断資产阶級在同一时期制訂的綱領相提并論。它們从本质上来說是根本不同的。一种綱領的任务是利用国家来摧毁外

① 从印度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得特别清楚。1939—1940年印度工业接受的国家定貨共为二亿八千万卢比，1942—1943年印度工业接受的国家定貨共为二十四亿七千万卢比(«People's Age», 15. II. 1948. Supplements)。

② *A. P. Whitak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merica. The Northern Republics. Cambridge,1948, p. 96.

③ *S. Inman*. Some Latin American Views on Post-War Reconstruction. «Foreign Policy Reports», New York, 1944, p. 8—9.

国壟断資本的統治，另一种綱領是加强国家对經济的干預以巩固壟断資本的統治。这两种綱領反映了宗主国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民族資产阶級之間的业已加剧的矛盾。这些矛盾是促进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潰的一种力量。

殖民地的民族資产阶級懂得，資本主义发展綱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目中已經是怎样的威信扫地，因此他們甚至广泛采用反資本主义的口号来作为掩飾。他們的領导人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类型的社会”、是“合作制国家”和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信徒，同时是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改造之基础的国营經济成分的捍卫者。民族資产阶級的策略是时代的表征，它证明了在飽受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里資产阶級思想体系的彻底破产。

到战爭結束时，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抱定决心不使殖民体系崩潰，要千方百計地維持这一体系。但是它們的政策只能加速殖民体系的瓦解。

第 二 篇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苏联的决定性的作用下，德国法西斯主义和日本軍国主义被击敗，这为欧亚一系列国家进行根本的民主改造創造了有利条件。

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中国、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波兰、罗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都走上了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們同苏联以及在此之前已經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一道組成了統一的社会主义陣营。南斯拉夫也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革命在欧亚一系列国家中的胜利，使帝国主义陣地遭受到新的强有力的打击。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越来越有利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超出了一国的范圍并且变成为眞正的世界体系，它包括着地球上的三分之一居民。强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現，意味着由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始的、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一全世界历史性进程正在順利发展，意味着社会主义正在国际范圍內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列宁关于“把无产阶級专政由一国性的（即存在于一个国家內的，不能决定全世界政

治的）专政轉变为国际性的专政（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影响的无产阶級专政）”① 的預言，已經得到实現了。

資本主义世界已經大大地縮小。生活再次雄辯地证明：社会主义代替資本主义，乃是社会发展的一条客观規律。帝国主义无法制止当代这一无所不包的过程。

但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在尖銳的阶級斗爭的条件下形成的，这一斗爭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政治、經济和思想意識方面。帝国主义反动势力为了挽回业已丧失的陣地，竟不惜采用极端的斗爭手段，包括內战和外国干涉。这是可以理解的。从資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一过渡还沒有完成，剝削阶級分子就会企图复辟。他們这种企图就表現在要使历史开倒車。

反动势力指望在战爭中受到慘重損失的苏联以后不会在国际事务中起重大影响，指望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不能克服战爭造成的經济困难而投靠資本主义的西方，首先是投靠在战爭中发了横財的美国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希望各人民民主国家国內的反动势力，借助外来的援助，能在反对社会主义力量的斗爭中巩固自己的陣地。帝国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对过去遺留下来的民族主义傾向，寄予不小的希望。

但是諸如此类的打算都完全破产了。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在战爭中遭到失敗，也未能打贏所謂“为和平之战”。它們不仅沒有能够“甩掉”共产主义，而相反地，在战后的头四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却已将自己的边疆一直扩展到易北河和太平洋。

在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世界上第一个为人类开

---

① 《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28 頁。

辟了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苏联，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横加反对，尽管它們企图阻碍苏联的經济发展，苏联人民在順利执行战后五年計划的过程中，迅速医治好严重的战爭創伤，恢复并滿怀信心地向前发展了国民經济的各个部門。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每年从苏联得到日益增多的經济援助，这种援助将促进这些国家社会主义的巩固，并有助于它們国际地位的加强。

1949年，美国的原子壟断地位消失了。原子壟断是对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一个极大威胁，是美帝国主义在爭夺世界霸权的斗爭中的一項主要賭注。苏联掌握了原子能的秘密以后，就保持了軍事上最强国的地位，这对于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安全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再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比資本主义优越，证明了苏联能够在发展最复杂的科学技术部門方面超过美国。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仅保障参加該体系的国家的主权。它对于遭到帝国主义者的侵略威胁的各国所进行的爭取主权和独立的斗爭，也是一个强大的支柱。

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对于国际舞台上各种事件的进程起着愈来愈大的影响。

苏联政府的一切对外政策活动，都是从列宁所提出的、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可以而且必須和平共处的論点出发的。苏联始終不渝地主張继續发展在上一次战爭中所形成的大国間的合作，主張在反希特勒联盟各盟国共同制訂計划的基础上，尽速实現和平安排。

苏联的对外政策是符合各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它旨在保障持久和平，維护各国人民的革命成果。这种对外政策的方針是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共同方針。

这种在国际事务上的观点的吻合，这种一致，并非偶然或暫时的現象。这种共同性有着巩固的、由社会主义性质本身决定的客观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的胜利，开始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并且这一大家庭的每一个国家在国内所取得的成就愈大，社会主义国家在經济、政治、文化等联系方面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則的作用范圍就愈广。

社会主义国家用完全具有不同內容的对外政策原則来同帝国主义相对抗，它們在建設新社会的事业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的斗爭中，在維护和平和保障国际安全、在援助为独立和自由而斗爭的各国人民的活动中，把自己的力量联合在一起。

苏联共产党綱領說道："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国与国之間經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新类型。"①

当世界摆脫束縛它进步的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子，摆脫社会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时候，这些关系就会成为世界上一切国家进行国际合作的楷模。

第 五 章

1945—1949 年苏联在經济上和政治上的发展。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綫

一、战后头几年苏联經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总結

苏联在偉大的卫国战爭中經受了对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8 頁。

度的严酷考驗。經过战爭的洗礼，证明我国在政治和軍事方面都是巩固的。但我国国民經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德国法西斯强盜使一千七百一十个城市和工人鎮以及七万多个乡村夷为平地，或遭到部分的燒毁。他們毁坏了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个工业企业，使九万八千个集体农庄、一千八百七十六个国营农場和二千八百九十个机器拖拉机站遭到破坏。根据苏联国家非常委員会的材料，仅国民經济和部分城乡居民受到的直接的物质損失就达六千七百九十亿卢布（按战前价值）。如果再加上国民經济轉向軍事軌道、轉向进行战爭的耗費，加上由于一些地区的暫时淪陷而未收足产品的价值和战后国民經济由战时轉入平时的費用，則总的物质損失达两万五千六百九十亿卢布，即将近五千亿美元。

千百万苏联人在爭取祖国和全人类的自由、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斗中牺牲了生命，无数的和平居民遭到希特勒分子兽性的蹂躪。

战爭使苏联的經济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尼·謝·赫魯曉夫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会上所作关于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报告中，談到了战时所遭受的重大損失，他說："如果把这笔巨額款項投入和平建設——建設各种工厂、铁路、发电站、住宅以及增加人民日用品的生产，那么我們早就有了丰裕的物质資料。"①

我国因战爭而遭到的牺牲和損失极为慘重。任何一个处于同样境地的資本主义国家，都不能沒有外援而独立地在短短的历史时期中恢复自己的經济。

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正是把它們对苏联的政策建立在使社会主义制度崩潰的希望上面。帝国主义者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了經济封鎖，用侵略政策阻撓它們恢复經济

① 赫魯曉夫：《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頁。

的工作，并迫使它們支付浩大的国防費用。他們企图从經济上和政治上来摧毀社会主义。但是正如过去一样，他們又低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潜力。

西方的反动报刊在战后喋喋不休地說："俄国如果不举外債，就将弄得精疲力尽。"它們預言苏联必然在經济上接受資本主义国家的奴役。帝国主义的政治战略家們就是从这种假設出发的。他們希望战爭所带来的損失，将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引起政治上的麻煩。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施加了經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企图使它們屈从帝国主义的指揮。①

1947年春，美国国务院計划局局长乔治·凱南曾經公然写出了这些盘算。他在发表于《外交季刊》杂志上的《苏联政策之起源》一文中，竭力强調苏联"經济上的脆弱"及其居民的"疲憊不堪"，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在其他一些著作中，凱南表示深信：外来的压力会在苏联引起"終将导致苏維埃政权的崩溃或逐漸削弱的趋势。"②

与帝国主义者的估計相反，苏联在战后还是順利地继續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設。在苏联人民面前摆着一項头等重要的任务，即尽速克服战爭給国民經济带来的恶果。

1946年3月，最高苏維埃通过了1946—1950年恢复和发展苏联国民經济的計划。这一五年計划的基本任务不仅是要恢复受到战爭破坏的地区，达到战前的工农业水平，而且还要大大超过这一水平。五年計划規定要提高苏联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使国民經济的所有部門继續取得技术上的进步。到1950年，工业的总产量要比1940年的水平提高48%。

在西方国家中，人們又像在战前經常所做的那样，断言战后的

① 参見本书第六章。

② *G.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1952, p. 122—127.

五年計划是不可能实現的。

英国資产阶級杂志《世界評論》要使人相信，"現有的材料令人信服地預料到，俄国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現自己新的五年計划"。英国的《經济学家》杂志武断地說，执行五年計划时遭到的挫折，将迫使苏联政府"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內政策。

但这些不吉利的預言都破产了。

苏联不仅迅速地治好了战爭的創伤，而且以資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可能达到的速度勇往直前。

苏联經济的迅速轉上和平軌道，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多么大的优越性。在苏联进行的这种調整工作，沒有像資本主义国家那样引起失业人数的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在美国，1946 年的失业人数比 1943 年增加了一倍，在英国几乎增加了四倍，而在苏联，复員者的就业問題有組織地加以解决了，并且职工人数在不断增长。仅仅 1946 年这一年，苏联国民經济中的职工人数就增加到三百万人。在美国，1946 年工业产品的生产量比1943年战爭期間的最高水平縮减了三分之一，而在苏联，只比1945年的水平縮减了 16.3%。将經济轉向和平軌道的工作基本上是在 1946 年完成的，在这方面它走在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前面。

苏联經济在克服了战后恢复平时生产的暫时困难以后便迅速向前发展。到 1947 年底，全年的工业总产量已接近 1940 年的水平，而 1948 年已超过这一水平。在采煤量方面于 1947 年超过这一水平，鋼产量方面于 1948 年超过这一水平，电力方面于 1946 年超过这一水平，生铁产量和石油开采量均于 1949 年超过 1940 年的水平。

如果考虑到苏联人民是在什么样的国际环境之下为恢复和发展本国

的經济进行斗爭的，那末这些成就就特别值得注意，要知道，美国帝国主义和其他西方国家总是以战爭威胁苏联人民。1946年，資产阶級报紙《指南針日报》的华盛頓記者，曾經淋漓尽致地描繪了这一形势。他写道："在美国政府中有一些人认为：原子武器方面的竞賽，是加速冷战的有利手段。在他們看来，冷战是比单純用言詞更好的一种办法。他們认为这是迫使苏联忙于重整軍备而妨害恢复工作的一种手段。現在，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他們希望世界上第一个計划化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在經济封鎖和軍事威胁的压力之下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經济恢复工作中，根本就談不到什么外国对我国的援助。国民經济只能靠苏联国内的資源来恢复。不仅如此，根据自己的国际主义团結的义务，苏联政府在各人民民主国家恢复它們的經济和开始迈步建設社会主义的时候，給予了它們兄弟般的援助。

与社会主义敌人的預言相反，苏联完成了五年計划，并且在工业、运輸和邮电方面是提前即用四年零三个月完成計划的。1950年的工业总产值比战前水平提高了73%，而按計划規定是48%。按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来說，苏联在战后大大超过了美国。苏联工业实物产量在1950年比1937年增长了151%，而美国仅仅增长了84%。

五年計划完成的成績，是社会主义在同資本主义进行經济竞賽中取得新胜利的保证。苏联人民建立了偉大的劳动功勋。那些指望苏联人"疲憊不堪"、指望苏联人不能克服困难的帝国主义政客，不得不陷入痛苦的絕望之中。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既沒有"意气消沉"的人，也沒有"疲憊不堪"的人。

战后时期突出的事实是苏联人民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团結进一步巩固。共产党对資产阶級思想体系展开了广泛的进攻。西方的帝国主义宣傳机构对苏联公民施加"思想"影响的企图，受到了决定性的打击。苏联人民在爭取祖国經济和文化的进一步高漲的斗

1945—1950年苏联工业实物总产量的增长①

（对1940年的%）

年份	全部工业	其中	
		生产資料的生产（第一部类）	消費品的生产（第二部类）
1940	100	100	100
1945	92	112	59
1946	77	82	67
1947	93	101	82
1948	118	130	99
1949	141	163	107
1950	173	205	123

爭中更加紧密地团結起来了。

筹划扼杀苏联的帝国主义政治战略家，无論如何也不能理解促进苏維埃国家日益强大的社会經济因素。他們不可能理解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乃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使經济高漲的一种强大的推动力。“劳动者认識到他們不是为剝削者工作，而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社会工作，这种认識产生了劳动热情、革新精神、創造主动性、群众性的社会主义竞賽。”②

苏联人民在执行战后第一个五年計划的过程中，需要克服不小的困难。这种困难特别表現在农业方面。由于1946年的旱災和歉收，农业遭到削弱。同时在农业的領导上，出現了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恶果。③

---

①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 1956,стр. 47.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3頁。

③ 参見赫魯曉夫：《最近五年来农业发展的結果和进一步增加农产品生产量的任务》（在1958年12月15日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頁。

但是，尽管遇到了种种障碍和困难，苏联人民还是利用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潜力，以自己忘我的劳动，大大加强了祖国的經济力量。1950年国民經济的主要指标远远超过了战前1940年的水平。

1950年的生铁产量为一千九百多万吨(1940年为一千五百万吨)，鋼产量为二千七百多万吨(1940年为一千八百三十万吨)，采煤量达到二亿六千一百多万吨(1940年为一亿六千六百万吨)，石油开采量接近三千八百万吨(1940年为三千一百万吨)，电力产量为九百一十亿瓩时以上(1940年为四百八十三亿瓩时)。工业的劳动生产率1950年比1940年增长37%。谷物总收获量1950年比1940年提高13%。

經济的和平方向是苏維埃經济发展的特征。苏联政府力图把尽可能多的資金用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1950年国防的撥款与战前1940年的32.6%和1946年的23.9%相比，只占預算的全部支出的18.5%。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战后生产的高漲是在以現代技术重新装备工业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重工业方面，即在电力、冶金、机器制造、化学等部門，生产自动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新的生产部門的出現，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

苏联科学的成就起了巨大的作用，这特别明显地表現在掌握原子能方面。1949年9月25日塔斯社关于苏联已經拥有原子武器的消息，打乱了帝国主义原子外交的計划。

十分有趣的是，在此以前不久，美国的政客和专家还揚言，苏联"至少在二十五年之內"无力参加現代战爭，"如果不是更长一些时間的話"。他們中間头脑最清醒的人断言：我国不会早于1952年掌握生产原子武器的秘密。但这一切預測都被事实推翻了。

苏联之掌握原子能，证明了苏联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质的变革。社会主义經济体系的胜利已經清楚地显示出来：过去一个落

后的、而且不久以前还受到战爭破坏的国家，能够迅速提高到科学技术方面最先进的資本主义国家的水平。甚至那些毫不同情苏維埃制度的人，也不得不肯定这一点。例如工党极右翼的代表雷蒙德·布萊克本就塔斯社的消息在《每日快报》上写道："現在一眼就可以看出，苏联已大大超过了英国，并且从生产能力和生产組織来看，可以毫不夸張地把它同美国相提并論。"

苏維埃国家推翻了美国的原子壟断地位，对以原子战爭威胁人类的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起了遏制的作用。虽然美国的反动报刊以加紧軍备竞賽保障美国优势的叫囂来回答塔斯社的报道，但某些清醒的呼声，例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編輯部文章的作者却号召持理智态度，强調"必須作更頑强的努力来确立和平"。

苏联揭示了原子裂变秘密，为和平利用这种新动能創立了基础。苏联不是把原子能用于破坏的目的（美帝国主义則是从这儿开始），而是建議用科学技术进步的这一偉大成就来造福人类。

苏联1945—1949年在經济和政治发展上取得的成就，再次向全世界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显示了它对資本主义的优越性。这些成就不仅巩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且也巩固了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国际地位。建立了强固和完整的經济体系的苏联的强大經济，成了已經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經济的当然核心。战后五年計划所取得的成績，使我国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进步力量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进攻的斗爭中，能够給它們提供有力的援助。

二、战后头几年苏联为爭取和平共处与国际合作的斗爭

苏联在战后头几年所面临的国內外形势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对外政策活动的方向。它的首要任务是，为創造有利于和平經济

建設的条件而斗爭。同时，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也完全反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上嶄新的职能，这种职能是由无产阶級专政的国际主义性质所产生的。这就是：援助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設，并根据国际社会主义分工的原則妥善組織同它們的合作。

苏联对已經着手建設社会主义的各国人民进行了多方面的政治支持和經济援助。考虑到帝国主义国家竭力想迫使这些国家接受它們所憎恨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上述援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苏联部队进駐由苏軍从法西斯铁蹄下解放出来的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箝制了这些国家国内反动派的反革命活动，同时也使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进行武装干涉以援助剝削阶級反抗人民群众意志的打算成为泡影。苏联的对外政策利用一切必需的国际关系渠道，也維护了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安全和独立。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枉費心机地力图利用自己的外交机构，在东欧各国扶植反动政党上台执政，使这些国家重新回到帝国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怀抱。盟国管制委員会的英美代表在保加利亚、罗馬尼亚和匈牙利进行顛覆活动的阴謀，遭到了苏联方面的坚决反对。苏联反对强迫波兰接受从倫敦回来的反动的流亡“政府”。帝国主义国家打算通过誣蔑人民民主政府来干涉波兰、匈牙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的选举运动并对选举过程施加影响的企图，遭到了失敗。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想引起人們怀疑这些政府的民主性质的企图，一再遭到苏联的反击。①

苏維埃国家在准备和締結对前希特勒盟国的和約时所采取的立場，使帝国主义国家未能强迫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馬尼亚接受奴役性的經济和政治义务；毫无根据地提高賠款数目，在和約中載入“机会均等原則”，以使这些国家依附于外国帝国主义，等等。苏維埃外交不断揭露帝国主义者对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馬尼亚的阴謀活动（美国当局扣留它們的財产，“冻

① 参見本书第六章。

結”它們的貨币基金等等），上述活动的目的，在于对这些国家施加經济压力。由于苏維埃外交所作的努力，和約成为德国前盟国爭取民主化、巩固它們的民族主权的重要工具。①

从苏軍解放东欧各国的时候起，苏联就对东欧各国人民进行了巨大的經济援助：供給它們粮食、燃料、工业原料、設备，提供貸款。苏联的兄弟般的援助，使得帝国主义国家想以經济压力来影响这些国家阶級斗爭的进程的打算归于失敗。

根据波兰經济学家的統計，仅仅波兰一国到1949年为止从苏联取得的用于工业化的貸款（二十二亿卢布），就等于美国根据“馬歇尔計划”向西欧十一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士、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提供的机器和設备的价值。②

苏联在1948年6月还削减了它应得的賠款，从而也促进了罗馬尼亚和匈牙利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經济的发展。此外，轉归苏联所有的前德国的資产，也轉交給了人民民主国家。③苏联又是人民民主国家許多傳統出口商品的銷售市場。

苏联的援助使各人民民主国家得以在短期內恢复并高速度地发展了它們处于蕭条和破产状态的經济。因此，它們不仅捍卫了自己的經济独立，而且能够在短期內在本国打下社会主义的經济基础。

友好合作互助条約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方面起了重要的作

① 参見本书第二十章。

② 参見《和平和社会主义問題》1960年第6期第68頁。

③ 参見《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ь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М., 1958, стр. 51。

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工业产量的指数*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波　兰 (1937 年—100)……	148	181	231
捷克斯洛伐克 (1937 年—100)……	108	124	143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1936 年—100)……	71	87	111
匈牙利 (1938 年—100)……	102	137	187
罗馬尼亚 (1938 年—100)……	85	…	147
保加利亚 (1939 年—100)……	180	…	288
阿尔巴尼亚 (1938 年—100)……	254	306	395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ь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стр. 50—51.

用。除了在战时(1943 年 12 月 12 日和 1945 年 4 月 21 日)同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签訂的同盟条約以外，苏联在 1948 年还同罗馬尼亚(2 月 4 日)、匈牙利(2 月 18 日)、保加利亚(3 月 18 日)締結了这种条約。上述条約为巩固欧洲的和平和所有締約国的安全作出了貢献。

1947 年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①，有助于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爭取社会主义和和平的斗爭中把力量联合起来。情报局在交流經驗和使各兄弟的共产党的行动配合一致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促进了共产党队伍中无产阶級国际主义思想体系的进一步巩固。

苏联过去和現在都是根据完全平等、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的原則，来建立自己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根据这些原則，苏联解决了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国界問題，解决了政治、文化、經济合作的問題。

① 除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以外，还有西欧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即法共和意共，参加了情报局。

由于个人迷信的恶果，在苏維埃国家同某些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1948年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上，产生了某些錯誤。在情报局譴責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領导机构的行动以后(这种譴責犯了一系列錯誤并把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陣营对立起来)，斯大林使苏联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关系不必要地尖銳化起来。① 尼·謝·赫魯曉夫在1958年德国統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談及这些錯誤时說道："1948年发生了什么呢？当时，我們党批評了南斯拉夫共产党領导机构的机会主义錯誤和民族主义錯誤。錯誤的不是我們的批評，这种批評我們从来也沒有放棄；錯誤的是情报局决議中要求更換南斯拉夫共产党領导的号召……錯誤是双方面都有的；我强調指出双方都犯了錯誤，是从这个意义上說的，即两党之間的爭执和关系恶化被轉移到国家的关系上。"② 1955年，苏联政府采取了措施来糾正这些錯誤。

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間的兄弟般的合作，加强了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和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济和政治力量，扩大了它們在国际关系上的影响。

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巨大增长，促进了中国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和这一偉大的国家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

中国人民順利地利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亦即欧洲法西斯势力和日本軍国主义被击潰以后所形成的有利形势。苏联对于中国人民解放軍反对蔣介石匪帮及其帝国主义主子的斗爭，从后方提供了可靠的掩护。苏联坚决阻止了美帝国主义公开干涉中国內战的企图。在1945年12月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議上，苏联坚持要美国軍队撤出中国(美軍是借口接收日軍投降而进駐中国的)。③

① 参見《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и решениях съездов, 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 пленумов ЦК》, ч. IV, изд. 7. M., 1960, стр. 232。

② 《赫魯曉夫在德国統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話》(見1958年7月14日《今日新聞》)。

③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5 год》. M., 1949, стр. 161—162。

此后苏維埃国家仍坚持不懈地打击帝国主义干涉中国人民內政的企图。这就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造成了外交上的有利条件。①毛澤东在1949年7月說道："假如沒有苏联的存在，假如沒有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假如沒有——这一点对于我們来說特别重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假如沒有欧洲各新民主国家的出現，……那末，堆在我們头上的国际反动势力必定比現在不知要大多少倍。在这种情形下，我們能够胜利么？显然是不能的。"②

苏联坚持不懈地致力于促使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朝鮮，在短期內成为独立的民主国家。在1945年12月苏、英、美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議上，苏維埃外交正是以此为目的，使会議通过了建立临时的朝鮮民主政府的决議。并且在后来，苏联坚持朝鮮人民的自决权，反对美帝国主义要将亲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权强加于朝鮮的企图。当美国破坏莫斯科会議的决議，在南朝鮮成立李承晚傀儡政府以后，苏联贊同由全体朝鮮人民选出的最高人民会議关于宣布成立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决定。苏联于1948年10月12日承认了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同它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給年輕的朝鮮人民民主国家提供了发展經济和文化的多方面的援助。③

在对年輕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整个政策上，苏維埃国家始終遵循着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和列宁的遺訓。列宁說："沒有世界各国无产阶級和全体劳动群众自願追求联盟和統一的願望，战胜資本主义的这一事业是不能順利完成的。"④

苏联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时，也对殖民地和附屬国的

---

① 参見本书第七章。

② 《毛澤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9頁（按：1479頁无"这一点……特别重要"一語。——譯者）。

③ 参見本书第六章。

④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0頁。

民族解放运动給予了积极的支持，这一运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苏联的政策完全实现了列宁关于“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資产阶級解放运动眞正具有革命性的时候”①，无产阶級才应当支持它的这一指示。苏联一貫主張保护为爭取使本国从殖民主义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各国的民族主权和独立。

从各个年輕的民族国家成立之日起，苏联就同它們建立了平等的友好关系，促进了它們国际地位的巩固，支持它們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行为的斗爭。

1944 年，苏联同叙利亚和黎巴嫩建立了外交关系。1946 年，苏联、烏克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关于法国軍队和英国軍队从各該国撤出的要求，給予了有效的支持。

苏維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首先起来保护从 1945 年秋天便遭到英国軍队和荷兰軍队侵略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苏联代表和烏克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代表 1946 年在安全理事会揭露了英国和荷兰殖民者的行为。西方国家不得不同印度尼西亚政府进行談判。在 1947 年和 1948 年，苏联代表团在安理会一再发出了反对殖民主义者侵略行为的呼声，因为它們違反了自己对印度尼西亚的义务。②1950 年，苏联同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外交关系。它是第一批同印度（在 1947 年）、緬甸和巴基斯坦（1948 年）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随着一系列走上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道路的年輕的民族国家的誕生，随着这些国家同苏联的友好关系的巩固，国际舞台上的和平力量增长了。

在战后时期，苏联同各資本主义国家关系的目的，在于通过相互合作来建立持久和平和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虽然在对外政策方面也带来了一定的損失，但它不能改变由

① 《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211—212 頁。

② 参見本书第九章。

党和人民制訂并加以实現的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和总路綫。在战后的年代里，苏联力图巩固和发展战时同資本主义国家，即同反希特勒联盟的参加国的合作。

这种合作的极为重要的直接任务，在于尽速同参加法西斯国家集团的各国締結和約。苏联在这些国家促进了把本国推向法西斯集团的侵略和反动势力的消灭，并促进了每一个国家中进行民主发展的条件的建立。

苏联在历届四国外长会議上和在 1946 年巴黎和会上为爭取和平安排的民主原則进行了頑强斗爭，从而使得 1947 年 2 月同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罗馬尼亚和芬兰締結的和約，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发展提供了可能性。①

如果波茨坦协定能够为它的全体签字国家所执行，那末在德国也会实現这种可能性。

苏联依靠着德国人民中的民主力量，一貫为爭取履行波茨坦协定，为尽速締結对德和約而进行斗爭。② 斗爭有时采取了尖銳的形式，例如在 1948—1949 年美国、英国和法国极力制造的破坏东德經济的所謂"柏林危机"时期就是如此。苏联使帝国主义国家阻止德国的和平民主势力发展的企图遭到了打击。

在西方国家分裂了德国，并成立了西德单独的政府以后，德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在东部宣布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共和国走上了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1949 年 10 月 8 日，苏联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同它一起作了更大的努力，来爭取恢复有利于德国人民的統一和同它締結和約。

苏联也进行不懈的努力，爭取为日本創造有利于它的和平民主发展的条件。③ 在 1943 年开罗会議的决議中，在 1945 年的克里

① 参見本书第六章。

② 参見本书第十八章。

米亚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中載明的反希特勒联盟的綱領中，規定了日本的非軍事化和民主化，及其經济的和平发展。1945 年 12 月，在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議上，苏联坚持要在会議所設立的远东委員会的范圍內制訂实現这一綱領的指示。

但是美国(其軍队以全体盟国的名义占領了日本)拒絕履行过去已达成协議的日本民主化的綱領，并使远东委員会的工作陷于瘫痪。尽管如此，苏联之参加远东委員会，还是促进了日本民主改革的进行，便利了日本进步力量的反帝斗爭。

苏联始終不渝地要求尽速同日本締結民主的和約。但是美帝国主义者力图取消日本的独立，并将它变为自己的軍事基地，对締結和約和撤出自己的占領軍則千方百計地加以拖延。当再也拖延不下去的时候，美国便无視苏联的权利，拒絕了波茨坦协定所規定的起草和約的程序。事实上美国沒有让苏联参加而开始了单独的談判，并且違反自己的义务而同日本締結了和約，从而給巩固远东和平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損害。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所发动的“冷战”，使得全体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家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的可能性大大受到妨碍。在美国、英国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中，指望以暴力縮小社会主义范圍、指望“甩掉”社会主义的这种力量占了上風。

拒絕同苏联和平共处并进行合作的傾向，使得像 1942 年英苏条約以及 1944 年的苏法条約这一类的保障欧洲和世界和平的工具归于无效。

但是国际舞台上新的力量对比，以及苏联甚至在“冷战”加强的情况下都执行始終如一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使它得以同某些資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948 年 4 月 6 日苏联与芬兰签訂

---

③ 参見本书第十九章。

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約，就是其中之一例。这项条約的宗旨在于共同保障和平，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苏联与芬兰之間的經济和文化联系。① 条約签訂以后，芬兰便巩固地走上了执行中立与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給其他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提供了眞正的爱好和平政策的范例。

在帝国主义国家煽起"冷战"的情况下，苏联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来爭取裁軍。自从大規模毁灭性的武器出現以后，裁軍的必要性就变得特别明显。

从 1946 年开始，苏联在联合国不断地为禁止原子武器、建立严格的国际管制，以完全排除将原子能用于軍事目的的可能性而进行斗爭。即使在苏联掌握了原子彈的秘密幷拥有这一武器之后，它也继續进行这一斗爭。正如塔斯社 1949 年 9 月 25 日的声明中所强調指出的，苏联政府"仍旧坚持幷且今后也願意坚持自己过去的立場，即无条件地禁止使用原子武器"②。

苏联政府提供了逐漸裁減軍队的榜样。1945 年 5 月，我国軍队人数为一千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人，到 1948 年，裁減到了二百八十七万四千人。1948 年，苏联向联合国提出了普遍裁軍幷在安理会范圍內对这项工作进行有效监督的提案。但是西方国家拒絕采取苏联爱好和平的建議。

在 1946—1949 年，苏联在联合国讲坛一再建議消除产生社会主义国家与資本主义国家間的猜疑与不信任的原因。

这里所談的是取消在外国的軍事基地幷从該处撤出外国軍队、禁止战爭宣傳、締結五大国之間的公約等建議。③

---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8 год》, ч. I. M., 1950, стр. 183—185.

②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M.,1953, стр. 163.

③ 参見本书第二十一章。

苏維埃国家一再以实际行动来使这种倡議更加有力。战爭結束以后，苏联在极短的期間就从中国、朝鮮、挪威、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在对法西斯侵略者作战过程中曾經进駐軍队的其他国家撤出軍队。帝国主义国家枉費心机地企图在我国和伊朗之間就所謂苏軍"駐留"在伊朗境內的問題挑起冲突。关于苏軍自伊朗撤出的問題，已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議加以解决。

苏維埃外交揭露了帝国主义者旨在加剧国际紧張局势、建立侵略性的軍事基地、加强軍备竞賽和掀起战爭歇斯底里的种种手腕。

苏联这一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作的爱好和平的努力，爭得了資本主义各国愈来愈广泛的阶层的同情。在1948年产生并且后来具有巨大規模的世界和平运动，对苏联的和平行动給予了愈益有效的支持。

苏联在采取和平共处政策的同时，由于面对着蓄謀已久的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不得不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巩固自己的国防。在西方国家着手建立侵略性的軍事集团以后，苏联本应当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鉴于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設立了外国的軍事基地，苏联采取了某些对策，苏联加强了在波卡拉—烏德和旅順港的軍事基地(苏联后来放棄了这些基地)。

随着与資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合作的发展，苏联努力扩大不同制度国家間的經济关系。在战后的头几年，苏联同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締結了一系列貿易条約和支付协定(1946年同丹麦和挪威，1947年同英国，1948年同意大利等等)。苏联同这些国家的貿易額，在战后头三年几乎增长了二分之一(从1946年的二十一亿八千一百万卢布增长到1948年的三十亿零九百万卢布)。

苏联主張所有国家共同努力来恢复遭到战爭破坏的欧洲經济。同时，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会导致破坏参加国主权的这种合作。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苏联才不参加“馬歇尔計划”，并且指出，如果参加“馬歇尔計划”，就会造成迫使較弱的国家接受强国的意志，并且这是对它們內政的干涉。

由于不可能把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拉入“馬歇尔計划”的体系，美国帝国主义集团以及在它压力之下的其他西方国家便对苏联进行經济歧視。純粹出于政治动机，美国政府于 1948 年停止发給向苏联輸出設备的許可证。英国政府也禁止向苏联輸出一系列商品。因此，苏联同美国、英国和其他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貿易大大縮減了。但是，同某些資本主义国家的貿易仍在继續发展。例如苏联与芬兰的貿易从 1938—1951 年几乎增长了八倍。

尽管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組織貿易封鎖，苏維埃国家的經济威力还是继續在增长，它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联系扩大了。1950 年，苏联对外貿易流轉額和战前相比超过了一倍半。①

归根到底，各資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經济歧視，首先給它們自己带来了損害。

苏联經济的和平发展，它为維护全世界的和平和民主所进行的不倦的斗爭，日益提高了社会主义及其对外政策在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中間的威信。尽管在进行着激烈的反共产主义的宣傳，和平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还是在日益广泛地傳播着，这就为进一步順利地展开爭取和平的斗爭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列宁的社会主义对外政策原則和战后的历史情况

当代的資产阶級政治家和外交家，照例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信徒。这种哲学以“現时有利的东西就是正确的东西”这一便于利用

① 参見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СССР с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М., 1957, стр. 13。

的教条，在政治上武装着毫无原则的市儈和冒險家。主張这种观念的人們，用自己的尺度来衡量一切事物，他們企图說服輿論，好像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也是受实用主义思想所支配，任何始終一貫的原則性的方針都是沒有的。这种謊言的用意是一目了然的，它是想让广大的人民群众难于了解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原則，以及它之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力图歪曲这一政策，千方百計地試图抹煞它的作用。

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目的和原則，是从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学說出发的。列宁关于战爭与和平、关于不同制度的国家共处的性质、关于新型的国际关系、关于在我国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过程之間的相互关系諸問題的极其重要的理論原則，都直接关系到我党政策与战略原則的制訂。这些原則是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論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經驗、苏維埃国家所經历的全部英雄和光荣的道路、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体系之变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上种种都不可辯駁地证明了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证明了列宁的思想在一切方面，包括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是极其正确的。現代的全部历史证明了社会主义与和平是不可分的，证明了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执行像在世界上消灭战爭这样一种最偉大、最人道的使命。

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創造性地发展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列宁的理論原則，以及发展資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的列宁的观念方面，有了眞正革命的进展。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中，以及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党的綱領中，在对两种体系的力量对比和战后时期世界政治的发展进行深刻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了关于在現代可以防止战爭的极其重要的理論結論。这一被近年来的对

外政策实踐完全证实了的結論，使和平共处原則具有了新的意义，使它成为苏联为爭取和平与安全、反对世界热核战爭威胁的斗爭的更加有效的工具。

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完全抛棄了列宁主义所不相容的、与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相联系的积垢。苏联政府重新考虑了个别的对外政策的作法，糾正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的錯誤和誤解。党再次肯定了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总路綫的这一列宁思想，并以对一系列新問題和新現象的分析，丰富了这些思想。

以尼·謝·赫魯曉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委員会，制訂并彻底执行了基于和平共处原則的苏联对外政策的綱領。这一綱領的出发点是：在当代得到广闊的客观发展基础的和平共处，不单純是在它与战爭之間的唯一选擇。和平共处的前提，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經济竞賽、經济和文化联系、旨在保障国际安全的政治合作。当然，和平共处并不是放棄在思想意識領域內同資本主义的斗爭。尼·謝·赫魯曉夫在美国《外交季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强調指出："主要的是，这要坚守在意識形态斗爭的陣地上，而不是使用武器来坚持己見。"①

在深刻研究当代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对和平共处問題采取的創造性的态度，对列宁学說的一切敌人——不管他們披着什么外衣——所进行的彻底的原則性的斗爭，使得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得以在它所通过的苏共新綱領中，提出了基于列宁思想的、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严謹而具有說服力的科学理論。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关系方面，特别重要的是苏共綱領中所作出的这一結論，即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在国际范圍

① 《沒有武器的世界——沒有战爭的世界》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0年版第42頁。

內进行和平竞賽的基础，并且是阶級斗爭的一种特殊形式。

*　　*　　*

按照列宁的定义，政治是社会經济結构的上层建筑，是“經济的最集中的表現”，并且同它有着不可分割的辯证的联系。① 在某一个国家中存在着的生产关系、該国統治阶級的利益，决定着国家的整个政策的实质。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同統治阶級的对內政策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級的現象，消灭人剝削人和一个民族剝削另一个民族的現象，因此就必然会消除爆发战爭的原因。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經沒有热中于奴役和剝削其他民族、掠夺它們的財富、热中于战爭的社会集团。和平——这是順利地建設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

苏維埃国家从自己誕生之日起，就宣布了嶄新的对外政策原則，从而也就标志着整个国际关系实踐中的根本轉折的开始。但是，在苏联还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还处于資本主义包圍中的时期，这些原則虽然对国际政治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但不是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主要是由帝国主义及其奴役和剝削各国人民的侵略政策决定着国际关系。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时，才产生了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及其所根据的原則对国际关系的整个发展和性质所起的影响大大增长了。

新的国际形势的特点首先在于：社会主义超出了一国的范圍并且变成为世界体系。社会主义已經扩大到地球上四分之一以上的地区，那里居住了人类三分之一的人口。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发生作用的范圍大大縮小了。在社会主义体系的范圍內，产生了

① 参見《列宁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5、71 頁。

② 参見《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67—368 頁。

原則上嶄新的国际关系的类型，即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基础，是直接由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論产生的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

世界解放运动的整个过程，爭取社会主义的斗爭任务，决定了各国劳动人民結成联盟和相互支持的必要性。这一原則始終是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策的基础。列宁曾經指出："工人正以各民族劳动者团結一致的新世界，不容許有任何特权、任何人剝削人現象的世界，来抵制充滿了民族压迫、民族紛爭或民族隔离的旧世界。"① 由于資本主义的消灭以及阶級对抗的消除，民族的对抗也随之而消失，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妨碍各民族眞正接近的压迫、歧視和相互不信任也不存在了。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第一次体現在各苏維埃共和国之間的国家关系上，它們于 1922 年联合成为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向全世界提供了不仅保证各民族眞正的政治平等，而且也是消灭从旧制度遺留下来的經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的范例。在一个統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各民族在国家、經济和文化建設上自願的合作，保障了每一个民族的繁荣，并使它們結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大家庭。

与此同时，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同外国記者談話时指出："我們的經驗使我們坚信，只有对各个民族的利益极其关心，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才能消除互不信任，才能消除对某种阴謀的顧虑，才能建立語言不同的人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互相信任；沒有这种信任，无論各族人民之間的和平关系，或者現代文明中一切珍貴事物的比較順利的发展，都是絕对不可能的。"② 正如苏联的經驗所表明的，坚定不移地执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乃是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第 19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75 頁。

② 《列宁全集》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47 頁。

义胜利的必要条件。

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把各国工人阶級在反对資本主义、爭取社会主义的斗爭中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級的团結，正在变为社会主义的团結，它是由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利益和目的的一致所产生的。社会經济制度之屬于同一类型，国家政权的共同的阶級实质，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致願望，大家共同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凡此种种，創造了社会主义国家結成統一的社会政治陣营的客观基础。同时，在当前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进行着斗爭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之結成統一的社会政治陣营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經济体系的发展，乃是社会主义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完全的胜利以及它們向建設共产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①

按其历史意义来說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形成的事件，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它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整个国际形势烙上了一定的痕迹。随着成批的年輕的民族国家出現于世界舞台，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前殖民地和附屬国的联系扩大了，在对待这些国家关系上的社会主义对外政策原則有了愈来愈充分的表現，并且得到愈来愈广泛的采用。

由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作用而加速了的落后和被压迫民族的覚醒以及它們的摆脫帝国主义压迫，是当代的主要特点之一。列宁在談到这一特点时指出，历史进步的整个过程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将沿着什么道路前进。列宁在强調指出它們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深刻的客观存在的矛盾时，曾經預言："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占世界人口多数的人民的运动，最初是为爭取民族的解放，将来一定会轉而反

① 参見本书第八章。

对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許比我們所希望的要大得多。”①

苏維埃国家对为爭取自由而斗爭的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的政策，始終是从这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論点出发，即宗主国中的无产者的运动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可以而且必須結成統一的反帝陣綫。

列宁指出，在爭取社会主义的斗爭中，工人阶級必須实行充分的民主，因此，不但要使各民族完全平等，而且要实現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② 十月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俄国完全脫离資产阶級“文明”的野蛮政策；資产阶級的“文明”是把剝削者的利益建筑在对千百万殖民地附屬国居民的奴役上。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在国內結束了民族压迫和歧視，所以它在同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的对外关系上也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則，从而为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打下了基础。

苏維埃国家同东方各国的关系是建筑在完全平等和尊重民族主权的原則上，它始終致力于巩固同爭取民族独立的国家間的友誼。苏联的对外政策坚决主張支持这一斗爭，反对形形色色的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附屬国的侵略政策。苏維埃国家完全是以“另外一种国际关系，这种关系使一切被压迫民族有可能摆脫帝国主义的压迫”③，来对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暴力政策。

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始終严格遵守不干涉这些国家內政的原則，从不試图将社会主义制度强加于这些国家的人民。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发展的自然的过程，“經济上的需要”終究会——虽然可能不是直接地——把这些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④ 列宁曾經指

① 《列宁全集》第 3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69 頁。
② 参見《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137 頁。
③ 《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33 頁。
④ 参見《列宁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47 頁。

出，从恩格斯的这句話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結論："他把这个絕对国际主义的('絕对国际主义的'字样是作者加的。——譯者)原則运用于一切'異族'，也就是說不仅仅运用于殖民地民族，因为强迫他們接受幸福，就是破坏无产阶級的胜利。"①

作为殖民地和附屬国人民的必然同盟者的苏联，在自己还处于資本主义包圍中的时候，就奠定了同一切摆脫了帝国主义羈絆的国家建立巩固的友好关系的基础。

这些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苏联威力的增长以及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体系，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給予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如果說在过去这种援助主要带有道义和政治的性质，那末現在，它正在成为摆脫了殖民主义枷鎖的国家为爭取經济和政治独立的斗爭中的越来越重要的物质因素。社会主义陣营已成为保护年輕的民族国家免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威胁和政治、經济压力的可靠支柱。这些国家的人民对于克服經济和文化上的落后(这是殖民主义者长期統治的結果)的密切关心，对于为此所必需的和平共处条件的切身需要，提供了巩固它們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合作的客观基础。这种合作是以完全平等和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为基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同資本主义各国的关系借以发展的那些条件根本改变了。由列宁提出的作为社会主义世界与資本主义世界关系的基础的和平共处原則，已經取得了新的意义。

列宁指出，由于資本主义制度下經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和跳跃性，以及由于因此而产生的不同国家必要的主观和客观的革命前提成熟时間的先后不同，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內胜利。因此，列宁还在十月革命以前就論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和

---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7頁。

資本主义国家长期并存的必然性。① 列宁在研究全世界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問題时，就闡述了自己对对立的社会經济制度的国家間关系的发展規律的看法的一个严整体系。

列宁认为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綫。对和平的渴望是社会主义的实质本身决定的。列宁认为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內政，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間的和平的首要政治条件。列宁一再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同資本主义国家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是可能的，同它們发展和平互利的合作是可能的。② 同时列宁指出，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矛盾是对抗性质的。因此，不同制度国家間的关系，是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合作和斗爭的辯证的統一。

不能而有时是不願意理解这种辯证的联系，并且力图使人怀疑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和平方針的反动学者和政論家，硬要在列宁主义中找出什么矛盾。他們认为，和平共处原則同两种体系的斗爭和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論点是不相容的。

几乎在每一部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反动著作中，都引用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的斗爭不可避免的主張，作者都洋洋得意地把这些歪曲为列宁“不相信”可以和平共处的证据。例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教授 A·魯宾斯坦在他关于《苏联对外政策》③ 的一部十分臃肿的著作中，就是断章取义地从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摘出了一些句子。列宁說：“我們不

① 参見《列宁全集》第 21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20—321 頁；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75 頁。

② 参見《列宁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33 頁；第 33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23、347 頁等。

③ *A. Z. Rubinste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1960.

仅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而且生活在許多国家組成的体系里，苏維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議的。其結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結局还沒有到来的时候，苏維埃共和国和資产阶級国家間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①

魯宾斯坦"忘記"提到：列宁这些話是在这样一个时期讲的，当时帝国主义国家拒絕了苏維埃国家一切和平的建議，侵入它境內想扼杀苏維埃政权。列宁所談的只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容忍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是这些国家的武装干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保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必要性。

这样来引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間可能而且必然发生軍事冲突的言論的情况，还可以列举不少。但是其中任何一句都不能证明他否认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的願望。每当列宁談到冲突的可能性时，他是指資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国家的干涉傾向。

列宁不是指的不同制度的国家以一連串冲突的方式共处，像反动的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工业社会与战爭》②一书的作者——所想像的那样。列宁是把敌对阶級的願望、意志和决心同历史的客观过程区别开来。虽然帝国主义具有侵略和掠夺的实质，但客观的发展規律还是使社会主义能够爭取，能够"爭取到"同資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与进行合作(首先是經济方面的合作)③。資本主义国家既然不能消灭社会主义，就不得不同它建立事务联系。

因此，两种体系的相互关系的和平性质，首先决定于社会主义"贏得和平"、迫使帝国主义接受和平共处的能力。这种能力随着

---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8頁。

② *R. Aron.*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aris,1959.

③ 参見《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73頁。

社会主义力量合乎規律的发展而在不断增长着。

社会主义的敌人硬說：由于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观点，便排除了不同制度国家間的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例如，美国B·庫勒斯基教授就在其专門进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針、目的和手段的分析”的专論中写道，列宁主張和平共处似乎純粹是出于一时的考虑。① 他硬說列宁想要“輸出革命”。借口社会主义国家“輸出革命”——这是和平共处的一切敌人慣用的論据。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論駁斥了“輸出革命”的思想。列宁屡次强調，借武力将某种思想体系强加于人是不可能的。列宁在揭露“左派共产党人”在布列斯特談判期間的冒險政策时，針对他們的决議写道：“也許起草人以为，国际革命的利益要求強行推动国际革命，而能强行推动这种革命的，似乎只是战爭，决不是和平，……这类‘理論’是完全違背馬克思主义的，馬克思主义始終否认‘强行推动’革命，因为革命的发展全要看产生革命的阶級矛盾的尖銳程度如何。”②

一国的內部制度純粹是該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是人民在实現一向被馬克思主义者承认的自决权。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实現这些思想的决心，不是用武力来培植的，它們是由于資本主义制度下阶級矛盾的合乎規律的尖銳化和工人阶級所达到的一定程度的組織性和覚悟性，以及由于使群众相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資本主义，而由群众所掌握的。

列宁写道：“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創立的。……生气勃勃的創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創立的。”③ 苏联对外政策基于对客观历史規律的认識，是同任何冒險主义都不相容的。只

---

① *W. Kulski*. Peaceful Coexistence. Chicago, 1959. p. 131—132.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7頁。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9頁。

有完全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理論的人，或者有意歪曲这一理論的政治騙子，才会誣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才会硬說社会主义国家有冒險主义的企图，要用强力，即通过战爭来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共产主义思想。

資产阶級思想家硬說苏联对外政策力图挑起資本主义国家間的冲突和战爭来加速革命的到来，这一点和苏联的对外政策同样是格格不入的。这些思想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間的战爭同革命，远远不是同类的現象。社会主义革命是由資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由資本主义所固有的一切內部矛盾有規律的酝酿、成熟和加深所准备好的。战爭不产生革命，而只能加速革命，使資本主义的矛盾尖銳化，并激起群众对产生战爭災禍的社会制度的憤恨。

列宁写道："如果各个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济发展沒有导致資本主义統治的結束，那是无法結束資本主义的統治的。战爭加速了这个过程，使得資本主义无法继續存在下去。历史不冲垮和摧毀資本主义，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它。"①

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历史发展的客观規律的认識，相信即使不經过战爭，社会主义也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而国际主义的义务要求苏联的劳动人民为防止任何非正义的战爭而进行斗爭，因为大家知道，在战爭中受害的首先是人民群众。这里就表現了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人道主义。

弗·伊·列宁在一个討論会中回答問題时說道："如果我們确实是唆使工人和农民去打仗，那是犯罪的行为。但是，我們的任何一种政策和宣傳决不是为了唆使各国人民去打仗，而是为了結束战爭……。"② 过去和現在都只有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才力图为了

① 《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386 頁。

② 《列宁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27 頁。

自私的目的来挑起軍事冲突。

在列宁心目中，結果社会主义必胜的两种对立社会制度的斗爭，并不是指和平共处的敌人所大肆宣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間的一連串軍事冲突。关于哪一种社会制度更为优越的历史性爭論，他建議通过和平的經济竞賽，即通过两种制度的"比賽"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必然会显示出自己对資本主义的优越性。比較高的經济发展的速度，資本主义經济制度所固有的一切社会災难的消除，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人民福利的不断增长——这就是最終保证社会主义在两种制度的經济"比賽"中获胜，证明其优越性，并使所有国家的人民群众相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資本主义的条件。

列宁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来估价对立的社会經济制度和平共处的前途。他說："我們主要是用我們的經济政策去影响国际革命。……在全世界范圍內斗爭已經轉到这个方面来了。我們一旦解决了这个任务，那我們就是在国际范圍內眞正地最終地取得了胜利。"①

列宁的作为苏联对待資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总路綫之基础的和平共处观点就是如此。这一观点产生于对客观历史規律的深刻认識，产生于列宁所总結的爭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爭的历史經驗。同时，列宁的和平共处观点并不排除这一斗爭的进一步发展，而相反地是以它作为前提的。

对立的社会制度国家的相互关系——这是一个发展着的范疇，它反映着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力量对比。随着历史所决定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进展，保障这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因素更为加强了。

---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7—428頁。

在两种制度共处的初期（当列宁还在世的时候），代表社会主义的只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个继承了革命前俄国落后的經济和技术的国家。当时苏維埃国家經常受到四周資本主义势力武装干涉的威胁。当时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虽足以反击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襲击，但它还不能决定整个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平共处对于苏維埃国家来說，当时首先意味着爭取和平的喘息，意味着沒有战爭，以及同資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和經济关系。

列宁制訂了一些原則，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都予以遵守，那就能保障它們之間的持久和平。苏維埃国家在自己的政策中，一貫遵循这些原則。它不断揭露帝国主义敌視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力量还不足以迫使資本主义国家遵守持久和平的条件。

可是，即使在苏联处于資本主义包圍的时期，由于它努力巩固国际安全，因此对国际事件也起着日益增长的影响。将原先落后的国家改造为发达的工业国的飞快的速度、苏联几个五年計划的順利完成，向全世界表明了社会主义經济制度对資本主义經济制度的优越性，促使世界范圍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1917 年，苏維埃国家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还不足 3 %，而到 1937 年，則已經达到 10%。苏联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比重增长了，它的經济联系扩大了。国际劳动分工的需要，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与資本主义国家間經济联系的发展。至于政治方面，則資本主义国家間的統治阶級甚至在对它們十分重要的問題上，也拒絕同苏联进行比較有效的合作。阶級仇恨常常損害着民族利益而压制了他們理智的声音。但是苏維埃国家为爭取和平和裁軍、爭取集体安全所进行的不懈的斗爭，符合各国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人民心目中的道义和政治威信。这一斗爭推动了广大群众政治覚悟的提高，

使他們有利于和平的行动积极起来。

苏維埃国家的力量同資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反战行动結合在一起，同劳动人民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团結运动結合在一起，已足以保障二十年之久的和平共处，粉碎国际反动派屡次想結成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盟的企图。但是帝国主义及其所固有的規律还是对国际关系发生了占优势的影响，因此就沒有能够制止第二次世界大战。

历史的邏輯导致了苏联同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大国以及同一系列其他的資本主义国家在战爭期間的紧密合作（包括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合作）。反希特勒联盟的形成及其所进行的活动，证实了两种体系的国家进行互利的和全面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卓有成效的，并且还有助于和平共处理論的进一步发展。

战后时期力量对比所发生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使和平共处問題有了新的提法。和平共处原則成为占地球上三分之一以上人口的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基础。这一原則也得到許多年輕的主权国家的支持。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范圍大大縮小了。共处、竞賽和两种体系的斗爭，变成了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而社会主义的內部規律則对国际关系的整个面貌起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資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危險消除了。社会主义的物质力量已經达到这样的規模，以致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孕育着帝国主义国家的致命危險。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这就是为什么从这时起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大大发生了有利于和平共处的变化。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社会主义的爭取和平的新同盟者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情况的发生。許多年輕的民族国家的成立，更加縮小了帝国主义侵略政

策的作用范圍。虽然这些国家在經济上仍然屬于資本主义世界經济体系的范圍，并且在那里执政的是民族資产阶級，但是极其深刻的矛盾使它們同帝国主义国家分道揚鑣。

正如上面已經指出的，帝国主义的政策威胁着年輕的民族国家的主权，而和平和国际合作的政策則符合这些国家的切身利益。因此，掙脫了殖民主义枷鎖的国家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即支持維护和平、尊重国家主权和进行平等互利的合作的政策，是完全合乎規律的。

由此可見，由于历史上合乎規律的殖民体系瓦解的过程，許多从前曾經还是帝国主义后备軍的国家，已变成反对其政策的因素。在国际舞台上两种对立的政治方針之間的斗爭中，这些国家是有利于和平共处的。

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作用范圍之縮小以及和平共处政策作用范圍之扩大不仅是地域上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大多数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削弱了，所謂帝国主义大国的数量減少了。帝国主义的突击力量在战爭过程中的被击潰，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內部阶級力量的配置，发生了不利于壟断資本的統治的影响。随着資本主义进入总危机的第二阶段，帝国主义資产阶級的上层和广大居民阶层之間的社会矛盾也急剧尖銳化。

随着阶級斗爭的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提高了，他們在决定战爭与和平問題上的影响增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經过和教訓，使資本主义各国人民学会了本領去认清和揭露帝国主义資产阶級用以替自己的侵略政策辯护的各种手法。

国际工人运动、資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始終是苏維埃国家在其爭取和平共处的斗爭中的可靠的同盟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一运动达到了很大的規模，共产党的数量急剧增长，它們对

工人阶級以及其他居民阶层的影响增长了。[①] 共产党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的經驗，职工会及其成千成万的会員都在共产党的領导下进行工作，千百万选民投票贊成共产党的民主和爱好和平的綱領。

在战后，产生了一系列捍卫和平的新的民主組織。其中某些組織（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等）吸引了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們参加自己的活动。世界和平运动是当代反对战爭的最广泛的民主运动。使战爭变得特别危險的原子武器的产生，在屬于社会不同阶級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識中引起了眞正的变革。[②]

世界輿論越来越积极地干預战爭与和平問題。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是最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这就保障它所宣布的原則在資本主义世界的群众中得到越来越大的支持。因此社会主义的“思想潜力”极大地增长了，它在决定两种体系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和平力量与战爭力量的斗爭中，在和平力量的威力的增长上，愈来愈感覚到这种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舞台上发生的根本性变动，使和平共处原則在国际关系实踐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現。对和平共处的广泛的国际承认，反映在战爭結束阶段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的几次会議的决議中。[③]

对这一原則的国际承认在联合国宪章中作了法律上的規定。在宪章的序言和第一条及第二条中，联合国会員国有义务“免后世再遭……战禍”，“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以和平方法”解决一切国际爭端，“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間屬于經

① 参見本书第三章。
② 参見本书第二十二章。
③ 参見本书第一章和第四章。

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問題”。在宪章中还規定了联合国各会員国的“主权平等”和“領土完整”，禁止干涉“在本质上屬于任何国家国內管轄之事件”①。

和平共处原則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对外政策方面的声明中得到了反映。某些西欧国家和日本的战后宪法也从立法上規定了放棄战爭。例如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載称：“意大利拒絕参加作为侵犯他国人民自由之工具及作为解决国际爭端之手段的战爭……。”

所有这些資本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对和平共处的必要性的直接或間接的承认，决不是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及其統治阶級的本性改变了。这种承认是他們被迫对时代作出的貢献，它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形势的特点。

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过去和現在都努力謀求資本主义国家不仅放棄使用战爭作为解决爭执問題的手段，而且尊重一切大小国家的領土完整和主权，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双方完全平等和互利的原則。社会主义陣营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日益增长着的經济、政治和国防力量，不断扩大了苏联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发动战爭的可能性。尼·謝·赫魯曉夫强調指出，“我們不是央求这种和平共处，我們是在清醒估計世界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提出这种政策。”②

社会主义在世界經济中所占比重的增长，促进了由国际分工产生的两种对立体系的国家間經济联系发展的傾向。这种像列宁所說的由“經济上的必要性”产生的傾向，不断地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尽管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对社会主义怀有阶級仇恨。資产阶級

① 《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5—37 頁。

② *Н. С. Хрущев.*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60 г., т. 2. М., 1961, стр. 557.

忽視同苏联的經济联系是越来越困难了。苏联在努力扩大同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济联系。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方面的繁荣，以及它們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也促进了不同制度的国家在这方面的联系和合作的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間的經济和文化合作，有助于各国人民的接近。

各国人民的和平願望，社会主义国家为制止新战爭而进行的坚决斗爭，头脑比較清醒的帝国主义国家統治集团的代表对这一战爭給資本主义命运带来的結局所表現出来的恐惧——这一切对于两种制度的国家間在政治方面为保障和平而进行的合作，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这种合作的实际必要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增长了。当科学技术革命导致具有空前破坏力的大規模毀灭性武器的产生时，想用軍事手段解决爭执問題的企图孕育着世界性的災难。只有在两种制度合作的过程中，当前像裁軍这样的直接关系着世界各国人民命运的問題才能得到解决。

苏联正在尽最大的努力，通过不同制度的国家間的合作来防止战爭的发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力量对比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它們之間的阶級斗爭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可能設法使这一斗爭的結局用和平方法解决。

經济領域是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之間竞爭的主要場所。在战后时期，不仅苏联，而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自己的經济发展方面，在生产为劳动人民謀福利的物质財富方面，显示了社会主义对資本主义的优势。社会主义国家經济合作的新形式的产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优越。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的經济竞賽的新的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这种竞賽現在是以两种世界体系竞賽的形式进行。

在国际舞台上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在政治領域的斗爭出現了新的特点。和平共处的社会主义原則正在从帝国主义政策夺取一个又一个的陣地。严格地不干涉他国內政，是持久的和平共处的政治基础。在两种制度之間新的力量对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有可能反击帝国主义国家对其本国內政进行干涉的一切企图，并且还愈来愈成功地反对它們为了輸出反革命，特别是为了保持腐朽透頂的殖民制度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內政的干涉。

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資本主义思想体系之間的斗爭越来越激烈了。由于全世界愈益广大的人民群众政治积极性的增长，这一斗爭取得了新的意义。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开展了爭夺人心的殊死斗爭。但是他們想使人民群众做資产阶級思想体系的俘虜的一切尝試，都将肯定遭到破产。明显地表現出来的社会主义經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优越性，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各資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力量对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宣傳手法的揭露，在这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与不同制度国家間政治和經济方面的具体問題不同，在这种思想斗爭中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妥协。

在和平共处的过程中，即在两种制度的合作与斗爭的辯证結合的过程中，苏維埃国家始終坚决地力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上的一切問題，都根据維护和平的利益加以解决。苏联共产党的綱領中强調指出："苏联过去始終不渝地坚持了、今后仍将坚持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① 这一政治方針符合于全人类的利益，符合于社会进步的利益，从而也促进着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进一步发展。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12 頁。

第 六 章

中欧和东南欧国家革命的胜利以及这些国家在国际关系上的新作用

一、中欧和东南欧人民民主国家的产生以及它們对外政策主要原則的形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以及在战爭剛一結束后，立即展开了人民民主革命，其結果是在中欧和东南欧的一些国家中，产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而这种革命对1945—1949年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国家的革命的胜利，一方面是其內部发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法西斯国家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而造成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其領土面积占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居民有九千万以上）是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的一环。

这些国家（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大部分都起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农业原料供应者的作用。外国資本占据着它們国民經济中的主要陣地。对于其中的許多国家来說，它們的特点是封建主义的殘余在农业中比較显著。劳动人民同时身受"本国的"和外国的地主和資产阶級的压迫。在一些国家中（在罗馬尼亚、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存在着亲法西斯的政权，它使这些国家中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銳化。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某些国家里，由于排挤少数民族而使社会压迫更为加深。无产阶級和农民进行的阶級斗爭，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斗爭交織在一起。

由此可見，中欧和东南欧各国都面临着社会革命的客观必要

性，这一革命既要解决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个别任务，也要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帝国主义者把中欧和东南欧各国当作反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跳板和工具并加以利用。这些国家的資产阶級地主政府奉行着迎合外国帝国主义的方針，从而使本国的民族利益受到巨大損害。

在战爭的初期，希特勒分子占領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意大利軍队兼并了阿尔巴尼亚。占領者对被奴役的人民、特别是斯拉夫民族，执行着种族仇恨政策，力图将他們变成自己的奴隶。希特勒分子洗劫了这些国家，毁坏了他們民族的財富。

在匈牙利、罗馬尼亚和保加利亚，情况略有不同。它們的統治集团急忙同希特勒德国进行勾結。这些国家形式上算是盟国，而事实上是德国法西斯的附庸。因此，这些国家的情形与希特勒分子所占領的国家的情况多少有些不同。实际上匈牙利、罗馬尼亚和保加利亚也丧失了独立，遭受到劫掠。

因此，中欧和东南欧各国国內的社会矛盾，同德国法西斯主义与受其奴役的各国人民間新产生的极其尖銳的矛盾紧密地交織在一起。这些国家的命运、其国內阶級力量的配置，便直接取决于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斗爭的进程和結局。

在这些国家的資产阶級和地主中，在战爭期間出現了两种傾向。在一些国家中，統治集团的主要部分公开指靠同占領者的合作，直接出卖本国人民的利益（如罗馬尼亚、匈牙利）。在另一些国家中（例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統治集团的主要部分反对占領者，但他們害怕本国人民更甚于害怕占領者，力图限制人民群众反法西斯斗爭的規模。这些集团指望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认为这一胜利能保证它們在法西斯集团失敗及其本国摆脫希特勒的压迫后仍然保持它們的阶級地位。上述两种傾向之

間的力量对比，在不同国家以及战爭的不同阶段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整个說来，統治阶級在战爭过程中都表現出自己无力維护民族利益。

工人阶級是中欧和东南欧的民族解放斗爭中的領导者和最积极的力量。正是它領导着建立爭取自由和独立的民族陣綫的事业。广大的劳动居民阶层，而首先是农民，都团結在工人阶級的周圍。在一些国家中，一部分民族資产阶級向他們靠攏。

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最彻底、最积极和最坚定的战士是共产主义者。这一点就决定了他們在民族解放斗爭过程中威信迅速增长，保证了劳动人民最广大的阶层团結在他們的周圍。

工人阶級和共产党的領导力量，不能不对民族解放斗爭的性质本身及其社会意义发生影响。基于对苏联参战以后的具体形势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所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共产党人号召人民群众开展最坚决的武装斗爭来反对希特勒占領者及其走狗，号召他們无条件地支持反希特勒联盟及其主导力量苏联。①

民族解放运动的过程和結果不只取决于某一国家中的阶級力量对比。这一运动是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反希特勒联盟的总斗爭的一部分。在工人阶級領导之下的被占領各国的民族解放斗爭，也对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起了一定的影响。随着事件的发展，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愈来愈坚决地走上了反对本国剝削阶級的道路，因为这些人的政策导致了希特勒的占領，并且他們时常是占領者的直接帮凶。

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民族解放斗爭的社会內容和工人阶級的

① 关于中欧和东南欧的民族解放斗爭和人民民主革命的詳細情况，可参閱苏联历史学家的专著，特别是：《История Польши》, т. III. M., 1958; 《История Болгарии》, т. II. M., 1955;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т. III. M., 1960。

領导作用，使西方国家的統治集团——反希特勒联盟的参加者惊慌起来。早在战爭期間，他們就力图使这一斗爭局限于一个地方，限制其范圍、規模和目的。在英美的統治集团中积极制訂了有关这些国家的战后制度的計划，打算在这些国家恢复战前所存在的反动政体。

这些計划的起草人指望苏联和东南欧各国都将因为战爭而被削弱。他們的出发点是要由美国和英国来提出和平条件。此外还考虑到这些地区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① 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打算在东欧建立对付苏联的新"防疫綫"，变东欧国家为美国和英国的壟断組織的剝削对象。

为了实現自己的战后帝国主义計划，美国和英国政府在战爭过程中就支持了东欧各国的反动的政治流亡者，这一批人指望借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扶助来恢复自己的統治并对付本国的革命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在战爭中的作用、它在国际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对中欧和东南欧各国人民的命运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苏联把被占領各国人民群众爭取自身解放的斗爭，看做是对反希特勒联盟的共同事业的貢献，因此苏联既通过在它境內組成并武装各国自己的軍队的办法，又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游击运动給予直接援助的办法，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一斗爭。

---

① 在1944年出版的П. 乔丹所写的《中欧联盟》一书中直言不諱地說道："根据希特勒的經驗而重新考虑的征服世界的公式是这样的：掌握中部地区，避免普遍战爭，扎实地在那里呆下去，不惊动可能的敌人，然后当我們准备停当时便开始进攻"（*P. Jordan.* Central Union of Europe. New York, 1944, p. 35）。关于这些地区的战略意义，在美国和英国战后的出版物中都有所透露。例如，《英国議会中的波兰》一书的編者在該书的序言中談到东欧地区时写道："这一地区对于未来的人类来說，要比直布罗陀、苏伊士或亚丁重要百倍"（«Poland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 1939—1945», New York, 1946, p. XI）。

在国际舞台上，苏联政府始終不渝地維护东欧各国的民族利益、主权和独立，使其不受西方国家的侵害。它一再坚决地宣称，在欧洲各国人民战后解决自己的命运时，不允許从旁干涉或从外部施加压力。

1944年7月，波兰开始得到解放，同年8月，罗馬尼亚退出了战爭，9月間保加利亚也退出战爭，10月間，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开始解放，11月間，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获得解放。波兰軍队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軍队，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軍，而稍后还有保加利亚和罗馬尼亚的軍队，都积极参加了苏軍展开的进攻性的作战行动。

苏軍的胜利对于中欧和东南欧的民族解放斗爭，对于将这一斗爭变成人民民主革命以及使人民民主制度获胜，对于进行深刻的社会經济和政治的改造，創造了极其有利的外部条件。

例如格·米·季米特洛夫在評价苏軍进入保加利亚的意义时說道："在9月9日起义的胜利方面，在把我們祖国从德国法西斯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的事业上，英勇的兄弟般的苏軍有着偉大的功績。"①

1945年以后，在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完成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新的国家机器的工作，进行了革命的土地改革，取消了主要生产資料的資本主义所有制，恢复了遭到战爭破坏的国民經济。反映着由人民民主革命轉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措施，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实行的：即工人阶級的团結，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領导力量的加强，工人阶級同农民基本群众及其他劳动人民阶层的联盟的巩固，以及某种形式的无产阶級专政的建立。到四十年代末，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开始了有計划的社会主义經济

① *Г. Димитр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II. М., 1957, стр. 611.

建設。

在中欧和东南欧各国国内生活上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化的同时，在它們的对外政策上以及它們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上，也发生了革命的变化。在这方面的决定性的轉折，是由中欧和东南欧一系列国家之走上人民民主的道路所决定的。

在某些情况下，在不同的阶級力量的斗爭中，正是对外政策因素被提到首位，对事件的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早在战爭的年代里，这些国家的爱国民主力量就猛烈譴責了从前的完全遭到破产的剝削阶級的对外政策方針。在民族解放斗爭的过程中，共产党和工人党所領导的进步的爱国力量就提出了必須有符合本国人民的根本民族利益的新的对外政策的問題，并为制訂这种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則打下了基础。

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人民政权机关的綱領性文件，在民族解放斗爭和人民民主革命中賦予对外政策問題以重要地位。

例如在波兰，早在1943年3月波兰工人党《我們为什么而斗爭》的声明中，就提出了"同欧洲一切国家建立睦邻和同盟关系，奉行基于同苏联結成联盟的对外政策"①的要求，作为眞正自由和独立的波兰的条件之一。在1944年7月22日公布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員会，即波兰第一个人民民主政府的宣言中說道："与我国的紧邻——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結成巩固的联盟，将是波兰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則……"此外，在宣言中表示了同英美加深友誼和巩固联盟的信念，并且希望"同复兴了的法国保持傳統的友誼和同盟，同时也希望同世界上一切民主国家进行合作"。宣言认为："波兰的对外政策，将是基于集体安全原則的民主的政策。"②

---

① «Kształtowanie się podstaw programowych Polskiej Partii Robotniczej w latach 1942—1945». Warszawa, 1958, str. 94.

② 同上书第505頁。

同苏联結盟和合作的方針不仅产生于人民民主国家的性质本身。它是决定于巩固和平和安全的利益，决定于巩固年輕的人民民主国家在国际舞台的地位这一任务，而这项任务只有在苏联的援助之下才能得到解决。

由此可見，早在战爭結束以前，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革命力量便力爭使本国的对外政策发生根本轉变，而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友好合作，是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則。这种轉变是內外因素相互影响的結果，它是民族解放斗爭本身的邏輯所决定的。由于同样的邏輯，产生了同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国家的合作，这种情况在共产党和工人党以及人民民主政权的綱領性文件中都有所反映。如果說这种方針沒有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政策上得到很大的发展，那末責任决不在于經常从和平共处的原則来发展同資本主义国家进行交往的人民民主国家，而在于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它們在战爭結束以后走上了"甩掉"共产主义以及对中欧和东南欧国家采取敌視政策的道路。

苏共綱領在說明这些国家中所发生的种种过程及其結果时指出，"产生了社会政治組織的新形式——人民民主，它是无产阶級专政的一种形式。"①

随着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級斗爭过程中的深化（其中也包括对外政策的具体問題），同时也在国际形势上所发生的进展的影响下，作为社会主义政策的各人民民主国家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則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在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关系上，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是国家政策的基础，而在对資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上，則是以和平共处原則作为这一政策的基础。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7 頁。

二、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同苏联的政治經济合作。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形成和巩固

各人民民主国家是把自己的对外政策实踐建立在同苏联的友好和合作上面。这一点既决定于人民民主革命的性质，以及苏联在这一革命取得胜利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决定于要巩固年輕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地位这一具体任务。

在各人民民主国家面前，从它們一誕生的时候起，就必須保障有利的对外政策方面的条件来巩固和发展新的社会制度，保护革命的成果，使其不受国內外敌人的侵害。保加利亚、罗馬尼亚和匈牙利需要签訂正义的和約。

这些任务之所以复杂和迫切，是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展开了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激烈斗爭，采取了要在中欧和东南欧国家复辟資本主义制度的方針。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存在本身及其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苏联政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爭取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所进行的斗爭，对于各人民民主国家沿着社会进步的道路发展，对于巩固它們的国內和国际地位，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苏联认为对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各方面的援助和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是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苏联的政策为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間广泛和全面的合作創造了前提。苏联在战爭期間以及在战后的头几年，都对中欧和东南欧各国人民进行了巨大的政治上和經济上的援助。还在战爭期間，在苏联同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中所产生的一切实际問題，就是根据友好合作的精神解决的，这一点在許多协定和条約中都有所反映。

1944 年春，当苏軍即将进抵同捷克斯洛伐克的接壤的国界时，在倫敦

签訂了《关于苏軍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以后苏联部队总司令同捷克斯洛伐克行政当局之間的关系的协定》。①协定充滿着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和主权的精神。并且后来苏联政府也是始終不渝地根据尊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主权和独立的精神行事的。完全根据民主原則并考虑到双方国家的相互利益来解决外喀尔巴阡山烏克兰問題，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1945年6月29日的苏捷条約，外喀尔巴阡山烏克兰同自己历来的祖国——烏克兰重新联合起来了，并且加入了烏克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②1946年7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同苏联签訂了关于选擇国籍和移居的权利的协定。

由于苏軍之开始解放波兰，在苏联政府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員会之間于1944年7月26日签訂了《关于自苏联部队进入波兰領土之后苏联部队总司令与波兰行政当局之間的关系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波兰民族解放委員会完全掌管被解放区（直接作战地区除外）的一切屬于民事管理的事务。③波兰民族解放委員会为爭取巩固人民波兰的国內和国际地位的斗爭，始終得到苏联政府的政治支持，特别是在它同倫敦流亡政府的代表举行談判的过程中。苏联政府首先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員会为波兰共和国的临时政府，在雅尔塔会議和波茨坦会議期間捍卫波兰的民族利益。

1944年9月，在波兰与同它接壤的苏維埃共和国之間签訂了关于从波兰境內撤走烏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居民，以及从烏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撤走波兰居民的协定。1945年8月16日，签訂了苏波关于疆界的条約。根据这項条約，白俄罗斯和烏克兰的土地都分别归入白俄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烏克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版图，而波兰的土地归入波兰的版图。

1944年9月，苏联統帅部为了在匈牙利展开反对德国法西斯軍队的战

---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I, стр. 123—125。

②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II, стр. 309—310。

③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I, стр. 157—159。

斗行动，請求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員会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統帅部同意苏軍暫时进入与匈牙利接壤的南斯拉夫領土。并且苏联統帅部表示，苏軍一俟完成战斗任务，即撤离南斯拉夫。双方同意，在南斯拉夫境內苏軍部队駐扎的区域，将由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委員会的民事行政当局行使职权。①在1944年9月下旬在莫斯科举行了南斯拉夫領导人同苏联政府領导人的談判之后，苏联对南斯拉夫国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加强，对于南斯拉夫的人民民主力量来說，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应南斯拉夫統帅部的請求，交給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两个航空师、两个坦克旅和一些野战医院。②

早在战爭期間签訂的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的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約中，就反映了苏联同这些国家之間的新关系。③在这些条約中首先談到的是在战爭中反对希特勒德国的联盟。但是那些涉及苏联同这些国家的战后关系的条文，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条約規定，在德国或其他直接或間接与德国在执行侵略政策方面相勾結的一切国家重新进行侵略时，必須彼此予以軍事及其他一切援助。一些专門的条款規定了战后合作的原則。

在苏捷条約中載称："締約双方鉴于各自安全的利益，同意在和平恢复后的时期保持密切和友誼的合作，并同意双方应遵守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及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双方同意于战后在最大可能的范圍內发展双方的經济关系，并尽一切可能进行相互之間的經济援助。"④

---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I, стр. 236。

② 《Советские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в борьбе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Югославии». М., 1960, стр. 49—50.

③ 同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約是1943年12月12日签訂的；同南斯拉夫是1945年4月11日；同波兰是1945年4月21日。

④ 《国际条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413頁。

苏波条約第二条載称："締約国双方深信为了波兰和苏联人民的安全和繁荣，在战爭期間和战后必須保持和加强一个牢固和永久的友誼，締約双方将按照相互尊重它們的独立、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內政的原則，加强两国間的友好合作。"①

上述条約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它們证明了苏联人民和这些国家人民之間的关系上的根本轉变。它們是进一步发展締約国之間全面的友好和合作的基础。面对着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政策，同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波兰締結条約，就大大巩固了它們的国际地位。英国和美国的統治集团千方百計地設法推迟这些条約的締約，力图阻碍它們的签署。②

苏联对阿尔巴尼亚也执行着友好的政策。苏联是第一批(1945年11月10日)同阿尔巴尼亚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对于人民民主国家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地位的巩固有着重大的意义。1947年7月在莫斯科举行苏阿談判时，苏联政府同意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經济援助和其他的援助。

战后头几年，苏联在发展同保加利亚、罗馬尼亚和匈牙利的政治关系上，采取了稍有不同的形式，因为在战爭期間，这些国家的資产阶級政府充当了希特勒德国的盟国。实际上，当这些国家推翻了从前的亲法西斯的政权并走上人民民主的道路以后，苏联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以苏联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反希特勒联盟的参加国)的关系上所遵循的原則作为基础。

苏联在战胜希特勒德国方面所起的举足輕重的作用，决定了同德国前盟国締結的停战协定及和約的民主性质。这一点在同这些国家締結的停战协定和和約的正义条款中得到了具体的反映。

---

① 《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24—25頁。

② 参見《Советско-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М., 1960.

1944年9月12日，在莫斯科同罗馬尼亚签訂了停战协定，同保加利亚的停战协定签訂于同年10月28日，同匈牙利签訂于1945年1月20日；1947年2月10日在巴黎同这些国家签訂了和約。

1945年8月，苏联政府鉴于罗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积极参加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爭以及罗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民对击潰德国所作的貢献，幷考虑到罗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忠实执行根据停战协定所承担的义务，决定同它們恢复外交关系。1945年9月25日，苏联同匈牙利之間恢复了外交关系。

苏联同这些国家之間以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作为基础的新的关系，从法律上規定幷載明于1948年签訂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約中。①

所有这些条約的內容几乎都是一样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規定締約国双方在德国或其他直接或間接与德国在执行侵略政策上相勾結的一切国家重新进行侵略的威胁时，必須采取联合行动。第三条規定締約国不得参加敌对的联盟。第四条規定就涉及双方利益的一切重要的国际問題进行协商。最后，第五条規定进行广泛的合作，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締約国双方的經济和文化联系，幷規定要遵循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內政的原則。

这些条約以及原先签訂的苏波和苏捷条約，与帝国主义的条約和协定有着根本的不同。它們都是防御性质的，都具有双方完全平等的特点。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新的友好关系的建立，促进了各人民民主国家間关系的改善，促进了过去遺留下来的爭执問題的順利解决。1945—1949年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一系列条約，而首先是友好合作互助条約的签訂，就是这些国家間的友好和合

① 1948年2月4日同罗馬尼亚签訂了这种条約，同匈牙利签訂于1948年2月18日，同保加利亚签訂于1948年3月18日。

作得到发展和巩固的证明。①

苏联和中欧及东南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大家庭，即社会主义陣营的巩固，使得它們同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联系得到显著的扩大。随着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彼此間的条約的締結，后来締結了一系列同亚洲年輕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条約和协定。② 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条約，在这些条約的范圍內，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开展着政治上、經济上和文化上的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双边联系的发展和巩固，已經在这一时期导致了多边联系的建立和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体行动。③ 这方面初步的一些措施就是：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在1946年巴黎和会和1948年多瑙河会議上的一致立場，以及1948年就德国問題召开的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罗馬尼亚和匈牙利的华沙外长会議。

1947年9月底召开的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波兰、罗馬尼亚、苏联、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的情报会議，在反帝陣营的团結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与会者討論了国际局势問題以及交換經驗和各党配合行动的問題。它們对

---

① 1947年3月10日签訂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約，1947年12月16日签訂了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条約，1948年1月16日签訂了保加利亚和罗馬尼亚的条約，1948年1月24日签訂了匈牙利和罗馬尼亚的条約，1948年4月23日签訂了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条約，1948年5月29日签訂了波兰和保加利亚的条約，1948年6月18日签訂了匈牙利和波兰的条約，1948年7月16日签訂了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条約，1948年7月21日签訂了罗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条約，1949年1月26日签訂了波兰和罗馬尼亚的条約，1949年4月14日签訂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条約。

② 参見本书第七章。

③ 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間的这种政治合作形式是在稍后一些时候才得到特别广泛的发展。

国际形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任务完全取得了一致的观点。在会議所通过的宣言中强調了反帝民主陣营团結起来的必要性。鉴于出席会議的各党之間由于缺乏接触而产生的不良現象，并考虑到相互交流經驗的必要性，会議决定成立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

在一定的阶段上，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革命的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史上，在基于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力量的团結上，在爭取持久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爭上，起了它的积极作用。情报局会議的决議促进了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之間的全面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加强。

至于南斯拉夫，則在 1948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間的关系恶化了。1948年，情报局会議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議，决議中对南斯拉夫共产党領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錯誤进行了公正的批評。这一决議基本上是正确的，并且是符合革命运动的利益的。尼·謝·赫魯曉夫曾經指出："后来，在 1949—1953 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党之間发生了冲突，当时在斗爭过程中犯了錯誤，发生了隔閡，因此給我們的共同事业带来了損失。"①

1955 年，苏联共产党表現了主动精神来消除这一冲突，力爭在国家方面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在党的方面建立联系和合作。尽管对一些政治和思想問題的理解有所不同，苏联在它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上还是竭尽一切努力来发展和加强同南斯拉夫的合作，从而帮助南斯拉夫人民在社会主义的陣地上巩固起来。

在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的政治关系得到发展和巩固并加以明文規定的同时，它們之間的新的經济关系也得到巩固并以明文規定下来。

① *Н. С. Хрущев.* К победе в мирном соревновании с капитализмом, стр. 345.

在战爭的最后几年以及在战后的头几年，当年輕的人民民主国家遭遇到严重的經济困难时，苏联給它們提供的巨大的无私的經济援助，对于巩固中欧和东南欧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对于順利发展这些国家同苏联之間的友好和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剝削者的統治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宰割而造成的大多数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經济上的极端落后，是它們进步发展道路上的絆脚石，使人民民主国家难于解决它們在經济方面所面临的新任务。除此之外，大多数欧洲人民民主国家都受着十分严重（比西欧各国要严重得多）的战爭創伤。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先淪为战場的波兰，在战爭年代里損失了22%的居民，損失了国家总財富的38%。其他的欧洲人民民主国家在战爭时期所遭到的破坏和損失也同样是慘重的。这些損失在經济任务的解决方面又造成了新的困难。战后头几年許多欧洲人民民主国家所遭到的天災，即干旱和歉收，也加深了它們的处境的困难。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的政策加深了这一切客观上的困难，它們因为不甘心这些国家脫离資本主义体系，便竭力恶化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处境，使它們国民經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到阻碍。

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东南欧的国家在它們的領土开始得到解放的同时，便从苏联得到了經济援助。苏联首先提供的是粮食和医药方面的援助，受到饥餓威胁的解放区的居民对此有着迫切的需要。随后苏联便开始向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工业原料、从而保障它們工业企业的工作，拯救劳动群众免于失业。应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的請求而派往該处的苏联专家——工程师、农学家、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在这些国家形成新的社会制度的初期阶段，也有着重大的作用。苏联向各人民民主国家提供了大笔的財政援助，根据最优惠的条件給以各种貸款。

1944年10月，苏联和波兰之間签訂了一項貿易条約，根据这一协定，苏

联向波兰提供粮食、食品、煤、石油、石油制品、棉花及其它各种工业原料和許多工业品。

波兰在恢复交通邮电、恢复发电站和工业企业方面，得到了苏联的巨大的援助。1945年7月7日，締結了苏波貿易条約。条約确定了两国之間友好合作的經济关系的基本原則，規定了最惠国待遇的原則。

在这一时期苏波經济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标志，是一系列协定的签訂。1946年5月，1947年2月以及1948年1月，都签訂了关于苏波經济关系問題的长期协定。

1945—1949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济关系的特点，也是順利地发展了广泛的合作。从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一开始解放的时候起，苏联便給兄弟的人民以无私的援助。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同苏联政府領导人于1946年7月和1947年7月举行的談判，对于苏捷經济合作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团訪問莫斯科的苏捷公报中(1947年7月)指出：双方一致认为必須"扩大两个盟国之間的經济关系，以保障两国間长期不断的商品交換，来保证两国經济計划的彻底执行和劳动力的充分利用。"①

1947年12月11日，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之間签訂了貿易航海条約。該条約規定一切有关两国相互經济关系的問題均采用最惠国待遇，并規定了苏捷經济关系的具体条款。同时签訂了第一个长期的貿易协定(1948—1952年)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苏联同匈牙利、罗馬尼亚和保加利亚之間的經济关系也得到了順利的发展。停战协定以及后来的和約都沒有阻碍互利的經济关系的順利发展。人民民主政府忠实地履行了自己根据和約所承担的义务。苏联根据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对这些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了重大的經济援助。

1945年，苏联同匈牙利之間签訂了經济合作协定。早在1948年，苏联同匈牙利之間的貿易額就比1938年的水平提高了十九倍。

同罗馬尼亚也签訂了类似的协定。根据这項协定，苏联运往罗馬尼亚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7 год», ч. 2. М.,1952, стр. 17.

大量的机器和原料以供給罗馬尼亚的工业。同时在作为德国的賠偿而轉交給苏联的德国資产的基础上，根据对等原則成立了苏罗合营公司，其任务是促进罗馬尼亚国民經济的恢复和发展。

还在战爭結束以前，苏联就开始向保加利亚提供粮食、工业原料和燃料。在1945年，就是在苏联正式承认保加利亚以前，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保加利亚之間，就签訂了第一个貿易协定。根据这項协定，苏联向保加利亚提供十二万吨石油制品、一万一千吨棉花、七万三千吨金屬和金屬制品，还有一系列其它的商品。早在1945年，保加利亚进口的79.6%和出口的94.3%都是同苏联进行的。1946年，苏联向保加利亚輸出的商品增加了一倍多。

1947—1948年，苏联同罗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訂了貿易航海条約，根据这些条約，締約国双方在两国之間的貿易和航海問題上以及有关在它們境內进行的工业和其它的經济活动方面，彼此予以最惠国待遇。每年都签訂了一些关于貿易和支付的协定。苏联政府一再采取措施，以减輕罗馬尼亚和匈牙利的賠偿义务。

苏联的經济援助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业已开始的經济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遭到战爭破坏的国民經济的順利恢复和发展，也促使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人民民主国家的封鎖和歧視政策的破产。所有这些国家都得以拒絕"馬歇尔計划"的奴役条件，得以捍卫自己的經济独立，使其免受外国資本的侵害，并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本国的經济，首先是发展現代的工业——整个国民經济的基础。

随着社会主义的超出一国范圍和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形成，产生了新的极其重要的加速社会主义經济发展的可能性。还在1945—1949年間，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經济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并着手执行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設計划。到1949年，已有条件組織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間更广泛的經济合作。这一問題在1949年1月于莫斯科召开的，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波

兰、罗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参加的經济会議上，进行了討論。会議认为，为了实現各人民民主国家同苏联之間更广泛的經济合作，必須成立由与会各国代表組成的經济互助委員会，委員会以平等代表权作为基础，其宗旨是交流經济方面的經驗，相互提供技术援助，相互提供原料、粮食、机器、設备等等。稍后，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参加了經济互助委員会。

經济互助委員会在国际經济合作方面完全是一种新的事物。委員会的全体参加国都有絕对平等的权利，共同的目的把它們大家联合在一起。委員会的决議只有在有关国家即决議所涉及的某一国家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具有拘束力。因此就不可能发生强迫某一国家接受与其利益相抵触的决議的情况，并保证能够充分考虑該組織全体参加国的利益。

苏联对每一参加国的政治和經济援助，为社会主义国家間全面合作关系的形成、扩大和加深的过程打下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人民民主国家自己的作用逐漸增长了，它們之間的双边联系的体系形成了，多边的联系也得到发展和巩固，不断出現了这种联系的新形式。相互的援助和社会主义陣营所有国家的积极参加經济合作，开始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种合作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陣营范圍內具有有計划的性质，世界社会主义經济体系开始形成。

在这些年代里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間的新的友好关系，促进了許多爭执問題的解决，包括資本主义旧世界遺留下来的最尖銳、最复杂的問題之一，即边界問題的解决。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許多国家取得胜利，边界問題具有了另外一种性质，它不再像資本主义制度下那样尖銳了。早在 1945 年，西烏克兰、西白俄罗斯、外喀尔巴阡山烏克兰問題，过去产生冲突和矛盾的特兰西瓦尼亚和帖申省的問題都用和平方式，照顾到一切有关国家的利益和巩固欧

洲的和平和安全的目的而加以解决了。在解决領土問題，解决一切边界爭端时，清楚地显示了劳动人民政权的优越性，证实了列宁的这一著名論断："这些英国和法国的資本家先生們以为是他們在决定边界，但是謝天謝地，除了他們之外，还有别人在决定边界，那就是工人和农民已經学会自己确定边界。"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件的整个进程，特别是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合作，鮮明地显示出偉大的社会主义的联合力量，社会主义不仅能摆脫剝削，而且能摆脫民族压迫，能結束民族仇視。

民族糾紛和民族仇視的消除、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际和国內地位的大大巩固、国民經济的順利恢复和发展——这就是1945—1949年苏联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发展政治經济合作的最概括的总結。但是，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的政治經济关系的这一初期阶段的最重要的总結，却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在建設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每一国家的国內政治地位越来越巩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形成社会主义大家庭及其威力日益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許多国家的革命取得胜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就从易北河一直延伸到太平洋的广大地区。这一切大大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为它們之間的全面合作和团結的进一步发展創造了前提。

三、欧洲人民民主国家为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內政、为爭取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爭

各人民民主国家从它們成立的时候起，便努力发展同一切国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頁。

家的平等友好关系，不論其社会政治制度如何。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积极参加了成立联合国的工作和联合国的活动，并且积极参加战后和平安排問題的解决。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馬尼亚忠实履行和約条款，也說明了这一点。但是人民民主国家要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的願望，遇到了美英帝国主义者的敌視。

它們为了要在人民民主国家复辟資本主义和反动的政治制度，为了要使这些国家变成反苏的桥头堡而进行的勾当，乃是战后帝国主义"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的一个組成部分。①

美国和英国对欧洲各年輕的人民民主国家推行的政策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公开支持国內的反动力量，并进而直接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駐中欧和东南欧各国的英美代表在物质上和政治上支持反对人民民主政府的反动势力。② 特别是，它們企图利用1945—1947年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举行的立法机关的选举，来扶植各种决心为英美帝国主义者的利益效劳的反动分子上台。同时，无視本国人民的利益并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反动派，也专門指靠外国的干涉，指靠美国和英国的援助。

例如季米特洛夫在描繪保加利亚"反对派"的特点时說道："我国的反对派并不是独立的。他們是根据外国的指示行事，他們是按他人的指使而从事自己的政治勾当。"③生活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尼·彼得科夫——保加利亚反对派的首脑之一，对自己的同謀者直言不諱地說："我国的战略地位……每日每时都吸引着外国人的注意，他們要通过压力来实現国內的变化，并且不会允許現政府操纵我国局势。"④

① 参見本书第十四章。

② 特别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美国文件《The Conference of Berlin. 1945》, vol. I, Washington,1960, p. 201, 839; vol. II, p. 231, 647—648, 694, 718, 734。

③ 《Работническо дело》, I. X. 1946.

④ 引自《История Болгарии》, т. II, стр. 403。

1945年7月26日，彼得科夫向保加利亚政府、同时也向盟国管制委員会以及英美代表团要求推迟原定1945年8月举行的保加利亚国民議会的选举，并要求将来选举在盟国监督下进行。尽管保加利亚政府拒絕了这項要求，彼得科夫也辞去了部长职务，但美国和英国政府还是利用了彼得科夫的要求来干涉保加利亚的內政。

8月13日，美国駐保加利亚的代表巴恩斯向保加利亚政府提交了一項照会，照会中美国政府对即将举行的选举的組織工作表示不滿，并坚持推迟这次选举。英国政府也采用了类似的行徑。8月21日和8月24日，美国和英国又先后提出了新的正式声明，声明以不承认新的保加利亚政府和不签訂和約相威胁。

保加利亚政府通过了将选举推迟到1945年11月18日举行的决議，从而表明——如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党)的特别声明中所說——它把人民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不願意造成哪怕是一点点口实来妨碍保加利亚和三大盟国之間的正常关系的建立。①

但是帝国主义者并不因此罢休，它們继續攻击人民民主的保加利亚。在1945年9月举行的倫敦外长会議上，貝文和貝尔納斯又提出了保加利亚的选举問題。他們力图对选举进行国际监督，并毫无根据地断言：在保加利亚不存在民主的代議制政府。在1945年11月16日美国政府的照会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譴責，照会并宣布不恢复同保加利亚的外交关系。

保加利亚政府坚决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保加利亚人民的自主权利的侵犯。季米特洛夫在同外国新聞工作者談話时讲道："美国人和英国人說他們不承认这些选举，他們可以有一段时候不承认我們。但他們不会从这里占到便宜，因为我国人民决不会向国內外的反动派低头。"②

11月18日，保加利亚人民表示出自己对祖国陣綫和保加利亚工人党的政府的支持。参加选举的居民有85.6%，其中投票贊成祖国陣綫的候选人者达88.18%。

保加利亚祖国陣綫政府的正义立場，得到了苏联的支持，苏联始終不

① 参見《Работническо дело》, 5. IX. 1945。

② *Г. Димитро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т. II, стр. 85—86.

渝地維护人民保加利亚的利益。1945年8月14日，苏联政府宣布同保加利亚恢复外交关系，同时强調指出了保加利亚对击溃希特勒德国所作的貢献，指出保加利亚忠实履行了它根据停战协定所承担的义务。

苏联参加为进行战后安排而成立的盟国之間的机构，以及参加各次会議，使它們难以被用来損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利益。

例如，由于駐盟国管制委員会的苏联代表所采取的立場，在保加利亚筹备1946年10月27日大国民議会选举期間，西方国家想再次干涉保加利亚內政的企图就遭到了反击。1946年10月1日，美国駐盟国管制委員会代表罗伯逊将軍根据美国国务卿貝尔納斯的指示，向苏联駐該委員会代表要求召开盟国管制委員会的特别会議，以討論保证在保加利亚进行如他所說的"自由选举"的措施。①苏联駐盟国管制委員会的代表拒絕了美方的要求，认为盟国管制委員会討論罗伯逊所提出的問題，或者进而在这方面采取某种措施，既是破坏保加利亚政府的特权，又是粗暴干涉保加利亚的內政。西方国家駐罗馬尼亚和匈牙利的代表也同样采取了支持反动分子的立場。

美国和英国政府一再企图直接干涉內政来維护其走狗的利益。这流人物是过去作为希特勒德国盟国的国家以及参加反希特勒联盟、走上了人民民主的发展道路的国家中的反动派和卖国賊。

美国和英国政府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它們在波兰的走狗米柯拉契克在即将举行的立法議会选举中的地位，并中伤民主党派联盟中各党派的活动，在1946年8月19日的照会中以获自米柯拉契克的情报为根据，对波兰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譴責和要求。例如英国照会中就对选举法的文

① 参見《Документы о враждебной и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ША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Болгарии》. София, 1952, стр. 28。

本沒有提交駐华沙的英国大使一事表示不滿。

人民波兰的政府在 1946 年 12 月 19 日的照会中，拒絕了外国想控制选举的无理要求。苏联政府对人民民主的波兰政府表示了完全的支持。苏联政府对美国 1947 年 1 月 5 日的照会的回答是，在 1 月 13 日的照会中坚决表示反对按美国政府的建議，"就波兰即将进行的选举对波兰政府采取某些步驟，以便签訂雅尔塔协定和柏林协定的国家对波兰內政进行干涉"①。1947年 1 月 19 日进行的立法議会的选举，标志着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民主党派联盟的胜利，它把資产阶級的代表完全排除在政权之外。

美国和英国代表参加 1948 年 2 月的捷克斯洛伐克資产阶級的反革命阴謀，以及它們在二月事件以后的行为，是帝国主义干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內政并公开支持反动势力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西方国家反对苏联和整个民主陣营的帝国主义計划中，捷克斯洛伐克占据着特殊的地位。这是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它的經济发展和国內形势的特点所造成的。当时，該国的資产阶級仍然拥有强大的經济和政治陣地，并且同西方国家的統治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克·哥特瓦尔德曾經說道："从国际观点来看，我們是人民民主国家总的战綫中最薄弱的一环。"②

1948年 2 月，反动势力同 Э·貝奈斯勾結在一起，企图实行反人民民主制度的叛乱。在国內进行活动的資产阶級阴謀家，同西方国家代表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策划叛乱的牵綫人之一就是美国駐布拉格大使斯坦哈特。

为了挑起政府危机并借此把以哥特瓦尔德总理为首的共产党部长們逐离政府，十二个資产阶級部长于 2 月 20 日提出辞职。但是他們想要夺取政权的打算被工人阶級有組織的行动所粉碎了。与劳动农民結成联盟的工人阶級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領导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7 год», ч. I, стр. 35.

② *K. Gottwald*. Vybrané spisy, S. II. Praha, 1955, str. 252.

下，解除了籠罩全国的威胁。2月25日，一批新的共产党的部长和进步力量的其他代表参加了哥特瓦尔德的政府。由于劳动人民的广泛发动，反动派被孤立了，而在政府中代表它們的帝国主义的走狗彻底被排除在政权之外。

因此，共产党所領导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依靠着为使捷克斯洛伐克不受外国干涉的苏联的道义上、經济上和对外政策上的支持，粉碎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国际反动派的阴謀。在1948年二月事件期間，由于劳动群众所施加的压力，曾經通过宪法程序从政权机关中驅逐了資产阶級代表，因此反动派遭到决定性的失敗，彻底解决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問題。

捷克斯洛伐克劳动人民二月的胜利，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的联系的进一步巩固，并使它得以成功地反击帝国主义干涉其內政的新阴謀。

捷克斯洛伐克的研究工作者Я·舍迪維和К·科札尔科娃写道：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方面的支持，"是一个主要的国际因素，它使得国际反动派不敢像1947年美国在希腊所干的那样来干涉捷克斯洛伐克。"①

美、英、法政府对于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清除反动分子一事所提出的"抗議"，以及后来想利用联合国来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誣蔑性攻击和干涉其內政的尝試，都已經不能使捷克斯洛伐克改变自己的政策。

帝国主义集团屡次試图利用联合国来干涉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馬尼亚的內政，并試图改变它們的对內和对外政策。怀着这种目的，西方国家一再指責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馬尼亚"破坏"和

① *Я. Шедивый, К. Коржаков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1945—1960 гг. Перев. с чешск. М.,1960, стр. 60—61.

約，并提出在这些国家“遵守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問題。

1949年，由于对匈牙利的紅衣主教明曾蒂以及一批被控犯有严重叛国罪的神职人員进行了审訊，从而便开始了誣蔑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运动。关于所謂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破坏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問題，被提交第三届联合国大会討論。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政府坚决反对譴責它們破坏宗教自由，并拒絕参加联合国对它們內政所进行的討論。

各人民民主国家坚定的立場，以及苏联对它們的坚决支持，粉碎了帝国主义者直接干涉这些国家內政的阴謀。

在試图利用联合国来实現敌視人民民主国家的阴謀的同时，美英政府在1949年还提議召开駐索非亚、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的苏美英三国使館首脑会議，来討論关于和約的解釋問題。

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馬尼亚政府都反对又一次企图侵害其主权的行为。苏联政府方面也拒絕了英美关于召开三国使館首脑会議的建議。在1949年6月11日的照会中，苏联政府认为“美国和英国政府力图将和約的解釋問題变为爭执的題目，就是直接企图干涉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馬尼亚的內政，以便对其国內政策施加压力”①。

在解决重大的国际問題时，帝国主义国家还广泛采用了其它一些施加政治压力和进行政治歧視，損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合法权利的形式。

美国和英国政府反对波兰临时政府参加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議。

1945年3月22日，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发表了一項专門的声明，表示了波兰輿論对于被邀出席旧金山会議的联盟国家中沒有已經获得解放的、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стр. 118.

同希特勒分子作战并重建自己国家的波兰一事，感到惊異。声明中着重指出，波兰密切关心保障和平之巩固的国际組織的建立，并指出波兰对参加旧金山会議一事，极为关心。①

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正义立場，以及苏联在会前和会議期間对人民波兰无条件的支持，保障了波兰作为联合国創始会員国的权利。

美国对各人民民主国家政策的一个特点，就是希望它們彼此反对并反对苏联。例如，在1947年选举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时，美国代表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候选人作为东欧国家选入安理会的代表，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并沒有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而是支持烏克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候选人。

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計总想阻碍人民民主国家的发展，加深这些国家政治和經济的困难处境，多少保持一点儿自己的影响。

在外长会議进行和約准备工作期間，以及在巴黎和会上，这一政策表現得特别明显。

千方百計地来損害各人民民主国家权益的傾向，也表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多瑙河航行制度問題所采取的立場上。它們提出了多瑙河"国际化"和"机会均等"原則，指望利用这些原則来暢行无阻地滲入多瑙河沿岸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經济。由于苏联坚定不移的立場，多瑙河航行制度的問題，后来在1948年专門召开的会議上，也得到了符合多瑙河沿岸国家利益的解决。

在彻底解决这一切問題方面，苏联代表同参加巴黎和会的各人民民主国家代表一道为和平安排的民主的正义原則而进行的坚决斗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②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締結的和約，不仅保障作为希特勒前盟国的国家享有独立和主权，并且也

① «Zbiór dokumentów. 1945», № 1, str. 45.

② 参見本书第二十章。

保障了它們民主发展的可能。

在战后同德国的和平安排的問題上，美英帝国主义集团力图对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人民民主国家（例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大家知道，英国和美国长时期不同意沿奥德—尼斯河来建立波兰西部边界，反对德国人从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移往德国。1946年9月，美国国务卿貝尔納斯在斯图加特的演說中，对波兰西部边界是否已最后确定提出怀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波兰在为爭取自己的权利、为爭取本国的安全和主权而进行的斗爭中，也不是孤立的。苏联政府毫不含糊地声明，苏联认为波兰的西部边界是永久不变的，波茨坦会議关于波兰西部边界的决議是誰也不能动摇的。

在西方国家反对保加利亚、罗馬尼亚、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参加联合国的問題上，也明显地暴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人民民主国家的敌視态度，以及它們想要破坏各国人民政府的陣地的打算。

帝国主义的代表在拒絕接納这些国家加入联合国时，公然借口他們不滿意这些国家的被他們任意說成是“不民主的”国內制度。此外，还提出对于違反和約某些条款的指責，作为拒絕的理由。

这一切借口都遭到各有关国家和苏联的坚决反对。苏联反对在接納联合国新会員国的問題上进行歧視，始終不懈地設法接納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馬尼亚和其他国家加入联合国（直到1955年，这一問題才最后得到肯定的解决）。

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在其顛覆中欧和东南欧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政策上，也采取了施加經济压力的手段，企图利用这些国家在恢复由于战爭和希特勒的占領而遭到破坏的国民經济的工作中所面临的困难。

1946年初，美国政府試图通过拒絕提供当时正为之进行談判的貸款，

来阻碍波兰实現基本生产資料的国有化。英美在德国的占領当局都阻撓归还波兰、捷克和南斯拉夫財产的工作。作为对波兰的人民民主政府施加压力的手段，还冻結了波兰在英美銀行的資产。在几个月的时間內，美国就扣留了将近七百艘多瑙河沿岸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船只，經过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坚决要求后才予以归还。

美国帝国主义試图利用1947年提出的所謂"馬歇尔計划"，来干涉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內政。① 在这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抱着特别大的希望，因为它同西方国家的經济有着紧密的联系②，而且直到1948年2月，資产阶級分子在国家机构中还占有比較强大的陣地。

在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其中也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拒絕了"馬歇尔計划"以后，同时也是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取得了二月的胜利以后，美国在国际貿易上开始公开实行歧視，并且实际上是企图組織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經济封鎖。

1948年2月27日，美国政府便拒絕付給捷克斯洛伐克购买棉花的貸款。随后，国际复兴开发銀行也拒絕提供发展捷克斯洛伐克經济的貸款。1948年3月1日，美国国会批准停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出口。对"馬歇尔計划"的参加国也施加了相应的压力。英国政府停止了关于締結英捷貿易协定的談判。

显然，在以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冷战"、广泛开展政治和經济攻势的情况下，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要想根据和平共处原則同西方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願望，在战后头几年是不可能得到应有結果的。

---

① 参見本书第十四章和二十四章。

② 还在1947年6、7月間，捷克斯洛伐克三分之二以上的貿易都是同西方国家进行的。

例如，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关于同法国締結同盟条約的建議，由于遭到法国政府的敌对立場而未能实現。早在1946年夏天，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同法国政府領导人的会談，曾經发表了一項联合声明，声明中談到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負有义务在条約的基础上就德国問題进行合作。但是后来談判沒有导致滿意的結果。1946年6、7月間送至巴黎的捷克斯洛伐克草拟的条約草案，經过十一个月的沉默而遭到拒絕。1947年6月，法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同盟条約草案。这一草案是捷克斯洛伐克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实际上在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德国以及可能与其相勾結的盟国的进攻时，并沒有保证提供援助。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草案迥然不同，在遇到侵略时，不是建議提供援助，而只是彼此进行协商。

法国在条約問題上所采取的立場，是以加强西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影响的意图为基础的。当时的法国总理拉馬迪公然宣称："因为德国在很长时期还不会有力量自己发动战爭，条約不会具有很大的实际价值。但是它在心理和政治方面将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会证明在东方和西方之間筑起桥梁的政策仍然存在……。"①

由于法国政府的过錯，波兰和法国之間的同盟条約也沒有能够签訂。波兰外交部长莫泽列夫斯基在1947年指出了法国在这一問題上的对外政策是前后矛盾、变化莫測的。②

可見，对于1945—1949年間各人民民主国家同西方国家之間的关系来說，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英国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企图干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內政，企图对它們施加政治和經济压力，以改变它們的对內和对外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同西方各資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的首要任务，是維护本国主权不受国內和国际反动派的侵害，反击帝国主义分子在政治上、經济上和思想上的进攻。

---

① 引自 *Я. Шедивый, К. Коржалков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1945—1960 гг., стр. 47。

② *Z. Modzelewski.* Polityka zagraniczna Polski. Warszawa, 1960, str. 60.

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各年輕的人民民主国家在国际合作方面的活动范圍。直到人民民主制度得到巩固，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內和国际地位稳定下来以后，它們在这方面的活动才充分展开。但是即使在年輕的人民民主国家成立的初期，它們就在保障和平共处方面作出了相当的貢献。

深刻的革命改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同苏联友好并結成一个統一的社会主义大家庭，这一切都提高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威信和影响，使得它們的权利和利益能够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

在1946年的倫敦《君子协定》中，反映出它們不得不承认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新的作用。根据該协定，东欧各国在安全理事会中应有一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1946年，波兰取得了这一席位。

作为联合国会員国的各人民民主国家，积极参加了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多年都当选为經社理事会的成員。波兰是成立联合国欧洲經济委員会的发起国之一。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支持苏联的爱好和平的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巩固和平和安全的建設性建議。

例如，关于联合国会員国同佛朗哥西班牙断絕外交关系的建議，就是由波兰提出的。在1946年1月第一届联合国大会上，波兰建議各国通过一項法律，禁止将原子能用于軍事目的。波兰在1946—1947年作为联合国原子能委員会的成員，为禁止将原子能用于軍事目的进行了不懈的斗爭。1947年2月8日，出席这一委員会的波兰代表提出了一項和平利用原子能的計划，并建議通过一項国际公約，規定禁止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銷毁現有全部原子武器儲存，并建立监督和檢查的制度。

在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上，波兰代表——外交部长莫泽列夫斯基提出了恢复遭受战爭破坏的各国的經济問題。同时他反对联合国漠視欧洲各国的經济恢复問題，反对将經济需要服从于政治目的（像“馬歇尔計划”所固

有的特点那样），反对在恢复經济的問題上德国享有优先权。他声明波兰政府希望扩大和加强同一切爱好自由的国家的經济关系。他說："我們願意同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民締結文化的、政治的和經济的协定，不論他們居住在奥得河和易北河的西面还是东面。"①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为遵守联合国宪章、为接納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符合宪章規定的一切条件的其他国家加入联合国，进行了不懈的斗爭。

各人民民主国家积极参加巴黎和会的工作，是对于爭取实現战后和平安排的民主原則的斗爭所作的重大貢献。

各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德国問題上的主張，有着重大的意义。防止德国重新进行侵略，对于德国帝国主义經常的扩張对象、希特勒侵略的最先牺牲者和深受战爭和占領之害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是具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事情。他們始終如一地力求德国問題得到民主的解决，为反对西方国家的占領当局破坏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而进行斗爭。

出席1947年1月召开的关于德国問題的副外长会議的波兰② 政府和捷克斯洛伐克③ 政府所提出的特别备忘录，以及波兰政府和捷克政府屡次送致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的照会，都证明了这一点。

1948年2月，就德国問題在布拉格举行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外长会議。各国外交部长通过了一項声明，抗議西方国家破坏盟国关于德国問題的主要决議，并譴責給予西德在恢复国民經济方面的优先权。④

① «Zbiór dokumentów. 1948», № 2, str. 45.

② «Zbiór dokumentów. 1947», № 1—2, str. 28—51.

③ «Dokumenty československé zahraniční politiky. 1945—1959». Praha, 1960, str. 383—389.

④ «Zbiór dokumentów. 1948», № 3, str. 87—105.

1948 年 6 月，由于苏联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倡議，在华沙召开了八国(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兰、罗馬尼亚、匈牙利)外长会議。会議就旨在分裂和肢解德国、阻碍签訂对德和約的西方国家片面的倫敦会議的决議問題，进行了討論。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代表，就德国問題制訂了一項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并眞正有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綱領。①

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抗議西方国家于 1949 年成立单独的西德国家的行为，因为它使德国遭到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各人民民主国家爱好和平的政策来說，它們承认 1949 年 10 月 7 日成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同它建立友好关系，乃是自然的結果。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社会主义陣营的积极参加者。

中欧和东南欧各国革命的胜利，人民民主制度在它們国內的巩固，以及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建設，使得它們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的、眞正革命的改变，决定了它們在国际舞台上起着根本上嶄新的作用，并且对整个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欧和东南欧各国过去在經济上和政治上落后，依附于外国，且是无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对象，現在已成为先进的、迅速发展的独立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全权主体。

人民民主国家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結成一个統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建立和发展新型的国际关系即为和平和社会主义服务的兄弟友好和全面合作的关系，这就是人民民主国家 1945—1949 年对外政策活动的最重要总結，这些总結证明了人民民主国家在对外关系上的新作用。

---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8 год》, ч. I, стр. 237—247.

第 七 章

中国的人民革命及其国际意义。亚洲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登上世界舞台

中国的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作为一个偉大的国家即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登上国际舞台，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世界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

苏共綱領中指出："欧洲和亚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給了帝国主义陣地以新的强有力的打击。中国革命的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欧洲和亚洲国家的革命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①

中国革命时期的决定性战斗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战胜者并且开始了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过程。在世界上发生了新的力量配置，它大大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完成。

毛澤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詞中曾經着重指出："在国际范圍內，我們胜利的获得，是依靠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持，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厚同情。"②

帝国主义不能像在"义和团"起义时期和1924—1927年間的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所做的那样，結成統一战綫来反对中国的革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德国、日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7頁。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頁。

本、意大利——被粉碎了，而另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遭到极大的削弱。

当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八年抗战結束时，中国分成了两个营垒。蒋介石政府控制了国內四分之三的地区，拥有数百万軍队，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人訓练和装备起来的。同时，在中国形成了新的强大的力量。在拥有一亿四千九百万人口的广大的解放区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爭中承担着主要重担的人民解放軍成长起来了，并且取得了战斗經驗；还有两百多万民兵。由共产党人所領导的这些人民的武装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突击力量。中国共产党自己也在革命战斗中受到了鍛炼，它在人民群众中更深地扎下了根，它的队伍更加壮大了。

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着重大作用的，还有以下情况，即当苏軍在中国东北战胜了日本关东軍以后，正是在这同苏联和人民的蒙古接境的广大地区，成立了人民政权。这一地区成为战胜国內和国际反动派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爭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人民革命的胜利，粉碎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鎖鏈。在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之后，中国便以很快的速度来发展自己的經济和文化。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根本改变了：如果說旧中国是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那末年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則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爭取維护和巩固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爭取社会进步的共同斗爭中，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所有国家团結在一起。

在表現出战后时期世界发展的新趋向的一系列事件中，越南的民族解放革命（1945 年 8 月）占有重要地位。它摧毁了法国殖民主义的基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过程的明显表現之一。

八月革命的特点在于：它是在工人阶級領导下实現的、殖民地

国家中第一批民族解放革命中的一个。这是在帝国主义的边緣地带即东南亚打开了它鏈条上的一个大决口。在工人阶級及其先鋒队共产党的領导下，越南的劳动人民摆脫了殖民依附关系，展开了反对中世紀殘余、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剝削的坚决斗爭，走上了建設社会主义基础的道路。

由于民族解放革命的結果而出現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即越南民主共和国，这种情况促进了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的高漲。越南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印度支那半島和东南亚的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洲成立的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由苏軍解放的朝鮮，暫时按三八綫被分为两个部分。但是由于美国政策的結果，暫时分为两个部分的情况竟演成了国家的分裂。在南部成立了領导着大韓民国的李承晚傀儡政府，这个国家已淪为美国的半殖民地，它受着独裁制度的控制，鎮压人民的民主运动。与此相反，在北部，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最广泛的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一个比較短的历史时期內，它达到了自己的最高阶段——政权轉到工人阶級和农民手中，成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甲、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陣地的一个致命打击

一、中国的第三次国內革命战爭

中国共产党力图避免內战，早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1945年)，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結束以前，就提出了成立有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同盟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以及

組織联合司令部的思想。

但是，受华盛頓鼓励的蔣介石政府却选擇了另外一条道路。在日本投降的时候，蔣介石的軍队呆在大后方，而人民的軍队則开往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和其他許多大城市。蔣介石得到盟軍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批准，下令給駐在中国的日本远征軍和傀儡軍队，不許把武器交給人民解放軍部队，并等候国民党軍队的到来。在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贏得时間从后方往各大城市运送軍队，并为了装出一副主張国内和平的样子，三次打电报到延安，建議毛澤东去重庆同蔣介石进行談判。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利益，尽一切可能力求避免内战，維护和平，保障民族的团結，并实現国家的民主化。1945年8月28日，毛澤东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的决定前往重庆。

蔣介石分子在与共产党人进行談判的同时①，急忙把軍队运往将来发动进攻的地点。美国政府則提供飞机和船只来运送国民党軍队。1945年9月，美国部队在天津、上海和其他城市登陆，以便阻止人民解放軍的部队解放这些城市。美国海軍陆战队占領了平沈和沪宁铁路。在中国的美軍数达十一万三千人。

1945年10月中旬，蔣介石分子背信棄义地向华中和华南十一省的解放区大举进攻。有一百二十七万国民党軍队和五十万傀儡軍队参加作战。美国軍队也时常参加进攻解放区的武装斗爭。它們深入到冀热辽解放区以及河北省东部的解放区，尽量向国民党軍队提供援助。10月31日，美軍和国民党軍队占領了北戴河。②

中国国内局势的更加尖銳化，引起了苏美英莫斯科外长会議的注意(1945年12月)。三国外长认为中国必須統一和民主化，并

① 詳細情况可参見 *Г. В. Астафьев.* Интервенция США в Китае и ее поражение. М., 1958, стр. 27—33.

② 参見刘大年：《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6頁。

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政府的一切机关，必须停止内战。他們确认了自己对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的信念。① 苏联和美国达成了协議，希望苏联和美国的武装力量在它們履行义务和职責所許可的最短期間內撤出中国。②

莫斯科外长会議的这一决議，对中国的局势发生了一定的影响。1945年12月20日，出名的軍事和国务活动家馬歇尔将軍以美国总統特使身分到达重庆。美帝国主义者被迫只是在表面上改变了一下策略：不是采取扩大內战的粗暴方針，而是决定用更巧妙的方法来解除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消灭解放区。馬歇尔的来华就是美国武装干涉中国的一种掩护。馬歇尔建議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談判中由他来进行調停。共产党接受了馬歇尔的"調停"，因为人民希望和平，哪怕是暫时的和平，而中国共产党人則努力爭取机会用和平方法来解决爭执問題。即使不能得到和平，参加談判也可作为宣傳共产党人观点的有利讲坛。

国民党政府被迫考虑莫斯科会議的决議，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議。經过1945年12月举行的有馬歇尔参加的国共两党的談判，1946年1月10日，公布了由两党代表签字的停止軍事行动的命令。同日，政治协商会議开幕，参加会議的有各党派代表和一些无党派人士。政治协商会議主張取消一党专政，代之以联合政府；号召采取一切措施以停止內战，并且决定审查多年前制訂的宪法草案，向国民大会提出新草案。

这些决議国民党政府連一項也沒有实現。尤有甚者，1946年3月1日，蔣介石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会第三次全体会議上公开要求重新审查政治协商会議的决議。

反对人民解放軍的軍事行动又重新开始了，这一次是在中国的东北，国民党政府調往該处十五个师。蔣介石声称：只有当人民解放軍撤出长春之后，东北的停战才能实現。

---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5 год», стр. 161.

② 参見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5 год», стр. 162。

人民解放軍部队为了避免武装冲突，于1946年5月23日撤离长春。但是国民党軍队并沒有停止进攻。它們占領了永吉、四平并进入松花江南岸。

在国民党軍队攻打中国的东北并策划全国范圍的內战的同时，它們也大吹大擂地展开反苏攻势。

1945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苏中談判时，便已通知中国代表团团长宋子文，苏联軍队将在战爭結束三个月后撤出东北各省。11月間，苏联統帅部向国民党当局提交了1945年12月3日以前撤退軍队的計划。

国民党政府要求苏軍暫时不要撤走，借口是在它們撤离之前既不可能調动軍队，也不可能組織民事行政机关。①但是，这并沒有妨碍国民党的宣傳机关叫嚷什么苏联占領了中国的东北。1946年2月22日和23日，在重庆、南京和上海举行了反苏游行。

鉴于国民党当局这种恶劣的态度，苏联政府于1946年3月声明：如果不是中国政府曾两度要求苏联軍队延期撤退，那末早在1945年12月，苏軍的撤离工作就可能已告結束。1946年4月3日，苏联統帅部将苏軍从东北各据点撤出的期限通知了国民党代表。② 1946年5月3日，苏軍从中国东北撤退的工作即告結束。

国民党政府企图爭取苏联同意国民党将軍队集結在辽东半島，它想从那里使人民解放軍背后受击。蔣介石本人曾几次同苏联大使商談，想說服苏联政府同意国民党軍队在旅順—大連地区登陆。苏联政府答复說，旅順港的防务是由苏联負責，而大連則根据苏中协定是一个商港，它是供运輸貨物、而不是供运送軍队之用。苏联政府反对任何軍队在大連和旅順登陆，因为这是对1945

① 参見1945年11月30日《消息报》。

②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6 год», М., 1952, стр. 112。

年 8 月 14 日的有关协定的破坏。

因此国民党人发动了反苏宣傳，企图利用它作为主要工具，来緩和由于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內政的行为而激起的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緒。但是，誣蔑性的宣傳并沒有給中国东北战場上的国民党人带来什么好处。人民解放軍部队击溃了国民党軍队，国民党政府于 1946 年 6 月 7 日声明准备停止軍事行动两周。

很清楚，国民党这一次也是企图赢得时間来重新組織力量。中国共产党忠于自己用和平方法解决爭执問題的路綫，因而还是同意进行談判。国民党政府要求解散中国东北的人民政权机关和人民解放軍部队，要求将津浦和隴海两铁路置于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还要求人民軍队撤离所有重要城市、根据地和重要交通綫。此外，蔣介石还建議馬歇尔在調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間的分歧时有最后决定权。当然共产党反对这样做。

同时，美国力图挽救国民党政权，开始大量向中国提供武器。1946 年 7 月 16 日，美国国会决定送給国民党政府二百七十一艘軍舰。6 月 27 日，美国政府决定装备国民党軍队的八个空軍大队，并交給它們一千多架战斗机。此外还給南京政府价值八亿二千五百万的剩余軍用物資。

蔣介石受华盛頓的指使，于 1946 年 7 月在全国发动內战。开始时国民党軍队（共四百五十万人）进展順利：它們占領了隴海铁路和山东、山西两省的許多地区。8 月27日，它們占領了承德，9 月底占領了張家口——革命力量重要的政治和軍事中心。

蔣介石政府大为得意，过早享受了胜利临近的欢乐。它召开了所謂"国民大会"，給国民党政权塗上一层"民主的"顏色。"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使蔣介石的政权合法化了。蔣介石被选为中国的"总統"。

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竭力揭露国民党的欺騙手腕，这种手腕是要用来为扩大內战、为美国干涉中国內政辯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抗議继續打內战，要求美国立即停止

对蒋介石的軍事援助，从中国撤出軍队。駐南京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給馬歇尔的信中写道：所謂和平談判已經被美国和蒋介石用来扩大軍事行动，而且美国的援助是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共产党和一切民主团体都抵制"国民大会"。

1947年1月2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停止馬歇尔在中国的"調停活动"。在此同时，美国軍队違反莫斯科会議的决議，不仅继續呆在中国，而且还加紧干涉中国內政。在青島集中了美国的第七舰队，共計有一百五十七艘軍舰。在国民党的参謀总部和各种兵团中，有千余名美国軍事顧問。1946年8月，他們訓练出五十七个国民党的师团。仅1946年，这些軍事顧問就在华北建立了四个間諜学校和二十七个軍事学校，其中包括五个空軍学校。美国的武器和装备在中国到处泛濫。

蒋介石政权得到了大批的貸款。蒋介石政府将中国的民族利益出卖給自己的美国保护人作为这种援助的酬报。經过秘密会談后，蒋介石政府于1946年11月4日在南京签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約。在横遭外国侵略者逞凶肆虐的中国历史上，还沒有一个这样的先例，即某一国家根据某項条約取得了像美国現在被賦予的这么多的权利。这一条約按其范圍来說超过了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它代替了1844年以后签訂的一系列中美不平等条約。

签訂的这一文件形式上是一个通商条約，但实际上却远远超过了商业范圍。根据条約，美国取得了在中国全境經营工商业，进行財政活动、宗教事务，从事科学教育工作，开設慈善机关等权利。为了以上目的，它們可以从事建設，获得土地和房屋。并且在一切活动方面，美国人保证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权利（即国民待遇）。这些权利不仅适用于业已存在的自然人和法人，而且还适用于将来会要出現的自然人和法人。輸入中国的美国貨的关税，不得高于对中国貨的征税。因此，关税不能保护民族工商业使其免受美国傾銷政策的打击。美国人还获得了內河航行权。

这项奴役性条約的签訂使中国人民大为憤怒。1947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发表了关于“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約”的声明。中国共产党为了維护中国的民族利益，声明它对1946年1月10日以后只經国民党政府的单独行动，而未經政治协商会議通过，也沒有征詢共产党的意見而成立的对外借款或条約，一律不予承认，并决不担負任何义务。①

美国壟断資本企图把中国变成只出售它們貨物的銷售市場。还在1947年，中国50.2%的进口貨均来自美国（通过走私的方式进口的大量美国貨还不計算在內）。

美国壟断組織在中国夺取了一个又一个的陣地。洛克菲勒同蔣介石当局締結了一項共同“开发”广东和广西两省的协議。“世界石油产品公司”取得了勘探和开采中国西北石油資源的权利。“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同国民党方面签訂了关于建設发电設施的合同。在上海，美国人对电力生产、电話网、无綫电网、銀行等等建立了控制。

1947年，在中国有十二个美国輪船公司进行营业，它們控制着九条国际航綫。国民党政府任命了美国人李度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度上任后即加紧把美国人和英国人安插到税务机关，用种种借口把中国人排挤出去。在这种机构中有二百三十四个美国人和英国人占据了重要职位。1948年5月，中美之間締結了一項关税协定，根据这项协定，許多美国貨物根本免予課税，而对其它一些貨物——如棉花、小麦、烟草，則規定了很低的关税率。1948年7月签訂的中美双边协定，将中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特别是所謂战略物資的产地交由美国控制。

美国帝国主义者十分重視对中国居民的思想影响。它們无中生有地散布苏联对中国抱有侵略野心的謊言，力图使人們对苏联不信任，并把中国拉入反苏集团。它們宣傳“美国生活方式”，并且从中国的統治阶級中提拔自己的走狗担任国民党政府的要职。

---

① 1947年2月4日《解放日报》。

美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和慈善机关来进行思想扩張。美国对这些活动的撥款达到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1948年各种美国宗教团体在中国占有九千六百五十一所房屋；在那里开設了許多中等和高等学校。

但是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根据亲身的經驗，深信只有消灭帝国主义的国民党走狗，才能使国家得到自由独立的发展，他們都站在共产党高举的革命斗爭的旗帜之下。无产阶級、农民、小資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都团結在共产党的周圍，組成了强大的革命的民族解放統一战綫。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变化。

二、人民解放軍轉入反攻。革命的胜利

1947年7月，开始了內战的一个新阶段。战場上的局势經过一个短期的稳定以后，人民解放軍开始了总反攻。在反攻的过程中，人民解放軍强渡了黄河，截断了隴海一天水铁路，直迫大别山地区。1947年8月，开始了从山东开往河南的胜利进軍。在西北，人民解放軍部队回到了延安。

蔣介石軍队的失敗使华盛頓感到严重的不安。南京的傀儡显然辜負了美国帝国主义的期望。在美国发出了对中国进行大規模武装干涉的号召，某些头脑发热的人认为这种干涉可以拯救蔣介石政权。1947年7月，魏德迈带着一批国务院、軍事部門和財政部的顧問来到中国。魏德迈跑遍了济南、沈阳、广州和台灣，然后制訂了一个拯救蔣介石政权的計划，并将此計划提交杜魯門批准。①

計划規定要大大加强对南京政府的軍事援助，当然是要在美国顧問的

①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Based on the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1949, p. 809—811.

控制之下。魏德迈还要求除了現有的許多空軍和海軍軍事基地外，还要交給美国新的軍事基地。他还建議以在中国东北停战为借口，用联合国名义采取行动，以便在东北建立在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控制之下的保护制。如果这些国家中有任何一国拒絕参加保护制(这里指的是苏联)，南京政府就应当請求联合国托管，这事实上也就是把中国的东北几省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美国将軍所建議的办法，是对中国內政的粗暴干涉，是对中国人民自主权利的嘲弄。但是华盛頓的計划是背着主人制訂的，而归根到底决定中国的事件进程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而不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蔣介石。

人民解放軍依靠着全体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同情，于 1948 年 9 月至 10 月轉入了决定性的进攻，并于 11 月中旬解放了中国的整个东北。

1949 年 1 月，天津和北京得到解放。到 1949 年 4 月，人民解放軍部队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区。

从中国撤出了自己軍队的苏联，努力設法制止美国对中国內政的干涉。在 1947 年 3 月至 4 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議上，苏联代表团向美国国务卿建議就外长会議关于中国的十二月决議的执行情况問題交換情报。但是馬歇尔迴避討論这一問題。

苏联的貿易組織同中国解放区的政权机关建立了事务联系。例如1946年12月21日，在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与中国"同兴"公司之間签訂了合同。"同兴"公司卖給"粮食出口"公司谷物、黄豆和肉类；苏联运往中国东北棉織品、棉紗、紙張、糖、食盐、汽油、煤油、机械用油、煤炭、机器和設备。

1949年7月，东北几省人民民主政权的貿易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經过談判后达成了相互提供貨物的协議。苏联专家帮助他們在短期內修复了铁路、桥梁和許多工业企业，安排城市經济。苏联防疫队同中国大夫一起防

治了鼠疫。

国民党統治集团在彻底崩溃的前夕又开始玩弄手法。南京外交部于1949年1月8日向苏、美、英、法駐中国大使館发出备忘录，要求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談判中进行調停。但是这种想推动苏联去干涉中国內政的企图沒有得逞。苏联政府拒絕承担調停的义务，声明恢复中国这样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国家的統一，乃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①

那时蔣介石政府派遣了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談判，但是共产党提出的建議沒有被接受，于是談判中断了。一部分国民党代表团团員拒絕返回南京而留在北京，因为甚至連他們也知道蔣介石政权已經气息奄奄了。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軍部队再次进軍，强渡了长江，并于4月23日攻占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而在同年5月攻占了上海。8月間人民解放軍部队进入兰州和长沙。到1949年秋，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部分領土上被消灭了。美国帝国主义者想变中国为任其剝削的場所并把它綁到美国战車上的計划遭到破灭。美国統治集团用来維持蔣介石政府的六十亿美元化为烏有了。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在北京召开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議。会議通过了关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的条例，通过了实质上是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綱領和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会議选举了政府，批准了1949年10月1日隆重宣布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国內建立了以工人阶級領导的无产阶級、农民、小資产阶級和民族資产阶級的統一战綫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这种政权是无产阶級专政的一种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стр. 40。

形式。

正当北京天安門广場上宣讀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的宣言时，人民解放軍部队消灭了企图盘踞在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敌人。到1949年底，人民的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全境建立起来了。1950年上半年，蒋介石分子从海南島、舟山群島等地被驅逐出去。敌人在台灣和某些邻近的島屿上盘踞下来。

中国人民在流血的战斗中失去了千百万儿女，取得了胜利。中国变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中国革命的胜利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过去以各族人民听任外国帝国主义暗无天日的压迫和奴役为其命运的旧亚洲，已經一去不复返了。反动派无力阻止亚洲人民复兴的这一偉大过程。这一过程是当代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并且它为爭取和平和人类进步这一斗爭的继續高漲开辟了令人鼓舞的前景。

中国革命的胜利决定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新作用。被帝国主义者看作巨大的投資潜在場所的一个国家脫离了資本主义体系。帝国主义国家的好战集团，希望中国成为侵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軍事跳板和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的打算，已經破产了。美国壟断組織为要占据自己的帝国主义竞爭者的地位并使中国服从它的絕对統治而进行的多年的努力都归于失敗。

中国人民的胜利对亚洲各国，对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爭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早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就声明：新中国将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屬于一个陣营。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議的共同綱領中已經强調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陣营方面”①。

拥有六亿多人口和将近一千万平方公里領土的一个大国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扩大了社会主义体系的范圍，增强了它的力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写信給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政府，建議建立外交关系。就在第二天，苏联政府即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同它建立外交关系。

1950年2月14日，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协定和关于貸款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②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把深远的历史联系固定下来了，并且是发展和巩固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間友誼的一个新阶段。同时这一条約奠定了两个兄弟国家之間进行合作的巩固基础，向全世界表明了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发展两国的經济和文化方面，在保障远东和全世界和平方面彼此提供兄弟般援助的眞誠願望。条約的每一条款都充滿着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精神。

毛澤东在苏联最高苏維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会議上讲話时，曾經談到这一历史性事件。他說："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同苏联締結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条約。这是两个偉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偉大同盟。我們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共命运、同呼吸。我們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結，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間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結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締約国一方受到日本或其盟国之侵襲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

双方保证以眞誠的合作精神参加一切旨在巩固和平和安全的国际活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1頁。

② 同上书第74—80頁。

③ 《毛主席在苏联的言論》人民日报出版社1957年版第9頁。

动。双方議定就涉及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問題彼此进行协商。

条約还規定根据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主权和領土完整的原則全力扩大苏联和中国之間的經济和文化联系。

苏联政府无偿地把共同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的权利以及屬于該铁路的全部財产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

关于旅順港的协定規定，一俟对日和約締結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軍即从共同使用的海軍基地旅順港撤出，并将該地区的設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人民中国得到了为数三亿美元的优惠貸款。在五年之內，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可以取得貸款六千万美元作为偿付苏联提供的設备和器材之用。

将两个偉大的国家联合在一起的、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間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約，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它使帝国主义集团不能对年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武装干涉。它不仅巩固了人民中国的安全，而且給人民中国提供了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經济和建設社会主义方面取得无私援助的广大可能性。

为了履行友好同盟互助条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于1950年4月签訂了关于貿易和商品流轉的几个协定。1950年，中苏貿易額为二十三亿零六百万卢布。为了在国民經济的恢复工作方面和組織經济管理和培养本国专家方面提供援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請，苏联派遣了数百名具有很高的业务水平的专家。

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馬尼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49年10月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阿尔巴尼亚于1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于1950年1月，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以及同邻近的兄弟国家之間，很快就开始了經济合作。

可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剛一成立的时候起，就巩固地确定了

它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大家庭中、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这些国家給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大大便利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又是它对加强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威力所作的巨大貢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一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願与資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平关系。在这方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采取了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願意根据平等互利、相互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則，进行关于修訂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訂的条約的談判；人民中国同美国在民主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广闊的可能性被打开了。但是美国政府不仅拒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还試图組織对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經济封鎖。

国务院发言人怀特于1949年10月4日声称，美国政府找不出急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由。一星期后，国务卿暗示說，如果中央人民政府承担由国民党签訂的条約所产生的义务，美国可能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換句話說，美国外交要求以保持美国在国民党政权下所占有的陣地，来交換对中国的承认。这是一种采用拙劣手段的企图。当然国务院的建議遭到了坚决拒絕。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仅不关閉自己的領事館，和在中国的宗教和"慈善"机关，而且还要求以对待官方人員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机关的工作人員，甚至还要求外交豁免适用于前領事館的官員。由此可見，美国政府不願承认人民中国，同时却企图在那里保持自己的机构来搜集情报，并进行反对新制度的破坏活动。

既然美国不願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承认它們大量的領事館、教会和其他組織的官方地位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中国当局驅逐了对人民民主制度进行敌对活动的美国人。沈阳的前美国領事館的某些工作人員被

提交审判，根据法院判决被驅逐出境。

美国官員和反动报刊企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一問題上的立場，說成是不尊重“自由”国家的权利。他們硬說中国政府自己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問題搞得复杂化了。1949年11月17日杜魯門总統在記者招待会上声称，中国当局以自己的行动破坏了国际实踐并侮辱了美国。某些国会議員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武力。

美国政府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經济抵制。它禁止将所謂战略物資运往中国。禁令也扩大到具有国民經济意义的商品，如发电机、开采石油和采矿工业的設备、汽車，同时还扩大到衣着和食物等方面。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在1947年为三亿六千二百万美元，到1948年为二亿四千六百万美元，而从1949年6月到1950年6月这一段时期則下降到三千万美元。①

在此同时，美国继續援助国民党。当人民解放軍部队逼近广州时，美国輪船和飞机把蔣介石分子运往台灣。被人民驅逐的政治上的破产者麕集于台北，他們把自己冒充为并不存在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美国和某些依附于美国的国家在台北設立了自己的使館。1949年10月，美国政府为了援助蔣介石分子撥出了七千五百万美元。1950年2月，国会通过决議，延长使用根据“馬歇尔計划”撥給国民党政府而未用完的一亿零八百万余額的期限。

从台灣常常发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沿岸的进攻。从1950年2月开始，由蔣介石分子和从美国、日本和西德雇佣的人駕駛的、带有“made in USA”（美国造）的标志的飞机，开始轰炸和射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点。在美国巡洋舰的保护之下，国民党海盜射击和搶劫了开往中国港口的外国船只。1949年11月，受到損害的船只就有《路易斯·摩勒号》，《艾第

① 参見 *Б. И. Бухаров.*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1949—1953). М., 1958, стр. 18。

特·摩勒号》,《莱昂毕号》,《济南号》,《巫山号》。甚至美国的盟国也对这种海盗行为提出了一系列抗議。

美国武装力量一步一步地准备占領台灣。在远东海面巡邏的美国第七艦队加强了。美国往日本調遣一批又一批的軍队。美国的将軍和外交家对远东的訪問頻繁起来。美国众議院和参議院的許多議員公开号召占領台灣。

美国政府对其他資本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要阻碍它們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早在1950年1月，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以后不久，国务院通过它駐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加拿大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大使向这些国家的統治集团表示，华盛頓将认为它們在承认未来的中国政府方面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不受欢迎的。

美国代表团积极支持国民党分子在第四届联大政治委員会上所提出的决議草案，該草案要求联合国全体会員国不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苏联反对通过这一决議，与它一起行动的还有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

美国統治集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国际性的政治和經济抵制的各种努力都沒有奏效。继社会主义国家之后，許多不久以前才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亚洲国家，都对人民中国关于按照民主原則建立外交关系的呼声作出了响应。中国人民和几十年来作为殖民压迫和掠夺对象的其他亚洲人民的共同命运，中国的解放斗爭的范例所具有的巨大吸引力，决定了它們之間的相互关系。

1949年12月16日緬甸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2月30日印度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巴基斯坦、錫兰、阿富汗、印度尼西亚也相继予以承认。

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之間的外交关系的建立。前印度駐华大使潘尼迦曾經写道，对于承认新中国的問題在他国内并沒有分歧，領导人之間

只是在承认的时間上有所分歧。① 尼赫鲁在議会中讲道："問題不在于贊同不贊同已經发生的变化，問題在于承认历史上的一个偉大事件，在于如何評价和对待它。新的政府是一个巩固的政府，沒有一种力量可以排挤或驅逐它。"②

西方国家的反华陣綫开始瓦解了。前英国駐中国总領事格拉罕于 1950 年 1 月 6 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递交了一項照会。英国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中国絕大部分領土实現了有效的控制，所以对它給以法律上的承认。胡阶森被任命为英国駐中国的临时代办，他被授权进行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談判。③ 中国政府同意接受英国代办，并就外交关系正常化問題进行談判。

英国政府之承认人民中国，是由許多情况迫使的。

第一、英国指望中国的市場来扩大对外貿易額并希望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存款。

第二、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参加英联邦的亚洲国家的态度，而它們都坚持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倫敦认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外交关系，可以便于解决关于香港和东南亚的英国領地方面发生的問題。美国《現代史料》月刊写道："英国对于同中国进行貿易的那种比美国强烈得多的要求，以及对于失去香港或者至少为了香港而打仗的惧怕心理——可以认为这一切都是抑制英国在中美冲突上不同美国过于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因素。"④

第四、英国統治集团担心支持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冒險立場，将

① *K. M. Panikkar.* In Two Chinas (Memoirs of a Diplomat). London, 1955, p. 67.

② «Far Eastern Survey», vol. XXI, № 4, 21. V. 1952, p. 74.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1 集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9 頁。

④ «Current History», December 1957, p. 329.

引起在远东的战争冒险，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导致英国在亚洲的陣地的严重削弱。

最后，艾德礼政府不願放棄英帝国主义的旧方式，沒有失去使中国脫离社会主义陣营的希望。英国首相在1950年12月5日向杜魯門說道："不要让中国人认为俄国是他們唯一的朋友。"要知道，他是希望，"中国人同俄国分离"，甚至成为"俄国在远东的对抗力量"。①

继英国之后，挪威、然后丹麦、以色列、芬兰、瑞典、瑞士、荷兰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西方国家的資产阶級政府虽然由于一系列經济上和政治上的原因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們决不是准备在国际舞台上支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公开的敌視、旧的殖民政策和經济上对美国的依附这种包袱，使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离开了同中国发展合作的正道。

英国政府认为，承认人民中国的事实本身，就足以保障解决那些促使英国承认中国的問題。英国統治集团并不打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

英国的某些集团違反英国首相也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开始怀疑台灣島的地位。1950年5月，英国外交部声称，台灣在法律上仍然是日本的一部分領土，并且所謂"国民政府"，也就是蔣介石集团，具有"最高权限"作为占領該島的交战团体管理該島。②

1950年春，英国当局限制中国人在香港和大陆之間的来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抗議英国当局的这种行为，并强調指出这无論如何不能促进中英关系的改善。③

①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I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New York, 1956, p. 402.

②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50, № 2, 1956, p. 415—416.

③ 1950年5月10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和胡阶森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談判陷入了死胡同，并被中断。

美国政府和支持它的西方国家政府在联合国采取了公开敌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場。它們的代表頑固地阻撓人民中国加入联合国，并阻撓把誰也不能代表的蔣介石分子驅逐出联合国机关。

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不久，中国政府决定派遣自己的代表去联合国，以便作为安全理事会五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这一国际組織的活动中作出自己的貢献，維护世界和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于 1949 年 11 月 15 日通知联合国秘书长：中央人民政府业已基本上解放了全中国的土地，且已得到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拥护；而国民党政府則已流亡潰散，因此它已丧失了在这一国际組織中代表中国的任何根据。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拍給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的电报中表明：它拒絕承认蔣介石匪帮的代表团有权代表中国人民。①

年輕的人民共和国在自己对外政策活动的各个方面經常感受到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友好支持，在自己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方面也得到了这种支持。苏联代表在 1949 年 11 月 25 日联大政治委員会上发言时，声明不承认蔣介石代表团的代表資格，并要求邀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烏克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团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但是美国及其盟国无視国际法，阻撓这种合法要求的实現。

尽管如此，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現于国际舞台，仍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在苏共中央委員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时打給中国共

① 参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 1 集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85—87 頁。

产党中央委員会的賀电中說道："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給予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陣地以致命的打击，在巨大程度上促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中国人民革命給了殖民地国家和附屬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新的强有力的推动。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鮮明地证明着战无不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的新的胜利。在加入社会主义友好兄弟国家亲密大家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展現了建設光輝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空前前景。"①

乙、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和印度支那的国际关系

一、1945年的八月革命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期，法国在軍事和經济方面就大大地遭到削弱。日本便蓄意利用这种情况来掠夺印度支那。

1940年夏，日本政府向法国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最后通牒。貝当政府作了让步。最后，达尔朗海軍上将与日本大使于1941年7月29日在維希締結了一項协定。这項协定使日本有权在印度支那的任何地方布置自己的軍队。

日本帝国主义占領了印度支那的領土以后，紧跟着便夺取印度支那的經济陣地。在日本的压力之下，維希政府取消了从前的关稅制度，并从1941年7月1日起，給予印度支那所謂关稅自主，为日本商品和資本滲入印度支那开辟了广闊的可能性。

維希統治者之所以不反对日本的扩張，是因为他們害怕日益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更甚于害怕这种扩張。他們希望即使在日本滲入印度支那之

① 1961年第8期《新华月报》第5頁。

后，他們还能在那里保持某些陣地。貝当在1940年9月告居住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民书中写道："經过深思熟虑以后，我委托我的政府同日本开始談判，談判应保持我們的基本权利，不容許因为印度支那而发生冲突。"①

但是日本蓄意完全占領印度支那。在1945年3月9日晚上至3月10日，法国軍队被解除武装并拘留起来，而整个印度支那的法国行政当局被推翻。印度支那即被掌握在日本侵略者手中。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还披着反对殖民主义的外衣。1945年3月10日，日本宣布"結束"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撾的殖民制度。在推翻了法国在越南的行政当局之后，紧接着便成立了由亲日分子組成的政府。保大皇帝及其傀儡政府，串演日本的把戏，公布了一項关于廢除同法国签訂的規定了保护制的条約，以及关于越南"恢复独立"的文告。公告的起草人宣布越南为"大东亚"的一个組成部分，并表示决心同日本合作。

駐扎有六万軍队在印度支那的法国司令部，实际上对于日本3月9日的变革未經任何抵抗便投降了。維希分子宁願把印度支那殖民地交到日本帝国主义手中，也不願意让民族解放运动取得胜利。当时充任印度支那总督的德古海軍上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实际上我們不应当从日本手中夺回印度支那，而应当是从印度支那人自己手中夺回印度支那……"②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印度支那人自己手中夺回印度支那"的这項任务，对于帝国主义来說是力不胜任的。

越南的工人阶級是越南人民解放斗爭的先鋒队。越南的工人阶級虽然年輕而且为数甚少，但它还是表現出自己是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

---

① «Témoignages et documents français relatifs à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au Vietnam», part IV, Hanoi, 1955, p. 33.

② Admiral *Decoux*. A la barre de l'Indochine. Paris, 1949, p. 336.

1941年3月，由越南共产党倡議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越盟）。这是团結了国內各种爱国力量的民族統一战綫。早在战爭开始以前几年，印度支那的共产党在喚起群众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同时，就沒有忽視来自日本帝国主义的危險。

在日本占領了印度支那以后，共产党便起来反对日本走狗散布的好像日本会給印度支那人民带来独立和自由的幻想。共产党是在越南唯一組織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反抗的力量。在1940—1941年，越南的爱国者組織了一系列武装斗爭来反对日本的占領，但它們都被日本軍队和法国軍队的联合力量鎮压下去了。

日本黷武主义者于1945年3月9日实現了政变，在这以后，印度支那共产党及其領导下的民族統一战綫越盟便开展了广泛的动員工作，动員群众进行反对印度支那人民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斗爭。共产党中央委員会作为刻不容緩的任务提出了以下各点：成立越南解放軍；組織革命軍事委員会，它的使命是准备和进行起义；成立地方的和全越南的人民革命委員会作为临时的革命政权机关。

从1945年3月到8月，越南爱国者扩大和建立了一些新的游击队基地。分散的游击队汇合成为越南的解放軍。在解放軍或游击队控制的地区，成立了人民革命委員会，而在淪陷区則成立了解放委員会，它实际上是政权机关和准备人民起义的机关。1945年6月，成立了包括北越六个省的辽闊的解放区。

1945年8月13日至15日，在解放区举行了全越共产党会議，会議决定在“打倒侵略者！”、“爭取完全的独立！”、“建立人民政权！”的口号下掀起全民起义。① 8月16日至17日举行的、有越南各族人民、各阶級和各政党的代表参加的越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意

① «Разобьем оковы». Документы Августов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945 года во Вьетнаме. Перев. с франц. М., 1960, стр. 66.

了共产党和越盟中央委員会关于立即开始起义的建議，选举了以胡志明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員会，并賦予委員会以越南临时政府的职权。

在全国范圍展开了武装示威，在示威过程中，地方政权由日本傀儡的手中轉入了人民代表之手。为了避免过多的流血，解放軍沒有到处使用暴力让已經投降日本的軍队繳械，也沒有在日軍遵守中立和不阻碍建立人民政权的地方发动进攻。

1948年8月17日至18日在河內举行的大規模示威发展成为人民起义。人民胜利了。8月19日傀儡政府被消灭。越南民族解放委員会掌握了政权。

北方，即工业最为发达、工人阶級人数最多和最有組織性的地区，是革命起义的先声。革命浪潮很快就从北方扩展到南方。在西貢，8月23日举行了将近有一百万人参加的强大示威。成立了人民政权机关——行政委員会；它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南越。

面对着已經取得胜利的革命和傀儡政权的彻底崩溃，保大皇帝于1945年8月25日签署了宣告退位书。临时政府首脑胡志明于1945年9月2日在河內五十万人大会上宣讀了独立宣言。在印度支那半島上出現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即越南民主共和国。反对法国殖民者、而后又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长期頑强的斗爭，便以越南人民的胜利而告終。殖民制度被消灭，君主制度也同它一起被埋葬了。

1945年10月12日，老撾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同日，它宣布了老撾的独立。1945年8月，柬埔寨人民也奋起为祖国的独立而进行武装斗爭。

八月革命之后，在越南开展了建設新的民主国家的工作。

1946年1月6日，在越南全境举行了立法机关即国民大会的选举。参

加选举的有90%以上的选民，他們絕大多数都投票选举越盟的候选人。在1946年3月6日国民会議第一次会議上，成立了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1946年11月8日，国民会議第二次会議通过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宪法，宪法写下了越南人民的历史成果。

越南人民共和国从它誕生的时候起，就宣布爭取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間友好的斗爭，是它对外政策的基础。1945年10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特别公报中說道："越南民主共和国决心实現与我国完全独立的状况相吻合的对外政策……越南民主共和国眞誠希望根据平等互利原則，为了建立全世界持久和平，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和合作。"①

越南民主共和国共产党和政府在八月革命以后着手进行了广泛的社会改造，以消灭农业方面的中世紀殘余，爭取經济高漲，提高人民群众的福利和文化水平。越南人民不得不在反对帝国主义的艰巨而持久的斗爭条件下来执行这些新任务，因为帝国主义企图凭借武力在越南和印度支那其他国家恢复殖民制度。

二、法国对印度支那的干涉

法国战后对印度支那的政策在法国临时政府1945年3月24日的特别宣言中表述出来了。宣言在"印度支那联邦"的名义下恢复了殖民主义者在上一世紀建立的"印度支那联邦"。越南有三个分散的部分——交趾支那、安南和东京参加了"印度支那联邦"。"印度支那联邦"被宣布为"法兰西联邦"的一部分，它在国外的利益应由法国来代表。②

在"法兰西联邦"的幌子下，实际上是掩盖着旧的殖民綱領及其一切特点，即总督的无限制的权力，印度支那各国的强力的联

①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ьетнам. 1945—1960». М., 1960, стр. 232.

② *Ch. de Gaulle.* Memoirs de guerre. Le salut 1944—1946. Paris, 1960, p. 459.

邦，印度支那最大和最发达的国家——越南——的肢解。

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不久，法国帝国主义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献媚或直接支持的情况下，企图恢复它在印度支那的业已丧失了的陣地。在这方面首先来帮助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是英国帝国主义者，因为他們担忧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的命运，幷且热中于鎮压这一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

1945年9月，英国軍队和国民党軍队带着使日軍繳械幷将其遣返回国的有限使命进入印度支那。英国軍队駐扎在北緯十六度以南，国民党軍队駐扎在北緯十六度以北。9月12日，第一批法国部队与英国軍队一同进入西貢。駐印度支那的英軍总司令格雷西将軍随后就武装了被日本当局拘留的法国士兵。在英国的帮助下，就这样建立了在印度支那的法国远征軍的基础；1945年底，其人数已达三万五千人。

1945年9月到达西貢的法国临时政府首任代表塞弟上校，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采取了坚决反对的立場。

塞弟是带着建立一个听从法国殖民主义者指揮的政府的計划和复辟殖民制度的綱領来到越南的。他将这一綱領提交南部①执行委員会，該委員会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名义管理南越。南部执行委員会主張同法国合作，但坚决反对不能作为合作的基础的殖民綱領。

法軍支队依靠着英軍和日軍的支持，着手消灭人民政权机关。在9月22日晚上到23日，他們占領了警察局、保安署、国庫以及西貢的其他行政和社会机关。

在西貢恢复了法国殖民行政机构。南部执行委員会被迫离开城市，幷将自己的活动轉向特罗斯尼克（按音譯。——譯者）流域和金甌角的农村地区，后来在那里建立了反抗干涉者的强大基地。

正如1945年10月8日的英法声明所表明的，英国政府不仅急于承认法国在西貢的权力，而且急于承认它在印度支那全境的

① 南部是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越南名称。

权力。[1] 英国給了法国在南越站稳脚跟的机会之后，便于1946年初从印度支那撤出了自己的軍队。

1946年初，法軍占領了南越一些主要的城市。远征軍总司令勒克萊克将軍走着他的前任在上一世紀后五十年所走的老路。他企图在交趾支那（越南南部）巩固下来，并把它变成再度占領整个印度支那的基地。

日本失敗之后，法国殖民主义在印度支那又有了一个新的竞爭者，即美国帝国主义，它蓄意阻止法国重回印度支那。同时美国統治集团企图在輿論面前把自己的計划說成是对印度支那人民命运的关怀。当时曾任美国駐維希政府大使的李海海軍上将，与文职的外交官和政治活动家不同，他比較露骨地道出了华盛頓对印度支那的企图。他在回忆录中叙述1941年7月就日本滲入印度支那的問題同貝当和达尔朗举行的談判时写道："我于7月19日再次訪問印度支那，是为了口头轉达华盛頓关于日本方面表現出来的这种新的积极性的信件。必須直截了当地說，如果日本成为胜利者，日本人就会拿走法国人的印度支那；如果是盟国在战爭中获胜，那末我們就应当拿到印度支那。"

日本投降以后不久，各种美国代表团就常常訪問越南，如以帕蒂少校为首的战略偵察局小組，战术偵察小組以及古德逊上校的小組，根据法国《世界报》的报道，該小組制訂了在海防建立美国海空軍基地的草案。[2]

1947年9月，著名的間諜、美国壟断組織的特使布立特[3]来到印度支那。法国高級专員波拉埃拍电报給法国政府說："虽然这次旅行带有私人性质，布立特先生……对經济問題表現了特殊的兴趣。"[4]

---

① *Th. Blanchet.* La naissance de l'état assosié du Viet-Nam. Paris, 1954, p. 53.

② «Le Monde», 13—14. IV. 1947.

③ 1936—1941年，布立特曾任美国駐法大使。

④ «Cahiers internationaux», Paris, décembre 1951, № 31.

美国帝国主义者相信不可能利用民族解放运动来为它們的利益服务，便决定以北越的国民党軍队作为賭注。在它們的帮助下，边远地区的农村中的人民政权机关被消灭了。国民党的司令部要求让自己的代理人参加中央政权机关，甚至参加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民大会。但是蔣介石在这一时期已經应当想想怎样拯救自己的問題。因此，1946 年 2 月 28 日，法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之間在重庆签訂了一項关于法国軍队在北越替換国民党軍队的协定。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希望尽快調整同法国的关系，早在 1945 年底就同法国政府的代表进行了談判。为了避免冲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同意在一定的条件下加入“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經济和文化利益，但它也要求承认越南的独立和国家統一。

法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于 1946 年 3 月 6 日签訂了初步协定，該协定第一条載称：“法兰西政府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軍队和財政，并为印度支那联邦和法兰西联邦的一分子。”① 关于交趾支那（越南南部）加入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問題，法国政府有义务批准該地区的人民自己通过全民投票而通过的决議。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意法国軍队（人数不超过一万五千人）进入北越来替代中国軍队。此外还規定了所有法国軍队在五年內撤出越南。

1946年 3 月 6 日的协議仅仅由于越南人民在八月革命中取得了胜利才成为可能。不过这些协議給予越南人民的东西少于他們实际上已經取得的东西。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不得不考慮这一事实，即在东京屯有二十万蔣介石的軍队，他們不仅仅是决定离开越南，而且还同意把地盘让給法国軍队。

---

① 《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14 頁。

协議的签訂表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力图用和平方法取得越南的完全独立和恢复国家的統一，希望通过談判解决同法国的一切爭执問題。但是，正如以后的事件所表明的，对于法国政策的策划人来說，談判和协議只是为了滲入北越而玩弄的一个花招。

人民共和党党員馬克斯·安德列，即法国在楓丹白露同越南进行談判的代表团团长，在該党代表大会的一次发言中，承认同越南政府进行談判是因为法軍必須进入东京。①殖民主义者需要协議来贏得时間，来积蓄力量，以便再度夺取越南。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越南代表团还在赴法途中（应当在那里开始談判），法国駐印度支那高級专員达尙礼海軍上将便于 1946 年 6 月 1 日以片面方式宣布交趾支那为"自治共和国"。

当在楓丹白露进行談判时，法国在印度支那的行政当局和黷武主义者又采取了新的手法。

达尙礼海軍上将于 8 月 1 日召开了柬埔寨、老撾和交趾支那的具有亲法情緒分子的会議。在沒有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情况下，在这里討論了成立印度支那联邦的問題。越南代表团在楓丹白露的談判中对于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的片面行动表示了坚决的抗議。談判被中断了。

胡志明留在巴黎，并竭尽一切努力，寻找途徑来和平調整同法国的关系。經过这些努力，胡志明和法国海外領地部长馬里尤斯·莫戴于 9 月14日在巴黎签訂了越法协定，协定規定了調整經济、关稅和其它問題的临时协定（modus vivendi）。协定規定成立解决越法关系方面的爭执問題的混合委員会，并規定至迟于 1947 年 1 月恢复談判，以締結最后的一般性条約。但是殖民主义者已坚决轉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发动战爭的道路。

---

① «Правда о Вьетнаме». Перев. с франц. М., 1949, стр. 134—135.

法国高級专員駐东京的代表于1946年10月14日頒布了建立法国的关稅管制的命令。

法軍司令部利用它一手挑起的、由于关稅管制而发生的事件，在1946年11月23日向海防行政委員会提出了越南軍队三小时內撤出該城的几个区的要求。接着便对越南軍队开始了軍事行动。法国海軍的大炮开始轰击城市。結果，在海防打死了近两万和平居民。美国記者舍恩布龙写道："如果什么时候有过战爭罪行的話，那末法国人轰击海防就屬于这种罪行。"① 第二天，法国軍队完全占領了海防城和港口。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希望避免同法国断絕关系，尤其希望避免战爭。越南民主共和国国民大会常务委員会于1946年11月30日向法国国民議会提出了一項請求，即請求它作为仲裁者来解决冲突，并派遣自己的委員会去越南。12月6日胡志明主席又向法国議会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12月12日，以列昂·勃魯姆为首的社会党分子的政府接替了皮杜尔的政府。12月15日，胡志明写信給勃魯姆，建議立即組成混合机构来实現 modus vivendi（临时协定）。巴黎頑固地保持沉默，而法国黷武主义者在印度支那挑起了越来越多的事件。

从12月17日开始，法国人向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內的越南当局寻衅，而12月19日占領者采取了軍事行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号召軍队和全体越南人民坚决抵抗殖民主义者，回击法国远征軍。1946年12月20日，胡志明主席关于奋起进行全面的抵抗战爭的热情号召傳遍了整个越南："不論男女，不論老幼，不分宗教、党派、民族，只要是越南人就要起来打法国殖

① *D. Schoenbrun.* Ainsi va la France. Paris, 1957, p. 275.

民者，拯救祖国。有枪就用枪，有刀就用刀，沒有刀就用鋤鎬棍棒。人人都要出力救国打殖民者。"①

法国殖民主义者轉入了在越南进行的侵略战爭的新阶段，即从积蓄軍事力量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利用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談判来加以掩护的），轉入公开的軍事行动。这时战爭已扩大到印度支那全境，因为早在1945年10月，法国人就开始了再次夺取柬埔寨的攻势，而从1946年春天起开始侵略老撾。

法国統治集团費了不少力气来推卸它在印度支那发动殖民战爭的責任。但是事实和文件都充分揭穿了它們是这一骯髒的战爭的主謀者和組織者。

例如法国的一个部长莫戴在国民議会被迫承认由越南当局截获的法国司令部1946年4月10日的秘密文告，在这一文件中发出了在越南策划政变的具体指示。②任远征軍司令幷代理法国駐印度支那高級专員的瓦呂伊将軍，于1946年11月21日打电报給駐海防法軍司令德貝上校，电文中說道："我认为有必要利用事件来改善我們在海防的地位。"③議員曼涅在国民議会宣布說，在着手轰击海防以前，印度支那的法国当局請示了皮杜尔总理幷得到了他的許可。④由于事先取得了皮杜尔的支持，瓦呂伊便向海防另拍了一封电报。在海防"改善地位"已經不能使他感到滿足。在11月22日深夜，他打电报給德貝斯說："給越南人以严酷教訓的时刻已經来到了。我們应采取一切我們所能采取的手段来成为海防的完全的主人，幷使越南政府和軍队有所悔悟。"⑤

① 《胡志明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0頁。

② «Annal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Débats. Session de 1947, vol. 3. Paris,1947, p. 871—872.

③ «Journal officiel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Débats parlementaires, Assemblée Nationale». Paris, 1953, № 73, p. 4542.

④ «Débat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Session de 1954, vol. 25. Paris, 1956, p. 40.

⑤ «Débat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Session de 1953, vol. 18. Paris, 1955, p. 4542.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后来一再努力制止流血战爭。1946年12月19日的事件以后，它几次向法国政府提出这种建議。但是法国統治者始終加以拒絕。1947年5月曾經与胡志明会晤过的、远征軍司令的政治顧問保罗·謬教授在这方面的供认是很說明問題的。他写道："作为答复(指答复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信件。——作者)由我轉交的通知，并不是我方的建議，而是予以接受就等于彻底投降的条件清单。"①越南民主共和国当然拒絕了投降的要求，但继續表示願意在业已签訂的法越协定的基础上，用和平方法解决冲突。

法国統治集团不願进行談判。它們希望消灭越南的人民政权，再度征服印度支那。法国的政府更換了，法国駐印度支那的司令和官員更換了，但进行侵略战爭的政策却始終未变。法国政府的整个战后政策都打上了天主教政党即人民共和党的烙印。人民共和党首脑的殖民政策也受到法国右翼社会党人的支持。

法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在印度支那进行殖民战爭。它領导着法国人民为停止在印度支那的軍事行动，为爭取在尊重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和平調整法国和越南之間的关系而进行斗爭。②

由于遇到人民的英勇反抗，殖民主义者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手腕来分裂越南人民。为此目的，1948年5月在西貢成立了"中央"傀儡政府。法国总統樊尚·阿里奧尔于1949年3月8日同逃亡的安南皇帝保大签訂了关于承认越南"独立"的协定。1949年4月，保大作为"国家元首"而重新被扶上王位。1949年7月19日，法国宣布承认老撾的"独立"，同年11月8日，承认柬埔寨的"独立"。

此后不久，法国殖民主义者及其美国保护人就相信扶植傀儡

① *P. Mus.* Viet-Nam. Sociologie d'une guerre. Paris, 1952, p. 366.

② 参見Резолюция ЦК ФКП от 19 марта 1947 г. в «L'Humanité», 20. III. 1947。

政权和宣布印度支那各国虚假的独立，并不能削弱各国人民爭取眞正的独立和自由的意志。越南人民的团結每年每月都在加强，他們的反抗日益增长。

中国人民的革命，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对越南人民解放斗爭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由于从中国大陆驅逐了帝国主义者，这便粉碎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敌对的包圍。越南有机会开始直接同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联系。1950 年 1 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同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越南开始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貿易。这一切情况給了越南人民新的力量，并鼓舞爱国者在民族解放战爭中以及建設新的自由生活的事业中建立新的功勋。

丙、1945—1949 年国际关系中的朝鮮

一、苏联为民主解决朝鮮問題所作的努力。美国政府分裂朝鮮和控制南朝鮮的方針

日本帝国主义的被粉碎、苏軍的进入中国东北及其开往朝鮮边境，便利了朝鮮人民几十年来英勇进行的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开辟了在朝鮮国內实現早已成熟的社会改造的前景。但是即使在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下，朝鮮人民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还是面临着不少的严重考驗。

朝鮮的富源及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早就使帝国主义强盜、特别是使美国和日本眼馋。因此在日本軍国主义战败以后，美国統治集团便急于取代它的地位并在朝鮮长期立足，是很自然的。为此目的，美国外交对当时在美国的李承晚集团下了主要的賭注。

杜魯門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反希特勒联盟各国首脑的德

黑兰会議上，美国建議宣布朝鮮“独立”，并建立对它的国际托管。一年半以后，在克里米亚会議上，美国代表团把自己的建議更明确了一步，着重指出，朝鮮应由美国、苏联和中国政府来进行托管，并且它至少要等二十年至三十年才能取得独立。① 这一来，美国在罗斯福、丘吉尔和蔣介石的开罗宣言中硬塞进“……在相当期間，使朝鮮自由独立”这一句② 的眞实用意何在，也就沒有什么疑問了。

在战爭将近結束时，国务院坚持要由美軍占領整个朝鮮。但是当美軍还呆在太平洋的島屿上的时候，苏軍已經解放了北朝鮮，而且在朝鮮本土已掀起了由民主力量領导的反日起义。于是便开辟了一种沒有美国参加而解放朝鮮并成立民主政府的前途。当时，按照三八綫来划分朝鮮的主意也已提出来了。正如消息灵通的美国記者約翰·根室所证明的，这个建議是在日本投降前夕就由美国国务院、陆軍部、海軍部协作委員会制訂出来的。③

关于三八綫的建議，在反希特勒联盟的領导国之間达成了协議，并且載入了关于日本投降的所謂《第一号总命令》之中。④ 同时，規定将朝鮮划分为苏軍負責的区域和美軍負責的区域，这純粹只是为了接受日軍投降，而不应当搞成对朝鮮的政治上或經济上的分裂。

在苏軍的援助下掙脫了日本帝国主义四十年的压迫的朝鮮人民，一致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改造。一切进步力量为了解决这些任务都团結在工人阶級及其政党的周圍。到处都产生了民主的政权机关——人民委員会。

---

①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I, p. 316, 317.

② 《国际条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07 頁。

③ *J. Gunther*. The Riddle of MacArthur. Japan, Korea and the Far East. New York, 1950, p. 178.

④ 《1941—1945 年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苏联部长会議主席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2 卷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63、267 頁。

但是在南朝鮮，日本投降后立即就在那里登陆的美軍的司令部，不承认由居民成立的人民委員会，并且恢复了日本占領时期建立的殖民行政机构。美国当局一方面支持地主、大資产阶級和高級官員，一方面阻碍民主組織进行活动。1945 年 10 月，李承晚被送到汉城，美国指定他作为朝鮮的独裁者。美国壟断資本家要利用对南朝鮮的占領来夺取对其工业及其它国民經济部門的控制。

美国立脚南部之后，并沒有放棄在全朝鮮扩張势力的打算。它把“建立全朝鮮的統一行政机关，以便随后建立独立的朝鮮政府”① 这样的条款，提上了莫斯科外长会議的議程。

在国务卿貝尔納斯所提出的协議草案中，对賦予朝鮮眞正的独立則只字未提。再次又談到对朝鮮建立国际托管，并由美国、英国、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以及苏联的代表組成特别的行政机关，以联合国名义进行活动。这种机关应当通过高級专員和执行会議在朝鮮实現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美国的建議沒有規定成立托管时期的朝鮮政府，而托管期限可以延长到十年。②

苏联政府不反对盟国对朝鮮进行临时托管，但是提出了原則上不同的协定草案，該草案后来經过不多的修改后由会議通过。③ 协定的实质在于組成有权管理全国的全朝鮮的临时民主政府。規定設立由北朝鮮的苏軍司令部代表和南朝鮮的美軍司令部代表組成的联合委員会，以便通过同朝鮮各民主党派和組織的协商，促成上述政府的早日成立。托管以五年为期。

莫斯科协定在 1945 年的情况下，是符合于人民利益和远东和平之巩固的一种解决朝鮮問題的最适当的方法。美国被迫同意了

---

①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I, p. 318.

②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ко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окументы).М., 1948, стр. 8—12.

③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5 год», стр. 160—161.

苏联的草案，但它并不放棄自己对朝鮮的計划。

在汉城和南朝鮮其他地区的美国司令部的支持下，朝鮮的反动分子組織了反对莫斯科协定的示威，居民被武力赶去参加。①右翼政客攻击托管原則，硬說它是違反美国意志而由苏联倡議通过的。实际是那种基于同朝鮮两部分的民主政党和团体进行协商而組成統一政府的条件，不适合它們的要求。

美方拒絕建立朝鮮两部分之間的正常关系，特别是反对向北朝鮮供应粮食，而北朝鮮經常是从南部的农业地区得到供应的。苏联在 1946 年 1 月召开的会議上就这一問題提出的建議，遭到美国司令部代表的拒絕。

但是美国的阴謀和南朝鮮反动派的挑衅，并沒有使朝鮮人民誤入迷途。1946 年 1 月25日塔斯社发表的报道对此起了一定的作用，在这一报道中叙述了莫斯科談判的过程，并揭露了美国在托管朝鮮的問題上的眞实立場。②

朝鮮两部分的进步力量都热烈欢迎关于成立临时民主政府的决定，并声明願意在莫斯科协定的基础上同苏联和美国进行合作。它們的这种态度为苏軍司令部代表和美軍司令部代表組成的联合委員会的召开提供了便利条件，該委員会于 1946 年 3 月 20 日在汉城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以促成全朝鮮政府的成立。

南朝鮮的反动分子，形式上表示願意根据莫斯科协定进行协商，实际上則继續反对民主政府的成立。而美国代表頑固地要求把反动集团认作为民主的集团，并且决定了全朝鮮政府的人員。委員会瘫痪了；1946 年 5 月 8 日，由于美国的坚持，委員会会議被中断，并且沒有指明复会的期限。

在北部为解决人民所面临的任务而成立的人民委員会所取得的成就，使美国的政客感到惊慌。訪問北朝鮮的經济代表团团长

① 参見 *Ф. И. Шабшина*. Очерк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Кореи. 1945—1953 гг. М., 1958, стр. 75。

② 参見《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ко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тр. 8—12。

鮑萊，在1946年6月22日写信給杜魯門总統說，在朝鮮"正进行着一种考驗：是一种自由竞爭的民主制度来取代业已遭到失敗的封建制度呢，还是其他某种制度，換言之即共产主义制度显得更为强大"。在指出北朝鮮的前日本壟断組織的財产轉入人民政权手中的重大意义时，鮑萊要求美国对日本的企业进行控制，"一直到民主的(应讀作"資本主义的"。——作者)管理方式有所保障"①。

美国統治集团口头上表示願意遵循莫斯科协定，实际上它們所提出的条件却是違反其实质的。美国政府在1946—1947年經其倡議在駐朝鮮的美軍司令和苏軍司令之間开始的来往信件中，正是采取了这种策略。

霍季將軍指責苏联片面解釋莫斯科协定，要求吸收反对这一协定的南朝鮮的反动集团来进行协商。苏軍司令继續坚持已經經过协商的民主原則。②

北朝鮮进行民主改造的成就，声势浩大的对南部的美軍司令部的反动政策的抗議(这种抗議在1946年底已发展成为反对占領者的武裝起义)，以及朝鮮人关于根据莫斯科协定尽速組成政府的一致要求——这一切都迫使美国政府为了掩飾自己的計划而在1947年5月21日恢复联合委員会的談判。但是，符合朝鮮人民利益的苏联建議，始終遭到美国代表的拒絕。美国的帝国主义力量采取了分裂朝鮮幷在南部建立資产阶級和地主的国家的方針，而这种国家本来是要成为消灭北朝鮮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桥头堡。

从1946年开始，美軍司令部便吸收右派集团的代表来"管理"

① 引自《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I, p. 321, 322。

② 参見1946年10月31日和12月19日《眞理报》；1947年3月12日《眞理报》，以及《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VIII (July 1945-December 1946), p. 838—842。

南朝鮮。1946年8月，設立了所謂朝鮮民事行政机关，而后又組成了南朝鮮临时立法議会，其成員中有一半系由美国当局任命，其决議由美国軍政长官批准。①

1947年初，李承晚被召赴美，他在美国会見了国务院的重要官員和实业界的显要人物。他从华盛頓打电报到汉城，在电报中肯定，"南方与北方統一的道路要通过南朝鮮单独政府的成立"，并且"美国当局同意这一意見"。李承晚回国以后，便宣布华盛頓願意提供六亿美元的貸款給南朝鮮的"独立政府"，只要它由右派活动家組成。②

1947年8月26日，美国国务院向苏联政府建議，让朝鮮按照两区的人口比例，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临时立法議会的选举，以便由立法議会来成立全朝鮮政府。③这一建議是在8月11日至15日的事件后提出的，經过該事件后，正如《密勒士評論报》記者休·迪安所证实的，几乎所有的左派的組織都轉入地下，而右派集团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它們宣布成立反共产主义的政府是自己的任务。在美国占領、李承晚的恐怖以及联合国的亲美代表监督"选举"的情况下，极反动的分子不可能不取得絕对多数，他們将在立法議会中充当头目，因为他們将"代表"居住了半数以上的朝鮮居民的南部地区。

苏联不能接受美国的这种方案，但是为了迁就它們的願望，苏联主張由全朝鮮各政党和团体的代表組成临时的全朝鮮的人民会議，以便同这一机关协商成立政府的問題。④这一决定同莫斯科协

① 参見《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доклада Врем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ООН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Корее》, т. 1. Нью-Йорк, 1948, стр. 14—15。

② 参見《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1945—1949 гг. 》, М., 1958, стр. 211。

③ 参見《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ко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тр. 46。

④ 参見同上书第49—50頁。

定的文字和精神是完全符合的，但是甚至还沒有对它进行实质的討論，副国务卿罗維特便于 9 月17日通知苏联政府，将朝鮮問題提交联合国大会討論，这就等于拒絕在莫斯科协定的基础上进行談判。①

苏联政府认为，不应当通过新的决議，而应当实現已經通过的决議，尤其是根据宪章的規定，联合国大会无权討論与战后安排有关的問題。② 但是由于美国实际上拒絕在莫斯科协定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便应当授权朝鮮人民自己組成自己的政府，而不受外来的干涉。

这种决定只有在外国軍队迅速撤出朝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苏联代表 1947 年 9 月 26日在联合委員会也提出了这种建議。③

美国拒絕了苏联的建議，于是苏美联合委員会于 1947 年 10 月 20 日停止了自己的活动。

关于美国拒絕撤出軍队的动机，美国《紐約先驅論坛报》作出了某种程度的解釋，这家报紙指出，反美力量"可能会在全朝鮮正当的选举中取得彻底胜利"。十分突出的是，反人民的李承晚集团的抗議声比誰都要大，它們說美軍的撤离会使它們不再能控制南朝鮮。

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届会議上，美国提出了关于朝鮮問題的决議草案，草案再次提出了关于在联合国监督下选举全朝鮮議会的建議。撤出外国軍队只是規定在組成全朝鮮政府后的不确定的未来。④

---

①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X (January 1—December 31, 1947), Princeton, 1949, p. 119.

② 参見«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ко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тр. 52—55。

③ 参見同上书第 61—62 頁。

④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X (January 1—December 31, 1947), p. 122, 123.

苏联为了制止对朝鲜人民內政的干涉，提出了两个决議草案，即关于邀請朝鲜代表参加朝鲜問題的討論以及关于苏軍和美軍同时撤出朝鲜以便使人民自由地組成政府的决議草案。① 美国不敢公开反对苏联草案，它提出了关于成立联合国委員会的"修正案"，据說委員会是为了要使"朝鲜代表眞正是朝鲜人民应当选举的人"而进行监督。

修正案以及关于在这一委員会的监督下进行国民議会的选举的美国提案，于 1947 年 11 月 14 日被通过，撤出軍队被否决。

联合国大会的这些决議破坏了朝鲜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是对他們內政的干涉。决議旨在反对朝鲜的民主发展，旨在为了迎合美国帝国主义而使朝鲜分裂。因此苏联政府譴責这些决議，并拒絕承认联合国关于朝鲜問題的委員会。

二、北朝鮮和南朝鮮社会政治方面的发展。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在朝鲜北部解放后两年的期間，国內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进展，經过反封建和反殖民主义的革命，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1945年 8 月間在各地成立的人民委員会，变成了以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員会为首的人民政权机关的体系。按其性质来說，这是由工人阶級領导的、人民的革命专政。在反对封建主和买办的尖銳斗爭中，进步力量团結起来了，并于 1946 年产生了北朝鲜的祖国統一民主主义战綫，这个統一战綫包括所有的民主党派和团体。北朝鲜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劳动党是这个統一战綫中的主导力量，它是在同一年由共产党和新民党合并后产生的。1946 年 11 月，在人民委員会的选举中，祖国統一民主主义战綫的候选人得到

① 参見《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доклада Врем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ООН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Корее》, т. 1, стр. 7。

了 97% 的票数。

人民政权依靠着广大群众，于1946—1947年实行了根本改变北朝鲜的阶級力量对比的改造。1946年进行的土地改革消灭了乡村中的半封建剝削，并使一百万町步①的耕地归农民所有。屬于日本国有或屬于日本資本家和朝鮮人民的叛徒的工业企业，都被收归国有并成为全民財产，从而打下了发展經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基础。人民政权在改善劳动人民的状况、組織教育、保健工作以及繁荣民族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因此，在北部形成了一个人民民主国家，由于其发展的自然規律，它具有进一步逐漸变化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前提。

南朝鮮却走着另外一条发展道路。在这里也有革命的局势，在这里，于1946年形成民主主义民族战綫的民主力量也要求进行北部已經实現了的改革。民主主义民族战綫的綱領在南朝鮮的劳动人民中間享有很大的威信。但是南方与北朝鮮相比，是落后得多的农业地区，封建买办反动势力的影响要大得多。尽管如此，正如1946—1947年工人和农民的革命行动所表明的，如果沒有美国司令部的直接干涉，地主和大資产阶級就不可能在这里巩固地执政。

1948年1月8日，联合国临时委員会（它是由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薩尔瓦多、叙利亚、菲律宾、法国和国民党的代表組成）来到朝鮮。在它到达汉城的那一天，許多企业的职工都举行罢工。南朝鮮各民主党派于1月10日抗議联合国干涉朝鮮內政，并抗議分裂的威胁。

委員会的許多委員不顧所謂联合国大会临时委員会的"諮詢意見"，认为不可能仅仅在南部进行选举。澳大利亚代表声明不同意进行单独的选举，因为除了极右翼的政党以外，朝鮮所有的政党和政治集团都反对这种

① 一町步＝0.99公頃。

选举。委員会中的加拿大代表支持这种观点。叙利亚代表則表示，“如果南朝鮮的局面将发生变化，使自由选举有所保障时”，他就主張进行选举。但是在美国司令部的压力下，委員会以四票贊成、二票反对、二票棄权而通过了对南朝鮮的“国民議会”的选举进行监督的可耻的决議。①

1948年5月10日，在空前恐怖和美軍公开示威的情况下演出了选举的丑剧。大多数居民在民主党派的号召下都抵制选举。1948年8月12日，“国民議会”批准了大韓民国（其政府由李承晚領导的、单独的南朝鮮国家的称呼）的宪法。

由于美国的“表决机器”的作用，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議于1948年12月12日通过了一項决議，承认李承晚政府为“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政府”②。美国还沒有等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議，便同李承晚政府签訂了一系列协定，其目的是在法律上規定美国在南朝鮮的統治。例如，在1948年8月24日签訂的行政协定中規定，美国将继續有組織地訓练和装备大韓民国的武装力量，甚至在“管理”南朝鮮的权力交給李承晚政府以后，美国司令仍有权对大韓民国的“保安力量”进行一般的业务上的监督等等。南朝鮮的反动派并不掩飾自己要消灭北朝鮮的人民民主制度的阴謀，并且在这方面得到美国的全面支持。

但朝鮮的进步輿論主張成立統一的、独立和民主的朝鮮国家。早在1948年4月，在平壤召开的南北朝鮮各党派和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議便曾向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呼吁，要求它們促进朝鮮的統一，并撤出自己的軍队。③ 当苏联政府在1948年5月7日重申

---

① 参見《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доклада Време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ООН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Корее》, т. 1, стр. 34—36。

② 参見《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Годовой доклад секретаря о работ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 1 по 30 июля 1949 г.》, Нью-Йорк, 1949, стр. 38。

③ 参見 *Ф. И. Шабшина.* Очерк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Кореи 1945—1953 гг., стр. 144, 145。

了从朝鮮撤出軍队的决心时，美国却对朝鮮人民的代表的呼吁置之不理。尽管朝鮮的民主輿論和苏联都作了努力，还是未能制止朝鮮的分裂。对这种历史上的非正义之举、对朝鮮民族的四分五裂、而远东的和平和安全遭到严重損害的情况，应由南朝鮮的反动派和在南朝鮮制造单独国家的美国帝国主义負完全責任。

朝鮮人民的利益要求用民主的朝鮮国家来同南部所建立的地主資产阶級的国家相对立，因为它会遵循民族政策，会有能力来捍卫独立和朝鮮人民取得的人民民主的成果。

根据劳动党的倡議，1948年6月29日至7月5日在平壤举行了第二次南北朝鮮各党派和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議。会議通过了关于举行最高人民会議的选举以組成民主的朝鮮政府的决議。

根据这一决議选举产生的最高人民会議，在第一次会議期間（1948年9月2日至11日）便批准了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并选举了以劳动党領袖金日成为首的政府。朝鮮人民多年来为之斗爭的民主的独立国家的成立，由这些行动在法律上固定下来了。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吸引朝鮮人民的一切进步力量的中心。只有随着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第一次出現了这样的朝鮮国家，它遵循劳动人民的意志并維护他們的利益，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它为使"朝鮮人民成为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① 而进行斗爭。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其对外政策上，遵循着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样的对外政策原則。

在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鮮劳动党的綱領性文件中加以規定的这些原則，可归納为以下几点：

①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48年9月10日的宣言》，見1948年9月13日《眞理报》。

(1) 同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的一切国家間的牢不可破的友誼和合作；

(2) 承认和平共处是不同社会政治制度国家間关系的基础；

(3) 坚决維护世界和平事业，而首先是維护亚洲的和平事业；

(4) 为爭取朝鮮人民的民族利益，反对保持和恢复对朝鮮的任何形式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剝削，为爭取使朝鮮和平統一为民主的、独立的、爱好和平的国家而斗爭。

最高人民会議致苏联和美国政府的关于立即和同时撤出两国軍队的呼吁书，是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对外政策文件，其中論及撤軍时說"因为这对于朝鮮的統一、它的經济、政治和文化的复兴和进步以及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的建立是首要和不可缺少的条件"①。

苏联最高苏維埃主席团 1948 年 9 月 18 日表示願意滿足这一要求，并在 1948 年年底以前結束苏軍的撤退工作。② 美国拒絕朝鮮人民的正义要求，继續占領南朝鮮。尽管如此，苏联还是在12月25日以前結束了从北朝鮮撤出軍队的工作。

年輕的朝鮮国家在它开始成立的时候起，便依靠着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般的支持。1948 年 10 月，在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之間建立了外交关系。1948—1950 年，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和經济及文化方面的联系。

1949年 3 月 17 日同苏联签訂的經济和文化合作协定，是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对外关系条約。③ 同时还签訂了关于貿易和支付的协定、关于向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信貸

---

① 参見《朝鮮問題文件汇編》第 1 集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3 頁。

② 同上书第 94 頁。

③ 参見《国际条約集(1948—1949)》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7 頁。

以偿付苏联商品的协定，以及給朝鮮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苏联同朝鮮的貿易額从1947年的一亿四千八百万卢布增长到1950年的七亿卢布。① 苏联的兄弟般的援助促进了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經济的极大高漲，而这是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和使北朝鮮变成全体朝鮮人民独立的支柱的重要条件。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承认李承晚的国家为全体朝鮮人民的代表，而美国却是徒劳地力求从联合国取得这种承认。

1948年10月7日，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了派遣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决議，10月9日，它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主席在討論朝鮮問題时傾听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者的意見。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事先声明：沒有朝鮮人民眞正的代表出席而通过的任何决議，它都认为是无效的。

为了爭取解决朝鮮人民主要的民族任务，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貫爭取国家的統一。这种努力得到南北朝鮮一切民主团体的支持，它們在1949年組成了朝鮮祖国統一民主主义战綫，以便制止分裂，使国家重新得到統一。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宣布成立，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它使殖民主义遭到又一次打击，使帝国主义陣綫又来了一次决口。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它过去和現在都在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体系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貢献，成为爭取远东和平和安全的斗爭的积极参加者。

---

① 参見«Корейская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М., 1954, стр. 349。

第 八 章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国家間新型的經济和政治关系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的胜利，随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現，产生了与新的社会制度的性质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关系。随着这一体系的巩固，新的国际关系对于整个世界政治起着日益增长的影响。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主义团結，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开始建立了符合于大多数人类的眞正利益的国家間关系。

馬克思在当时就天才地預見到了这种眞正是全人类的国际关系的基础，它将根本不同于資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基础。馬克思写道："与那个經济貧困和政治昏瞶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誕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是同样由劳动統治的！"①

一、社会主义国家間眞正的平等和同志式的互助关系的客观基础

新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国际关系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历史上的偶然性。既然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以及在全世界的胜利是合乎規律的，因此符合于社会主义本性的各国人民之間关系的胜利也是合乎規律的。这种关系是由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准备起来的，并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469頁。

且是建立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牢固基础上。

社会主义革命根本摧毁了帝国主义所固有的国家之間和民族之間的敌对矛盾的基础，摧毁了資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剝削和暴力政策的基础。

社会主义国家間关系的发展是由另外一种、与資本主义相对立的規律来决定的。这些关系中沒有一个国家統治和奴役另一些国家、一些民族統治和奴役另一些民族的打算，也沒有把整个整个的大陆变成宗主国的殖民附屬物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关系体系所固有的特点。

在資本主义世界，某一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会加深国家間的矛盾，而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它不仅不同其他所有国家的利益相矛盾，相反地还促进共同的高漲。如果說危机和震荡是資本主义經济的特点，那末世界社会主义經济則是有計划、高速度地稳步发展。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的成就，都会导致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巩固。

从前，当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时，它是一个进步的社会过程。但是在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中种下了使它走向崩溃的客观和主观的前提。必然应当有另外一种符合于全世界絕大多数居民的需要的体系，来取代世界資本主义体系。

一方面是根本上具有客观进步性的、国际間經济上相互接近的傾向，另一方面是实現这种傾向的、在資本主义条件下的掠夺方式，这两方面处在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列宁曾經指出："資本主义使民族分成了两类，一类是占少数的民族，是压迫别人的、实行大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有全权的和特权的民族，另一类是占絕对多数的民族，是被压迫的、附屬或半附屬的和沒有平等权利的民族。"① 不多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許多殖民地和附屬国之間的矛

盾，在資本主义总危机的情况下大大地加剧了。整个現代史、特别是它的战后时期，都令人信服地表明：在世界上一种强大的力量正在发展着，它从根本上摧毁着这种注定要灭亡的經济体系的基础。

生产力的发展，应当导致建立有計划地加以調整的全世界經济的前景。但是，这种正在进行的生产和交换国际化的过程所产生的傾向，不能在狹窄的資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圍內得到实現，因为資本主义所有制离間各国人民。

只有基于生产資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創造了最充分的可能性，使世界范圍內的生产力向前发展，使各国巩固的經济上的統一得以实現。正是这种生产关系，即早已在苏联取得胜利、并在战后时期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各国成功地巩固下来的这种生产关系，成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可靠基础。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优势的生产資料公有制，是新型关系的經济基础。随着社会主义成分在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經济中成为占統治地位的成分，社会主义經济規律的作用也越来越广泛地扩大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的經济联系的領域中。一种新型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較之資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工高級得多。

世界社会主义陣营范圍內的国际分工以及相互的經济合作，使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最合理和最充分地利用本国的自然資源和經济条件，来迅速发展生产力。

如果說，在資本主义条件下，冲到前面去了的国家千方百計地力图保持其他国家的落后地位，以便牺牲它們而保障本国統治阶級的最高利潤，那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則是工业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过去落后的国家，这种援助使落后的国家可以高速度地

---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頁。

发展本国的經济，縮短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間。

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經济上的互助，特别是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援助，决不損害它們的民族利益。这种援助和合作的結果，是实現各国社会主义經济的共同高漲，消灭資本主义遺留下来的各国之間經济和文化上的差别，使它們的經济发展水平趋于平衡，这样一来，便打开了它們将大致同时即在同一历史时代內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景。

因此，国家間的經济关系，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整个时期，第一次由一些国家剝削另一些国家的工具，变成为克服长期的落后、为爭取各国人民光輝的未来而共同进行斗爭的一种手段。社会主义的客观規律，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使得各国的經济越来越接近。这是社会主义各国始終不渝地实行团結的經济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为各国和各民族的全面接近創造了經济前提，而且也創造了政治前提。阶級对抗的消失，导致了民族間对抗的消除和各民族間的关系上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国际主义特点的发展。

各国劳动人民实行联盟和兄弟般团結的必要性，是由工人阶級斗爭的全部历史經驗所决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一世紀中叶所創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及发表了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口号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为国际无产阶級在爭取社会解放和进步的斗爭中联合自己的力量創立了开端。在这一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綱領性文件中指出，正像个人对个人的剝削将被消灭一样，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的剝削也将被消灭。在以后的整个时期內，馬克思主义者都为了在一国之中以及在国际范圍內联合各国以工人阶級为首的劳动人民而进行斗爭。当然，在資本主义还在世界上进行着独占統治的情况下，各国工人之間的兄弟联盟不可能超出被剝削者的阶級团結的范圍。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以后，在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結的发展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紀元。苏联所积累的順利执行列宁的民族政策的經驗，平等和自由的苏維埃各共和国相互关系的实踐，与沙皇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行为迥然不同的，苏联对待东方各国和各民族的态度，資本主义各国的劳动人民对世界上第一个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所作的援助和支持，——这一切都是无产阶級国际主义的新的鮮明表現，它們丰富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使之成为已經摆脫資本压迫的各国人民相互关系之基础的那些基本原則。

随着社会主义之超出一国范圍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在社会主义体系各国相互关系的总体中得到了体現，并且因为取得了新的、更加深刻的政治內容而丰富起来。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关系是基于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尼·謝·赫魯曉夫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为国际生活新准則鋪平了道路，为全世界树立了各国人民眞正平等和兄弟关系的榜样。"①

国际无产阶級的团結，始終是工人阶級和全体劳动人民在爭取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斗爭中的强有力的武器。这种团結在反对資本这样一种国际力量的斗爭中始終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社会主义各国結成一个統一的陣营，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兄弟般的合作和互助，乃是由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而首先是由建設社会主义和逐漸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利益所产生的最迫切的需要。

脫离資本主义的各国之所以必須在政治上紧密地团結起来，也是由这些国家为反对国际反动派的进攻，反对敌对势力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甩掉"共产主义的企图而进行共同斗爭的那些任务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7 頁。

所决定的。它是由爭取普遍和平、即爭取尽速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条件这一共同斗爭任务所决定的。

因此，社会主义各国兄弟般的团結和合作，是符合于每一个国家最高的民族利益和国际主义利益的。

随着剝削制度的崩潰，民族之間产生矛盾的基础也不复存在了。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主义和民族局限性的表現并不是自动地消失的。民族偏見和从前的民族糾紛的殘余，有时在某一国家內部和在国际舞台上还会被社会主义敌人利用来阻碍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破坏它們的团結。某一国家脫离社会主义大家庭而孤立起来，就会使它不可能利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优越性，延緩它經济上的发展，阻碍它克服国內敌对阶級殘余的反抗，有利于帝国主义利用民族主义傾向为它們的反动目的服务的企图。

苏共綱領中指出："脫离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孤立地、单干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設的方針，在理論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違背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規律。它在經济上是有害的，因为它导致社会劳动的浪費、生产增长速度的降低，而且使国家依賴于資本主义世界。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和危險的，因为它在帝国主义势力联合陣綫面前不是团結而是离間各国人民，它培植資产阶級民族主义傾向，最后会导致社会主义成果的丧失。"①

因此，忠实于馬克思列宁主义原則、忠实于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向民族局限性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一切表現进行坚决斗爭，乃是社会主义在任何一个国家取得彻底胜利的必要条件。

列宁写道："沒有平等权利的和附屬的民族对大国主义的、压迫别人的民族的不滿和不信任……已經积累了好几百年了。"② 在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8—179頁。

②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頁。

各国人民爭取社会主义的共同斗爭的过程中，这种过去的遺产正在順利地被克服。但是这一过程远不是迅速的。列宁教导說："我們主張建立自願的民族联盟，不允許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施行任何强制，而以充分信任、明确地感到亲密团結的必要和完全自願作为基础。这样的联盟是不能一下子实現的。实現这种联盟的时候，应当十分耐心和十分謹慎，不要把事情搞坏，不要引起不信任，要让几世紀以来由地主資本家的压迫引起的、由私有財产引起的以及因瓜分和重分私有財产而彼此仇視所引起的那种不信任心理自己慢慢地消失。"①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結的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各国的領导和指导力量——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間的兄弟友誼的发展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們不仅在国家方面，而且还在党的方面决定着相互关系的基本方向。在社会主义陣营的团結方面，共产党和工人党对劳动人民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思想工作具有重大作用，它可以消除过去統治阶級所散布的民族主义思想殘余。

因此，由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实质所产生的一般規律，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全体国家所固有的。苏共綱領中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各国具有同一类型的經济基础——生产資料公有制；具有同一类型的国家制度——以工人阶級为首的人民政权；具有一致的意識形态——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保卫革命成果和民族独立不受帝国主义陣营侵犯的共同利益；具有同一个偉大的目标——共产主义。这种社会經济和政治上的共同性，为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之間巩固的友好的关系創造了客观基础。"②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頁。

②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8頁。

二、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对外政策的主要规律。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

社会主义在每一个摆脱了資本主义压迫的国家面前，开辟了执行一种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有着原則性区别的新的对外政策的可能性。这一政策系有机地从新国家的本性产生的，并且完全符合于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利益，符合于和平和国际合作事业的利益。

苏共綱領中指出："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独立和主权、兄弟般的互助和合作，——这就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間关系的特征。"①

平等，尊重領土完整、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內政，乃是正式得到大多数政府承认的国际法原則。但是帝国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仅仅在口头上承认它們。对于它們来說，空談什么平等、不干涉和主权，只不过是为了掩飾它們对其他国家和人民采取的侵略和反动的行为。社会主义国家則在它們彼此之間的关系上，以及在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上，都实际运用上述原則。

但是，作为和平共处学說的基础的一般民主原則，并不能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間关系的一切方面。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兄弟般的互助、自願地把力量联合起来爭取社会主义的胜利，乃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之間关系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在社会主义陣营中，任何国家都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和特权。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以列宁的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为依据，而无产阶級国际主义意味着摆脱了剝削的各国人民在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斗爭中結成紧密的联盟，实行兄弟般的团結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8 頁。

和互助，意味着对資本主义各国群众的民主和解放运动的支持。

在社会主义各国相互关系上的对外政策活动范圍，比資本主义国家彼此关系上的这种活动范圍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这是由相应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保障着政治領域，以及經济、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紧密合作能够协調一致。除了完全体現各国人民利益的政府机关以外，劳动人民的群众性的政治和社会团体也愈来愈积极地参加了这些关系。

这一切就使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国际关系，成为眞正意义上的人民之間的关系，因此它們既在它們所表現的方式上，也在方法上反映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随着新的社会制度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得到巩固，苏联和这些国家間的友好合作也得到发展。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社会主义陣营的先鋒的一个世界大国，过去和現在在国际舞台上都特别积极地捍卫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对人民民主国家进行全面的援助和支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①

在战后的头几年，苏联对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經济援助，首先是旨在使它們迅速治好战爭的創伤，并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国民經济的基础。随着在这些国家中实現社会主义改造、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国民經济，随着新的生产部門、首先是重工业部門的产生，社会主义陣营的經济合作也扩大和加深了。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在发展社会主义經济方面的成就，使它們从双边的合作进到它們和苏联之間的多边的合作。1949 年 1 月經济互助委員会的成立就是这一方面的表現。經济互助委員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济联系的进一步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的經济合作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对外

① 参見本书第五、六、七章。

貿易、提供貸款等国家間經济来往的傳統形式以外，还产生了仅仅为社会主义的国际关系所特有的嶄新的現象。这就是：协調經济計划，以及作为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比較高級阶段的生产专业化和合作化。

紧密的經济合作和互助，又进一步提供了使整个社会主义陣营以及参加該陣营的每一个国家加快生产增长速度的可能性。因此，早在 1950 年，以社会主义各国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来說，煤为 28.2%，生铁为 18.5%，鋼为 19.2%，木材为 28.4%，电力为 14.8%。

从人民民主制度开始建立的时候起，各年輕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間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关系，結成統一的由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結、信任、兄弟般的友誼所产生的社会政治陣营。

苏联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所締結的、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締結的一系列的友好互助条約，是社会主义陣营巩固的政治团結的表現。在这些条約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各国在政治、經济和文化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合作更为加强了。

这些条約是在不同的历史情况下締結的。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同波兰人民共和国之間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签訂的，因此这些条約首先規定在反对法西斯德国的斗爭中，締約国双方相互提供軍事的及一切其他的援助。也規定了在战爭結束后共同采取措施来防止德国或直接間接和德国勾結的其他国家的再一次侵略的威胁。同时这些条約也是直接在巩固締約国之間的友好合作。

苏联同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馬尼亚之間的友好互助条約，是在 1948 年已經同这些国家签訂了和約之后締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不久出現的国际局势，即出現了德国軍国主义复活的危險这一情况，决定了这些条約的內容。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之

間的友好互助条約，也是在 1947 年至 1949 年签訂的。①

1950 年 2 月签訂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約，是对巩固远东和平和安全事业的重大貢献②。

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的友好互助条約，沒有賦予締約国任何一方以任何特权。它們不仅毫不損害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民族利益，而且相反地，完全是旨在巩固这些国家的安全，保障它們的民族独立和主权。

我們举一个条約即苏联与罗馬尼亚之間的条約作为例子。③为了維护普遍和平和安全，遵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則而巩固友好关系和保持紧密合作，苏联和罗馬尼亚之間保持符合于两国人民切身利益的睦邻关系，——这就是締約国双方的宗旨。

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重教訓，并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締約国双方承允"尽力采取一切联合行动，以消除德国或以直接或任何其他方法同德国結合的任何其他国家重新发动侵略的威胁"。同时条約規定双方参加旨在保障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的一切国际行动。

苏联同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間的、以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彼此之間的友好互助条約，按其性质和实质来說，是同帝国主义类型的条約，如战后美国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签訂的条約直接相对立的。社会主义陣营各国之間的一切友好互助条約的特点是，它們的目的都在于防止德国和日本或者以某种形式同它們勾結的国家再一次进行侵略，它們的宗旨在于維护和巩固和平。

对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說，它們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針是共同的。它們对外政策的总路綫是：为爭取和平和不同社会經

---

① 参見本书第六章。

② 参見本书第七章。

③ 条約全文可見《国际条約集（1948—1949）》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5 頁。

济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而斗爭。

当然，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每一个国家都可能产生而且正在产生自己具体的对外政策利益。例如对于罗馬尼亚和保加利亚来說，巴尔干国家的合作問題具有特殊的意义；对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說，具有特殊意义的，則是保障自己的边界不受西德軍国主义的侵犯等等。但是，无論在这些具体問題上，无論在国际关系的根本問題上，社会主义陣营的一切国家都是团結地、协調一致地共同行动。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的損害，都会使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受到損害。因此，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来維护和捍卫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要求，乃是新型国际关系的特点之一。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各国团結的巩固及其威力的迅速增长，都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进步人类在自己反对侵略战爭、爭取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的斗爭中，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看作可靠的支柱。

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的胜利，使产生战爭的資本主义規律的作用范圍急剧地縮小了。在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多年来引起各国人民之間的敌对和冲突的那些地区，已經永远堵塞了这种政策的去路。从来就是作为国际爭端的对象的、东欧各国之間的边界，已經成为不是离間各国人民，而是联合各国人民的疆界。波兰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間的边界，就是这方面的明显的例子。巴尔干国家已經不再是"火药庫"了。巴尔干半島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間的兄弟般的友誼和合作，使这一地区的国际局势有了根本的改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該国由从前作为帝国主义国家間导致远东軍事冲突的这种斗爭的目标，而变成保障普遍和平的重要因素。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不仅在世界三分之一的地区消灭

了孕育着爆发战爭的国际冲突的基础，它意味着在战爭与和平的力量对比方面发生了巨大的质的进展。继苏联之后，又有一系列捍卫和平和国际安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出現。它們之間的团結以及它們行动的一致，大大提高了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行动的效力。社会主义陣营的联合力量，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严重障碍。

早在1945—1949年，社会主义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对于帝国主义对爭取本国民族解放的各国人民的政策，以及在其他許多国际問題上的政策，都起了巨大的抑制作用。

社会主义体系已成为吸引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自然的中心。各社会主义国家从自己成立的时候起，就表示亟願为了和平、民主和进步，同一切进步力量进行合作。

社会主义各国坚决执行的和平、平等、自决、人民主权、尊重各国独立的原則，符合于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願望。眞正人民的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范例以及社会主义正直的、人道的外交范例，对資本主义世界千百万人民的头脑起了革命化的作用。

社会主义各国的对外政策，在提高資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加强了他們对国际关系領域的影响。帝国主义国家統治集团要欺騙人民群众，要背着他們去办外交大事，要違背人民利益去解决国际問題，是越来越困难了。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对外政策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資本主义各国的进步力量的发展和团結，使它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斗爭中作出了更积极的努力。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产生，使得屬于資本主义經济体系的小国和弱国有可能奉行独立的政策。如果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有这些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屬于帝国主义大国的政策的范圍，那末，現在的情况就根本改变了。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維护各国

人民的主权和独立，小国便能够胜利地对抗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拒絕参加它們的集团。在它們面前开辟了遵循中立主义政策的可能性。例如在1948年，像芬兰这样一个相当小的国家，就能够拒絕参加美国强加于它的"馬歇尔計划"。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对于經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瓦解过程的加快，并有助于摆脱了殖民主义桎梏的国家爭得政治上的独立，执行独立的政策。

反过来說，像亚非年輕的民族主义国家这样的反帝力量的出現于世界舞台，并且奉行不参加侵略性軍事集团的政策、支持和平共处原则，又有助于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国际影响的增长，使帝国主义具有的条件更加受到限制。

因此，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头几年，帝国主义的統治和从屬的政策、强国压迫弱国的政策，就遇到了强大的对抗它的因素，因此連二接三地遭到失敗。而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原则则开始得到日益增长的国际上的承认和支持。① 这些原则已成为解决1945—1949年的一系列国际問題的基础。在以后的时期，随着两种对立的体系之間的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社会主义各国大家庭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愈来愈得到巩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① 参見本书第五章。

第 三 篇

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所起作用的变化

各殖民帝国的崩溃，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亿万人民从帝国主义政治压迫下赢得解放，这是在战后世界中展开的意义最重大的过程之一。

在战前，曾經有过几个辽闊的殖民地附屬国地区。东南亚——从英屬印度到菲律宾和从越南到印度尼西亚——是其中最重要的。另一个被帝国主义压迫的辽闊而且重要的地区是包括从埃及到阿富汗等国的中近东。第三个由帝国主义控制的地区是拉丁美洲。最后，第四个是非洲大陆，它的特点是殖民主义采取的形式最粗暴，解放运动比較落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后，特别迅猛地出現了一些內部的和外部的强烈因素，它們决定了殖民地世界中一些最重要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漲。

进行民族解放革命的最坚决的战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工人阶級。在許多被压迫国家中工人阶級虽然人数比較少，但却是一种影响其他各个阶級的重大政治力量。

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促进了无产阶級阶

級意識的覚醒。这些政党进行彻底的斗爭，指引群众从事根本的革命的改造。

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各国中，居民的絕大部分是农民。无产阶級使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革命的彻底性、組織性和阶級意識，而运动的广度、范圍和規模則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农民阶級的立場。战爭更加迅速地把广大农民群众卷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殖民地附屬国的土地問題进一步尖銳化，把土地革命提到日程上来。一些国家里（越南、緬甸、印度尼西亚）当时已經为工农联盟奠定了基础，这就使它們有可能在解放斗爭中取得重大的成就。

在經济比較发达的国家中，民族資产阶級的地位显著地巩固了。完全服从帝国主义国家大資本家的种种原有的条件，已經使民族資产阶級感到不方便，它需要至少摆脫那些宗主国統治集团用来束縛它的非經济性的桎梏。民族資产阶級的两面性表現在不彻底性、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傾向和內在的反动性。資产阶級所要求的从殖民压迫下的解放，是要把前殖民地保持在資本主义經济体系內，并保证使剝削阶級当权的那种解放。

殖民地的軍队参加反法西斯联盟方面对“軸心国”作战，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斗爭的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手里得到了武器，树立了信心：相信自己不仅能够参加击溃“軸心国”，而且能够制止英、法、荷兰重新恢复殖民統治。

在带有反法西斯和解放性质的战爭进程中，德、意、日这些世界反动势力突击队的溃敗，成了直接革命行动的信号。

最后，促使民族解放运动能更迅速、更順利地取得成就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

苏联的力量和威信的增长，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現，一些亚洲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所有这些过程和事件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地球上最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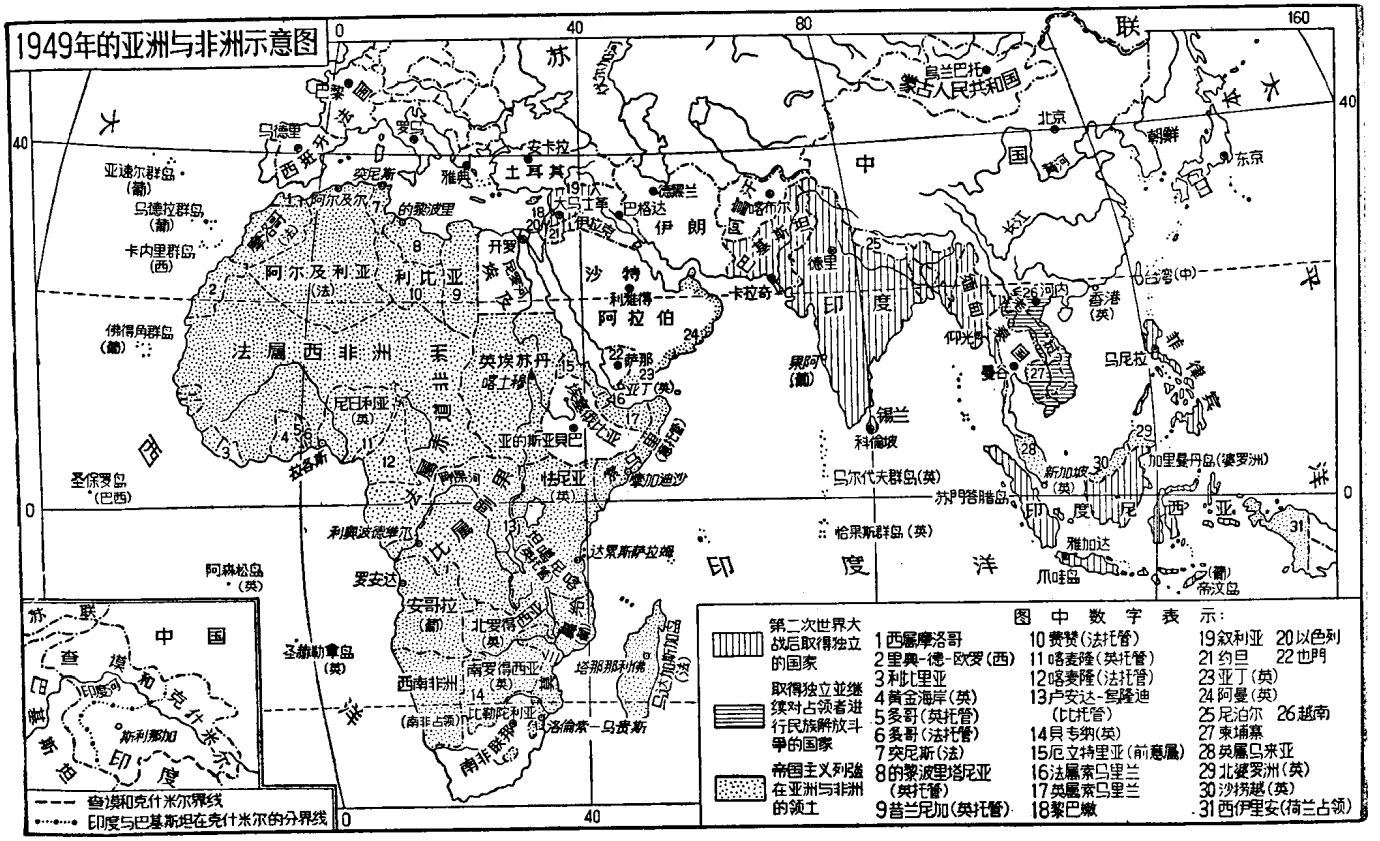
的国家——中国，自己以前就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因此，在四十年代的后五年中国革命的凱歌行进，不仅間接地，而且直接地打击了殖民主义，标志着世界帝国主义的整个殖民体系的瓦解。

在本篇所論述的殖民地世界各地区中，民族解放运动达到最壯闊規模的地方是东南亚。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和殖民体系的瓦解的連鎖反应，正是从远东起首先向这个广闊地区扩展开来的。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越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达到了最高阶段，幷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緬甸、菲律宾、錫兰，摆脫了殖民主义的政治桎梏。馬来亚人民进行了长期的英勇斗爭。

在中近东，巴勒斯坦的殖民地地位被取消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得到了独立。但是，形势依然十分复杂。帝国主义在这里还是保持了实行其"分而治之"政策的可能性。在非洲，摩洛哥和突尼斯即将解放。撒哈拉以南，帝国主义的陣地表面上似乎比較稳定，但即使在这一地区也出現了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决战創造前提的严重而深刻的过程。半殖民地和附屬国的大陆——拉丁美洲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大多以隐蔽的形式进行統治。替帝国主义进行政治統治的，是当地的反动势力，特别是軍人。

在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两个陣营的条件下出現的殖民主义的瓦解，使整个国际关系具有了新的性质。一些新国家的成立根本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前殖民地各族人民从帝国主义政策的对象变成了对世界政治发生重大影响的积极的独立的力量。

在战后最初几年，一些得到解放的国家的新作用还沒有充分明显起来。但是，即使在这时，其中大多数国家一方面依然处于資本主义世界經济的范圍內，同时却已拒絕参加帝国主义的軍事政治体系，幷在国际关系中占据特殊的地位。正如苏联共产党綱領所强調指出，"年輕的主权国家既沒有加入帝国主义国家体系，也


1949年的亚洲与非洲示意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
取得独立并继续对占领者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国家
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与非洲的领土
图中数字表示：
1西属摩洛哥
2里奥-德-欧罗(西)
3利比里亚
4黄金海岸(英)
5多哥(英托管)
6多哥(法托管)
7突尼斯(法)
8的黎波里塔尼亚(英托管)
9昔兰尼加(英托管)
10费赞(法托管)
11喀麦隆(英托管)
12喀麦隆(法托管)
13卢安达-乌隆迪(比托管)
14贝专纳(英)
15厄立特里亚(前意属)
16法属索马里兰
17英属索马里兰
18黎巴嫩
19叙利亚
20以色列
21约旦
22也门
23亚丁(英)
24阿曼(英)
25尼泊尔
26越南
27柬埔寨
28英属马来亚
29北婆罗洲(英)
30沙捞越(英)
31西伊里安(荷兰占领)
查谟和克什米尔界线
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分界线

沒有加入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但是其中絕大多数国家还沒有脫离世界資本主义經济，虽然它們在那里占有特殊地位。"①

它們对于帝国主义专制行为的抵抗，由于和平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存在而更便于进行，因为社会主义陣营始終不渝地执行和平政策和支持正在贏得解放的各族人民的独立的政策。无产阶級国际主义原則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貫彻执行，为巩固已經解放的各国的政治独立以及爭取使它們經济上进一步发展，都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可見，在1945—1949年，中立国集团形成的过程已經开始幷进一步发展，这个集团的基础是东南亚、中近东和北非各个贏得民族独立的新国家。这个国家集团在国际关系方面开始探索新的道路，宣称其政策的目的是：拒絕与帝国主义締結軍事协定，进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爭，支持解放运动，发展和巩固同一切国家的联系，建立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合作，对世界政治的各种最重要問題采取爱好和平的立場。

第 九 章

东南亚各国人民爭取自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緬甸、巴基斯坦和某些其他国家获得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所有国家中只有两个小国——泰国和尼泊尔享有独立，但也不过是形式的独立，因为連这两个小国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99 頁。

也是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依然处于英国統治下的有印度、緬甸、錫兰、馬来亚及其他殖民地，总人口約五亿。法国仍控制着印度支那半島的大部分地区，这里約有三千万人居住。荷兰殘酷地剝削了有六千万居民的印度尼西亚。

东南亚广大人民群众卷入反帝斗爭的过程，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时期已經开始，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后这种过程特别加强了。

从1941年底日本武装力量进攻珍珠港时起，战火从中国領土蔓延到整个远东和东南亚許多国家。日本的軍事行动击溃了英国人、法国人和荷兰人，从而加速了关于殖民者軍队战无不胜的神話的破灭，这种神話的基础在于装备武器和素有訓练的軍队与以前自发而零散地奋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手无寸铁的居民比較起来所具有的优越性。

在成为战場的各国中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間的斗爭，使当地各族人民具有了爭得政治独立的希望。日本軍国主义者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比較"稳定"的后方，开始蠱惑人心地宣揚日本在亚洲的"解放"使命，甚至使被占領国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这就使各族人民的上述希望更加熾烈了。

但是，"被解放的"的各族人民很快就确信，这不过是"自己的"亚洲殖民者来代替了欧洲殖民者。于是，就开始了他們爭取独立的新阶段。随着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逐漸临近，一些抗日的行动也就发展成为广泛的軍事行动。各国年輕的共产党起了积极的作用。它們团結了革命的劳动群众，并向他們指明了为爭取政治自由和經济独立而进行彻底斗爭的道路。

这样，在大战时期，民族解放运动就发展成为民族解放革命。东南亚各国的人民群众用卤获的武器装备起来，团結在眞正爱国力量的周圍，并在战斗中經受了鍛炼。他們充滿坚定的信心，决不

让英国、法国和荷兰恢复統治和建立以前的殖民制度。这个地区最大的国家——印度沒有成为战場；日本軍队的推进在伊洛瓦底江的要冲处被阻止住了。但是，英国人并沒有能把世界上这个最重要的殖民地与席卷整个亚洲的解放运动洪流隔离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殖民体系的瓦解，是由这一地区各个国家以前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所制約的。瓦解的过程由于法西斯势力与反法西斯联盟之間的战爭这一极大的震动而加速了。随着反法西斯联盟的胜利，随着依靠苏联威望和力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出現了一些有利于殖民地各国爭取政治独立的条件。

一、印度摆脫殖民地依附地位和印度、巴基斯坦自治領的成立

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几乎在亚洲大陆上彻底消灭殖民制度的亚洲各族人民反帝斗爭的主要洪流之一。

战爭剛結束，印度工人阶級的罢工斗爭就迅速发展起来。农民同地主和警察发生冲突的次数更加頻繁了。与劳动者的社会性的行动同时，反对英国統治的全民运动也扩大起来。經济上壯大起来的民族資产阶級在国家独立問題上采取了比以前更坚决的立場。

英国当局千方百計地企图把群众的日益高漲的积极性轉移到被故意煽动起来的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間的宗教仇恨方面来。像穆斯林联盟这样的政党进行了有利于殖民者的活动，它在战后时期直接把国內的宗教矛盾提到了首要地位。穆斯林联盟对印度国民大会党的态度变得几乎比对英国殖民当局更加敌对。

1942年从地下轉为公开的共产党在各工业中心的工人中間以及在某些地区的农民中間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一时期国民大

会党在全国范圍內牢固地保持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領导作用。

战后在印度，革命形势成熟了。1946年2月18日在孟买无产阶級支持下爆发的孟买水兵武装起义，差一点成为全民反帝革命的信号。①

孟买起义迫使英国工党政府感觉到局势的全部严重性。起义开始第二天，2月19日，当时事件的結果如何尚未可知，艾德礼首相已宣布，政府决定派遣一特别使团去印度，就賦予印度某种形式的自治問題进行談判。②

包括印度事务大臣巴錫克·劳倫斯、财政大臣克里浦斯和海軍大臣亚历山大的特使团于1946年3月底抵达印度，并与总督魏菲尔一起同印度政治領袖們开始談判。1946年5月16日，发表了《关于印度的白皮书》——內閣特使团声明。声明中包括了关于印度制宪机构的方案。

总起来說，英国的各种方案可以归結为企图建立一个被內部矛盾攪得分崩离析的軟弱的国家，从而需要由倫敦来"調解"和"領导"。

英国內閣特使团离开后，印度的局势变得更紧張。特使团的破坏活动使穆斯林联盟同印度国民大会党之間的仇恨更尖銳了。

关于临时政府問題和对英国建議的态度問題的激烈爭論的結果是，穆斯林联盟根本拒絕同印度国民大会党进行任何合作。M·眞納宣布开始爭取建立巴基斯坦的"直接斗爭"，即把信奉伊斯兰教的各省分裂出去，成立独立国家③。"直接斗爭"变成了在孟加拉、旁遮普和比哈尔等許多地区爆发的群众性的械斗和蹂躪暴行。像印度教大会型的一些印度教宗教沙

① 杜德：《今日印度》下册世界知識社1953年版第278頁。

② 《The Times》, 20. II. 1946.

③ 参見 *А. М. Дьяков.* Индия во время 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9), стр. 84。

文主义政党对于蹂躏暴行也負有同穆斯林联盟相等的罪責，这些政党从宗教狂热病者和刑事罪犯中糾集了一批殘害異族的"黑帮分子"。在总督府政治部中的英国走狗千方百計地煽动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間的仇恨。宗教不睦之所以日益严重，还因为在印度一些地区內不同信仰的代表者屬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宗教的外衣下也表現了阶級冲突。

但是，甚至宗教不睦——几十年来英帝国主义政治賭博中的主要王牌——也已經不能阻遏民族解放运动。全民反英起义的威胁继續增长；殖民当局感觉自己正像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人。

1947年2月20日，首相艾德礼在众議院宣称："目前形势不明确，蘊伏着各种危險，不能长此持續下去。陛下政府願意明确地說，它坚定地准备采取必要的步驟，至迟在1948年6月把政权轉移到印度人自己手中。"① 艾德礼暗示，英国政府要根据宗教标志来肢解印度。在同保守党人爭辯时，工党活动家們毫不掩飾地暗示，"离开印度"絕不是自願的。

甚至英国当时駐印度总督的參謀长伊斯迈勛爵也承认这一点。他写道："1947年3月的印度是一艘仓中滿載彈药而在大洋中着火的船。当时的問題是在大火延燒到彈药之前把火扑灭。事实上，除了像我們所做的那样去做之外，在我們面前并无选擇的余地。"②

工人、农民和全民的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证实，不列顛皇冠上的珍珠是在違反倫敦政府意願的情况下失却的，印度人民終于成为自己历史的主人。

印度紧張的政治局势很快就向英国統治集团显示出，把"离开印度"拖延到1948年6月对自己会是危險的。他們沒有敢冒拖延履行艾德礼諾言的危險，因为他們懂得，越早一些出現轉交政权的局面，获得政权的集团就

① 《The Times》, 21. II. 1947.

② 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世界知識社1954年版第172頁。

会表現出越大的溫和性，而保持英国在印度的陣地的机会也就会越多。

1947年7月3日，公布了"关于在印度移交政权"的法案，报刊上称为《蒙巴頓方案》(根据同年2月20日任命的新总督的名字)①。《蒙巴頓方案》規定，要根据宗教标志把印度分裂为取得自治領地位的两部分，即印度联邦和巴基斯坦。方案建議，关于各省加入巴基斯坦的問題将由各地方的立法会議决定。方案建議各王公土邦或者加入一个新自治領，或者宣布独立国地位。

該法案經英国議会通过，被印度两个最大的政党接受，并于1947年8月15日生效。这样，在世界地图上就出現了两个新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

这个事件标志着英殖民帝国开始瓦解，并对整个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給以最有力的打击。印度的人口总数約四亿——大体上占1947年处于帝国主义直接統治下的整个殖民地世界的人口的一半。

印度贏得政治独立，不仅对于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而且对全世界的国际关系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这种意义在尔后的时期才充分地表現了出来。但是，即使在当时已經显而易見，国际舞台上出現了一个有四亿二千万人口和发达的民主运动的国家，国际关系的状况将在不小的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

德里，这个以前曾是"閉鎖"的城市，变成了重要的外交中心之一。以前印度仅只在形式上是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成員国，在这些国际組織中的印度代表团是由英国当局任命的，印度代表团的全部作用可以归結为給大不列顛投补充的一票。但是，从1946年，在以賈瓦哈拉尔·尼赫魯为首的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形势就开始

① 《The Times》, 3. VII. 1947.

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7年8月15日以后，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內，都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苏联同印度交換了大使級的外交代表。当时苏印关系面临的前景是朝着扩大政治、經济友好联系的方向发展。

从印度分裂出来的国家——巴基斯坦，拥有約七千万人。主要住有伊斯兰教徒的一些省，如信德省、俾路支、西北边省、西旁遮普、东孟加拉和一些土邦，（由于复杂和有时非常尖銳的斗爭的結果）划入了巴基斯坦版图。这样，这个国家的領土就由两部分組成，这两部分被印度的領土分隔开，而且在經济上和民族上都毫无相互联系。

与国家分裂的同时，又爆发了宗教性的新的血腥虐杀，出現了大批的难民。印回虐杀的牺牲者的数目达一百万人，难民約八百万。这就是当时工党政客們以虛伪的自豪心情像談"功勋"似地談論的"不流血的革命"。

但是，血流成河还不是印度分裂的唯一的悲慘后果。两部分的經济状况也显著恶化了，因为划入巴基斯坦的領土是生产原料的，而这些原料要在印度的工厂加工（黄麻、棉花等）。巴基斯坦仍然几乎沒有工业，印度則沒有足够数量的原料。工业品和农业品的产量都出現了災难性的下跌。饥饉席卷了許多省份。失业群众达几千万人。几百万无居所的难民充塞于加尔各答、卡拉奇、孟买及其他大城市的近郊。

印度被英国分裂为两个国家，这就造成了一个国际紧張局势的策源地，而帝国主义大国則利用它同时对印、巴双方施加压力，进行恫吓。帝国主义者企图使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对外政策服从英、美集团，巩固自己在这两个国家內的經济、政治和战略地位，保证自己在反对社会主义陣营的"冷战"中得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支持。

至于印度的对外政策，則当时就已經明显地表現出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后来成为印度的独立和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路綫的基

础。反殖民主义从一开始就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重要方針。它要处于各种帝国主义集团之外的意願，也以同样的程度显露了出来。早在1947年8月15日以前，尼赫魯政府就已經采取了一些旨在建立亚洲各国团結关系的措施。尼赫魯政府对于印度尼西亚人民要求摆脫殖民枷鎖的解放斗爭采取了从道义上支持的立場，在德里召开了关于这个問題的专門的国际会議。印度坚决反对南非联邦的种族隔离。它促使世界輿論来注意这一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变种，并把問題提交联合国討論。但尽管如此，印度統治集团在这一时期对于世界政治的一些主要問題的态度，是复杂的和充滿矛盾的。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济上与大不列顛的联系，曾非常明确地表現出来。

在独立的印度，民族資产阶級掌握了政权。印度民族資产阶級渴望加强自己的政治和經济陣地，为自己爭得"太阳下的地盘"，爭取完全的独立，在国內实行一些社会—經济性的改革。但是，1947年8月15日以后，英国壟断資本在印度經济中仍然保持了非常强固的地位，保持了与印度大資本的密切联系。

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級和农民阶級，对印度的政治形势有了显著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印度民主运动随着英国統治的消失而得到了新的推动力。印度共产党在群众中，包括在农民中，巩固了自己的陣地。

印度資产阶級当时需要在分裂为两个对立陣营的战后世界极端复杂条件下，制訂自己的对外政策路綫。两大陣营之一——英美集团——的积极参加者有英国，而英国是印度不久以前的宗主国，英联邦的首要国家。在最初几年，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年輕的印度国家的政策。

某些有势力的資产阶級集团曾指靠亲美和从美国获取經济援助。美国外交当局也希望能比較容易地"馴服"这个国家。与此相

联系，美国对1949年底賈·尼赫魯正式訪美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是，以后的几年表明，由于印度社会各主要阶級的影响和各种客观因素的作用，中立主义政策成了印度的对外政策。印度經济的进步和独立的巩固，不能靠着向帝国主义大国的"援助"一边倒来保证，这种观点已經得到几乎普遍的承认。印度的中立主义表現在拒絕参加侵略集团，加强反对殖民主义的斗爭，为支持一切国家和平共处而积极活动。

巴基斯坦的对外政策从一开始就以极端反印、而且带有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为其特征。

巴基斯坦的民主运动是軟弱的。新国家的政府依靠着封建地主集团，而这个集团认为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巩固巴基斯坦各地区間統一的工具。既然这些地区的統一能够主要依靠宗教的共同性，各种宗教因素在决定对外政策路綫上自然就开始起显著的作用。因此，巴基斯坦企图夺占克什米尔，而当它做不到时就把克什米尔問題变成同印度进行剧烈而持久的爭执的对象。然而，两个自治領的各族人民的利益却要求这两个新成立的国家发展密切的政治、經济和文化联系。巴基斯坦政府压制了要求自决权的六百万普什图人的願望。这使它与北方邻国——阿富汗的关系恶化了。內部不稳和民族主义的、宗教的目的促使巴基斯坦統治集团在国外寻求支持。它在某些伊斯兰教国家找到了精神上的支持。巴基斯坦向主要的帝国主义大国要求軍事、政治的支持。在这方面，美国的作用逐漸加强，英国的作用不断減弱。

这样，虽然在1947—1949年間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对外政策路綫还沒有最后明确起来，但是当时就已經可以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傾向，一种后来促使印度加入了和平地区，加入了执行中立主义政策的国家集团，一种則促使巴基斯坦加入了帝国主义集团，盲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

二、克什米尔事件和印巴冲突。克什米尔問題在联合国

决定巴基斯坦社会中各有势力阶层——封建主、地主、阿訇——的政策的是，被千方百計煽动起来的宗教偏执心理，和继續坚持英国人提出作为分裂其印度領地的根据的“两大民族”原則的决心。巴基斯坦統治集团要求合并甚至那些根据《蒙巴頓方案》并未划入巴基斯坦版图的“伊斯兰教”地区。問題首先是关于位于次大陆北部而与两个新成立的自治領接壤的查謨—克什米尔土邦。

这个土邦的大君到1947年8月15日并沒有宣布并入任何一个自治領，克什米尔成了“独立”国家。正如大君以后所声明的，由于地理、政治、宗教等“特殊条件”，“独立”在他看来是“最好的解决方法”。① 克什米尔除与印度和巴基斯坦接壤外，还与阿富汗、中国接壤，而且距苏联边界很近。这个土邦的領土一向是英国当局极感兴趣的战略重地。要了解大君采取的解决办法的眞正动机，这就是关鍵所在。

必須指出，某些大土邦，如海德拉巴、克什米尔、迈索尔、特腊范科尔—柯欽和卡提阿瓦尔型的一些联合土邦的“独立”，被英帝国統治集团看做是在印度境內保持英国政治据点甚至軍事据点的一种手段。用英国历史学家拉施布鲁克·威廉斯的話說，当时計划这些土邦会依然是“在有爭执的地区內的友好的堡垒”②。但是，印度政府迫使英国人和土邦大君們同意必須让土邦参加印度自治領或巴基斯坦自治領。由于絕大多数土邦原来都附丽于組成印度联邦的各省范圍之內，因此，正是印度自治領成为英王对印度各土邦的宗主权的继承者。

① 参見《White Paper on Jammu and Kashmir》, New Delhi, 1948。

② 《Amerasia》, October 1947, p. 7.

由于特殊的內部和外部条件，克什米尔的命运却有所不同。这个土邦的四百万居民在宗教信仰上不一致。約80%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余的居民則信奉印度教、佛教和塞克教。近百年来，克什米尔盆地由查謨大君統治，因此在这个土邦里民族上屬于多格尔族而宗教上屬于印度教的拉其普特人的特权种姓占据統治地位。克什米尔民族很大一部分信奉伊斯兰教，他們处于无权的被压迫地位。专制大君的血腥制度鎮压了人民爭取起碼的民主权利的一切企图。

1947年8月15日以后，在克什米尔开始出現爭取摆脫經济、政治和宗教压迫的新的斗爭高潮。以前，大君的王位是靠英国刺刀支持的，但在新的条件下反动統治已經不稳固了：大君制度的崩潰和資产阶級民主革命的胜利看来已是几个月內的問題。

国民会議党在人民中的影响最大，这个党的領导机构采取資产阶級民主立場。这个党的領袖們基本上是伊斯兰教徒，但是他們强調自己的党的非宗教性质，而且在全印度范圍內接近国大党的政治路綫。

1947年10月22日巴基斯坦当局組織的普什图游牧部族武装队伍的干涉行动开始时，克什米尔的局势就是这样。以前英国政客們曾慫恿大君宣布"独立"，到这时却已最后看清，沒有外部的支持，大君控制不住政权。英帝国主义者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輕"，最好牺牲大君而促使事件发展成克什米尔划入巴基斯坦版图。正因如此，許多英国官員不仅知道入侵的准备，而且还参加了准备。

印度政府公布的文件証明，在印度服役的英国高級官員，如西北边省省督乔·肯宁汉和武装力量总司令K·奧欽列克元帅关于即将发生的事件都有非常灵通的情报，但却不让印度政府知道①。他們认为襲击的突如其来是使巴基斯坦順利夺得克什米尔的基本条件。这个土邦与印度之間有难以逾越的山脊阻隔，因此印度政府将很难仓卒之間調遣大兵团前去。装备精良而且由巴基斯坦正規軍軍官指揮的入侵部队②則相反，它可以不仅

① 参見 *В. Кумар.* 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Кашмира. М., 1955. стр. 77—78。

利用穿过巴基斯坦国境进入克什米尔的全年通行的汽車路，而且可以利用铁路。似乎土崩瓦解、遭到居民憎恨的土邦軍队的抵抗会很容易就被挫敗，几天之內入侵軍就会占領整个克什米尔盆地，包括斯利那加。到那时，印度将被迫面临既成事实，它所能做的将只是提出些外交抗議，但抗議是不会改变形势的。

干涉者——出乎自己意料之外——遭遇到人民的反击。包括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和民主知識分子的人民义勇軍和人民警察的队伍成立了。国民会議党領导了抵抗組織。由于土邦行政机构的彻底瓦解，克什米尔盆地的全部政权事实上已經轉入国民会議党手中。

这样，干涉仅只加速了克什米尔的反土邦势力的胜利。1947年10月30日，大君被迫签署了一項命令，成立以剛从监獄中被釋放的国民会議党領袖阿卜杜拉教长为首的非常行政当局。大君本人离开了土邦。但是，外部的危險在威胁着新的民主制度：万一巴基斯坦的干涉成功，革命就会淹沒在血泊中（像最初几天被搶占的巴拉穆拉城的居民的命运所显示的）。

仓卒之間成立的志願部队不可能长期阻遏装备精良的部队向前推进。唯一的希望在于印度軍队的支援。大君和国民会議党的領导机构都向印度政府提出了关于这种援助的要求。总督蒙巴頓勛爵反对立即提供援助。10月24日（大君在这一天正式向印度提出要求）以后又过了几天，这时印度政府曾劝說大君：为了解除蒙巴頓的阻撓，克什米尔必須加入印度联邦。为此目的，土邦事务部秘书В·П·梅农曾飞赴斯利那加③。"两害相权取其輕"，大君签定了被要求的文件。

---

② 美国間諜 P·海特所指揮的部队之一（1948年6月1日《紐約先驅論坛报》）。

③ *V. P. Menon.* The Story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ian States. Bombay, 1956, p. 390—415.

蒙巴頓虽然被迫批准土邦加入印度，但却（違反《关于印度独立的法令》）提出保留：建立秩序以后必須了解人民的意願。这种出乎意料的"民主主义"姿态也就以一种对帝国主义势力合适、而且向巴基斯坦提供干涉口实的提法为整个所謂克什米尔問題奠定了法律基础。

1947 年 10 月 27 日——經过几天几乎成为致命的拖延以后——印度軍队一营人开抵斯利那加机場。如果再迟甚至几小时，就会使敌人占領了飞机場，而不可能让大批軍队和重武器着陆。干涉者是在距克什米尔首府近郊几英里的地方被阻止住的。

巴基斯坦想針对这种形势而向克什米尔調遣正規軍队的企图遭到了英国官員的阻止：在劍拔弩張、趋向未定的形势下，这样做会酿成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間的大規模战爭。如果"局部"冲突可以使英国纵横捭闔，从中取利，眞正的战爭却会让英国即使不在两个自治領，至少也在印度完全丧失陣地和影响。

根据蒙巴頓总督的倡議，克什米尔問題被提交联合国审議。印度政府对此表示同意，因为它估計，安全理事会考虑到事件在实质上无可爭論的性质，会譴責巴基斯坦的侵略行为，并呼吁它停止侵略活动。也許出于同样的考虑，巴基斯坦政府在最初坚决抗議把問題提交联合国。

1947 年 11 月 1 日，蒙巴頓勛爵在拉合尔会見了巴基斯坦总督 M·眞納。关于蒙巴頓如何"代表了"印度方面，他的私人秘书坎貝尔·約翰逊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坦白地叙述："蒙巴頓把关于印度在斯利那加的軍队数目和印軍最近几天內可能得到的增援部队的情报告訴了眞納。他对眞納說，在既成形势下他认为使部族的大批軍队进入斯利那加的前景是黯淡的。"①从完全可靠的来源得到这个重要的情报之后，巴基斯坦政府相信，

① *A. Campbell-Johnson.* Mission with Mountbatten. New York, 1953, p. 229.

对于突然襲击和軍事力量的指靠已經落空，更有利的是轉而采用外交手段。

但是，眞納提出的建議，和以后巴基斯坦总理列雅格特·阿里汗在致賈瓦哈拉尔·尼赫魯的信函中提出的建議，都不能做为建設性的談判的基础，因为这些建議要求取消关于克什米尔加入印度联邦的决定和解除非常行政当局等①。双边談判的失敗更为蒙巴頓把事件提交联合国审議的思想补充了一个理由。

与此相联系，必須指出巴基斯坦針对蒙巴頓建議所采取的态度的急剧轉变。眞納断然反对联合国干涉以后，經过两周，列雅格特·阿里汗在11月16日致尼赫魯的信中所建議的却恰好是，由联合国代表負責安排停火，建立秩序，組成公正的行政当局，进行公民投票。以后的事件进程表明，巴基斯坦統治集团在对联合国干涉的态度上的突然和重大的轉变对他們显然是有利的。

1947年12月30日，根据蒙巴頓总督的建議，印度政府就巴基斯坦对印度一部分領土的侵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了控訴。

安全理事会中的英美多数对于印度的控訴避免立即表示反应；通过的决議是成立一个"研究"問題的委員会。英美多数为滿足巴基斯坦的要求而扩大了需要研究的問題的范圍。甚至"查謨—克什米尔問題"这个名称本身也改作"印度与巴基斯坦問題"。由于美、英代表所采取的立場，安全理事会对克什米尔在法律上已并入印度的事实不予考虑。安全理事会认为印度的单方决定——以后再了解土邦居民的意志——是还需要由联合国方面进行监督的一种国际义务。安全理事会立即干涉了克什米尔的內部事务，它怀疑現存行政当局的合法性，并认为討論的出发点应該是：在进行公民投票时不可能保持这个現存行政当局。这就是沒有得到苏联

① «Dawn», 17. XI. 1947.

和烏克兰代表团支持的1948年1月20日安全理事会决議的基本内容。① 这样，安全理事会的多数就完全采納了巴基斯坦的观点，虽然形式上对問題的实质甚至还沒有表示意見。

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員会成立后，根本沒有立即开始对克什米尔問題的实际审理。外交手腕又继續了三个月，目的不外是迫使印度作更多的让步。

1948年4月21日，出現了一个新的决議，据此，委員会的成員增加到5人。委員会必須到当地去，以便采取恢复和平和进行公民投票的措施。設置了主持公民投票的行政长官职务。决議建議克什米尔政府向該行政长官移交他"认为进行公正无私的公民投票所需要的"全权，"包括——单純为此目的——对克什米尔軍警力量的指揮权和监督权"②。总的看来，行政长官被賦予几乎毫无限制的全权，在准备和进行公民投票的整个时期內事实上等于代替了現存政权。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根据共同承认，准备时期可以延續几年。③

直到7月初——可見，印度对侵略行动提出控訴后过了半年——委員会才到达次大陆。在这六个月期間內发生了許多事件，为冲突的解决增加了困难。最初，巴基斯坦否认它曾参預克什米尔战爭。但是，安全理事会的立場使得巴基斯坦政府决定直接参加战爭。1948年4月，印度軍队解放了克什米尔盆地西部的几个城市，在这以后，担任巴基斯坦总司令的英国人格雷西将軍向这里調遣了正規軍队。本来，如果这支正規軍队沒有进駐克什米尔境內，就可以在几周內把部族的部队逐出土邦，而克什米尔問題本身也許就消失了。印度也許就可以准备征詢人民的意願。联合国干涉的可能性也許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而巴基斯坦正規軍的一些大兵团調进克什米尔，这就使他們有可能控制住那已經侵占的地位，并保持了继續爭执的基础。

---

①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Document S/654, January 20, 1948.
②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Document S/726, April 21, 1948.
③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Document S/819, June 3, 1948.

安全理事会中帝国主义多数的阴謀在于，挖空心思地掩飾冲突的起因。进行侵略的巴基斯坦在法律上竟被置于与侵略的牺牲者——印度同样的地位。

印度的輿論被西方国家对克什米尔問題的政策激怒了。印度报刊提出了激昂的抗議。不仅英国，甚至美国的威信都受到了严重的損害。在印度响起了一片号召退出英联邦的呼声。而最趋极端的集团則要求对巴基斯坦宣战并在巴基斯坦本土作战。

西方的政治活动家們基于他們在亚洲拼凑軍事集团的政策而对印度多所屬望，中国人民的革命又不断地取得新成就，因此，印度的上述情緒不能不使西方政治活动家們惊惶失措。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力图緩和印度人民对他們的阴謀所表示的不利的反应，另一方面又企图利用克什米尔冲突对有关双方进行恫吓，施加压力，以便把它們拖入自己的軍事—政治盟国之列。因此，他們偶而向印度方面也作一些“让步”。安全理事会派遣的委員会执行了两面政策，它有时向双方政府发表直接矛盾的保証性的声明，而且不把一方的立場通知另一方。

1948年12月11日，联合国第三届大会开会时，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代表們又得到了关于公民投票基本原則的一些新的建議。建議中包括了对印度的让步——特别是，主持公民投票的行政长官失去了对軍队、警察和法院的监督权。①对印度这样卑躬屈节，在巴基斯坦引起了非常特殊的反应。《軍民报》写道：“近来巴基斯坦越来越感覚到，为了印度在西方民主制度与俄国共产主义的斗爭中所占据的对英美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无論英国和美国都把巴基斯坦的利益当做牺牲品。”

針对社会主义陣营的“冷战”对美、英在克什米尔問題上的立場有决定性影响，这是任何一方都不怀疑的。爭論只是在于，在不同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計划究竟把他們推到哪个方面去：

---

① *M. Brecher.* The Struggle for Kashmir. Toronto, 1953, p. 97.

偏向印度，或是偏向巴基斯坦，或是另寻某些其他解决办法。

賈瓦哈拉尔·尼赫鲁对于最新的建議作了一些重要保留，但是同意在这些建議的基础上实行停火。巴基斯坦政府也同意了。前綫的形势促成了这样的解决办法：因为巴基斯坦担心印度会取得进一步的战績，印度则知道进攻的扩展会促使冲突更加尖銳，甚至引起更大規模的——越出克什米尔边界的战爭。

停火协定在1949年新年到来前一分钟生效。

談判的下一个阶段涉及两个問題：印度与巴基斯坦締結停战协定和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这一时期內主要的意見分歧是关于土邦的非軍事化。

談判拖延了七个月，結果仅只是1949年7月27日在卡拉奇締結了关于軍事分界綫的协定。双方承担了不再調遣軍队进入土邦的义务。但是，这个协定虽然对冲突双方好处极少，联合国委員会却获得了派遣联合国軍事观察員进入克什米尔并任意分布于任何地区的权力。在观察員中，美国軍人立即开始占了多数。他們可以自由地进行空中摄影和地形測繪工作等；他們配备有无綫电发报机和各种器械，以及自由行駛于斯利那加、德里、卡拉奇之間的塗有联合国标志的軍用汽車和飞机。

沒有等到对举行公民投票問題达成协議，委員会就决定赶快任命前述拥有极广泛权力的联合国行政长官，并使他开始实际活动。1949年3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德利格佛·賴伊任命美国前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茲担任这項职务。預定由尼米茲扮演的角色很快就明确起来了。1949年8月，委員会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提出了克什米尔非軍事化方案，并要求"无条件地接受"这个方案。不出所料，这个方案遭到了拒絕。于此也就显露出指导联合国委員会活动的那些人們的眞正意图。

委員会突如其来地取消了它自己預定在8月22日召开的印、巴双方会議，而建議把一切与停战有关的爭論問題交由海軍上将尼米茲仲裁。根据委員会中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契尔博士所提供的材料，这个决定在有关双方得悉以前，却先已通知給美国总統哈·杜魯門和英国首相克·艾德

礼。①杜鲁門和艾德礼立即公然要求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承认尼米兹海軍上将为仲裁者。

面对这种横蛮压力，印度群情激憤。尼赫鲁宣称这是史无前例的施加粗暴压力的事件。②杜鲁門和艾德礼的要求被拒絕了。尼米兹海軍上将沒有成为仲裁者，实际上也沒有开始执行駐克什米尔行政长官的职务。帝国主义各国的預計落空了。

这次冒險活动終于使委員会威信扫地。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契尔博士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了一份揭露委員会阴謀詭計的单独报告。委員会的幕后策动者决定稍微改变一下策略。联合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員会在其最后的报告(1949年12月9日)中承认了本身所負使命的失敗，并建議把委員会的职能轉交給一个人——联合国調停者，該調停者被授权进行仲裁。这个建議由安全理事会多数通过。

联合国对克什米尔問題的干涉并沒有使問題易于解决。冲突的法律方面反而变得更錯綜复杂了。原因在于，安全理事会的多数理事会都是从本身的帝国主义动机出发，而不是从克什米尔人民的利益和地球上这一地区的安全需要出发。《巴基斯坦时报》对这一点正确地写道："我們不能不看到，全部問題根本不应該与各大国的冲突糾纏在一起，与美国反对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張的斗爭糾纏在一起。"③

三、爭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緬甸

第二次世界大战剛开始，緬甸的各爱国組織的領导者們就曾企图同英国当局建立联系。他們准备在战后能給予緬甸独立的条件下全力支持英国。但是，尽管英国統治集团对印度并不反对提

①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S/1430. August 13, 1948.
② «The Times of India», 5. IX. 1949.
③ «The Pakistan Times», 2. IX. 1949.

出諾言——固然是价值可疑的諾言，他們对緬甸却甚至认为連进行談判都不需要，而是索性禁止提出各种詳細建議的德欽党进行活动，并逮捕了党的領袖：巴莫、德欽丹东、德欽努。① 甚至緬甸傀儡政府总理宇素（又譯吳沙），在去英国（他同溫·丘吉尔进行了談判）之后，竟被送到烏干达去住②。

因此，1942 年春季日本侵入緬甸和英国殖民当局逃跑，这在緬甸很多爱国分子看来是終于可以爭取政治独立的有利条件。这种看法适合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于是他們允許成立緬甸独立軍。

有許多爱国分子参加了緬甸独立軍，他們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企图利用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当时团結起所有左派力量的有影响的人民革命党領袖、二十七岁的得人心的政治活动家昂山，成为緬甸独立軍的司令。这支軍队是規模壯闊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核心和支柱。

日本当局为了維持关于它的解放作用的神話——这对于它軍事上取得胜利是必要的——而形式上給予緬甸以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1942年 8 月 1 日）。当时宣布緬甸成为“大东亚共荣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中享有充分权利的成員。③

但是，英日战綫在印度边境上胶着住了，日本人不再需要緬甸独立軍了。几乎緬甸全境都已在日本人控制下，他們不再支持解放运动；因为解放运动从此侵害的已不是英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日本当局企图解散緬甸武装力量，使它复員，并限制緬甸当局的自治权。这样，正如以后緬甸显要政治活动家吳努所承认的，緬甸爱国者估計日本会协助独立运动的想法結果是錯誤的。④

在这一时期，成立了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左派力量的統一战

---

① 参見《Бирманский Союз》. М., 1958, стр. 93—94。

② *J. Cad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New York, 1958, p. 430—432.

③ 同上书第 436 頁。

④ *Thakin Nu*. Burma under the Japanese. New York-London, 1954, p. 5—7.

綫。同盟开始准备驅逐日本人的全民斗爭。共产党人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們在人民中的影响和威望迅速地增长了。根据全民族領袖昂山的倡議，并在他指揮下，背着占領者而成立了以緬甸国防軍①为基础的志願的緬甸国民軍。反法西斯联盟准备了反对日本的武装起义。

联盟的領袖們企图同英軍指揮部建立联系，以便从英軍取得武器，因为日本人向緬甸軍队提供的武器数量不够。早在 1943 年 12 月，就进行了第一次試探。但是，直到 1944 年底（起义前夕），英国人才給緬甸人一些武器。不过，正如蒙巴頓勛爵在其正式报告中所证实，很快就发出了停止以武器供給緬甸国民軍的指示，因为这“在現在和将来都会危及緬甸的安全。”这个决定沒有使在敌后活动的英国第一三六兵团司令感到滿意。他向蒙巴頓呼吁，要求放棄“政治性的考虑”，并证明“在緬甸进一步加强的游击运动对作战将是重大的援助。”蒙巴頓經过同民政顧問們长期論辯以后，才允許各兵团司令在他們认为必要时向緬甸爱国者提供一定数量的武器。蒙巴頓总督在其致参謀长們的报告中写道：“但是我命令，武器不得交予作为一个組織的反法西斯联盟，只有我們的偵察和軍事行动所需要的有限数目的該联盟盟員才能得到武器。”当时还曾建議，一旦不再需要他們的援助时，就立刻解除游击队的武装。②

1945 年 3 月，爆发了反日的武装起义。被日本人派赴前綫的緬甸部队举行了起义，而英軍指揮部則事前得到了即将举行起义的通知。这个指揮部——首先是民事行政部，却对起义抱着反对的态度。但是，正如李斯

① 这是緬甸独立軍从 1942 年 8 月起的新名称。

② 政治顧問們证明，以武器装备緬甸国民軍会損害“緬甸国內安全”。正如蒙巴頓勛爵所写的，他“完全了解，让緬甸人掌握武器是一种潜在的危險。”但是他估計，問題只是提供少量的武器，这“比起緬甸人已經有的武器，比起他們在 1942 年英国人撤退时所获得的和从日本人手里夺到的武器来，是微不足道的。”此外，提供武器的指揮官們都接到了指示，要对緬甸部队的行动进行全面的指揮，并尽最大限度控制住它們。当时如果完全拒絕，就会在这些緬甸部队中激起反英情緒，而且会不可能对它們进行任何控制，这也是很明显的。（《Report to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by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South East Asia. 1943—1945. Vice-Admiral of Burma Earl Mountbatten》. London, 1951, p. 143, 201.）

中将所通知的，这次起义是不以英国当局意志为轉移，非爆发不可的。对緬甸軍起义部队是否援助的問題，首先在蒙巴頓总部进行了討論——从与提供武器問題同样的观点进行討論。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应該在驅逐日本人以后立刻逮捕昂山及其他緬甸領袖。蒙巴頓知道，二者必須擇一：或者是支持反日起义，或者是用武力鎮压起义并逮捕領袖們。后一种做法在他看来过分冒險，因为昂山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而且要鎮压起义，就必須抽調太多的軍队，当时日本人还在頑固地抵抗，所以蒙巴頓不能这样做。从相反的方面看，起义者的行动却可以使英国人有希望迅速占領仰光。蒙巴頓把这些考虑通知了倫敦，英国战时內閣认为支持緬甸人起义会更适当些，但是关于今后英国对緬甸"民族主义者"的政策却不可向緬甸人提出任何保证。①

到1945年5月，英国軍队向緬甸国民軍所解放的各地区推进。这时，对宣布这支軍队非法的建議，又进行了认眞的討論。但是，根据李斯中将的估計，对昂山軍进行軍事行动，至少需要英軍两个师。

在昂山同英軍司令部代表会晤后，1945年5月22日倫敦向蒙巴頓建議：在已經不需要緬甸軍援助的地区，逐漸爭取把緬甸軍集中到一定的中心区域，以便由英軍控制住，并解除它們的武装。英国殖民者了解，眞正民族的武装力量会在緬甸人民爭取独立的斗爭中起甚么样的作用。帝国主义者一方面被迫同緬甸爱国領袖們进行談判，同时又力图贏得时間，并且在可能的期限內尽量不暴露自己的阴謀。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这对緬甸只是意味着恢复英国的統治。早在1945年5月，英国政府在特别《政策声明》——白皮书②中就宣称，它打算"将来"給予緬甸自治領地位。这个諾言实現——在遙遙无期的将来——以前，設立英国总督署。

---

① 《Report to the Combined Chiefs of Staff…》, p. 144—145.

② 《Burma. Statement of Policy by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May 1945》. London, 1945. 必須指出，在这份《白皮书》中規定要使撣邦和其他一些民族脫离緬甸，即印度式的"带分裂的解放"。

当时准备在三年以后再恢复战前的"立宪的"管理形式。这是对緬甸人民爭取解放的意願的侮辱。

在緬甸全国开始了群众性的示威游行，人民要求彻底的独立。由于各进步党派行动一致，全民政治罢工得以胜利地进行。不仅私营公司的全体职工参加了罢工，而且政府职員以及邮电部、铁道部的官吏甚至警察，也参加了罢工。很快，英国統治集团就了解到："緬甸的憤怒"已經达到非常强烈的程度，因此不可避免地必須向民族解放运动做最重大的让步。在这种危急的局势下，要試图保全以前的陣地，就必須动用大批的武装力量，而且即使这样作也未必就能保证胜利。

由于緬甸进步力量的积极活动的結果，成立了有一些革命活动家参加的政府，其中有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領袖、人民英雄昂山将軍。

1947 年 1 月，以昂山为首的政府代表团在倫敦进行了談判，最后签訂了关于成立經选举产生的負責制定宪法的制宪議会和关于以后給緬甸完全独立的协定。6 月，召开了在普遍选举权基础上选出的制宪議会。制宪議会最初采取的步驟之一，就是通过关于完全退出英联邦的决議。

但是，英国殖民者并沒有放棄鎮压緬甸民主力量的企图。他們决定在移交緬甸政权时要做到，挤掉坚决革命的政党，并使那些与反帝、民主势力为敌，首先是与共产党为敌的集团掌握政权。同时，英帝国主义者采取了在撣族各土邦統治者中間和克倫族各族系中間煽动和鼓吹分立主义情緒的方針。对于反动分子和分立主义分子的阴謀来說，主要障碍是得到人民无限支持的昂山民主政府。反动势力竟做出了凶殘的罪行——暗杀了人民領袖昂山和其他六位政府成員（1947 年 7 月 19 日）。民主运动遭到了非常重大的損失。

9月，制宪議会通过了緬甸联邦宪法。宪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和二百一十二条宣布，緬甸不以战爭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并忠于和平和各族人民友好合作的理想①。

在緬甸即将取得独立地位时，民族解放运动的团結遭到了破坏。資产阶級在一手独攬政权以后，就认为当前主要任务在于限制緬甸革命的范圍。

在"人民革命党"基础上組成的社会党領袖、继昂山之后作为反法西斯联盟領袖的德欽努②，成为总理。他宣布了一个綱領，其中包括一些带有反帝性和社会性但却极其溫和的措施。同共产党——最彻底的反帝的和革命的政党——的合作关系逐漸遭到了削弱。共产党人要求立即把地主的土地交給农民，但是这种要求得不到反法西斯联盟領导机构的支持。同英国签訂的軍事协定成为促使以德欽努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領导机构与以德欽丹东为領袖的共产党領导机构发生分裂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这两个党是結成联盟的党）。

另一方面，从分立主义傾向极强烈的克倫族政治領袖中产生的强大的反对派势力，也威胁着把自己从左派势力中孤立起来的緬甸政府。这种分立主义傾向长期以来就得到英国殖民者的培育和鼓励。反对政府的还有"人民志願軍組織"、"紅旗"假共产党等政党。英国的"分而治之"政策得到了成果。

从1948年春季开始，緬甸愈来愈深地陷入了內战的泥潭。1949年，政府的地位特别飄摇不定。在克倫族的逼攻下，政府軍有时竟退却到仰光近郊。曾經有几次甚至討論过政府轉入不合法状态的問題。

在制宪議会通过了断絕同英国及英联邦的一切联系之后，1947年8月英国統治集团把《防御协定》强加給德欽努政府。根据这一协定，英国軍事代表团被派赴緬甸。緬甸不得接納来自非英

① «Конституция Бирман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57, стр. 79.

② 吳努。

联邦成員国的軍事代表团。英国軍舰可以任意使用緬甸港口，英国軍用飞机可以任意使用緬甸飞机場。緬甸必須尽一切力量协助英国陆軍，并允許假道。

《防御协定》成为1947年10月17日艾德礼同德欽努在倫敦签訂的关于緬甸独立的条約的一部分。根据这个《艾德礼—吳努条約》(后来开始这样称呼)，緬甸获得了独立主权共和国的地位，并退出了英联邦。① 条約中的軍事条款与制宪議会通过的对英国和英联邦断絕一切联系的决議相矛盾。此外，英国人还把这样一款規定在条約之內：在对待英国私有者的关系上，緬甸政府負有与英国政府同样的义务。英国打算这样来保障自己在緬甸的投資，免遭无偿的国有化。②

在英国議会討論这个条約时，保守党人批評工党政府沒有試图使用武力来阻止緬甸完全分立。特别是溫斯頓·丘吉尔发表了这样的意見：当时如果把布署在巴勒斯坦的部队調到緬甸去，就会有可能根据1945年5月17日"白皮书"的精神行事，即长期維持住殖民地的地位③。針对这种指責，工党发言人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答辯。他們宣称，只有在保持英国对印度的控制时，也許才可能用武力鎮压緬甸解放运动④。

克倫族在內战中取得胜利，結果使克倫族和撣族作为两个独立国家从緬甸分立出来，这样的前途在当时是非常可能实現的。当时估計，克倫族和撣族的国家統治者会同英国建立起极密切的

---

① 《Trea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Burma regarding the Recognition of Burmese Independence and Related Matters. London, October 17, 1947》. London, 1948, p.2—8.

② 同上书第9—11頁。

③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Commons》, vol. 443 (November 5,1947),p. 1877—1897.

④ 同上书第1902—1911頁。

关系，这不仅是由于傳統，而且由于这两个新国家将需要得到防止緬甸侵害其独立的保障。

但是，緬甸內战的进程——首先是共产党人影响的扩大——，使英帝国主义者极其忧虑。到1949年春末夏初，英国政府似乎已經得出了結論：对于帝国主义在緬甸的陣地来說，主要的危險是共产党。印度总理尼赫魯当时談到召开关于緬甸的英联邦国家会議的原因时說："我看到，英国政府和其他政府所怀抱的恐惧是，如果保持現状，其他分子在緬甸将会起比克倫族和緬甸政府都更重要的作用……"①

英国政府由于考虑到这种危險而同德欽努政府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早在二月間，英国在答复緬甸人提出的关于軍事和財政援助的要求时，就曾建議由英联邦各国調处同克倫族的談判——这在德欽努政府看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到这时倫敦則向德欽努政府提供了軍事援助，特别是給政府軍一万支步枪。② 英国議会中的反对派要求让德欽努保证軍事援助将不用于反对克倫族人，但是工党領袖們却滿有一套正当的想法：不提出这样的要求。同样地，工党領袖們拒絕在向緬甸政府提供援助时以对英国作重大让步做前提条件，而某些保守党人却坚持这一点。

这样，緬甸人民走向独立的道路就成为漫长的和痛苦的。它不得不先后同英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然后再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爭。緬甸付出了慘重的牺牲，由于爱国力量的英勇、頑强和坚决，才从殖民主义的强固的魔爪中爭得了自由。但是，获得政治独立这本身还并沒有为緬甸人民带来經济解放、和平和繁荣。

---

① 引自 *K. Karunakaran.* India in World Affairs 1947—1950. Calcutta, 1952, p.110。

② *J. Cady.*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p.598.

四、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者的解放战爭

1942年初，日本的武装力量在印度尼西亚各島上开始进行軍事行动。派駐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軍队沒有对日本武装力量进行认眞的抵抗，并且拒絕让当地居民支援战爭和参加战爭。1942年3月，荷兰行政当局投降了。

在很多印度尼西亚政治活动家看来，日本占領比荷兰統治似乎坏处还少一些；而且，在日本人占領下，他們还有一定的条件設法取得哪怕是部分的自治。在战爭进行时，日本向民族的政治集团討好，并維持了日本負有解放使命的神話。

当时曾允許用印度尼西亚語出版报紙，允許各爱国的文化团体进行活动；从监獄中釋放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們，包括苏加諾。很多以前仅由荷兰人担任的行政职务，也任命印度尼西亚人担任。①这些让步都带有被迫的性质。日本所关心的是能不間断地得到石油、大米和有色金屬的供应，并且希望能控制住印度尼西亚而不占用大批的武装力量。但是，印度尼西亚的爱国集团利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政治賭博，来为自己爭取完全独立的斗爭作准备。

反日的情緒在印度尼西亚逐漸增长起来。成立了一些不合法的組織。在准备驅逐占領軍的工作中，共产党起了最显著的作用。沙里佛丁左派也进行了积极的地下活动。某些右派活动家，特别是沙里尔，也参加了反对日本当局的不合法斗爭。担任公职的一些印度尼西亚人——如苏加諾、哈达，同一些地下組織，包括同共产党人，保持了密切的接触。

1943年3月，在爪哇島和馬都拉島上所有正式存在的爱国团体都联合起来。被称为"普帖腊(Путера)"②的新中心組織，由苏加諾領导。但是，

① 在荷兰統治下，行政人員中只有7%是印度尼西亚人。(*D. Woodman.*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London, 1955, p.182.)

② "各种政党联盟"。——譯者

到这一年年底，日本当局了解到这个联合組織不遵循亲日的方向，因此解散了“普帖腊”，而代之以在占領軍严密监視下进行活动的新的組織。同时，日本人建立了宗教性的政党“馬斯友美党”，企图倚靠宗教界势力。由日本当局所采取、但后来被民族解放运动所利用的一項重要措施，是建立一些印度尼西亚的軍事性和半軍事性的組織。这些組織中最大的一个——彼塔(Пета)①到1944年底已經有了一万二千名战士②。

根据日本占領当局的阴謀，它所采取的一些蠱惑人心的措施要以横暴地掠劫印度尼西亚人的国家財富来抵偿，結果，印度尼西亚的經济状况显著恶化。被日本包括到“大东亚共荣圈”內的印度尼西亚人民群众在忍饥挨餓。他們的劳动遭到新出現的殖民者的殘酷剝削。“亚洲人为了亚洲人！”的口号实际上却表示“亚洲人为了日本帝国主义！”

为要討好輿論，占領当局允許苏加諾在1943年成立一个权力极有限的印度尼西亚中央委員会。“軸心”国在前綫的形势越来越坏，日本也就越来越慷慨地許願。1943年底宣布，印度尼西亚将获得独立。1945年3月，甚至成立了印度尼西亚独立筹备委員会。但实际上，这个国家依旧是殖民地。因此，印度尼西亚的爱国者們准备为爭取解放而进行决战。早在日本軍队投降以前，印度尼西亚的爱国者們就发动了起义。他們在許多地方解除了日本占領軍的武装，幷拘禁了日本占領軍。

1945年8月17日，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告成立。八月革命具有首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內容，这次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农民阶級。国內的主导政党——民族党在自己的队伍中集結了既包括右派、又包括左派的各色各样的人。

---

① “祖国保卫軍”。——譯者

② *G. Kahin.*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p.109.

苏加諾成为共和国的总統，哈达成为副总統。成立了第一届共和国議会——印度尼西亚中央国民委員会。新的政权机关完全控制了国内各主要地区。它們廢除了荷兰統治时期那些侵害工人阶級罢工、組織工会、集会和游行权利的法律。人民的代表們被吸收参加各种管理机关。国家暫时控制了屬于外国資本的工厂，但預先說明厂主有权索回他們的財产或取得补偿。在某些企业中建立了工人的监督。但是，土地問題的解决实际上甚至沒有开始。

苏加諾总統宣布，共和国政权在解除日本武装力量的武装和拘禁他們的工作中将与各盟国合作。他要求那些已派軍队到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在对日本降軍的手續結束后立即把自己的軍队撤回。但是，在各盟国軍队面前却摆着另外一种任务，它們对解决这种任务比起对解除日軍武装和拘禁日軍来竟表現得更加急切和热中。这种任务就是恢复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統治。荷兰拒絕承认新的共和国，而所持的口实則是虛妄地指責印度尼西亚領袖們曾同日本“合作”。由荷兰盟国——英、美提供武器和装备的一些荷兰軍团火急地調运到印度尼西亚各島。殖民行政机构又重新成立起来；荷兰各公司的代表又涌向印度尼西亚来，他們忙着把各銀行和商号門上的日本招牌換上荷兰招牌。

印度尼西亚人民手执武器来迎击老殖民主义者。这时，荷兰統治集团决定进行談判，以便贏得时間，准备大規模的軍事行动。

在这种欺騙印度尼西亚輿論的图謀中，英軍司令部和官方代表起了可耻的作用。英国駐东南亚特使基隆勛爵，凭恃着依然留在印度尼西亚境內的英国軍队，竟在談判中扮演起調停者的角色。1946年10月14日，签訂了停战协定。协定規定，荷兰須限制其武装力量为九万一千人，即到停战前已有的人数。但是实际上，不仅在談判期間，而且在协定签訂以后，荷兰軍队继續調运到島上来，因而人数很快竟达到十二万人。荷兰殖民軍大力以美、英軍事技术装备自己，其中包括大炮、坦克和飞机。

如果沒有美、英的財政和軍事援助，荷兰本来是不能对印度尼西亚进行殖民战爭的。仅从1945年9月至1947年7月这段期間內，荷兰就从美国得到信用貸款和一般貸款达五亿五千万美元。在建立西欧联盟和接受"馬歇尔計划"以后——即在荷兰軍队进行最猖狂的軍事行动时期——，美、英对荷兰殖民者更大力提供了財政和軍事援助。

1946年11月，荷兰同印度尼西亚双方草签了所謂林芽椰蒂协定。但是，荷兰人提出了国际法历史上从无前例的要求：把协定的解釋权只給荷兰一方。因此，林芽椰蒂协定直到四个月以后，即1947年3月25日才签訂。

根据这一协定，荷兰对在爪哇、苏門答腊和馬都拉島上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存在作了事实上的承认，并許諾"到将来"甚至还把各島上仍由荷兰軍队或英国軍队占領的各地区交給共和国。当时达成协議，要"尽速在联邦基础上建立民主的主权国家，該国家将名为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①。除爪哇、苏門答腊和馬都拉各島外，婆罗洲和东印度尼西亚各島也必須并入新国家。荷兰和印度尼西亚双方承担义务，在执行协定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見分歧，必須交付仲裁解决。最后这一款是作为对协定全文解釋問題的妥协而載入协定的。

到这时，荷兰政府感觉自己对战爭已經做好了充分准备，于是就甚至寻求能破坏和平解决的口实，它要求在共和国領土內由荷兰与印度尼西亚的联合警察执行任务。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到巴达維亚② 就这个問題进行談判，这时荷兰帝国主义撕下了假面。1947年7月20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团在巴达維亚被逮捕，荷兰軍队为消灭新的共和国而开始了軍事行动。

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結在各爱国的政党周圍，这些政党号召为

① 引自 *D. Woodman.* 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 p. 236。

② 現改称雅加达。——譯者

自由和独立战斗到最后胜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起了卓越的作用，它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进行奋不顾身的斗爭，从而在人民群众中赢得了广大的影响。与共和国正規軍的軍事行动同时，还广泛地展开了游击运动。成立了在社会党領袖沙里佛丁領导下、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联合政府采取了为国家彻底解放而坚决斗爭的路綫。

荷兰帝国主义的背信棄义激怒了全世界的輿論。苏联各族人民坚决譴責了荷兰殖民者的侵略行为。

殖民战爭在印度尼西亚重新爆发，这在印度引起了不滿的反应，当时印度正处于独立的前夕。尼赫鲁总理譴責了荷兰的行动；印度政府要求立即在安全理事会討論这个問題。澳大利亚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驟。不过，被邀請参加討論的印度代表指出荷兰的"警察行动"是侵略，而这种侵略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所以要求停止这种行动；而澳大利亚代表却确定了……由双方破坏停战协定的事实，并呼吁双方停止軍事行动。殖民国家——英国、法国、比利时——同荷兰代表勾結起来，而荷兰代表則硬說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件是它本国的內政。最后，終于通过了一項号召双方停止軍事行动的决議(1947 年 8 月 1 日)。但是，荷兰当局相信自己可以不受制裁，因此虽然頒发了停火令，实际上却继續在馬都拉島上进行軍事行动。于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要求联合国派遣特别委員会到当地来。1947年 8 月25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項决議，根据該决議成立了两个委員会。其中一个委員会由駐巴达維亚的領事代表(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和中国的領事)組成，受委托观察事变的发展和报告停火协定的执行情况。另一个委員会——"斡旋"委員会的任务則是調停談判和停战的执行。这两个委員会都千方百計地为荷兰洗刷罪行，并侵害年輕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希望它很快就灭亡。

但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英勇地抵抗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所鼓励的荷兰侵略，从而挫敗了殖民者的計划。結果，荷兰不得不同意停战，于1948年1月17日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签訂了所謂倫維尔协定。

在协定中确定了尔后政治安排的一些基本原則：1. 印度尼西亚人民享有独立；2. 根据联邦原則（在荷兰暫时保留宗主权的条件下）成立有主权的印度尼西亚联邦；3. 印度尼西亚与荷兰王国結成联盟等。①但是，荷兰却把倫維尔协定看做一紙空文，或者不如說看做一个幌子，来掩飾它继續执行原先的消灭印度尼西亚独立国家的路綫。执行安全理事会中帝国主义多数意志的联合国委員会，对于这种路綫絲毫也不加以阻撓。在根据倫維尔协定荷兰必須撤軍的一些地区，赶忙就成立了一些傀儡政府。

帝国主义者当时认为头等重要的任务还包括設法不让眞正革命的力量积极参加印度尼西亚的領导工作。他們依靠印度尼西亚国內反动势力，在1948年1月終于推翻了沙里佛丁政府。民族党的反动活动家哈达領导了新政府。这时，資产阶級中，尤其是資产阶級上层中的許多人都已經脫离开主張捍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人們，而上述种种事变正是与这一情况有直接联系的。印度尼西亚資产阶級中的这一部分懾于劳动阶級势力的加强，竟在1945—1947年实际上成为最反动的势力的同盟者。封建和宗教集团依然占据着强固的陣地，它們是革命的死敌和殖民統治的支柱。在人民解放战爭的条件下，他們企图从进步势力手中夺取主动权，消灭人民的胜利果实，并保存住能让他們随心所欲剝削劳动阶級的反动制度。

各民主的組織为保卫革命利益而团結起自己的力量，并对反

① *K. Karunakaran.* India in World Affairs, 1947—1950, p.223—224.

动势力进行还击。1948年5月成立了人民民主陣綫，它在共和国議会中占有一半席位。三个工人政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社会党和印度尼西亚工党在同年八月通过了合并为一党的决議。人民民主陣綫預定在十月举行全印度尼西亚代表会議，会上将通过使革命深入发展的綱領。

反革命势力也已經准备好进行决战。反动势力为了打好同荷兰人勾結的基础和保全封建地主阶級利益，而沉重地打击了民主运动，首先是共产党。

1948年9月，在馬迪翁(茉莉芬)被挑起一次武装冲突。經过几个月的恐怖行动以后，反动势力使共产党失去了領导。像慕梭、沙佐諾、达魯斯曼以及以前在社会党同共产党合并中起过积极作用的沙里佛丁等共产党著名領导人都遭到杀害。成千的进步活动家被投入集中营和监狱。所有这些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八月革命。正如迪·努·艾地所写的，1945—1948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农民阶級"沒有被充分地发动起来进行斗爭和参加革命"。結果，反帝民族革命和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一些最重要的任务就相互割裂地来解决①。

荷兰帝国主义对单凭武力重新奴役印度尼西亚既已絕望，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准备背叛本国人民利益的封建和宗教集团的分立主义傾向上。在印度尼西亚全境像雨后春笋似地开始长出一些傀儡"国家"：东印度尼西亚、东苏門答腊、馬都拉、西爪哇、南苏門答腊、东爪哇等。

荷兰人人为地扶植起一批傀儡政权，企图利用由地理条件和經济条件所造成的这个国家的分散状态及其各地区間的隔离状态。印度尼西亚位于很多海島上，在这些島屿之間来往需要乘船，

① 参見*Д. Н. Айдит.* Индонез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индонези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ндонез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58, стр.57.

而这些島本身又大多布滿难以穿越的密林，交通系統不很发达。在某些島上的居民中間，当时甚至連民族統一的感覚都不很发达。把印度尼西亚肢解为一些弱小国家，让这些国家的統治者仰賴宗主国的施舍，去反对爱国力量——这就是荷兰殖民者的新策略。从这种政策中不难看出，荷兰企图运用从来沒有使英国"解放者"得到預期效果的在印度和緬甸分裂国家的試驗。当时估計，傀儡国家联邦将能組成临时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无形中取代苏加諾的共和国政府。甚至联合国委員会对这些計划也表示悲观，但这不是因为它认为这些計划表現了肆无忌憚的殖民主义，而是因为它认为这些計划实际上不可能实現①。与此同时，还对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实行了旨在从經济上窒杀它的封鎖。

美国外交官員这时开始了解，荷兰帝国主义的計划是空中楼閣，它已經掌握不住印度尼西亚。当时出現的局势被华盛頓的政客們名之为"政治眞空"；对于美国来說，出現了取代正在被驅逐的老殖民主义的可能性。华尔街之所以这样想，除去为它自己狹隘的帝国主义利益之外，还基于整个帝国主义陣营需要从政治上和經济上控制住像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个在一切方面都关系重大的国家。而这一点在目前的时代归根結蒂总是会把不同国家的帝国主义者从竞爭者变为同盟者。

1948年夏季，联合国印度尼西亚委員会中的美国和澳大利亚代表提出了一个調处方案，但是荷兰統治集团拒絕接受。荷兰統治集团认为埋葬老殖民主义还为时过早，而力图用武力使它"起死回生"。1948年11月荷兰外交大臣史蒂克同哈达总理談判后认为可以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达成协議，但是他实际上却由于荷兰內閣使节团的派遣而被本国否认了。荷兰內閣使节团把談判变成了

① *K. Karunakaran.* India in World Affairs, p.25.

一場鬧剧，它要求恰恰是把印度尼西亚全部武装力量都交由荷兰指揮。正如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在致亚洲国家协商会議（1949年1月为討論印度尼西亚問題召开的）的备忘录中所指出，荷兰使节团所进行的談判，目的不是要达成协議，而是要欺騙輿論，特别是欺騙联合国①。

1948年12月2日，荷兰政府宣布它停止談判并成立印度尼西亚临时政府。两周以后，荷兰帝国主义者要求"斡旋"委員会爭取使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也同意这样作②。次日，1948年12月18日，海牙政府向委員会中的美国代表宣称，它认为自己已不再受倫維尔协定約束（說起来，它从来也沒有遵守过这个协定），并认为停战协定已經无效。荷兰軍队立即就不通知对方而开始全綫大举进攻。

这次进攻是事先經过縝密准备的，而1948年間所有的談判——关于移交主权的期限、高級专員的权力和荷兰軍队的地位等——之所以必要，之所以延續，不过是为了准备进攻，在荷兰上层人物看来进攻才应該是带有决定性的。

軍事行动的进程在最初对侵略者非常有利：荷兰人搶占了爪哇和苏門答腊的一些最大的城市，包括共和国的首都。印度尼西亚武装力量轉入了游击战。安全理事会中的英、美多数这时采取了两面态度：它們号召双方停战（仿佛这还决定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同时又拒絕苏联代表提出的要求把軍队撤至12月18日前双方所占界綫的决議草案。这样，如果荷兰眞执行了它的老同伙們的停战建議，它的战略地位仍然会是占优势的，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則只有破坏停战协定才能解放自己的領土。但是，荷兰

① «Indonesian Republic's Memorandum to the Asia conference on Indonesia», January 1949.

② 委員会中的美国代表怀疑怕不能說服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不經过談判就同意这样作，因此建議荷兰通过继續談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統治集团相信，同共和国派的战斗指日即可結束。他們在答复安全理事会的决議时，正是以这种信心来进行安撫。安全理事会中的多数为了蠱惑人心，偶而也通过一些模棱两可的决議，但是根本不想对荷兰施加有效的影响。

苏联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中对战斗中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进行了精神上的援助。但是英、美集团在安全理事会中处于控制地位，結果苏联捍卫印度尼西亚人民利益的試图遭到了利用"表决机器"的帝国主义者的抗拒。亚洲各族人民为印度尼西亚的命运感到深重的忧虑。为抗議殖民者的行为、拥护同印度尼西亚人民团結的群众集会遍于整个东南亚。甚至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錫兰的資产阶級政府也决定向印度尼西亚表示团結一致，并提供了虽然是不十分有力的支援。錫兰政府对載运軍用貨物去印度尼西亚的荷兰船只和飞机，禁止进入錫兰港口和添燃料。印度和巴基斯坦停止了对荷兰"皇家航空公司"飞机的服务，緬甸政府則建議召开专門的国际会議。賈瓦哈拉尔·尼赫魯响应了这个建議，1949年1月20日至23日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錫兰、阿富汗、伊朗、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也門、埃塞俄比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代表在德里会晤。

为討論殖民者侵略行为而召开的这第一次亚洲和非洲各国的会議，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現象。賈·尼赫魯在关于召开会議的宣言中直接譴責帝国主义集团各国是荷兰侵略行为的共犯，他宣称："世界比較明显地被分割成几个互相角逐的国家集团，它們主張甚么呢？它們对这种消灭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企图的反应是甚么？我們必須遺憾地承认，某些大国的态度表現为沉默地贊許或同意这种侵略行为。有一个荷兰参加的西方联盟。这个西方联盟的立場是怎样的呢？它(向荷兰)提供錢財……"①

① 《The Times of India》, 23. I. 1949.

但是，总的說来，会議并沒有走上坚决捍卫印度尼西亚和譴責荷兰的道路。会議通过的决議仅只对安全理事会的各項决議表示支持。这个决議中的新东西仅只是指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要求的期限：3 月 15 日以前解放被占領的地区，1950 年 1 月 1 日以前成立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会議的参加者想尽办法强調他們并不打算"暗中取代"联合国，而只限于向荷兰提出口头呼吁，但荷兰对这种呼吁比对安全理事会的决議更漠然視之。

但是，荷兰統治集团預想的"閃电战"不仅出乎始料所及地延宕下去，而且遭遇到印度尼西亚爱国者的英勇抗击。进攻在密林中失敗了；殖民者所控制的只有城市，印度尼西亚的內地都仍然是解放运动的根据地。爱国者的武装力量威胁了荷兰的交通綫，甚至轉入了对殖民者的进攻。威胁着干涉者的是消耗战，而消耗战的下場——1949年春天已經很明显——只能是被赶出印度尼西亚全境。

因此，在 1949 年 3 月荷兰政府就向联合国委員会建議，組織圓桌会議来"解决"印度尼西亚問題。荷兰不得不同意給印度尼西亚以形式上的独立。但是，荷兰帝国主义在同意这种步驟时，还企图保留下一些进行控制的无形的杠杆，至少也要把政权交給那些主張同西方結成軍事政治联盟的反动集团。

1949 年夏季事变的进程证明，恢复以前的軍事鎮压政策已經不可能。8 月 23 日，在海牙召开了圓桌会議。除荷兰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代表外，参加的还有联邦协商議会，即荷兰人在西爪哇、东印度尼西亚等地建立的傀儡政权的代表。圓桌会議于 1949 年 11 月 2 日以签訂协定結束。

荷兰答应一定在 12 月 30 日以前把对印度尼西亚領土的主权无条件地彻底地最終地移交給被建立的独立国家——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西伊里安(新几內亚)在一年之內有条件地留归荷兰，以后通过荷兰同印度尼西亚联邦之間的談判决定其地位。(以后情况表明，荷兰根本就不想通过

談判解决西伊里安問題，而准备无視印度尼西亚人民对这一地区的主权，把它保留为荷兰的殖民地。）两个国家建立了联邦，联邦的目的是在国防、对外联系以及（根据需要程度）財政、經济等問題上滿足"双方的利益"。荷兰人认为要保持自己在印度尼西亚一些最重要生活領域中的影响，要保持印度尼西亚的依賴性，主要的是这一款。对于实行这一款的保证，則是作为"客人"留駐印度尼西亚各島上的荷兰軍队。

这样，长期的殖民战爭并沒有帮助荷兰重新使印度尼西亚屈从自己。尽管帝国主义者和印度尼西亚国內反动势力策划了种种敌对的阴謀，人民仍在战斗中捍卫了自己的独立。由于海牙圓桌会議的結果，荷兰帝国主义被迫在形式上承认了印度尼西亚的独立地位，但是它仍指望着协定的条款和强固的經济陣地将能使它保持住对自己前殖民地的控制。正如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綱領中所指出，哈达政府由于签訂圓桌会議协定而恢复了荷兰帝国主义者对印度尼西亚經济的控制①。只是随着时間的推移，印度尼西亚人民才粉碎了这种計划，走上使祖国完全解放的道路。

*　　*　　*

战后最初五年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各广闊的殖民帝国中"風暴和冲击"的时期。印度和巴基斯坦，緬甸和錫兰，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获得了政治独立。固然，一系列的地区依然在帝国主义的直接控制下——印度支那、馬来亚、西伊里安、新加坡及其他一些較小的殖民地。但是，在殖民地亚洲史上 1945—1949 年时期的特点在于，大多数被压迫民族終于消除了在政治上依附宗主国的状态。

帝国主义者并不是自願地放棄自己的陣地的。相反，他們死抓住政权不放，力图尽可能长期地为自己保持殖民地。但是，殖民主义在亚洲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各族人民正在抛棄外国的桎梏，以

① 参見 *Д. П. Айдит.* Индонез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индонези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стр.45。

重大牺牲为代价争取独立。

但是，前殖民地赢得政治独立，并沒有使它們彻底摆脫帝国主义的統治。西方各壟断組織在一些最重要的經济部門中依然从經济上恣意妄为。在赢得独立以后，工业的落后和不发达，經济的畸形、片面性质以及长期殖民奴役的一些其他极有害的后果，阻碍着这些新国家的独立发展，成为它們的致命弱点。而帝国主义则企图利用这一切来保持——但是已經用新的形式——自己对这些新国家的控制。

几乎整个南亚和东南亚都得到了政治上的解放，这对于国际关系有重大的意义。一些客观因素促使这些新国家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拒絕听从帝国主义大国的号令。經济发展的利益要求它們执行爱好和平的政策，在它們所处的地区以及在全世界范圍內巩固国际和平事业。許多亚洲年輕国家的这种政策越积极，广大人民群众对对外政策路綫的支持越强有力，这些国家的态度也就有更大的影响。

第 十 章

近东、中东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一、战后最初几年国际关系中的近东和中东

战后时期，在社会主义、和平、民主力量与帝国主义、战爭、反动力量間展开的大規模斗爭中，近东和中东占有显著的地位。

这一地区总面积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①，从东地中海延伸到波斯

① 这个地区的总面积应約为七百九十八万四千平方公里。——譯者

灣，从尼罗河流域到巴基斯坦①。这个地区的人口約一亿二千七百万人。位于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不小程度上决定于它們的战略位置。近东、中东地区邻接苏联南部边界，并处于欧、亚、非三大洲交会处；在这一地区还有一些陆地、海上和空中通道，把三大洲同大西洋和印度洋联接起来，也有从西欧去印度洋的最近便的水路——苏伊士运河。

在近东政治詞汇中，“石油”这个字已經經久不变地用了五十年之久②。資本主义世界經过勘测的石油蘊藏量三分之二集中在近东和中东。

近东和中东各国的特点是，它們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惊人的差異。这一地区的資本主义主要是从外部通过外国投資才培植起来的，这就在其經济中引起了强烈的对照。甚至在那些資本主义关系比較发达的国家——如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和以色列，現代工厂企业也淹沒在小企业和手工作坊的大海里。

外国資本在近东和中东建立起按最新技术成就装备的强大的石油采掘工业，修建了道路和飞机場。在石油工业企业中集中了相当众多的无产阶級群众。

同时，在这人口三分之二以上从事农业的地区，各国农业中都还保留着半封建关系，在游牧和半游牧部落中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关系的殘余；在阿拉伯半島各国，封建制度和原始公社关系殘余还凌駕正在萌芽的資本主义制度。

所有这些就造成了解放斗爭形式和手段的多种多样，使斗爭呈現出一

---

① 在苏联文献中，近东和中东通常包括七个資产阶級共和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叙利亚、伊拉克共和国、黎巴嫩、苏丹、以色列；三个立宪君主国：伊朗、阿富汗、約旦；两个专制神权君主国：沙特阿拉伯、也門（1962年成立共和国。——譯者），以及英国在波斯灣和阿拉伯半島上的一些殖民領地和被保护国：亚丁、阿曼和馬斯喀特、麦什哈特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群島。除土耳其、以色列、伊朗和阿富汗外，所有其他近东和中东的国家都是阿拉伯国家。在苏联的科学和政治文献中，伊朗和阿富汗通常划入中东本部地区。

② 实际上，除去少数例外情况，近东和中东的一切石油工业都掌握在由美、英、荷、法資本所控制的大石油壟断組織手里。这些壟断組織掌握着近东、中东租让和租借面积的92.2%，經过勘测的石油藏量的99.9%，石油采掘量的99.7%。

幅五色繽紛的图景。此外，近东、中东各国居民在民族和种族成分上又极复杂①，宗教信仰也紛歧杂多②，因此，近东、中东各国民族运动甚至阶級斗爭也就时常带有中世紀的宗教色彩。国內各种力量的政治分布的特殊性也影响着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

在战后时期，近东和中东也像亚洲其他許多地区一样，成为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革命的場所。这里局势的特点是，帝国主义各大国的政策造成了異常的紧張，这些大国只要能保持住这一地区作为殖民剝削范圍，只要能在这里巩固其軍事战略体系，就竟然无所不为，甚至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近东和中东的国际气氛也由于帝国主义大国（首先是英国同美国）之間的角逐而变得很熾热。这里曾多次发生过足以酿成新的世界性大屠杀的"局部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近东和中东的軍事战略意义、經济意义和政治意义都增加了。世界帝国主义丧失了自己在中欧和东南欧，特别是在巴尔干一系列国家境內的进攻基地，它采取了在近东和中东沿苏联边境巩固現存的和建立新的强大进攻基地的路綫，因此，近东和中东地区就开始在世界帝国主义的战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武装力量总司令、美国将軍（后来成为美

① 在近东和中东住有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阿富汗人、波斯人、犹太人。有势力的少数民族是庫尔德人，他們居住在土耳其、伊拉克（占人口的16%）、叙利亚、黎巴嫩和阿富汗（及伊朗。——譯者）；庫尔德人总計达五、六百万人。在阿联、叙利亚、黎巴嫩、伊朗，有相当多的亚美尼亚人。此外，还住有契尔克斯人（叙利亚、黎巴嫩、約旦、土耳其）、艾索尔人（或亚西利亚人）（伊拉克、伊朗）、土庫曼人（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印度人和非洲人（沙特阿拉伯、也門、波斯灣的阿拉伯沿岸地区、亚丁、巴林群島）、巴基斯坦人、俾路支人、阿塞拜疆人（伊朗阿塞拜疆）、烏茲別克人和塔吉克人（阿富汗）以及其他民族和种族集团。

② 近东和中东的多数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同时，在这一地区的各国中有可观人数的基督教徒（例如在黎巴嫩占居民的53%）和信奉犹太教的人（以色列）；存在着許多伊斯兰教的（逊尼派教徒、十叶派教徒、伊斯迈尔派教徒、阿拉維特派教徒、德魯斯派教徒、瓦哈比特派教徒、賽迪特派教徒）和基督教的（东正教的亚美尼亚一格利果利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瑪隆尼特〔住在黎巴嫩山麓的一派耶穌教徒。——譯者〕）教派。

国总統)德·艾森豪威尔正是表述了这种观点，他在自己的一项声明中强調指出："从战略观点看，世界上沒有比近东和中东更重要的地区。"①

近东和中东的經济意义之所以不断增大，主要是由于它在向世界市場提供石油方面起的作用越来越大。1938年近东和中东的石油采掘量为一千六百万吨，占資本主义世界石油采掘量的5.7%，到1946年在这个地区已經采掘三千五百五十万吨，占資本主义世界石油采掘量的9.4%。②

在战爭年代里，近东和中东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所起的作用显著地增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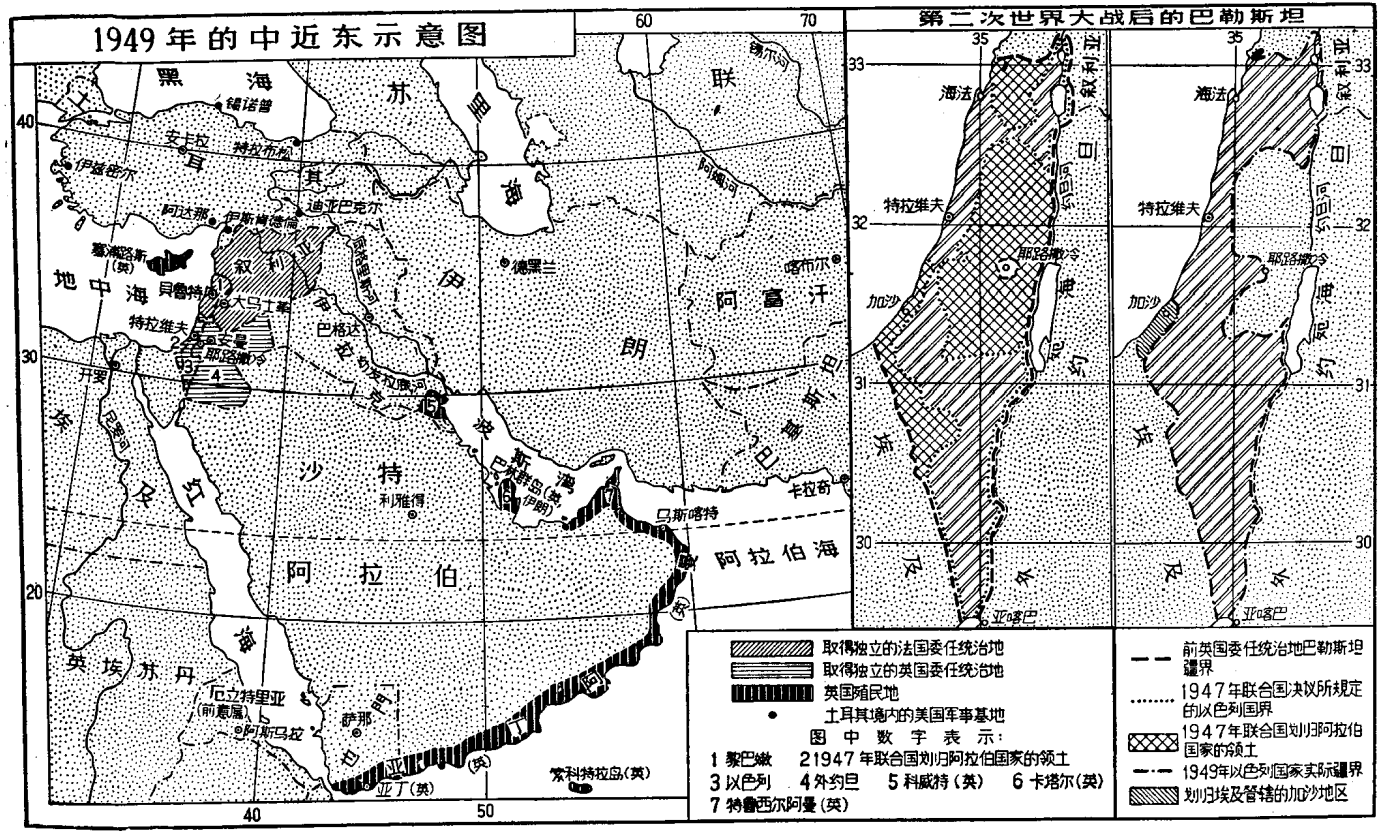
在战爭时期，近东和中东的土地、人口、軍事一經济潜力大部分都由英、美司令部以及"战斗法国"③軍队司令部所控制。同盟国軍队与"軸心国"軍队之間的直接交鋒只是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境內进行。

在战时条件下，阿拉伯各国的民族解放力量从英、法帝国主义爭到了一些重大的让步。"战斗法国"政府的宣言特别重要，这个宣言确认了关于賦予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諾言。这个宣言是1941年6月盟国軍队开进叙利亚和黎巴嫩境內的前夕由賈德魯将

① 引自 United States Congres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Appropriations. Departments of State and Justice, the Judiciary and Related Agencies. Appropriations for 1957. Department of State. Refugee Relief Program. 84 Congress II Session. Washington, 1956, p. 198。

②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1945 to 1954». Supplement to World Economic Report, 1953—1954.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55, p. 3.

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法国政府投降德国后，戴高乐在丘吉尔的支持下于1940年8月在倫敦組織"自由法国委員会"，簡称"自由法国"。1942年7月14日改名为"战斗法国"。1945年11月戴高乐在巴黎組織政府，"战斗法国"宣告結束。——譯者


1949年的中近东示意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巴勒斯坦
黑海
地中海
阿拉伯海
红海
波斯湾
阿曼湾
阿拉伯
叙利亚
伊拉克
约旦
埃及
沙特
英埃苏丹
联
土耳其
伊朗
阿富汗
巴基斯坦
锡诺普
安卡拉
特拉布松
伊兹密尔
阿达那
迪亚巴克尔
伊斯肯德伦
塞浦路斯(英)
贝鲁特
大马士革
特拉维夫
亚喀巴
耶路撒冷
开罗
巴格达
德黑兰
喀布尔
卡拉奇
马斯喀特
利雅得
巴士拉
萨那
亚丁(英)
索科特拉岛(英)
阿斯马拉
的黎波里亚(前意属)
海法
加沙
取得独立的法国委任统治地
取得独立的英国委任统治地
英国殖民地
土耳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
图中数字表示：
1 黎巴嫩 2 1947年联合国划归阿拉伯国家的领土
3 以色列 4 外约旦 5 科威特(英) 6 卡塔尔(英)
7 特鲁西尔阿曼(英)
前英国委任统治地巴勒斯坦疆界
1947年联合国决议所规定的以色列国界
1947年联合国划归阿拉伯国家的领土
1949年以色列国家实际疆界
划归埃及管辖的加沙地区

軍发布的。①

苏联战胜了法西斯主义，苏联的实力和威望由于战爭的結束而增强，这对于近东和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遭受严重削弱的远景的出現，具有重大的意义。甚至当苏軍进行防御战爭而实行退却时，在那对苏联人民来說十分艰險的年月里，苏联还是尽力之所能及，支持了近东和中东各族人民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苏联首先承认了叙利亚的独立（1941 年 9 月 27 日宣布独立）和黎巴嫩的独立（1941 年 11 月 26 日宣布独立）。

随着苏联在世界政治中，同时也在近东政治中实力和威望的增强，出現了一些对于爱国、反帝力量的斗爭更加有利得多的条件。苏联在战爭中的胜利在近东和中东各国引起了显著的意識形态的变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望提高了，同时，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的吸引力也增强了。

苏联在战爭年代中同阿拉伯各国建立外交和文化关系并在战后发展这种关系，是近东政治中的重大事件之一。1943 年 8 月，埃及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②（在这以前二十年来只有貿易关系）。1944 年，苏联同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建立了外交关系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結果为近东和中东的深刻变动造成了一些前提，这不仅是因为世界舞台上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战爭时期在这些国家內部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社会經济性质的变化。

首先，由于战爭时期的情况和需要，工业发展的速度几乎在近东和中

---

① *Général Catroux*. Dans le bataille de Méditerranée, Egypte, Levant, Afrique du Nord, 1940—1944. Paris, 1949, p.137.

②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 стр.401—402。

③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I, стр.153—154, 162—163, 212—213。

东一切国家中都显著地加快了。工人阶級的人数增加了，民族資产阶級的陣地加强了。这些阶級在战后时期也就成为爭取使近东、中东从帝国主义統治下解放出来的主要力量。

在这一地区的多数国家中，民族資产阶級是民族解放斗爭的領导者，① 但是这一斗爭的主要重担却由劳动群众来肩負。在斗爭的准备和进行中，工人阶級的組織和政党起了重大的作用。其中某些組織和政党在战后时期从地下状态轉为公开②，其余的則仍处于非法状态，遭受殘酷的迫害。

近东和中东的民族解放革命与劳动群众爭取自己的阶級利益、反对封建压迫和資本主义剝削、反对外国和本国剝削者的双重压迫的斗爭交織在一起。

工人阶級及其各种組織的发展和巩固，工人阶級积极性的提高，是近东、中东各族人民在爭取本身解放的斗爭中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原因之一。同时，这又引起近东、中东各国統治集团的焦虑和恐惧，特别是促使民族資产阶級摇摆不定，要在国內政治方面和国际方面改变自己的立場和陣綫。

这种动摇态度也影响到近东、中东各国与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

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和近东、中东各族人民的邻邦，它的政策始終不渝地促使这一地区的各个国家便于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不仅近东、中东各国的劳动群众，甚至民族資产阶級的代表們也越来越了解并估計到这一点。

为了阻遏近东、中东工人运动的壮大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扩展，

① 伊朗的形势在战后最初几年則有所不同。

② 埃及共产党在战后脫离地下状态，在合法条件下进行活动，直到1948年春；叙利亚和黎巴嫩共产党在1941年脫离地下状态，在合法条件下进行活动，直到1948年；1941年10月在伊朗成立了伊朗人民党（杜德党）；在土耳其，社会党和工农社会党活动了一个短时期。

这一地区内各个国家的資产阶級往往堕落到执行反苏政策的立場。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对国内革命运动的恐惧就已經使土耳其民族資产阶級背棄了它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步立場；战后时期，也正是这种恐惧情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伊朗的种种事件的发展，决定了近东、中东各阿拉伯国家对外政策中的迂回曲折。帝国主义外交当局則人为地在近东、中东各国民族資产阶級中間鼓动和利用这种情緒。

二、美帝国主义在土耳其和伊朗发动进攻和建立軍事基地

法国和英国由于战爭的結果而遭到削弱，德国帝国主义和意大利帝国主义暫时被排除出近东政治舞台，这些似乎都在为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决定性的迅速胜利創造一些有利条件。但是，美帝国主义登上了舞台。美帝国主义在資本主义世界巩固自己的陣地，美国統治集团执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路綫，这在很大程度上对事变的进程起了坏作用；这加剧了国际紧張局势，并使战后时期近东、中东各族人民的解放及其社会經济进步遇到重重困难。

在美帝国主义者拟訂的攫取世界霸权的計划中也包括着这样一項任务：在近东和中东取代英国和法国，建立一个美国殖民帝国。

美国在战爭时期利用根据租借法所提供的援助（这为美国出口大开方便之門）和美国武装力量的駐扎，作为自己发动进攻的工具。

1942年6月，除英国中东司令部之外，在中东又成立了一个美軍司令部①。随着1942年11月初美軍在北非登陆，美国对整个地中海区域、包括对近东、中东各国的政治和經济扩張也急剧地加强了。

① 在英語文献中，近东和中东地区被簡称为中东。

当然，美国統治集团在近东和中东所采取的某些措施，是迫于对"軸心国"进行軍事行动的需要。但是，美国人无孔不入地設法在近东和中东长期站住脚。

美帝国主义者认为最有重要意义的是控制住石油資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在美国石油壟断組織控制下的有近东、中东全部租借地的一半以上，石油采掘量的13%以上和石油加工厂总容量的11%以上。但是，美国石油巨头們却得隴望蜀，密切注視着石油矿藏丰富的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位于波斯灣地区、石油蘊藏量最丰富的国家。

在战爭年代，美国參謀长联席会議坚决要求支持美国各石油壟断組織向近东和中东扩展。海軍上将李海(他在罗斯福总統时期和以后在杜魯門时期曾任美国參謀长联席会議主席)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參謀长联席会議尽一切可能，力爭使美国得到通向沙特阿拉伯石油的进路……战爭的經驗和參謀长联席会議对这个問題的研究使我們得出結論：如果不幸在欧洲开始新战爭，則掌握近东的石油或取得通向近东石油的进路，实际上对于美国人順利地作战会有重大的意义。"①

战爭結束后，美国壟断組織就进行反对1928年《紅綫》协定②，到1948年11月終于廢除了这个协定。在这以后，美国石油壟断組織在近东阿拉伯各国的投資开始急遽地增加：从1945年至1950年美国投資由二亿四千二百万美元增加到八亿五千三百万美元——即增加了两倍多。

美国資本在近东和中东之所以取得成就，有种种原因。法帝国主义和英帝国主义的削弱迫使懾于民主运动規模的近东和中东各国統治阶級在帝国主义大国中寻求新的、更强有力的盟国：美国就作为这种盟国出現。同时，在近东和中东各国居民的相当广泛的范圍內，对美国政策的眞正性质还抱有錯誤的想法。美国在这一地区还从来沒有直接地公开地表現为殖民强国；因此，近东、中东居民中甚至怀抱爱国情緒的集团里也有一部分人当时曾接受了

① *W. D. Leahy.* I was there. New York-London-Toronto, 1950, p. 184.

② 关于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間划分"势力范圍"的协定。

关于美国"反殖民主义"和美国对外政策"民主主义"的宣傳。这些集团曾想在反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斗爭中依靠美国，并利用美国的支持来清除封建殘余。这种心情在近东和中东的一部分軍官、知識阶层和民族資产阶級中，是很可以作为特征的。想利用美援来迅速推进近东、中东各国經济发展这样一种虛幻的希望曾經特别流行。

此外，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同英国和法国竞爭者角逐，对近东、中东各国还作了某些让步，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石油康采恩提出了一些更加有利的石油租让条件。

美国統治集团了解民族資产阶級、知識阶层和軍官的重要性，因此就寻求同这些阶层的代表人物的联系，而且往往还建立起这种联系。这些阶层的代表人物在某些国家里組成反对派来反对与英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封建保皇統治集团（例如在埃及），特别是在这种国家里美国推行了上述政策。但是，在美国能使封建保皇統治集团变作美国支柱的地方（例如在沙特阿拉伯），美国政客們却很快就忘掉了自己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民主主义"的放言高論，而千方百計地支持这些集团当政。

美帝国主义打着反对"苏联威胁"和"共产主义危險"的幌子，在近东、中东发动政治的和意識形态的进攻。

战爭結束后，美国立即着手在土耳其建立軍事基地，在伊朗建立据点。美帝国主义成为英、法帝国主义在土耳其的继承者；这种继承得到了英国的迫不得已的同意，甚至形式上由英国自己提出要求。

1947年2月24日，英国駐美大使通知美国政府說，英国已經不能再負担軍事上和財政上援助土耳其的开支（这种援助是根据1939年英土同盟条約①提供的）。这表明，英国已經不得不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对

① 大概指1939年10月19日簽訂的《英法土互助条約》。——譯者

土耳其事务所持的立場上退却下来。1943年在卡薩布兰卡会議上，丘吉尔爭取使西方各盟国同意，在土耳其"……軍事供应上和外交方面，决定性的作用仍保留給英国。"①

美国毫不迟延地利用了"邀請"。1947年3月12日，宣布了"杜魯門主义"②

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加强了土耳其反动势力的陣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土耳其統治集团曾宣布土耳其是"非交战国"，但事实上它支持"軸心"国反对苏联③，并是殘酷地鎮压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战爭結束后，这种政策的鼠目寸光以及它在政治上和經济上为土耳其造成的損害，都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

在整个战爭年代里，土耳其国內被种种迫害手段人为地加以压抑的不滿情緒不断地增长。战爭剛一結束，这种不滿情緒就充分表現出来。工农运动广泛地开展。議会中出現了反对派。

共和人民党的政府求助于政治上的权变手腕。在1945—1946年間，政府采取了一些旨在削弱人民不滿情緒的措施：通过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法律；廢除了一些战时的特别稅；議会的两級选举改为一級选举；允許成立政党(共产党除外)和进行活动，結果，除其他政党外，出現了社会党和社会工农党。

这些权变手腕使土耳其統治集团有了积聚力量的时間；然后，它在美

①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 p.626, 827.

② 参見本书第十四章。

③ 1941年6月18日，即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前四天，土耳其与希特勒德国签訂了友好互不侵犯条約。土耳其以重要的战略原料(首先是鉻)供应德国，并違反蒙特娄公約，允許德国和意大利的軍艦通过黑海海峽。有一些无可辯駁的材料证实，1942年秋季土耳其几乎已准备要参加反苏战爭；还在这以前，駐扎在与苏联外高加索接壤地区的土耳其軍队就已增加了一倍。希特勒匪徒在伏尔加河岸附近的潰敗阻抑了土耳其統治集团参加战爭。直到1944年8月，土耳其政府才与德国断絕了外交关系，到1945年2月，才对德国和日本宣战；土耳其被迫采取这种措施，因为它企图避免使自己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地位，并保证自己能躋身于胜利国之列。(参閱：《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帝国主义支持下重新轉入进攻。社会党和社会工农党重新遭到禁止。只有地主阶級和資产阶級—地主阶級的一些政党才仍然能自由活动。一些进步的組織遭到破坏，这些組織中的活动家們受到极殘酷的迫害。

土地"改革"的結果只是使富农阶級——統治集团在农村中的支柱——壯大了，使农民基本群众更加貧困并丧失土地。1945年土地改革的主要原則規定，超过五百公頃以上的地主土地应进行分配，但是連这一点也沒有实現。

"杜魯門主义"为美国在土耳其境內建立軍事基地，并为美国壟断組織奴役土耳其开路。根据1947年7月12日签訂的关于"援助"土耳其条件的协定①，美国軍人开始改組土耳其軍队，并按照美国規格重新武装土耳其軍队。土耳其的武装力量处于美国人的控制之下。此外，美国还有可能在土耳其境內建立自己的基地。伊斯肯德倫（以前的亚历山大勒达）变成了美国的巨大海軍基地；在阿达納、迪亚巴克尔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立了美国空軍基地。

1948年7月4日，美国同土耳其根据"馬歇尔計划"② 签訂了經济"合作"条約③，1948年12月签訂了关于文化合作的协定。这些文件为美国資本的扩張造成了广泛的机会。

为了保障美国商人的利益，美国政府采取了消灭土耳其民族工业的路綫。1947年到土耳其的以国务院顧問 M·托恩貝格为首的第一个美国經济使节团，就要求土耳其政府放棄"土耳其之父"基瑪尔（亦譯凱末尔）的經济政策中最重要原則——国家主义④，而正是国家主义帮助奠定了土耳其工业发展的基础。托恩貝格使节团坚持要以发展"个人主动精神"来代替

①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1947》, vol. VII, p. 300.

② 参見本书第二十五章。

③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1949》, vol. XXIV, p. 67.

④ 国家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土耳其民族解放革命后执政的資产阶級所推行的在土耳其經济中发展国营成分的政策。正如战前的經驗所表明，"土耳其之父"基瑪尔所实施的各种措施曾促使土耳其經济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高漲。

經济中的国家主义①。

美国統治集团在推行奴役土耳其的政策时，以“共产主义危险”和苏联对土耳其主权及生存本身的虛构的威胁来恫吓土耳其人。叛卖民族利益的土耳其資产阶級也用这种宣傳来掩飾自己，因为他們已經被土耳其国內和邻近的伊朗②的民主运动的規模吓倒，被近側——巴尔干开始的深刻的社会經济改革吓倒。

1946年苏联外交当局对土耳其所犯的一些錯誤也被利用来进行反苏、反共宣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土耳其統治集团所采取的直接以苏联为敌的背信棄义的政策，很自然地引起了苏联人民的不滿。原来他們一心只盼望——但是根本沒有盼望到——希特勒匪帮一旦在苏德战場上取得明确的决定性的胜利，就来攫取自己一份战利品，也就是在“消灭俄国”以后，由土耳其来吞并苏联阿塞拜疆的丰富的油田以及中亚細亚各苏維埃共和国的土地③。

战爭时期敌舰竟得以进入黑海这样一种局面引起了苏联人民和政府理所当然的不安，并希望更可靠地保証苏联黑海沿岸地区的安全，因为这一地区伸延达二千一百公里，并通向苏联各重要經济地区。但是，除去所有这些郑重的有根据的考虑和动机之外，在苏联对土耳其的政策中还渗杂了一些錯誤的外交行动，这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結果④。这些行动的大部分責任在于莫洛托夫，他当时担任外交部长的职务。苏、土关系的恶化是关于修改1936年蒙特娄黑海海峡制度公約的建議所引起的，这个建議

---

① *M. W. Thornburg* and oth. Turkey. An Economic Appraisal. New York, 1949, p. 250.

② 土耳其的庫尔德少数民族人数相当多，因此土耳其統治集团对伊朗境內庫尔德民主自治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感到惊惶。

③ 土耳其的一些泛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集团都曾公开提出过类似这样的要求。

④ 关于这个問題参見 *Н. С. Хрущёв.* Речь на четвертой сесси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четвертого созыва 29 декабря 1955 г. М., 1956, стр. 35.

沒有考虑到土耳其政府对保证海峡安全問題的立場。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提出的对土耳其的領土要求使气氛更加恶化。

这些都被土耳其反动集团和外国帝国主义利用来在土耳其加剧反苏、反共歇斯底里，并在保证土耳其"安全"的借口下把它拖进以美国为首的軍事集团。

在以后的时期，当苏共中央开始为清除对外政策中与斯大林个人迷信有关的种种恶劣杂质时，对土耳其所犯的一些錯誤才得到糾正。1953年5月，对土耳其政府声明中說，"为保持善邻关系和巩固和平与安全，亚美尼亚及格鲁吉亚政府认为可以放棄自己对土耳其的領土要求。"这項声明还指出："至于海峡問題，苏联政府重新审查了自己以前对这个問題的意見，并认为可以根据一些苏、土双方都同样能接受的条件来保障苏联与海峡有关的安全。"①

苏联政府曾努力改变既成局势，恢复同土耳其的友好关系。但是很遺憾，在1953年时和以后的年代里土耳其国务活动家并沒有协助这种努力。

* * *

战爭时期在伊朗发生的一些事件促成了显著的对外政策和对內政策方面的变化。

1941年8月，根据1921年2月26日的苏伊条約第六条②，苏联軍队开进伊朗領土。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了制止設在伊朗的納粹間諜机关的顛覆活动，預防希特勒軍队从伊朗領土进攻苏联南部边境，也是为了保证来自美、英的軍用物資通过伊朗送达苏联。在苏軍开进伊朗的同时，英国軍队也从西部和南部开进伊朗③。1941年9月16日，鼓励納粹間諜組織在

① 1953年7月19日《眞理报》。

② 第六条規定：将来如有第三国"企图通过武装干涉在波斯領土內推行侵略政策，或者使波斯領土成为在軍事上攻击俄国的根据地……"，則俄罗斯苏維埃政府有权派遣自己的軍队进入伊朗。（参見《国际条約集（1917—1923）》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615頁。）

伊朗进行活动的礼薩·汗被迫退位；穆罕默德·礼薩成为他的继承人。1942年1月29日，苏联、英国与伊朗締結了同盟条約，它对于胜利地进行反对納粹德国的战爭具有积极的意义④。

1941—1943年間的种种事件——礼薩·汗的退位，苏、英、伊三国同盟条約的締結，伊朗与希特勒德国断絕关系和后来对之宣战(1943年9月9日)——促使伊朗在国內政治生活民主化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941年秋季，一些政治犯——民主运动活动家得到釋放。民主报紙开始印行。1941年10月，成立了伊朗人民党(杜德党)，它不久就把工人、民主知識分子和其他进步分子等广泛阶层团結起来。人民党成为伊朗最有群众性的党。工会組織恢复起来，农村中出現了农民协会。

伊朗的进步、爱国势力坚决要求廢除同英伊石油公司签訂的承租条約，进行民主改革，同苏联建立更密切的政治、經济和文化关系。在輿論压力下，1945年初美国的米尔斯坡財政代表团被逐出伊朗，因为这个代表团企图使伊朗經济受美国壟断組織控制⑤。

伊朗民主运动不断地壯大，特别是在伊朗阿塞拜疆，这里的民

---

③ 1942年底，三万名美国兵也在伊朗登陆，虽然在盟国之間，在美国与伊朗政府之間，对此都沒有达成任何协議。

④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 стр.217—224。关于伊朗的政策及其战时的情况，参見 *М. С. Иванов*.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Ирана. М., 1952, стр.336—364。

⑤ 战爭时期，美国派遣大批顾問到伊朗。美国将軍被任命为伊朗武装力量的顾問；伊朗的宪兵实际上已經由美国人控制。美国的一些技术代表团和財政代表团也在伊朗进行活动。

美国壟断組織利用米尔斯坡代表团所享有的全权来扩大自己在伊朗的陣地：它們得到了大量的包工合同和訂貨，并力爭使伊朗政府廢除同英国人締結的同样的协定。为了加强伊朗对美国的依附，米尔斯坡执行了一种破坏伊朗的財政、經济，阻碍其工业发展的政策。米尔斯坡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无耻地宣称："工业独立对于波斯是一种不合理的政策和民族主义的过份昂貴的代价。"(*A. C. Millspaugh.* Americans in Persia. Washington, 1946, p. 248.)

族压迫使得封建压迫和政府、宪兵的横暴恣睢更加猖狂。战爭結束后，在伊朗形成了革命形势。1945 年 12 月，伊朗阿塞拜疆宣布自治。自治政府实行了一些重要的民主改革（把国有的土地分配給农民，限制地主的剝削，确定八小时工作日，通过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險的法律等）。

阿塞拜疆建立民主制度以后不久，又成立了北庫尔德斯坦民主自治政府。在伊朗的其他地区，民主运动也壯大起来。大規模的农民发动也开始了。农民未經官方許可就拒絕向地主繳納收成，拒絕各种服役。

为了孤立民主势力，伊朗反动集团展开了恶毒的反苏运动；他們企图把被压迫的貧苦人民爭取本身利益和起碼权利的斗爭說成是“苏联干涉”的結果。哈基米政府在倫敦和华盛頓的鼓励下，1946 年 1 月把“关于苏联干涉伊朗內政”問題提交联合国。但是，伊朗的反动势力及其庇护者虽然把这个挑撥性的問題提交联合国，却并沒有达到他們所追求的目的。于是伊朗反动派及其同謀者就采取了新的手腕。

1946 年 1 月，艾哈迈德·盖凡姆（盖凡姆·厄斯·薩耳塔涅）政府上台，它暫时放棄了公开迫害民主組織的作法和明目張胆反苏的对外政策。盖凡姆政府向人民表示将进行各种社会改革，并与伊朗阿塞拜疆的代表进行了談判，允許保留阿塞拜疆居民的主要民主成果。1946 年 8 月 1 日，盖凡姆让三名人民党党員参加他的內閣。同苏联的談判也开始了，1946 年 4 月 4 日签訂了关于成立勘測和开采北伊朗石油产地的苏伊联合公司的协定①。

盖凡姆执行这种政策，目的在于迷惑輿論，贏得时間，以便在帝国主义大国援助下巩固反动势力，破坏民主組織。趁苏軍从伊

---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6 год》, стр. 113—115。

朗撤退的机会①，英、美帝国主义者开始公开地无耻地干涉伊朗内政。

以1946年7月在庫齐斯坦英伊石油公司企业中爆发的总罢工（罢工者約十万人）为借口，英帝国主义者依靠一些王公的援助，組織南伊朗各部族向英伊石油公司的工人們进攻，并派遣軍舰駛入波斯灣。在巴士拉地区（伊拉克），八月初曾集中了英軍几个师；它們已經迫近伊朗边境。

1946年9月中旬，卡什卡伊和伊朗南部的一些王公們，在英、美帝国主义者和德黑兰反动派挑撥下发动了叛乱。这些匪帮对人民党党員和民主运动的其他参加者尽力摧殘。这些王公們反对伊朗阿塞拜疆的民主势力，并要求把人民党党員逐出政府。

政府和軍事当局的代表們虽然口头上譴責了叛乱，但是实际上不采取任何措施去鎮压叛乱。发动部族鬧事是一种慣用的政治手腕，其目的是让盖凡姆能放手鎮压民主的阿塞拜疆和其他民主力量。1946年10月中旬，伊朗政府同伊朗南部各王公公布了一个协議，宣称他們在法尔斯組織的反动叛乱是"民族运动"。同时，盖凡姆改組了他的內閣，把人民党党員排挤出內閣。

1946年12月10日，盖凡姆命令向伊朗阿塞拜疆进軍。伊朗政府宣布这一地区处于軍事状态，并开始鎮压阿塞拜疆民主党的領导机构和民主运动的参加者。然后，圍剿队就向庫尔德斯坦推进。在伊朗全国大規模地逮捕民主活动家。美国駐伊朗軍事顧問筹备了圍剿队，并亲自直接領导；例如，美国将軍施瓦尔茨科普夫就領导了宪兵队，摧毀了伊朗阿塞拜疆的民主势力。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摧毀伊朗民主势力的机会来加强自己的陣地。虽然战爭早已結束，根本不再需要有外国軍队和代表团駐在伊朗境內，但美国軍事代表团仍然留在伊朗。1947年10月6日签

① 苏联与伊朗签訂了关于苏軍从1946年3月24日起一个半月期限內撤出的协定。1946年5月9日，苏軍完全从伊朗境內撤出。（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6 год》, стр. 113, 123.）

訂的新协定[1] 使美国軍事代表团在伊朗陆軍部和总参謀部中起更重要的作用。

根据1947年10月6日的协定，美国軍事代表团开始按照美国方式改組伊朗軍队，并以美国武器装备伊朗軍队，这些武器是与美国人用来装备土耳其的武器同一类型的。在伊朗北部修筑了一些防御工事和飞机場，在伊朗南部修筑了地下汽油庫。美国軍官經常到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进行視察，并进行地形测量。

在美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压力下，伊朗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带有反苏的性质。伊朗报刊經常进行反苏宣傳。为了取悅于美、英"庇护者"，1947年10月22日伊朗議会拒絕批准关于成立勘测和开采北伊朗石油的苏伊联合公司的协定。伊朗对苏貿易額显著減少——从1945—46年度占伊朗貿易額的24%減少到1948—49年度的0.8%。[2] 伊朗政府的反民族政策造成了丧失苏联市場的后果，从而使伊朗財政状况显著恶化。同时，美国傾銷商品的大量进口对伊朗的工业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竞爭，使伊朗工业的发展速度甚至与战前年代比較也更加迟緩了。

伊朗民族資产阶級离棄人民群众的民主运动这一情况，对于事变的这种发展状态起了显著的作用。民主运动的广泛規模及其革命性质吓倒了伊朗資产阶級；巴尔干半島上发生的革命性的变化使伊朗資产阶級也正像土耳其資产阶級一样感到惊惶不安。

1945—1949年間的种种事件在土耳其人民和伊朗人民的历史上是黑暗的一頁。这两个国家的爱国进步力量当时沒有能打退国內和国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世界范圍內的和平、社会主义和

---

① 1947年10月6日美国与伊朗关于駐伊朗軍事代表团的协定。見《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cts Series 1666.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2997》.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②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1945 to 1954》, p. 78.

民主的力量在当时也沒有能够筑起不可逾越的屏障来阻止帝国主义对土耳其和伊朗的反革命輸出。土耳其和伊朗的种种事件表明了美帝国主义在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包括近东、中东所起的世界宪兵的恶毒作用。

美国在土耳其境內設立軍事基地，在伊朗境內設立据点，这就使近东和中东变为战后世界上国际紧張局势中最令人不安的策源地之一。美帝国主义在土耳其和伊朗境內的活动使这两个国家同苏联及阿拉伯各国的相互关系严重地恶化了。

一个直接的威胁在压迫着阿拉伯各族人民。土耳其的某些集团还不能忘怀"土耳其帝国政府"統治东方各族人民的时代，他們千方百計地企图恢复土耳其在这一地区的势力。他們一直在酝酿建立以土耳其为首的所謂穆斯林集团的計划；他們这种計划同帝国主义制訂的、在中近东建立由阿拉伯各国加上土耳其組成的、在西方大国卵翼下的政治集团的方案相互呼应。

三、委任統治制度。阿拉伯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阿拉伯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近东、中东战后事件发展中起了显著的作用。这一运动是在比土耳其和伊朗人民的解放斗爭更加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的。

1945—1949年間美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各国沒有能像在土耳其和伊朗那样地稳定下来；在阿拉伯各国斗爭的鋒芒是指向已經遭到严重削弱的英、法帝国主义。

后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方面发生的有利于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变化，使美帝国主义不可能占領那些英、法在阿拉伯各国被迫放棄(常常是在美国压力下)的陣地。

战后时期阿拉伯各族人民重要的斗爭成果，就是彻底消除了由国际联盟建立而早在三十年代已經开始崩溃的委任統治制

度①。1946—1948年間，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統治制度失效，英国在外約旦和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制度失效。

委任統治制度的廢除是阿拉伯各族人民在艰苦的斗爭中贏得的，同时，这也是与一些尖銳的帝国主义矛盾、外交事件和軍事冲突的爆发有連带关系。

还在战爭时期，圍繞着叙利亚和黎巴嫩委任統治制度的廢除，就已經发生了复杂的国际冲突，战爭結束后这种冲突变得更加剧烈了。

虽然叙利亚和黎巴嫩早在1941年已經宣布独立，而且1943年还成立了全国立法机构，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全部政治生活和經济生活却依然由法国和英国当局所控制。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反对占領者的斗爭发展成眞正的反殖民主义战爭②。

苏联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作了重大的支持。1945年5月，战爭結束后，法国派塞內加尔部队在貝魯特登陆，开始炮击和从空中轰炸叙利亚各城市，这时，苏联政府向各大国提出特别声明，建議采取措施，制止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軍事行动，并以和平方式調解已經发生的冲突③。这个声明鼓舞了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并对法国政府施加了影响。

从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矛盾也开始发生作用。

美国开始十分注意叙利亚和黎巴嫩的事件。英国統治集团也决定利用这个时机，彻底控制住叙利亚和黎巴嫩。戴高乐将軍在他的回忆录中带

① 1930年，英国統治集团被迫在伊拉克廢除委任統治制度。

② 参見 *Ю. В. Лукоянн.* Борьба народов Сирии и Ливана за вывод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йск (1945—1946 гг.).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арабских стран. М.,1959。

③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II, стр.269。

着激怒情緒指出："英国的政策是时而明爭，时而暗斗，企图取代法国在大馬士革和貝魯特的地位。"①1945年5月30日，英国政府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戴高乐停火，并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全部政权交給英軍司令部。

法国政府企图抗拒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逼攻，而采取独立的外交手腕。針对丘吉尔提出的关于召开由法、英、美参加的三国会議的建議，戴高乐政府提出了反建議，主張召开法、英、美、苏、中五大国会議，但是这个反建議被英国和美国拒絕了②。

法国政府被迫让步，把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全境的控制权交給了英国当局。在以后从外交上討价还价的时期，法国政府曾提出要以解决这一地区的英法矛盾作为法国同意加入西方联盟的条件。

1945年12月22日，公布了英、法两国关于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軍条件和为近东各国"繁荣"并"保障安全和宁靜"而进行合作的协定。这个协定表明，帝国主义大国为抗衡民族解放运动而企图在近东和中东进行勾結并統一力量。这种政策以后在1950年的英、法、美三国宣言中表現得更明显。

协定实质上并沒有規定英、法軍队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出，而只是重新配置这些軍队。法軍的撤退不定期地拖延下去——直到安全理事会"在保障这一地区的安全方面决定自己的方針"时为止。对英軍則規定撤到邻国——外約旦和巴勒斯坦，然后，根据英国的計划，一旦成立"大叙利亚"王国，就立即重返叙利亚和黎巴嫩。

英法协定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激起了不滿情緒的迸发，和抗議、游行、罢工的浪潮。1946年2月4日，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就英、法的行动向联合国提出控訴，这个控訴在安全理事会中得到討

① 戴高乐：《战爭回忆录》第1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版第157頁。

② 戴高乐在結束他关于英、法就近东問題的冲突的叙述时說："英国人总会有一天要为他們反对法国的詭計而付出很高的代价。"（«Из военных мемуаров де Голл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61, № 4, стр.116.）

論①。叙利亚和黎巴嫩問題在安全理事会中沒有解决；但是，在联合国中对这个問題的討論引起了世界輿論的注意，在討論叙利亚和黎巴嫩控訴的过程中，苏联代表团支持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这都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英国和法国統治集团不得不让步——1946年4月它們的軍队撤出了叙利亚和黎巴嫩。这是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的重大胜利，是殖民者在近东的慘重失敗。这是各种不同的、但起了积极作用的情况和因素的結果：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的斗爭和他們的政府的坚定立場，苏联和全世界进步輿論对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尖銳的帝国主义矛盾的結果。

在阿拉伯各国中，不仅巩固主权的思想，而且对統一的向往也扩展开来。劳动群众把阿拉伯統一理解为在反对殖民压迫、爭取消除經济落后状态、实現根本性的社会改革和各国民主化的斗爭中的团結。至于民族資产阶級，其中一部分人却时常对阿拉伯統一的口号作民族主义的和沙文主义的解釋，并利用这个口号来鎮压工农运动。資产阶級还认为阿拉伯統一是发展和巩固民族資本以与外国資本对抗的工具，是扩大市場的工具；它还认为，虽然帝国主义者的軍事政治控制为阿拉伯各国的对外政策布置了种种障碍，阿拉伯統一却可以使阿拉伯各国能克服这些障碍而在国际舞台上提高自己的威信。

阿拉伯团結的巩固过程正在成为近东、中东国际关系中越来越严重的因素；各帝国主义大国不能不估計到这一点。英国在近东阿拉伯各国仍然占有最强固的陣地，因此它的外交当局一方面尽力阻碍阿拉伯各族人民在反帝、民主的基础上达到眞正的团結，

① 英国代表賈德幹在安全理事会中宣称，英、法撤离叙利亚和黎巴嫩，将会在这一地区造成"眞空"，这很可以作为特征。"眞空"理論反映出帝国主义者对近东和中东各族人民的蔑視，这种理論也被美帝国主义拿去当做武器。

另一方面却又为了本身的利益而利用阿拉伯团結的口号，拼凑成在軍事上政治上与英国有联系的各封建統治者的"神圣同盟"。英国統治集团制訂这样的計划，目的是在阿拉伯国家中保持自己的統治，同时利用对英国馴服的"阿拉伯集团"来加强英帝国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联合国內遭到削弱的地位。

所有这些相互矛盾的傾向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成立时都起了自己的作用(1945年3月)。

英国統治集团企图把阿拉伯国家联盟变作自己在阿拉伯国家中有許多分支部門的軍事政治机构的一个附屬物，但是这种企图由于阿拉伯人民群众的抵抗而破产。阿拉伯各国人民、特别是埃及（英国統治集团企图使它成为自己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的主要支柱）人民的斗爭不可阻遏地日益发展，甚至影响到在阿拉伯国家联盟中开会的各阿拉伯国家元首的态度。此外，英国的計划还遭到法国和美国的严重反对。

英国还曾計划建立"大叙利亚"或"肥沃新月国家联盟"，其目的是把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統一起来，并使之在軍事、政治和經济上同伊拉克和外約旦——英国統治近东的堡垒建立密切联系；但是，由于上述同样的原因，这种計划也失敗了。同时，英国外交当局还曾企图把伊拉克、外約旦与土耳其联結起来，以防英国彻底丧失它在土耳其的势力，并借以加强"阿拉伯集团"。因此，英国积极促进土耳其与伊拉克、土耳其与外約旦之間《友好同盟》条約的締結(1947年)。伊拉克与外約旦之間則于1947年4月締結了《永久同盟》条約。

美国統治集团也拟訂了在近东和中东建立軍事一政治集团的計划，但是要以美国为首。美国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土耳其和伊朗。

关于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間在美国保证和調停下締結同盟条約的談判，以及关于恢复薩阿达巴特公約①的談判，是1947年10月美国駐伊朗大使艾命訪問土耳其时，和1948年夏季美国新任駐伊朗大使烏艾里訪問安卡

拉时进行的。华盛頓像倫敦一样地想把土耳其和伊朗与阿拉伯各国联結起来，而且像英帝国主义同样地把近东、中东各国的土地、居民看做执行自己外交时的"輔币"。

美国和英国为了在阿拉伯各国竞爭而不断煽动統治伊拉克、外約旦的哈希姆王朝与埃及封建保皇上层之間的不和；煽动哈希姆王朝拥护者与統治沙特阿拉伯的王朝之間的不和。混乱的王朝間的阴謀加强了阿拉伯各国的紧張局势。

帝国主义大国在阿拉伯各国中爭夺統治权的斗爭，对于这些国家和整个近东、中东，都造成严重的后果。这种斗爭是在巴勒斯坦形成軍事冲突策源地和爆发战爭的原因。

四、巴勒斯坦战爭。以色列国家的建立

巴勒斯坦問題是1945—1949年間近东、中东国际关系中最尖銳的問題之一；其中反映出这一地区各种势力之間的冲突和矛盾②。

英国政府继續煽动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与犹太居民間往往竟酿成流血冲突的仇恨情緒，而不想让巴勒斯坦独立，虽然早在1939年它就已經提出过这种諾言。

由于美国和法国的日甚一日的干涉，巴勒斯坦問題变得更加复杂了。到战爭結束前夕，美国在阿拉伯各国的势力比英国的陣地弱得多，因此美国統治集团集中主要力量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

---

① 1937年的薩阿达巴特公約形成了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的政治集团。英国外交当局促进了这个公約的締結，因为它企图借此巩固自己在近东和中东的势力，并利用这个集团实行反苏政策。

② 参見 *К. Иванов и З. Шейнис.*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зраиль, его положение и политика. М.,1959。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①。但是同时，它們又不願意牺牲自己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英国統治集团在这一段时期則主要指靠阿拉伯各国，同时继續与犹太复国主义大資产阶級保持和扩大接触。

在美国与英国之間展开了复杂的外交斗爭，斗爭过程中它們先后都以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与犹太居民的利益作交易。美国和英国对巴勒斯坦問題的政策的特点，都是极其出人意料的曲折复杂。

不仅在巴勒斯坦本地，甚至在其他国家居住的人們的宗教信仰，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巴勒斯坦問題的解决：巴勒斯坦被认为是三个世界性的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圣地"。

巴勒斯坦問題长期以来沒有离开过联合国的議事日程。

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建議在民主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迅速解决巴勒斯坦問題：廢止英国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立即从巴勒斯坦境內撤出英国軍队，在阿拉伯居民和犹太居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二位一体的民主的阿拉伯—犹太国家。但是这个計划沒有得到支持，甚至沒有得到阿拉伯代表和犹太代表的支持。1947年11月底，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在巴勒斯坦境內建立两个独立国家——阿拉伯国（一万一千一百平方公里）和犹太国（一万四千平方公里）的决議。决議还規定使耶路撒冷城这个同世界三大宗教的历史有联系的"圣迹"所在地国际化。

在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关系极端紧張的情况下，建立統一的阿拉伯—犹太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廢除英国的委任統治而賦予巴勒斯坦阿拉伯居民和犹太居民以国家独立权，这却提供了彻底根除帝国主义势力和进行民主改革的机会。不过，这种机会被錯

① 在美国执政的民主党还企图借此在国会选举和以后不久即将举行的总統选举时获取犹太选民們的选票。

过了。

1948 年 5 月 14 日英国放棄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同日，犹太国家以色列宣告成立，在这以后紧接着爆发了不承认新国家的阿拉伯各国与以色列之間的战爭。这次战爭是被一些企图在近东維持自己陣地的帝国主义大国所挑撥起来的。这次战爭是使人民群众的注意力离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势力的斗爭的手段之一，而且成为迫害进步組織和民主活动家的口实。1948 年春季，一系列阿拉伯国家在保证"軍队后方"的借口下宣布了戒严状态，并开始迫害民主运动的参加者，特别是共产党人。埃及共产党被禁止活动。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对苏文化連絡协会被禁止活动。

巴勒斯坦的軍事行动(1948—1949)是在互有胜負的情况下发展的。最后，根据联合国决議划归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領土的相当大一部分由以色列軍队占領。以色列除划归它的一万四千平方公里外，还又占領了六千七百平方公里。在作战过程中，以色列軍队把阿拉伯居民从他們所占住的土地上驅逐出去。阿拉伯难民——九十万人——中絕大部分流离在邻近的阿拉伯各国，衣食居所毫无着落。1949 年 2 月—7 月，在罗茲島上締結了以色列同約旦和埃及之間的停战协定；然后締結了以色列同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間的停战协定。根据这些协定，在阿拉伯各国的領土与以色列所控制的領土之間沿双方临时分界綫划定了非軍事区。成立了联合国关于停战协定条款执行情况监督委員会。

阿拉伯人軍事上的失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幕后阴謀，各阿拉伯統治者之間尖銳的意見分歧，和阿拉伯各国經济上的落后状态。战爭使各阿拉伯国家的經济和财政更加枯竭了。

在前巴勒斯坦境內的阿拉伯国家根本就沒有成立。后来，1950 年 4 月，被英国軍官指揮的外約旦"阿拉伯軍团"所占領的前巴勒斯坦的一部分，由于英国的协助而被划归外約旦，从此外約旦开始

称为哈希姆約旦王国。

以色列人民本来希望能从帝国主义統治下得到眞正的解放，但是大銀行家、商业資产阶級和投机商人却立即夺到了以色列的政权；长期以来同英国、法国、美国有联系的抱着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的反动活动家(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左右以色列的政策①。劳动群众实际上甚么也沒有得到。

美国資本在以色列国內取得了优势的地位。这样，美帝国主义者就在近东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据点。通过提供补助金和貸款，美帝国主义者大力支持了以色列上层統治集团。美国政府在承认以色列国家上表現得迫不及待，这很耐人寻味。前美国总統杜魯門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以色列国家宣告成立以后十一分钟，美国就声明对以色列临时政府作事实上的承认②。

随着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的壯大和深化，美、英帝国主义者越来越认为，以色列作为反对这一运动的工具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們越来越猖獗地利用以色列来施加經常的压力，組織軍事挑衅，并唆使以色列对阿拉伯各国进行武装发动。

这也就是近东地区国际紧張局势的主要原因之一。

* * *

一目了然，1945—1949 年間中近东发生的变化，归根到底无非是帝国主义势力在这一地区进行重新配置。近东和中东在經济上和軍事、政治上都依然处于帝国主义的桎梏之下。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中，例如在土耳其，帝国主义的經济、軍事、政治陣地甚至更强固了。

在阿拉伯各国的政治中，受帝国主义外交当局煽动的王朝傾

① «Communist Party of Israel». Congress 13th. Documents. Tel-Aviv, 1957.

②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I, p. 164.

軋和紛爭的气息越来越濃烈；英帝国主义在阿拉伯各国的陣地受到了震撼，但还远沒有被摧毀；美国統治集团則尽一切努力占領英国的地位。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攫取了对近东出現的新国家——以色列的控制权，并利用以色列作为反对阿拉伯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这样，在近东的心臟地区就又出現了一个經常的軍事冲突的策源地。

但是，事件发展的另外一条綫，另外一种趋势却具有远远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未来是屬于这种趋势的。还在1945—1949年間，一些深刻的过程就已經开始发生影响，这些过程到后来使得帝国主义在近东和中东的軍事、政治和經济統治遭到摧毀，使得这一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变为世界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和独立的因素。

在这方面，阿拉伯各国中委任統治制度的消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战后时期，近东、中东多数国家已經作为政治上独立的国家出現在国际关系中。因此，阿拉伯各国也就有可能根据它們从帝国主义軍事、政治桎梏下解放的程度在国际事务中起越来越积极的作用。

在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存在的条件下，贏得国家独立，就为阿拉伯各国开拓了巩固本身独立的道路。在英国刺刀下維持的埃及封建君主制度已經摇摇欲墜；埃及在对以色列战爭中的失敗暴露了君主制度的腐朽，在軍队中，甚至在軍官中激起了强烈的不滿。巴勒斯坦战爭使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和經济危机也变得更加尖銳，从而給民族解放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在阿拉伯各国，民族的爱国力量的团結到处都加强了，群众的政治积极性不断高漲。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現出要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独立立場的願望。

1945—1949年間的种种事件开始在近东、中东各族人民的心目中揭露美帝国主义。美国在土耳其和伊朗的行动，它在巴勒斯

坦問題上的玩弄手腕和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集团的支持，在这一地区的一切国家中，甚至在那些美帝国主义似乎已經最稳固地站住脚的国家中，也都不能不引起坏的反应。伊朗的民主力量受到了打击，但是这却并沒有消弭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新浪潮在不断地高漲。

在近东和中东各族人民的这种斗爭中，苏联提供了重大的援助。苏联的威力和国际影响的扩大，社会主义陣营的出現，美国原子壟断的破产，东南亚殖民体系的瓦解——所有这些过程对近东、中东各族人民都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促使这一地区居民的广大阶层意識到，必需摆脫帝国主义而爭得彻底的解放。

第十一章

非洲的解放运动和国际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非洲的經济意义和軍事—政治意义都显著地增加了。爭夺非洲的斗爭在各帝国主义交战国的計划中不是占最末一位。1941 年 11 月，美国杂志《幸福》把非洲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者的奖品"。

战爭越出欧洲边界以后，就扩展到非洲大陆的一系列地区，首先是地中海沿岸各国：北非变成了战場。

非洲大陆成了交战双方所需物資的重要来源。希特勒德国甚至在战爭年代，在維希政府、西班牙和葡萄牙协助下，还从非洲各国首先是从法屬殖民地运出了各种稀缺的原料——錳、鈷、錫、鎢——和粮食。但是，通向非洲資源的道路对于"軸心"国家来說变得一年比一年难走了，而与此相反，英、美可以利用的非洲产品却源源不絕地增加。英国从非洲进口的铁矿石、錳矿石、鉻矿石、

铁矾土、錫、銅、天然橡胶、工业上用的钻石、紡織工业原料、咖啡和落花生等，都显著增加。美国也从非洲各国运出很多原料，首先是有色金屬和鈾矿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五年，絕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命运依然由各帝国主义大国掌握。几乎非洲大陆的任何民族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組織中都被剝夺了独立的代表权。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依然是帝国主义的比較可靠的殖民地后方。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各国在发展上严重地落后。延續几百年并使非洲付出一亿人生命的奴隶买卖，严重地破坏了这些国家的生产力。許多在人种上相近的非洲部族被一些任意划定的边界粗暴地分割开了。这种情况大大阻滯了民族形成的过程，使部族分散状态保持下来。在非洲大陆上，还沒有像在亚洲早已有过的那种大規模的、形成国家和民族的过程。

在殖民主义者看来，他們在非洲的陣地似乎是巩固的。他們被种族主义的意識形态所蒙蔽而看不到新的趋势，看不到非洲各族人民正在从成百年的睡梦中觉醒过来。例如，負責近东和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麦克基在 1950 年宣称："非洲，它是世界上这样一些地区之一，那里不存在道地的严重危机。"①

但正是在四十年代，在非洲大陆的辽闊地区，各族人民逐漸开始为民族独立进行頑强的战斗。全世界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在战后的强大发展以及非洲本地所发生的严重的內部变动都证明，帝国主义希望继續保持"黑色大陆"作为自己牢靠的后方的想法只是空中楼閣。殖民体系的瓦解必然也将席卷非洲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埃及展开了。

---

① 引自《Démocratie Nouvelle》, 1951, № 4, p. 204。

一、意大利各殖民地和委任統治地的归宿

希特勒联盟的参加国意大利，战前在非洲曾拥有辽闊的殖民領地。在北非，意大利曾拥有根据洛桑和約（1922年10月）① 脫离土耳其的利比亚。紅海沿岸地区的两个国家——厄立特里亚和索馬里的一部分，从十九世紀末叶起由意大利帝国主义者統治。

随着"軸心"国家的潰敗，在占領这些殖民地的資本主义胜利国之間爭夺这些殖民地的斗爭就变得熾烈起来；意大利則不願意让出这些殖民地，而企图利用英、美、法之間的矛盾来取巧。这就是关于这些非洲国家問題的一条路綫——根据帝国主义各国間新的力量对比关系来重新分割非洲的路綫。而且每一个有关的帝国主义大国都认为，必須使殖民制度实际上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

苏联在各人民民主国家和一些亚、非国家的支持下，却执行了另外一条路綫。苏联坚持，必須根据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索馬里人民的利益和意願，通过賦予他們独立并撤出战爭結束后仍留駐該地的外国軍队，来解决这个問題。

苏、英、法、美外长会議最初曾建議，意大利在非洲殖民地問題将与对意和約的签訂同时解决。1947年2月10日，对意和約在巴黎签訂，但是关于意大利在非洲殖民地問題却依然悬而未决。对意和約第二十三条仅只規定："意大利对于它在非洲的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大利索馬里兰各屬地放棄一切权利。"② 当时决定，如果在一年內四强"关于任何此等領土的处置未能获致同意时"，則問題应交由联合国大会审理。

在一年的期間內，各帝国主义大国，首先是英国和美国，千方百計地拖延这个問題的解决，力图把問題交到联合国。它們指望利用"表决机器"来

① 时間有誤，洛桑会議是1922年11月20日开幕的，而洛桑和約的签訂則是在1923年7月24日。——譯者

② 参見《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304頁。

使它們"解决"这个問題的計划能强行通过。

意大利前殖民地問題在1949年春季第三届联合国大会第二次会議上初次被討論。英国代表团提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是事先同美国商量好，并得到意大利贊同的（所謂貝文—史佛卓协定是这个方案的基础）。这是关于瓜分意大利前非洲領地的典型的帝国主义勾結。方案把利比亚分成三块托管領土，昔兰尼加交由英国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从1951年起）仍由意大利托管，費贊則交給法国。托管期滿——十年以后，利比亚必須成为独立的国家。前意屬索馬里也交由意大利托管——不提托管結束的期限。当时打算把厄立特里亚分为两部分，东南部划归埃塞俄比亚，西北部划归英埃苏丹①。1949年5月，帝国主义国家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員会中終于使自己的方案强行通过。政治委員会只是沒有同意把厄立特里亚的一部分交給英埃苏丹②。

但是，在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会議上（1949年5月18日），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某些亚洲国家的代表对英国方案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此外，利比亚人民对于在托管形式下强迫它重新受意大利統治的企图发动了抗議运动，殖民国家不能不估計到这种情况。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发生了特别强烈的示威游行，根据方案这一地区应交由意大利托管。帝国主义的瓜分沒有得到联合国大会的贊同，問題被移交下一届联合国大会。

1949年9月，苏联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处置前意大利殖民地的明确計划。苏联建議立即宣布利比亚独立，然后在三个月內把一切外国軍队撤出利比亚，并消除在利比亚的一切軍事基地。苏联代表团建議，对前意屬索馬里和厄立特里亚实行五年托管，然后宣布这两个国家独立。責成托管理事会管理索馬里和厄立特里亚，并由它分别任命一名有执行权力的行政官員到这两个国家去。考虑到出海通道对埃塞俄比亚在經济上很重要，苏联建議把厄立特里亚的港口阿薩布及其附近区域交給埃塞俄比

① 《The Annual Register》, 1949, p. 155.

② 同上书第156頁。

亚。①

但是，各帝国主义国家拒絕了苏联的建議，并把自己的方案强加給联合国大会(1949 年 11 月 21 日通过)。联合国决議規定，两年以后，即在 1952 年 1 月 1 日以前賦予利比亚独立，而不是像英国方案所建議的經过十年托管的期限。在这个限期以前，利比亚的两个地区——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交由英国管理，而第三个地区——費贊交由法国管理。② 前意屬索馬里交由意大利托管。殖民国家在这里也不得不稍作让步，明确了托管期限(十年)，这在以前是沒有規定的。③

厄立特里亚問題更复杂些：它涉及两个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的相互关系。埃塞俄比亚坚持把厄立特里亚划归它，特别借口說，缺乏出海口使埃塞俄比亚的經济受到严重損失。苏联在第四届联合国大会提出的方案考虑到了这两个非洲国家的利益。在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 (1950 年 9 月至 12 月)，苏联重申关于把阿薩布划归埃塞俄比亚的建議，并主張根据厄立特里亚人民多数的願望，立即賦予厄立特里亚独立。④ 这个建議遭到拒絕，但是英国提出的由埃塞俄比亚和英埃苏丹瓜分厄立特里亚的計划也破产了。美国的影响起了作用，它在这时已經加强了对埃塞俄比亚的滲入。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决議，根据联邦原則把厄立特里亚并入埃塞俄比亚。⑤

---

① «Объединённые На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ёты IV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Первый комитет.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кратким отчётам заседания». Нью-Йорк, 1949, стр. 22.

② 同上书第 32—33 頁。

③ 同上书第 33 頁。

④ «Объединённые На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ёты.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V сессия. 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тчёты», т. I. Нью-Йорк, стр. 548.

⑤ 同上书第 558 頁。

爭夺意大利前非洲殖民地的外交斗爭的結果，并沒有发生对領地的傳統的帝国主义的重新分割。时代改变了。帝国主义者不得不違背本心地顧忌到一些阻止他們随心所欲的新因素。在这些因素中，首先就是苏联的已經壯大的力量和威望，苏联反对由一个帝国主义主人代替另一个帝国主义主人的那些方案。其次，殖民主义者已經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完全无視非洲各族人民的要求，因为非洲人民已經正在覚悟到要参加积极的政治生活。殖民国家不得不向前意大利殖民地提出关于独立的諾言，并同意賦予这种独立的具体期限。帝国主义为所欲为并毫无阻碍地重新分割世界的时代已經成为过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解决非洲問題的两种态度在关于国际联盟非洲委任統治地（西南非洲、卢旺达—布隆迪①、坦噶尼喀、多哥和喀麦隆）問題上也表現了出来。战前，国际联盟把对这些国家的委任統治地交給法国（多哥和喀麦隆的一部分）、比利时（卢旺达—布隆迪）、南非联邦（西南非洲）和英国（坦噶尼喀和多哥及喀麦隆的一部分）。

美国建議以国际托管制度来代替委任統治制度。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只在形式上改变委任統治制度的名称，重新粉刷它的表面，而实际上在各被委任統治国依然保持殖民制度。在拟制联合国宪章时，苏联曾积极爭取把国际托管制度变成一种旨在使这些国家循社会經济进步和独立道路发展的国际法治的制度。在旧金山会議上，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建議，关于以独立作为托管任务之一的条款終于載入了联合国宪章，虽然各殖民国家是反对这样做的。

根据联合国宪章，委任統治国必須准备关于托管的协定草案，提交联合国审議。

① 卢旺达—布隆迪（旧譯卢安达—烏隆迪）已于1962年7月1日宣告独立，分别成立卢旺达共和国和布隆迪王国。——譯者

在联合国第四委員会和1946年12月13日联合国全体会議上討論被提交的各种草案时，展开了尖銳的辯論。当时曾审理了二百二十九項修正案，其中包括苏联提出的一些重要的带原則性的重要修正。

苏联代表特別反对这样一条："管理当局有权把被托管領土当作本国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管理。"印度代表也同意苏联代表团的意見，他說这一条引起"对暗图兼并的疑虑"①。

苏联代表团还坚决反对使托管国有权在被托管地建設軍事基地的条款，因为这是直接違反联合国宪章的。②

最后，苏联提出关于托管期限的第三个重要修正案。各种草案都以緘默来迴避这个問題。任何草案都沒有規定托管何时終止。这证明草案拟制者企图不顧联合国宪章而把賦予被托管国以独立的問題置之高閣。

联合国大会第四委員会的多数成員国支持苏联提出的修正案，虽然托管国——英国、法国、比利时和一些其他国家提出反对，苏联的修正案还是通过了。但是，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議上，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动了"表决机器"，否决了这些修正案。1946年12月13日，联合国大会以多数票同意了关于坦噶尼喀、多哥及喀麦隆的一部分交由英国托管，多哥及喀麦隆的另一部分交由法国托管，卢旺达—布隆迪交由比利时托管的协定。

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在这个决議的鼓励下，开始公然破坏联合国宪章。它們在被托管国家中也使用了与在本国其他殖民地中同样的管理方法。

① «Объединённые На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ёты второй части перв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тчёты. 23 октября—16 декабря 1946 г.» Нью-Йорк, 1946, стр. 292.

② 参見联合国宪章第82—83条，見《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54頁。

英国和比利时規避联合国而采取了一些行政措施，甚至使它們变其托管地为殖民地的作法“合法化”。坦噶尼喀被与英国殖民地肯尼亚和烏干达合并了，而卢旺达—布隆迪被与比屬剛果合并了。这些行动破坏了托管制度的基础。但是，当苏联在第三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这种任意妄为不合法和不能容許时，各殖民国家又求助于“表决机器”，否决了苏联提出的关于取消这种合并的建議。

在討論非洲最后的委任統治地——西南非洲問題时，形成了更不正常的局面。在 1946—1947 年間联合国曾两次通过决議，认定托管制度也应适用于西南非洲。但是，負責委任統治的南非联邦却无視联合国的意志，实际上兼并了这个地区。为了使兼并行为具有“合法”性，1947 年 4 月西南非洲被賦予了在南非联邦議会中的代表权。① 南非联邦政府不仅拒絕提交关于托管西南非洲的协定，反而要求联合国承认西南非洲并入南非联邦。在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上（1947 年），苏联提出了关于由联合国托管西南非洲的决議案。但是英国、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此表示反对，从而助长了南非联邦政府的扩張主义政策。

后来，关于西南非洲地位問題被移交国际法院审理，1950 年，国际法院通过了一个“所罗門王式”的判决。一方面，判决中强調南非联邦无权兼并西南非洲。另一方面，国际法院指出，只有根据西南非洲的倡議，而且在它自願同意后，才可能对西南非洲建立托管制度。毫不奇怪，南非联邦不久——1950 年 8 月——就組織了一次伪造的选举，把西南非洲作为第五个省份最后并入了南非联邦。

由此可見，从国际托管制度建立的最初几年起，帝国主义大国就已企图利用它在被托管国家中保持以前的殖民制度。此外，托管制度还标志着金元帝国主义要使殖民地国际化的老意图的复活。华盛頓企图趁着各宗主国本身已依附美国的时机，来拔除这些宗主国所設置的种种路障。但是，美帝国主义者沒有估計到非

① 参見 *И. П. Ястребова.* Южно-Африканский Союз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2, стр. 126.

洲各族人民对殖民制度日益强烈的抵抗，沒有估計到社会主义力量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压迫的斗爭。

二、非洲在帝国主义的經济和軍事—政治計划中的地位

英国、法国和欧洲其他殖民大国的政府和一些最大的資产阶級政党，在制定其战后政策的基础时，都认为非洲大陆占有重要的位置。这并不奇怪。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打击下，亚洲的一些殖民帝国崩溃了。資本主义的欧洲正在經历一个严重的經济和政治困难的时期。为了寻求出路，資本主义的欧洲就轉而"面向非洲"。

法国壟断資本家的《海外法兰西新杂志》写道："在亚洲发生了一些悲剧以后，欧洲的心臟在想到'黑色大陆'时竟出乎意料地开始跳动得更加快了。"①

1948年3月，在英国执政的工党分子提出了《工党的西欧計划》。在这个文件中，非洲大陆对于欧洲帝国主义的意义是这样表述的："西欧本身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經济单位而单独存在，这是已經完全证明了的。我們对美国供应的依賴性的眞正減少，主要是与非洲大陆丰富資源的开发相联系着。但是这种开发又取决于在非洲負責任的各大国之間的密切合作。"

法国的統治集团也同意这种观点。前法国駐突尼斯总督让·蒙写道："必須开发非洲并使它与欧洲长期联系在一起，以便巩固欧洲的陣地，而且使非洲大陆便于发展。"②

为了巩固欧洲帝国主义，并靠劫掠非洲自然資源来使欧洲"返老还童"，在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宗主国曾拟訂过各种各样的方案。

---

①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d'Outre-mer», février 1953.

② 引自 *R. Laure.* Le continent africain au milieu du siècle. Paris, 1952, p. X。

在1945年和1950年，英国曾頒布"关于发展和提高各殖民地福利"的法律。1948年通过的"关于开发海外資源"的法律則是对上述法律的补充，这項法律規定設立殖民地开发公司和海外粮食公司。

1946年，法国政府也通过了一項关于拟訂法兰西宗主国及海外領地現代化計划的法律。一个专門設置的計划会議和計划总委員会从事这項工作。

其他一些在非洲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也不落后于英国和法国。

圍繞着开发殖民地的种种帝国主义方案，資产阶級宣傳机构掀起了一片自我表揚的囂声，侈談甚么宗主国企图消灭殖民地的饥餓和貧困，提高殖民地的福利，使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等等，借以掩飾資产阶級的目的。

但是，这些方案的眞正意图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宗主国的資产阶級实际上是怎样对待殖民領地的經济发展問題呢？英国的副殖民大臣里斯—威廉斯这样公开地解釋这个問題，1949年3月他写道："在我們的願望中并沒有到处建立一些小兰开夏① 的企图"。殖民者的經济政策是要使非洲永远依附帝国主义，并扩大掠劫非洲的規模。在考察他們的种种計划本身和实現这些計划的方法、方式以后，就不难了解这一点。

首先，根据种种所謂开发計划，只撥出了簡直少得可怜的錢。按照帕姆·杜德的計算，在1946—1951年間，对英国各殖民地的居民，每年在每人身上只花費了二先令又半便士。②

第二，根据这些計划实际上支出的款額总是比原来規定的要少得多。

第三，从殖民地榨取到的利潤超过宗主国"慷慨"撥付的款額許多倍。例如，"尤尼莱佛"康采恩及其所控制的最大的非洲托拉斯"联合非洲公司"仅只在1950年一年的总收入就达六千六百万英鎊——比英国根据殖民地

① 兰开夏是英国最大的棉紡織工业区。此处为借喻。——譯者

② 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世界知識社1954年版第217頁。

开发計划每年的支出要多十倍至十一倍。

第四，各宗主国力图在殖民地发展采掘工业的某些部門，特别是战略原料的采掘，以及下层建設。像“为显著改善迅速增加的居民的生活条件而提高粮食产量”、“保证居民就业”以及其他一些計划，目的只是为了宣傳，始終是一紙空文。

各欧洲殖民大国加强了对“黑色大陆”的剝削，不仅只是为了借此摆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直接造成的一些經济困难和政治困难。

对于不得不向美国人做重大让步的西欧来說，在非洲能控制富饒的殖民地和巩固的殖民后方，这应該是同美国进行帝国主义斗爭的重要王牌。非洲各殖民地似乎变成了輔币。作为对美国援助的酬謝，除去其他一切办法之外，各宗主国还把通向非洲的更广闊的通道让予美国資本和美国商品，从而加强美国在非洲的政治影响。

美帝国主义不断滲入非洲，是早在战爭年代就开始了的，特别是美軍在北非登陆（1942 年 11 月）以后。在整个非洲，而且在非洲大陆的許多国家中，首先是在摩洛哥、比屬剛果、南非联邦、法屬西非洲和赤道非洲、葡萄牙各領地，特别是莫三鼻給，以及西班牙各領地等，美国巩固了自己的經济势力和政治势力。

在战爭年代已經开始的美国資本对英国、法国、比利时及其他殖民国家陣地的进攻，到战后时期变得更加猛烈了，特别是在杜魯門提出《第四点計划》——所謂“援助世界落后地区以促进其开发”計划以后①。非洲大陆成为美国与其他殖民国家竞爭的首要对象之一。

虽然欧洲帝国主义者同美帝国主义者相互竞爭，但是他們的目的在一点上毫无疑問是一致的——反对社会主义陣营、反对殖民地世界中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侵略性战略方針，在他們

① 参見本书第十四章。

的非洲政策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很久以来美国侵略势力就要求把非洲的大西洋沿岸地区包括到"門罗主义"适用范圍中去。非洲大陆沿岸各国被看做是轉运从美国出口的軍备和商品等的过境点。达喀尔（塞內加尔）、阿比姜和大巴薩姆（象牙海岸）、杜阿拉（喀麦隆）、拉各斯（尼日利亚）等，都被扩建和改变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港口。各宗主国軍事部門的間諜在非洲各国无孔不入，从当地居民中糾集討伐队。招募者用欺騙方法招募到成千上万的非洲人。例如在越南，法国远征軍团的60%是非洲兵。

对非洲的資本輸出不断地扩大。美国的私人投資从1943年的一亿三千万美元增加到1950年的三亿五千二百万美元①。在美国壟断組織看来，法屬領地，首先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对于大量投資是特别有前途的。被战爭所削弱的法帝国主义缺乏足够的資本，不得不做重大的让步。

美国資本首先打入一些矿山采掘工业部門，打入有色金屬（鉛、鋅、鈷、錳、鎢）的采掘部門和铁矾土、铁矿石和工业用钻石的产地。美国資本往往被賦予把采掘到的产物全部运往美国的权利。

在英屬非洲領地中，美国的直接投資达四千一百万美元②。例如，美国在罗得西亚的矿山采掘工业中順利地排挤了英国。

在美国以原子武器威胁全世界而业經勘探的鈾矿藏还不多的那几年里，比屬剛果的鈾矿产地对于美帝国主义具有特殊的意义。美帝国主义所使用的全部鈾矿的一半，是从比屬剛果运到美国去的。1945年，美国政府爭到了把几乎全部剛果鈾矿石运往美国的权利。

向非洲的扩張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計划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种扩張追求着下列主要目的：首先，美国企图在非洲建立以反苏

①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December 1952, p. 8.

② 同上。

为目的的强大的空軍和海軍基地网，把非洲大陆变成广大的战略前进基地和为侵略行动服务的資源庫；其次，美国壟断組織希望摧毀其帝国主义竞爭者的陣地，并巩固自己在非洲的陣地；第三，美帝国主义还追求这样的目的：在非洲各国保持住殖民制度，从而把非洲变为鎮压亚洲各国、特别是近东各国民族解放斗爭的根据地。

1947年《生活》杂志刊載了一篇文章，在該文所附的地图上整个非洲大陆都被包括在未来的美利坚世界帝国的疆域之內。这种侵略意图与1945年发表的耶魯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备忘录中所叙述的思想有內在的联系。在这份备忘录中，主要强調以非洲为重点，作为美国的軍事战略前进基地和美国軍事工业所用战略原料的产地。备忘录特别强調了北非和东北非地区的战略意义①。1948年11月，南非联邦陆軍部长派耳在倫敦宣称："一旦发生战爭，非洲将是英美集团进攻欧洲的主要基地。"②前駐阿尔及利亚总督納歇朗坚持要帝国主义的軍人們注意北非，他把北非称为"头等的战略陣地"。

广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三角形地区——以苏伊士运河为中心的北非和东非地区首先吸引了帝国主义者的注意力。早在战爭年代，美軍登陆摩洛哥以后，就在克尼特尔（利奧特港）长期駐扎下来，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海軍基地。

英国統治集团則在三角形地区的另一端进行了狂热的工作。战爭剛剛結束，他們就撥出巨款，在馬金諾一路特铁路車站地区建設大型基地。在东非各国建設了一些目的在于接納噴气式飞机和远程轰炸机的港口和飞机場。同时，还敷設了铁路，修筑了汽車路干綫，以便把东非一些最重要的战略据点相互联結起来。

---

① *S. Jones.* Africa and American Security. New York, 1945.

② 引自 *И. М. Лемин.* Обострение кризиса Брит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1, стр. 365.

三、殖民主义者的策略手段和非洲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非洲各族人民对击溃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場上作战，捍卫了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各爱好自由民族的事业。非洲各族人民当时相信并希望，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将把他們从帝国主义桎梏中拯救出来。但是，这并沒有实現。

各帝国主义大国企图使非洲避免遭受革命的震动，不让解放的思潮在非洲各国扩展，并在非洲保持殖民制度。

战后时期各宗主国在非洲的殖民政策是根据每一非洲国家的具体条件，根据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程度制定的。

在南非联邦，这种政策的基础是由少数白种人对絕大多数非洲居民公开采用法西斯的种族歧視方法。在英屬东非和中非的英国殖民当局也执行了大体上相同的政策。而在其西非各殖民地中，英国殖民当局則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行政一政治改革的策略。在1949—1950年間，制訂了黄金海岸宪法。尼日利亚在战后五年中甚至两度被“賞賜”以宪法：1947年和1950年。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这些国家正向自治“前进”的外貌。

法帝国主义者也把改革政策拿来当作武器。他們在自己的北非和西非領地特别广泛地推行这种政策。1947年9月，頒布了新的“阿尔及利亚組織法規”。①形式上，阿尔及利亚被賦予了成立阿尔及利亚議会这样一些自治权。但是，全部政权却仍然和从前一样掌握在法国总督手中。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法帝国主义的改革活动最初也归結为地方行政机构体制的一些形式上的变化。1947年在突尼斯甚至成立了“內閣”，但是这个奇怪的“政府”沒有任何权利。在实行改革时总是强調指出，关于保护关

① 組織法規的全文見：*К. и Ф. Жансон.* Алжир вне закона. Перев. с франц. М., 1957, стр. 311—328。

系的条約，即殖民管理体制，依然是法国同突尼斯及摩洛哥相互关系的基础。

根据战后最初几年在法屬西非实行的改革，每一个地区都被授权可以制訂自己的既符合本地区利益、又符合法国利益的法規。但是，这种权利只是紙上空談。当时还設立了一些由选举成立的机构——所謂大議会或領地議会。但是由于全部政权屬于总督，这些机构就不能影响政策。①

在所有法屬殖民地中，改革政策都是追求一个同样的目的：以殖民管理体制的形式上的变革作掩飾，来保持原有的殖民制度。但是，帝国主义国家在其殖民政策中即使进行这些局部的、往往是虛假的变革时，也并非出于自願，而是迫于非洲各族人民的冲击。例如，在尼日利亚和黄金海岸宪法宣布以前不久，就曾在1948—1949年爆发过反对殖民制度的風潮和示威游行。法帝国主义在北非的策略是与战后这一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高漲相联系的。

亚洲的一些事件对殖民主义者也起了催促作用。法国在非洲的殖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在印度支那的失敗。法帝国主义者在把国家拖入"骯髒战爭"以后，害怕非洲各殖民地人民效法印度支那各族人民，因此为欺騙人民群众而玩弄手段，进行改良。

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积极揭露帝国主义殖民者，捍卫被压迫国家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帝国主义者越来越难以在殖民地执行以前的公然掠劫和施加暴力的政策。

殖民主义国家在进行各种改良时，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正在消逝。这种进行改良和玩弄帝国主义手段的政策，只能够拖延，但不能防止殖民制度的崩溃。非洲各族人民已經正在觉醒，并投身到爭取民族解放的斗爭中。他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水平是不同的。在某些国家里（葡萄牙和比利时的殖民

① 参見 *Г. Е. Скоров.*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в Западной Африке. М., 1956, стр. 161。

地，英国在东非的領地，法国在赤道非洲的殖民地），政治上只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在其他一些国家里（几內亚、加納、尼日利亚、西非某些其他国家），战后最初几年运动还沒有越出只提极溫和要求的界限。而在第三类国家（北非各国）里，給予独立的問題已經被提到日程上来。那几年在某些非洲国家中，民族解放运动正处于轉而对殖民主义者进行武装斗爭的前夜。

在非洲个别地区和个别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水平的差别是由甚么决定的呢？在北非（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民族形成的过程已經完成，当地的民族資产阶級已經出現幷正在发展，他們企图进行独立的經济和政治活动。在这些国家中已經成长起較大的无产阶級队伍；同法国工人阶級的联系对这些队伍的形成和无产阶級阶級觉悟的提高起了良好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非洲这一地区曾經成为直接的战場，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反法西斯的目的对于这一地区社会、經济和政治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最后，必須指出北非各族人民与阿拉伯东方各同种民族間的密切联系。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最发达的中心是叙利亚和埃及，这种运动的思想滲入了阿拉伯西方各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

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区的形势則不同。部落分散状态在这里还依然保持着。民族形成的过程剛剛正在开始。当地的資产阶級或是还不存在，或是还很軟弱。在北非，資本主义关系不仅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中也已經非常发达，但是在撒哈拉以南这种关系还只是在为自己开拓道路。封建关系和宗法式的公社关系占着統治地位。除南非联邦外，撒哈拉以南任何非洲国家中都沒有共产党，这种情况也阻碍了民族解放运动。

1945年5月，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浪潮席卷整个阿尔及利亚。殖民当

局对运动的强大高涨感到震惊，决心一举而彻底摧垮这种运动。四万五千阿尔及利亚人成为对人民殘酷鎮压——战爭結束日（5月8日）的血腥迫害——的牺牲者。胜利日成为阿尔及利亚人民全民哀悼的日子。甚至法帝国主义的死心塌地的辯护人、資产阶級学者安里·貝納泽都写道：那是"凶殘、无情、从其瘋狂性上看眞是慘无人道的"鎮压①。警察的迫害使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遭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不久以后运动又重新壯大起来，特别是在1947年底。阿尔及利亚无产阶級以强大的罢工来回答阿尔及利亚新組織法規的頒布，并要求进行眞正民主的改革。在以后的年代中，罢工斗爭不断发展。在阿尔及利亚发生了罢工、抗議殖民主义者专横行为的示威游行和其他一些政治性的行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48年底—1949年初的一百天矿山工人罢工。

在北非其他两个国家——突尼斯和摩洛哥，民族解放运动也扩大了。法国把不触动保护关系基础的改革强加于人，这种政策引起广大群众日益强烈的不滿和抵抗。在摩洛哥，以"叛乱的"苏丹穆罕默德·本·优素福为首的一部分封建主也参加了斗爭。

在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像北非那样成熟。

英屬非洲領地中，反对殖民压迫的斗爭在英屬西非，特别在黃金海岸和尼日利亚广泛地开展起来。战爭时期和战爭結束后，在这些国家里发生了重大的阶級变化和政治变化：当地的无产阶級在数量上增加了，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力量，民族資产阶級巩固了，而作为英帝国主义社会支柱的封建上层的陣地遭到了显著的破坏。1947年成立的資产阶級民族主义政党"黃金海岸統一大会党"成为在黃金海岸最有影响的政党。在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会議"——以阿齐克韦为首的民族陣綫型的广泛組織成为一支最有影响的力量。

南非联邦中反对殖民压迫和种族压迫的运动在极其困难的条

① *H. Benazet.* L'Afrique française en danger. Paris, 1947, p.57.

件下发展着。統治集团把南非联邦变成一个使非欧洲居民受折磨的大集中营。但是，尽管在恐怖行动、反动势力的猖狂、种族仇視和鎮压民主的条件下，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也波及了南非联邦。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是南非居民的最大的政治組織。南非印度人大会代表印度居民的利益。工会所起的作用很大，特别是团結几万劳动者的南非工会大会。这些組織为反对反动派、法西斯恐怖和对非白种人的歧視而进行了英勇的斗爭。

1945—1949年間，在比屬剛果曾多次发生农民風潮。工人运动也扩展了。1945年，馬塔迪的碼头工人宣布总罢工，罢工后来变成同軍警的武装冲突。1946年，剛果无产阶級爭得了組織全国工会的权利。到1948年底，工人运动已經显著地壯大起来，在运动过程中提出了一些新的更成熟的政治要求和經济要求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最初五年內，民族解放运动在不同程度上波及整个非洲大陆。帝国主义者企图用“鞭子和蜜糖餅干政策”来鎮压非洲各族人民的斗爭，但是失敗了。殖民主义国家沒有能够使非洲各国与革命的解放的思潮隔絕。“黑色大陆”上災难深重的各族人民正在觉醒，他們要求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并力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中取得成就。在进步力量的支持下，在社会主义陣营的支持下，他們要求消除深仇宿恨的殖民制度，贏得民族独立。

虽然在这一时期非洲各族人民还沒有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国际舞台，但是他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爭对于国际关系已經具有巨大的潜在意义。从五十年代初期起，非洲大陆上一些最先得到解放的国家开始执行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拼凑侵略性軍事集团的对外政策，这不是偶然的。非洲各年輕国家对外政策中的这种

---

① 参見 *В. А. Мартынов.* Конго под гнетом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1960。

傾向，随着独立国家数目的增加，随着它們在世界政治中所占比重的增加，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十二章

1945—1949年的拉丁美洲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拉丁美洲各国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大削弱了拉丁美洲与欧洲各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与从前在許多拉丁美洲国家中占有强固陣地的英国之間的經济联系。与此相反，美国却扩大了它对拉丁美洲的經济渗透。同时，民族資本在战爭年代无疑也加强了。在1945—1947年期間，与1937年比較，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智利的工业产量增加了約50%，而发达程度較差的国家則增加了30%。①

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还奠定了現代黑色冶金工业的基础。紡織（棉紡）工业的产量显著地增加了。食品工业的各部門也以很快的速度发展着。

拉丁美洲各国間的貿易联系扩大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墨西哥、哥倫比亚、巴西成为拉丁美洲各国市場所需棉紡織品的供应者。出現了一种相互合作的傾向，一种为保卫民族独立而制定經济发展共同計划的傾向。

还在战爭以前墨西哥政府就曾进行的一些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改革对于拉丁美洲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些改革使得建立国营經济成分的

①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Prepared by the Secretariat of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49, p. XVII.

思想和保卫民族工业免受外国竞爭的思想在拉丁美洲各国中普及起来。

美国壟断組織力图阻撓南方各邻国独立的工业发展，因此鼓励一种"理論"的散播，似乎拉丁美洲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国营經济成分的扩大带有人为的暫时的性质，似乎形势到战后已經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們提出了这样一个論題：在战爭結束后拉丁美洲需要恢复"国际劳动分工原則"，換句話說，需要放棄独立的經济发展。因此，美国資本对拉丁美洲經济的主要"貢献"就仅只在于扩大拉丁美洲的采掘工业。这些壟断資本家譴責弗·罗斯福政府，說它对拉丁美洲要求解放自己經济的各国人民表現了"軟弱"、"自由主义"、"犹疑不决"；他們极力使人相信正是"睦邻"政策助长了拉丁美洲人反对美国資本的行动。①

到战爭結束前夕，两种相互矛盾的傾向已經明确地显現出来：美帝国主义企图阻撓拉丁美洲經济和政治的独立发展，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則为爭取独立而斗爭。这两种傾向极强烈地影响了拉丁美洲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

除去經济方面的变化以外，在拉丁美洲的政治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过程。这个大陆上的国家实际上并沒有参加战爭。固然，到1944年底，所有这些国家都已对法西斯国家宣战，或者同它們断絕了外交关系，但这大多只是形式上的行动。巴西（在意大利有一个远征軍团）和墨西哥（在菲律宾有一个空軍兵团）仅只派少数部队参加了战爭。而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則仅限于向美国提供原料或軍事基地。

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战爭中的这种消极态度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的影响。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宁願让拉丁美洲各国同法西斯主义仅只处于"象征性"战爭状态。他們怕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战爭会发展成为爭取民主解放和社会正义的斗爭。

① *F. Behrendt*.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 Albuquerque, 1941, p. 15.

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的独裁者由于害怕群众的反法西斯情緒而仓皇地重新粉飾了一下自己的制度，声称自己忠于"民主制度和自由"。独裁者索摩查(尼加拉瓜)、特魯希略(多米尼加共和国)、烏維科(危地馬拉)、卡里阿斯(洪都拉斯)、馬丁涅斯(薩尔瓦多)、摩林尼哥(巴拉圭)等人，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同时，美国在"援助"战时盟国的借口下用武器装备这些独裁者(根据租借法的供应)，这些武器就被用来維持反动制度。

但是，拉丁美洲的人民群众希望对法西斯主义进行眞正的、而不是表面的斗爭，他們开始爭取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苏联对法西斯主义的偉大胜利和亚洲殖民地附屬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鼓舞了他們的斗爭。当时拉丁美洲政治形势的特点是，人民群众对苏联的同情和友爱大大增强。某些国家的政府不能不考虑到这种情緒。在二十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十三个国家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①。

在民主运动的冲击下，某些由美帝国主义者保护的独裁政权垮台了。1943年12月，玻利維亚的恩里克·佩尼亚兰达将軍的反动政府被推翻。1944年5月，厄瓜多尔的起义的人民群众推翻了阿罗育·戴·里奥的独裁政权。在同年八月由貝拉斯科·伊巴拉所組成的新政府中，有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代表参加。美国最近的后方——中美洲沸騰起来了。1944年春季薩尔瓦多的政治总罢工驅逐了美国地主寡头和壟断組織的最殘酷、最可恨的走狗之一——独裁者馬丁涅斯。在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人民群众也起来反对独裁政权。

危地馬拉的爱国者們在解放斗爭史上写下了英勇的一頁。1944年7月，由于总罢工的結果，多年来肆虐国內的独裁者烏維科終于下台。代替他上台的以弗雷德里科·彭塞将軍为首的軍事委員会企图把人民运动淹沒在血泊中。当时在反对反动派的統一战綫中团結了劳动者、大学生、进步

① 参見 *С. А. Гонионский.* Латинская Америка и США. 1939—1959.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 1960, стр. 137。

的知識阶层和有民主思想的軍人集团；他們在同軍事委員会的部队进行的激烈战斗中贏得了胜利。1944 年 10 月，民主势力占了上風，这成为危地馬拉发展中的一个轉折阶段。建立了資产阶級民主制度。1944年底，举行了第一次普选。著名的民主活动家何塞·阿雷瓦洛担任总統职务；他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經济改革。

1946年秋季，在智利組成了新政府，有三名共产党人参加了政府。由于共产党的不倦的活动和原則性，在智利建立起左派各政党（共产党、激进党和民主党）的統一战綫。先进势力在巴西的影响也扩大了；議会选举（1945 年 12 月）的結果，共产党人在众議院內得到十四席，在参議院中得到一席。民主力量在秘魯、委內瑞拉和古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工人阶級在拉丁美洲所起的作用加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它不仅在人数上增多了，而且——这是最主要的——巩固了自己的团結，在組織上变得坚强了。在許多拉丁美洲国家，劳动群众爭得了成立工会的权利。团結各派工会的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的影响加强了。1938 年 9 月成立的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引导劳动者参加爭取拉丁美洲各国自由和独立的发展、反对帝国主义統治的斗爭。1944 年 12 月，在卡利（哥倫比亚）召开的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代表大会拟訂了拉丁美洲劳动者在战后时期的行动綱領。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号召为拉丁美洲各国得到完整的政治和經济独立而斗爭，并拟訂了深刻的社会經济改革的綱領。

民主运动的发展帮助了农民，首先是雇农去爭取建立自己的协会和工会的权利。建立工农合作关系的客观可能性逐漸增加了。以前不大积极的一些小資产者阶层（手工业者、小商販）也参加了政治活动。

在某些国家里（玻利維亚、委內瑞拉、巴拉圭、古巴）出現了一些基本上反映居民中小資产者阶层利益的新政党。民主力量也影响了一些老的"傳統的"政党，例如哥倫比亚的自由党，在这个党內战后最初几年間左翼即所謂"盖丹"派（根据其領袖霍尔赫·埃列塞尔·盖丹的名字）的势力加强了。

拉丁美洲居民中以前消极的一些阶层的覚醒，为解放陣綫的扩大开拓了前途。同时，这些阶层带着他們全部的偏見和幻想登上积极的政治斗爭舞台，这也有其不利的一面。一些小資产阶級

的和資产阶級民族改良主义的政客們利用各国人民对社会正义性和自由的向往，而在群众中散播幻想，硬說甚么帝国主义統治的时代已經結束，美国壟断集团的政策已經发生根本变化。

拉丁美洲各国中的資产阶級地主集团和反动軍閥依然是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柱。它們在經济和政治生活中依然保持强固的陣地，一等到时机有利就轉入进攻。

"睦邻"政策已經不符合极端侵略的美国壟断資本集团的利益。他們指望着执行对拉丁美洲更强硬的政策。

二、墨西哥会議、旧金山会議和美国的立場

在美洲国家間关于和战問題会議上(1945年2月21日至3月8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召开)，美国統治集团公开地解釋了它对拉丁美洲各国的"新"政策。在会議上发号施令的是美国副国务卿威廉·克萊頓。他2月27日发言的中心思想，归結起来实质上就是論证积极延續"門戶开放"政策。克萊頓宣称，美洲大陆各国"相互依賴"的时代已經到来，現在应該是結束"經济民族主义"的时候了。① 他号召清除关稅壁垒，放棄国家对經济的干涉。

"克萊頓計划"是一个对拉丁美洲国家沿經济独立道路前进的任何企图都加以破坏的綱領。② 这就是美国代表在会議上談得天花乱墜的"泛美团結"的經济基础。

---

①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VII (July 1944—June 1945). Boston, 1947, p.707—708.

② 克萊頓并不是提出这种綱領的第一个人。1945年1月，納尔逊·洛克菲勒在就任泛美財政經济协商委員会主席时宣称：拉丁美洲各国应該放棄国家对經济生活的控制，开始"自由貿易"，开辟对原料的自由通道等。由此可見，"克萊頓計划"反映了美国最有势力的壟断資本集团的利益。(《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VII (July 1944—June 1945), p. 760—761.)

某些代表团——哥倫比亚、烏拉圭、智利和一些其他国家——反对"克萊頓計划"的基本原則。拉丁美洲各国的代表們拒絕取消关稅壁垒和实行通貨自由兌換比价，而这是美国代表团所坚持的。

这些矛盾在会議所通过的《經济宪章》中反映了出来。《經济宪章》沒有接受美国所提"鏟除一切形式的經济民族主义"的建議，而只限于表示希望消除"經济民族主义的过火現象"。此外，还加上了一个极能說明問題的补充："……也包括……本国剩余产品在世界市場上的傾銷"，这显然是針对美国壟断組織的路綫的。美国曾建議拉丁美洲各国"不在貿易部門建立国营企业"，这个建議在《經济宪章》的定稿中被删除了。①

尽管如此，美国代表还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代表团施加压力，終于把"克萊頓計划"的許多原則强行載入了会議的决議：使本国資本和外国資本机会均等，刺激私营企业家的活动等。《經济宪章》表示反对对"个人主动精神"的束縛，反对国家的干涉。所有这些都被"团結"和"平等"关系等堂皇辞句掩飾起来。

在拉丁美洲，《經济宪章》及其基础——"克萊頓計划"受到了各个不同阶层人民的尖銳批評。甚至墨西哥制造业商会——墨西哥民族資产阶級的主要联合組織——也把"克萊頓計划"称作美国世界霸权計划，根据这个計划美国自居宗主国，而使其他国家作附庸国。②

經济問題并不是会議日程上的主要內容。建立美洲大陆各国似乎是"防御性"的軍事集团問題和泛美联盟改組問題，被提到了首要地位。查普德庇克公約（根据公約签訂地点墨西哥的查普德庇克宫而得名）是在巩固美洲大陆各国軍事合作道路上的第一步。

① 这个問題对于拉丁美洲各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們希望建立起自己的商船队，以結束对美国的依附状态。正是在这个时期，委內瑞拉、哥倫比亚和厄瓜多尔进行了关于建立統一商船队，即所謂"大哥倫比亚商船队"的談判。

② *R. F. Behrendt*. Inter-American Economic Relation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1948, p. 69.

这个文件規定了共同使用武装力量，并建議美洲各国締結一項《为反抗进攻而相互援助的协定》①。

出現了一种反常的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結束，法西斯主义已經濒于溃灭的边緣，而美国却在会議上拼凑一个西半球国家軍事同盟。查普德庇克公約借口“区域联防”，为西半球反动上层人物的反共、反民主集团奠定了基础，它的鋒芒是指向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

当然，美帝国主义者暫时还沒有全部攤牌，而宁願退居幕后，让某些拉丁美洲的代表出头露面地活动。

墨西哥会議各項决議的实质不仅在于从理論上为“区域主义”辯解，而且还为泛美联盟② 的改組作了实际的准备。美国坚决要求尽速“巩固”泛美体系。美国坚持改組泛美联盟，是因为它企图在美洲大陆上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势力。在墨西哥通过的各項决議使美国得到了更猖狂地干涉拉丁美洲各国事务的武器。

在建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議上（1945 年 4 月），美国依靠拉丁美洲各国的支持，企图爭取使查普德庇克各項决議得到贊同。当然，与此同时也就发生了泛美組織存在的合法性問題。华盛頓的代表們为坚持把关于“区域主义”的各条款載入联合国宪章，而硬說联合国宪章損害“小”国权利和不考虑西半球各国的傳統。美国外交企图以它所領导的拉丁美洲各国集团来对抗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的大国一致原則。

美国代表們——阿瑟·范登堡、納尔逊·洛克菲勒、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希望西半球各国不仅遵守联合国各項原則，而且遵守“門罗

①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VII (July 1944—June 1945), p. 720.

② 泛美联盟成立于 1889 年。在第一届泛美会議时，它被称为“美洲各共和国促进貿易、友誼及和平联盟”，到 1910 年才改称为“泛美联盟”。

主义”。

比較有远見的美国政治活动家反对这种路綫。例如，弗·罗斯福时期国务院的負責官員、拉丁美洲問題专家劳倫斯·达根强調說，区域集团政策正在破坏着联合国。达根誠实而且客观地承认，美国企图用煽动反苏情緒来建立泛美体系，这种企图势将使美国同苏联的相互关系发生災难性的恶化，而“地球上两个最大国家的”合作“是普遍和平的极端重要的条件”①。

旧金山会議以后，美帝国主义者就倚靠拉丁美洲各国內的反动分子，把自己的种种侵略計划大力强加給拉丁美洲。

三、西半球各国軍事—政治集团的建立

1946年5月6日在总統致国会咨文中提出的所謂“杜魯門計划”，在美国执行其战后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美国同拉丁美洲进行軍事合作的計划。它包括下列各点：1. 通过从南极地带到阿拉斯加建立統一的部队来进行陆軍和海軍的合作。2. 一切武装力量的軍事訓练和組織的統一体系。3. 所有拉丁美洲二十个共和国的軍事装备和武器都按照北美型式实行标准化，并由美国供应武器。4. 利用拉丁美洲各国的人力来进行軍事建設和执行美国的軍事战略任务。5. 根据軍事性质的要求对拉丁美洲各国进行人口調查。

“杜魯門計划”的目的是要全面地控制拉丁美洲各国，把这些国家变成美国經济的附庸。諸如此类的計划的理論“根据”，就是关于美国与拉丁美洲各国間“天然的”相互补充和关于“大空間經

① *L. Duggan.* The Americas. The Search for Hemisphere Security. New York, 1949, p. 119, 122. 当反共歇斯底里，“猎捕女妖”开始时，达根被控有“共产主义”思想，并被傳到“非美活动調查委員会”去。由于不堪迫害，达根自杀了。

济”的地緣政治学观念。

罗德尼·阿里斯門迪写道：“杜魯門計划是更大的事情的一部分，是企图把‘美国世紀’强加于世界的那种反动空想的一部分。由于这一情况，那些被預定給华尔街的世界霸权充当‘內地’的国家受奴役的威胁，不仅沒有減弱，反而更加严重了。”①

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使拉丁美洲各国的反动軍閥变得更加猖獗，加强了他們对政治生活的干涉。主要問題甚至还不在于指靠拉丁美洲的軍队，而是在于把这些国家变成美国統治的重要据点。在华盛頓，人們当然了解，拉丁美洲各国的軍事潛力很小，一旦爆发反苏战爭，它們并不能起甚么显著的作用。主要的是准备基础，以使一些执行宪兵职能的政府在拉丁美洲上台。美国社会学家厄德溫·柳溫在《拉丁美洲的軍队与政治》一书中承认：“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各种軍事計划的目的首先带有政治性，虽然人們承认更适当的是在表面上給这些計划一个軍事的形式，而不是政治的形式。”②

劳倫斯·达根不安地写道：以武器装备拉丁美洲各国会导致軍人集团夺取政权，而他們将取消民主自由。达根指出：“对于五角大楼来說，同甚么样的政权合作反正都一样，只要这个政权支持五角大楼的計划。”③

不仅劳动者，特别是他們的組織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而且各种不同的資产阶級集团，也都对“杜魯門計划”提出了批評。前哥倫比亚总統埃德瓦尔多·桑托斯以前曾以同情美国知名，但他指出，“杜魯門計划”正在破坏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主权和这些国家对外政策的独立，强迫它們进行軍备竞賽，使得捐税增加，人民生活水

① *Р. Аристенди.* Вторжение доллара в Латинскую Америку. Перев. с исп. М., 1948, стр. 39.

② *E. Lieuwen.* Arms and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1960, p. 218.

③ *L. Duggan.* The Americas. The Search for Hemisphere Security. p. 187.

平降低。[1] 甚至拉丁美洲某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了解到，无条件地支持美国路綫会使它們做得太过分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損失。

由于拒絕依从北方邻国的号令，在美国政府与阿根廷庇隆政府之間发生了冲突。美国企图迫使阿根廷政府放棄它在某些方面与美国政府牴触的比較独立的路綫，并希望重演以前美国在巴西所能爭取到的局面[2]。

胡安·庇隆——有民族主义情緒的軍人的代表，在1946年上台。他的政权是拿破侖式独裁制的变种。庇隆企图利用国內各种社会力量之間的矛盾，希望为自己的政权保証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庇隆政府向劳动者和中間阶层献媚。它为了巩固自己而利用了人民群众和民族資产阶級对于土地—金融寡头所执行的政策的不滿情緒。庇隆及其拥护者提出了保卫民族主权，不受外国干涉的諾言。

庇隆政权，特别是在初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中各种不同阶层的而首先是資产阶級的民族主义情緒。庇隆政府表現了爭取国家"經济独立"[3]，同一切国家发展貿易、經济关系的願望。在一些泛美会議上，阿根廷的代表曾經多次反对美国使拉丁美洲各国完全屈服于美国利益(也包括在軍事方面)的图謀。阿根廷領导人的这种声明和行动引起了华盛頓的不滿，引起了对庇隆的尖銳的抨击和对阿根廷政府的直接压力。同时，美帝国主义者还千方百計地力图把阿根廷——拉丁美洲最大国家之一——拖入自己的軍事計划，并保证使阿根廷参加为签訂軍事协定而計划在里約热內卢召开的美洲大陆国家会議。

里約热內卢会議(1947年8月15日至9月2日)带有一个堂皇的名称："美洲国家維持大陆和平和安全会議"。这个会議是根

---

① *A. P. Whitak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America. The Northern Republic. p. 248.

② 1945年，在巴西曾企图在一定程度上执行民族主义政策的瓦加斯总統被推翻了。以杜特拉将軍为首的亲美軍人集团上台。公开反对瓦加斯政策的美国駐巴西大使阿道耳夫·貝尔利在政变中起了活跃的作用。

③ 1947年7月9日，庇隆在图庫曼城签署了所謂《經济独立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出了一些反映民族主义集团情緒的要求。

据各国外长墨西哥会議（1945年）的决議——經过多次延期以后——召开的。

1947年9月2日在里約热內卢签訂的《美洲国家間互助条約》（有时被称为《西半球联防公約》）证明，美国政府已經把自己的政治計划和战略計划强加給拉丁美洲。

条約的主要条款充分露骨地显示出，在关于西半球"联防"的辞句背后隐藏了些甚么东西。例如，条約的第四条規定了半球的"安全区"。"安全区"的西界穿过北极、白令海峡、沿太平洋（巴拿馬运河以西約一千二百海里）并穿过南极。东界是沿格陵兰东岸和大西洋，通向南极。阿拉斯加和格陵兰、加拿大、北极地区和南极地区，都被包括在"安全区"之內。在这个辽闊的地区范圍內，一旦发生"侵略"时，西半球各国必須"相互援助"。①条約把侵略理解为不仅是来自外部的武装进攻，而且包括美洲大陆內部那些危及"某一美洲国家的主权或政治安全"的行动（第六条）。美国政府在1954年加拉加斯第十届泛美会議上就利用了使反革命輸出合法化的这一条，来組織对危地馬拉人民的侵略。

对"侵略"概念的任意解釋把"联防"条約变成了奴役拉丁美洲和鎮压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

里約热內卢条約还有侵略性的反苏的明确傾向。这个条約再一次表明，美国上层人物企图执行阻撓联合国正常活动和建立軍事—政治集团的政策。1947年9月4日，参議員范登堡在参議院发言时，把里約热內卢条約称作其他同类条約的"典范"。实际上，这个条約后来成了侵略性的北大西洋公約和其他帝国主义协定的"典范"。②

美国在里約热內卢由于对拉丁美洲各国施加直接压力而取得的外交胜利是极其有限的。美国只是稍微緩和了一下同这些国家的矛盾，但并沒有消除这些矛盾。

---

① 值得指出来的是，早在第一届泛美外交部长会議（巴拿馬，1939年）上就划定了"安全区"。当时，这个"安全区"包括了圍繞美洲大陆海岸的三百浬地带。

② 参見本书第二十四、二十五章。

四、拉丁美洲經济矛盾和政治矛盾的尖銳化

在战后最初几年，拉丁美洲各国的經济状况恶化了。战爭时期积存起来的比較多的外汇儲备很快就减少了。首先是拉丁美洲同美国之間不平等的貿易促成了这种局面。例如，在1947年拉丁美洲从美国的进口达三十九亿美元，而出口只有二十一亿美元。結果，拉丁美洲各国的外汇儲备从1946年的四十五亿美元减少到1947年底的三十七亿美元。

为了寻求出路，拉丁美洲各国削减了进口，加强了保护关稅的壁垒，并加强了对外汇兌換比率的控制。其中有一些国家实行了貨币貶值。困难的处境促使拉丁美洲各国巩固相互間的經济合作。在1946—1947年間，阿根廷同智利、玻利維亚和厄瓜多尔締結了貿易协定。巴西同委內瑞拉的貿易协定（1947年）規定，由巴西供应紡織品和食品，来交換委內瑞拉的石油。

拉丁美洲各国曾要求美国提供援助，特别是用于經济发展的借款，但是这种要求遭到坚决拒絕。①

各壟断組織提供了“援助”，但只用一种形式——私人投資。此外，它們还要求“必要的保障”，即拉丁美洲各国不得捍卫本国的民族工业，不得企图爭取經济独立。

在建立联合国拉丁美洲經济委員会問題上，拉丁美洲各国与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意見分歧。拉丁美洲各国主張成立这样的委員会，希望在它的援助下哪怕能部分地克服一些經济困难也好。美国却不願意拉丁美洲各国把自己的要求提到国际舞台上来。在联

① 进出口銀行所給予的微不足道的款項当然是不能算在內的。在1945—1947年間，这个銀行撥給拉丁美洲各国二亿一千八百万美元，但撥給其他国則达二十二亿五千九百万美元。（《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5—1947》. New York, 1948, p. 134.）

合国就成立联合国拉丁美洲經济委員会問題进行投票时，美国代表棄权。

劳动群众的困难的經济状况在拉丁美洲各国中促成了尖銳的社会冲突。在其中許多国家里展开了罢工运动，爱国力量的各种行动也扩大了。由于惧怕人民風潮的規模，国內的反动派同美帝国主义勾結起来发动了反共运动，对民主力量进行了迫害。

巴西和智利的統治集团成了反共主义的打手。1947年5月，巴西最高选举法庭宣布共产党非法。巴西政府对工会和劳动群众轉入了进攻。同年，一度曾向拥护民主的人們献媚的智利总統岡察雷斯·魏地拉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除出去。反共运动和对劳动者的迫害开始了。华盛頓在岡察雷斯·魏地拉的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美国壟断資本家們拒絕給智利貸款，并威胁說，如果不把共产党人从政府中排除出去，如果不鎮压劳动者的活动，美国就要迫使智利人偿还以前的債务。①

美国壟断資本家对岡察雷斯·魏地拉政府施加压力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阻撓智利与苏联的合作，特别是阻撓关于签訂貿易协定的談判。苏联大使館遭到了智利反动分子的襲击。正如苏联照会所指出，这种事件"能够发生，只是由于在智利进行而不受智利当局制止的肆无忌憚的反苏运动的結果"②。

1947年10月20日，巴西借口苏联报刊对巴西政府首脑杜特拉将軍发表批評意見，而与苏联断絕了外交关系。次日(10月21日)，智利政府也与苏联断絕了外交关系。这是实施在里約热內卢通过的各項决議的最初一些行动之一。

1947年3月，当巴拉圭民主力量起来对摩林尼哥独裁制度进行武装斗爭时，美国政府出面援助，用武器装备它的忠实奴僕。美帝国主义者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借口下，以"大陆团結"为名，运送武器到巴拉圭，美国駕駛

① *V. Codovilla*. Resistirá la Argentina al imperialismo yanqui? Buenos Aires, 1948, p. 305.

②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7 год», ч. II, стр. 42.

員参加了反对起义者的軍事行动，而美国駐巴拉圭軍事代表团长多納耳德·皮尔逊实际上成为独裁者軍队的領导人。古巴共产党人的理論性机关刊物《基础》写道："在巴拉圭以'大陆防御'为名而进行的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鎮压，与杜魯門主义的宣布、美国反共运动和在希腊的干涉、以及里約热內卢公約的签訂同时发生，这絕不是偶然的。"①

对于1948年春季哥斯达黎加內战的爆发，美帝国主义者在不小的程度上要負責任。同时，民主运动在哥斯达黎加壯大起来，人民先鋒党的影响加强了。哥斯达黎加人民的民主运动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的人民发生了不小的影响。美国壟断資本家企图利用反共宣傳和对巴拿馬运河"安全"的虛构的威胁，使这种民主运动局限在一个地区，并消灭它。②

帝国主义者及其代理人力图在拉丁美洲的工人运动中引起分裂。主要的打击是針对着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挑撥运动的发起人是与美国国务院密切合作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头目們。

由美国劳工联合会在秘魯首都利馬組織的工会联合会(1948年1月)，是为建立"缺乏的环节"而采取的实际步驟。根据該联合会的决議，成立了采取反共立場的美洲国际劳工会議。

五、波哥大会議及其后果

1948年3月30日，在哥倫比亚首都波哥大召开了第九届泛美会議。美国派了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到波哥大去：代表团成員有国务卿乔治·馬歇尔、商业部长阿弗里尔·哈里曼、財政部长約翰·斯奈德、副国务卿諾拉曼·阿麦尔等。

还在波哥大会議开始以前，馬歇尔在代表团团长会議上就公开宣布：美国代表团所感兴趣的是討論关于"指向美洲各共和国和

---

① «Fundamentos», 1949, № 93, p. 1.

② 例如，国务卿馬歇尔的态度就证明了美国政府对哥斯达黎加內政的干涉。他在参加波哥大泛美会議的工作时，曾打給哥斯达黎加政府一份这样內容的电报："在巴拿馬运河两岸沒有消除共产主义威胁以前，我将不离开哥倫比亚。"

平与安全制度的外国顛覆活动"① 問題，也就是煽动反共运动。

在里約热內卢，美国代表团借口签訂《联防公約》而爭取到不討論經济問題。到波哥大，他們又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不过这次的借口則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进行斗爭。但是这里的形势远远不是对他們有利的。反共主义并沒有成为会議的主要題目。

拉丁美洲許多国家的代表更关心的是經济問題。在最初几次全体会議上，他們曾間接地，有时甚至公开地同美国国务卿爭辯。

墨西哥外交部长海美·托雷斯·博德特陈述了拉丁美洲的經济困难情况，并指出需要有广泛的經济和財政援助来消除落后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博德特根本沒有触及"国际共产主义"問題。阿根廷外交部长布拉姆格利亚也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拉丁美洲各国經济发展的需要上。实质上，他拒絕支持智利代表提出的反共决議草案。② 阿根廷代表团在墨西哥、哥倫比亚和秘魯代表团的支持下，建議設立一个为拉丁美洲經济发展供給資金的泛美銀行。③ 某些拉丁美洲国家要求在从拉丁美洲出口的原料价格与从美国进口的工业品价格之間确定公平的对比关系。古巴代表团建議譴責"經济侵略"，即外国商品在拉丁美洲市場上漫无限制的竞爭。危地馬拉代表团提出了譴責美洲大陆上的殖民主义的决議草案。④ 多数代表团贊成这个决議。⑤

4月9日，波哥大的人民起义破坏了波哥大会議的进行。起义的直接导火綫是反动分子杀害了号召进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的自由党左翼領袖盖丹。但是，一些更深刻的原因却蘊含在人民对当时执政的保守党領导人恐怖、反动政策的憤懣情緒中。人民的斗爭已达到的規模，使得会議不得不

① 《The New York Times》, 31. III. 1948.
② 《Fundamentos》, Junio-Julio de 1948, p. 309.
③ 《Fundamentos》, Noviembre de 1948, p. 636.
④ 《The New York Times》, 9. IV. 1948.

中止工作(从4月9日至14日沒有开会)。美国的軍国主义者把武器从巴拿馬运河区运进哥倫比亚,而保守党人的政府就在这些美国軍国主义者的援助下把起义淹沒在血泊里。

甚至从这些哥倫比亚人民的悲惨事件中(当时在波哥大,一千二百人被杀死,二千五百人負伤),美帝国主义者也决心要为自己捞取好处。馬歇尔宣称,在波哥大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現象,这些事件与法国和意大利的罢工相类似,結成一条"国际共产主义"的活动的統一鏈条,目的在于破坏"民主制度"⑥。馬歇尔的声明受到杜魯門总統的贊賞,而且在美国国会中和美国反动报刊上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美国对外政策領导人的目的是明显的。他們企图在反共运动的掩飾下,把泛美会議的工作方向改变到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来,使会議带有軍事性质,而把一些最尖銳的問題"束諸高閣"。在一定程度上,他們达到了这个目的。

4月22日,波哥大会議通过了貫穿着"冷战"精神的《保卫民主宣言》。这个宣言是一些关于"民主"的蠱惑人心辞句的堆砌,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威胁"自由世界"的濫調謊言的堆砌。在起草这篇宣言时,馬歇尔特别挖空心思,他同一些拉丁美洲代表团团长进

---

⑤ 还在波哥大会議前夕,1948年初,智利、阿根廷和危地馬拉就为英国在西半球的殖民領地問題,同英国发生了冲突。阿根廷政府和智利政府对福克兰群島和南极洲的一部分提出了要求。危地馬拉要求归还伯利兹(英屬洪都拉斯)。在危地馬拉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危地馬拉的事件带有特别激烈的性质。英国为了应付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派了三艘巡洋舰到伯利兹去。英国水兵在英屬洪都拉斯登陆,并且占領了一些非常迫近危地馬拉边界的据点。在危地馬拉致联合国的抗議照会中强調指出:英国的行为是武装挑衅,侮辱民族尊严,目的是恫吓危地馬拉。关于取消西半球殖民領地問題的提出本身,就表現了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要求的加强,和他們对美国在英国实际支持下所推行政策的不滿。同时,也不能不看到,某些政府,例如智利和阿根廷政府,企图借助于这些要求来捞取政治資本,并使人民群众的注意力离开尖銳的国内問題。

⑥ 《The New York Times》, 13. IV. 1948.

行了秘密談判。①

波哥大会議的中心文件是《美洲国家組織宪章》，它成为泛美联盟改組的基础。

根据这个宪章，美洲国家組織的主要机构是：(1)美洲会議；(2)美洲国家外交部长协商会議；(3) 美洲国家組織理事会；(4) 泛美联盟（秘书处）；(5) 各专門会議；(6) 各专門机关。美洲国家組織的最高机构是美洲会議。美洲国家組織理事会（会址在华盛頓）是美洲会議閉会期間的最高机构。②理事会的成員是每一国家派出一名的大使級代表。理事会选举美洲国家組織秘书长，任期十年。泛美联盟执行秘书处的职能。在美洲国家組織系統中，还包括各种专門会議，許多专門的美洲組織，其中有美洲防务理事会、美洲农业学会、美洲印第安人学会、美洲地理及历史学会等等。

美洲国家組織宪章是在尖銳矛盾的情况下通过的。在討論宪章的过程中，許多拉丁美洲国家表現出一种願望：限制美洲国家組織理事会的职能，阻止它变成一个享有无限政治和行政权力的"超国家"机构。拉丁美洲代表們的抵抗迫使美国代表团不得不让步，同意取消理事会的某些"超国家"职能，虽然理事会仍然保持了許多重要的政治权力。③关于組織的名称問題也引起了爭論。美国建議把新的联合机构称为"美洲民族組織"，阿根廷、墨西哥、委內瑞拉和一些其他国家的代表表示反对。这表現出，拉丁美洲各国担心对它們的独立甚至拒絕作法律上的承认。在拉丁美洲人的压力下，"民族"这个詞被改成了"国家"。④

在討論防务理事会职能时，也发生了意見分歧。墨西哥和阿根廷在一些拉丁美洲代表团支持下，反对使防务委員会直接隶屬美洲国家組織理事

① 值得注意的是，反共决議剛剛签字，馬歇尔"突然"就对波哥大会議失去了兴趣，4月23日就回华盛頓去了。

② 理事会中設下列机构：美洲經济及社会理事会、美洲法律专家理事会、美洲文化理事会。

③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8—1949》. New York, 1949, p. 367.

④ 十一票"贊成"，十票"反对"。

会。它們坚持防御性的軍事措施由各国自己直接采取，而不应根据美洲国家組織的命令。①协商的結果，建立了并不直接隶屬美洲国家組織理事会的防务协商理事会。②但是，所有这些意見分歧都并不带有原則的性质，都不能改变美洲国家組織宪章基本上符合美帝国主义者利益的总的傾向性。宪章中規定，美洲国家組織支持里約热內卢条約关于"互助"的一些基本原則。这一条的載入說明，美洲国家組織的成立是美帝国主义把拉丁美洲拖入其侵略計划的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波哥大会議沒有緩和拉丁美洲与美国之間矛盾的尖銳程度。

在它們的經济关系中，主要問題之一是根据"馬歇尔計划"向欧洲供应粮食和原料的問題。这些国家很快就认識到，它們想靠参加"馬歇尔計划"来改善自己經济状况的指望是沒有根据的。美国壟断了拉丁美洲同欧洲的貿易。因此，拉丁美洲各国就只得完全依附美国壟断組織。借口要为"复兴欧洲"而牺牲，美国把远远低于世界市場价格的价格强加給拉丁美洲各国，并削减了粮食商品的采购。結果，拉丁美洲各国不得不縮减它們所需要的工业設备的采购，并遵守节約日益减少的美元儲备的严格制度。此外，美国在欧洲市場上开始成为越来越活跃的粮食主要供应国，这种情况更加深了拉丁美洲各国的經济困难。

美国統治集团企图借此迫使其南方各邻国作出更大的让步。这特别明显地表現在对阿根廷的关系上，阿根廷提出的关于粮食商品的支付价格不应低于世界市場价格的要求遭到了拒絕。于是，阿根廷方面就同一些欧洲国家（芬兰、南斯拉夫、荷兰等）在直接交換商品和原料的基础上締結了一些貿易协定。对于阿根廷这种执行独立政策的企图，美国政府表現了敌

① 《The New York Times》,18. IV. 1948.

② 必須指出，虽然这个理事会的成立并不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意味着原来样式的"杜魯門計划"遭到了挫折，但是美国还是同意了，因为美国在其中发号施令的美洲防务理事会依然保存着。

对的反应。它坚决反对英国同阿根廷之間貿易条約的签訂(1949年6月)，因为这个条約威胁了美国石油、机器和其他制成品向阿根廷的出口。这一时期美国同阿根廷关系的特点就是一种特殊的"小規模經济战爭"①。

波哥大会議以后，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发生了新的反动政变，这些政变也表明了波哥大会議的决議是怎样实現的。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的反动派利用反共口号，对民主运动轉入了公开的进攻。

1948年10月，以曼努埃尔·奥德利亚将軍为首的軍人上层在秘魯发动了国家政变。11月，在委內瑞拉也发生了同样的政变，也是軍閥的代表們德尔加多·查尔沃德中校、佩列斯·希門尼斯和廖維尔薩·帕耶斯上了台。稍后(1949年)，教权主义和地主反动派的走狗劳雷亚諾·戈麦斯在哥倫比亚上台。反动軍閥們立即到处迫害民主制度的拥护者，并鎮压工人运动。同时，新的統治者們急迫地宣布，外国資本将被給予"安全活动"的充分保证。

軍人集团宣布支持"反共主义"政策和"西半球防御"計划。他們不掩飾自己对五角大楼軍事冒險主义的忠誠。能說明問題的是，积极参加政变的，恰恰是那些在美国軍事学校中学习过和在华盛頓担任过武官的軍官們。此外，秘魯軍队和委內瑞拉軍队都还得到許多美国武器。

反动政变在拉丁美洲极广泛的輿論界中引起了憤怒。例如，以民主和反帝思想知名的墨西哥前总統拉薩罗·卡德納斯在給委內瑞拉大使館的信中譴責了軍事阴謀分子，并直接指明了主要罪犯——剝削拉丁美洲各国国民財富的外国壟断組織。②

对帝国主义者阴謀的憤怒情緒促使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两份"說明书"，否认美国的石油公司和美国駐委內瑞拉大使館曾参預軍事政变。稍后(1948年12月2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在

①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8—1949», p. 371.

② «La Voz de Mexico», 5. XII.1948.

口头上譴責了政变，并对消灭“民主制度”表示“不安”。

但是，美国壟断資本家集团直接参加政变，是无可置疑的。被推翻的委內瑞拉总統罗慕洛·加萊哥斯的声明在拉丁美洲得到了很大的反响。他說明，美国武官亚当斯上校当政变时正在叛軍的兵营中。加萊哥斯强調說：在政变参加者背后有这样一种势力，它“企图阻撓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爭取經济独立，阻撓它們坚持自己的民主要求和作为有主权的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①。加萊哥斯补充說：外国壟断組織之所以参加政变，是由于委內瑞拉政府采取了限制石油壟断組織活动的措施，提高了对利潤的捐税，停止了提供新的石油租让。

1948 年 11 月初，在里約热內卢召开了美国駐外机构工作人員会議。在会議上决定，对那些企图自行开发石油資源的拉丁美洲国家，执行拒絕提供援助和貸款的政策。

美国报刊不厌煩地反复說：拉丁美洲的一些新政权是“自由企业活动”的拥护者，它們鼓励外国投資，因此在美国投資者面前正开展出广泛的机会。此外，美国报刊还企图把这些独裁政权描繪成是对“混乱”和“共产主义危險”能进行有效斗爭的“拉丁美洲民主”的特殊形式。

在国务卿艾奇逊宣布关于承认这些独裁政权的計划以前的奇特准备工作就是这样进行的。1949 年 9 月 19 日，艾奇逊在紐約泛美协会会議上宣布了这項計划。在这次发言中，美国对拉丁美洲一些反动的政变的支持还多少有些遮掩。艾奇逊的主要論題是这样的：如果这些新政府答应一定尊重美国公民的利益，保持以前的一切“国际义务”，那末就沒有任何理由不承认这些政府。正是依据这种“理論”，美国統治集团向独裁者們提供了軍事援助，并同他們締結了軍事条約。关于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爭”中美洲大陆必須巩固团結的宣言掩盖着这一切。

---

① «Noticias de Venezuela», 1954, № 38, p.8.

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中虽然动摇不定、但仍試图抗拒美国壟断資本家幷捍卫民族利益的合法政府被推翻，这种情况加强了美国在美洲国家組織中的势力。用著名民主活动家、前危地馬拉总統阿雷瓦洛的話說，美国为了自己的侵略目的而"改划了拉丁美洲政治地图"①。

但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是皮魯士式的胜利。② 关于美国忠于拉丁美洲"民主发展"的幻想在不断地消逝。

美帝国主义者沒有能够用反共宣傳哄騙拉丁美洲居民的主要群众和把他們拖进"冷战"。相反，正是这几年里拉丁美洲爭取和平的斗爭开始扩大，这种斗爭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密切交織在一起。根据"拉丁美洲劳工联合会"的倡議，1949 年 9 月在墨西哥召开了大規模的拥护和平会議，拉丁美洲各国几百万和平拥护者派代表参加了会議。这次会議促进了整个美洲大陆上拥护和平的斗爭的开展。对美国壟断組織掠劫拉丁美洲各国自然資源的企图，各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国际关系中的反动路綫表面上占了上風。美洲大陆各国駐联合国的代表团馴順地按照美国的命令投票，許多政府同苏联断絕了外交关系。但是，强大而且深刻的民族解放趋势正暗中发展着，这种趋势正为拉丁美洲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行动作着准备，也为拉丁美洲各国在执行对外政策方面和同其他大陆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更巩固的联系方面摆脫美国操纵作着准备。

---

① *J. J. Arévalo.* Fabula del tiburon y las Sardinas. Mexico, 1956, p.104.

② 牺牲太大，无異失敗的胜利。典出艾皮尔王国国王 Pyrrus 战胜古罗馬軍队后的悲叹，他說："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我就沒有軍队了！"——譯者

第 四 篇

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及其对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

只有注意到能够說明資本主义总危机的特点的那些过程，才能了解帝国主义国家在战后时期的对外政策。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共綱領給資本主义总危机的最本质的特点和規律性下了一个定义：

“愈来愈多的国家脫离資本主义；帝国主义在同社会主义的經济竞賽中陣地的削弱；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随着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和軍国主义的发展而来的帝国主义的矛盾的尖銳化；表現为資本主义日益无能充分利用生产力（生产发展的低速度、周期性的危机、生产設备的經常开工不足、經常性的失业）的資本主义經济內部不稳定性和腐朽性的加强；劳动和資本之間的斗爭的加剧；世界資本主义經济的各种矛盾的急剧尖銳化；各个方面的政治反动的空前加强，对資产阶級自由的摒棄，一系列国家中法西斯暴政的建立；資产阶級的政治和意識形态的深刻危机，——这一切就是資本主义总危机的表現。”①

在前几篇中說明了那些决定資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最重要过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82 頁。

程，解釋了那些由于在一系列欧洲和亚洲国家中帝国主义鏈条遭到社会主义革命全面冲破而給資本主义带来的后果，考察了帝国主义由于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进行經济竞賽而使其陣地遭到削弱的問題，分析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这一已經开始了的过程对国际关系所发生的影响。

在各个国家中体現統治阶級意志的該国对內和对外政策对战后历史的这些客观过程起了很大的影响。历史再次有力地证实了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規律性。退出社会舞台的反动阶級不能执行英明的現实的政策。他們为了要保持自己的特权，便試图用自己的政策来挽救已經过时了的和应当让位于新事物的东西，来挽救全部历史发展过程注定它必然要灭亡的东西。

只有新生阶級的政策才能取得胜利，才能促进历史发展，因为它能考虑現实和进步的社会趋向。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胜利絕不是各种有利情况偶然湊合而产生的。这个胜利反映了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所領导的人民群众的劳动、毅力、意志和忘我精神所证明的一定的历史規律性。

資本主义总危机表現在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危机上。帝国主义国家冒險主义的对外政策充滿了要使历史后退的反动趋势，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剧了战后时期資本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消灭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一切步驟最終都反轉过来反对他們自己，这并不是偶然的。

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虽然屡次遭到失敗，但仍然給全人类带来了苦果。它再次使人类面临战爭的威胁。軍国主义和軍备竞賽使国际局势經常处于紧張状态中。拼湊帝国主义集团的情况給所有大陆上的人民带来了战爭的危險。

美国壟断組織充当了帝国主义国家陣营的組織者的角色，它們企图同时解决这样两个无法解决的战略任务。第一，依靠整个

帝国主义陣营的力量，消灭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成为帝国主义陣营的統治力量，成为包括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在內的新的大帝国的中心。为了要巩固帝国主义陣营，为了要为消灭社会主义創造条件，美国便帮助自己的竞爭对手恢复經济实力，这就必然导致帝国主义之間旧矛盾的恢复和新矛盾的产生，并导致資本主义其他一切矛盾的尖銳化。其結果不可能不是这样，因为美国的战略是造成經济軍事化、引起軍事集团和軍事基地体系的建立的"实力政策"，而这些措施对它所有的伙伴来說是一个沉重的負担；美国的策略和外交乃是一个包括所謂保障"安全"、以免受到无中生有的"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以及所謂为了維护"自由世界"而提供援助等善良意願的"弥天大謊"；而它的眞正的政策却是要使它的軍事集团的一切盟友都听命于华尔街。

英国的对外政策决定于英国統治阶級要取得盎格鲁撒克逊族的世界霸权的宗旨。英国帝国主义者指望借助于"美国宪兵"来消灭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从而保住英帝国的实力。他們打算建立英美世界卡特尔，而英国将在其中充当美国的大伙伴的角色。

法国統治集团把对外政策轉回到战前的旧的軌道，即从外部寻求援助来控制人民的革命力量。这一政策使它企图充当欧洲領导的野心丧失了一切的基础。为了从外部得到"援助"，就不得不以損害民族尊严和同意让法国在大陆上的主要敌人即德国帝国主义复活，来作为交換的代价。

从法西斯政权下解放出来的意大利，由于它的民主力量具有組織性而向前迈进了。但是依靠外国支持而执政的反动政党的集团做尽了一切使意大利的对外政策的独立性丧失得一乾二淨的事情。意大利的財政寡头使意大利降低到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小伙伴"的地位。

在本篇中不准备考察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这并

不是偶然的。西德和日本在战后最初五年中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国家对外政策的对象。

当战后和約基础奠定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是建筑在錯誤的前提上，并且沒有考虑实际的力量对比。沒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实现它們所提出的战略目的。帝国主义者旨在反对現代进步力量的一切对外政策行为都导致了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尖銳和加剧。

第十三章

1945—1949年資本主义世界經济和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資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二阶段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的胜利，資本主义制度不但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政治損失，而且它还受到了巨大的物质損失。帝国主义对地球上四分之一的領土和三分之一的人口完全丧失了統治。在脫离資本主义制度的国家里，曾經占有帝国主义国家全部对外投資的五分之一左右。这些国家曾經是重要的銷售市場。帝国主义者失去了利用这些国家的原料和粮食資源的可能。同时，帝国主义还失去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后备，即多年来一直准备用来进攻苏联的重要战略基地和在他們所有反苏計划中起着重大作用的、动員起来的資源。

在資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第二阶段，一些新国家之脫离这个制度，使得帝国主义政治、經济和战略陣地遭到空前的削弱。战后时期剛一开始，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的竞賽就已經是資本主义总

危机第二阶段的重要特点，是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决定性因素。

已經形成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新的世界力量对比，对已經縮小了的資本主义世界內部矛盾的加剧和革命过程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战后时期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亚非一系列主权国家的成立，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帝国主义国家想在亚洲一些地区維持殖民主义的企图遭到了失敗，在那里，民族解放运动在工人阶級及其共产主义先鋒队領导下发展起来并导致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它們又打算在殖民地世界的其他地区来巩固自己的陣地。它們希望控制住民族解放运动的領导权屬于統治阶級的那些国家。

但是殖民主义者大大地失算了。他們沒有考虑到給民族解放运动以强大支援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也沒有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已融合为一个統一的世界反帝的巨流。他們沒有預見到：殖民体系的瓦解具有連鎖反应的性质，它对帝国主义来說，即使在获得解放的殖民地中政权掌握在民族資产阶級手中的情况下，也是危險的。亚洲主权国家的民族資产阶級拒絕支持拼凑軍事集团来准备侵略社会主义陣营的政策，表明了帝国主义在世界資本主义体系內部的政治后备力量的縮小。

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在对帝国主义的斗爭中形成統一战綫，乃是資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阶段的一个特点。苏共綱領指出，年輕的主权国家的人民"作为新生活的創造者和国际政治的积极参加者，作为摧毀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站起来了"①。

在帝国主义国家陣营內部也发生了质变。壟断資本的政治陣地在这里也遭到严重的削弱。在所有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里阶級力量对比发生了向左的轉变。在意大利和法国这样一些国家里，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99 頁。

工人阶級及其同盟軍比反动派的力量要組織得好一些。他們对于因战爭而破产了的壟断資本的統治集团及其政治代理人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工人阶級及其同盟軍沒有能够取得政权并結束財政寡头的統治。这是由于美帝国主义前来帮助被削弱了的欧洲帝国主义資产阶級。①

开到西欧同法西斯主义者作战的美国和英国軍队，如第一篇中已經指出的，实际上被用来在战后时期充当資本主义制度的警卫队和保护者。美国对西欧資本主义国家所提供的財政和經济援助在这一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美国之所以提供这一援助，不只是美国壟断組織企图在欧洲經济中巩固下来以便确立世界霸权，除此之外，这种援助还反映了一定的阶級战略。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借款、饋贈和資助进行一种独特的經济干涉来反对西欧革命力量。欧洲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內政上的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这些战略阴謀的实現。

战后資产阶級最反动的集团——公开同法西斯占領軍合作的附敌分子和战前主張同法西斯占領軍勾結的慕尼黑分子——暫时退居次要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同抵抗法西斯主义运动有联系的資产阶級集团代替了他們，并指望着同美帝国主义进行軍事和政治上的勾結。这种力量的重新配置造成了整个党政机构已經有所改变的表面現象。新的政党开始将壟断資本在战后西欧的权力加以掩飾和隐蔽。在遭到法西斯占領的西欧国家里，教权主义的政党在战后成为壟断資本最重要的政治支柱。右派社会民主党的領袖很快就找到了和这些党派共同的語言，尽管在綱領上有所区别，但实际上右派社会民主党領袖和这些党派是一致行动的。

教权主义政党的領导千方百計地为美国将欧洲从法西斯主义中挽救出来的使命进行吹噓，并且要使人民群众相信，只有美国的援助才能使他

① 参見本书第二十三章。

們不受饥餓、不受战后破坏的影响。壟断資本的右派社会党走狗随声附和教权主义党人。他們竭力設法不使工人阶級去实現历史上已經成熟了的根本社会改革，首先是不去剝夺那些对发动战爭負有責任以及依靠战爭发了財的壟断組織的財产。

西欧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在美国的支持下，才得以維持住自己的阶級統治，暫时巩固了自己的陣地。但是这一支持的代价是很高的，欧洲資本主义国家对美国的經济上和政治上的依賴空前加强了。

战后資本主义的特点是，政治和經济发展的不平衡大为加剧。

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外圍經历了一个激烈的革命改造时期。宗主国的壟断資产阶級虽然在左派力量的压力下不得不从阶級斗爭前綫撤出一些地方，但他們毕竟还是掌握了对劳动人民实行强制的主要杠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压迫群众的制度趋于完善。然而总的来說，不但在世界范圍內，而且在資本主义世界內部，实力对比是朝着不利于帝国主义資产阶級的方向发展的。他們在个别国家里的陣地得到暫时的巩固，并不能遏止日益加剧的、帝国主义被削弱和資本主义总危机加深的过程。这种暫时的巩固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的情况不同，它并沒有导致資本主义的相对稳定。

資本主义发展日益加剧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义的矛盾在其总危机第二阶段上尖銳化的重要原因。这种不平衡性反映了新的特点。第一，在資本主义世界內部分裂为两个国家集团，即高度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与它們对立的不发达国家，后者已經摆脫了殖民主义的枷鎖、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并且走上了爭取經济独立道路。还在战后最初五年中，这一分裂便成为世界資本主义經济結构和帝国主义分工已經开始破坏的标志之一。

第二，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內部所占的比重激增，出現了一种

表面現象，仿佛帝国主义时代相沿成习的大国爭夺世界霸权的竞爭已經消失了。看样子好像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內部的領导权已經非常巩固，好像发展不平衡規律只是朝着一个方向发生作用，即保证美国陣地不断加强。而美国帝国主义也的确在利用帝国主义竞爭对手的削弱，大肆加强它的扩張。它力图确立一种能使它控制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关系体系。

但是，正如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所表明的，帝国主义陣营內部的关系上由于美国陣地大大加强而发生的一些变化，非但不能阻止帝国主义之間傳統的矛盾的恢复，而且还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战后最初五年快結束时，美国在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中比重下降的趋势已經出現。西欧經济恢复过程結束以后，又重新显示出同美帝国主义者在重新瓜分市場和势力范圍的斗爭中进行竞爭的能力。

第三，在技术方面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加剧了經济发展的不平衡。原子能、測算机、电視、塑料、鋁和最新技术的其他組成因素开始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并在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济中引起了最大的結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比較着力进行固定資本更新的国家，就得到了一些便宜。这些国家由于有最現代化的設备，由于开始建立比較完备的生产結构，因此多多少少弥补了自己的落后。这一因素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竞爭中所起的作用在以后的时期中完全表現出来了。但是这些变化的前提是在战后最初五年中奠定的。

在这一时期中資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即劳动和資本之間的矛盾的进一步加深，也明显地表現出来。依靠国家实力的財政寡头与絕大多数人民之間的鴻沟更为加深了。这一切为所有資本主义国家中爭取实現根本的社会經济和政治改造的斗爭，不断增加了建立广泛的反壟断联盟的前提。

关于資本主义內部矛盾的发展問題，在苏共綱領中有这样一段話："財政資本的压迫不断地加强。大壟断組織把絕大部分社会生产集中在自己手中，从而就控制了国民生計。一小撮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不受监督地支配着資本主义世界的全部財富，把整个整个民族的生活变成他們营私牟利的輔币。財政寡头惊人地发財致富。国家变成了管理壟断資产阶級事务的委員会。整个經济生活的官僚化急剧地加强。国家壟断資本主义把壟断組織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联合成統一的机构，以便壟断組織发財致富，鎮压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爭，拯救資本主义制度，发动侵略战爭。"①

二、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战后恢复平时生产的問題。經济的軍事化。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經济上的結构变化。帝国主义陣营中力量的新配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貿易和財政的恢复，它們之由战爭軌道轉上和平軌道，使得資本主义国家国际經济和政治关系的整个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使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新矛盾有所发展。

不仅是在各資本主义国家本国的經济范圍內产生了战时經济轉向平时經济的問題，与此同时，在整个世界資本主义体系范圍內，也产生了向平时經济过渡这一同样复杂的問題。在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中，根据战爭快結束时形成的力量对比确立了新的比例关系。在資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发展方面也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战爭期間美国同它的盟国之間的对外貿易机构，是靠租借办法来維持的。租借法案的廢除使得美国商品和黃金发生了"过剩"，而那些受到战爭破坏、十分迫切需要进口的国家，既沒有支付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83 頁。

手段，又沒有商品来抵偿这一进口。① 为了恢复对外貿易，美国和加拿大还在 1945—1946 年就不得不向自己的欧洲主顾提供貸款。但是这些貸款显然不足以消除資本主义欧洲所存在的尖銳的“美元荒”。无論美国的或者是西欧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級，都认为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建立某种类似和平时期的租借法案的制度，組織一个广泛的、在国家补助的基础上进行貿易撥款的体系，就像战时所存在的情况一样。②

在战爭轉向和平的条件下产生的資本主义世界中国际經济和政治关系的新体系，就在“杜魯門主义”和“馬歇尔計划”中得到了体現。③

壟断資产阶級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有保障的国家市場，这是資本主义各国的国內經济由战时轉向平时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大壟断組織在和平环境下也希望維持供应軍备的特权地位。但是为了保住有利可图的生意，为了用“民族利益”来論证进行这种生意的必要性，必須首先制造“政治气候”，以便为軍备竞賽进行辯护。无怪乎那些依靠战爭发了財的暴发戶和投机商，首先宣布自己是“西方民主”的捍卫者，首先开始号召进行反共的“十字軍远征”。

作为保持軍事化經济这一政策之基础的，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經济上的原因。政治上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企图用武装力量来鎮压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經济上的原因是壟断組織企图依

① 如果以 1938 年为 100，那么 1945 年美国出口量指数就是 184%，而英国相应的指数則为 45%，法国 10%，德国 1%（«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9, стр. 183）。

② 路易斯·布朗所准备的《关于德国的报告》中說明了这些想法（*L. Brown.* A Report on Germany. New York, 1947）。

③ 参見本书第二十三章。

靠"国家市場",也就是利用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途徑,来克服資本主义市場的狹窄和解决实現商品的困难。經济軍事化已成为和平时期經济的經常伴侶,它特别明显地表現了現代資本主义的腐朽性。

为了替經济軍事化进行辯护,不仅仅利用了"冷战"政策。而社会蠱惑性宣傳的方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資产阶級經济学家,特别是在美国,經常論证維持軍事生产以防止經济危机的巨大災害的必要性。继凱恩斯之后,大多数資产阶級經济学家开始断言,国家所組織的和"計划的"非生产的消費,可以消除經济周期性的发展,可以消除危机和蕭条。經济軍事化被宣布为最重要的反危机措施。

美国經济杂志用下面一段話表达了凱恩斯派的这一无耻的主張:"如果生产过剩是蕭条的主要原因……而蕭条的作用在于定期的排除蕭条前夕所积累的生产过剩因素,那么可以合乎邏輯地认为,不断进行的軍事生产和其他許多政府的非生产的費用,将通过对它們的非生产利用而在消除生产过剩因素方面起着蕭条所起的作用。"①

不难发現,凱恩斯派为了迎合軍国主义資产阶級的需要,便把資产阶級所謂的消費不足是危机的原因这一关于危机的旧理論翻改成新的时髦的样式。这一理論的用意在于掩飾因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資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而产生的危机的眞正原因。把軍国主义化吹嘘为反危机的眞正手段这一事实本身,不但表明了資本主义經济日益加剧的腐朽性和寄生性,而且还表明了資产阶級經济学的退化,表明了整个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的深刻危机。

除了对产生反共的"冷战"的原因有通常的解釋以外,欧洲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对阻止軍队的复員和經济的轉上和平軌道还有特殊的理由。欧洲殖民国家在大战結束以后,立即集中全力同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斗爭。它們在东南亚和近东发动了殖民战爭。它們在那些形势还沒有发展到人民起来发动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武装斗爭、但它的先决条件已經成熟的殖民地,

①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8, III, p. 1622.

增加了駐軍并建立了新的基地。

在西欧，軍事生产的继續进行，就意味着濫用稀缺的而又为民用經济部門所迫切需要的燃料、原料和物資。在那里生产能力不但沒有发生过剩，而相反地，还感到严重的不足。在这种情况下，軍事生产的撥款，是一种更加露骨的、濫用生产和劳动物資的野蛮行为。

壟断資产阶級竟阻止了經济之轉上和平軌道。資本主义国家維持了很大規模的軍事生产。經济軍事化和軍事通貨膨脹的景气，成了它們发展中的經常性特点。①

战敗了的法西斯国家的經济发展道路，則有些不同。这些国家的資产阶級，暫时丧失了依靠軍备生产而发財致富的特权。这些国家的經济，由于法西斯軍国主义集团的破产而摆脫了軍事預算的負担。这是帝国主义战敗国在市場上同战胜国进行竞爭的重大优越性。

資本主义經济軍事化在战后初期的重大特点是，它的发展不是在旧型的軍备生产基础上、而是在嶄新的生产技术基础上进行的。战爭快結束时原子彈和噴气式发动机的出現，使得战爭的整个"操作規程"、軍队和后方的組織、战略和策略，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軍国主义化是在旧的战爭手段几乎完全受到"无形損耗"的条件下展开的，它促进了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門的出現，同时还引起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整个經济的連鎖反应。为了制造新武器，就要求提供嶄新的材料——原子原料，耐高溫的合金，稀有元素，半导体，塑料，具有特种性能的合成材料等等。为了制造新武器，就必須具备全新的生产組織体系。对生产必須实行自动化和遙控机

① 根据直接軍事費用在国家官方統計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就可以說明經济軍事化的程度。从1937--1938年至1948—1949年美国的比重从1.5%增加到6.5%，英国从4.1%增加到7.7%，法国从5.9%增加到6.1%（参見E·瓦尔加：《帝国主义經济与政治基本問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50頁）。

械化的管理，必須用电子計算机来装备生产。这又推动了电子学的发展和生产过程自动化設备的生产。

經济軍事化的因素經常存在，引起了生产的增长，这一增长在一定时期內能够把軍事通貨膨脹的行情的消极方面加以掩飾。可是这一行情对世界資本主义經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后果。

第一，軍事通貨膨脹的行情，促进了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帮助了最反动的和最好战的財政寡头集团維持統治陣地。因为正是他們推动了軍事集团的建立和加剧了国际局势的緊張。

第二，軍事通貨膨脹的行情，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在美国，这一行情暫时还起着稳定剂的作用，即用美国資本主义內部矛盾加深和加剧的代价，来遏制經济危机的爆发的作用。在英国和法国，这一行情阻碍了非常重要的經济部門的恢复，并且使得这些經济部門的发展速度放慢。在西德、意大利和日本，虽然沒有軍备竞賽，但是还存在战前遺留下来的极为严重的通貨膨脹現象。它使得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資急剧下降，从而也促进了出口方面竞爭能力的某些提高。

第三，經济軍事化把輸出武器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外貿易的重要項目之一。把小国拉入軍事集团，强迫它們接受"軍事援助"，让它們大事扩充軍事預算并在其境內建立軍事基地，这些已成为爭夺这一"商品"的壟断市場的一种特殊的斗爭形式。軍备竞賽使帝国主义国家爭夺新的战略原料产地的斗爭加剧了。

第四，通貨膨脹和物价上漲已成为壟断組織以"隐蔽的"降低工資的方法向实际工資进攻的主要和决定性的形式，这一进攻的主"犯"是国家，而不是个别資本家。① 通貨膨脹对工資进行的"調整"，預先决定了劳动和

① 物价几乎不断地上漲，已成为战后資本主义經济的特点。資产阶級著名的經济学家Г·哈伯勒于1960年底写道："最近二十七年以来不曾有过物价下降的时期，而在这期間內却有过許多物价上漲的时期。从1914年到1932年的物价动态（批发的或零售的）是时起时伏的波浪形，但是从1933年到1960年却成了步步上升的梯形了"（«Lloyds Bank Review», January 1961, p. 24）。

資本之間阶級斗爭的新形式，促进了阶級斗爭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帝国主义国家几乎沒有經过喘息的时間就开始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它們竭尽一切可能来延长已經軍事化了的經济部門的存在。尽管如此，从战时經济向平时經济的过渡，在資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經济中以及在整个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中毕竟造成了很大的結构改变。在一切資本主义国家里，都必須消除战爭給民用經济部門带来的損失，并且还要大力进行固定資本的更新。

下面的表格說明了扩大再生产的速度和規模。

資本主义国家的投資在国民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①

（百分比）

国　家	1938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美国……	14.0	15.7	15.6	16.3	17.7
英国……	14.1	11.0	11.9	13.0	12.3
法国……	11.6	17.8	18.4	17.6	16.6
西德……	17.2*	—	—	20.3	21.6
意大利……	19.0	24.9	15.8	16.7	17.5
加拿大……	16.0	19.3	21.7	21.8	21.4

* 德国系在1937年內。

在資本主义国家里不单是恢复和大力扩大民用工业部門，而且还大大改变这些部門的結构。这是因科学技术革命的开展而产生的現象。这一革命加剧了个别經济部門发展的不平衡，因此使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矛盾。

战后最初几年在世界資本主义經济部門結构驟然改变的过程中就出現了哪一些新的趋势呢？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动力技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电力的生产大大地超过了工业总产品的增长。結果生产的动力装备程度，大为提高，电力在需要大量动力的新生产部門特别是在电力冶金和电力化学部門的技术操

① «Эконом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стр. 352—357.

作中，有了广闊的利用范圍。还值得加以注意的是，石油的消費大大超过了对煤的利用，这就造成并加深了煤炭工业的危机。在冶金工业的发展中出現了新的趋向。炼鋼量少許超过了工业生产的总增长量，而在一些部門中用来代替鋼的鋁和塑料的生产，已經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紡織品的生产結构也改变了。棉布的生产开始受到人造纖維和合成纖維織品的排挤。化学工业的成就还打击了像收割天然橡胶这样一种世界資本主义經济的重要部門。战后合成橡胶已經很順利地同天然橡胶进行竞爭。

汽車生产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尽管到战后五年快結束时，汽車生产还沒有达到像整个工业那样超过战前水平的程度。其他耐用商品——冰箱、电視机、收音机、洗衣机和其他电力的生活用具——的出产，也同小汽車的生产一样，在那个时期开始具有重大的意义。

战后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中所形成的新的生产結构，造成了多方面的后果。旧部門占有很高比重的国家，在工业增长速度方面已居于落后的地位。这就使得像英国和比利时这样一些高度发达的国家的状况有所恶化。而不发达国家特别敏感地尝到結构改变的苦头。

工业部門的結构改变对战后經济关系，其中包括对世界貿易的发展，对需求的性质以及对經济周期的过程，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旧部門的衰退造成了局部性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和經常性的失业。就业的构成也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在战后，房屋的建筑迫切需要加以扩大，而技术上的进步使居民点的类型和建筑工程的基础发生了变化。在建筑中由于采用鋼筋混凝土和装配式結构，因此大規模生产的工业方法得到了推广。在这一部門占統治地位的，过去是一些比較不大的公司，但是战后却是一些与貸款給房屋建筑业的銀行有密切联系的大壟断組織。

由此可見，尽管主要的資本主义国家在实行經济軍事化，但是

民用工业部門在这些国家的經济上、在国內市場的扩大以及在世界貿易流轉的增长上，仍具有越来越大的比重。

世界資本主义經济部門发展的不平衡，使各个国家之間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資本主义国家工业产量指数①

（以 1937 年为 100）②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整个資本主义世界……	108	121	130	131	149
西欧……	70	80	92	104	115
其中：					
奥地利……	…	83*	92	122	146
英国……	95	100	109	116	124
比利时……	73	91	100	100	102
希腊……	62	78	85	101	128
丹麦……	105	118	130	140	156
爱尔兰……	107	116	127	145	165
意大利……	…	90*	98	108	125
卢森堡……	59	76	100	97	101
荷兰……	74	94	114	127	140
挪威……	104	120	133	146	164
芬兰……	107	120	136	144	155
法国……	…	85*	100	109	112
西德……	…	37	56	81	101
瑞典……	137	140	150	155	162
日本……	30	36	48	60	69
美国……	147	163	170	159	184
加拿大……	160	175	184	186	198

* 根据欧洲經济合作組織的資料所作的初步統計。

① «Эконом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стр. 62—63.

② 这里与上表不同，它不是以危机的年份 1938 年为基础，而是以战前周期中生产达到最高点的 1937 年为基础。

首先我們来考察一下，整个資本主义世界以及各个国家的工业生产同战前水平相比較发生了哪些变化。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1946年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生产的工业产品比1937年多8%，而西欧工业产品只等于1937年的70%；日本的工业产品甚至下降到30%，西德在1947年的产品只等于1937年的37%。整个資本主义欧洲在1949年結束了經济恢复的过程。西德和日本的恢复时期拖延了很长，西德在1950年才达到战前水平，而日本在1951年才达到这一水平。

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在战后五年中不断地增长起来。直到1949年才处于几乎停滞的状态，当时它的年增长額还不到1%。这是因为在美国发生了經济危机。美国由于加紧出口，才有可能限制那些引起危机的力量的作用，同时把危机的負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轉嫁于資本主义世界的其他国家。

最初，当被战爭抛在后面的国家进行經济恢复工作的时候，美国在世界出口中的比重大大增加。美国夺取了相当大一部分的世界經济市場。但是一当受到战爭破坏的国家恢复了本国的經济后，美国这一"特权"地位便开始丧失。美国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也就随之而开始下降。正是在这个轉折的时刻美国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这并不是偶然的。

下面的表格說明了战后最初五年中世界資本主义市場上力量对比的变化。

資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上的地位，是它們之間經常变化的力量对比的重要标志。但是它还不能衡量各国的实际經济力量。資本主义各国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最清楚地說明各国的实际經济力量。

虽然到战后的五年結束时，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开始下降，但是这一比重比战前还是大得多。按其工业实力来說，美国仍然超过其他所有資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的总和。加拿大在資本主义世界工业生

各国在資本主义国家总輸出中所占的比重①

（百分比）

	1937年	1947年	1950年
美国……	14.2	32.5	18.3
英国……	11.3	9.8	11.0
法国……	4.1	4.0	5.5
西德……	10.3*	0.5	3.6
意大利……	2.4	1.4	2.2
日本……	5.2	0.4	1.5
加拿大……	4.4	6.0	5.3

* 德国系在 1937 年内。

各国在資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②

（百分比）

	1937年	1948年	1950年
美国……	41.4	56.4	53.3
英国……	12.5	11.7	11.7
法国……	6.0	4.1	4.0
西德……	9.0*	4.3	6.8
意大利……	3.0	2.1	2.3
日本……	4.8	1.5	1.9
加拿大……	2.7	3.6	3.4

* 德国系在 1937 年内。

产中所占的比重也超过了战前。但是上表中所列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沒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超过了这一水平。英国在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比所有的国家更为接近其战前水平。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的，不是法国，而是

① «Эконом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стр. 494.

② 根据以下几本书所作的統計：«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М., 1956; «Эконом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стр. 6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它还在1948年就超过了法国。195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生产的工业品，比法国多70%。德国帝国主义又重新成为英国在欧洲的主要竞爭对手。

三、殖民体系的瓦解及其对世界資本主义經济的后果。不发达国家发展的趋势和国际分工的帝国主义基础的摧毁

战后时期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在农业原料国家的經济中引起了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各个国家以及各个重要經济部門在整个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中的比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并且对世界資本主义貿易的性质，和資本輸出的形式和方向，都起了巨大的影响。在資本主义国际分工方面以及在其表現形式即在国际經济关系范圍內，产生了嶄新的过程。

帝国主义剝削基础的摧毁与崩溃过程，在資本主义世界經济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外圍展开了。殖民主义者在东南亚遭到了最大的失敗。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帝国主义者受到了难以挽回的損失；这些国家脫离了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体系而成为社会主义陣营的組成部分。在这些国家里几乎集中了整个殖民地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战前这三个国家約占所有殖民地和附屬国对外貿易流轉額的十分之一，在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和附屬国的国外投資总額中大約占10%。①

长期的殖民战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帝国主义者对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馬来亚和菲律宾的“正常的”剝削，这些国家的經济在作战过程中，遭到了很大的損失。

---

① 参見《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59, № 6, стр. 47。

由于民族解放斗爭的进行，法国和荷兰实际上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英国在它从前的殖民地所取得的壟断地位，也大受震撼。

虽然英国帝国主义者能够在馬来亚发动殖民战爭，幷帮助荷兰和法国帝国主义者进行了武装干涉，可是英国却沒有敢于在南亚的主要殖民地发动战爭。新成立的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和錫兰——已作为自治領而获得了政治独立。取得了政治独立的緬甸已退出英联邦。

但是在那些沒有采取軍事行动的东南亚地区，帝国主义者也未能保持住战前的殖民剝削形式。一系列国家所取得的政治独立，已成为瓦解殖民主义經济基础的工具，幷成为摆脫对宗主国单方面依賴的手段。民族資产阶級尽管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爭中很不彻底，但是他們为了捍卫本身的經济利益，也不得不对外国壟断組織的势力加以限制。

为实現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措施有：1948 年印度制訂的立法，該立法規定，参加印度工业的外国資本不得超过股份資本的 50%；在征稅方面給本国的公司規定了优惠条件；提高外国資本家的所得稅。国家預算被印度資产阶級广泛用来給自己的企业提供資金。

經济中的国营成分在印度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民族資产阶級在同外国壟断組織进行竞爭中的支柱。自从过去由英国帝国主义者所控制的中央銀行以及财政系統的整个領导权轉入印度手中以后，民族資产阶級的陣地就大大地巩固了。在其他摆脫了殖民制度的国家中，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在前殖民地取得政权的民族資产阶級所采取的一些初步的反帝措施，即已表明这些国家不再是外国資本投資专有的有利場所。

这就預先决定了在战后时期資本輸出的方向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私人資本开始大規模地投到西欧高度发达的国家中，投到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丁美洲仍然是私人資本投資的重要場所。但是在那里，发展国家資本主义和为民族資产阶級規定特权的趋向，也在某种程度上遏止了私人資本的流入。

对帝国主义国家来說，解放了的殖民地国家作为銷售市場和廉价原料和粮食的供給者的作用都有所改变。前殖民地不再是宗主国的壟断市場了。它們从关閉性的市場变成为对其他竞爭国开放的市場。这就使对外貿易的方向和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市場的斗爭受到重大的影响。

英国在它前殖民地的对外貿易流轉中比重的改变，可以說明殖民地市場壟断权的丧失如何影响到貿易。

英国在亚洲新成立的国家的对外貿易流轉中所占的比重①

（百分比）

	1938年			1948年		
	出口	进口	流轉	出口	进口	流轉
印度……	34.4	31.4	33.0	21.7	22.7	22.8
巴基斯坦……	—	—	—	8.6	19.9	10.5
錫兰……	50.0	20.9	36.8	30.2	17.6	23.9

前殖民地之取得政治独立，不但影响到对外貿易的分布，而且还影响到它的結构。不仅英国，而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都不得不放棄抵制印度和一切已解放的国家发展本国工业的願望的那种企图。这些国家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机器和設备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到战后最初五年快結束时已經十分現实地表現出

①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nual issue. Annual Data for the Years, 1938, 1948 and 1954—1957. Statistical Papers, Series T, vol. IX, № 10, New York, 1958.

来）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放棄了自己的老殖民主义的方法。它們不得不以机器和設备供应者新的身份出現在以前被它們强迫处于工业国的农业原料附屬物地位的那些亚洲地区。亚洲新成立的国家的民族資产阶級所提出的工业发展綱領以及实現这些綱領的最初步驟，使得这些国家在世界原料和粮食貿易中的作用有所改变。帝国主义者丧失了独占殖民地国家境內的原料产地的特权。前殖民地工业的发展，会使过去帝国主义国家可以不受限制地輸出廉价粮食的“多余部分”减少下来，这也是很明显的。

所有这一切使殖民地附屬国的經济結构必然发生变化。于是造成了工业国和不发达国家之間分工的帝国主义基础遭到破坏的直接威胁。

在那些战前就經常发生饥荒的不发达国家里，粮食生产按人口計算，仍然少得可怜。1948—1952 年在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谷物生产每年平均为二亿六千三百万吨，但在不发达国家中只有二亿一千万吨。谷物生产按人口計算，在工业国家比在不发达国家大約多一倍半。①这些国家能为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完成供应农产品任务的程度比战前要小得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已經形成的国际分工受到破坏，使傳統的經济联系遭到断絕，而大战后在东南亚进行的一些“小”战更加剧了这种情况。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經济上所引起的变化，也使資本主义世界工业国和不发达国家之間历史上已經形成的“相互依賴关系”有所削弱。例如，合成橡胶生产的改进使它完全可以代替天然原料；合成纖維和人造纖維的出現，降低了棉花、羊毛、生絲等天然原料的意义。

在战后資本主义經济中，高度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之間的比例，

① 参見 *В. Рымалов, В. Тягуненко.* Слаборазвитые страны в мировом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хозяйстве. М., 1961, стр. 144—145。

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不发达国家里，农产品在1948年比战前水平只增长2％，而在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农产品的增长额却超过了12％。

此外，在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农业中发生了一定的突变。农业机械化和化学化的程度大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如此之高，以致資本都集中到农业这个有利可图的投資部門。結果，資本主义工业国粮食和某些原料的自供率提高了。

不发达国家的地方工业稍微有些重大的进展，并不能补偿农业的衰落和停滞。工业国家加工工业的产量在1948年比战前时期增加了45％，但在不发达国家里只增加了37％。在采矿工业中形成的对比关系有些不同。工业国家的采矿工业的产量在上述时期中增加了26.6％，而在不发达国家里却增加了40.8％。不发达国家在采矿工业增长速度上所以达到这种优势，主要是靠近东石油的开采。

虽然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在战时和战后初期有一些增长，但是它們在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中的比重并沒有增长。从下表可以作出这一判断。

如果拿整个工业——采矿工业和加工工业都包括在內——来說，那么不发达国家1948年在資本主义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同1938年一样。但是不发达国家工业生产的結构却朝更坏的方面变化了。采矿工业的比重有所增加，而加工工业的比重有所減少。工业主要靠旧部門而发展起来。

根据所有的指标（石油的开采除外）来看，南亚和东南亚在資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都減少了。但是就是石油的开采也沒有增长到改变該区在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中的作用下降的总情况的程度。非洲、中近东的比重主要因采矿工业的增长而有所提高，而該区加工工业的发展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影响了这一比重的提高。拉丁美洲在資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則不但因采矿工业的发展，而且还由于加工工业特别是紡織工业的发展而有所提高。

不发达国家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上的地位也改变了。

两个主要国家集团在資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比重的变化①

（百分比）

	年份	采矿和加工工业	采矿工业				加工工业					
			整个采矿工业	其中			整个加工工业	其中				
				煤炭	金属矿	原油和瓦斯		輕工业	重工业	紡織工业	冶金工业	金属加工工业
工业发达国家……	1938	90.9	83.3	97.2	57.2	82.4	91.9	89.5	94.8	85.6	93.2	96.9
	1948	90.9	81.6	96.6	67.4	77.4	92.0	88.6	95.1	84.4	93.6	97.1
不发达国家（大洋洲的国家除外）	1938	9.1	16.7	2.8	42.8	17.6	8.1	10.5	5.2	14.4	6.8	3.1
	1948	9.1	18.4	3.4	32.6	22.6	8.0	11.4	4.9	15.6	6.4	2.9

虽然工业国的商品出口量在1948年已經差不多达到战前的水平，而在1950年已經大大超过这一水平，可是农业原料国的商品出口量直到1950年才稍許超过战前水平。同时出口主要是靠輸出开采权完全操纵在外国壟断組織手中的石油而增加的。如果在总出口量中不算石油，那么在商品出口方面农业原料国甚至在1950年也达不到战前的数量。

工业国和农业原料国出口发展的这种不平衡情况，給农业原料国造成了严重的經济后果。农业原料国通常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債务国。它們不得不以自己的商品出口来支付外国的投資，以清偿借款和支付債息。农业原料国因債台高筑，必須使貿易經常維持順差。可是，战后出口的縮減使这些国家的貿易平衡出現了赤字，并且使这些国家的财政制度发生混乱。

①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 1938—1958》,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60.

資本主义世界出口量指数①

（以1937年为100）

	1948年	1950年
整个資本主义世界	95	114
工业国家*	98	123
农业原料国家	90	103
除去石油的出口	83	93
(甲)拉丁美洲	94	95
除去石油的出口	84	84
(乙)其他原料国家	88	108
除去石油的出口	81	97

* 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和日本。

不等价交换的加强也是产生财政困难的一个原因。根据联合国专家的計算，1947年不发达国家用同一数量的出口原料所换得的工业品比战前少得多。例如，法屬赤道非洲用它所輸出的原料换得的紡織品少了68%，伊朗这样换得的紡織品少了54%，圭亚那——少了50%，智利——少了42%，印度——少了49%。②

所有这些都是这些国家貿易平衡出現赤字的原因。

資本主义世界农业原料国的貿易平衡③

（单位：十亿美元）

	1938年	1948年
出口(离岸价格)	7.0	20.4
进口(到岸价格)	7.2	22.4
平衡	+0.2	−2.0

① 根据《World Economic Survey. 1958》(U. N. New York, 1959, p. 85.)一书作出的統計。

② 《Post War Price Relations in Trade between Underdeveloped an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U. N.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1949, p. 104.

③ 农业原料国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貿易不包括在內。根据《Statistical Yearbook 1959》(U. N.,1960)一书作出的統計。

农业原料国不能以貿易的順差保证自己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債务国的支付能力，这一点在帝国主义国家当权的財政寡头中引起了很大的不安。正因为如此，便初次产生了"援助"殖民地进行經济发展的計划，但这一发展要能够促进它們同宗主国之間經济"联系"的加强。

1948年英国通过了《海外資源开发法》，該項法律規定成立两个公司，即殖民地开发公司和海外粮食公司①，法国海外屬地中央銀行在法国积极进行活动，这一銀行从为此目的而专門設立的經济和社会发展基金中撥款来发放貸款和补助金，并且还借款給私人企业家以便于他們向殖民地投資。

不言而喻，"开发計划"同时还具有政治性质。帝国主义者企图通过这些計划来破坏民族解放运动，并且在运动参加者当中引起混乱。除此以外，帝国主义者的目的还在于，在不发达国家里巩固自己的軍事陣地，并为私人資本的輸出，創造有利的政治和經济条件。

美国在战后最初几年里就已經成为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但是它在那个时候不是对殖民地世界所有地区都提出自己的綱領。特别是当时倡議制訂"援助"不发达国家計划的，是欧洲宗主国，它們企图依靠这些国家来巩固自己的陣地。美帝国主义者在那个时候不是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看做資本主义的主要危險，而是把欧洲人民的革命运动看做資本主义的主要危險。1947年春天和夏天出現的"杜魯門主义"和"馬歇尔計划"，其使命首先是拯救欧洲的資本主义。美帝国主义者的出发点是：打算在欧洲宗主国巩固下来，然后就能为剝削海外殖民地和势力范圍鋪平道路。这种战略事先就决定了美"援"的方向。

美"援"除給欧洲的以外(給欧洲的差不多占全部撥款的四分之三)，大部分都撥給了中国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和用于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所进

① 帕姆·杜德：《英国和英帝国危机》世界知識社1954年版第214—234頁。

从 1945 年 7 月 1 日至1950 年 12 月 31 日
美国的补助金和借款的地区分配情况①

	百万美元	%
欧洲* ……	18,985	66.9
近东、非洲和南亚**……	1,610	5.7
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	4,293	15.1
拉丁美洲……	364	1.3
其他……	3,106	11
总額……	28,358	100.0

* 希腊和土耳其除外。

** 包括希腊和土耳其。

行的殖民战爭。在那个时期美国政府向不发达国家經济中的投資是微不足道的。

到战后最初五年快結束时，欧洲壟断資产阶級由于美国的补助金和借款，才有机会撥出較多的資本投到自己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圍。欧洲資本主义国家从美国那里获得了补助金和借款，便继續向殖民地輸出資本，因此得到了极高的收入。不言而喻，債务国的这一政策引起了美国貸款者的不滿。

1949 年 1 月 20 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杜魯門計划”的第四点②，声称要独力“援助”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

当然，“杜魯門計划”的第四点，不但体現了美帝国主义者寻求有利可图的投資場所的企图，而且还是建立殖民主义者的軍事政治集团来对付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步驟。

殖民主义者企图通过“援助”方案把不发达国家控制在帝国主义分工的体系中，而使它們仍然处于农业原料附屬物的地位，但是

① 根据《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6》. Washington, 1956, p. 890—894 的資料計算出来的。

② 后来通称为“第四点計划”。——譯者

这一企图未能得逞。帝国主义国家的任何援助都不能使不发达国家克服因世界資本主义經济的变化而产生的那些困难。对它們来說，唯一的出路就是坚决改变本国經济的性质，使經济摆脱单一发展农业原料的方針。但是只有实行能够保证国内市場发展的民主改革，并同社会主义国家——唯一願意眞誠和无私地帮助不发达国家消除殖民主义的严重經济遺毒的工业国家——发展經济联系，才能获得这种出路。壟断資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促进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全面发展經济的綱領的实現，因为这会破坏帝国主义进行压迫的基础。

四、帝国主义国家爭夺市場和投資場所的新阶段的开始

大战結束以后世界資本主义市場的相对統一已經开始恢复。这一过程是在資本主义已經縮小了的范圍內，是在資本主义总危机加剧所引起的极大变化的条件下发生的。在"統一的"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中，尽管有必要立即消灭战爭的后果，但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在經济上重新瓜分世界的斗爭还是很快就展开了。

对外貿易是一个很重要的場所，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从一开始起就在这里表現出来。上面已經引用了一些資料来說明美国在資本主义国家出口中所占比重增长的程度。

但是美国在对外貿易扩張方面取得的成績，实际上破坏了世界資本主义的市場，使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支付平衡发生严重的比例失調，破坏了进出口的相对平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无論在貿易平衡或是在支付平衡方面，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順差。美国在世界黃金儲备中的比重仍继續在增长着。与此同时，其他所有資本主义国家由于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出口来抵偿应該付給美国的、数目日益增长的款項，便不得不向美国拋售黃金，从而使

它們通貨的稳定受到震撼。資本主义国家貨币对美元的貶值，使得美国壟断組織有可能廉价收购这些国家中的財产。通貨膨脹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因此为美国公司向那些受它們盘剝的国家进行投資，創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1946—1949年期間，美国出口的年平均額为一百三十二亿六千六百万美元，进口的年平均額为六十三亿七千四百万美元，出口超过进口的数額为六十八亿九千二百万美元。因此，出口超过进口的价值达一倍以上。美国黃金儲备在1946—1949年期間增长了四十五亿美元，而在1949年8月达到了它的最高水平——二百四十八亿美元，即資本主义世界所拥有的黃金儲备的三分之二以上。

人为的提高美元的黃金含量，也是有助于榨取黃金的一种手段。美国金庫按照三十五美元換一盎斯黃金的价格来购买黃金，这就相当于1934年規定的美元的黃金平价。但是战后美元貶值了三分之一以上。尽管如此，美国仍继續維持黃金的原来价格，人为地降低了美元所表現的黃金的价值，以便把美元变成"貨币的貨币"。美国利用自己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上的壟断地位，独断独行地把黃金价格規定得很低。这是一种不等价交換的新形式。美国以低价购买黃金，实际上就掠夺了那些需要美元而不得不用自己儲备的黃金兌換美元的国家。

美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加剧了整个資本主义世界中的"美元荒"，同时却加强了美国的"黃金充盈"局面，这一政策使美国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間产生了尖銳的矛盾。

为了要了解美国和它的帝国主义竞爭对手中所展开的激烈竞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动力，必須比較詳細地研究美国的支付平衡。

美国在日常业务方面的支付平衡①

（单位：十亿美元）

	1938年	1946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商品的出口……	3.2	11.7	16.1	13.5	12.3	10.6
投資的收入……	0.6	0.8	1.1	1.3	1.4	1.6
劳务和其他的收入……	0.5	2.3	2.6	2.3	2.3	2.2
总額……	4.3	14.8	19.8	17.1	16.0	14.4
商品的进口……	2.2	5.1	6.0	7.6	6.9	9.1
支付給向美国投資的外国資本的金額……	0.2	0.2	0.2	0.3	0.3	0.3
劳务和其他的支出……	0.7	1.7	2.0	2.4	2.5	2.7
总額……	3.1	7.0	8.2	10.3	9.7	12.1
美国方面的結余……	1.2	7.8	11.6	6.8	6.3	2.3

上表說明美国支付平衡的順差比战前水平增长了很多。

但是从 1948 年起，即資本主义欧洲基本上結束本国經济的恢复工作以后，美国的商品輸出縮減了，美国支付平衡的順差也相应地減少了。在美国的經济发展中也出現了一个轉折时期。

美国支付平衡順差的急速增长的直接后果，是其他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西欧国家支付平衡逆差的加剧。

与美国不同，西欧国家在战前就出現了貿易平衡的逆差。但是貿易平衡的赤字通过"无形出口"——投資、运費、銀行业务、旅行等項收入——而得到了弥补。欧洲資本主义国家以剝削殖民地所得的收入来弥补同美国支付平衡中出現的赤字。但是战后西欧国家一方面在同美国的支付平衡上赤字有所增长，而另一方面在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支付平衡上也开始

① Balance of Pay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vised Series. A Supplement to the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Washington, 1954,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March 1955.

出現赤字。

下面的表格說明了西欧支付平衡急剧恶化的情况和在这一情况下产生"美元荒"的原因：

欧洲資本主义国家在日常业务方面的支付平衡①

（单位：十亿美元）

	1938年		1947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对一切国家	对美国	对一切国家	对美国	对一切国家	对美国	对一切国家	对美国	对一切国家	对美国
出口……	3.7	0.6	6.4	1.0	8.8	1.3	10.2	1.0	9.9	1.3
进口……	5.5	1.3	13.7	6.1	14.4	4.6	13.5	4.2	12.8	3.4
貿易平衡差额……	−1.8	−0.7	−7.3	−5.1	−5.6	−3.3	−3.1	−3.2	−2.9	−2.1
投資收入……	+1.2	+0.1	+0.4	—	+0.4	—	+0.4	—	+0.5	+0.1
劳务……	+0.6	+0.2	−0.5	−0.5	+0.3	−0.1	+0.1	+0.1	+0.4	+0.3
商品和劳务平衡差额…	—	−0.4	−7.4	−5.6	−4.9	−3.4	−2.6	−3.1	−2.0	−1.7

在西欧貿易平衡以及商品和劳务总的平衡中出現的赤字的最大一部分是因美国在西欧貿易中作用的急剧改变而产生的。战前在西欧貿易平衡的赤字中美国占了不到一半，但是在战后却占了三分之二以上。

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使西欧支付平衡出現赤字。其中首先是軍費的增加。西欧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貿易的縮減在西欧"美元荒"的加剧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

一系列在战前同美国有支付平衡順差的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受到了"美元荒"的箝制。当美国商品向这些国家的出口大大增加时，它們向美国的出口却仍停留在比較低的水平上。由于美

①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Balance of Payments Yearbook, vol. 1, 2, 3, 4 (1949—1952).

国在战后仍继續执行侵略性的保护关稅政策，通过高关稅和其他保护关稅的措施禁止許多商品輸入到自己的市場，因此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的“美元荒”加剧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維持美国在世界資本主义商品出口中的巨大优势的唯一办法，就是向那些美国力图在它們的市場上巩固已經夺取的陣地的国家提供貸款和美元“援助”。和以前不同的是，这种資本輸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国家壟断的基础上实現的。

美国在国外的投資①

（单位：十亿美元）

	1939年	1945年	1946年	1948年	1949年	1950年
投資总額……	11.4	16.8	18.7	29.4	30.7	32.8
其中：						
私人投資……	11.4	14.7	13.5	16.3	16.9	19.0
国家投資……	—	2.1	5.2	13.1	13.7	13.8

美国在国外的投資总額中，国家資本在 1945 年占 13%，但在 1950 年已經占 43%。

战后时期同国家借款与补助金相結合的“援助”，已成为美国資本輸出在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加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形式。通过預算来分配的全部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集中在政府手中，乃是国家資本輸出的物质基础。国家壟断輸出資本的目的，不仅在于为美国公司的商品輸出和它們的私人資本进行能盈利的投資創造最有利的条件。它还追求一些更深远得多的美帝国主义的計划。美国統治集团企图利用資本輸出来巩固自己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的領导权，并且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結束时因美国竞爭对手的削弱而在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中形成的那种比例永

① «Эконом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стр. 660—661.

远保持下去。

一切依附于美国的国家都实行經济軍事化，已成为国家壟断輸出資本的特点。这就使西欧变成了热中于輸出武器和修建軍事基地以及其他战略項目的美国康采恩最大的銷售市場。

但是有关資本輸出新形式的美国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战略計划沒有、也不可能完全实現。美国壟断組織并沒有能够防止西欧与它竞爭的生产部門的发展。这些国家的壟断資产阶級的利益，要求采取措施来抵制美国的竞爭。美国試图取消西欧壟断資本所采取的保护政策的努力，結果遭到了失敗。

支付平衡的恶化，使得已經恢复資本輸出的欧洲財政寡头所极为关心的通貨稳定有受到破坏的危險，这种情况也推动了西欧各国資产阶級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加以限制。除此以外，随着西欧工业的恢复，西欧的壟断資产阶級就开始爭取不依靠美"援"、而通过增加商品輸出来补充美元的儲备。他們不但不接受"美元的援助"，反而开始設法滲入美元市場。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开始实行一些数量上的限制。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快結束时，西欧国家工业集团中企图同社会主义国家扩大貿易的願望开始加强了。美国設法使欧洲貨币回流的尝試也遭到了失敗。

(2)美国企图通过資本輸出来巩固自己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上的独占統治地位、并使整个資本主义国际分工制度适应自己的需要，結果这一打算完全落空。

1948—1949年的經济危机延續了十一个月，并且使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7.7%①，这一危机說明，以"調整"整个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为己任的美国，甚至都沒有能力对付本国的經济，并且仍然是世界危机的震源区。美国的經济危机揭露了所謂資本主义无危机发

① «National City Bank Monthly Letter», March 1960.

展时代已經到来的强辯性的空談是毫无根据的。

虽然美国的經济危机沒有波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但它对整个世界資本主义經济还是起了很大的影响。它使美国的进口縮减了6.1%①，并且向其他所有資本主义国家表明，在同美国的結算平衡上必然会增加它們的困难。对农业国也产生了新的危險。从1948年起在美国开始发生了农业危机。从那个时候起美国便依靠国家的津貼大規模地开展了农产品的傾銷。許多国家都因向美国輸出的原料跌价而吃尽苦头。

由于美国經济危机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后果，因此1949年9月英鎊貶值了30.5%。接着就出現了眞正的貨币貶值流行病。在一个星期之內就有二十六种貨币貶值。这一"流行病"总共蔓延了三十五个資本主义国家。②

資本主义貨币大規模的貶值，是帝国主义之間矛盾尖銳的标志，特别是英美矛盾尖銳的标志。英国企图使竞爭的条件驟然变得对自己大为有利，这是貨币大規模貶值的原因。无疑的，貨币貶值使持有已貶值貨币的国家提高了竞爭能力。

美帝国主义者把軍备竞賽看作是消除1948—1949年經济危机的手段之一。他們开始更加紧地輸出軍备，加速建立帝国主义者的軍事集团，以便扩大軍事工业的市場以及与它有关的部門。这便是1949年4月締結的北大西洋公約的經济基础之一。美帝国主义者决定通过对自己盟国領土实行"不流血的占領"来加强这些国家对美国的依賴。

---

① «National City Bank. Monthly Letter», March 1960.

② 参見 *А. В. Еврейское.* Кризис валютной системы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 1955, стр. 186, 190。

五、国际經济关系中的国家壟断趋势的发展。超国家的經济組織是帝国主义之間竞爭的新領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就开始产生了一些新的国际經济組織。它們应当起着世界資本主义經济的国家壟断的上层建筑的作用，这一上层建筑負有协助維持和巩固財政寡头的阶級統治的使命。

美帝国主义者非常重視超国家的国际經济組織，他們企图利用这些組織作为控制整个世界資本主义經济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手段。

超国家的国家壟断的上层建筑本身，是由于資本在国际上的交錯結合而产生的，当然，它反映了世界資本主义經济中所形成的現实力量对比。根据美帝国主义者的倡議而建立起来的国际經济組織，不但是美国壟断組織对資本主义世界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和施加压力的工具，而且与他們的打算相反，这一組織已变成帝国主义之間竞爭的場所。在这些組織的范圍內，資本主义国家不但实行了在美国庇护下的联合，而且还出現了分裂，因为形成了一些表現帝国主义竞爭者之間互相矛盾着的局部利益的国家集团。

国际貨币基金組織(MBΦ)是經济政策的重要工具。美帝国主义者有可能用国际組織作为幌子来掩飾自己的經济扩張。

尽管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的章程对外汇平价已作出了規定，但是各个参加国为了在世界市場上进行竞爭，并未停止自由变动外汇行市。1949年的貨币貶值所反映出来的貨币危机，暴露了国际貨币基金組織規定的通貨稳定的虛伪性。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奥地利、希腊和一系列拉丁美洲国家虽是国际貨币基金組織的成員国，但并不遵守基金組織所規定的外汇平价，而規定了波动幅度很大的外汇行市，像瑞士和新西兰这样一些国家，由

于害怕丧失对本国貨币政策的控制权，因而拒絕参加国际貨币基金組織和国际复兴开发銀行。美国未能做到通过国际貨币基金組織使美元的黄金平价稳定不动　除三十五美元换一盎斯黄金的官价以外，在黑市上和外汇市場上还继續存在着一种自发規定的价格。这一价格显示了美元对黄金以及其他貨币的眞正平价。

国际貨币基金組織在战后最初年代里就已經采取了限制借貸业务的方針。美帝国主义者认为在这一段时期內直接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提供貸款和"援助"更为有利。他們甚至壟断了提供"援助"的权利。1948 年 4 月 5 日，国际貨币基金組織根据美国的坚决要求，作出了一項专門的决議，規定凡是根据"馬歇尔計划"获得"援助"的国家无权从該組織得到貨币。

美国还操纵了国际复兴开发銀行(МБРР)的活动。① 与国际复兴开发銀行成立时所发表的宣言相反，該銀行的主要职能不是尽先貸款給那些受到战爭災害最严重的国家去恢复国民經济。例如，国际复兴开发銀行的管理机构对波兰的需要就完全置之不理。歧視政策迫使波兰于1950年退出国际复兴开发銀行。非常需要財政援助的亚非国家，在战后最初五年实际上也沒有从国际复兴开发銀行得到什么东西。而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复兴开发銀行在 1947 年发放的第一笔、也是最大一笔总数为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貸款是給了法国拉馬迪政府，这一政府为了要得到美帝国主义者的賞識，便将共产党員从政府成員中驅逐出去。国际复兴开发銀行的第二項財政业务以及它以后的貸款，同复兴以及开发遭受战爭災害的国家的宗旨，也毫无共同之处。

在大战結束后不久，即在 1945 年 11 月，发表了美国关于"扩大世界貿易和就业"的建議，建議中規定成立国际貿易組織(MTO)以"調整"世界貿易。美国壟断組織希望利用这一組織来取消妨碍

①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1946—1953». Baltimore, 1954;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195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правочник. М., 1960, стр. 166—175.

它們进行貿易扩張的一切障碍，来把控制一切資本主义国家的关税政策的机构掌握在自己手中。

1946年4月，联合国經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議，根据美国的倡議通过了关于召开国际貿易和就业会議的决議。为了实現这項决議，成立了一个由十五国代表組成的筹备委員会。但是国际貿易組織并未能組織起来。問題在于，美国向国际貿易組織提出的一項重要任务是廢除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所建立的特惠关税制。美国所追求的目的同其他大国壟断組織的利益背道而馳，所以它得不到美国的竞爭对手的支持是十分自然的。

1947年10月30日在日內瓦签訂的、从1948年1月1日起在它的参加国批准后而开始生效的关税和貿易总协定，是对国际貿易組織未能組成的一个弥补办法。① 关税和貿易总协定不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参加国政府的超国家的机关。但是通过它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国家之間的机构，美国企图把它用来作为自己的工具，同时并用来作为掩飾同其它資本主义国家壟断組織締結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协定和进行这种勾結的幌子。

美国利用了这一协定，立刻开始設法使英国放棄帝国特惠制。已經使自己依賴于美国"援助"的英国不得不暫时退却。在締結关税和貿易总协定时，英国削弱了帝国特惠制：取消了5%的特惠关税，并且有四分之一的特惠关税减少了35%或35%以上。除此以外，英国以及其他国家，不得提高剩下的特惠关税，也不得实行新的特惠。虽然关税和貿易总协定沒有成为美国壟断組織手中不断发生作用的武器，但是它們毕竟得以利用这一国际协定来迫使它的参加国作出让步。

① *A. J. Peaslee*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vol. I. The Hague, 1956; *Р. Быстрицки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торговые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 1957; *Л. Фитуни.* Торговые, договоры и соглашени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М., 1958.

在关税和貿易总协定存在的初期，美国統治集团已經开始寻求新的手段来减少他們經济扩張中所遇到的关税、貨币和其他障碍。美国财政寡头在"馬歇尔計划"的基础上煞費心思地建立起来的国家壟断的联合組織——欧洲經济合作組織——的使命，便是为上述目的服务的。①

欧洲經济合作組織(OEЭC)的宗旨，远远超出了期限預定为几年的"馬歇尔計划"的范圍。这一組織起着美国化了的泛欧联盟的作用，它負有消灭或至少是破坏欧洲各国人民的民族主权和独立的使命。

欧洲經济合作組織在欧洲一切超国家的国家壟断組織的活动中起着衔接的作用。美国統治集团通过欧洲經济合作組織成立了为它們所控制的欧洲支付同盟。欧洲支付同盟的萌芽是1948年10月16日"馬歇尔計划"参加国締結的欧洲內部支付和补償协定。这就为美国积极干預欧洲国家的借貸—支付关系以及影响这些国家之間的相互經济关系創造了另一种可能性。②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在对国际經济关系进行有利于美国壟断組織及其伙伴的調整方面，担負了一定的职能。③

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机构中担負这种职能的，首先是战略物資出口調整委員会（KOKOM）。实际上該委員会起着对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实

① *A. J. Peaslee.*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vol. 2.The Hague, 1956; *R. Sannwald* and *J. Stohler.* Economic Integration. Princeton, 1959; *А. И. Шапир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экспансия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а США в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е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1956.

② *W. Diebold.* Trade and pay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Study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1947—1951. New York, 1952; *Л. И. Фр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расчеты и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М., 1954.

③ 参見本书第二十七章。

行經济封鎖的組織者的作用。那些同軍事生产关系很远的商品也被任意列入"战略物資"的清单。

为了监督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国动用撥出的建筑共同軍事工事的經費情况而建立的"地面建筑委員会"是壟断組織分配它們投資的一种特殊的承包单位，也是协調軍火工厂主的国际卡特尔的活动的一个机关。

由于溫·丘吉尔的努力以及美国的支持，在1949年成立了"欧洲委員会"，参加該委員会的有十五个国家的代表。欧洲委員会負有超国家議会和有关"欧洲整体化"事务的最高机关的职能。

1949年5月5日在十个創始会員国(比利时、英国、丹麦、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法国和瑞典)参加的倫敦会議上，签訂了欧洲委員会法規。1949年8月10日在斯特拉斯堡举行了"欧洲委員会"正式成立的仪式。以后希腊、土耳其、奥地利、冰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成为委員会的成員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以色列的代表以观察員的身份参加了委員会。①

由于参加国之間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欧洲委員会"的許多立法草案都根本不能实現。但是委員会毕竟促进了一系列大的国际性的国家壟断联盟的組成。1950年产生的"欧洲煤鋼联营"(在下一卷中将詳細加以論述)便是其中的第一个。"欧洲委員会"同欧洲經济合作組織、关税和貿易总协定以及其他执行同一些主子的意志的超国家組織，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欧洲委員会"作为腐敗的世界主义宣傳的一个重要中心来說，也起了不小的影响作用。

由此可見，到战后第一个五年快結束时，在資本主义世界中已經产生了一个复杂的超国家的国家壟断組織系統。在欧洲这一类

---

① Statute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May 1949, with amendments approved by the committee of ministers at Strasbourg in 1952 and 1953 London, 1955; *И. И. Ермашев.*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вет» в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планах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1949.

的組織特别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一現象的根源不仅在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它們还包含在經济范圍里所发生的客观过程中。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里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空前的加强，不能不使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对外經济和政治联系的領域內起着日益增长的作用。

"欧洲整体化"的目的是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欧洲統一战略建立經济基础。欧洲的"联合"不是欧洲各国人民政治上接近的結果，而是壟断組織之間旨在損害这些人民的切身利益而組成的联盟。

帝国主义壟断組織的联盟力图动員西欧一切反动势力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东欧，击溃西欧的工人运动，鎮压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中的民族解放运动。为了抵抗壟断組織的这一联盟，形成了一个民主力量的战綫，这些力量正在为欧洲的眞正統一、为反对把欧洲变为新的世界大战的进攻基地而斗爭。

第十四章

美帝国主义变为反动和侵略势力的主要中心。1945—1949年美国的对外政策

一、美国在被削弱的資本主义世界中作用的加强。美国壟断資产阶級在国內外的反共主义

对美帝国主义战后对外政策的內容和性质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有四个主要因素：

(1)社会主义所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和发展，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利于資本主义的根本变化。

(2)許多国家中民族解放革命胜利，殖民奴役体系瓦解，年輕的主权国家中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国主义的斗爭，这些国家日益积极参預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

(3)被削弱的資本主义世界内部的"均势"发生有利于美国的重大变化；美国对世界資本主义的經济和政治的影响大大加强；美帝国主义对于建立包罗所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軍事政治体系，建立旨在反对世界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集团，起着决定性作用。

(4)美国本国发生变化和变动；美国經济不稳定性增长，阶級矛盾尖銳化；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壟断資产阶級加强反动的对內政策，同时群众对壟断組織的强制进行反抗。

上述因素中的第一項和第二項，已在以前各节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里只需要强調指出，欧洲和亚洲一些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整个世界資本主义体系，特别是使美帝国主义遭到不可弥补的損失。由于帝国主义丧失了它的大部分殖民地后方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同爭取独立的各国人民不断加强合作，就更加重了上述損失。因此，战后时期資本主义世界經济和政治中美国影响的加强的最突出特点在于：这种影响是在世界資本主义体系削弱、資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經济結构已經衰落、帝国主义本身遭到革命的破坏的条件下加强起来的。

两大体系力量对比中发生的在性质上带有深刻阶級性的一些最重大变化，促使美国壟断資产阶級的战后政策开始远远超过以前的体現着国际資本的利益。从整体上巩固国际資本陣地的必要性，决定了資本主义主要国家美国的壟断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与

其余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倒的和参加过反希特勒联盟的——的壟断資产阶級的利益之間的密切联系。

战后的最初五年相当程度上是在美帝国主义称霸于資本主义世界、美国的影响在資本主义世界經济和政治中飞跃加强的标志下渡过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有密切联系。

首先，資本主义最普遍的規律之一——資本主义經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其次，在战爭的影响下，美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一些傾向更强烈得多地表現了出来：美国的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显著地加速了；国內市場的显著扩大得到了推动力。結果，美国轉变为資本主义主要国家这样一个在整个帝国主义时期不断发展着的过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期就达到了頂点。

在苏联共产党綱領中有充分根据地强調指出："帝国主义的經济中心已經从欧洲轉移到美国，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也随之轉移。"①

大家知道，早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前夕，从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比重来看，美国就已經赶过了所有其他的資本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資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美国約占一半。战爭时期，在主要交战国中，由于国土被占領、直接的軍事行动和敌机的襲击等，生产力都遭受了破坏，只有美国沒有經历这样一些災难。美国的人力損失也比較小。同时，美国帝国主义資产阶級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战时市場情况，一方面来使巨大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工作（在1929—1933年經济危机时期和危机后的蕭条以及1937—1938年的危机时期，这些生产能力曾暫时停止工作），同时又来进行与战爭需要有关的大規模的基本建設。工业总生产能力在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7頁。

战争年代扩大了約 40%。美国工业产量年增长速度在战争时期提高了15%。如以战争爆发前五年(1935—1939)的工业生产水平为 100，則 1943年已經提高到239%。①

战时市場情况为美国金融寡头在国外市場上也提供了新的、更广泛得多的条件。美国的出口在实物量上增加了两倍多（从 1934—1938 年每年平均二十六亿美元增加到 1939—1945 年每年八十二亿美元，这一时期总数达五百七十四亿美元)。②

战争一方面在美国經济中引起了突然的兴隆，另一方面又为美国所有主要的帝国主义竞爭国造成了严重的經济后果，这种情况使得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由1937年的41.4%增加到 1947 年的 62%。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額中所占的比重由 1937 年的 14.2%增加到 1947 年的 32.5%，即增加了 1.3 倍，約占資本主义各国出口总額的三分之一。必須补充說，到战爭将結束时，在商船队的总吨位上美国已經超过了所有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总合。

战爭所造成的形势促使美国資本輸出显著地增加了。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外投資銳減，而美国的国外长期投資却由 1939 年的一百十四亿美元增加到 1945 年的一百五十三亿美元。到 1950 年，美国国外长期投資达三百二十八亿美元。甚至根据經过削減的官方材料，1946—1955 年間美国从国外投資所得到的收入（不包括国家貸款的利息）竟达二百十二亿美元(不包括六十亿美元再投資的利潤)。这說明，从战后最初十年內資本輸出所贏得的利潤額已經超过了1945年美国的私人长期投資总額(一百二十三亿美元)。③

①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March 1950, p. 353—354.

②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ce Program》. New York,1946, p. 2—3.

③ 参見《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СШ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M., 1958, стр. 569, 584.

战后美国資本輸出的特点首先在于它的地理疆界的显著扩張(美元眞可以說是涌向了資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地区，特别是涌向遭受民族解放运动打击的欧洲各宗主国的殖民帝国)，其次，还在于空前地滲入西欧——老資本主义的堡垒。

資本輸出一向是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美国壟断組織打入欧洲主要国家和日本市場的重要手段。只要提一下"門戶开放"和"金元外交"理論在美国全部对外政治活动中的首要作用，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战后时期，美国利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經济上和財政上的困难处境，而对一些依附欧洲資本主义的国家加强扩張，并且还直接向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加强扩張。根据英国經济学家的統計，美国在英联邦各国(英国除外)中的投資总額在1950年破天荒地超过了英国投資的数額。①

同时，美国資本也还甚至力图使欧洲各宗主国大"开門戶"：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欧大国正在成为"金元外交"的对象。

美帝国主义广泛地利用这样一些施加影响的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撥出的一百九十亿美元貸款，从屬于美国資本的国际銀行和国际貨币基金的活动，特别是作为"援助"而給予被战爭弄得破产的西欧各国的战后貸款。美国作为資本主义世界外汇中心的作用也显著地加强了。战后最初几年，在美国竟集中了資本主义世界全部黃金儲备的7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美国轉变为掠夺許多国家的最大国际債权人的过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爭結束后大大加强了。在資本輸出数額方面，美国远远超过了其余整个資本主义世界，而且在战后最初几年实际上是所謂資本主义大国中唯一的大規模輸出資本的国家。美国資本在掠夺殖民地附屬国人民和搶劫經济不发达国家自然資源及其他国民財富方面所起的作用显著

① 《New Commonwealth》, January 18, 1954, p. 57.

地加强了。

苏联共产党綱領强調指出："靠軍事利潤和軍备竞賽的酵母膨脹起来的美国壟断資本，掠夺了最重要的原料产地、銷售市場和投資范圍，建立了独特的殖民帝国，成了最大的世界剝削者。"①

大家知道，以前，在資本主义世界經济中美国所具有的首要意义与軍事力量对比中美国地位的相对軟弱，这二者之間曾經有过一定程度的脫节。例如，十九世紀末叶，美国在当时已經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大国，但是在海軍的規模方面只居第十二位，至于空軍力量方面这种脫节現象就更严重了。不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这种脫节現象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就彻底消除了。

以前，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之一曾經是軍国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統治比欧洲少些，但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已經失去了这个特点，而且正如列宁所指出，滾到"支配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軍事机关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这样一种形势：在軍国主义的发达程度上，美国已經使所有的資本主义国家落在后面，而且在战后时期取代已被击溃的法西斯国家，成为主要的軍国主义力量。

美帝国主义建立了規模空前的軍事机器。它成为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陆軍、空軍、海軍)的拥有者。在像原子武器这样大規模屠杀和破坏手段的生产方面，美国已經远远地超过了其余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美国用自己的軍事基地网把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环繞起来，并成为帝国主义軍事集团体系的首倡者和組織者。

各种軍国主义傾向在美国的加强，这是帝国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一切基本特点和規律性扩延于美帝国主义的明显证据。軍国主义是現代資本主义的不可分离的特性。从基本經济指标上看占主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187頁。

② 《列宁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03 頁。

要地位的一个資本主义国家躋于資本主义世界最軍国主义化的大国的地位，这是一个合乎規律的过程，它一方面证明整个資本主义在进一步腐朽下去，另一方面还证明关于臭名远揚的美帝国主义"特殊性"的資产阶級讕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經济中占首要地位，而且变为軍事方面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大国，这种情况就促使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中的政治影响显著加强。这是完全合乎規律的，因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力量才正是某一国家政治威望的主要标准。

某些与战爭后果有关的过程也沿着同样的方向起着作用。由于战爭的結果，世界反动派的突击队——法西斯德国和軍国主义日本被击溃了。战爭过程中，甚至在反对法西斯国家的資本主义国家里，一些資产阶級政府和政党也变得声名狼籍了。在那几年里，各国人民特别清楚地看到了作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极端表現的法西斯主义的仇視人类的本质。至于美国壟断資产阶級，它却恬不知耻地以种种民主口号来投机，并企图利用美国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事实来提高美国統治集团的威信，也提高臭名远揚的整个資产阶級民主制度的威信。参議員范登堡暴露了美国上层人物的目的，他宣称："我們必須实現对世界的精神領导，或者是世界将根本沒有領导。"①

資本主义世界內部力量的配置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除美国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国家能成功地担任資本主义世界的政治中心和意識形态中心。从帝国主义存在以来，美国壟断資产阶級手中破天荒第一次既掌握了强大的經济王牌——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經济中的巨大优势，又掌握了重要的政治优势，这种优势促使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政治中的比重显著地增加了。

①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Ed. by A.H. Vandenberg Jr. Boston, 1952, p. 267.

在整个帝国主义时期，对社会主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感到惊惶不安的主要帝国主义大国，破天荒第一次圍繞着这些大国之一——美国，統一在一个軍事政治集团里，建立了帝国主义陣营。現代資本主义的最有影响的軍事、經济、政治和意識形态力量——美帝国主义，成为帝国主义陣营的自然的中心。苏联共产党綱領指出："美国的垄断資产阶級是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①。

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間的矛盾轉变为現时世界的基本的、决定性的矛盾，在美国壟断資产阶級庇护下組成反对社会主义的"神圣同盟"，这当然都并不能够消除帝国主义之間最深刻的矛盾。帝国主义矛盾的基础在于各国壟断組織的經济利益有着不可消除的冲突，而資本主义統治的地区范圍越縮小，这种冲突表現的尖銳程度也就越强烈。

由此可見，由于一系列原因，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时期資本主义各国經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規律起作用的結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結束时，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的經济、政治和意識形态中，以及在資本主义各国間軍事关系方面，都占据了史无前例的統治地位。但是，如前所述，这种过程是在資本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已經空前衰落的情况下发展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政治中反动傾向的加强，证明整个現代資本主义的內部是軟弱的，证明它对自己的力量沒有信心，而且对战后时期国际舞台上展开的两个世界体系間大規模斗爭的結局感到疑虑。

在美国本身发展着的一些內部过程也为这种缺乏信心感覚提供了发展的环境：如群众的普遍左傾，无产阶級阶級覚悟和組織程度的提高，在战爭的反法西斯解放性质影响下民主力量的团結。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187頁。

而且在美国，反对壟断組織进攻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斗爭，捍卫人民公民权利的斗爭，与群众反对对外政策中冒險行动的斗爭，抗拒"冷战"和新战爭准备的斗爭，这两个方面是交錯在一起并相互作用的。

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資本主义的陣地的削弱，伴随着美国資本主义具有的經济不稳定性的加剧，和美国資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对抗性內部矛盾的尖銳化。資本主义总危机在其第二阶段所具有的一切特点，在美国都充分地表現了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美国生产設备的显著扩大，与战后年代的实現問題发生了极尖銳的矛盾。从1943年底起，經济行情就开始不断恶化。工业生产指数由 1943 年的 239(以 1935—1939 年平均水平为 100)降至1945年的 203 和 1946 年的170。就业总人数由 1944 年 7 月的五千五百七十万人減少到 1946 年 1 月的五千一百万人。

从 1946 年底到 1948 年夏末生产稍微扩大以后(其基础是美国工业各主要部門的現代化，一些新生产部門的发展，出口的扩大，經济的軍事化)，美国在 1948 年下半年进入了周期性的經济危机。工业生产指数从 1948 年10月至 1949 年 7 月下降了10.4%，在 1949 年全年比 1948 年下降了6.7%。失业現象显著扩大，农业状况大大恶化。

壟断資本家企图靠加强剝削劳动者来克服內部困难，这促成了阶級斗爭的尖銳化和罢工浪潮的高漲。战后第一年罢工的規模超过了以前美国史上最高的 1919 年水平，在 1946 年罢工者达四百六十多万人。在战前五年(1936—1940)，美国平均每年罢工人数为二千九百人①，而到战后最初五年(1946—1950)則增加到四千一百人。

为了寻求摆脫社会矛盾的出路，同时为了創造更有利的国內条件来保证对外扩張，美国壟断資本狂热地迫害美国人民的进步代表，并加强了它

① 数字有誤。根据《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經济統計集(1848—1960)》的資料計算，1936—1940 年美国每年平均罢工人数在一百万人以上，1946—1950 年平均为二百八十三万多人。——譯者

的对内政策的反动性。

杜魯門政府口头上夸耀那种似乎应当用以继承罗斯福"新政"的所謂"公政"(Fair Deal)的施政綱領,实际上却对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民主权利发动了进攻。

虽然杜魯門总統要人們相信在美国正进行着"最偉大的社会的和經济的革命"①,而且許多資产阶級思想家和宣傳家也拚命把美国渲染成一个"人民資本主义"的国家,但是实际上一小撮亿万富翁与千百万劳动群众之間的鴻沟在美国正越来越扩大。根据1950年的調查材料,85%的美国人根本沒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資料;而0.2—0.3%的居民却控制了所有美国公司股票的主要部份。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結束时,美国各壟断組織的利潤比战前水平增加了两倍半以上,而70%以上的美国家庭却得到少于"海勒委員会"規定的最低生活費的收入,到战后最初几年,最富的資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劳动者的实际工資竟比战时水平显著降低了。

战后时期,在美国通过了一系列的反劳工立法。只在1946年一年,美国国会各委員会中就討論了九十件反劳工法案,1947年提出了二百多件这样的法案。《塔夫脫—哈特萊法》起了最反动的作用。它是以对《华格納法》的"修正案"的形式提出的,它規定了要取消美国无产阶級在頑强斗爭中贏得的已有的关于劳动关系的立法。1947年3月21日,杜魯門总統签署了关于所謂"忠誠調查"的法律,从此就开始了对民主力量的殘酷迫害以及恐怖、怀疑气氛的弥漫。

战后年代中美国形势的突出特点是反共主义上升到首要地位。1960年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声明指出:"反共主义反映着資产阶級思想体系的深刻的思想危机和极端严重的退化程度。它駭人听聞地歪曲馬克思主义学說,粗暴地誣蔑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捏造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目的,迫害民主的和爱好和

①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 p. 483—485.

② 参見 *P. Миллс*. Властвующая элита.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9, стр. 166。

平的力量和組織。"①

正是反共主义成为美国壟断資产阶級的政策和意識形态的基础。1946年，美国参議院非美活动調查委員会主席、以后因刑事罪被揭发的約·巴奈尔·托馬斯宣称："最近几年內我們的任务在于彻底根除共产主义。通过揭露、解釋和追緝，这是可以作到的。"②美国国內反共歇斯底里的煽动，还伴随着在整个資本主义世界范圍內对这种歇斯底里的拼命煽动。在这一方面，也正像在許多其他事情上一样，表現出美帝国主义对內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間极深刻的有机联系，表現出美帝国主义政策的本质，这是一种国际政策，它不仅产生于美国国內和資本主义陣营內部的阶級斗爭，而且产生于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之間的阶級斗爭。

在美国这个資产阶級民主制的国家里，似乎每个人都有权利持有任何政治观点，但是共产党却横遭无数的迫害，因为共产党員不同意占統治地位的各資产阶級政党代表的观点。1947年，美国共产党总书記尤金·丹尼斯（以"不尊重国会"的罪名）被判入獄；1948—1949年，对美国共产党其他十二个主要領导人又提起了公訴（按照資产阶級"司法"的說法，是因为参加"共产主义阴謀"）；1949年，麦卡倫法案被提交国会，这个法案借口"反对間諜活动"而規定要加强对共产党人的迫害。

美帝国主义最好战的思想家之一——詹姆斯·伯納姆为了給反共歇斯底里找特殊的"理論根据"，竟建議"让共产主义活动成为非法的"。他解釋說："我是在双重的意义上使用这些詞的，我指的是，首先让輿論相信共产主义在理性上和道德上都是"非法的"，即超出文明社会所能允許的限界；然后由此作出实际的結論，用法律来禁止并鎮压有組織的共产主义运动。"③

---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声明》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8 頁。

② 《The New York Times》, 27. XI. 1946.

③ *J. Burnham.* Containment or Liberation? New York, 1953, p.228.

战后年代美国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进一步加强了，与此直接相联系，在对內、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壟断組織所起的作用加强了。

在战爭年代里，生产积聚和資本集中的过程大大向前发展了。最有势力的美国康采恩和托拉斯的活动已經达到这样的規模，即这种活动之广足以同一系列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济活动范圍相比拟。

美国各公司的年平均利潤（納税前）从1936—1940年的六十二亿美元增加到1941—1945年的二百十五亿美元和1946—1949年的二百九十亿美元。

1945年屬于二百五十家最大公司的生产資料等于1939年屬于所有公司的生产資料的数量。这二百五十家公司的資产从1935年的九百五十亿美元增加到1948年的一千九百二十八亿美元。一些亿万富翁公司（这种公司的数目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的三十一个增加到1946年的四十三个和1952年的六十六个）的势力甚至发展到实际上由它們控制了各公司全部資产的75%以上。①

随着各壟断組織在經济領域中統治权的扩大，美国的国家机器越来越从屬于金融寡头，国家与壟断組織的相互結合越来越牢固了。在罗斯福总統任期內，特别是在战爭时期，一些最大的壟断資本家起了重大的作用，而随着杜魯門上台，联邦政府和整个国家机器中眞是一切关鍵性职位都让大資本家們的代表掌握了。

詹·福萊斯特是最大的銀行家之一，担任过国防部长，五十年代的战爭歇斯底里正是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他自己竟作了这种歇斯底里的牺牲品，自杀了。这个福萊斯特曾宣称："世界上的秩序只能由商人来建立"②。必須指出，杜魯門完全听从这种劝告而組成了一个政府，它承担了一項不体面的任务：在战后世界建立"美国式的秩序"。

正如威·福斯特所强調指出，华尔街的壟断資本家已經不滿足于"远

① 参見《Корпорации-миллиардеры》.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4, стр. 8。

②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by W. Millis. New York, 1951, p. 248.

远地控制着政府。他們更进一步将他們自己的心腹安插到政府及其一切部門的許多負責职位上去。"①

随着壟断資本主义加速向国家壟断資本主义轉变，美国的金融寡头得到了一些新的更广泛的条件，来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給美国人民。这对于美国人自己和全世界和平与安全事业都造成了极坏的后果：战后时期美国資本家在对內政策方面进而对人民群众更广泛地采取了恐怖的斗爭方法，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而发动了极广泛的扩張和侵略。

二、美帝国主义夺取世界霸权的斗爭綱領

資产阶級的思想家和政客們曾企图把美国的帝国主义的国家渲染成为"經济人道主义"和"政治自由"的体現，把这个国家所奉行的对外政策說成是"爱好和平"、"民主"、"无私"的典范；但战后的全部經驗证明，这都是毫无根据的。美帝国主义絕非已不再是具备一切固有坏屬性的帝国主义；相反，随着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性表現得越来越严重。美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本性完全保持了下来。如果說这种政策在規模、手段、形式和方法上发生了一些变化——甚至非常大——，那末，改变的实质就在于，美国对外政策路綫的反动性更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变化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变成国际反动势力的中心的过程，变成对各个民族和国家进行資本主义剝削、奴役和压迫的那种历史注定必遭灭亡的制度的主要堡垒的过程。

在整个壟断資本主义时期，正像其他所謂大国一样，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的战略目的也是爭夺世界霸权。列宁揭露了在向帝国主义过渡前夕和这种过渡以后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

① 威·福斯特：《世界資本主义的末日》世界知識社 1953 年版第 79 頁。

本內容，他說："……我們看到的……是世界上几个最大的資本主义强国——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它們几十年来的全部政策就是不断地进行經济竞爭来統治全世界，扼杀弱小民族，保证銀行資本获得三倍至十倍的利潤，把全世界囊括到自己的势力范圍以內。"① 列宁的这段評述完全可以适用于美帝国主义及其对外政策。

美国国家的全部对外政治活动和美国資产阶級外交的全部实踐，过去和現在都可以归結为：力图創造一些条件，以保证美国壟断資本能最大限度地不仅对"自己的"人民，而且对其他国家人民进行剝削和掠夺；力图造成一种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美国資本在世界一切地区、一切大陆、一切国家进行扩張的国际气候。从这个观点来看，美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一些基本目的和性质仍然沒有改变。它們在战后时期也还沒有改变。美国目前的对外政策路綫是美帝国主义以前全部政策的合乎邏輯的继續。

当然，在这种路綫的执行上，在美帝国主义爭夺世界霸权的实踐中，有过一些特殊的起伏。在有利的国际和国內条件下，上述政策就执行得更紧張些；相反，在不具备这种条件时，美国統治集团就不得不节制自己的胃口，而局限于在建立世界霸权的总的战略远景中只解决一些比較局部的任务。

如果談到爭夺世界霸权已經突出为最重要的实际任务，而且美国外交的眞正全部日常活动都从屬于这項任务的时期，那末，在美国历史上可以划分出两个这样的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是与世界大战联系着的。

第一个这样的时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展开的。在忙于互相消灭的欧洲主要帝国主义强国已經互相削弱了的形势下，美国帝国主义通

① 《列宁全集》第 24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70—371 頁。

过威尔逊总統宣布了爭取由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具体綱領。这个綱領反映在臭名远揚的威尔逊"十四点計划"中，反映在美国参加巴黎和会时的立場中，还反映在，美国統治集团企图使"門罗主义"、"門戶开放"和"机会均等"等美国对外政策的各种理論得到国际上的最广泛的解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战爭結束后初期美国爭取世界霸权的企图遭到了失敗。失敗的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之間的尖銳矛盾，美国人民自己对美国壟断組織的侵略性綱領的抗拒和——强調这一点非常重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冲决了帝国主义的鏈条，在国际关系的全部性质和整个体系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幷大大限制了在資本主义进行完整而且独占的統治时期国际关系中存在的那种恣肆专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是，資本主义的一切矛盾达到了这样尖銳的程度，以致出現了帝国主义鏈条全面断裂的現象。无产阶級专政已經越出了一国范圍，而成为一支对整个世界发展发生着强大影响的国际力量。我們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本身解体和崩溃的时代，是由更高級的社会經济形态社会主义革命地代替資本主义的时代。在这样的条件下，由某一个帝国主义强国来建立世界霸权的計划是根本不能实現的。

但是，要期待那些已經过时的阶級和政党能对力量配置进行清醒的分析，幷在估計到各种实际事实的基础上制定出有远見的政策，这是徒劳的。由于被憎恨社会主义的心情所蒙蔽，美国壟断資产阶級认为，苏联在战时所遭受的損失使它不能迅速恢复本国的經济，也不能挫敗美国的扩張計划。而且，資本主义世界內部的"力量对比"中还从来沒有出現过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如此有利于美国的局面。

根据这样的估計，美国統治集团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他們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会，来开始一个由美国爭夺世界霸权的新回合。于是他們在战后时期就特别紧張地展开了这場斗爭。

这个新的斗爭回合的具体內容和美国統治集团所遵循的一些策略方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反映了国际舞台上力量配置的特殊性。这也就預先决定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对外政策綱領的特点。

首先，这个綱領把反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斗爭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斗爭放在首要地位。綱領中的这个特点产生于与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有关的一些变化，还产生于，美国統治集团不得不考虑到一些带有根本性质的新条件，这些条件的特点就是两个世界体系的共处和斗爭。

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爭政策的主要障碍。与此相联系，战后时期美帝国主义的全部——政治的和軍事的——战略就首先規定了要进行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斗爭，而且是用尽一切力量、不惜任何手段的斗爭。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时期和尔后的反苏干涉年代里，美帝国主义曾經是——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同样地——这种干涉的主要組織者和参加者之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却成为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爭的主要发起国，它肩負了这种斗爭的基本重担，并彻底地全面地发揮了国际反革命势力集結的主要中心的职能。

敌視苏維埃国家的动机在美国統治集团的政策中占了中心位置。1955年，美国的著名生意人之一、"国民鋼铁公司"經理会議主席威尔承认說："过去十年的一大部份时間里，对俄国抱經常敌意的主題在我們的国际政治中占了統治地位。如果我們坦率的話，我們必須承认，这就是美国政策的实质。"①

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綱領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在綱領中把首

① «St. Lois Post Dispatch», 25. V. 1955.

要的注意力放在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上，不論这种运动在甚么地方出现，而且在各种不同的国家里千方百計地援助各反动阶級来保持并巩固資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陣地。这一特点产生于下列情况：美国統治集团不得不仅考虑到資本主义統治的边界在地域上縮短了，而且要考虑到业已縮小的資本主义世界內部資产阶級陣地的削弱，要考虑到資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在其总危机第二阶段上突出的深刻化和尖銳化。

从其世界历史性的后果来看，殖民主义的崩溃具有仅次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的第二重要因素的意义；在这种条件下，为防止殖民主义体系进一步瓦解，为把一系列已經贏得民族独立的国家拉回到帝国主义怀抱而进行的斗爭，就成为爭取資本主义体系生存本身的斗爭的一个最重要組成部份。这种斗爭与美帝国主义爭夺世界霸权的战略計划的执行，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美国的計划規定，要使殖民主义制度在已經摆脫帝国主义羈絆的那些国家里复辟，要夺占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殖民主义列强的殖民帝国，还要使近东、中东、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系列附屬国屈从于美国。

为了辯护这些行动，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和政客們提出了"实力眞空"的特殊概念。这种观念的实质在于：随着法西斯强国的溃敗和英、法殖民統治的削弱，在一系列地区里形成了对这些地区和对整个世界都很危險的"眞空"，这种"眞空"必須从外部来填补：美国反动集团完全否认了上述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有权利、也有可能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且，当然只有美国才被认为是能够填补这种虛构的"眞空"的力量。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論家張伯倫声称："为了我們自己，也为了世界文明，我們必須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填补……道德的、政治的和經济的眞空，——无論是在欧洲，是在亚洲，或是在任何其他地区。"①

战后美国殖民計划的特点是：美国金融寡头在进攻欧洲各国

的殖民帝国的同时，还企图利用宗主国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級作为自己的阶級同盟者，企图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維持殖民体系的斗爭中建立世界帝国主义的統一战綫。

在欧洲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展开了对資本主义极其危險的一些革命性的过程，这也是美国統治集团不能不看到的。这些过程实际上使这些国家中的資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受到了打击，因为，从經济上、政治上和軍事潜力上看，西欧是現代帝国主义的仅次于美国的主要中心，如果世界資本主义体系失掉了西欧，这就会使資本主义世界受到无可弥补的損失。事实上，如果沒有西欧的資本主义，"世界資本主义体系"这个概念本身也就失去了实际内容。

因此，美帝国主义一方面为了在德国、日本、意大利的經济中夺取統治地位，为了夺取国际市場上屬于这些国家的陣地而进行頑强的斗爭，并且向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欧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业、貿易和財政发动猛烈的进攻；与此同时，美帝国主义又还认为自己的头等任务是，帮助主要欧洲国家和日本的反动势力，来反对在这些国家中发展着的一些革命性的过程。根据这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爭夺世界霸权綱領的特点之一就是，美国統治集团采取了拼凑以美国为首的一切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統一战綫的方針，来共同对付这些国家中的革命运动和民主运动。

美国各种計划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是这些計划的极广泛的"全球"性质，是拋开以前的"势力均衡"理論而新提出的美国压倒优势論和美帝国主义"万能"論。諸如美国是"巨人"，"巨人"的經济、政治和軍事力量是无出其右的，美国是現代世界的"当然領袖"和"超强国"，而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都只能对美国奉命唯謹等等，这样一些自詡的論調到战后叫得更响，散播得更广了。

① *W. H. Chamberlin.* America: Partner in World Rule. New York, 1945, p. 138.

"二十世紀是美国世紀……是美国成为占統治地位的世界力量的第二个世紀。"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亨利·卢斯(几份美国最大的杂志的編輯和出版者)所发表的这种无耻的声明，可以作为題詞写在美帝国主义战后任何对外政策綱領的前面。

最大的銀行家和生意人、美国总統顧問伯納德·巴魯克声称："美国，由于其武装力量的强大、經济方面的优势、資源和产生于美国生活方式的道义力量，能够树立起对世界的領导。"②

著名的軍事評論家汉森·鮑德溫写道："今天，我們是銀行家的国家，債权人的国家，出口商的国家，偉大的海軍和空軍强国，世界各交通綫的集中点。罗馬曾經是当时存在的世界的中心，而华盛頓就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二十世紀西方世界的中心。"③

美国商业界的領导人之一威耳奇在"对外貿易全国协議会"战后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說："在称为地球的这个公司里，我們必須承担起最大股东的責任。"④应該說，杜魯門政府的确尽了它的全力，来試图实現壟断資本上层人物的这个要求。

我們所論述的美国綱領的第四个特点是，它比任何时候都更审慎地把美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眞正目的伪装起来。美国政府、美国国会、主要的資产阶級政党和整个龐大的宣传机构都尽了最大努力，把美国的主要軍事战略措施硬說成似乎是在"共产主义侵略"面前"不得不"采取的。

壟断資产阶級上层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在杜魯門政府中担任过要职的托馬斯·芬勒特，在介紹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方針时說：这个方針是用以同苏联、人民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行动"相抗衡的"几乎完全

---

① *H.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New York-Toronto, 1941, p. 27.

② «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8. X. 1944.

③ *H. W. Baldwin.* The Price of Power. New York. 1945. p. 26.

④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14. XI. 1946.

带防御性的"方針。①芬勒特宣称，美国軍事預算大量增加的原因在于苏联的行动。他写道："俄罗斯人逼迫我們这样做。"②

美国的資产阶級历史学界也按着同样的調門說話。③美国最著名的对外政策問題学者之一T·貝利教授曾企图使輿論相信，美国統治集团宣布"杜魯門主义"，通过"馬歇尔計划"，結成北大西洋联盟和采取其他一些最富侵略性的行动，这些似乎都只是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他写道："美国的政策从性质上說完全是防御的——它与其說是华盛頓的人們所制定的，不如說是克里姆林宮的人們所制定的。"④

美国对正在爭取独立的国家所执行的反动政策，和美国資本家为反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而采取的扩張主义行动，也是經过审慎的伪装的。为此目的，美国动用了各种蠱惑人心的声明：美国对一切其他民族的"援助"，美国政策的"反殖民主义"性质，美国不干涉其他国家內政，和尊重民族自决思想。

美国綱領中的这个特点是与主要帝国主义强国統治阶級的下列企图有关的：設法适应人民群众在一般政策上、特别是在对外政策上所起作用显著加强的形势，阻止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的影响的縮小，阻止社会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在国际关系中影响范圍的扩大。

美帝国主义战后綱領的第五个特点是，公开地提出"实力政策"，作为夺取世界霸权的最重要的手段；寄希望于所謂美国"原子优势"；广泛利用"原子外交"和"原子战略"；积极准备那种使用人类还沒見过的大規模屠杀手段的战爭。

---

① *T. Finletter.* Foreign Policy: The Next Phase. New York, 1958, p. 33.

② 同上书第13頁。

③ 参見本书第七篇。

④ *T.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1958, p. 809.

在战后美国綱領的这个特点中，反映出軍国主义化和資本主义腐化的加强，表現出在現代資本主义主要国家所采取的对外政策措施的整个体系中軍事政策具有了越来越大的意义。

三、"实力地位"政策被提升为国家的对外政策理論。"原子战略"和"原子外交"

壟断資产阶級过去和現在都认为，实現自己战后对外政策路綫的主要手段是"实力地位"政策。正如尼·謝·赫魯曉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指出，这种政策反映了"現代帝国主义最富有侵略性的集团的意图，他們打算取得世界霸权，鎮压工人运动和民主、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方針反映了他們对社会主义陣营进行軍事冒險的計划。"①

利用实力作为对内、对外政策的主要工具和手段，这是資本主义各国在資本主义一切发展阶段、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本质上所固有的。奴役和掠夺其他国家的人民，特别是政治上依附和經济上落后的国家的人民，攫取銷售市場、原料产地和投資地区，为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圍而进行战爭，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政治活动和对外經济活动中其他一些最重要的因素，这些都是与使用武力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弗·伊·列宁多次强調指出，相互竞爭的壟断資本家集团之間分割世界，同时，最大的一些資本主义强国之間对地球进行領土的分割，这些都屬于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在壟断資本統治的条件下，除非用"实力地位"——軍事的、經济的、财政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的实力，这种分割就不可能实現。

因此，毫不奇怪，从壟断資本主义开始时起，美帝国主义在广泛訴諸暴力和侵略的同时，已經不断地灌輸对实力的迷信，特别是对軍事实力的迷信。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具体形势下，这首先表現于海軍上将阿尔弗列德·馬汉所提出的"海上实力論"在美国軍事战略观念領域內的傳

① 赫魯曉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結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頁。

播，其次表現为对外政策思想領域中的“命运注定”观念（“Manifest Destiny”）。美国的思想家和政客們利用一些借口（譬如說：以两大洋为界的美国“天然边疆”和受此情况支配的“战略安全”考虑，美国产业革命具有的特大規模，人口的迅速增长，美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引力”原則），企图論证美国有“权利”进行无限的扩張，說甚么“大自然本身”“遵照上帝意旨”而让美国承担了“对世界命运的責任”。

在美西战爭时期，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的反动侵略集团最猖狂地利用了对实力的迷信。后来，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成为“实力政策”基础的一些观念，特别是地緣政治学的許多提法，被德、日、意法西斯主义拿去当作了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現代資本主义的主要国家——美国，成为在实力范疇的基础上制定政策的主要国家。

甚么叫做“实力政策”或“实力地位政策”呢？这种美国对外政策基本理論的实质是甚么呢？

我們首先让这种理論的創造者和辯护者来讲話。美国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 P·斯特劳斯—胡佩和乔治敦大学教授 C·波索尼在他們 1950 年出版的著作《国际关系》中宣称：正像“利潤”在經济中一样，“实力”在世界政治中也是同样的动机。他們說：“保证实力，这就是政治的最高目的。”而且，不是甚么抽象的实力，而是作为順利进行战爭的必要条件的实力。这两个作者写道：因为“在我們的时代，对外政策或者是决定于当前战爭的各种需要，或者是决定于未来战爭的可能性，同时，对外政策或者是意味着能够借以避免战爭的一些措施，或者是意味着为进行这种战爭而准备好最有利的条件，以便胜利地結束战爭。”①他們針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期解釋說：“必須注意到，只有依靠实力政策，或者主要是依靠实力政策，美国才能够保持住自己的决定性的地位。”②

① *R. Strausz-Hupé* and *S. F. Posson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London-Toronto, 1950, p. 2, 6.

② 同上书第 177 頁。

"实力政策"的主要提倡者之一、美国著名的地緣政治学者斯皮克曼写道："在国际关系中，暴力的任何形式，包括破坏性的战爭，都是可以容許的。"他声称：在現代的社会中，战爭是"国家政策的"一种"自然的"和"必要的""工具"，而一个国家的領土則是該国家可据以进行斗爭并在被称为和平的暫时停战时期据以准备战爭的軍事基地。"①在这种条件下，"……爭取实力的斗爭……就成为一个国家对內政策和对外政策中最重要的目的。一切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的，因为归根結底只有靠实力才能达到对外政策和对內政策的目的。"②

美国的"实力政策"，这是帝国主义的扩張和侵略政策，是一个国家——美国对所有其他民族和国家发号施令的政策，是战爭訛詐政策，而如果訛詐达不到目的，則是准备和发动掠夺性、侵略性战爭的政策。"实力政策"規定要积累下这样的一些物資和工具，即美帝国主义希望能借助于它們而变得比一切其他国家都更强大，以便把美国关于战后和平安排的条件和美国的"和平安排"綱領强加給一切其他国家，并保证美国的領导权。这首先就是：积累战爭的工具和物資，"在战爭边緣上周旋"（用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五十年代时用起的术語），利用"局部战爭"，并且"积蓄力量"，以便使美国反动集团在一旦出現对他們有利的形势时就准备发动的"总体"战爭中保证美国的胜利。

由此可見，"实力政策"是与和平共处政策对立的。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主义的实力理論，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資本主义世界的相互关系的总路綫——和平共处理論，是根本相反的。

和平共处的理論和政策的出发点是：各族人民和各个国家所

---

① *N. 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New York, 1943, p. 18.

② 同上书第447頁。

面临的主要任务在于不允許战爭，不为解决国际冲突而訴諸日益带有毀灭性质的軍事手段；与此相反，“实力政策”的出发点則是：准备新战爭，包括准备世界大战，不仅是可以被允許的，在美帝国主义集团看来甚至还是“适合于目的的”，而且使用最新式大規模屠杀的手段也是“合法的”。

为了反駁不同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思想，美国的拥护实力理論的人們提出了一个論題：在比較长的历史时期內的这种共处是“不可能”的。他們故意无視和平共处的可能性——这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既已被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二十年来苏联同对它进行資本主义包围的各国的相互关系的实踐所证明，而且也被苏联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參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各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有效合作所证明。

社会主义各国的政策的根据是締約各方互相尊重，无条件地承认主权原則、領土完整和一切国家不可侵犯原則、平等原則、各国間互諒和信任原則；而美帝国主义所执行的政策却与全人类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这些最重要原則有着最深刻的矛盾。“实力政策”，这是一种傲慢地蔑視一切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合法权利的政策，是美帝国主义对它們的內政和它們的全部对外关系横加干涉的政策。

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則貫穿着各民族友好合作的思想；与此相反，“实力政策”的傳导者和辯护者却提出了一些資本主义的兽性法則，根据这些法則，强者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弱者并統治弱者。“实力政策”，这就是美帝国主义让一切比較弱的国家都在經济上、政治上、軍事上和意識形态上隶屬于它。

因此，战后时期美国統治集团所宣布和执行的“实力政策”的最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用这种政策来公开地对抗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对抗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理論。

在这一点上也就表現出美帝国主义对外政策路綫是沒有前途的，現代資产阶級的一般政治理論，特别是对外政策理論，是有缺陷的。这些理論的非現实性和主观主义往往非常接近于冒險主义。战后的整个"实力政策"都是根据这样一个前提：美国似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强大，它能够而且必須趁这个机会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但实际上，与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却是一种比美元和美国原子炮更强大无比的力量——社会主义、民主与和平的力量，被苏联及整个社会主义陣营不可摧毁的威力所加固的最偉大的人道和人权的力量。

战后"实力政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已經极高度地"国家化"了，这种理論已經被提升为正式的、在許多总統发言和国会法令中表述过的美国对外政策路綫基础。以前，关于美国"万能"、美国"特殊"的某些言論和声明，还只是政府、軍界或商界的个别——即便是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所发表的；而到战后时期，这些說法已經变成美国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領域中全部实际活动的正式綱領了。

这絲毫也不意味着，壟断資本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所起的作用縮小了。恰恰相反，壟断組織在美国对外政策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前还从来沒有像战后时期表現得这样显眼。正是壟断組織、最有势力的工业联合会和金融集团，才是美帝国主义对外扩張的鼓舞者、組織者和主要参加者。事实证明，战后时期的主要对外政策措施沒有一件不是在壟断資本的最直接参加下策划和执行的。①

这种情况特别表現在杜魯門政府的下列重要对外政策行动中："杜魯門主义"、"原子外交"、"馬歇尔計划"、"第四点計划"、結成北大西洋集团和

① 参見 *Н. Иноземце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1960, гл. V-VII。

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体系、宣揚"共同安全"体系。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国家壟断企业家活动的例证。这些行动大多不仅符合整个美国壟断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而且在其具体的实际体現中常常是最有势力的金融集团发財致富的工具，这本来也完全是合乎規律的。

作为美帝国主义某些軍事战略措施和对外政策措施的基础的"原子战略"和"原子外交"，成为那些与原子生意直接有关的公司（首先是洛克菲勒、摩根和杜邦的公司）謀求巨額利潤的源泉。关于这种原子生意的規模，即使只从原子工业的投資数額中也可以判断出来；从战爭結束后的前五年，原子工业就已經被列入了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工业部門之內。

在好几年之內，"馬歇尔計划"曾是美国对西欧政策的主要环节；与这项計划有关的营业使經理兌現該計划項下发放的信貸的那些美国托拉斯大发其財。只說这样一点就够了：在"馬歇尔計划"实施的第一年，全部业务的95%是由美国十二家最大的公司所壟断的。洛克菲勒的托拉斯"新澤西美孚油公司"从"馬歇尔計划"項下的全部石油供应中攫取了60%，仅只从这一項它每年就賺到至少二亿五千万美元的額外利潤。

杜魯門的"第四点計划"使美国在經济落后国家的投資显著增加，結果，也就使美国壟断組織从国外直接投資中所賺得的利潤显著增加。

"实力地位"政策規定，美帝国主义在各种不同的方向——經济上、政治上、意識形态上和軍事上，都要大力地齐头并进。在这种政策中，体現了統治集团使經济軍事化和扩大軍事預算的行动与对美国劳动群众的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进攻之間的密切联系；体現了美帝国主义在反共主义幌子下的意識形态扩張与其主要軍事战略措施之間的密切联系。

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实現美国扩張的形式和方法，是与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相适应的，与資本主义世界內部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內的各种过程相适应的。但是，美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和实质——为保持和巩固資本主义陣地、为确立美国壟断組織的世界霸权而斗爭，这是依然沒有改变的；同样，寄希望于

"实力政策"或"实力地位",以之作为美国战后整个对外政策路綫的基础的基础,这也是沒有改变的。

同时,軍事方針被提出来作为"实力政策"的主要方針,而作为主要任务的則是准备新的世界大战,首先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大战,以便用这种办法試图把世界分裂为两个体系的状况加以克服,并为資本主义恢复它已經失去的陣地,恢复它以前的稳定状态。

这反映在最广泛的美国軍事战略体系中。1946—1949 年間,仅只直接軍費就达八百五十亿美元;1949 年,軍費比战前 1939 年的水平超过了十一亿。1950 年,美国的武装力量約达二百五十万人,这在和平时期是空前的。

在战后时期美国軍事战略路綫和整个对外政策的主要方法和手段的武庫中,"原子战略"和"原子外交"占有中心的地位。对"实力地位"的指望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所謂的美国原子优势。

最有影响的美国政治和軍事活动家們在他們的估算中是以下列三种因素作出发点的:

第一,是对原子武器的壟断;在美国战略家看来,原子武器是一种"絕对威力"的手段。他們希望美国能长期保持住原子壟断。这种幻想所以产生,是由于下列因素:美国拥有資本主义世界最发达的經济基地;战爭結束前夕取得了原子生产領域的經驗;最熟练的科学技术干部,包括許多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专家聚集美国;資本主义世界現有原子原料首先是鈾的主要产地轉由美国控制。

第二,是"在运載这种武器以达目标的工具方面的几乎絕对的能力"。① 这种工具是指远程轰炸机和配备許多艘航空母舰的海軍舰队。在这两方面,美国在战爭将結束时已經大大向前发展了,而

① *R. G. Hubler.* SAC: the Strategic air Command. New York, 1958, p. 268.

在战后最初几年又投入巨額的追加款項。在武装力量的撥款計划中，战略空軍的扩大和航空母舰的建造享有絕对的优先权。

第三，是"本土不怕攻击的独占地位"。这指的是，美国在地理上距离可能成为战場的地区很远，在别国領土上有密布的美国軍事基地网，以及为之花費巨款的防空体系。

所有这一切綜合起来，就使美国統治集团得出一个虛妄的結論：似乎美国在实力方面具有这样一种"优势"，足以使它在进行原子战爭威胁后，能把对自己有利的解决办法强加給整个世界其他国家。

美国前总統赫伯特·胡佛暴露了我們在上文已就其主要特点进行过分析的那个广泛的扩張和侵略綱領的根本方針，他宣称："目前，我們，只有我們，掌握着原子彈，我們能够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給全世界。"① 后来任美国陆軍参謀长的泰勒将軍說："……我們的空軍掌握着决定性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使美国对世界建立起警察的监督，并迫使世界接受一种特殊的'美国式的和平'(pax americana)。"②

作为原子武器的壟断持有者，美国統治集团就企图利用这种武器作为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首先是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进行恫吓和施加压力的工具。美国在扩大原子武器生产和使之进一步完善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一系列保持和巩固美国在这方面的壟断地位的軍事政治行动，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这些行动中最重要的就是 1946 年夏季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委員会中提出的"管制原子能"計划，后来称为"巴魯克計划"③。苏

① *H. Hoover*. Addresses upon the American Road. 1945—1948. Toronto-New York, 1949, p. 14.

② 《Look》, 24. XI. 1959.

③ 参見本书第二十三章。

联提出的建議本来規定要彻底和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并拯救人类免于原子战爭的威胁；“巴魯克計划”却与此相反，它根本不禁止原子武器，而且絲毫不想对原子武器的使用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督。“巴魯克計划”实质上可以归結为：建立一个享有最广泛权利的美国原子超級托拉斯，这个托拉斯在联合国国际监督机构的招牌下必須保证达到美国壟断資本和美国政府所提出的侵略目的。

四、“冷战”的发动。“杜魯門主义”的宣布

美帝国主义爭夺世界霸权的斗爭和它的“实力地位”政策，对战后时期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极坏的作用，造成了一系列隐伏着战爭的严重政治危机，并且是“冷战”的主要原因。

美帝国主义者及其政治的和意識形态的娄罗們費了不少力气，想让世界輿論相信，国际紧張局势似乎是苏联执行的“以暴力扩張共产主义世界边界”和“通过使用暴力来傳播共产主义”的政策所引起的。他們还借口說苏联似乎干涉了东欧各国的內政，說甚么只是因为这样才在上述国家里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

資产阶級的历史学家和宣傳家們譴責苏联，說它似乎是首先主动开始恶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在苏联同西方国家、首先是同美国之間存在过的友好关系，說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似乎开始破坏了战爭时期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他們說，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才无可如何，只好也“相应地破坏”这些义务。

斯丹福大学教授厄德加尔·罗宾逊声称：“无論是过去或者現在，东西方之間沒有停頓的冲突”的根源“……深深地在于俄国的政策。”①軍事史专家和記者У·米利斯在1958年发表的集体著作《对外政策和自由社会》中断言：“冷战不是美国的作品”②。斯特劳斯—胡佩和波索尼宣称：苏联

① *E. Robinson.* The Roosevelt Leadership. 1933—1945.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1955, p. 365.

是"'冷战'的基本的和唯一的罪犯。"③

杜魯門、貝尔納斯、艾奇逊和战后最初几年的美国政府成員——正是在其执政时苏美关系严重恶化并发生"冷战"的那一个政府，特别頑固地对苏联进行了这种譴責。

这种論断都是沒有任何根据的。美帝国主义集团不願意承认在世界上已經发生的革命性的变化，因而动員起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反对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用尽一切手段，甚至軍事手段，来巩固資本主义的陣地，并力爭确立美国的世界霸权。这种路綫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美、苏之間存在过的合作友好关系是不相容的。还在战爭末期，美国統治集团就故意开始忽視和破坏自己对苏联所負的义务，着手准备和挑起美苏冲突，并千方百計地加剧国际紧張局势。美国政府和美国外交的全部行动方式，以及它們所采取的国际行动在时間上先后有序的情况，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事实正是这样的。

让我們看一些事实。

1945年4月12日，世界范圍內的政治家，为保障和平和国际安全而坚决拥护美苏合作的人，弗·罗斯福总統去世了。他的去世象征了美国对外政策中与美苏战时合作相联系的一个时期的結束。在罗斯福时期已經进行活动的反动势力，利用組成新政府的时机而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影响。当时法西斯德国的投降已經临近，根据与此有联系的已經发生变化的战略形势和政治形势，反动派另外制定了一条根本敌視苏联的美国对外政策路綫。

1945年4月20日，美国新总統哈里·杜魯門同从莫斯科返国的美国

---

② *W. Millis, J. Murray* and other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Free Society. New York,1958, p. 4.

③ *R. Strausz-Hupé* and *S. F. Posson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 XXV.

大使阿·哈里曼及几名閣員举行会議。在这次会議上，哈里曼承认"苏联政府不打算同美国决裂"，同时坚持让杜魯門在对苏关系上表現"坚定"。杜魯門在他的回忆录中追忆說："我打断了哈里曼的話，說：我不害怕俄国人，而且要表現坚定。"①这里所謂的"坚定"，就是指使用最极端的手段，以便把美国的命令强加給苏联。难怪美国最著名軍事領导人之一 Г·阿諾德将軍早在 1945 年春季就写道："我們的下一个敌人是俄国。为了順利地利用战略空軍，我們需要在全世界都有基地，这些基地要分布得使我們能够据以攻击任何一个我們被命令去毀掉的俄国目标。"②

1945 年 4 月 23 日，杜魯門写信給苏联政府首脑。正如以前在 4 月 18 日写的信一样，这封信也是企图迫使苏联同意西方国家干涉波兰内政。問題在于，美、英政府違反在雅尔塔会議上达成的协議，不願承认享有多数人民信任和支持的波兰临时政府是后来改組成的全国統一政府的核心，而企图把对美、英有利的政府强加給波兰人民。苏联政府首脑針对这封信强調指出："美英两国政府事前就波兰問題达成了协議（而苏联对波兰要比其它国家更加关心得多），然后企图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苏联，使苏联的代表們处于无法容忍的境地，这种情况应該认为是不正常的。"③

1945年5月8日，在法西斯德国投降的那一天和对軍国主义日本的战爭正紧張的时候，杜魯門签署了大大紧縮租借法的命令，这首先是針对苏联。正如杜魯門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这实际上是意味着"对任何駛向俄国的船只实行禁运"，总統承认，这不能不引起"俄国人对我們所采取的不友好态度的警惕。"④

1945年5月12日，正如在福萊斯特日記中所承认的，哈里曼提出美国"需要修改"雅尔塔协定的問題。⑤

1945年7月16日，杜魯門到达波茨坦的第二天，意义最重大的国际会

---

①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 p. 70—71.

② *H. Arnold.* Global Mission. New York, 1949, p. 586—587.

③ 《1941—1945 年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苏联部长会議主席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 2 卷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22 頁。

④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 p. 228.

⑤ 《The Forrestal Diaries》, p. 56.

議开幕前夕，第一个原子彈在阿拉默果尔多（新墨西哥州）的一个演习場中爆炸。杜魯門认为这次爆炸是"实力的示威"，目的在于影响以后的全部事变进程，使之按美国統治集团所选擇的方向发展。还在試驗的前夕，他就宣称："如果它（即原子彈。——作者）像我所想的那样爆炸了，那我当然就有了一根对付这伙子人的粗棍子。"①，——不，是一根对付苏联的粗棍子。

1945年8月6日和9日，对日本城市广島和长崎进行原子轰炸。根据美国軍事历史家摩頓的話，1945年6月国务卿貝尔納斯同反对这种措施的美国原子专家們談話时承认，为了击溃日本，是不需要这样作的。但是貝尔納斯却还是坚持进行原子轰炸，他說，这可以"使俄国在欧洲更好商量。"②

1945年9月21日，召开內閣特别会議，从美国当时壟断原子武器的角度来討論未来的对苏关系。③一些比較有远見的內閣閣員、特别是陆軍部长亨利·史汀生知道，如果美国凭恃这种壟断而进行原子訛詐，美苏关系会复杂到甚么程度。但是，美国政府拒絕为保障国际安全而禁止原子武器，反而走上加强原子軍备的道路，并公开宣布了它的反苏的明确傾向。

1945年12月16日—26日，莫斯科外长会議。大家知道，苏联代表团在这次会議上表現出极願意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协議，并情願做出一些合理的妥协。在評述会議的結果时，苏联政府首脑指出："……会議已經做了工作。这种工作在从战爭过渡到和平的目前时期将大大有助于建立我們两国之間的适当的相互諒解。……但是即使是現在，我也认为我能够說，总的說来，我对于我們目前就紧急国际問題交換意見的結果是乐观的。我希望这将提供进一步的机会来协調我們两国在其它問題上的政策。"④这反映出，苏联希望并准备尔后仍走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合作的道路。但是，美国的反动集团不希望这样的合作，杜魯門根本就沒有答复苏联的信件。这样，战爭时期曾带来明显好处的苏、美政府首脑間的通信，在1945年底就

① *В. Э. Вильямс.* Трагед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60, стр.165.

②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57, p.347.

③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 p.524—527.

④ 《1941—1945 年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苏联部长会議主席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版第282頁。

被杜魯門总統阻断了，对此，杜魯門应負完全責任。

1946年1月25日，杜魯門給国务卿貝尔納斯一份特別备忘录，說不应該"在今后再作妥协"①。杜魯門自己在回忆录中曾非常露骨地把这份备忘录称作美国对苏政策中"新路綫的开始"。杜魯門写道："我相信，对俄国来說，强硬坚定的語言将会比外交上的客气話更容易理解得多。"②

1946年3月5日，有杜魯門总統在場，丘吉尔发表了富尔敦演說，这篇演說得到杜魯門的完全贊同。这篇演說中充滿了指責苏联"极权主义"和"干涉"东欧各国事务等等的話，它为反对苏联和一切自由民主力量的英美軍事政治集团的建立奠定了一块基石。

1946年春季，国务卿貝尔納斯在一些发言中，甚至在正式发言中，宣布以"强硬路綫"作为美国对苏关系的基础。这表示，美国統治集团已經公然开始背棄以平等为基础的国际合作，背棄战时由苏、美、英共同通过的协議，背棄作为联合国成立基础的大国一致原則，而使自己的全部政策从屬于反共主义的目的。

1946年5月，当时的德国美占区軍政副长官克萊将軍給陆軍部长一份秘密报告，其中提出了詳細拟定的分裂德国和修改波茨坦协定的計划③。

1946年6月10日，《生活》杂志发表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一篇題为《关于苏联外交政策和应采取的对策的一些想法》的綱領性的发言，后来印成专門小册子。他硬說苏联的对外政策路綫似乎在全世界都"威胁着和平与安全"，他号召美国"同苏联政策的一切具体表現相对抗。"他要求特別注意在苏联边境建立"防疫綫"。杜勒斯宣称，美国同时还必須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的武装力量"④。

1946年6月15日至7月12日，巴黎外长会議的第二次会議。以美国代表为首的西方国家代表团在会上建議，应在和約中載入一些規定实行美国金融寡头的扩張主义原則的条款，这些原則体現在"自由貿易"和"机会

① 《Memoirs by Harry S.Truman》, vol. I, p.552.

② 同上。

③ *L. 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New York,1950, p.73—78.

④ *J. F. Dulles*. Thoughts on 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New York, 1946, p.1—3, 30.

均等”提法中。他們力爭保持外国对多瑙河流域航行的监督，并拒絕了苏联就意大利和前意屬殖民地处理問題提出的公正、民主的建議。苏联拒絕同意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反民主的扩張主义的要求，而这却被帝国主义的宣傳硬說成是证明苏維埃国家“固执己見”，“不願”达成共同协商的决議，企图“强加于人”。

1946年7月1日和25日，美国在比基尼环形島进行原子彈的新的試驗爆炸，目的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議的初期对苏联施加政治压力。

1946年7月29日至10月15日，巴黎和会。美、英代表坚持要修改一系列以前达成的协議，并再一次企图使一些符合美、英統治集团扩張主义的反动目的的原則能暗中通过。但是，苏联和一切民主力量这一次又坚决反击了这种企图。正因为如此，在对意大利、芬兰、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馬尼亚的和約中才确定了一些旨在消灭这些国家中法西斯殘余和使之循民主道路发展的要求。

1946年9月6日，貝尔納斯在斯图加特发表演說。美国国务卿正式声明，美方准备修改波茨坦协定，并怀疑奥得—尼斯河的波德边界的永久性。①

1946年12月3日，签訂了关于在德国的美、英占領区合并的单方协定。在背棄四大国对德国問題共同协議的政策，分裂德国和准备在西德恢复軍国主义的条件方面，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驟。

1947年1月，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多数开始活动。范登堡代替康納利任外交委員会主席，乔·馬歇尔将軍代替貝尔納斯任国务卿。参議員范登堡号召“在中国”采取“更坚决的反共政策”②。

这就是1945—1946年間美国統治集团一些行动的枯燥但同时却又很有說服力的清单，这些行动都是直接在“杜魯門主义”和“冷战”正式开始以前采取的。这張清单是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充当資产阶級的历史捏造者的思想帮凶們提出的无可辯駁的起訴书。

1947年春季将来临时，美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认为，时机已經够

① 《The New York Times》, 7. IX.1946.

②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5—1947》, p.453—454.

成熟了——既是指国内形势，又是指国际形势——，已經可以公开宣布美国打算撕毁战时同苏联签訂的协定，示威式地加强对反动政权和反动集团的支持，并故意声張地宣布反对共产主义的斗爭是美国的主要任务。发表这种声明的任务交給了杜魯門总統；这个声明被称为"杜魯門主义"。

1947年3月12日总統致国会的特别咨文①的直接口实是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四亿美元)問題。希腊和土耳其距离美国几千公里，而且以前沒有任何条約和义务使这两个国家同美国有联系。

当时在希腊正进行着人民反对保皇法西斯分子及其靠山——英帝国主义的解放斗爭。杜魯門总統在他的咨文中猛烈地攻击希腊的民主爱国力量，称他們是似乎要在希腊建立"极权制度"的"武装少数派"②。杜魯門主义的实质，就是美帝国主义对解放运动露骨的挑战。

美国統治集团企图靠运用暴力和挑起內战来制止世界各地区合乎历史規律的解放过程。同时，在杜魯門的咨文中还包含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粗暴的誣蔑性的抨击，这說明，美帝国主义者已經露骨地轉变到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行公开敌对的对外政策路綫。美帝国主义企图依靠"杜魯門主义"，借口保证"美国安全"而在距美国极远、却与苏联直接接壤的那些地区夺取重要的軍事战略陣地，并且借口"援助"而把这些地区的資源攫为己有，使这些地区从屬于美国資本。

甚至許多美国資产阶級的著作者也并不隐諱"杜魯門主义"的反苏傾向。例如，維拉·M·迪安在追述"門罗主义"的反俄傾向时指出，"'杜魯門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門罗主义'的继續"，但它"开始了一个在考虑到日益扩大的美国利益、影响和实力范圍而可以允許美国进入的地理限界內

① «81-st U. S. Congress. 1-st Session. Senate Document № 123. 1949». Washington, 1950, p.1253—1261.

② 同上书第1256頁。

'遏制'俄国的政策的时期"。①

美国上层人物认为"杜魯門主义"是一个重要的綱領性文件，并希望使它的作用扩展到尽量多的国家中去。美国政府正式采取了美帝国主义干涉其他民族和国家內政的路綫。

美国著名的国际問題专家艾·坎貝尔写道："总統咨文的語言是通用的，希腊問題被精心描繪成为一个全世界的問題。"②国防部长詹·福萊斯特宣称："我曾断言……我們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支持将是为在世界各个地区执行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經济行动和政治行动而采取的一个試驗性的准备步驟。"③福萊斯特在参議院一个委員会的会議上强調說："美国在从直布罗陀到印度洋的整个地区都有非常重要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首先是从軍事观点上看，同时也从經济观点上看。"④

为"杜魯門主义"的宣布所选择的时机也是带有征兆性的：在討論最重要的战后和平安排問題的莫斯科外长会議开幕后两天，总統提出了他的咨文。在这次外长会議上，美国代表团拒絕了苏联提出的关于德国非軍国主义化和民主化、建立四国对魯尔的管制、达成德国的經济統一和政治統一和立即准备对德和約的建議。⑤

"杜魯門主义"的宣布，美国代表在莫斯科外长会議上所采取的立場和尔后不久"馬歇尔計划"的提出，都证明"强硬路綫"已轉变成"冷战"。大体上在同一时間內，即1947年春季，"冷战"这个名詞本身也被美国的資产阶級宣傳机构广泛地使用起来了。

① *V. M. Dea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50, p.215.

②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7—1948». New York and London, 1948,p. 27.

③ «The Forrestal Diaries», p. 263.

④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ce Program. Hearings before Special Committee U. S. Senate. 80-th Congress», part 41. Washington, 1948, p.25290.

⑤ 参見本书第十九章。

許多資产阶級著作者不得不承认，美国根据"强硬路綫"和"冷战"而采取的主要行动，是要完成公开带进攻性的任务，而絕不是像帝国主义宣傳机构所說的那样要完成防御性的任务。例如，华·李普曼写道："冷战"的目的是要"……制止俄国扩展它的势力范圍和据为己有，然后再迫使俄国縮小这个势力范圍。"①

总之，使人类遭受大量牺牲和苦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沒有来得及結束，各族人民的和平和安全就受到了新战爭的威胁。这种局面的責任完全在于主要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战后最初几年美国政府的全部行为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五、共产主义"遏制"論的宣布。美帝国主义反民族解放运动的斗爭。在資本主义世界內部确立美国領导权的路綫

在轉入"冷战"的同时，一批政治的和軍事—战略的特殊概念和理論也应运而生了，而美帝国主义就企图利用它們作为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实际行动的基础。这些观念首先是針对美苏关系拟制出来的。这也可以理解：要知道，美国統治集团认为苏联才正是自己的主要敌人，是阻止它扩張的主要力量。

1947年，"遏制"(containment)共产主义的理論被提出来。几年之間，直到共和党政府上台和"解放"(liberation)理論正式宣布为止，"遏制"理論是美帝国主义的占統治地位的对外政策方針，而根据这种理論所执行的对外政策路綫是"实力地位"政策的主要变种之一。

"遏制"理論是1947年才以比較有系統的形式第一次由乔治·凱南在报刊上的文章公开提出来，凱南当时正在領导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規划委員

① *W. Lippman.*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47, p.28.

会。从这个观点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行为的淵源》一文(1947年以"X"笔名在《外交季刊》上发表①，然后收入凱南的《美国外交。1900—1947》一书中。)、《美国和俄国的未来》一文②和凱南的《美国对外政策的現实》一书③。

維納克教授写道："从'杜魯門主义'宣布时起，对苏維埃扩張主义的'遏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公开承认的目的。"④凱南說："遏制政策的目的，就是在任何地点，只要俄国人在那里表現出企图侵害稳定的和平的利益的傾向，都要以始終不渝的起反作用的力量来对抗俄国人。"⑤

共产主义"遏制"理論的实质是甚么呢？这种理論的創造者們企图把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描繪成似乎是保障国际安全的路綫，可是在他們的貌似"防御性"的辞句背后究竟隐蔽着甚么呢？

首先，"遏制"理論的創造者們的出发点是否认不同制度国家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們打的算盘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边界一定要縮小，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早晚总会根本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必須迫使这些国家向西方的要求投降。

其次，"遏制"理論規定，美帝国主义要积极地干涉各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苏联的內政，以便爭取使它們向資本主义复辟的方向"进化"。

---

①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By X.《Foreign Affairs》,July 1947.

② *G. Kennan.*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Future.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51.

③ *G. Kennan.*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1954. 应該指出，在战后年代凱南由于估計到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而对成为"实力地位"政策基础的一些方針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新估价。后来，他对两个体系的国家和平共处問題发表了一些健康的意見。

④ *H. W. Vinac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 1945—1951. Stanford, 1952, p. 128.

⑤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p. 576.

第三，“遏制”理論規定，要創立这样一种“自由世界的实力形势”（这个提法出自美国国务卿艾奇逊）①，它可以使人們挑起一些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順利的“局部”战爭，同时为大規模战爭作准备。

凱南写道：“我不知道，我們中間有誰会不希望縮小苏联統治和苏联影响的地区。”② 維納克虽然以稍加掩飾的形式，但却也相当明确地把“遏制”政策看做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一定的过渡阶段。按照維納克的意見，在西方能向苏联提出明确的最后通牒并迫使苏联向美国的要求投降以前，这个过渡阶段必須持續下去。

凱南把願望当作現实，因而在1947年时硬說，苏維埃政权似乎是“內部不稳固”，苏維埃人民“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已疲憊不堪”，苏維埃經济已經瀕于“死亡的边緣”，在共产党內“冲突已經成熟了”等等。

“遏制”理論的拥护者們的出发点是：美国政府必須不仅利用“內部困难”——虛构的困难和一些因战爭后果給苏联带来的困难以及人民民主国家中新制度的建立而产生的实际困难——，而且必須力图用自己的政策来尽量加重这些困难。为此目的，他們认为必須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組織經济封鎖，更进一步煽动“冷战”，加强反对社会主义各国的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在这些国家內部最大限度地展开顛覆活动。

“遏制”理論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与追求和平的願望及眞正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在这种理論的創造者所使用的表面上带“防御性”的辞句背后，隐蔽着用暴力来保持和扩大資本主义陣地的意图，千方百計地进行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爭的意图。美国政府的主要实际步驟也都正是为了这种目的。

①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26. VI. 1950, p. 1037—1046.

② *G. Kennan.*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 76.

从宣布"冷战"和提出"遏制"理論时起，美国統治集团就发动了广泛的宣傳运动来反对苏維埃国家及其爱好和平的政策。为了中伤苏联，任何謊言都編造出来了。例如，美国国务院出版了一本《苏联—納粹关系》的官方汇編，希望借此来伪造历史，虚妄地指責苏联同德国法西斯合作，企图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責任轉嫁給苏联。在誣蔑性的攻击中，还有像美国劳工联合会反动上层人物所編造的关于苏联似乎实行强迫劳动的备忘录，以及許多其他的东西。

同时，美国还决定对苏維埃国家施加經济压力。这种压力的手段之一，是在根据租借法进行清帳問題上对苏联提出的歧視性的要求。这种手段的另一个是：美国駐德軍事当局对于把德国法西斯在西德的应受拆除的軍事企业中的設备供給苏联这項工作实行怠工。在經济斗爭方面主要的希望則是放在对苏联組織封鎖上。

1947年，美国政府单方撕毀了关于1945年10月15日賒售美国商品的苏美协定。1948年3月，美国政府实行了旨在禁止多数种类的商品輸往苏联的出口許可证制度。稍后，美国參議院于1951年通过了所謂《巴特尔修正案》①，它規定：对于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出售战略商品的国家，不得提供美国貸款和任何援助。同年，美国政府正式宣布，1937年开始締結、尔后每年續訂的苏美貿易协定失效。結果，苏美貿易实际上几乎停頓了。

美帝国主义在进行反对苏联的政治斗爭和經济斗爭的同时，还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軍事战略措施，并且对这些措施特别倚重。美国軍事基地的部署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措施的反苏目的。在直接逼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地区，或者在从該处可以抵达苏联

① 即《巴特尔法》。——譯者

及其他社会主义陣营国家战略重地的地区，美国軍事基地网都是特别密集的。

在采取一些軍事动員措施的同时，美国黷武主义者在战后年代还开始广泛地在苏联边界地区进行挑衅。間諜、破坏和顛覆活动也都受到不少的注意。在美国，違反苏美之間的有关协定而建立了許多反苏的組織。

美国对中国的干涉是1945—1949年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对外政策路綫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遏制"理論的主要具体表現之一。

美帝国主义者沒有自己的数量上够用、质量上中用的武装力量，来对中国进行大規模的公开的軍事干涉。杜魯門承认："我們沒有能够把足以保证胜利的軍事力量派到那里去(到中国去。——作者)……"①此外，美国統治集团还意識到，这样的干涉将会在全世界面前暴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将会不仅引起全中国人民的頑强抵抗，而且引起苏联、整个民主和社会主义陣营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民主力量的致命的反击。最后，这种公开的干涉还必然会遭遇到美国人民自己的坚决反对，并可能危害美帝国主义的內部后方。因此，美国上层人物宁願通过对蔣介石集团的全面协助而进行隐蔽的干涉。杜魯門說："我們已經拿定主意，我們所能奉行的唯一明智的行动方式，就是……向大元帅（指蔣介石。——作者）提供政治的、經济的以及在可能范圍內軍事的援助。"②

美国向国民党人提供的物质援助，超过了全部作战支出款項的一半。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伍修权1950年11月28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做"关于控訴美国侵略中国案"的报告时强調指出：从1945年9月至1948年，美国給蔣介石的物质援助和財政援助达六十亿美元以上。③

①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I, p. 62.

② 同上书第63頁。

③ 伍修权关于控訴美国侵略中国案的发言稿。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集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224頁。

国民党的軍队基本上是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而且主要是由美国教官訓练出来的。在1949年国务院发表的关于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前面所附的艾奇逊致杜魯門总統的信中，艾奇逊承认說："国軍(蔣介石軍队。——作者)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內，沒有一次战役的失敗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彈药。"① 美国还派遣了武装力量直接参加战爭，并积极地从政治上和外交上支持了中国的反动走狗。而且美国資本还继續进一步深入到国民党中国的經济中，中国实际上已在殖民地化。但是，不論美帝国主义如何大举干涉，它毕竟沒有能阻止住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遏制"理論和美帝国主义公开的扩張主义的对外政策路綫的重要应用范圍，还包括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

由于中欧和东南欧各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性的改革，世界資本主义体系遭受了严重的損失。只指出这一点就够了：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人口在战爭前夕共約七千五百万人，即占資本主义欧洲的人口的23%；面积則相应地占19%。

美帝国主义挖空心思地力图不使这些国家的資本主义被消灭，并把这些国家变成对苏联进行斗爭的战略基地。反共主义的理論家和思想家們宣称：他們认为"主要的战略任务"是"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使共产主义失敗"，这个中心地区即是指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苏联。②

美国政府对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政策的基础是，資助和支持反革命力量，进行破坏和顛覆活动，并从經济上、政治上、外交上和思想上展开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斗爭。

合法的方法与一些不合法的方法交錯在一起，而主要的希望是寄托在不合法的方法上。詹姆斯·伯納姆在一本类似反共主义手册的书《共产主义的将来的失敗》中說："生活的經驗表明，傳統的設計和傳統的外交是不

① 《中美关系資料汇編》第1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39頁。

② *J. Burnham.* Containment or Liberation, p. 128.

符合当前要求的。"①他要求以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战爭来代替，或者至少是补充"各种傳統的方法"。"冷战"年代中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許多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条路綫决定的。

但是，美帝国主义在欧洲并沒有爭取到它預期的結果。人民民主制度，强大的社会主义陣营的存在，每一个人民民主国家同苏联以及同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友誼，使美帝国主义的計划遭到破产。

反对苏联、中国和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斗爭，是以"实力政策"为基础的美国战后对外政策路綫的主导方向，但却絕不是唯一的方向。美国对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鎮压，美国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殖民地附屬国的扩張，占有越来越多的地位。这种現象是由各种原因促成的。

对住有世界人口大部分并集中无数自然財富的这些国家从經济上进行剝削，是会使美国壟断組織得到难以置信的利潤的。同时，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附屬国人民的奴役，和主要欧洲宗主国的殖民帝国轉入它手中，这就会使它还能在軍事战略上得到很大好处。因此毫不奇怪，殖民地附屬国中美国統治地位的建立，正如上所述，被看作是美帝国主义建立世界霸权計划中的首要任务之一。

美国的帝国主义上层人物对上述国家更加注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民族解放运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而在这些国家中以空前的規模发展起来。如果美帝国主义能够把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的殖民遺产搶到自己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它是絕不反对老殖民帝国垮台的。但是，当殖民体系已經开始瓦解时，美国統治集团却——不是沒有根据地——从这中間看到了一种对世界資本主义存在本身及其国际陣地的极严重的威胁。当民族解放运动已

① *J. Burnham.* The Coming Defeat of Communism. New York, 1949, p. 98.

經轉变为对帝国主义进行革命性破坏的重要因素时，作为資本主义主要国家的美国就成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堡垒。这是从国际舞台上阶級斗爭的全部邏輯中产生的。

最后，第三个重要的情况：使美国統治集团惊惶恐惧的，是社会主义陣营与已經贏得独立的国家之間日益增强的相互作用，世界社会主义的成就与民族解放运动高漲之間深刻的內在联系。因此，美帝国主义过去和現在都认为，反对解放运动、保护殖民主义的斗爭，不仅从这种斗爭的本身角度看，而且从两个世界体系冲突的观点看，都是反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斗爭。

美国对外政治活动沿着这个方向采取了哪些主要的实际步驟呢？

首先美帝国主义力图为自己保持住像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这样一些美国扩張的老的"傳統"地区。

美国壟断組織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机会而急速增加了同拉丁美洲各国的貿易額。1936—1938年，在这些国家的进口中美国占33%，到1947年則占65%。美国对拉丁美洲的資本輸出也大大增加了。美国对拉丁美洲經济的干涉所达到的程度，已經可以使美国壟断組織把例如智利、秘魯、墨西哥几乎全部銅的生产和拉丁美洲已勘探石油資源的75%等等，都夺到了自己手里。在巴西，美国資本开始控制了全部民族經济的約80%。

同时，美国对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滲透也显著加强了。为此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有：在西半球由美国領导实行武器标准化和組織軍事訓练的"杜魯門計划"、在里約热內卢签訂的公約、美洲国际会議、泛美主义体系以及許多經济协定，首先是附带政治强制的"克萊頓計划"。为美帝国主义利益而进行的一些談判和美国对拉丁美洲各国內战的干涉等等，也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①

就太平洋地区来說，菲律宾是美国政策的一个能說明問題的

① 参見本书第十二章。

例子。1946 年，菲律宾人民由于頑强斗爭的結果而爭得了菲律宾共和国的成立。但是，美帝国主义在給予独立的同时所采取的一些行动，却使美国对年輕的共和国建立了經济上、政治上和軍事上强制的关系。

1946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关于同菲律宾进行貿易的法令，实际上禁止对美国商品課进口税。1948 年美国同菲律宾的貿易額按价值計算比战前增加了三倍，占菲律宾进出口总額的 76%。对菲律宾的資本輸出大大增加了，以致在五十年代仅只美国私人投資已达六至七亿美元左右。

1947 年 3 月，签訂了关于菲律宾境內十六处軍事基地由美国租借九十九年的协定。根据該协定，菲律宾除同美国政府外，不得同任何政府就"与菲律宾武装力量有关的任何义务"进行接触。

美国統治集团特别注意反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斗爭，特别注意使美国資本不仅向中国，而且向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大力滲入。

在美国对亚洲的扩張中，主要的指望是在中国。但是，当对华政策的破产已經开始暴露时，美国壟断資本就加强了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滲入。

在朝鮮，美国統治集团所采取的路綫是分裂朝鮮，在朝鮮半島南部建立自己的統治，并把南朝鮮变为傀儡警察国家和侵略基地。在越南，美帝国主义千方百計地协助法国殖民者进行反对越南人民的反革命战爭，同时努力設法把法国人从越南排挤出去。

美国壟断資本力图尽量广泛和深刻地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滲入，在这两个国家中首先进行反对民族解放力量的斗爭，同时也进行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爭。美国在印度进口中所占的份額从 1946 年的14.6% 增加到1951年的26.2%，而英国的份額在同一时期內却从 31.8% 减少到 18.7%。美国資本的大量流入也加强了。

美帝国主义慷慨地帮助荷兰殖民者进行后者在印度尼西亚挑起的殖

民战爭。荷兰得到了十五亿美元的借款、貸款和补助金。杜魯門政府鼓励了印度尼西亚的反动集团，在1948年酝酿了人民陣綫的分裂，1949年美国外交人員在把奴役性协定强加給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海牙圓桌会議上进行了幕后活动。

美国反动力量慫恿了在泰国反对民主政府的顛覆活动，結果在1948年3月終于促成了亲美的国家政变。在这以后，1950年9月19日美国同泰国就签訂了"关于經济技术合作"的协定，稍后又签訂了"联防"协定(1950年10月17日)。

中东、近东和非洲也成为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重要对象。这是由于，这些地区处在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具有丰富的自然資源，特别是石油，而且长期以来是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利益发生激烈冲突的場所。

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米尔斯坡財政經济代表团就在伊朗开始活动。对伊朗宪兵队的控制权轉移到美国人手里。1947年10月，签訂了一个关于在伊朗設立美国特别軍事代表团的协定，而且伊朗答应不得到美国同意就不允許其他外国軍事顧問进入伊朗。

美帝国主义对土耳其經济、內政和軍事措施的干涉显著地加强了，特别是在"杜魯門主义"和"馬歇尔計划"宣布以后。

美国統治集团，特别是最有势力的石油壟断組織，还在战爭时期就已开始爭取滲入沙特阿拉伯。1943年，美国根据租借法向沙特阿拉伯提供了援助。1945年，美国軍事代表团被派到沙特阿拉伯去，1945年2月伊本·沙特国王同意在波斯灣沿岸地区建設美国軍用飞机場。①

在1938—1948年間，美国向非洲法屬殖民地的出口額增加了几乎七倍。美国向非洲輸出总額由1938年的一亿一千八百万美元增加到1948年的七亿八千五百万美元，輸入总額在同一时期由五千五百万美元增加到四亿零七百万美元。

① 参見本书第十章。

大家知道，美国的殖民政策一向带有美国历史发展特点所决定的特殊性。美国是在反殖民主义革命的基础上出现的。美帝国主义从来沒有过像英国和法国那样的經过法律固定下来的殖民帝国。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后美国在殖民地、附屬国和經济不发达国家中进行扩張的形式和方法。

美帝国主义利用美国"特殊性"和"反共主义"口号，而成为这样一些新殖民主义形式的創始者：通过把殖民地附屬国拉进帝国主义軍事集团的办法，或是給这些国家各种"援助"(最明显地表現在杜魯門总統"第四点計划"中)，而在这些国家中建立經济的、政治的和軍事的統治。

1949年1月20日，杜魯門在第二任总統就职演說中提出了政府的經济措施和政治措施的綱領，其中第四点就是援助經济落后国家。杜魯門宣称："我們必須实施一个新的广泛的計划，它将能利用我們的科学和技术成就来发展和繁荣不发达国家。"①

美国許多主要的資产阶級活动家，特别是外交家和宣傳家，在夸耀美国"援助"时，总是硬說这种"援助"是无私和人道的。"有产者帮助无产者，为的是帮助自己"，共和党著名活动家哈罗德·史塔生这样表述了美国"援助"經济不发达国家計划的实质。

但是，实际情况与此毫无共同之处。在一些不是供对外宣傳而是为实业界用的材料中，包含着关于美"援"眞正意图的极露骨的承认。由"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和研究美国經济及軍事政治扩張問題的全国計划协会任命的一个特别小組准备了一份研究报告：《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經济学》，这份报告說："美国政府向其他国家提供貸款或贈品，因为这些貸款或贈品是达到美国对外政策目的的有效的和精神上有根据的手段。符合这些标准的援助是

① «Foreign Aid by the U. S. Government. 1940—1951». Washington, 1952, p.1.

正确的；不符合这些标准的援助则根本就不应該提供。"①

事实证明，美国对經济不发达国家的"援助"总是同时伴随着对这些国家对內、对外政策的干涉和对它們主权的侵犯。这种"援助"成为施加压力的工具，目的在于使这些国家今后在經济上依然依附帝国主义，而首先是依附美国壟断組織。

同时，"援助"計划也是在这些国家的經济中为美国壟断組織夺取和巩固陣地的一种手段。杜魯門总統在1949年6月24日致国会咨文中介紹自己的"第四点計划"时宣称：这是一个要使美国私人資本得到"鼓励的計划"，它要为扩大私人投資"奠定基础"，要由政府保证美国私人投資免于可能的剝夺風險，这不是偶然的。② 1952年杜魯門在芝加哥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演說时說："第四点計划"对于美国来說是"一笔好生意……它意味着貿易和銷售市場的扩大……原料的更好的供应"③。

* * *

詹·伯納姆說："美国的金融家和工业家会是很高兴地把世界想像成为期待美国商品、美国机器和美国資本之雨的一片自由原野。他們能保证供应一切，他們幻想着整个世界，他們不需要其他的工作不好又无效果的民族来援助，无論是德国、英国或日本都一样。世界、整个世界，都必須成为美国商品和机器的銷售市場，成为某些种原料的产地。"④

这种声明反映着美国壟断資产阶級及其政治亲信中最反动、最富侵略性的一部分人的观点，从这种声明中表現出美帝国主义所計划的战后扩張的規模，和在美国計划中为所有其余資本主义

① «Political Econom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ts Concepts, strategy and Limits». New York, 1955, p. 340.

② «The New York Times», 25. VI. 1949.

③ 同上，27. VII. 1952.

④ *J. Burnham.*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New York,1947, p.6.

世界、首先是为西欧各国所規定的位置和作用。

美帝国主义者考虑到战爭所造成的种种困难，因此战后最初几年在其对欧洲政策中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經济干涉上，以之作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这种政治目的可以归結为在欧洲巩固資本主义陣地和使欧洲各国屈从美国的操纵。

1944—1946年間，出現了几个不同的加强美国在所有其余主要資本主义国家中經济扩張和政治扩張的方案(哈里曼建議、史汀生备忘录、胡佛报告等)。1947年夏季則提出了从上述建議中吸取許多成份的"馬歇尔計划"①。美国战后政策中在时間上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是与这項計划的宣布和执行有联系的，而"馬歇尔化"这个名詞本身也变成了普通名詞。

1947年5月5日，国务卿乔治·馬歇尔对哈佛大学毕业生联合会演說时声称："美国将尽一切努力来促进全世界正常經济情况的恢复，否則就不可能出現政治的稳定和有保障的和平……我們的政策不是要反对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要反对饥餓、貧困、絕望和混乱。这种政策的目的是要在全世界恢复有生命力的經济。"②杜魯門断言："'馬歇尔計划'将作为美国为保卫和平而做出的最偉大貢献之一載入史册。"③

在这个似乎特别"超阶級"、"超党派"、"人道"和"民主"的行动背后，究竟隐藏着甚么呢？"馬歇尔計划"的眞正目的和內容究竟是甚么？

这个計划的主要使命是在欧洲巩固資本主义陣地；不过，美国金融寡头提出这个計划时，却还企图在反对苏联及世界社会主义

① 参見本书第二十三章。

② 《Address of Secretary of State Marshall at Harvard University on June 5, 1947》(《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ne 15, 1947, p. 1160).

③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I, p.119.

体系的斗爭中和爭取資本主义世界中美国統治权的斗爭中同时解决几項經济、政治和軍事性质的任务。

把“正常經济状况的恢复”和“在全世界恢复有生命力的經济”，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显然是理解为回复到这样的状态：世界資本主义体系完全占統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范圍則先縮小到1939年边界，然后被彻底消灭。

美国外交官中有些人，特别是貝尔利，曾經硬說“馬歇尔計划”不仅不追求反苏的目的，反而是“西方調整对苏关系的一种企图”①；硬說甚么这个計划不追求政治目的。某些資产阶級的历史学家也随声附合这些說法。維拉·迪安声称：“馬歇尔計划沒有政治色彩”。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連迪安本人也承认：正如“馬歇尔計划”的拟訂者所希望的，这个計划負責实現的“复兴”必将引起的后果是“大陆上的政治趋于稳定，結果，共产主义遭到削弱，甚至經过一段时間后陷于崩溃”②。参議員塔夫脫說得还更露骨。在参議院討論这个計划时，他直接明确地宣称：他怀疑这个計划在經济上是否适合于目的，但是他将投票贊成計划，因为他认为这項計划是“在反对共产主义的世界范圍的搏斗中一項十分必要的措施。”③

至于对西欧各国，“馬歇尔計划”在这里的目的首先就是要在保持資本主义方面援助——从經济上和政治上——欧洲資产阶級。同时，美国壟断組織还企图使美国資本尽量广泛地打入这些国家的工业、財政和商业，在欧洲市場上巩固自己的陣地，以便在美国提高工商业的积极性。

“馬歇尔計划”的任务是帮助西欧資产阶級使一些反动政府执政，使一些极右的政党便于活动，促使工人阶級的团結发生分裂，

① *A. A. Berle.* Tides of Crisis. A Primer of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1957, p.112.

② *V. M. Dea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250.

③ «Congressional Record, 80-th Congress», March 12, 1948, p. 2725-2734.

协助煽动反共歇斯底里。在美国同有关的欧洲国家根据"馬歇尔計划"签訂双边协定以前，美帝国主义对法国和意大利的反动集团施加了压力，以便把共产党人从这些国家的政府中驅逐出去。

"馬歇尔計划"的政治目的和經济目的与軍事目的有密切联系：正当这个計划有效期間內，侵略性的北大西洋集团体系大体上拼湊了起来。①

1948年3月16日，西欧十六国——"馬歇尔計划"参加国——巴黎会議閉幕，而3月17日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就签訂了布魯塞尔条約，这个条約完成了西方联盟的建立。同日，杜魯門总統正式宣布："美国将会按照需要的程度来支持西方联盟"②。

在这以后不久，1948年4月27日，举行了关于美国同西欧主要大国締結軍事同盟問題的杜魯門內閣特別会議。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員会討論了关于成立这种联盟的問題。杜魯門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当时就已經认为，把西德包括到正在計划的同盟里去是适当的。③ 杜魯門說："如果沒有德国，欧洲的防御就将会是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后卫战斗。"④ 由此可見，还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前，美国政府就已經认为，分裂德国并把德国包括进具有反苏目的性的軍事集团的問題，对于美国本身說来是早已决定了的。

在建立美国及主要欧洲大国的侵略性軍事集团的道路上，下一个步驟是1948年6月11日参議院通过了关于对外政策"新方針"的所謂"范登堡决議"。这个决議要求，通过立法途徑放棄从华盛頓、杰弗逊、林肯时代以来最根深蒂固的对外政策傳統之一：不同欧洲大国締結經常性的軍事和政治同盟。在我們正論述的这个

① 参見本书第二十四、二十五章。
②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8. III. 1948.
③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I, p. 244—246.
④ 同上书第253頁。

时期以前，美国同欧洲只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才建立了軍事合作关系。而現在，則是在和平时期，并且在沒有任何人威胁美国和西欧安全的情况下，提出了建立美国—西欧联盟的問題。

在决議中建議批准这样一条原則："美国参加以經常的和有效的自助及互助为基础、并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些区域性的和其他集体的协定。"① 这样，就正式提到了美国同位于西半球以外的各国建立的集团，其目的似乎是为了保证"相互安全"。但是，沒有任何人威胁到这种安全，按照美国地緣政治学家的意見，美国的安全区要扩延到整个世界，而且美国的一些身居高位的国务和政治活动家自己就露骨地談到拟議中的协定的反苏方針；从这些方面考虑，不能不得出結論：实际上并不是要建立防御性的，而是要建立侵略性的軍事集团。苏联外交部有充分根据地指出，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方向"意味着恢复以前的反苏路綫，目标指向发动战爭和用暴力确立英美世界霸权。②

1948 年 7 月，"范登堡决議"通过后不久，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会議，会上拟定了締結北大西洋集团的基本条件和程序；1949 年 4 月 4 日，签訂了北大西洋公約。

北大西洋集团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它为自己規定的目的是用一切手段，首先是軍事手段，来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全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这个集团的主要发起者和組織者——美帝国主义还另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利用这个集团来巩固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的陣地。

北大西洋集团的建立必然地要使国际紧張局势大大加剧，战

---

①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 Washington, 1950, p. 197.

②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стр. 46—71.

爭威胁更加严重。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在五十年代剛开始时，世界就已經瀕于战爭慘禍的边緣，只是由于力量对比上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根本变化、苏联的积极对外政策和各族人民的坚决斗爭，这場慘禍才得以防止。

第十五章

英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改变。英国在1945—1949年間的对外政策

一、經济状况和阶級力量的配置

在战爭的初期，英国眼看就要被战敗了。仅仅由于同苏联、美国結成了反法西斯联盟，它才得以避免一場看来是难以避免的毀灭。英国和苏联作为盟国，紧密配合作战，共同反击了法西斯国家。这一点对挽救英国当时的局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1939年到1946年間担任英国战时內閣秘书的揚格·雅各布少将曾这样写过："……如果俄国在1941年遭到失敗，使得德国能够把大陆上的一切軍事資源和工业資源全部用于一个目标——消灭英国，那末，英国即使有整个英联邦和美国的支援也未必能支撐下来。"①

英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战胜国。但是战爭削弱了这个不列顛帝国，使它失去了一系列重要陣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最沉重地打击了大英帝国，使它开始崩溃下去。不錯，英国当

① 《United Kingdom Policy: Foreign, Strategic, Economic》. London, 1950, p. 41.

时是收回了曾被敌人夺去的各个殖民地，并且还从意、法这两个殖民国家手中捞到了一些油水，但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已經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进行統治了。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威力下，英帝国主义不得不放棄它在印度、緬甸、錫兰和某些其它国家的政治权力。这些变化对于整个国际形势，而首先是对英国战后的对外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在战爭时期和战后，英国和原来的自治領的联系大大削弱了。自治領对于"宗主国"的依附程度減少了。这不能不破坏英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陣地。英帝国主义本来打算在战后加强对自治領的控制，但結果并未能阻止自治領的分化。所以如此，其基本因素是：自治領的經济发展相当快，在速度上已經超过了英国，同时美国的資本又越来越多地滲入这些地区的經济領域。

战爭的經济后果对英国也是不利的。当然，英国在战爭中的各种遭遇确实影响到了它的經济情况，但是，要讲遭遇，那它根本不能同苏联以及許多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伤亡人数比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的伤亡人数少四分之三，这次英国死了二十四万四千人，受伤的二十七万七千人，下落不明的五万三千人。① 英国本身沒有被敌軍占領过，在英国的土地上沒有进行过毀灭性的陆地战，而空中轰炸也沒有給英国的工业中心带来了不起的損失，英国的工业力量并沒有因此而遭到显著的削弱。

在战爭期間，国家的工业投資是一亿英鎊。② 当时这些資金是用在增加軍事工业生产能力的，在战后大部分軍事工业又都改成为了生产出口商品的。由此可見，英帝国主义的生产基地在战爭期間并沒有受到什么重大的損失。然而，由于战爭，英国在世界資

① 《Whitaker's Almanac. 1949》, London, 1949, p.465.

② 参見《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M., 1958, стр. 36。

本主义經济中的比重毕竟是降低了，它更加落后于主要对手——美国。

从1945年到1949年这一期間，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的竞爭中，英国曾經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出口方面，它恢复了原来在資本主义国家中所占的比率，而且这种比率在战后的头五年中一直是稳定的。这是因为英国壟断資本在世界資本主义市場中占領了战敗国德、日所丧失的重要陣地。但是，在这一方面，英国也碰上了更为强大的美帝国主义的竞爭。

周期性的国际收支逆差一直是英国經济的致命伤，使得英鎊的行情不能稳定。其原因之一，就是在战爭期間英国的国外投資减少了，因此靠国外投資得的收入也就少了。这种收入由1938年的二亿零五百万英鎊降到1946年的一亿六千二百万英鎊。① 战后英国的財閥們立刻加紧資本輸出，到1949年，国外投資的收益就增加到二亿英鎊。热中于資本輸出的金融寡头，极力支持鎮压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侵略行动。然而，殖民战爭并沒有改善英国的經济状况，相反，巨大的軍事开支只是导至了英国收支平衡上的恶化。

为了"挽救"收支逆差的状况，采取了减少进口日用品的办法，結果給人民群众造成了新的困难。1949年，英国出口总額的指数是134%(以1937年为100)，进口总額指数是81%②。收支平衡不稳定，又需要加紧出口，这迫使英国政府于1949年秋季貶低英鎊的币值。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英国壟断資本賺的錢并不少。据官方資料，英国資本家获得的利潤从1938年的十三亿六千八百万英鎊

① 参見《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тр. 374—378。

② 同上书第374頁。

上升到1945年的二十三亿九千万英镑①。在战后，虽然是工党执政，但是壟断資本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却大大增加了。

美国經济学家罗果夫专門研究了从1945年到1950年間工党政府和"巨宗生意"之間的关系，他指出："工党政府同它的前任一样，在一切直接或間接涉及工业利益的問題上，都要和不列顛工业同盟会商量(不列顛工业同盟会——英国壟断資本的中央机构，被认为是英国工业的总司令部②)。

战后，在国家壟断資本的发展上，英国已經名列前茅。英国資本主义危机在战时和战后期間的急剧加深、不列顛殖民帝国的崩溃，这一切逼着英国的壟断資本最大限度地利用国家机构来保存和巩固它們在国內外的陣地。正因为这样，在战后的十年之內，还一直保存了当年根据战爭需要而建立的国家調整和监督体制。

为了壟断資本的利益，主要是与新兴工业部門有关的壟断資本的利益，工党政府在燃料动力工业和国內铁路和航运业方面实行了資本主义国有化。这样作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国家把国有化的部門，重新装备起来，对主要的壟断部門提供廉价的燃料、动力和运輸，从而加强它們的竞爭能力。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又取消了国家軍用工厂的国有化，其实就是把这些工厂交給了那些控制新兴部門的大壟断資本。这些措施，大大地推动了英国資本主义沿着工业資本集中的道路发展，而在这方面英国过去是大大落在美国和德国資本主义后面的。

英国統治集团还企图解决另一个任务——削弱阶級斗爭。采

① «Annual Abstract of Statistics, № 84. 1935—1946», London, 1948, p. 229.

② 参見«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тр. 183。

煤工业和国內运輸业的国有化，給他們提供了一种借口，說什么他們已經滿足了多年来一直坚持爭取国有化的矿工和铁路工人的要求，說什么在英国的經济中似乎建立了"社会主义成份"。

战爭对英国国內的政治局势和阶級力量的分布給了巨大的影响，使人民群众更向左轉。这表現在英国人民对苏联的向往大大增长，要求确保英苏两国在战后紧密地友好相处。劳动群众公正地认为，同苏联結成牢固的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保卫欧洲和全世界和平的保证。

第二次大战后英国人民渴望进行巨大的社会改革，以便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英国人民希望永远不再遇到新的战爭。

英国著名的国际問題观察家柯明斯在1945年大选前夕写道："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国千百万人民对俄国有好感，坚决要求同它合作。对于絕大多数英国人来說，在战后同俄国合作是必然的。任何一个党，要是忽視这种情緒或企图貶低它的意义，都会在当前的竞选中失敗。"①

工党的竞选綱領中規定要巩固同苏联的关系并在国內进行重大的社会改革。保守党人士——壟断資本主要政党——在竞选中失敗了，工党取得了政权。

自由党的报紙《新聞紀事报》把工党的当选比作为"慕尼黑的結束"②。正如一家工党杂志《論坛》双周刊所写的那样："一般人都认为，丘吉尔不是一个能和苏联建立經常友好关系的人。英国人民相信，与苏联的友誼是世界和平的基石……英国人民不願意让丘吉尔的对外政策继續执行下去，他們譴責这种政策……"③

① «News Chronicle», 4. V. 1945.
② «News Chronicle», 27, 28. VII. 1945.
③ «Tribune», 3. VIII. 1945.

英国人民相信了工党的竞选口号，岂知这些口号基本上都是竞选前不负責任的欺騙和宣傳。竞选結束后的第二天《泰晤士报》就写道："人們如果指望在对內、对外政策上会有革命的改革，那是无根据的"。① 果然，工党政府在 1945 年 7 月取得政权后在对外政策方面继續奉行違反英国人民利益和世界和平事业的反动的帝国主义政策。欧·貝文——艾德礼的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工联和工党最反动的头子之一，在战时参加过丘吉尔的三党战时的內閣——就是这种政策的积极奉行人。資产阶級报刊对任命貝文为外交大臣表示"极大的滿意"，并强調"对外政策将不会改变"。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曾签訂了許多十分重要的国际协定，承担了义务，要在战后同其他大国合作，爭取建立一个正义的、民主的和巩固的和平局面。在战后，英国和其他大国一道承担着在欧洲、远东和世界其他各地建立和維护和平的責任。他們的这种責任不仅在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举行的各次会議的决議中有了規定，而且在联合国宪章和其他文件中也有相应的規定。如果英国政府遵守这些协定，那么在英国对外政策上就会有一个历史轉折点，同时也会更便于解决英国在战后的各种問題，会有助于巩固英国本身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地位。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英国統治集团几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剛一結束的时候就背棄了各盟国在战时所实行的共同协商的政策。

二、英国在 1945—1949 年間的对外政策

英国統治集团把社会主义在战后的胜利发展看成是对它的直接威胁。所以，反对社会主义就成了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础。"这

① 《The Times》, 27. VII. 1945.

② 《The Times》, 28. VII. 1945.

样，可以肯定地說，反对共产主义的进攻……”，是英国“政策的主要方向”①。这段話是倫敦大学国际关系史教授查理斯·韦伯斯特1949年在对皇家国际关系学院所作的报告中讲的。

英国的政治家們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势看成是“在整个欧洲和东方酝酿着革命的时刻”。② 他們的这种估价是完全公正的。英帝国主义本身首先就是殖民主义，因此英国的統治集团和其他国家的殖民主义者一道，采取一切手段鎮压民族解放运动。怎样才能够继續保持对殖民地人民的剝削，这成了英国对外政策的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务。

工党虽然执政，但是英国战后的对外政策实质上是由外交部、陆海軍部和国防部的反动官員們所掌握的。

1946年初工党人士K·齐里阿庫斯写道：“事实上，左右我們对外政策的不是工党政府，而是国防部、海軍部和外交部。不論是在欧洲，还是在近东和远东（印度尼西亚），他們追随的是老牌統治阶級所一貫追求的社会目的和帝国主义目的。这个統治阶級既便是在議会竞选中落选，也照样能够控制外交部、殖民地部和武装力量。”③

貝文的所作所为，就是同外交部里的老牌反动官員們共謀的和取得他們的同意的。工党評論家和議員迈克·富特指出：“外交部的人立刻就爱上了貝文，在工作中他們眞是志同道合。”④ 正因为这样，貝文这个人才在保守党人中深受推寵。

英国統治集团企图制止欧洲和亚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东欧复辟資本主义制度，粉碎民族解放运动并巩固大英帝国在这些国家的殖民体制。他們在对外政策上所追求的这些目的，显然

① «United Kingdom Policy. Foreign, Strategic, Economic», p. 33.
② *A. White*. The Cold War. London, 1950, p. 5.
③ «Labour Monthly», March 1946, p. 73.
④ *M. Foot*. British Foreign Policy since 1898. London, 1956, p. 158.

是徒劳的，但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們必須打击世界革命和民主运动的主要堡垒——苏联。因此，英国就十分热衷于同美国一起准备反苏战爭。

战爭剛一結束，英国統治集团就大肆进行敌視苏联的活动，从而破坏了在战时所結成的各大国之間的統一。帕姆·杜德在1946年1月写道："1945年的下半年不比上半年，看来，那些左右行情的人們的笨聪明得到了证实。他們曾經說过，在胜利的时刻，一切协定将都会被撕毁……。果然，一股骯髒的誹謗苏联的洪流开始泛濫。"① 还在1945年11月，外交大臣貝文就說过，英国的对外政策已經同大国統一的政策分家了。12月23日他在众議院說："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观点：我的政策和陛下政府的政策必須完全依据三大国的統一。"②

但是，工党的大臣們也懂得，他們对苏联的政策是違反英国人民的心意的。因此，他們一面对苏联大肆造謠污蔑，削弱人民对苏联的向往，另一方面却又玩弄种种花招，掩飾其反苏政策，欺騙公众輿論。

这种欺騙手法之一就是貝文在1947年提出的关于将1942年英苏条約的有效期从20年延长到50年的建議。在此后各次英苏談判中，充分地暴露了英国統治集团的虛伪面目。英国方面不仅反对改善1942年的条約，而且反对增加一些新的、要求英国承担义务不参加反对苏联的集团和活动的条款。英国的这种立場使得談判破裂了。

1947年夏天的英苏貿易談判也为英方所破坏。英国的統治集团采取了限制英苏貿易的政策，企图給苏联造成損失。

英国政府一方面破坏反希特勒联盟中各大国行动一致的原

① «Labour Monthly», January 1946, p. 2.

② «Parliamentary Debates. House of Commons», vol. 416, col. 762.

則，同时竭尽全力加强在战时形成的英美集团。英国統治阶級指望在美国壟断資本的支持下来克服战后时期在經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英帝国主义者需要有美国的支援来鎮压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而美国的財主們也应該帮助英国克服經济困难。同时，倫敦方面也认为，同美国結成联盟能够有助于英国在国际舞台上恢复过去所起的作用。

倫敦把英美联盟看成是在战后巩固英帝国主义地位的一种手段。而华盛頓則想利用倫敦方面对美援的兴趣，进一步使英国在經济和政治上服从于美国。

1945年8月，美国未作事先通知，突然停止了按租借法案对英国提供的供应。正如《工人日报》所評論的那样，美国企图"利用英国暫时的經济弱点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①

1945年末締結的英美財政协定中所規定的条件，正是符合美国的这种动机的。英国从美国得到四十四亿美元的借款，其中要拿出六亿五千万美元用来支付租借法案供应賠償金，其余的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英国打算在五年內根据需要来使用。为了偿还这笔借款，英国同意在政治上和經济上作出巨大让步：英国承担了义务，在协定生效一年后取消"英鎊集团"；恢复英鎊对美元的自由兌換，冻結"英鎊集团"各国在英国的英鎊存款；先降低而后完全取消关税特惠。虽然尽管英国在后来并未履行某些条款，也从債款中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但是在签訂协定的时候，英国报界仍然表示了憤慨，把这个协定称之为"英国經济上的敦刻尔克"。

由于这个协定，英国淪入了美国資本在資产阶級欧洲的重要投資范圍之內。继1945年的借款之后，接着就是关于"馬歇尔計划"的协定和巨宗的私人投資。战后美国在欧洲的私人投資有一半是投在英国。从1946年到1949年英国从美国得到十六亿六千三百万英鎊的借款。因此，使得英国在对外政策和軍事政策上依从于华盛頓。与此同时，由于这些借款，英

① 《Daily Worker》, 25. VII. 1945.

国获得了恢复資本輸出的可能，从而保持了英国对英联邦各国的經济影响。从1945年到1949年，英国資本輸出达十一亿英鎊，其中有七亿五千七百万英鎊是輸出到英鎊区的国家。①

英国同美国为了統治全世界，共同建立了軍事政治集团。英国統治阶級一直想广泛地利用这个集团。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頓的演說曾提議創立一个"英語民族协会"，目的在于，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样，建立"英联邦內部的各民族与帝国同美国之間特殊的关系"。②

战后欧洲的发展同英帝国主义者的这些計划是背道而馳的。所以丘吉尔在富尔頓才悲哀地說："这并不是我們曾經为之而奋斗的那个欧洲。"③

英国对欧洲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实現美英集团的侵略目的。还在战爭快要結束的时候，英国政府就动用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去阻止欧洲各国沿着进步的道路发展。1944年11月，英国軍队参加鎮压比利时的民主力量。在意大利，英国占領当局同美国的軍事机构一道庇护那里的反动派。1944年底英国政府派遣軍队进駐希腊，企图复辟受英国摆布的希腊反动体制，鎮压希腊的革命力量，并把这个国家变为反对巴尔干半島进步运动和近东民族解放斗爭的軍事基地。丘吉尔下令駐希腊的英軍司令斯科比将軍，要他"毫不犹豫地进行枪杀"。英軍占領希腊并进行反对希腊人民的武装行动，造成了一場延續了几年的战爭。

但是，在东欧和东南欧，在那些为苏联紅軍从法西斯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国家里，英帝国主义者无法实行警察統治。与丘吉尔的

---

① 参見《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тр. 28—29。

② 《The New York Times》, 6. III. 1946.

③ 同上。

願望相反，英国軍队未得进入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人民掌握了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沒有人敢于向人民动武。

一系列欧洲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使英国和其他国家的資本家失去了他們在中欧和东南欧的原有市場，失去了原料和农产品的来源。与此同时，英国反动集团也失去了許多重要的、反对苏联的軍事战略基地。

当然，英国統治集团也不惜任何力量和采取一切手段，妄图使旧制度在人民民主国家里复辟，阻撓它們沿着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前进。他們从精神、政治、外交、財政等方面支持这些国家的反动派，在外交上和經济上对这些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利用联合国的讲台反对这些国家。

英国統治集团和美帝国主义者一起，把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权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以便保存这个反动派的和法西斯主义的策源地。1946 年，联合国通过决議譴責佛朗哥政权，建議联合国各成員国从西班牙召回自己的代表，这时候英国政府，正像美国資产阶級历史学家M·菲茨西蒙斯所承认的那样，只是"到最后才勉强地接受了这一决議，从西班牙召回了自己的大使"。① 但是英国当局在被迫采取这一步驟之后，仍从經济上支持佛朗哥政权，促进扩大同西班牙的貿易。

英帝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一样，在战后一貫推行复活西德軍国主义的政策，企图利用西德来充当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力軍。在 1945 年和 1946 年內在德国英占区，大量的由德国旧軍队組織起来的部队，官兵总数在十万人以上②。直到 1947

① *M. Fitzsimons.*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British Labour Goverment. 1945—1950. Notre Dame. 1953, p. 40.

② 参見《Правда о политике западных держав в германском вопросе》(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М., 1959, стр. 75。

年12月1日，在英占区还有158处高射炮台、860处永久性工事和战略油仓[1]没有拆除。英国当局在它的占領区里保存了那些策謀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壟断資本，沒有执行对法西斯罪犯的惩处，反而迫害民主人士和民主組織。

对于为战爭所削弱的法国，英国采取的政策是建立两国之間的軍事和政治联盟。倫敦方面把这一联盟看成是在政治上影响法国的一种手段和将来在英国操纵下的西欧国家軍事政治联盟的核心。但是英法之間的严重矛盾阻碍了这一計划的实現。巴黎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組織的反法阴謀，对英国当局企图独霸魯尔区，消除法国对魯尔区的控制等行动異常憤怒。英法联盟条約是在解决了爭端之后才締結的。1947年3月4日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于敦刻尔克在条約上签了字。英法联盟条約形式上似乎是为了防止“德国侵略在任何形式下的复活”而签訂的，但实际上却为軍事性的侵略集团——西方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奠定基础。[2]

英国作为欧洲的大国和欧洲資本主义的强大堡垒，企图成为欧洲的“总管”，以为这样它就有可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仲裁的角色。但是，这些策划沒有考虑到迅速改变着的世界力量对比的情况。欧洲以及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的“总管”角色，被美帝国主义抓去了。

战后，英国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宪兵作用，不只是在自己的殖民地。1945年，当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的时候，英国派遣了十万軍队，包括空軍和舰队，去援助荷兰殖民者恢复对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統治。直到1947年这些軍队才被召回。英国武装力量还支援法

① 参見《Правда о политике западных держав в германском вопросе》(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М., 1959, стр. 77—78。

② 見本书第十六章、第二十五章。

国殖民者在印度支那維持"法制和秩序"。

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严重地削弱了英国对远东的影响。

在战后的初期，英国在近东的地位是有些不同的。那时，英国殖民者在近东的陣地还算是比較巩固的，他們有充分的决心保存自己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地区的統治。英国对这一地区的政策正像对远东的一样，也是为了对付民族解放运动。同时，对于英国有特殊意义的是，要在近东抵制极力企图在这一地区占取英国地位的美国壟断資本。

英国还打算在过去法国的占領地区巩固自己的势力。大战剛一結束，英国就利用駐軍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机会，企图把法国人从那里排挤出去。但是，英国在这里也接二連三地失去了陣地。英法之間尖銳冲突的結局是：在叙利亚和黎巴嫩人民的和世界輿論的压力下，不論是英国的，还是法国的殖民主义者都只好在 1946 年离开这些国家的土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不列顛帝国主义才不得不承认約旦的独立。英国同約旦签訂了条約，該条約允許它在約旦駐軍和建立軍事基地。

在 1947 年和 1948 年英国丧失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权。①

英国在埃及的陣地也岌岌可危。大战結束后，埃及人民立即要求廢除 1936 年签訂的不平等的英埃条約，要求撤出英国軍队。英国殖民者企图武力鎮压埃及人民的解放运动，結果使局势更加尖銳，埃及人民終于在五十年代获得了自由。

英国要想保持反动势力的首脑地位，是困难的，这在 1947 年就已經很明显了。这一年对英国来說是一大关。許多美梦成了泡影，英国上层分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所策划的計謀都破产了。到 1947 年，从美国借来的貸款已花得一干二淨。英国政府原

① 参見本书第十章。

来打算在五年內花完这笔債款，但是一年多就光了。收支逆差危机急剧地尖銳了。造成这种結局，首先是归咎于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因为它需要大笔的国外开支（1946年——五亿三千七百万英鎊，1947年——三亿八千五百万英鎊）。①

同时，英国殖民地人民的斗爭达到了如此規模，以致英国不得不让出并放棄在印度、緬甸和錫兰的政权。

英国政府为了巩固其国內陣地，开始加快进行各种社会改革。在对外政策方面，英国政府开始奉行"有限义务"的方針。也就是說，英国的侵略措施，稍微有所收拣，把扶植反动派、鎮压民族解放运动的职能轉让給美帝国主义者。

要推行侵略的对外政策，就要有巨大的开支，这削弱了英国的經济，使得英帝国主义者把自己在希腊的地盘轉让給美国。1947年2月24日貝文指示英国駐美大使因維切貝尔轉交一份备忘录給国务卿馬歇尔。声称"英国的經济情况不允許它继續单独地对土耳其和希腊提供財政和軍事援助"，备忘录中說，"从4月30日起，陛下政府不得不停止对希腊的一切援助。《政府机关》（«Office»）一书的作者J·康納尔解釋这一行动的原因时写道："国庫坚决地向外交部提出，对希腊的帮助必須立即全部停止。"②

这样，英国实际上是請求美国来承担在此后不久由"杜魯門主义"所規划的角色。英国是"馬歇尔計划"的热烈拥护者，这是不足为奇的。

經过英国政府的努力，1948年3月17日签訂了建立西方联盟的条約。参加这一联盟的有：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1949年4月4日签訂北大西洋公約，实际上并吞了西方联盟。

---

① *G. D. Worswick* and *P. H. Ady*. British Economy. 1945—1950. London, 1951, p. 479.

② *J. Connell*. The Office. London, 1958, p. 308—309.

結果英国被排挤到"小伙伴"的地位。

英国参加西方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更远地背离了它历来所慣用的不参加經常性同盟和尽力保持行动自由的政策。这是由于英联邦的衰弱所造成的。英国已經无法再去推行它的"势力均等"的老政策。后来英国就完全背离了五十年前所开始奉行的路綫。

同美国一道参加軍事集团，让美国来負責扶植和保护希腊、土耳其的反动的反人民政权，一直到向美国政府乞求新的經济援助，这一切都使得英国越来越依附于美国。

对这一点的有力证明，就是1948年7月为了推行"馬歇尔計划"而签訂的英美双边协定。按照这个协定，英国制訂自己的生产計划时得同美国商量，向美国提供經济情报，供应軍事战略物資。

1948年在英国的領土上建立了美国的空軍基地，并配备了用于对苏联进行原子打击的轰炸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之間的經济政治关系虽然更加密切了，但是两国的矛盾也继續加深了。尼·謝·赫魯曉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美国和英国之間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的。英美矛盾牵涉到很多問題。"①

英帝国主义指望从美苏矛盾和冲突中得到好处，因为这不仅会削弱苏联，而且也会削弱美国，从而为恢复英国在国际关系中原有的作用創造条件。弗兰克林·罗斯福在1945年就覚察到了这一点。1945年4月罗斯福曾对自己的（海軍）部长福莱斯特說过："显然英国人力求使美国迟早卷入一場与俄国的战爭"②。1948年丘吉尔在保守党年会上非常詳細地闡明了英国的排美計划。丘吉尔把世界分成"三大区域"之后，并声称："我們是在

① 尼·謝·赫魯曉夫《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总結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頁。

② 《Forrestal Diaries》, p. 37.

每一个区域里都是唯一起重要作用的国家……，如果我們干得高明的話，我們完全有可能重新掌握要害……"也就是企图重新施展英国慣用的外交手法：使其它大国互相对立和冲突，以达到削弱它們的目的。

同时，英国企图重新推行"以他人之手来进行战爭"的政策。他們在欧洲的主要賭注是利用西德。英国及其伙伴一开始就为西德安排了一个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充当打手的角色。

北大西洋集团的軍事力量应該針对誰呢？对这个問題，英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报告的作者做了回答："这将是所預料的一場对苏联的战爭。"①但是由于英国統治集团一貫都是通过别人来进行战爭，所以上述报告的作者在1950年就有这样的看法："根据純軍事观点的邏輯，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說：是要解决——实际上是鼓励——建立一支有一定数量的德国武装力量，并在依靠魯尔区的重工业来把这支力量重新装备起来。"②

这是对和平事业和英国民族利益都很危險的方針。这种方針，从邏輯上来說是以英国为主謀的罗加諾和慕尼黑政策的继續。关于这一点，工党著名活动家安奈林·比万曾写道："阿登納及其支持者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国在內，从心眼里嘲笑关于統一德国的事业，他們继續玩弄老花招，使他們所摆布的那一部分德国轉过头来去反对苏联。这也正是張伯倫希望由希特勒来执行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后果如何，是大家都知道的"③。

1947年是英国政府在口头上所承认的英苏关系正常化的最后一年。艾德礼在1948年1月3日发表的演說表明，英国的領导人把同苏联友好的虛伪声明也抛到一边去了，而且是用一种敌視的語言来讲的。④所以丘吉尔在1948年1月底在众議院讲話的时候也能够肯定地說："首相（艾德礼）和樞密院主席（莫里逊）爵士对

① 《Defence in the Cold War. The Task of the Free World》. London, 1950, p. 74.

② 同上书第78頁。

③ 《Правда о политике западных держав в германском вопросе》, стр. 32.

④ 《The Times》, 4. I. 1948.

苏俄所使用的語言，以及新战爭的危險，就阴暗程度和威胁性来說，远远超过了我自从战爭爆发以来在任何时候就这个問題所表示过的一切。"①

工党領袖在誹謗苏联这件不体面的勾当中特别卖勁。他們甚至通过决議，禁止工党成員参加主張英苏友好合作的英国社会組織的活动。在1951年2月24日苏联政府致英国政府的照会中指出："工党領袖們甚至在战爭結束以前，一俟希特勒德国的失敗已屬显明之时，就立即表現出不安，并急忙采取削弱英国人民与苏联人民間友好关系的措施。"②

英国签訂了反对苏联的布魯塞尔条約和北大西洋集团公約，这是对苏維埃国家的极端的敌对行为，是对1942年签訂的英苏条約的严重破坏。英苏条約第七条明文規定："締約双方承允决不締結反对他方之任何同盟，或参加反对他方之任何集团。"③

苏联政府忠于列宁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共处的原則，一貫坚持同英国保持正常关系，主張通过談判解决一切爭端。英国人民要求英苏关系正常化，虽然有人总想用反苏讕言来毒害它。但是英国政府的行动違反了人民群众的意願。工党党員麦休在1950年写道："近来英国对苏俄的政策与各盟国(应讀作美国。——作者）的政策几乎完全沒有区别。要求同苏俄进行談判——两国政府領导人之間进行談判的建議不断地提出。这些建議已經有力地同社会輿論相呼应……，但是英国政府并沒有为这种輿論所影响，这毫无疑問是做对了。"④

英国統治集团对苏联抱着什么打算，这一点在丘吉尔于1948

① 《Hansard》, 23. I. 1948.

② 参見《欧洲安全和德国問題文件汇編》第1集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198—199頁。

③ 同上书第428頁。

④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0, № 4, p.481.

年10月在保守党年会上发表演說之后，就十分明显了。保守党的这位过于坦率的領袖竟要求立刻向苏联提出如下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消灭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制度；苏联占領軍撤出德国和奥地利；取消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共产主义运动；最后，允許国际壟断資本进入苏联領土，归根到底也就是要資本主义制度在苏联国內复辟，要求苏联放棄独立。丘吉尔說："同苏联和解是不可思議的"，他呼吁西方大国乘"他們拥有原子彈，而俄国共产党人还沒有的时候"①，赶紧发动对苏联的侵略。

这幷不仅仅是丘吉尔一个人的計划。保守党許多活动家以及英国壟断資本的报刊都支持这一計划。在这些集团当中，流行着一种思想：乘苏联和社会主义陣营的其他国家还沒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損失中緩过来的时候，对他們发动一場先发制人的战爭。倫敦方面于1950年写道："十年和平将会大大地增强这个集团的各个国家的威力和稳定。如果在最近发动一場战爭，就能够拖延它們向共产主义方向发展。"②

英国統治集团的这些所作所为当然对英苏关系带来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三、英国在战后初期的对外政策的总結。英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

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外政策，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不仅美国的統治集团，而且英国的国务活动家也是帝国主义陣营的侵略性对外政策的創造人。1946年3月丘吉尔在富尔頓发表演說时說："俄国人比任何人都更讲究实力。"③工

① 《The Times》, 11. X. 1948.

② 《Defence in the Cold War》, p. 12.

③ 《The New York Times》, 6. III. 1946.

党党員艾姆利斯·休斯把丘吉尔在富尔頓的演說称之为“冷战中的第一枪”①。

丘吉尔所制訂的侵略綱領是艾德礼—貝文政府政策的基础。工党正式接受保守党的方針，用来武装自己。在工党的綱領性的小册子《摊牌》中說到：“英国在国际关系中是否能起到有效作用，这取决于它的实力，而不取决于它的对外政策是資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还是法西斯主义的。”② 工党分子遵循丘吉尔所拟定的路綫，因此丘吉尔在1950年說：“我很高兴，我們在对外政策方面是一致的，我們一直走着我在1946年于富尔頓所指出的道路。”③

丘吉尔确实規划一条十分明确的道路。在《摊牌》这本小册子中說：“如果认为溫斯頓·丘吉尔反映保守党政策的話，那末这种政策就是要求在英美之間有一个明确的反苏的排他性同盟。丘吉尔要求与美国結成經常性的联盟，以便反对他所认为的經常性的政治威胁。”④

无論在上面所說过的丘吉尔的言論，还是工党政府的外交行动，都十分有力地证明，工党活动家所許下的願，說什么他們的党在执政后就会实行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等等純系空談。

英国在战后的对外政策显然是缺乏現实主义的，是冒險主义的政策。因此，英国的这种政策尽管某些局部上有了一些成就，但就全面来說，它是破产了。

---

① *E. Hughes.* Winston Churchill. New York, 1957, p. 263—264.

② «Cards on the Table». An Interpretation of Labour's Foreign Policy. London, 1947, p. 3.

③ 引自 *В. Трухановский.*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М., 1957, стр. 14.

④ «Cards on the Table», p.13—14.

英国虽然同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結成了联盟，但是它沒有达到其反苏目的，沒有能够阻止欧洲和亚洲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沒有能够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当然，更沒有能够防止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最大失敗。

英帝国主义者在其原来的領地和势力范圍內也受到了极大的挫敗。英国沒有能够保住自己在亚洲的殖民帝国。印度、巴基斯坦、錫兰、緬甸等国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些在战后头五年內所发生的事件，意味着世界帝国主义，其中包括英帝国主义在远东的陣地大大削弱了。一种悲观和恐惧的情緒流露在英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在1950年所写的著作里。在这本书里說到："有一种新的威胁，不仅威胁着亚洲政局的稳定，而且威胁着西方大国在制訂經济恢复計划时所指望的市場和原料来源。"①

1947年英国把对希腊和土耳其的"責任"轉給美国，这标志着英国政策在地中海东部的破产。英国取消了对巴勒斯坦的托管，承认約旦的独立，这又证明英国在近东的失敗。这一切也是英国政策在后来在这一区域遭到惨敗的預兆。

英国統治集团本以为同美国結成联盟，就会使他們有可能巩固自己的經济和保存自己的殖民統治，但是一切打算都成了幻想。事实证明，英美联盟既沒有保住英帝国的殖民統治，也沒有提高英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仅如此，这一联盟反而使英国在政治和經济上更加依附于美国，并使它降到作为美国"小伙伴"的地位。英国外交大臣于1950年3月28日在众議院宣布："我們不听取盟国意見而独立制訂自己政策的时代已經一去不复返了。"②

英国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是反对进步思想，目的在

① «Defence in the Cold War», p. 7.

②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0, № 4, p. 478.

于破坏社会主义和加强資本主义。就是英国工党的政治家也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思想的巨大威力和这种思想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麦休指出："今天，世界力量的平衡，不是仅取决于手中的武器和口袋中的金錢，同时也取决于人民头脑中的思想。"① 英国国家机器加紧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工作，他們花了很多資金去进行反苏反共的宣傳。但是英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承认：在爭取人心的战斗中他們是不能取胜的。英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报告中指出："經过广泛討論之后，作者們得出了一条結論：政府及其所建立的国际机构，在保证思想斗爭的胜利方面是无能为力的。"②

工党政府对外政策的失敗也給国家造成了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严重損失。与此同时，以巨大的开支去推行侵略政策，也給英国的战后經济造成了困难。

英国人民中的进步人士为反对这一反动的对外政策展开了积极的斗爭。这也是这一政策必然破产的重要因素之一。

英帝国主义的战后对外政策由工党来执行，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迷惑了人民群众。因为他們不会設想工党会执行实质上是保守党的外交政策綱領。因此，工党在执行这一政策时所遭到的抵制，比起由保守党人自己公开执行这一政策所能遇到的抵制要小得多。但是，尽管英帝国主义者获得了如此重要的条件，反对这种对外政策的斗爭在英国仍然是剧烈的。

某些工会和劳动人民的群众大会或集会所通过的各項决議，非常鮮明地說明了英国工人对艾德礼—貝文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行动所持的态度。

1946年，电气工人工会为职工联合会年会起草的决議案中提到："本届年会对政府对外政策的某些方面感到严重的不安。我們看到，政府对希腊所采取的政策，巩固了該国反动势力的地位，为君主制的复辟創造了有利

①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0, № 4, p. 482.

② 《Defence in the Cold War》, p. 108.

条件，并导至了对进步力量的鎮压。在西班牙继續同佛朗哥将軍保持經济与外交上的联系，为保存法西斯制度提供了便利。在德国，波茨坦协定遭到違反，国家的統一沒有实現，民主机构和經济监督沒有建立。苏英关系在最近十二个月以来恶化了，原因是政府的政策使英国在經济上依附于美国資本，同时又推行英美称霸和孤立苏联的政策。我們认为，这一切都是极端危險的。"① 虽然年会沒有通过这項决議，但是职工联合会的二百四十四万会員的代表投票贊成②，最有組織的、最开明的和自覚的工会都給予支持。

英国工人坚决要求英苏关系的正常化。1949年2月，兰开夏和切郡的英苏友协和工会委員会在曼彻斯特联合召开会議，会上通过的声明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情况。与会者以九十五万英国工人的名义强烈地要求和平，要求同苏联友好。

1946年11月，七十名工党代表对女王的演說提出了指正，要求改变政府的对外政策。1947年4月和1948年12月，許多工党代表反对政府的兵役政策③。在工党議会派中形成了一个由几十名代表参加的集团，这个集团就政府的主要对外政策問題提出了批評。

政府对外政策在工党議会派中遭到的抨击，比来自保守党反对派的批評要厉害得多。M·菲茨西蒙斯指出："保守党人欢迎貝文，是为了感謝他保护了英国的（帝国主义的。——作者）利益，虽然保守党人的支持有时也使貝文与其本党的关系复杂化。"④

在保守党內也有一部分人反对工党政府所奉行的政策，尽管在人数上比工党內反对这种政策的人要少得多。这是些拥护所謂"皇家政策"的人，如比維尔布魯克勛爵、利奧波特·埃默利和其他等人。他們懂得，采取听从美国統治集团摆布的政策，对英国的皇家地位会起着破坏作用。

---

① «Labour Monthly», December 1946, p. 368.

② 同上。

③ 参見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тр. 545。

④ *M. Fitzsimons.*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 1945—1950, p. 28.

在反对工党政府的反动对外政策的斗爭中，保卫和平的运动起着巨大的作用。1949年7月成立了英国保卫和平委員会，其成員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出席第一次英国保卫和平大会(1949年10月)的有来自四百个不同組織的一千零九十名代表。

英国共产党是保卫和平的先鋒。共产党一貫坚持揭露艾德礼—貝文所执行的帝国主义对外政策，指出这一政策是对和平事业的敌視，是对英国人民切身利益的敌視，号召劳动人民团結起来反对这种政策。

共产党在1949年5月1日发布的宣言中提出号召："紧密团結，起来勇敢地呼吁和平，起来要求立即大量削減軍事开支，要求把我們的士兵从希腊、馬来亚和中东撤回来……美国兵撤出英国去，恢复我們的独立自主。反对北大西洋公約、布魯塞尔条約和英美战爭玩火者的一切其他侵略措施。加强联合国，忠于英苏条約，爭取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貿易。大家要知道，和平和进步的力量大于战爭的力量！"①

現行对外政策的性质以及它对国家經济状况和英国的国际地位的有害影响日益明显，因此英国人民反抗这种政策的声势越来越大。

英国在1945年到1949年期間內的对外政策及其后果，证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对这一情况发生影响的，当然是英国的資本主义由于資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而日趋衰弱。但是，为了实現反动的和侵略的目的而同美帝国主义結成联盟，这种方針也是起了作用的。总起来說，英国的大国地位动摇了，它只成了美国的"小伙伴"。

美国公开地說，已經不能再把英国看成是一个强国了。M·菲茨西蒙斯在总結1945—1950年英国对外政策时有一个典型的說法，他写道："英国在战爭中贏得了胜利，却失去了自己的强国地

① «Daily Worker», 1. V. 1949.

位……英国的兴趣虽然广到全世界，但它并非世界强国。"①

但是，这种看法也反映了对英国的估价不足。在战后的头几年，为恢复自己在世界經济中的地位英国曾經进行了頑强的斗爭，而且也确有成效。在 1945 年到 1949 年期間，在政治和經济方面，英国仅次于美国，居于資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英国仍然是一个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它的工业生产在資本主义世界中占第二位。英国在世界貿易中的作用也是巨大的。它的海运能力虽然比美国小了，但它仍不失为强大的海运国的地位。

大英帝国殖民統治的沒落大大削弱了英国在国际上的陣地。这对英国有巨大的影响，因为它是依靠联邦成員国的人力和物力資源的。但是英国仍是英联邦的經济和財政中心。因此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作用比它这个拥有五千万人口的島国本来所能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所以說，尽管英帝国主义处于日益衰落的阶段，但它在 1945 年到 1949 年間还保留着能够对世界政治起重要作用的大国地位。但是这些机会都未被利用。毋庸置疑，如果工党政府能实現 1945 年拥护它上台的广大劳动群众的期望，即执行进步的和平的政策的話，那末英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将得到不可估量的提高。英国本来可以大大地巩固它的工业、貿易和海运强国的地位，如果利用各种条件扩大同社会主义各国（社会主义国家的計划經济高速度地发展着，那里的人們不懂得什么是經济危机）的經济联系的話。

---

① *M. Fitzsimons.*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 1945—1950, p. 28—29.

第十六章

法国在1945—1949年期間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

一、从战爭过渡到和平期間的法国

在战爭結束的时候，法国的国际地位是相当不稳定的。由于英国，特别是由于美国的立場，反希特勒联盟的各大国都不承认由戴高乐組成的法国临时政府。直到1944年10月23日，由于苏联政府的坚持才給予承认。突出的是，美国表示承认的时候却附带了一条可以撤消承认的保留条件①。

法国的国际地位之所以軟弱是由許多原因造成的。法国自从在1940年被占領以来，就已經不再是一个多少还有一点軍事力量的大国了。法国資产阶級的一部分已經开始与占領当局合作。誠然，到后来"战斗的法国"的力量，特别是法国的抵抗运动，对共同的斗爭也作出了重要的貢献（指1944年抵抗运动的武装部队牵制了希特勒十二个师而言）。不管怎么說，法国的努力不仅根本无法同苏联的决定性行动相比，甚至也不能同作用較小的英美两国相比。在領导反法西斯斗爭和决定对德宣战或媾和問題的大国当中是沒有法国的。美国和英国的統治集团反对法国参与解决和平安排問題。对于法国来說，問題是要首先取得战后大国的地位。

法国在經济上极其困难，这也是法国国际地位軟弱的一个原因。由于法西斯的掠夺、战爭破坏和經济工作的紊乱，在1944年

① «L'Année politique 1944—1945». Paris, 1946, p.52—53.

秋季，工业生产指数只有1938年水平的20%；农业产量比战前少了一半。三分之二的运輸工具不能使用了。对外貿易实际上停止了。国家的財政陷于困境。

法国解放后，反动势力立即与抵抗运动中的右翼相勾結，对在战后影响急剧增长的各民主組織展开了斗爭。共产党通过反法西斯的英勇斗爭，在人民中获得了空前未有的高度威信，其党員已由1937年的二十四万人增加到1945年的九十万人。这使得它在建立民族陣綫——群众性最强的抵抗运动組織——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与共产党合作的还有包括五百万会員的总工会。

共产党人要求在全国抗战委員会的基础上成立临时政府。但是戴高乐集团、人民共和党和社会党却把这一委員会变成了戴高乐政府下的一个諮詢机构。他們竭力不让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只让抗战运动中的右派参加。

临时政府竭力阻撓，不让抗战运动的武装力量成为法国軍队的核心，把它們解散了。临时政府还取消了由抗战运动的各个組織随着全国的解放而成立的爱国民警队。反动派企图保留和恢复旧的国家机构。

为了在法国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展开了一場尖銳的斗爭。戴高乐集团妄想建立"总統制"共和国的独裁制度。但是在全国解放后的第一次制宪会議的选举中，共产党取得了五百万零四千張选票，有一百五十二人当选。这证明了民主力量的巨大影响。在大选后組成的政府中，共产党人取得了六个部长席位，而过去只占二位。1946年1月，在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間达成了关于在爭取通过民主宪法的斗爭中共同行动的协議，这促进了反对建立独裁制的力量的增长。反动派在1946年1月发动了新的攻势，戴高乐最后通牒式地宣布辞职。但是这一套把戏并沒有成功：在以社会党人古恩为首的新政府中，共产党人取得了六个部长席位。

由于国内民主力量的空前壯大，实现了一些重要的进步的改革。許多大壟断資本的企业和某些銀行都收归了国有。这首先触犯了在战爭期間主張附敌的那部分資产阶級的利益。此外，还采取了一些重大的社会措施，如恢复了每星期四十小时的工作制，假日照常付薪；扩大了企业中工人代

表的权利，增加了多子女职工的补助費和养老金等等，法国工人阶級爭到了比較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1946年通过的宪法中肯定了劳动人民的許多斗爭果实。

在当时为統治集团公开支持和承认的抗战組織的各項綱領性文件中明确承认有必要根本改变对外政策。

在1947年以前，法国实际上是处于由英美帝国主义集团建立的侵略集团之外的。法国的这种立場是由于战爭結束时在其国內形成的阶級力量对比的結果。

战爭表明，与苏联結成联盟对法国的安全具有多大的决定性的意义，輕視这一联盟，又会带来多么有害的后果。在战爭期間，所有拥护抗战运动的人，都坚决要求同苏联恢复盟約。苏联在粉碎德国，自然也就是在解放法国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苏联在战爭时期对法国民族解放委員会的一貫的政治支援，这一切在法国引起了空前未有的对苏友好的高潮。法国統治集团也懂得，同苏联締結同盟条約，就会在决定性程度上协助巩固法国的国际地位。

1944年11月，临时政府主席戴高乐在与苏联駐法大使的談話中表示願意訪問苏联，以便同苏联政府的領导人建立接触。作为对这种表示的回答，苏联政府邀請了戴高乐将軍訪苏。

1944年11月21日到22日，諮詢会議举行了法国解放后第一次对外政策辯論，这次辯論几乎整个是有关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談的問題。外交部长皮杜尔說，他认为莫斯科之行"对于法国的未来，对于世界和平和安宁都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①。諮詢会議中的抗战运动的各政党和集团的代表一致主張与苏联签訂同盟条約。

1944年12月2日，法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与苏联政府

① «Journal Officiel», 22. XII. 1944, p.309.

举行了談判。戴高乐将軍在同苏联領导人的談話中說到："发生了許多重大的事件，法国人了解了許多事情。法国人理解到，如果沒有苏俄将会如何"。戴高乐认为，"法国遭到不幸的原因，是法国沒有和俄国在一起，沒有和它訂立协定"。法国政府首脑强調說，苏联和法国是"德国的邻居，所以都处在它的威胁之下。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①。戴高乐建議締結同盟互助条約。苏联政府完全諒解法国人所表示的意見，同意締結条約。

但是，由于法国对当时卢布林的波兰民主政府所采取的立場，在談判中产生障碍。法国政府不承认这个政府，而同流亡在倫敦的反动"政府"保持联系。苏联建議法国承认卢布林政府，因为如果在波兰沒有一个友好的民主政府，苏联当然不可能保证法国的安全在将来不受德国的侵犯。战前的波兰沒有这样一个民主政府，这实际上促进了 1935 年苏法条約的撕毁。在莫斯科談判中，戴高乐同意与波兰的民主政府互換代表，但同时又与倫敦"政府"保持联系。

1944 年 12 月 10 日在克里姆林宮签訂了苏法同盟互助条約。法国和苏联双方承担义务"共同把对德战爭进行到底"。双方表示坚信，只有在法苏之間实行"紧密合作"，才有可能在牢固的基础上恢复和平和保持将来的持久和平。两国承担义务"共同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消除来自德国的任何新威胁，共同阻止所有能够使德国任何新的侵略企图成为可能的行动"。締約双方还承担了义务不締結任何反对另一方的同盟，不参加任何反对另一方的联盟②。

苏法条約本来可以成为战后保证欧洲和平的重要基础之一。执行这一条約，是能够可靠地保证双方免受德国重新侵略的危險。

---

① «Совет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М., 1959, стр. 340.

②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I, стр. 327, 329。

法国輿論热烈欢迎苏法条約的签訂。所有法国的报紙，无例外地都表示了贊揚。

1944年12月21日，在諮詢会議上討論了批准条約的問題。所有的发言人一致表示欢迎这一条約，大家都认为同苏联合作对法国的安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社会党主席安德烈·菲利浦說：法苏条約使法国得到了"多少年来在国际会議和国际談判中一直苦心寻求的安全"①。

諮詢会議的議員們都承认，同苏联締結条約标志着法国国际地位的大大巩固。著名的法国活动家保罗·彭古在向政府表态时說到："你們給我們带来了很好的新年礼物。这个条約标志着，法国又重新成了一个大国，而同它結成联盟的又是一个最大的大陆国家。"②右翼集团代表安德烈·繆泰尔表示，法苏条約是"法国复活强大"的公开证明。③所有的发言人都譴責了法国在战前所采取的破坏苏法联盟的錯誤方針。他們指出了盲目执行反共政策对法国的危險。保罗·彭古說："在布尔什維克主义面前吓得魂不附身，这是我們的錯誤和不幸的原因之一。"④

戴高乐将軍在发言中指出，"在两次大战期間，在巴黎与莫斯科的关系問題上采取动搖和不信任的政策，以及在决定性时刻破裂关系，这为恢复来因河上的軍事力量、侵占奥地利、奴役捷克斯洛伐克、粉碎波兰、希特勒入侵法国的准备，以及一年后进攻俄国等創造了条件。"⑤

战爭結束时，法国对外政策中的中心問題是法国能否在各大国当中取得它的应有地位。1944年签訂的法苏条約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法国回到大国的行列中来。苏联还通过其他活动帮助了法国。例如，1944年11月，在苏联的坚持之下，抵制了英美的反对，邀請了法国参加欧洲諮詢委員会，并作为它的第四个常任委員

① «Journal Officiel», 22. XII. 1944, p. 591.
② 同上书第583頁。
③ 同上书第590頁。
④ 同上书第583頁。
⑤ 同上书第595頁。

国。这一事实对法国逐步获得同其他三大国所拥有的同样权利是有决定意义的。

根据大国首脑克里米亚会議的决定，法国获得了可能与苏、美、英等国一道积极参加战后的安排工作。会議决議中有关对德占領的条款中写道："已經商得同意，法兰西如果願意的話，三国当邀請它承受一个占領区，并参与管制委員会，作为第四委員。关于法兰西所占領区域的范圍，将由有关四国政府共同商定……"。①会議通过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的結尾說道："三国表示希望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所建議的程序下予以协作。"②

1945年2月法国政府要求美、英、苏三国解釋在克里米亚所討論的若干問題。在这之后，它正式表示贊同克里米亚会議的决定。

1945年上半年，法国获得了其他各大国所享有的各种权利。5月8日，法国代表参加了关于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5月末，法国同其他三大国以同等身份参加了对德管制委員会。6月5日法国代表和其他三大国的代表一起签訂了宣布德国战敗的宣言。1945年6月6日签訂了关于占領德国的协定。协定中也为法国划分了占領区，其条件是与其他三大国相同的。在这一期間內法国还参与了各大国共同协商的其他事宜。

法国虽然沒有参加波茨坦会議，但是波茨坦协定完全符合法国的利益，协定中对于法国在各項重大問題上的权利还专門作了說明。

然而，在这之后法国却对波茨坦的各項协定采取了特殊的立場。1945年8月3日皮杜尔就剛剛閉幕的波茨坦会議問題向苏、美、英三国大使提交了照会。照会中說到："法国政府感到遺憾的是，虽然它从1944年11月起就是欧洲諮詢委員会的成員国，但是有关德国問題的各項重要条款却在沒有法国参加的情况下制訂的。

① 《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6頁。

② 同上书第3頁。

"法国政府同意波茨坦公告所提出的关于占領德国的宗旨，但是它又认为，在目前来解决在德国全境恢复各政党和建立德国的中央行政机构的問題为时过早。法国政府一方面在原則上不反对在奥得—尼斯河以东的地区建立波兰的行政机构，同时又认为，关于德国的边界問題只有經过一切有关国家的共同研究才能全部解决。"①

法国贊同波茨坦的各項协定是有許多重要保留条件的。后来的事件表明，法国提出这些保留条件并不是偶然的。这些条件的出发点是不願意德国問題获得民主的解决。这种立場也不符合法国本身的利益，因为波茨坦协定的执行将使法国有現实的可能来彻底解决对法国历来存在的德国侵略問題，并且可靠地保证它的安全。

二、战后的法美关系和法英关系

在法国剛解放的时候，美国駐軍对維护資产阶級政权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后，法国壟断資本开始投靠美国，把美国看作为在国际舞台上和在国內反对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支柱。美国壟断資本在經济、政治和軍事等各个方面援助了法国帝国主义。

在战后的头几年，关于由美国提供援助和貸款的各种协定在法美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

1945年2月28日签訂了法美租借协定。美国承担义务对法国供应十六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原料和粮食，以及九亿美元的工业設备。此外，美国还要向法国供应十亿美元的商品，以偿还法国对美軍的供应和对美国提供各种服务。法美租借协定在当时对于法国在对外貿易上投靠美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5年8月法美之間签訂了战后第一个由美国对法国提供貸款的协

① 《L'Année politique 1944—1945》, p.282.

定，于是法国得到了五亿五千万美元的貸款。当时报界指出，提供貸款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反动派在战后不久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的地位。在研究提供貸款的談判中，美国力求取得在法国的某些殖民地建立軍事基地的权利。杜魯門总統当时就要求戴高乐将軍排斥共产党人参加政府。

美国为了使法国在对外政策中失去独立性而采取的下一个重要步驟是1946年5月28日在华盛頓签訂的法美財政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取消了法国四亿二千万美元的軍事債务，同时又对法国提供了三亿美元的貸款，以购买美国留在法国的剩余軍事物資。这两个协定都是首先对美国有利的。假如法国把自己的商品运入美国，以偿还貸款，那就会触犯美国壟断資本的利益。至于剩余軍事物資，如果美国把它們运回去的話，那么运費比这些物資的价值还要高。根据华盛頓协定，美国进出口銀行也对法国提供了六亿五千万美元的貸款。但是，为此法国政府却得放棄战前的关稅特惠政策，不得再用限制进口的办法来保护本国的工业。法国的国內市場为美国物資广开銷路。

华盛頓协定是在1946年6月2日第二次大选的前夕签訂的，显然是为了对这次大选給予影响。在华盛頓进行談判的是列昂·勃魯姆。法新社記者写道：勃魯姆与美国財政部长溫逊談話的时候，对方“正式要求勃魯姆去使社会党人配合反共联盟，以便排斥目前在法国議会中占有重要席位的共产党人”①。

《紐約时报》在評論美国对法政策时写道：“如果美国不利用自己的强大和資源来鼓励法国的中間派和自由派人士，不去建立一种不仅对法国的未来，而且对美国的未来也同样有决定意义的制度的話，那眞是愚蠢和不可思議的近視”②。

至于外交上的具体做法，美国是使尽一切办法，把法国拉进西方国家的反苏陣綫。

当时，法国政府的立場还同英美的立場稍有不同。1945年11

① *А. Верт.* Франция. 1940—1955. Сокр.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9, стр. 275.

② «The New York Times», 31. V. 1947.

月22日戴高乐将軍提出的法国的基本对外政策路綫是："我們的国家多少年来就是东西方兼顾的，就其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現有地位来說，它能够而且願意成为二个世界之間的紐带，但是无論如何也不充当走卒。"①

可是美国的对法政策正是要它成为反苏陰謀中的走卒。美国采取了种种施加影响的手段：以"共产主义侵略"的威胁进行訛詐、財政施舍、同意让出薩尔区等。这些手段一步一步地影响着法国的政治路綫。例如，在巴黎和会上，法国代表在一系列問題上公开地同由美国所糾集的反共多数結合在一起。

为了掩飾法国政策中的轉弯，法国报刊大肆喧嚷，說什么苏联已經改变了对法国的态度并开始执行敌視法国的政策。針对这一情况，在1946年8月《眞理报》写道："苏联对待法国的态度并沒有任何变化。大家都知道，这些关系是由苏法同盟互助条約所規定的。大家也都知道，苏联忠实地一貫地遵守着他們所签訂的条約和协定……某些法国报紙关于苏联改变对法国态度的捏造是毫无根据的。"②实际上，是法国本身的政策有了明显的改变。

在法国战后的对外政策中，同英国的关系問題占有重要地位。与这个国家締結軍事政治同盟是法国近十年来的一貫路綫。但是，在战爭結束的时候，英法間的"衷心一致"已經处于飄搖的状态。在整个战爭期間英国极力削弱法国的地位。英国一直想把法国从其許多殖民地中排挤出去。英法之間的冲突实际上并沒有停止。这一情况到战后也沒有改变。关于英国当时对待法国的态度，可以从丘吉尔1945年5月12日致杜魯門电中的話得到证明："法国人是衰弱的，同他們共事是困难的"③。

---

① *Ch. de Gaulle.* Discours et messages. 1940—1946. Paris, 1946, p. 707.

② 1946年8月21日《眞理报》。

③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VI, p. 498.

1945年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发生了极为尖銳的英法冲突。1945年1月，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府要求法国兌現它于1943年宣布的諾言：承认这些国家的独立。法国接着就作了回复，說法国仍将保持对叙利亚和黎巴嫩軍队的监督，并且一定要"維持秩序"。新的法国軍队接着被派往叙利亚和黎巴嫩。到5月末，法国占領軍和这些国家的人民之間开始发生武装冲突。

5月30日英国政府要求法国停火并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政权轉交給英軍司令部。5月31日丘吉尔在給戴高乐的信中宣称，他已命令中近东的总司令干涉这場武装冲突。他要求法国軍队立即撤走。

1945年7月2日，戴高乐說，叙利亚和黎巴嫩事件是英国顛覆活动的結果。戴高乐被迫同意举行談判来解决冲突。談判延續了一年多，法軍終于撤出中东各国，这是英国积极促成的。

战后英法两国在經济方面也发生了尖銳的矛盾。英国想尽一切办法来利用法国战后的經济困难。这首先造成了两国对外貿易上的极端不平等的状况。法国在这次貿易中受了巨大亏損。1946年它是英国商品的头号买主，但在供应对方商品方面却名列第十七位。

法国的財政債务不断增多。1946年法国欠英国四千万英鎊。1946年2月底英国拒絕同法国重訂財政协定。这一步驟实际上是完全停止英法貿易并使法国陷于十分困难的地位。在后来的談判中英国不同意法国推迟归还債款。最后达成的协議規定了十分严格的限期，并用黃金和外汇来偿还債务。《世界报》写道，"英国提出的无理条件"和"英国拒絕向法国貸款"①，在法国引起了震惊。

1946年9月法国政府得以和英国签訂了新的財政协定，根据这一协定，这些債款可以在十二年內分期归还。但是这笔債款并未減少，因为在英法貿易中法国仍旧有支付逆差。1946年11月签訂的新的貿易协定，事实上并未緩和法国的窘境，它与英国的貿易平衡仍旧是逆差。

英法之間在德国問題上也存在着严重的矛盾②。这些矛盾的主要焦点是魯尔区問題。

① «Le Monde», 14. V. 1946.

② 参見本书第十八章。

1946年，由于法国在一切主要对外政策問題上开始滾到英美集团的立場上去，英法矛盾才略有緩和。1946年3月24日，法国政府首脑，社会党人菲力克斯·古恩提議締結英法同盟条約。4月3日英国外交部长貝文也主張与法国締結条約。4月与法国政府举行关于締約問題的談判。

法国政府的代表揚言，草拟中的条約应該成为对1944年法苏同盟互助条約的补充。諸如此类的言論无非是为了掩飾法国背棄法苏合作，轉到英美集团立場上去。实际上，法国統治集团是从法英条約中找到了代替法苏条約的工具和建立反苏的西欧联盟的道路。

2月16日正式举行締約談判。1947年3月4日于敦刻尔克签訂了条約。条約中規定，任何一方遭到德国侵略时另一方应立即給予援助。締約双方决定在出現德国威胁的复活标志或德国不履行由于战敗而必須承担的經济义务时进行协商。条約規定，"为了提高两国的福利和保证安全"，法国和英国經常协商有关經济方面的問題。条約的有效期为五十年①。

这一条約从形式上看具有反德傾向，而实际上它的隐秘含义是在于：为筹划西方国家的反苏集团創造一个准备条件。以后的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一点②。

三、法国政策中的德国問題

法国的帝国主义集团在战后立即提出了一个同波茨坦协定根本对立的解决德国問題的綱領——所謂"德国实行联邦制"綱領。他們建議把德国分割成为几个独立的国家，并且打算控制其中的

① «L'Année politique 1947». Paris, 1948, p. 485.

② 参見本书第二十五章。

一部分。他們坚持把鲁尔区和来因河左岸的土地从德国划出来，并入法国版图。

法国統治集团的代表声称，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保证法国的安全和解决德国問題。实际上分治德国只能培育并助长德国反法的复仇精神。来因河界——这一条所謂"天然疆界"，在当今自然也不能保证法国的安全。要确保安全，就必須消灭德国軍国主义的基础——大壟断資本和反动的容克地主。但是法国的对外政策却忽視了这一任务。

法国提出的分割德国許多領土的綱領直接違背波茨坦协定。法国在其他問題上也違反了波茨坦协定。由軍队和外交机构中的最反动的分子所組成的法国占領当局，在惩治战犯、肅清納粹和德国民主化方面起了破坏作用。

法国壟断資产阶級对德国問題的基本政策是力图从德国得到新的領土，但是这种企图違背美国壟断資本复活德国帝国主义的方針。于是，法国在外交上施展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其盟国施加压力。在管制委員会的会議上，法国代表反对有关德国全国性的任何措施，特别是反对建立德国的中央行政机构。

法国当局的这种策略手段对于美国和英国是十分有利，使他們能够借助别人的手来破坏以民主方式解决德国問題。前美国駐德司令刘·克萊将軍在《德国問題的解决》一书中承认法国这种政策对美国是有利，他写道："幸而，法国的否决权障碍了我們去建立一个充当共产主义工具的机构"①。

1946年中，法国破坏政策也开始妨碍英美統治集团。在这个时候他們已經公开采取分裂德国和单独成立西德国家的政策。英美的占領区也开始实行合并。法国起初曾拒絕参加占領区的合并，

① *L. 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p. 40.

并单独保持了他的占領区。可是这样作严重地妨碍了英美措施的效果。美国和英国决心要把法占区合并过来。于是他們改变了在薩尔問題上的政策，开始支持（虽然带有保留条件）法国对薩尔区的野心。前美国国务卿詹·貝尔納斯在《說老实話》一书中写道："我希望，法国人在占領区合并問題上能够贊成我們。这也是我所以公布我們对待薩尔区的决定的原因之一。"①

为了对法国施加压力，还采取了其他手段。美国和英国迟迟不把德国的煤供給法国，从而在法国国內引起了严重的煤荒。他們还采用时而拒絕，时而接受法国向美国提出的貸款請求的办法来左右法国的政策。他們采取了一切手段逼使法国統治集团放棄自己在德国問題上的政策，爭取法国贊同美英政府的各項政策。

1947年召开的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議是法国战后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分水岭。在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議初期，法国本身提出了基本上还同过去一样的綱領。法国外交部长皮杜尔談到法国决不許德国軍国主义复活的决心。但是所有这一类的声明都是冠冕堂皇的空話而已。至于問題的具体解决，法国代表則主張修改波茨坦协定，从而破坏了最現实的、眞正能防止德国軍国主义复活的綱領。他們依然主張德国实行"联邦制"，主張把来因河左岸地区从德国分出来，主張魯尔区国际化。法国特别坚持地要求把薩尔区并入法国并要求魯尔区对法供应煤。

除薩尔問題外美国和英国反对法国的所有要求。

苏联当时提出了一項全面的綱領，如果采納这一綱領，将会永远保证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不受德国侵略复活的威胁。苏联坚决支持法国提出的关于供应魯尔煤的要求。苏联代表建議，魯尔煤可作为賠款供給法国。苏联代表支持法国提出的监督魯尔区的建

① *J.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New York, 1950, p. 197.

議，并指出，鲁尔区只由美国和英国监督、而法国和苏联被排除在监督之外的情况是不正常的。当然，当法国建議与波茨坦协定相抵触时，苏联就加以拒絕。法国和苏联的立場尽管有这些分歧，但在有关德国的重要問題上法苏立場是吻合的。法国代表如果在这些問題上同苏联一道，本来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摆脫孤立状态。然而，法国統治集团却一味遵循反共意图，違背法国民族利益，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在四外长会議的背后，美、英、法三国外长进行了秘密談判。1947 年 1 月 19 日他們达成了法—美—英关于煤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鲁尔区将逐步增加对法国供应煤。但是，协定中最主要的是英美第一次正式明文同意把薩尔区从德国分出来并在經济上归法国管轄①。报刊也透露，协定中尙有秘密的政治条款，根据这些条款法国在对待苏联的一些重大問題上必須与美英一致。

在三国签訂片面协定之后，法国代表就放棄了自己过去关于鲁尔区国际化、賠偿和其它等要求的提議。总的来說，这一协定是法国外交上的巨大失敗。为了一些十分可疑的暫时性的让步，法国竟然在对德的主要問題上放棄了独立政策。这一片面协定削弱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也是法国陷入美国政治集团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莫斯科四外长会議上，法国代表坚决拒絕法苏合作。美国杂志《新聞周刊》写道："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对苏联态度的改变被认为是莫斯科会議最杰出和最光輝的一个成就。"②

为了掩飾在德国問題上的轉变，法国統治集团利用了 1947 年 11 月到 12 月在倫敦召开的四外长例会。法国外交路綫就是企图证明苏联对法国采取了"頑固态度"，使它"不可避免的"走英美

① «L'Année politique 1947», p. 75.

② «Newsweek», 21. IV. 1947.

路綫。

尽管苏联在会議上提出的許多建議都符合法国原来的要求，法国人却不加支持。他們与英、美代表一起拒絕就对德和約問題进行实质的討論。法国与美、英签訂了一項在原則上規定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的协定。

在倫敦会議的紧張关头，美国国务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訪問了巴黎，并与法国政府和各資产阶級政党領袖們进行了談判。12月5日他在記者招待会上說，在这次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的会談之后，已經沒有任何"巨大的障碍能够在德国問題上把两国政府分开"①。

12月16日，即四外长倫敦会議結束后的第二天，皮杜尔在記者招待会上則說，法国可能要把自己的占領区与双占区合并。这个問題是在杜勒斯赴巴黎会談中及倫敦会議期間西方三国外长单独的秘密会議上解决的②。

1947年法国实現了所謂"在經济上"把薩尔区合并到法国去的措施。法国統治集团企图把这說成是对法国同意合并占領区和放棄对德問題独立政策的一种最珍貴的抵償。但是，薩尔区的合并仅仅符合于法国大壟断集团的利益。1947年在薩尔发生的事件令人信服地証明了这一事实。法国統治集团建立了"薩尔自治国"③。

10月14日議会通过了薩尔宪法并于1947年12月17日付諸实行。宪法的序言中規定薩尔并入法国。宪法宣布薩尔从德国划分出来，它的对外关系与防务由法国管理，并把最高权力交給法国。

法国在德国問題上投降美国的道路，第一步是四外长莫斯科会議，第二步是1947年末的倫敦四外长会議，第三步是倫敦的片面会議。

---

① «Le Monde», 6. XII. 1947.

② *L. 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p. 176.

③ *J. Dircks-Dilly.* La Sarre et son destin. Paris, 1956, p. 143—155.

虽然法国統治集团已經为在德国問題上的让步打开了一条大道，但是在倫敦会議上仍旧暴露了法国和美英集团之間的严重意見分歧。这在监督魯尔区的問題上表現得特别尖銳。法国已經不是用过去的方式来提出这个問題，也就是不再要求在苏联的参加下进行眞正的国际监督。它只不过是希望自己得到与美、英共同监督魯尔的权利。

按照美英的計划，只能监督魯尔区产品的分配，而法国則要求监督它的生产。法国还反对在单独的西德国家实行过分的集权化。但是在主要問題上，法国代表是贊同美英計划的。《紐約时报》曾写道："虽然法国代表贊同英国人和美国人，但法国的国內政治情况和法国公众輿論却約束着他們。"①

倫敦会議末期，法国实际上在所有問題上都妥协了。法国代表只是爭取使会議的决議尽可能是不肯定和模糊的。在6月7日公布的会議"建議"的条文中有这样一条：法国同意西德在与其他参加国相同的基础上参加"馬歇尔計划"。对魯尔区的监督只是在产品分配方面，而不是法国所坚持的监督生产。在"建議"中提出了关于建立西德国家的原則。法国提出的关于联邦制的要求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得到了考虑②。

倫敦会議决議在法国的广大公众輿論中引起了不滿。共产党发表了反映法国人民抗議的声明。声明中說："法国政府在倫敦会議上沒有維护眞正的民族利益，竟同意首先重建西德。政府放棄了德国应該付給我們的賠款，它把同德国訂立同盟的意图置于重建法国之上，它助长了德国的軍事力量的复活，使国家的安全受到威胁。"③

---

① 《The New York Times》, 17. II. 1948.

② 《L'Année politique 1948》, Paris, 1949, p.400—403.

③ 《L'Humanité》, 9. VI. 1948.

法国在德国問題上完全站到英美立場上，这恰好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結合起来了。在西德打开了复活德国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的道路。

四、法国与帝国主义国家軍事政治集团的形成

1947年5月4日由于通过社会党人实行反动阴謀，共产党的部长离开了政府。他們参加政府不仅对国家的对内政策，而且对它的对外政策，也具有巨大的影响。右翼势力不得不考虑让积极捍卫法国民族利益的共产党代表留在内閣中。資产阶級和社会党的領袖們采取了种种办法才在对外政策中推行了自己的路綫。共产党人参加政府阻撓了法国公开参加美国所糾集的政治和軍事集团。

在1947年召开的法共中央全会上莫里斯·多列士指出："我們参加政府，就可证明法国的政策是完全独立的。反之，把我們从政府中排除出来，只表明法国及其当前的执政者依附于美国。"①

至于美国，他們立即对法国資产阶級加以酬劳，酬謝这些对美国有利的行动。1947年5月7日，法国从国际复兴开发銀行得到了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貸款。

实行"馬歇尔計划"所引起的后果当中，法国的情况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国内阶級斗爭十分尖銳，罢工运动极为广泛。继萊諾市工厂罢工（这次罢工曾被反动派利用作为排挤共产党人部长的借口）之后，五月底，八万碼头工人举行罢工，6月8日，铁路工人又掀起了总罢工。粮食情况也非常困难。

5月1日，面包配給定額由三百克減至二百五十克，到了6月，面包定額已减到二百克。

---

① «Cahiers du communisme», 1947, № 11, p.1109.

为了加剧紧張，并把經济困难的責任推到共产党人头上，資产阶級故意采取經济怠工的策略。

1947年秋，罢工运动更加剧烈了，在馬賽发生了流血事件，那里的罢工具有眞正起义的形式。到12月，法国的罢工人数已达到三百万人。

法国的反动集团立即抓住了馬歇尔于1947年6月5日所提的建議，这是自然的。1947年6月7日法新社发表官方公报欢迎"援欧"計划。

1947年6月17日，貝文与皮杜尔就"馬歇尔計划"举行会談。皮杜尔在国民会議上說，"根据法国的創議"已决定成立欧洲經济委員会以"研究欧洲的需要"①。

1947年6月27日至7月2日，在巴黎召开了法、英、苏三国外长会議，会上皮杜尔和貝文一起反对苏联提出的关于美国只能在严格尊重他国独立并不干涉其內政的条件下援助欧洲各国的建議。皮杜尔对組織十六国会議非常积极。在1947年7月12日召开的会議上，皮杜尔竭力吹捧"馬歇尔計划"的优越性，比美国人自己还热心。在会議上成立了以法国人埃尔文·阿尔芳为首的确定援助需要的工作委員会。

1948年6月29日外交部长皮杜尔代表法国与美国签訂了"馬歇尔計划"的援助协定。从而法国放棄了民族主权中的重要因素。法国承认美国国会于1948年4月3日通过的"援"外法案对它具有約束力。这一法案使美国得以大为干涉法国內政。它們可以在任何时候停止援助，如果"不是对美国的民族利益更为有利的話"②。援助只能用于美国所安排的目的。法国与东欧各国的貿易从現在起要受美国的直接监督。关于"馬歇尔計划"法令实际上規

① «L'Année politique 1947», p.127, 135.

② «Documentations Française. 1948», IV, p.1702.

定停止征收有利于法国的德国賠款。这一法令使得美国能够决定法国的許多內政問題。

法国統治集团同意放棄国家独立，是因为資产阶級害怕丧失自己的阶級地位和美国在1947年到1948年間加强了对法国的压力。

1947年秋，法国已經花光了5月份得到的二亿五千万美元的貸款，于是政府又向美国請求补充貸款。但是这一要求被拒絕了。法国于9月再一次請求貸款——哪怕是給一亿美元也好，并答应在1948年初就归还。只是到了12月中旬，法国才得到二亿四千八百万美元的"临时援助"。但是，剛到1948年春初，法国又重新处于財政危机状态。2月28日法国得到三千八百万美元，4月12日它又得到了4千万美元。"馬歇尔計划"的援助协定就是在这种丧尽尊严的乞求的情况下签訂的。

"馬歇尔計划"对于法国战后的政治发展具有严重的意义。这一計划使得法国資本主义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巩固，虽然它也加深了法国資产阶級对美国的依附性。

从1948年4月到1952年6月，法国按"馬歇尔計划"一共得到了总額为二百七十亿美元的商品和貸款。至于这笔貸款的使用，那只是帮助了大資本家。在1947年到1953年間，七百五十家大公司的利潤增加了四倍。許多大的壟断集团根据"馬歇尔計划"直接得到了大量貸款①。

与此同时，劳动人民的情况却更加恶化了。1948年到1950年間，法国的物价上漲了27—30%。在这一期間，直接稅增加了三分之一，間接稅增加了二倍。

"馬歇尔計划"为法国的对外政策造成了极大的恶果。它是把法国拖入美国所糾集的軍事政治集团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建立西方大国的軍事政治集团的过程中，法帝国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

① 参見«Франция и тресты», M., 1955, стр. 257, 260.

在莫斯科四外长会議之后，法国統治集团蓄意制造同苏联的紧張关系。苏联的政策，不仅沒有給这一勾当提供任何借口，而且，突出的是，始終以友好态度对待法国。苏联于1946年夏天給法国的友好援助可算得典范。当时，法国遭到特别严重的粮荒。整个国家都在饥餓中。尽管苏联本身的后备粮食也很有限，但仍旧同意供給法国四十万吨小麦和十万吨大麦。然而，拥有大量儲存粮的美国，当时却不援助法国。苏联曾坚决反对过美国和英国低估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作用的企图。

但是法国統治集团，違反了法国的民族利益，却去反对苏联。他們实际上破坏了苏法的貿易关系。1947年11月14日，他們在博勒加尔策动襲击待遣返的苏联人收容所。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們，他們使用了坦克。襲击带有明显的挑衅性质，并且引起了法国广大的各界人士的憤慨。

1947年12月6日法国单方面廢除了1945年6月29日締結的法苏协定，并且声明要停止为了执行这一协定而成立的关于遣返在法苏侨的苏联代表团的活动。苏联政府不得不从法国召回了苏联代表团，并且要求同一性质的在苏联的法国代表团也停止活动。

法国的报刊掀起了一場挑衅性的反苏运动。右翼报紙于12月份大肆喧嚷，似乎是苏联組織了法国国内的罢工运动。与此同时，圍繞着叛徒克拉夫欽柯的卑鄙著作十分猖獗地掀起了一場可耻的叫嚷。1948年初，法国政府对在法国的苏联侨民进行逮捕，并且驅逐他們出境。苏侨机构出版的杂志被禁止出版。法国統治集团力图大大限制同苏联的一切联系。他們撤消了法国駐莫斯科使館的情报处，減少了駐苏法国記者的人数。

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开始采取旨在恶化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的措施。它对1948年2月捷克反动派叛乱的失敗发表了敌对性的声明。法国破坏了关于同波兰签訂同盟条約的談判。1949年初，法国拒絕同波兰重新签訂关于遣返在法波侨的条約。1948

年 11 月，法国对罗馬尼亚侨民进行迫害，禁止他們建立組織，禁止該組織出版定期刊物。

法国代表在联合国采取与苏联相敌对的立場。

1948 年，法国参加了欧洲資本主义国家的軍事集团——西欧联盟。在 1948 年夏天，法国政府最积极地参加了制定西欧联盟的軍事措施，参加了建立共同的軍事机构和制定軍事計划。当 1948 年 9 月成立西欧联盟的所謂"防御性組織"时，法国将軍拉特尔·德·塔西尼被任命为西欧联盟的陆軍总司令，法国海軍上将若札尔被任命为海軍总司令。西欧联盟的总部設在巴黎的近郊楓丹白露。

法国坚决参加軍备竞賽。1947 年法国的軍事开支为两千三百一十亿法郎，1948 年——三千三百二十亿法郎，1949 年——三千七百七十亿法郎。

建立西方国家的独立的軍事政治集团的政策，当时表現在最初試图組織"欧洲联盟"这一点上。

1948 年 7 月 20 日在海牙召开的西欧联盟各国会議上，乔治·皮杜尔提議成立五国經济和关稅联盟，并且还要求建立政治性的欧洲大会，他說："除了我們几国的議会外，其他願意参加这一偉大而神圣事业的国家的議会，都可派代表参加这个大会。"①

法国建立"欧洲联盟"的意图是与其长远計划相联系的。法帝国主义者盘算，他們只要把西欧各小国团結在自己的周圍，就能够把欧洲联盟变成自己在西欧大陆掌握領导权的工具。法国統治集团指望利用法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对手德国已經垮台的这个机会。但是，在实現法国計划的道路上却屹立着英国。海牙会議沒有就皮杜尔的建議通过任何决議，并且把它搁到 1948 年秋季再进行討論，这不能說不是受英国的影响。

① 《L'Année politique 1948》, p.126.

8月間，法国政府提出了正式的外交倡議，建議成立欧洲大会。附和这一建議的有比利时。但是，倫敦强烈反对欧洲大会得到眞正的政治权限。英国不願意在"欧洲联盟"承担重要的义务，深恐因此削弱自己同英联邦各国的联系。同时，它也不願意在沒有自己参加的情况下建立联盟，因为这样会削弱英国在欧洲大陆的陣地。为了同法国、比利时关于建立欧洲大会的建議相对抗，英国提議成立"欧洲委員会"，由"馬歇尔計划"参加国的代表組成。委員会不得具有实际的立法和执行权利。

英法之間就欧洲联盟的形式問題展开了激烈的斗爭。最后，英国的观点取得了胜利，根据这一观点，"欧洲委員会"不应具有实际的权力。

1949年5月5日，西欧十个国家的代表在倫敦签訂了"欧洲委員会"規章。該委員会仅仅具有关于法律、文化和社会問題的諮詢机构的作用。"欧洲委員会"成了西欧各国政治集团組織的附屬机构。法国想利用欧洲的局势以巩固自己在西欧联盟和集团范圍內的地位的企图，由于英国的阻撓而沒有得逞。

1949年4月4日，罗伯·舒曼代表法国在华盛頓签訂了北大西洋公約。这是法国对外政策方面特别重要的一个步驟。它意味着法国政府公开地和完全地附和准备反苏战爭的政策。法国承担了展开軍备竞賽的义务，这不能不引起最严重的經济和政治后果。

法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这一举动，公开撕毀了1944年签訂的法苏条約，因为条約規定双方不得参加反对另一方的任何集团。苏联政府在1949年3月31日关于北大西洋公約的备忘录中指出："北大西洋公約違反法国与苏联于1944年所签訂的条約，根据該約，两国均負有一項义务，要合作維持和平与国际安全，并且不締結或参加反对签約国另一方的任何同盟或集团。"①

为什么法国統治集团积极参加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呢？是什么想法推动他們这样做呢？他們企图达到什么目的呢？

---

① 《欧洲安全和德国問題文件汇編》第1集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110頁。

按照法国統治集团代表人物的公开論据，对这些問題的回答是：法国的安全似乎受到来自苏联方面的侵略的威胁。法国的政客无休止地一再强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防御"性质。但是，沒有、也不可能有能够证明"苏联威胁"确实存在的任何事实。不仅如此，法国統治集团的著名的代表人物自己也曾多次承认，不存在苏联对法国的任何軍事威胁。

有趣的是，在国民議会討論关于批准北大西洋公約的問題时，报告人雷納·麦耶仅仅指出了唯一的一件事实来"证明"存在来自苏联方面的战爭危險。他說，威胁的证据是：在苏联建立了……支援海空軍志願协会！①

法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眞正原因，是同法国和全世界在战后所形成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法帝国主义的陣地大大削弱了。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根本性的变化。法国工人阶級的政治組織的影响空前地增长了。法国資产阶級已經不能指望用自己本身的力量去同工人和民主运动作斗爭了。对社会变革的恐惧把它拖入了大西洋集团，因为这一集团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資本主义制度，联合起来对社会主义陣营各国进行"十字軍远征"。

法国資产阶級的某些集团把大西洋联盟与巩固法国国际地位的希望联系在一起。这些希望随后不久就已經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在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法国参加該联盟的时候，这些希望起了自己的作用，并且曾促使資产阶級的主要政治集团同意批准北大西洋公約。

这些希望之一是与法兰西殖民帝国战后所处的困难状况相联系的。战爭結束后，法国統治集团力图用武力来收复自己的殖民

① *R. Mayer.* Le Pacte de l'Atlantique. Paris, 1952, p.59.

陣地，把民族解放运动淹沒在血泊中。血腥事件連續发生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馬达加斯加、印度支那和法国的其他殖民地。法国殖民者指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参加国至少会支持法国在其殖民地推行的政策，并且为殖民战爭提供軍备。这些希望看起来似乎是現实的，因为特别是在制定北大西洋公約的时候，法国代表得以把阿尔及利亚划入了該公約发生作用的范圍之內。

实际上大西洋公約的签訂，絲毫也沒有緩和法国殖民者的困难处境。如果說从前美国沒有放过一个在法国殖民地排挤法国的最小的机会，那么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建立以后，这种政策就开始执行得更加明目張胆了。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帮助下，在法国的殖民地建立了自己的軍事基地。而在印度支那，随着法国在1946年发动的战爭中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美国直截了当地逐步排挤了法国。

法国統治集团还指望北大西洋联盟会帮助他們建立一支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現代化武装力量。

在激进党人的代表大会上，国防問題报告人罗朗·爱納克說："能不能設想，像我国这样的国家在軍事方面是独立的？这在經济上是不可能的。独立的空軍力量需要有原子彈，但是我們沒有！由此可見，我們本国的資源必須要由布魯塞尔协定和北大西洋公約范圍內的技术援助来补充，如果沒有这种援助，軍事联盟是不可想象的。"①

这些希望后来也沒有实現。美国从一开始就反对法国具有用各种武器装备起来的独立的武装力量。虽然美国給了它不少武器，但主要是陈旧的普通武器。法国当然沒有得到任何原子彈。美国仅仅让法国扮演步枪提供者的脚色。

法国資产阶級的某些集团还打算，大西洋联盟能够帮助法国

① 引自 *J. Coutard.* Politique extérieure et défense nationale. Paris, 1946, p. 27。

解决它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問題——消除德国侵略危險的問題。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倡議人曾經热心地支持过这类目光短浅的打算。历史无情地嘲笑了抱过这类幻想的人：五年之后西德自己也成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国，并順利地利用着这一組織重新进行武装。

在1949年，資产阶級集团中只有少数代表看到了由于参加大西洋联盟而展現在法国面前的带有威胁性的前景。总的說来，充滿着1949年特有的反共狂的法国資产阶級拥护大西洋联盟。

1949年7月27日国民会議以三百九十八票贊成、一百八十九票反对批准了北大西洋公約，7月29日共和国內閣以二百八十四票贊成、二十票反对通过了該条約。

根据这些数字，还不能够作出法国資产阶級一致贊同大西洋联盟的結論。就在当时，法国已經产生了在报刊上称之为"中立主义"的現象。資产阶級政党的某些議員在討論批准大西洋公約問題时談到了該集团对法国的危險性。例如人民共和党的代表布莱向国民会議提出过关于通过"中立宣言"的建議①。这是一家有影响的資产阶級报紙《世界报》从1949年3月开始就明显反映出来的那些傾向的表現。这家报紙的許多文章都确认，大西洋联盟必将导致战爭，在这場战爭中主要的打击将落到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身上。《世界报》提議奉行軍事中立政策以避免这一場災难。这家报紙肯定地說，如果沒有大西洋联盟，入侵西欧的危險将大大减少②。但是1949年的中立傾向的表現沒有汇合成任何有組織的行动。

法国人民的民主力量展开的反对大西洋联盟的斗爭，具有巨大的意义和效果。1948年法国第一批保卫和平的組織誕生了，它們在1948年末就已經展开了群众性的反对大西洋集团的运动。在呼吁不要战爭的口号下征集了在"和平簿"上的签名。在"和平和

① «Annal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1949, p. 5231.

② «Le Monde», 2. III. 1949.

自由战士全国委員会”致美国总統杜魯門的信上，有一百二十万人签了名。这封信說，法国人民不承认自己的政府有权签訂大西洋公約，并且拒絕承认这一公約对法国具有約束力。

1949年7月展开了反对国民会議批准大西洋公約的运动。在7月14日民族独立节那一天，抗議的示威游行和集会具有特别普遍的性质。政府由于害怕人民运动，曾一再拖延对批准該公約进行辯論的日期。为了抗議大西洋公約的签訂，以及后来抗議批准这个公約，曾經发生过无数次的短时間的罢工。

共产党特别积极地进行了反对大西洋联盟的斗爭。共产党人利用議会讲坛、报刊以及同人民联系的一切机会，向人民不倦地說明大西洋联盟对于法国利益和保卫和平的危險性。1948年末法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受到所有爱国力量支持的著名的口号：“法国人民将不会，而且永远也不会与苏联作战！”

美国人大卫·舍恩布龙在其《法国在那样生活着》一书中痛苦地承认，尽管在1947年从政府、軍队和警察机关赶走了共产党人，但是有“四分之一的选民投票贊成共产党，而且法国人說‘不要’反对俄国或反对共产主义的战爭”①。法国民主分子反对由大西洋公約体现的战爭威胁的斗爭，在那些紧張的“冷战”年代中，对保卫和平事业是一个重要的貢献。

第十七章

意大利1945—1949年間的国际关系

意大利是作为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主要同盟者发动了战爭

① *D. Schoenbrunn.* Ainsi va la France, p. 16.

的，而从1943年秋季起，它就以反希特勒联盟的共同作战方的姿态出現了。墨索里尼派遣出去征服新国家的意大利法西斯軍队在远离国境的地方，在那从頓河河灣一直到利比亚沙漠的广大地区上被粉碎了。意大利人民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喝干这杯战爭的苦酒。意大利从南到北的全部土地上布滿了战綫。

意大利遭受了两次占領：它过去的德国同盟軍的占領以及后来它与其共同进行反德战爭的英美联軍的占領。虽然在战爭結束时意大利屬于获胜的反希特勒联盟那一边，但是它作为一个被占領国家的国內和国际局势却是极端困难的。只有在战后，意大利才重新获得了曾經两次失去的主权。

意大利不得不在欧洲大陆上第一个在实际中領教英美帝国主义的秘密政治战略，英美帝国主义力图使用一切手段不让欧洲的革命民主运动在战爭过程中得到发展，在欧洲各国实行"反革命輸出"。

英美的軍事政治干涉蛮横地阻碍了意大利国內的发展，那里的反法西斯的民主革命增长了，摧毀了二十年的法西斯专政并威胁着壟断組織的整个統治制度。美英統治集团人为地把經济和政治权利保持在意大利壟断組織手中，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在战爭末期遭受到自其有史以来最深刻危机的意大利資本主义的生命力得到了恢复。

这些过程对意大利的战后发展发生了影响，預先决定了它的对外政策方針的性质以及它在已形成的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一、意大利人民的反法西斯民主革命和美英的政治战略

法西斯主义在1942年冬和1943年遭到的历史性失敗意味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轉折点，这次失敗使意大利处在經济和軍事災

难的边緣。多年来在国內酝酿的深刻的政治危机，已經明显了。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大資产阶級、将軍們和宫廷的亲信集团秘密地在上层策划了一个阴謀，其結果是1943年7月25日逮捕了本尼多·墨索里尼，并把政权交給皮埃特罗·巴多里奧元帅。

阴謀的策划者想走在意大利反法西斯風暴的前面，摆脫掉这些被社会輿論认为是法西斯化身的最令人憎恨的人物，同时使政权仍保留在壟断資本的手中。他們竭力想尽快地同西方大国签訂停战协定，依靠美英的軍事力量，以便阻止日益增长的群众压力。当意大利軍队在伏尔加河畔被歼灭和希特勒进攻庫尔斯克弧形地区遭到失敗之后，这种压力就特别强大了。

帕·陶里亚蒂指出："在9月8日① 很久以前，我們党就提出了第一个抵抗与武装斗爭的总計划。計划規定，要与德国决裂，与各联合国家签訂停战协定，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击退德国人的可能的进攻，軍民进行合作，消灭法西斯主义和确立和平"②。正是这个以共产党为首的人民群众的倡議，使意大利統治集团害怕得要命。

早在1942年秋季，当已明显地看出同德国联盟沒有前途、国內反战和反法西斯情緒日益高漲的时候，"改变方向"、坚决投靠西方大国的思想已經在意大利壟断資本的上层分子中酝酿成熟了。美英的壟断集团和政治首脑也非常希望不流血地战胜意大利，同它单独签訂停战协定，利用其領土为自己的軍事政治利益服务，防止意大利人民反对法西斯专政的革命解放战爭和巩固資产阶級—地主集团的統治。丘吉尔公开地提出了这一个任务："在意大利局势这样不安定和不稳固的情况下，身負拯救重任的英国和美国采取

---

① 意大利实际退出战爭的日子。

② *П. Тольятти.* Итальян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Перев. с итал. М., 1959, стр. 73.（参見中譯本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69頁。——譯者）

消灭意大利国家的全部結构和整个面貌的举动，是一个严重的錯誤。毫无疑問，我們并不渴望使意大利陷入混乱和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也不渴望造成一种沒有任何政权同我們打交道的局面。"①

英国統治集团通过当时的意大利駐土耳其大使、后来任巴多里奧內閣的外交部长的瓜里利雅同宫廷集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美国的間諜机关則通过艾倫·杜勒斯駐瑞士办事处接近了意大利北部的壟断資本家和某些"在野的"将軍們。美英間諜机关制定了"先发制人"的上层陰謀策略，以便轉移人民群众对当权的反动派的憤怒。1943 年 7 月 10 日盟軍在西西里島登陆，这为撥动意大利寡头政治集团对外政策道路上的指針創造了有利条件。

美英政治領导集团从来沒有认为，粉碎亚平宁半島上的希特勒軍队的直接作战行动具有重大的意义。开辟意大利战場的想法，从一开始起就是两国政府玩弄政治陰謀的对象，这一陰謀主要是用来反对苏联的利益。《美国外交》一书的作者罗伯特·菲萊尔在指出美英两国 1942—1944 年在欧洲战略方案上的冲突时承认："英国的战略家，特别是丘吉尔，牢牢記住了战爭的政治目的——战胜希特勒，但不消灭大陆上的西方文明結构。"② 在他看来，这就产生了丘吉尔的"巴尔干""外圍"战略。

在 1943 年 8 月的魁北克会議上，制訂了关于意大利問題的軍事和政治总路綫。弗·罗斯福和溫·丘吉尔就英国在地中海区域的优势影响达成了协議。开辟意大利战場对英国来說是一个有利的决定，因为这样可以"保住"意大利，使其免遭推翻法西斯的"危險"后果，在将来还可以把作战行动轉移到巴尔干去。对美国来說也是一个有利的决定，因为美国在亚平宁半島具有悠久的帝国

①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vol. 5. 1943—1945, p. 5898.

② *R. H. Ferrell*. American Diplomacy. A History. New York, 1959, p. 404—405.

主义利益。由此可見，关于开辟意大利战場的决定从一开始起不仅具有軍事性质，而且还带有政治性质。这就决定了在意大利作战的特殊进程和美英指揮部在那里的"特殊使命"。

代表巴多里奧的卡斯德拉諾将軍和以貝德尔·史密斯为首的英美代表团，在里斯本和西西里进行关于意大利退出战爭的秘密談判时，商定了于1943年9月3日签訂的停战的簡明条件。这一协定除了包括与停止軍事行动直接有关的一些条款外，还規定把全部政权交給盟軍总司令部，意大利必須接受以后向它提出的政治、經济和軍事条件。

1943年9月29日，艾森豪威尔将軍代表联合国家、巴多里奧代表意大利在停泊于馬耳他島海濱的"納尔逊"軍舰上签訂了停战协定的全文，根据該协定，意大利要解除武装、复員軍队、服从占領和实行民主化。联合国家可以利用意大利的全部領土及其資源来进行反希特勒的战役。国內国外貿易、銀行、生产都归盟国管制，报刊、电台、电影院和剧院都必須通过檢查。

停战的政治条件正式要求貶黜墨索里尼及其主要帮凶和其他战爭罪犯，解散法西斯組織，鎮压法西斯思想，廢除排斥犹太人的和其他不平等的法令，釋放政治犯和同情联合国家的人士①。艾森豪威尔将軍向巴多里奧重申了早先許下的諾言：如果意大利与盟国眞誠合作，这些条件可以放寬。1943年11月9日签定了补充条款，其中規定苏联是停战协定的参加者。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9月10日发表的宣言中号召意大利人站在盟国一边。但是宮廷和巴多里奧却迟迟不向德国宣战。直到1943年10月13日，意大利才对德宣战。

就在同一天，苏联、英国和美国在自己的宣言中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方。但是共同約定：这并不影响停战条件，这些条件只有經过盟国之間的协議，根据意大利对盟国所提供的帮助才能改变②。

---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 стр. 403—405。

② 参見同上书第407頁。

西方盟国不能完全忽視苏联在这方面的利益：通过什么道路使意大利从法西斯主义下解放出来并恢复民主秩序。美国和英国不得不同意与苏联共同发表关于意大利政策的正式文件。这一文件就是1943年10月美、英、苏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議通过的关于意大利宣言①。

这是共同商定的行动綱領，这一綱領如能切实付諸实現，那么就能够彻底消灭国内的法西斯主义，就能够使意大利人民获得建立以民主原則为基础的政府和其他机构的現实可能性。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R·巴塔里雅所指出的那样，莫斯科会議所通过的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使得与意大利局势有关的最微妙和最复杂的問題明确化起来"，首先是"庄严地承认了意大利人民中最积极的那一部分人为爭取和平和反对法西斯主义所进行的斗爭"②。

莫斯科会議在不顧美英反对的情况下所达成的关于成立意大利問題諮詢委員会的决議，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該委員会由三大国和法国民族解放委員会的代表組成，后一阶段还吸收了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代表。諮詢委員会是与美英所建立的盟国管制委員会和盟国軍政府平行的机关，处理除了軍事作战事項以外的日常問題，作出旨在协調涉及意大利的盟国政策的建議。苏联加入諮詢委員会意味着苏联参与对意大利局势的管制，尽管这是間接的。这使英美司令部难于实現其对莫斯科会議上制定的关于意大利民主化决議所采取的怠工政策。

这样一来，在由于意大利既是共同作战方、又是被盟軍占領国

① 参見同上书第413、416—417頁。

② *Р. Батталья.* История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стр. 183.

文中談到，宣言中承认："必須通过吸收意大利人民中自始至終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那些阶层"，換句話說就是劳动阶級的代表的办法使意大利政府更加民主化。

家的双重身份所引起的一些問題上，找到了苏联和西方国家都认为可以接受的共同立場。但是，后来对意政策成了反法西斯联盟內部日益加深的矛盾的重要一环。

首先，这涉及到对意大利境內德国法西斯軍队作战的性质。直到1944年6月4日，盟軍才占領罗馬，而到8月12日才占領佛罗倫薩。他們沒有足够的軍队和装备，以便在冬季以前突过亚平宁直达波河平原和利古里亚省。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当战爭已經进行到不可避免的結局——希特勒德国被粉碎的时候，英美軍队还竭力設法避免在北意大利与德国人进行决战。司令部通过美国在欧洲的間諜机关头子艾倫·杜勒斯与德国将軍們就意大利战綫上德軍单独投降問題进行了秘密談判。仅仅在1945年4月，当由于意大利人民的反法西斯起义，整个北部实际上已經从德国軍队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盟軍才开始到达那里。直到1945年5月2日，連柏林的德国人也已經停止了抵抗，意大利战綫上的德国軍队才投降。

美国历史学家Г·麦耶指出："英美的軍事政策追求着一个目的：避免历史上难以避免的战爭后果——欧洲寡头政治的复灭……英美軍队在意大利作战的茅头，像反对凱塞林将軍的二十二个納粹师那样来反对意大利人民……如果美国不顾丘吉尔的'否决'，把步枪和机枪供給意大利的游击队，那怕只供給几百万美元的，那么就能使美国軍队在意大利少受一半損失。但是他們仍然指望：能够强迫意大利接受一个不管什么样的昏庸的法西斯国王和反动政府。"①

意大利人民始終不渝的反法西斯革命斗爭对粉碎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貢献，这一革命斗爭是以1945年4月北意大利的全民起义而告終的。抵抗运动的战斗精神和成就在战后的許多年代中都在意大利和西欧的政治生活中留下了自己的

① *Г. Д. Мейер.* Неизбежна ли гибель Америки?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0, стр. 109—113.

印痕。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对这一次人民运动的社会内容下了这样的定义："……在实现了全国統一一百年以后，出現了巨大的民主革命，这是过去从来沒有过的。这个民主革命就是抵抗运动。它曾粉碎了法西斯主义，肅清了法西斯殘余，进行了艰巨的解放战爭并赢得了胜利，为新国家打下基础。然而民主革命在应当轉入建設时期、轉入經济結构改革、巩固新的政治領导阶級时，却中断了……"①

意大利人民的革命解放运动建立了政权，这一政权的最重要的机构是民族解放委員会，民族解放委員会在許多地方，后来甚至在整个北部范圍內的斗爭过程中，不仅成了各反法西斯政党的政策协調机构，而且成了群众的代表組織。它們領导了广大的游击区的"共和国"。几乎有五十万意大利人在委員会的領导下手持武器与德国軍队斗爭。委員会在 1945 年 4 月意大利北部起义之后到盟国軍队和当局到来之前的十天內，領导了全部的政治、社会和經济生活②。

共产党善于把民族解放斗爭的任务与意大利工人阶級和农民阶級的社会解放任务結合在一起，引导人民群众去进行使壟断資产阶級和大地主失去政权的国內的根本性变革。

在英美軍队占領的南方，民族解放委員会和西方盟国之間的第一次严重的冲突，是由于必須执行莫斯科会議关于通过吸收組成民族解放委員会的六个政党的代表参加政府、使意大利政府民主化的决議而发生的。1944 年 1 月这些委員会在巴里召开了代表大会，大会最初提出消灭君主政体是同政府合作的必須的条件。英美盟国利用了这一要求大肆挑撥。③

① 《意大利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重要文件汇編》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106 頁。

② 参見 *Л. Лонго.* Народ Италии в борьбе. Перев. с итал. М., 1949, стр. 362—387；1948 年 1 月 1 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③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II, p.1554—1555.

为了防止英美方面对莫斯科宣言的怠工行为，苏联采取了坚决的行动。《消息报》于1944年3月30日发表了一篇編輯部文章——《意大利問題》，文章揭露了英美政府的阴謀，要求停止有損莫斯科宣言声誉的政策并立即改进意大利政府的成員①。关于国內的状况問題被提交諮詢委員会討論。英美政府被迫作了让步。

1944年3月14日苏联政府宣布与意大利建立外交关系。这引起了美英的极端不滿，因为它們把意大利看作是自己的世襲領地，嫉妒苏联代表和意大利政府的直接接触。②

維利奥·斯巴諾写道："美国人和英国人把苏联承认意大利政府这一事实看成是自己的失敗，丘吉尔为此大发雷霆并发表了众所周知的演說，在演說中丘吉尔以他那慣有的粗魯无礼把意大利称为'沒有柄的咖啡壺'。英国人和美国人认为自己是意大利的主人，竭力不許意大利人民站在民主国家国际同盟方面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斗爭。他們希望意大利今后仍旧是'沒有柄的咖啡壺'，于是就一味吹毛求疵，用数不清的借口来拖延对意大利的承认。"③

意大利消除政治危机的直接結果是：建立了比較民主的、有共产党和社会党参加的六党政府，意大利更有效地参加了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爭，美英两国后来也承认了意大利政府。

美国和英国在意大利的主要政治工具是盟国管制委員会和盟国軍政府。从形式上看，对意大利进行管制不仅仅通过这两个机构，而且还通过諮詢委員会。然而，有苏联代表参加的这一机构实际上被西方大国逐步解除了它对意大利国內情况的监督作用。占

① 1944年3月30日《消息报》。

② «The Realignment of Europe». Ed. by A. and V. Toynbee. London, 1955, p.425.

③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жизни и борьбы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тр. 415—416. 参見 M. речь У. Черчилля в кн.: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V, p.441—442.

領当局集中掌握在西方大国手中。

到战爭快結束时，英美軍事机器掉过头来鎮压意大利国內的革命陣綫。这是溫·丘吉尔主要关心的事情。他早在1944年5月就用公开挑撥的口吻談到意大利的国內情况："难道我們打算容忍巴尔干半島甚至意大利的共产主义化嗎？"①

策划好各种鎮压意大利民主革命运动的計划的国內外反动势力，首先就力图消灭准备进行反法西斯起义的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

1944年11月13日，盟軍司令亚历山大将軍向游击队提出停止有組織的軍事行动的号召。这就等于号召"解散回家"②。

英美統治集团对于北部的武装起义特别感到恐慌，因为它不仅摧毀了德国人的政权，而且还威胁着壟断資产阶級和大地主的統治。西方大国害怕意大利抵抗运动的成就会影响到整个西欧人民群众的斗爭，促使他們迅速地革命化。英美軍队剛一开进游击队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北部地区以后，就着手取締革命民主組織并消灭它們工作的成果。

首先，盟軍司令部开始解除民族解放委員会任命的抵抗运动参加者的职务，換上了旧的法西斯官吏。盟国軍政府阻撓在国家机关內进行清洗，阻碍民族解放委員会关于沒收附敌分子財产决議的实現。盟国軍政府拒絕承认管理委員会并且把工厂归还給与法西斯主义合作过的企业主。民族解放委員会所逮捕的法西斯党的骨干和墨索里尼的官吏，都被釋放了。

国內外反动派挑撥进步力量与占領当局的軍队直接发生冲突，妄想借盟軍之手直接鎮压反法西斯运动。帕·陶里亚蒂后来

①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VI, p. 64.

② *Л. Лонго.* Народ Италии в борьбе, стр. 304—305.

在制宪会議上指出："意大利被占領了，它被英美帝国主义的軍队牢牢地占領了。由此可見，物质力量的絕对优势不在我們这一边。共产党如果領导人民进行反对英美軍队的武装斗爭，那无論从意大利国內形势来看，还是从那些年的国际形势来看，都会产生悲剧性的后果，因为在那几年，帝国主义一味寻找借口，以便鎮压恢复意大利民主的任何尝試，正如他們在希腊所做的那样，以便在更大的范圍內挑起力量的較量。"①

溫·丘吉尔1945年5月9日致德·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对于評价英美盟国在意大利的政治和軍事战略非常重要。电报說："我怀着不安的心情听說，德国人必須在西蒂（他們的駐地。——作者）消毀他們的全部飞机。我希望，在武器和其他装备方面不要采用这种政策。可能到某一个时候，我們会十分需要这些东西，甚至在現在，它們在法国，特别是在意大利还有用处。"②

反希特勒德国的軍事行动当时已經全部結束。显然，这个电报不可能有别的解釋，只能被看作为可能对这些国家进行武装干涉以便支持反革命的公开暗示。

尽管美英对意大利的政策完全一致，它們之間爭夺經济和政治統治权的斗爭一分钟也沒有停止过。地中海势力范圍的划分并沒有使这两个竞爭对手和解。美英就1944年11月美帝国主义的傀儡——卡罗·斯福尔查（又譯卡洛·史佛卓。——譯者）伯爵参加意大利政府并担任外交部长一事发生的公开冲突，引起了最大的反应③。

① *П. Тольятти.* Речи в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Перев. с итал. М., 1959, стр. 6.

②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VI, p.499.

③ *D. A. Graber.* Crisis Diplomacy. A History of U. S. Interven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Washington, 1959, p. 255; *Р. Шервуд.* Рузвельт и Гопкинс.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 т. II.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8, стр. 548—549; *P. Nenni.* Il cappio delle alleanze. Roma, 1949, p.17—18.

从签訂停战协定(1943年9月3日)到战爭結束(1945年5月8日)这一期間，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人所宣布的、并为天主教民主党和民族解放委員会其他各党所公开承认的意大利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把意大利从共同作战方变为联合国家的同盟国。但是右翼集团千方百計地阻撓这一目的的实現。

右翼資产阶級活动家領导下的意大利官方对外政策是消极的，对美英代表奴顏婢膝，竭力想在任何条件下与美英勾結来反对国內革命力量，这一切注定使意大利处于附庸的僕从国地位。意大利在战爭末期甚至都沒有利用共同作战方地位所給它的权利。为了本阶級的利益投靠西方大国的、充滿反苏情緒的意大利資产阶級把它的政策强加在国家身上，由于这样的政策，人民群众不得不忍受被占領的痛苦和重担，尝不到一点胜利果实，然而他們为了取得胜利却付出了不少牺牲，与敌人英勇忘我地战斗过。

二、和約問題和意大利在战后最初年代中的作用

在战后最初几年里，英美帝国主义牢牢地把意大利掌握在自己的政治监督之下，力求达到它們各自在战爭期間就提出的目的。

意大利的經济状况当时是极端困难的。1946年10月工业产量达到战前水平的三分之二。到1947年1月，根据工业家联合会的資料，工业生产指数比上一年9月降低了三分之一。1947年4月意大利有二百二十万失业者。1946年农产品的产量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70%。对外貿易全部被破坏了。意大利财政出現了危机的情况。到1947年3月1日国債已超过战前数字的七倍。

由于战爭的緣故，經济上原有的缺陷变得更加复杂化了，这些缺陷主要表現在工业的北方和农业的南方之間的矛盾上。与此同时，在战爭期間和战后头几年里，意大利的經济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国家投資的比重大大

地增加了。

国內政治情况是极为紧張的。尽管美英帝国主义者得以把意大利革命力量排挤出去，社会变革的風潮并沒有在意大利平息下来。尽管抵抗运动的絕大部分实际成果已被国內外反动派所消灭，但是它仍旧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因素。在政治舞台上出現了拥有二百万党員的共产党，它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无可爭議的威信和爱戴，这在根本上改变了国內力量的配置。抵抗运动的綱領体現了共产党和社会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要求：廢除君主政体，宣布成立共和国，制定民主宪法，实行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和其他根本性的社会改革，以及执行独立的、爱好和平的对外政策。某些民主成果，特别是共和国宪法的通过——这个宪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并把爭取自己的权利的武器交到他們手中，使国內外反动派极为恐慌。

在1946年和1947年，美英帝国主义势力影响意大利局势和意大利統治集团对外政策的方式和方法有些改变。直接的軍事占領的强制漸漸变为在經济和对外政策上对人民群众的訛詐，变为同意大利壟断資本和梵蒂岡以及他們的政治僕从——在国家中占居重要职位的天主教民主党实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在这些年里，帝国主义在势力方面进行了显著的重新分配。美国政府在战爭开始阶段为了策略上的目的把地中海，特别是意大利的大部分势力让給了英国，然而英国到此时已不能保持自己的陣地了。它漸漸为美帝国主义所排挤以至被排挤出去了。这一点是由于西方陣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所促成的。

在意大利国內，美国和英国調換了脚色这一事实，反映在英国所依靠的自由党势力的衰落上，并导致一开始就是美帝寵儿的天主教民主党迅速掌握了政权。在美国的直接支持下，阿·德·

加斯貝利成了反动陣营的对內对外政策的主要奉行者①。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意大利所采取的总路綫是利用它作为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重要战略基地和政治盟友。西方国家力图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实际上也就是建立一个反动的政府。而且正如英国資产阶級历史学家M·格林劳德所承认的那样，即使在共产党用"宪法的手段"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他們也不打算放棄这一目的②。

同美英帝国主义集团的干涉政策相反，苏联一貫采取完全不干涉意大利內政的立場，首先是在有关管理形式、国家制度和政府組成等問題上。

在1946年8月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苏联代表在說明苏联对意大利的态度时强調指出：苏联人民相信意大利作为一个大国的前途，同时毫不怀疑，光荣的意大利人民一定会荣誉地摆脫战后的困难，并且眞正走上不愧为偉大和自由的意大利的民族高漲和复兴的道路。苏联在这一期間不止一次地强調指出，意大利只有在政治和經济独立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到恢复。

但是，意大利反动派力图消灭抵抗运动的影响，特别是共产党的影响，使国家在政治和經济上更加依附于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同就管理形式进行全民投票、1946年6月2日制宪会議的选举有关的事件，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这一情况。美国和英国积极干涉选举运动的进程，对意大利人民群众威胁說，如果左派力量获胜，就停止經济援助，使其处于饥餓中。这些国家的某些政客直截

① 1944年12月12日阿·德·加斯貝利当了波諾米第二內閣的外交部长。到巴利內閣时(1945年6月21日到1945年12月10日)，他仍保留这一职位，1945年12月10日以后，他出任內閣总理。一直到1946年10月15日，他才被免职，由P·南尼任外交部长的职位。

② *M. Grindrod.* The Rebuilding of Ital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45—1955. London—New York, 1955, p. 4—5.

了当地表示，如果意大利民主力量获胜，就进行武装干涉。

意大利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反动势力在6月2日选举中遭到的失败，迫使他們向国外寻求援助，以便根本改变国內的局势。

早在1947年1月，当时已是意大利內閣总理的阿·德·加斯貝利就到华盛頓去同美国統治集团建立直接的联系。他的訪問目的表面上說是取得"經济援助"，但是华盛頓談判的隐秘的含意决不仅限于此。正如梵蒂岡一个秘密文件中所承认的那样，这一訪問的直接目的是巩固美英在意大利的势力，罗馬教皇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种势力上①。当时美国报刊承认，加斯貝利之所以赴华盛頓进行談判，是由于美国官方集团竭力想把意大利控制在資本主义軌道上并阻止它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願望直接引起的。

从經济援助的角度来看，加斯貝利华盛頓之行的直接結果是很微小的。美国答应給他一亿美元貸款②。但是，华盛頓向意大利总理提的要求是十分明确的。保皇派的报紙《晚邮报》写道："加斯貝利沒有从大洋彼岸运来金犢，却带来了坚定的、深刻的信心：在清除共产党人的最困难时刻，美国将作他的后盾。加斯貝利把自己交到了杜魯門的手里。他从美国回来时，口袋中带来了政府危机。美国的銀行家害怕共产党和一般左派的政府。因此就必須扩大政府和解除共产党員及其社会党同僚的职务。"1947年3月12日杜魯門宣布无限的帝国主义扩張和干涉他国內政为美国政策的原則的声明，为意大利反动势力兴高采烈地接受了。

1947年5月，当美国进出口銀行的代表到达意大利举行关于給該国一亿美元貸款的談判时，加斯貝利挑起了政府危机，其結果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被排除出內閣。

1947年5月31日建立的基本上由天主教民主党的成員所組成的政府，同意大利壟断集团有着最密切的联系。美国对这个政

① «L'Unità», 3, IV. 1948.

② «Documenti di vita italiana» №1, Dicembre 1951, p. 6.

府可以完全“信任”，况且政府中的要职都由同华盛頓有直接联系的那些人，其中包括卡罗·斯福尔查伯爵，所占据着。国內反动派举行进攻和在意大利推行美国的压力政策的閘門被打开了。

1947年6月3日馬歇尔宣布美国准备“援助”意大利。两天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計划，即人所共知的“馬歇尔計划”。后来哈·杜魯門公开解釋“馬歇尔計划”对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战略所起的作用时指出，他“請求把这一問題看成是最迫切的問題，特别是由于法国和意大利的形势正在明显的恶化中……”① 卡罗·斯福尔查献媚地把这个計划称为“安定欧洲的序幕”，他非常懂得这个計划对恢复西欧国家的反动制度所起的作用。在1947年7月12日的巴黎会議上，卡罗·斯福尔查重申了意大利政府为了“欧洲的統一”准备达成“任何协議”的願望，同时要求别的国家也放棄主权原則。意大利政府从一开始起就是“馬歇尔計划”最热烈拥护者之一②。

竭力想把意大利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英美帝国主义，这些年来广泛地利用了的里雅斯特問題。这使他們能够对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施加压力，能够从事反苏投机并在最短的时間內悄悄地掌握像的里雅斯特这样重要的战略据点和海軍基地。

早在意大利境內的德軍投降之前，丘吉尔就和杜魯門商量过占領的里雅斯特的問題。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一思想已經酝酿了几年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后半期都在酝酿。他在1945年4月27日給杜魯門的信中写道：“我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如果可能的話，用輕而易举的方法去得到的里雅斯特，并且进行同那些軍事政治行动有关的冒險。已故总統③一向认为的里雅斯特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他看来，的里雅斯特应該成为保证多瑙河流域所有地区通往亚得利亚海的通道的国际港口……的里雅斯特的

①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I, p. 117, 119.

② «Documenti di vita italiana» №1, Dicembre 1951, p. 7.

③ 指罗斯福。——譯者

实际地位可以在将来空閑的时候决定……"①杜魯門在1945年5月12日的复电中同意了丘吉尔关于占領的里雅斯特的建議②。

根据1945年6月20日的杜伊諾协定，南斯拉夫軍队退到了塵根綫以外，把的里雅斯特、通向伊逊佐河平原的狹长地带和包括波拉在內的面积不大的"昂克拉夫"③留在英美手中。这样就形成了两个軍事区——"甲区"(美英的)和"乙区"(南斯拉夫的)。外长会議于1946年2月28日指定了由四方面人員組成的委員会，于5月提出了包括四国(英、美、法、苏)建議的边境綫地图。1946年7月1日外长会議作了妥协，采用法国提出的边界綫作为南斯拉夫的西部边界并且同意在的里雅斯特成立国际区。这一解决办法准备了就这个問題在巴黎和会进行談判的下一个回合。这些年来英美盟国就这样完全有意識地使的里雅斯特問題悬而不决，利用它作为实現自己对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島的政治計划的杠杆。

向意大利施加压力的主要工具是和約問題。圍繞着和約的前景进行政治投机是意大利反动派同民主力量进行斗爭的慣用手法。統治集团力图使人相信，如果民主力量在意大利得到巩固，那么西方大国或者是根本不在和約上签字，使意大利在将来也处于被占領国的地位，或者是向意大利提出特别苛刻的經济条件和政治条件。

在准备和約的过程中，在对待意大利問題上出現了两条具有原則区别的政策路綫——英美集团的路綫和苏联的路綫，这两条路綫是在战爭期間开始形成并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最終定形下来的。

外长会議接受波茨坦会議关于准备和約的委托，开始进行对

---

①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VI, p. 480—481.

②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vol. I, p. 243—244.

③ Анклав，即一小国，四面为另一个国家所包圍，如意大利境內的圣馬利諾。——譯者

意大利和約的起草工作。1945 年 9 月 13 日外长会議就英国提出的草案展开了爭論。从一开始討論起，苏联就对英美想用来作为政治阴謀手段的的里雅斯特、南的罗尔以及意大利前殖民地等問題采取了鮮明的原則性立場。

在 1946 年 7 月 29 日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在討論对意和約草案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各国的政治路綫就完全明显了。但是，美国和英国互相竞爭，它們都想利用对意和約作为使它們在这个国家实行的扩張政策合法化的工具，作为使意大利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經济和軍事集团的工具。同时，它們实际上是希望把意大利降低到地中海和欧洲的二等国的地位，迫使它追随美英的政策。

在經济方面，西方国家竭力想延长意大利支付占領費用的期限，打算把駐意外国軍队的費用的全部重担轉嫁到意大利人民的身上。美英代表企图在和約中把这样一項要求肯定下来：在一切有关意大利的貿易、工业、航海和其他商业活动的問題上，向联合国任何一国的公民提供同意大利公民"平等"的权利。

西方国家利用的里雅斯特作为其战略基地，在战后的国际关系中保留这一問題以便对意大利和南斯拉夫施加政治压力的方針，是十分明显的。

美国和英国利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代表作为幌子，反对意大利給苏联一亿美元賠款，很明显，尽管这笔微不足道的款額与其說是对意大利侵略者在苏联領土上三年蹂躪所造成的損失的实际賠偿，还不如說是对侵略者进行惩罰的象征。

同西方国家在对意和約問題上的政策相反，苏联一貫采取爱好和平和民主的立場。苏联力图使和約眞正符合渴望得到持久和巩固的和平的各族人民的利益，使它成为眞正民主的和約，这样的和約既不会使侵略者免受惩罰，同时也不致忘記在爭取共同胜利

的解放斗爭中所作出的牺牲。苏联坚持要使民主的和約为所有渴望安全并准备共同回击任何新的侵略的各国人民之間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創造良好的条件。苏联认为，民主的和約应該反对法西斯主义，应該对民主原則的巩固給予尽量的支持。

苏联政府一貫反对一切可能損害意大利主权的做法，反对一切可能导至使它在經济上受較强的国家束縛的做法。

苏联从这一原則性立場出发，坚决捍卫意大利的民族利益，反对西方国家打算在和約的經济条款中增加意大利人民担負的占領費重担和运用扩張主义的"机会均等"原則的企图，这一原則能够使意大利受外国資本的束縛。

苏联政府譴責了意大利代表团团长阿·德·加斯貝利在和会上发表的旧的侵略要求。苏联政府指出，意大利必須同自己的邻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結束它原来的扩張主义政策。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意大利才能眞正成为巩固欧洲和平的重要因素。苏联拒絕了加斯貝利提出的关于"临时和約"、关于实际上延长停战协定期限的建議，并且揭露了加斯貝利的旨在达到反动的国內政治目的和利用西方国家与苏联之間日益增长的矛盾的詭計。

苏联在巴黎和会上对的里雅斯特章程所采取的立場是以承认外长会議的决議为折衷办法作为基础的，該决議規定，的里雅斯特的領土应該成为在联合国安理会保护下的国际化領土。同时，苏联又坚决反对美英想把类似殖民制度的枷鎖强加在的里雅斯特身上的企图，并坚决要求通过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民主管理的里雅斯特和規定外国軍队撤退的准确日期的建議。

經过长时期的討論和斗爭之后，終于在1947年2月10日签訂了对意和約，参加签字的有苏联、英国、美国、中国、法国、澳大利亚、比利时、白俄罗斯、巴西、加拿大、捷克斯洛伐克、埃塞俄比亚、希腊、印度、荷兰、新西兰、波兰、烏克兰、南非联邦、南斯拉夫和意

大利的代表①。

在和約上签字的加斯貝利政府把这一和約呈交制宪会議批准。1947年7月20日制宪会議在二百六十二票贊成、六十八票反对、八十票棄权的情况下批准了該和約，它自1947年9月15日起开始生效②。

对意和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个体系之間一定的力量对比的結果。它不是像凡尔賽那类条約的帝国主义式的和約，因为在它的制訂过程中有苏联的积极参加，苏联坚决阻撓西方大国要把这一条約变为帝国主义进行操纵和奴役的工具。苏联的影响以及它为爭取民主的和約而进行的正义斗爭在和約的一系列决議中得到了反映。但是西方大国还是在这一文件的許多地方給自己留下了退路，以便推行其压制意大利人民的政策。

在和約起草期間，意大利反动集团的对外政策也起了不良的作用，这一政策在很多方面帮助了西方大国推行它們对意大利的扩張計划和軍事計划。加斯貝利政府在巴黎和会期間毫不含糊地确定了自己的立場，它追随在英美外交使节的后面，毫不掩飾它对苏联的敌視。在和会期間，意大利代表团在自己的活动中常常采取違反民族利益的立場，以迎合美英帝国主义集团的需要。加斯貝利对待和約問題的政策是由此决定的：意大利統治集团在自己阶級利益的驅使之下，放棄了爭取独立和持久和平的任务，使意大利最終加入了重新建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作为意大利帝国主义集团对外政策主要动力的反共产主义，在那些年的情况下給意大利带来了最为沉重的后果。

肩負了反法西斯斗爭全部重担的意大利人民③，他們所願意

---

① 参見《对意大利和約》(1947年2月10日)，見《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291頁。

② «Documenti di vita italiana», № 1, Dicembre 1951, p. 6.

实行的完全是另一种政策。意大利共产党最明确地制定了这种对外政策的原則。帕·陶里亚蒂在制宪会議上发言时指出："今天我們把两点基本利益摆在高于一切、高于任何私人要求的地位，这就是国家的独立和意大利人民的和平。我們应該要求，应該不惜任何代价爭取和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意大利人民的和平。"④

在制宪会議上，共产党的代表和議員对和約作了深刻的政治和历史分析。他們令人信服地证明，如果意大利人民沒有起来反对法西斯暴政，如果意大利沒有参加解放战爭（人民願意进行这个战爭，他們战胜了統治阶級的反抗和动搖），如果沒有游击战爭和全意大利的爭取解放的起义，那么这个和約还要苛刻得多。同时，共产党又指出，如果意大利政府执行的是另一种政策，如果它富有那种鼓舞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而不使对外政策服从于具有党的或阶級的性质的思想目的，那么这个和約的情况可能会好一些。意大利政府的这种对外政策分裂了人民，排挤掉了民族利益，走上了一面倒和效忠于西方的道路⑤。

三、意大利加入帝国主义国家的經济和軍事—政治集团

国內外反动派在实現他們計划的道路上还必須克服一个重要的障碍。反动派为了使意大利能够彻底走上美国及其所組織的集团的政治軌道，就必須在1948年4月18日的意大利議会大选中巩固天主教民主党的陣地，这些陣地是在左翼勢力被逐出加斯貝利政府后为他們占領的。这是美国这一阶段在意大利的主要政治

③ 帕·陶里亚蒂在制宪会議上指出："事实上，解放斗爭的創議者不是国家也不是政府，而是人民。"（*П. Тольятти.* Речи в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м собрании, стр. 133.）

④ *П. Тольятти.* Речи в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м собрании, стр. 134—135.

⑤ 同上书第254—256頁。

目的。

华盛頓在加斯貝利政府的帮助下很快就巩固了自己在意大利的經济和政治势力。1948年1月3日，美意之間签訂了对意大利来說具有奴役性的"无偿非常援助"协定。这个协定給了美国政府以实际控制意大利經济和对內对外政策的可能性。过了一个月，于1948年2月2日签訂了意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約。作为这一条約基础的依然是那个美国早就企图偷运到和約中去的、臭名远揚"机会均等"原則。这一条約又給了美国一个施加压力的有力的杠杆①。

新的意美协定为意大利接受"馬歇尔計划"准备了土壤。但是这些协定也有暫时的政治目的，即旨在巩固加斯貝利及其政党在1948年4月18日大选前夕的陣地。与此同时，意大利人民受到了来自美帝国主义方面的恫吓。

《商业周刊》——美国壟断集团的喉舌在这些日子里写道："意大利是美国的領土。当去年加斯貝利把共产党員排挤出政府的时候，美国在这里掌握了主动权，美国打算在这里保持这种主动权。馬歇尔和福莱斯特深信，西方国家不能让意大利沿着共产主义路綫发展……它們的第一目的就是通过政治和經济压力影响意大利大选的結果。如果这还无效，那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华盛頓并不排除甚至采用武装干涉的手段。"

美国国务院給天主教民主党三百万美元作为組織选举运动之用。美国命令其在地中海的舰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并到处散布，"在必要的时刻，它将帮助罗馬政府"。就在大选之前美国宣布：美国"飞行堡垒"将于4月18日經过意大利飞往近东。法国軍队在与意大利接壤的国境綫上进行示威，表示准备帮助阿·德·加斯貝利。同时还流傳着一些流言：如果左翼力量得胜，美国将停止对意大利的援助，这样全国都要处在饥餓之中。美国通过同梵蒂岡和意大利反动派整个陣营的联系，促进了天主教民主党在大选中的"胜利"。

英美的外交人員在法国的参与下，在"意大利陣地上"发动了

① «Documenti di vita italiana» № 1, Dicembre 1951, p. 8.

决定性的进攻，以便吸引这个国家参加他們的集团。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一个步驟是使意大利接受"馬歇尔計划"。

1948年4月16日在巴黎签訂了欧洲經济合作公約，意大利在这公約上签了字。这是議会大选前两天的事情①。在这以前，在1948年1月于倫敦就意英之間的經济关系举行了会談，并且在3月間建立了比荷卢同盟。意大利沒有直接参加这一集团，但是却使自己同法国的相互关系更加密切了。斯福尔查和皮杜尔于3月20日在都灵签訂了訂立法意关稅同盟的議定书、商务协定和支付議定书。②皮杜尔宣布，西方三大国已决定通过外交途徑向苏联提出，必須把的里雅斯特自由領土归还給意大利。这位法国部长宣称，他的政府贊同意大利关于自己前殖民地的要求。4月20日三大国发表联合宣言，建議把的里雅斯特的自由領土归还給意大利。③

1948年6月1日，加斯貝利在向議会报告关于自己新組成的政府的时候，宣布接受"馬歇尔計划"对意大利的經济援助綱領。意大利在第一年应該得到七亿零三百万美元。斯福尔查6月15日在参議院发言时，千方百計地企图证明意大利参加"馬歇尔計划"是正确的。天主教民主党的头子之一、后为意大利国防部长的巴奥洛·塔維亚尼，在1948年11月到12月进行的議会关于"馬歇尔計划"的辯論时，完全公开地宣称，必須"确定意大利在世界中的立場，世界的掠厥并沒有排除或許是遙远的、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④

由于意大利参加了就"馬歇尔計划"举行的巴黎会議，就把自

---

① 《Documents on European Recovery and Defence. March 1947—April 1949》. London-New York, 1949, p. 67—77. 意美互助双边协定是在1948年6月28日签訂的。

② 意法关稅同盟条約是1949年3月26日在巴黎签訂的（《Documents…》, p. 131—135）。

③ 《Documenti di vita italiana》 № 1, Dicembre 1951, p. 8—9.

己的命运同那些有意識地在政治上分裂欧洲并为建立北大西洋集团准备基础的人联結在一起。意大利政府依靠美国推行其对內政策，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新組織的集团中。意大利在参加"馬歇尔計划"后，就为外国經常干涉自己的內政和經济提供了基础。它被迫拒絕与东欧国家进行經济和貿易上的合作，采取美国奉行的歧視这些国家的政策。意大利附和分裂欧洲的政策，陷入了已經不能自拔的政治傾向的支配中。它对这些政治傾向只能是服从，使自己的政策适应于美国的政策，正如它不得不使自己的經济适应于美国壟断組織的經济利益一样⑤。

然而，"馬歇尔計划"并不是美国靠阿·德·加斯貝利和斯福尔查的帮助引导意大利去的最后的政治港灣。不久之后，統治集团提出了关于意大利直接参加西方国家反苏的軍事政治集团的問題。

意大利反动派的"老朋友"溫·丘吉尔，1948年5月7日在海牙号召意大利参加布魯塞尔条約，以便"完全恢复它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⑥ 加斯貝利提出了对同意参加新的軍事集团的"补偿"問題，特别是的里雅斯特和过去的殖民地的問題。加斯貝利从自己方面答应給美国及其新的侵略集团提供軍事基地和兵員。

1949年1月，布魯塞尔条約的参加国正式邀請意大利加入西方联盟。意大利共产党立刻起来揭露把意大利拉入欧洲反苏軍事政治集团新体系的企图。帕·陶里亚蒂于1949年2月26日明确宣布了意大利劳动人民在侵略势力发动新战爭时应当采取的立場。

但是意大利反动派在美国的唆使下，决定不顾一切地硬干。巴·塔維亚尼在議会上发言时，竟大发雷霆，攻击那些談論"意大

---

④ *P. E. Taviani.* Solidarietà atlantica e comunità europea. Firenze, 1957, p. 5.

⑤ 参見 *П. Тольятти.* Речи в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м собрании, стр. 267—275.

⑥ «Documenti di vita italiana», № 1, Dicembre 1951, p. 10.

利有可能走中立主义道路并对两大体系和两大集团采取袖手旁观态度"① 的人。意大利政府在得到关于加入北大西洋联盟組織者的正式邀請之后，于 1949 年 4 月 4 日签訂了該条約。5 月 5 日它在倫敦同意了"欧洲委員会"的規章。

加斯貝利于 1949 年 7 月 1 日利用政府中的大多数(天主教民主党、保皇党、自由党、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在三百二十三票贊成、一百六十票反对和八票棄权的情况下强使議会通过了批准北大西洋公約的决定。

人民群众对統治集团的这种卖国政策感到憤慨。在議会內外，就意大利加入大西洋集团和国家的整个对外政策問題展开了激烈的斗爭。在众議院中，辯論連續进行了五十一小时之久，这一情况就足够說明一切了。天主教民主党人只是用强奸意大利民意的办法和不擇手段的卑鄙伎俩才得以拼凑成多数和通过法令。

北大西洋公約的得到批准，反映了天主教民主党对內政策的反动性及其違反民族利益的对外政策。毫无疑問，意大利反动派需要北大西洋公約作为保护其国內阶級利益、反对劳动人民群众的保障。

这样，意大利在和約批准两年后就被吸收到美国所領导的旨在反对苏联、反对世界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經济、政治集团体系中去了。

可見，意大利的反动势力已陷入了自己的对外政策的恶性循环中，又回到已一度驅使它走向战爭和民族灾难的那个立場上去了。然而，妄图重溫"大国"旧梦并为此牺牲了民族利益的意大利統治集团，并未能給意大利爭得帝国主义群魔会上的一席。意大利在北大西洋公約中从一开始就是二等伙伴，只配順从地执行帝国主义政界"有錢有势的人們"所制定的方針。

① *P. E. Taviani*. Solidarieta atlantica e comunità europea, p. 34.

第 五 篇

在战后安排的基本問題上两种方針——民主方針和帝国主义方針的斗爭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极其复杂的国际問題。必須实現一种和平安排以可靠地巩固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

还在大战进行时，三大国政府首脑就已在其各項决議中提出并商定了为和平的利益而进行国际合作的基本指导原則。这一重要情况有助于达成民主的和平安排的目的。由于苏联的参与，大国的各項决議总的說来是具有深刻的进步性和建設性的。苏联国际威信的空前增长，可靠地保证了这次的和平安排不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样，具有帝国主义的性质。

同时，由于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家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而首先是美国的反动野心，联盟內部的矛盾不能不对和平安排发生影响。这些矛盾在战爭进行中就已表現出来。但那时由于軍事方面的需要，这些矛盾受到了抑制，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共同敌人的存在巩固了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而現在共同的敌人被消灭了，因而只有抱着眞正为和平而合作的願望，才能采取共同行动，实現有效的和平安排。

苏联强烈地、明确地表示了这种願望。而西方国家則采取了另外一种政策。这一政策立即表明了它的帝国主义性质。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統治集团，在对待巩固对法西斯主义胜利的問題上，不是从持久和平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壟断資本的統治势力的利益出发。

所以，在从战爭轉到和平的重要时刻，两种方向、两种相反的傾向——民主的和帝国主义的傾向在国际舞台上公开地对立起来。第一种傾向体現了苏联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政策。第二种傾向則体現了西方国家，而首先是美国和英国的政策。这两种傾向的斗爭也就构成了和平安排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許多国际問題的长期和复杂的外交活动的实质。

在这些問題中，对德国和日本的媾和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在解决对德媾和問題时，所指的不仅是完成傳統的任务——締結确定战爭結束的和約，而且还要确定新的德意志国家的性质、德国的經济和政治結构，也就是說，实质上要解决德国的命运問題。这是国际关系上史无前例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在苏联同西方国家的目的和願望之間存在根本差别的复杂条件下，在德国本身存在着尖銳阶級斗爭，即在德国領土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的情况下解决的。

对希特勒集团的最大成員国日本的媾和任务也是十分复杂的。这里，有其不同的特点，例如，这种特点是同在日本保存全国的国家政权相联系的。日本的領土全部被美国軍队占領。这里民主力量的斗爭，是在占領当局全力支持反动势力的复杂条件下展开的。在日本，美帝国主义有更大的可能影响事件的进程。但就是在这里，它也不得不考虑民主力量的增长，考虑远东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考虑苏联爱好和平的和民主的政策。

对希特勒德国前同盟国意大利、芬兰、匈牙利、罗馬尼亚和保

加利亚的媾和任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当时的情况容許立即着手解决这个任务，而且这个任务也順利地解决了，尽管帝国主义国家曾企图利用締結和約干涉东欧国家的內政，把帝国主义"和平"强加給它們。由于苏联的参与，对德国前盟国的媾和，同帝国主义的凡尔賽和約相比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联合国的建立是战后最初几年国际关系中的积极現象。联合国的建立就表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国际生活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和其他主張战后对世界进行民主安排的国家击退了反动势力企图复活臭名昭彰的国际联盟的阴謀。产生了新的国际組織，它有相当的理由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根据和平共处的精神发展国际关系的基础。

最后，战爭的結束为研究和解决裁軍問題創造了有利的可能。当时两个主要的侵略策源地——法西斯德国和軍国主义日本的消灭首先促进了这一点。在剛剛經受了战爭苦难的各国人民中間，裁軍的願望大为增强。原子武器的出現說明了裁軍的迫切必要，因为新的战爭給人类带来的災难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人們所經受的一切要巨大得多。广島和长崎的慘剧会以无比巨大的規模重演。

如果裁軍的問題在战后初期，虽有現实可能而竟未能得到解决，那么在这方面的罪責只应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承担。至于苏联，那么，它曾为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問題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

总結和平安排方面两种方針的斗爭时，必須指出，在战后初期西方反动集团制定和实行的帝国主义的和約計划，首先是破坏和"甩掉"共产主义的計划完全遭到了破产。西方国家的有势力集团曾經指望利用战爭的結局来加强資本主义的陣地和削弱社会主义。它們曾妄图以美国的原子壟断来迫使苏联接受帝国主义的和

平安排办法。它們曾經企望，担負了战爭主要担子的苏联会由此而削弱，而不得不俯耳听命于那些力图阻撓在任何地方，特别是在德国和东欧实現民主改造的帝国主义者。所有这些阴謀都遭到了完全的破产。帝国主义不仅沒有能够"甩掉"共产主义，而且自己也不得不挤一挤，让出些位置来。帝国主义的統治范圍大大縮小了。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使国际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加强和平事业作出了不可估計的貢献，因为在我們的时代，社会主义陣营国家的威力是維护和加强和平的主要的和决定性的因素。由此可以作出結論說，尽管帝国主义者破坏解决德国問題、裁軍等有关和平安排的問題的解决，但是为和平安排而斗爭的进程，总的說来，是以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力量的决定性胜利而告終的。

第十八章

战后和平安排的基本原則和从1945—1949年的德国問題

一、德黑兰会議、雅尔塔会議和波茨坦会議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和平安排的任务是多方面的，是极其复杂的。这首先是由于在1939年到1945年的战爭中取得的对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全部战后的国际关系，都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取得民主和公正和平的条件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要有

利得多，这是因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如此，苏联在战爭中还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当然，这不能不确定了苏联在战后調整中的作用和意义。在解决最重要的国际問題时，苏联坚定地站在維护民主与和平的利益的立場上。

不言而喻，在討論和平安排的具体問題时，西方国家的統治集团总是以帝国主义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为依据的，而这种利益是同取得眞正民主的和平这个任务根本不相容的。这往往造成苏联同英国和美国政府之間的尖銳冲突。但是，美国和英国的外交无法强制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接受它們在战后安排的最重要問題上的观点。

在战爭进行期間和战后，在反希特勒联盟的主要国家苏联、美国、英国的国际会議上，圍繞这些問題而展开的斗爭都带有鮮明的阶級性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个世界，在这里发生了冲突。在这場冲突中，社会主义的国际政治概念——两种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国际合作、不干涉他国內政等等——的生命力得到了明显的表現。

发展战时盟国关系，并以制定一致同意的战后改造綱領的方式来合乎邏輯地結束这种盟国关系，是国际生活的客观必然性，是不以西方国家某些領导人的意志为轉移的。这是由加强反希特勒联盟和規定在整个战爭期間参加联盟的資本主义大国迫切需要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軍事和政治合作的某些規律所决定的。下述因素具有特别的意义：

第一，在对法西斯德国作战中苏联的决定性作用。西方国家——苏联的盟国必須承认苏联是对胜利作出了最大貢献的国家。

第二，是人民群众的意志。人民群众认为反对法西斯敌人的

斗爭是共同的事业，而不管反希特勒联盟的各国具有什么样的制度。在整个战爭期間，人民群众对資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施加了直接的影响，促使它們加强軍事行动，憤怒地对待反动派寻找途徑同希特勒政府单独媾和的任何企图。

第三，还应当考虑到那时在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家和欧洲的法西斯国家之間所形成的力量对比。英国和法国由于它們战前的反动政府所执行的政策，由于它們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綏靖"方針而自食恶果。英国和法国的統治集团不能不理解，当它們的国家一对一地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发生冲突时，必然会遭到失敗。它們不能不理解，苏联对战胜希特勒德国的事业作出的貢献，是欧洲国家得以恢复独立的最重要的保证。

因此，在战爭期間，盟国之間进行合作是具有牢靠基础的，那就是共同的軍事利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国都共同关心协商一致解决反希特勒联盟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正是这种情况促使資本主义国家謹慎行事，抑制自己的帝国主义野心，寻求妥协性的解决办法，考虑苏联的利益和立場，并且往往違反自己的意願，接受苏联的观点。

在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之后不久，苏联政府和英国政府就签訂了为对德作战采取联合行动的协定（1941 年 7 月 12 日訂于莫斯科），根据这个协定，两国承担义务，在同希特勒德国作战中彼此合作，不同敌人举行任何单独談判，也不同敌人締結单独和約。从 1941 年 9 月 29 日到 10 月 1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三国（苏、英、美）代表会議，商討在軍事供应上协力互助的事宜。

会議通过了一項决議，强調指出三国政府願意在消灭希特勒暴政以后，保障各国人民的和平和安全，并創造条件使他們能够过沒有恐惧和貧困的生活。在 1942 年 1 月，接受了"联合国家"这个称呼的二十六个国

家，包括美国、苏联和英国，在华盛頓签署了一个宣言，保证为爭取一切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为維护人权和正义而共同斗爭。①1942 年 5 月 26 日英苏签訂了同盟互助条約。这个条約的第二部分不仅規定了在战爭期間共同行动的原則，而且也規定了在战后时期共同行动的原則，以維护和平。②

1943 年 10 月 19 日到 30 日在莫斯科举行的苏联、美国和英国的第一次外长会議对于共同解决有关战后和平的各項問題具有重大意义。莫斯科会議为战时定期举行的高級三边会議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議不仅确认了应該共同解决战后各項問題的原則，而且确定了和平安排方面的某些重要的一般性規定，成立了研究保障欧洲和平問題的机构。

会議通过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問題的宣言③規定尽快建立一个国际組織来維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組織“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則，所有国家无論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員国”④。这样主权原則就成了应該确保战后和平的未来国际組織的基础。莫斯科会議对于确定战后安排基础这个方面的重要貢献就在于此。

宣言还指出，宣言签字国在战爭結束后，将不在其他国家領土內使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赫尔发表的回忆录中明确地指出，这一規定还包括禁止在外国領土建立海軍和空軍基地⑤。

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說，三外长决定建立一个联合机构——欧洲諮詢委員会，会址設在倫敦。委員会的任务是研究欧洲問題，并向美国、英国和苏联政府提出联合建議。公报强調指出，委員会的任务是确保三国政府在欧洲問題上进行最紧密的合作。因此重申，有关战后安排的一切問題必須在眞誠国际合作的情况下共同加以解决。

---

① 参見本书第二十一章。

②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 стр. 270—271。

③ 除了美国、英国和苏联以外，中国也在宣言上签了字。

④ 《国际条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403 頁。

⑤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II, p. 1299—1300.

1943年底举行的德黑兰会議是制定战后安排基础的道路上的重要阶段。美国、英国和苏联三国政府首脑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了。在这里决定了战爭的根本問題和战后安排的問題。在会議开幕的那一天，丘吉尔这样說明了会議的意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曾經有过的最大一次世界力量的聚会。在我們的手里要解决关于縮短战爭时間、关于贏得胜利、关于人类未来命运的問題"①。

会議商定了詳細的軍事行动計划，并明确指出，主要的是苏德战綫，同它相比其他战綫仅起次要作用。罗斯福总統談到会議的結果时說："我們从广大目标的观点而不是从細节討論了国际关系"②。这种"目光的广大"正是德黑兰会議决議的特点，它决定着这次会議的重要性。

德黑兰会議的决議指出："我們已經議定了关于将德軍消灭的計划。我們已就将从东面、西面、和南面进行的軍事行动的規模和时間，商得完全的协議"③。关于战后安排的原則，在德黑兰通过的三国宣言中說，苏联、美国和英国政府完全承认它們負有崇高的責任，"要創造一种和平，这种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許多世代中，排除战爭的災难和恐怖"④。

苏联的彻底的民主路綫和綱領是同資本主义国家反动集团以帝国主义和平結束战爭的意願相对立的，苏联为自己提出的目标是，通过完全和彻底地击潰德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道路尽快結束

① «Тегера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трех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61, № 7, стр. 179.

② «Nothing to Fear». The Selected Addresses of F. D. Roosevelt 1932—1945. New York, 1947, p. 383.

③ 《国际条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408頁。

④ 同上。

战爭和为巩固的与持久的和平創造前提。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和苏联政府制定的綱領完全建立在各国人民享有平等和主权、坚决和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列宁主义原則之上，建立在不同社会經济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則之上。

一切种族平等和各国人民友好的列宁主义政策也决定着苏联对德国問題的态度。苏联从来不打算消除德国人民或消灭德意志国家。苏联提出粉碎希特勒軍队——侵略的德国帝国主义的产物这个目的后，从来不认为德国的居民全是反动的，从来沒有在德国帝国主义統治者和德国人民之間划等号，认为在德国存在着民主分子，他們即使在法西斯統治的严酷条件下也沒有停止过同德国帝国主义的斗爭。

还在1942年11月苏联就宣布，它无意消灭德国。苏联在确定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在对法西斯德国斗爭中的任务时指出，战爭的胜利以消灭希特勒德国、击溃法西斯軍队和消灭各国人民所仇恨的欧洲納粹"新秩序"为前提。这些任务的解决不仅符合对希特勒德国作战的各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德国人民自身的根本民族利益。

彻底鏟除法西斯主义和軍国主义始終是德国人民和爱好和平的德意志国家民主复兴的最重要前提，而苏联提出来的綱領恰恰可以归結为这一点。

美国和英国的政府首脑提出了分裂德国的計划，力图在德黑兰会議上把这个計划强加給苏联。但这种企图以西方国家的失败而告終。

哈里·霍布金斯在他关于会議閉会的記事中，談到丘吉尔和罗斯福关于德国問題的建議时供认，苏联代表团对于从分裂德国的計划出发的两个

建議沒有表示特别的热情，而是提請注意必須消除普魯士軍国主义和納粹机构，即必須实現德国的民主化。如霍布金斯所写的，正是由于苏联代表团在德黑兰的这种立場，“这个問題的討論沒有得到結果。决定把这个問題提到倫敦的欧洲諮詢委員会进一步研究”①。以反苏的观点而著名的西德反动历史学家鮑里斯·迈斯納尔也不得不承认，苏联代表团在德黑兰所关心的不是分裂德国，而是清除軍官基干和消灭参謀总部的問題。②

在欧洲諮詢委員会中，这个問題的討論也由于苏联对分裂計划的鮮明否定态度沒有达成任何具体的决議。

由于战爭最后几年和战后头几个月（1945 年 2 月在雅尔塔和同年 7 月到 8 月在波茨坦召开的三大国政府首脑会議）举行的談判和会晤，战后时期的积极綱領終于确立了。

雅尔塔会晤具有特别的意义：它确定了建立战后和平，特别是建立战后德国所依据的原則。在雅尔塔还通过了关于共同管制德国和关于建立和平安排机构的重要組織性决議。在雅尔塔的决議中对德政策的主要原則是这样讲的：“我們不屈不撓的宗旨，就是要消灭德国軍国主义和納粹主义，要确保德国不能够再扰乱世界的和平。……我們的宗旨决不是要消灭德国的人民，但是惟有当納粹主义和軍国主义已經根絕了的时候，德国人民才有过适当生活的希望，他們才有在国际友誼中占一席地位的希望。”③

这个基本原則完完全全符合苏联在德国問題上的对外政策所遵循的立場。同时，雅尔塔会議的这个原則同美国和英国初期的立場是有很大距离的。因此，在規定盟国对德政策的主要目标方

---

① *Р. Шервуд.* Рузвельт и Гопкинс.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 т. II, стр. 493.

② *B. Meissner.* Russland, die Westmächte und Deutschland. Die sowjet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943—1953. Hamburg, 1954, S. 33.

③ 《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4 頁。

面，苏联的路綫取得了胜利。这对于进一步制定盟国对德的战后綱領有着重大的意义。

雅尔塔会議为达到消灭德国軍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改造德国这个基本目标制定了具体措施。盟国必須遵循的原則本身以及具体措施，都实际上勾銷了仅仅在雅尔塔会議前几个月在魁北克拟定的、以“摩根索計划”这个名称而著名的美英对德綱領。这些措施同“摩根索計划”所要求的、把德国变为农业国的方針沒有任何共同之点，相反，而是要在民主与和平的基础上改造德国經济的条件下，促进德国經济的繁荣。

雅尔塔会議决定实現盟国軍队对德国的临时占領，并給四大国（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中每个国家划定了单独的占領区。为了管制德国，决定在柏林設立中央管制委員会，它的任务是协調各占領区行政的措施和实現对整个德国的管制。

正是在雅尔塔决定了吸收法国参加中央管制委員会，邀請法国負責一个占領区，“如果它願意这样做的話”。在雅尔塔会議以前，无論英国还是美国都坚决反对邀請法国。可是在这次会議上美国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特别是由于法苏同盟互助条約的签訂，对加强法国的地位起了作用。法国参加德国命运的解决是符合苏联对外政策的立場的，这种政策力求达到包括法国在內的一切大国的紧密合作。

雅尔塔会議通过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宣言說：“必須凭借足以使被解放的各国人民能够消灭納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最后痕迹，根据他們自己的选擇建立民主制度的途徑来达到欧洲秩序的建立和国家經济生活的改造。根据大西洋宪章关于一切国家的人民有权选擇他們生活于其下的政府形式这个原則，必須保证被侵略国家用暴力夺去主权和自治的各国人民恢复主权和自治”①。因此，雅尔塔决議固

① 《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 頁。

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原则，这就是在被解放的国家的人民选擇战后的社会經济制度和管理形式时大国不得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在这里苏联始終为之而斗爭的原則取得了胜利。

最后，雅尔塔会議通过了以《为和平而团結正如为战爭而团結》为标題的这个最重要的原則性的文件。这个文件强調指出了战后大国經常合作的必要性。“唯有我們三国之間以及一切爱好自由的各国之間，继續增进的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現人类最崇高的願望——一种安全而且持久的和平……”①，这就是会議的結論。換句話說，雅尔塔会議是从战后时期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資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出发的。

和平安排远东問題的基础也是在战爭期間的各次国际会議上建立的②。在这方面雅尔塔会議有着特别的意义，在这次会議上达成了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在这个文件中說：“三大国領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爭結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內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③。三大国关于远东問題的克里米亚协定特别規定将千島群島和庫頁島南部归还苏联。

苏联即将参加对日作战大大地影响了波茨坦会議的进程，使得极其关心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英国和美国願意妥协解决在波茨坦討論的和平安排的最尖銳問題。

雅尔塔会議的各項决議为战爭結束后民主安排国际問題創造了必要的基础。1945年7月17日到8月2日举行的三大国波茨坦会議达成了体現在有关国际文件中的关于这种安排的协議。

在波茨坦苏联政府是建立民主与爱好和平的統一的德国的捍卫者。波茨坦协定首先确定了建立这种德国的原則。决議指出：“盟国并无毀灭或奴役德国人民之心意，盟方实欲德国人民获得机

① 《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7頁。

② 参見本书第十九章。

③ 《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8頁。

会，在民主及和平的基础上重建其生活。倘其自身努力能悉集中于此目的，则德国人民在适当之时期，当能在世界之自由及和平的人民中获得地位。”①

在規定盟国的經济原則的部分指出：“在占領期間中，德国应被視为一个經济单位”②。

四国管制德国的問題是同保证德国的經济和政治統一的問題密切相联的。波茨坦会議对拟定四个占領国共同管理德国的制度給予了密切的注意。在波茨坦签訂的《关于管制初期在处置德国时所应当遵循的政治及經济原則的协定》的第一条規定：“德国境內最高权力由美英苏法四国总司令遵本国政府命令，分别在其各占領区执行；彼等并以管制委員会委員之地位，共同处置有关全德国之一般事件。”③

协定明确規定了管制委員会所应遵循的占領目标：第一，保证解除德国的全部武装，使完全非軍事化，鏟除或控制可用以作軍事生产之一切德国工业；第二，使德国人民确信軍事上已完全失敗，并不能逃避对其执政者的罪行所負的責任；第三，摧毁納粹党及其附屬与监督之机构，解散一切納粹組織，并确保此等机构組織不得以任何形式复活，所有納粹軍人之活动及宣傳必須制止；第四，准备使德国政治生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彻底的改造，并使德国将来在国际生活上参与和平合作。

波茨坦协定第十五条指出，“同盟国之管制将施諸德国經济”，以便“实施工业上解除武装和非軍国主义化、賠偿和經核准之进出口計划”以及“管制德国之工业、及一切經济金融之国际交往”④。

波茨坦会議决定成立外长会議（由英国、苏联、中国、法国和美国的外交部长組成）也有重要的意义，它“将被用于准备对德和平安排事項，以便将来符合这一目的的德国政府建立时，由該政府接受相应的文件”⑤。

---

① 《反法西斯战爭文献》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第 303 頁。

② 《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83 頁。

③ 同上书第 81 頁。

④ 参見同上书第 83—84 頁。

⑤ 参見同上书第 80 頁。

波茨坦会議制定了使德国非軍国主义化和民主化的詳細綱領。波茨坦协定規定完全解除德国武装，廢除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和軍事化的組織、参謀总部、一切为保持德国軍事傳統服务的协会。还制定了关于消灭軍事工厂和防止生产各种类型武器、关于消除軍国主义分子和納粹分子在德国活动的具体措施。还規定了反对德国壟断联合組織这类德国侵略的眞正組織者和鼓动者的特别措施。第十二条("經济原則"部分)規定："德国的經济应分散，以便消灭目前經济力量的过分集中，特别是以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及其他壟断联合組織的形式表現的集中"①。

在波茨坦通过的賠偿决定指的是对希特勒占領者所造成的損失的局部賠偿。賠偿应由每个占領国从自己的占領区征收。賠偿总数規定为二百亿美元。此外还規定，苏联应获得西方占領区內須加銷毀或沒收的多余的工业装备的25%(其中10%是无偿的)。

波茨坦会議規定了德国的东部边界綫。根据克里米亚会議的决議，在德国东部的波兰領土重新并入了波兰。德国的边界沿奥得河和尼斯河西段划定。此外，哥尼斯堡城(現在的加里宁格勒)及其附近地区移交給苏联。

当然，波茨坦会議的各項决議并非对于战后和平安排都是同等重要的。其中許多带有过渡的性质，只是为战爭結束后的头一个时期考虑的。例如，規定占領当局权限的部分就完全屬于这种情况。

波茨坦决議的民主的、旨在保证国际安全的性质反映在現在还保持着意义的如下几个基本規定中：

(1)德国的整个政治生活应当按民主的方式加以改造，而且应当給予德国人民一切机会，使他們自己在反法西斯的、和平的基础上实現其生活改造。

(2)德国軍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必須永远消灭，使德国永远不

① 《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83頁。

再威胁自己的邻国或世界和平。

(3)德国壟断联合組織应予消灭，因为它們就是德国軍国主义的骨干，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負有直接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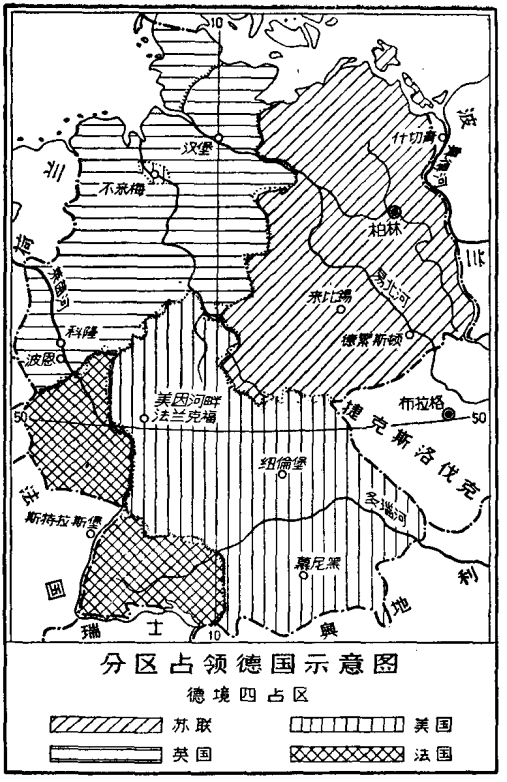
(4)必須立即开始制定和約的准备工作，而以后必須同符合波茨坦协定原則的德国締結和約。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力对波茨坦协定起了不良的影响，它們力图在德国問題的解决方面达到自私的目的。协定的无疑缺点是沒有明确指出德国中央政府必須立即建立。还在波茨坦会議以前苏联代表团就一再提出这个問題，在这次会議上又一次提出这个問題，可是未能得到最終的解决。根据美国代表团的建議，这个問題的审查被擱置下来了。会議只是規定“建立某些非常重要的德国中央行政部門”，特别是在財政、运輸、交通、对外貿易和工业等方面。

沒有中央政府便利了帝国主义国家在战后分裂德国，促进了波茨坦会議关于共同管理德国的决議遭受破坏。这就为德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种罪过完全由美国和英国来承担，是它們反对就建立中央政府通过相应的决議。

还应当指出，波茨坦协定中反映了西方国家使德国“非工业化”的某些观点。正如上面所指出，虽然根据“摩根索計划”把德国变为农业国的企图遭到坚决的拒絕，但协定中仍然包括了(根据美国代表团的坚决要求)限制德国工业发展的某些条文。苏联认为像限制德国工业生产水平这样一些措施完全是暫时的。可是波茨坦协定的这些条款后来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占領区的行政当局用来阻碍恢复过程，这就延长了西方占領区的經济破坏状态。

战爭結束以后提出了实际实現在波茨坦通过的綱領的問題。随着希特勒德国在1939—1945年的战爭中的完全被粉碎，形成了



一种历史上沒有相类似的局面。法西斯帝国倒台了，停止了自己的生存。它的执政者除希特勒及其几个亲信以自杀結束生命外，都被盟方当局逮捕起来，等候各国人民审判。

1945年在紐倫堡开始了对主要战犯的审訊过程。国际軍事法庭执行各国人民的意志，給大多数希特勒头目判了死刑。法西斯主义的滔天罪行在审訊过程中的揭露再一次着重說明了实現波茨坦协定的迫切性和刻不容緩性。

为了使德国非軍国主义化、非納粹化、民主化，盟国的决議規定由四大国的軍队临时占領相应的地区；位置在苏联占領区內的柏林成为管制委員会的所在地，柏林的西部容許美国、英国和法国的軍队进入。

从此，通过德国領土的分界綫不单純是参加反法西斯战爭的主要国家的軍队之間的分界綫，而且还是不同社会經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資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武装部队之間的分界綫。这使同盟国家遇到了直到現在还沒有任何一个大国联盟曾經解决过的問題。

随着战爭結束，在国际关系的整个范圍內形成了新的局势。軍事利益的一致性曾經把反希特勒联盟的国家联合起来，曾經使帝国主义强国看得起苏联，把它当作是反法西斯德国斗爭中的主要力量，現在从这种一致性留下的痕迹不多了。美国帝国主义变为資本主义世界中占优势的力量，它力图攫取战胜法西斯德国的果实，不仅要对資本主义国家、而且要对全世界建立独霸的統治①。

战后美国和英国的主要国务活动家认为，必須考虑苏联的利益和观点的时候过去了，从現在起应当强使苏联接受他們的意志。美国政府实际上不仅采取了取消战爭年代合作的方針，而且采取了发动反苏"冷战"、拼凑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軍事政治集团来反对世界社会主义、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的方針。美国政府力图取消可以称之为政治遺产的东西——关于战后和平安排、首先是关于战后对待德国的原則的协定。帝国主义国家的新的对外政策方針不仅旨在反对苏联，而且旨在反对世界上为民主性质的战后安排而斗爭的一切进步力量。

二、战爭結束后西方大国的反波茨坦方針

所有三个西方大国——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政府一致力图阻撓在德国进行深刻的民主改造，保存旧的、培育法西斯主义的經济体制。反波茨坦方針是它們的共同綱領。可是这些国家中每个国家的統治集团都企图战后在对待德国方面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在美国、英国和法国之間在执行对待战后德国的具体对外政策路綫方面由此产生了一定的冲突。但是，因为美国对其他一切資本主义大国的鮮明优势已在战后完全确立，美国的政策归根到底决

① 参見本书第十四章。

定了西方大国在德国的路綫。

美国占領当局最初在德国的政策是由杜魯門在1945年5月10日签署的IGS/1067号指令决定的。这个指令是立脚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議上所同意的“摩根索計划”基础上的。指令中指出：“德国被占領不是为了它的解放，而是因为它是被战敗的敌国。德国問題的解决应当促使这个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結构的非集中化以及地方自治的发展。为此目的，对于各州、区、市行政当局中間的任何自治意向都应当予以支持”①。克萊将軍证实，在1947年7月15日以前，在这个指令被新的指令代替以前，也就是說，在两年多的时期內，美国行政当局的行动“是由IGS/1067号指令决定的，这項指令旨在建立迦太基式的和平。”②（也就是旨在消灭德国）

当然，这种政策同履行波茨坦协定沒有任何共同之点。美国壟断組織需要的只是消灭德国今后成为世界市場上美国竞爭对手的能力。至于波茨坦协定，美国占領当局則阻撓协定中关于非軍国主义化、限制壟断組織等等最重要規定的执行。美国当局积极帮助魯尔壟断組織复活，对恢复和平工业部門和农业沒有做任何事情。西德的經济籠罩着混乱，随后美国在自己的政策中立即利用了这种混乱。这种政策詳細地公开表述在1946年9月6日国务卿貝尔納斯在斯图加特的演說中。貝尔納斯首先攻击关于德国东部边界的波茨坦决議，并声称虽然美国“在原則上”也支持波兰关于收复从前屬德国管的、它的西部領土这个要求，“但是应当划归波兰的土地的大小只有在最后安排时来确定”③。这样一来，尽

①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October 21, 1945, p. 596.

② *L. 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p. 19.

③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 p. 527.

管在波茨坦明确决定，盟国将在和平会議上完全支持在波茨坦确定的領土状况，而在美国国务卿的演說中德国东部边界的問題却变成了盟国之間发生冲突的对象。

貝尔納斯打着在西德恢复"自足經济"的幌子，在演說中宣布了把西方占領区联合起来以及在联邦制的基础建立管理机构的意图。

貝尔納斯的演說实际上是公开拒絕履行波茨坦协定。它标志着美国同盟国关于德国問題的协定的正式决裂。

1947年1月17日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紐約全国出版者协会会議上的演說暴露了美国"新方針"的涵义。这个演說引起了广泛的反映，被认为是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的眞正立場的最露骨表示。杜勒斯說："規划德国的未来时，需要更多考虑的是欧洲經济統一的概念，而不是宣称德国必須成为統一經济整体的波茨坦条約的概念"①。杜勒斯从这种立場出发，編制了一个由联邦化的和非集中的德国、法国、比利时以及荷兰成立"西方联盟"的計划。

这些演說的基础实际上就是把德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的方針。这也就是企图把分裂德国的方針同那种在美国統治下合幷西方占領区幷利用西德經济潜力和人力来实現美帝国主义反苏計划的政策結合起来。

使西方占領区分立的准备工作早在1946年初就开始实行了。美国前駐德高級专員刘歇斯·克莱承认，1946年春天他第一次同国务卿討論了美国和英国占領区合幷的問題。同年五月，克莱根据貝尔納斯的要求拟制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中說："合幷起来的英国和美国占領区可以在几年內做到自足……。我們完全意識到这种合幷的政治后果，但仍然认为，这种

① *J. F. Dulles.* Alternatives for Germany. New York, 1947, p. 3.

后果不如保持現在彼此完全隔离的占領区那样危險"①。

这个建議得到了貝尔納斯的完全支持，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步就这样做了。1946年6月11日我在巴黎宣布了这个措施——不管苏联是否参加把占領区合并起来"②。英国外交大臣貝文第二天就表示同意美国的建議，7月20日美国駐德軍政长官麦克納尼把美国的建議正式交給对德国的管制委員会。过了十天，7月30日，該建議得到了管制委員会英国代表的正式同意；年底，12月2日，英国和美国签訂了合并两国占領区的协定。

1947年7月，符合貝尔納斯在斯图加特提出的新立場的IGS/1779号指令表述了美国的占領政策。这个指令的基本意思是，为把西德变为美国政策的可靠支柱和实現美国的欧洲經济計划的据点开辟道路。关于限制經济集中、尤其是关于反对壟断組織的措施問題，新的指令一字未提。第十九条讲到在"健康的基础上"改造财政，而其他的条文都是規定在經济上加强西德壟断組織的措施。这項指令賦予了克莱以广泛的权限。指令說："你作为軍事长官的权限，使你有独立行动的广闊場所"③。

美国在德国問題上的政策自然是服从于越来越具有公开侵略和反苏性质的美帝国主义的总方針的。

1947年3月12日宣布了"杜魯門主义"，而在1947年6月5日，馬歇尔就宣布了給予西欧国家美"援"的計划。"馬歇尔計划"的实际实施很快就开始了。这个計划的中心任务之一是恢复西德作为反苏联盟的潜在参加者。美国銀行家詹姆斯·华伯在他的《德国是桥梁还是战斗場所?》一书的德文版前言中指出："从这个时候起，德国就变成了美国和苏联之間激烈进行'冷战'的許多战

① *L. Clay*. Decision in Germany, p. 78.

② *J.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p. 195.

③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 p. 552.

場之一。結果是欧洲的分裂和德国的分裂"①。

英国在德国問題上的政策，是由把魯尔的整个工业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意图，以及建立丘吉尔在战爭年代一直主張的各种欧洲联邦和邦联的方針所决定的。②

聞名的丘吉尔富尔敦演說公开地表示了这样的想法，即"重新建立起来的德国"，說得更确切些，重新軍国主义化的西德应当成为美英"联盟"在欧洲的最重要支柱。丘吉尔建議恢复德国壟断組織的工业实力，停止德国的非納粹化，廢除关于德国东部边界的波茨坦决議。③

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在苏黎世的演說建議成立受美国和英国統治的西欧軍事联盟。丘吉尔提出"法德和解"的思想作为建立这种联盟的前提。具体地說，他力图在西德和法国加入反苏西欧联盟的基础上达到这两个国家的联合。他說："……首先我們必須在区域性体系——欧洲联邦的范圍內重建欧洲大家庭……。在这个十分迫切的事业中法国和德国必須共同承担領导……。大不列顛、英联邦、强大的美国……必須作为好朋友支持这个新的欧洲，帮助它取得生存的权利"④。关于这种联盟的目的，丘吉尔沒有使人产生任何怀疑，他的演說充滿了对苏联的瘋狂攻击和反共产主义的号召。

英国的外交給西德在西欧联盟中划出了重要地位。还在战爭的年代里，他們就力图把德国的个别部分包括到各种欧洲联盟中去。战后，这些老的計划根据大西洋联盟成立方案作了修改。

法国在德国問題上的政策也带有公开反波茨坦的性质。并且，法国的外交比英国和美国的外交早得多、露骨得多地表明了它

① *J. P. Warburg.* Deutschland-Brücke oder Schlachtfeld. Stuttgart, 1949, S. XI.

② 参見本书第十五、二十五、二十六章。

③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46, p. 7770—7772.

④ 同上书第8138頁。

的反波茨坦立場，特别是在德国的經济統一、中央行政机关的建立等等問題上①。

法国的这种立場被美国和英国的政治活动家用作法国人“不让步”的口实来掩盖自己的分裂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拿法国人的“罪过”作口实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为美国和英国的政策辯护。当然，这并不是說，在美英为一方和法国为另一方之間不存在分歧。这种矛盾主要是同来因和魯尔区的命运有关。

魯尔区划入了英国占領区，英国帝国主义认为它可以建立自己对魯尔的独裁統治，而不願意滿足法国壟断組織分割魯尔的要求。法国对魯尔的要求遭到英国的坚决拒絕，并且在这个問題上美国代表完全支持英国的外交。后来，英国的統治集团不得不向另一个更强大的伙伴——美国的压力作越来越大的让步，而英国对魯尔的統治漸漸被美国的实际統治所代替。

但是，如果說法国对魯尔和来因区的要求立刻遭到美国和英国的坚决拒絕，那么薩尔問題就被它們变成了进行无耻政治交易的对象和压制法国的手段。

对战后头几年西方三大国在德国問題上的方針的分析表明，虽然其中每一个国家在追求各自在德国的特殊帝国主义利益，但它們在主要問題上——在分裂德国和把德国的西部变为軍国主义和反苏的跳板的政策上是一致的。由此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結論：战后在德国問題上明确規定了两种对立的方針——苏联的和平民主方針和美英法西方三大国的軍国主义的和反动的方針。

---

① 参見本书第十六章。

三、苏联为履行波茨坦协定所作的斗爭

苏联政府在对德問題的政策上是从战后改造德国的綱領出发的，这个綱領的基础就是波茨坦决議和雅尔塔决議。

在苏联政府的綱領中，在內部政策方面主要是实現德国的民主化，綱領的对外政策的基础就是要求締結对德和約。签訂和約会防止德国的分裂，从而排除利用德国的某一部分作为跳板来实現参加反希特勒联盟的某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侵略政策的可能性。換句話說，和約将排除把西德变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策源地、变为准备新战爭的中心的可能性。

这种立場成了苏联占領当局在德国和苏联外交在国际舞台上的一切活动的基础。

反希特勒联盟的主要国家在第二届外长会議① 会議上詳細討論了德国問題。这届会議的第二期会議是在 1946 年 6 月 15 日到 7 月12日于巴黎举行的。②

---

① 外长会議（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是根据 1945 年柏林会議的决議成立的国际机构，由中、苏、美、英、法外长組成，負責进行战后和平安排的准备工作。1945—1949 年总共举行了六届会議。第一届（倫敦，1945 年 9 月 11 日—10 月 2 日）、第二届（巴黎，分两期：1946 年 4 月 25 日—5 月 16 日和 6 月 15 日—7 月 12 日）和第三届（紐約，1946 年 11 月 4 日—12月12日）。这前三届会議，主要进行对意、罗、保、匈、芬等国和約的准备工作。第四届（莫斯科，1947 年 3 月 10 日—4 月 24 日）、第五届（倫敦，1947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15 日）和第六届（巴黎，1949 年 5 月 23 日—6 月 20日）。这后三届会議，主要討論有关德国問題和准备对奥和約草案。由于美、英、法破坏 1945 年柏林会議和 1945 年波茨坦宣言有关处理德国問題的决議，同西德和日本签訂非法的单独协定，从而使外长会議工作陷于瘫痪。——譯者

② 第一届外长会議会議（1945年 9 月 11 日到 10 月 2 日于倫敦）主要是关于同德国以前的盟国签訂和約的初步談判。1945 年 12 月 16 日到 26 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三国外长会議，討論对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和約問題以及远东的和平安排問題。在巴黎举行的外长会議第二届第一期会議（1946

可是在这次会議上德国問題的討論只带有預备的性质；决定从以后的会議中拿出一次专門审查德国問題。

尽管如此，巴黎会議鮮明地暴露了在德国問題上两条路綫——苏联的路綫和西方国家的路綫——的冲突，特别是关于德国經济和政治統一以及非軍国主义化的問題。

苏联政府提出了旨在和平和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德国統一的建議。它尖銳地譴責了一切联邦制計划，因为这些計划的基础仍然是那种分裂德国的立場。苏联政府声明，它反对任何使德国非工业化的企图，主張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发展德国的經济。

西方国家的代表团断然拒絕了苏联关于和平安排的一切建議。它們拒絕了建立德国中央部門和随后建立全德政府的建議，主張从德国搶走薩尔，主張重新审查波茨坦会議关于把波兰西部土地归还波兰的决議。西方国家在会議外，背着苏联，采取了目的不在于和平安排、而在于在德国西部复活侵略成性的德国軍国主义的实力的实际步驟。这一切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貝尔納斯关于对德和約的巴黎談話的欺騙性。

美国的外交以自己的关于德国非軍国主义化的条約草案同和平安排相对抗，还在 1946 年 4 月 29 日外长会議举行第二届第一期会議的时候，貝尔納斯就把这个草案提交外长們审查。

当然，美英法苏四国签訂关于德国非軍国主义化的条約这个思想本身不会引起苏联政府的反对。后来，苏联作了一切努力，爭取締結眞正符合欧洲和平利益的条約。

可是，当貝尔納斯把美国的条約草案提出来的时候，发現草案的眞正目的并不是使德国非軍国主义化，而是重新审查波茨坦协

年 4 月 25 日到 5 月 15 日）討論了德国非軍国主义化問題以及法国对魯尔和来因区的要求，但是由于西方国家的立場从最初起就排除了就討論的問題达成协議的可能性，会議被中断了。

定的某些基本原則，实际上是以不包括波茨坦协定最根本部分的另一个文件来代替这个协定。虽然美国代表也肯定地說，他們的草案不是在締結对德和約前預先采取的步驟，但草案本身证明，他們打算建立显然違背关于德国非軍国主义化和民主化的波茨坦决議的那种和平安排的基础。

美国草案的最根本缺点是把德国的非軍国主义化和民主化割裂开来。但是大家知道，在波茨坦决議中这两个問題是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考察的，因为很清楚，沒有德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就不可能做到德国的眞正非軍国主义化，即不可能做到使它沿着和平的道路发展。在美国的条約草案中完全沒有提到履行波茨坦协定关于德国民主化的义务，其中包括消除德国工业中經济力量的集中、实行土地改革、根除法西斯主义殘余、保证民主党派自由发展等等。

通过这种草案就意味着实际背离波茨坦协定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建立苏联和民主力量完全不能接受的、将来对德国进行和平安排的基础。所以苏联在贊同签訂关于德国非軍国主义化的条約这种思想时，对美国的草案提出了詳細的补充，以期改进它，使它能够为一切方面所接受。

貝尔納斯，随后还有克萊将軍以及其他美国和英国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在战后发表回忆录，企图把事情說成这样，似乎苏联拒絕四国签訂关于德国非軍国主义化的条約这一思想。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条約沒有签訂，罪过首先在西方国家身上：它們拒絕审查苏联关于这个問題的建議，企图强迫别人接受美国的草案，坚持不作任何修改地加以通过。

因此，战后头几年就已經表明，西方国家忽視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規定的关于合作和共同解决战后問題的原則。这些国家开始加紧发动反对苏联的"冷战"。

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議第四届会議(1947 年 3 月 10 日到 4 月 24 日)清楚地表明，在涉及德国的一切基本問題上，西方国家和苏联的观点发生了怎样尖銳的分歧。在这次外长会議上討論的首

先是这样一些重要政治問題，如使德国非軍国主义化、非納粹化和民主化，确定德国临时政治組織和国家机构的形式和范圍，拟定关于准备对德国和約的基本指示，討論关于非軍国主义化和防止德国侵略的条約，等等。会議也討論了德国最重要的經济問題——关于賠偿、德国經济統一、关于解除武装和規定德国經济水平、非卡特尔化和土地改革等等問題。①

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建議是从波茨坦决議出发的。苏联认为德国的民主化在这个阶段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向外长会議提出了解决这个任务的詳細計划。这个計划規定，立即解除原先积极活动的法西斯分子的社会职务，使德国民主党派和自由工会享有在全德范圍內联合起来的权利，在德国全境实行选举法的統一原則，在 1947 年在西方占領区实現土地改革。可是这些建議同西方国家在德国問題上的反波茨坦政策是針鋒相对的。西方国家的代表团阻撓了苏联建議的大多数措施的通过。

苏联在莫斯科会議上还提出了德国复兴为民主共和国的具体綱領，規定这个共和国拥有两院制的全德議会和全德政府，拥有全德宪法和各州宪法来保障一切民主党派和社会組織的自由建立与活动，保障一切人不分种族、性别和宗教享有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

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团提出了許多建議，旨在阻撓就議程上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問題同苏联达成协議。它們再一次提出了德国东部边界問題，美国国务卿馬歇尔并且声称，美国主張重新审查波茨坦协定所規定的边界。他甚至建議成立关于确定边界的委員会来修改波茨坦协定。② 貝文支持馬歇尔，他建議把根据波茨坦

① 参見 1947 年 4 月 29 日《眞理报》。

②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X, (January 1—December 31, 1947)p. 46.

决議归还波兰的大部分土地并入德国（例如，什切青〔旧譯斯才新。——譯者〕东北和尼斯河南两支流之間的土地）。同时，馬歇尔和貝文坚决主張把薩尔并入法国，坚决主張实际建立美国和英国对魯尔的統治。西方国家的代表团完全不想达成一致商定的决議，虽然莫斯科会議議程中的問題的討論表明，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所有与会者的观点仍然达成了一致。如果苏联的西方对手具有誠意，莫斯科会議的这些决議就可能成为美英法苏之間就德国問題达成更重要协議的基础。

莫斯科会議的参加者議定，管制委員会在 1947 年 7 月 1 日拟好消除专門生产軍用物資的工厂的計划。苏联、美国和法国的代表团議定在 194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結束消除第一类軍事工厂（少数工厂除外）的工作。英国代表指出，它准备以 1948 年 6 月30日作为消除第一类軍事工厂的时限。

会議还責成管制委員会加速进行非納粹化，保证在 1947 年內在德国所有占領区內进行和完成土地改革。关于德国临时政治組織的形式和范圍，会議参加者議定，管制委員会将就中央行政部門工作的总的方面指导德国諮議委員会，德国諮議委員会在管制委員会提出的一般原則范圍內制定德国临时宪法的細則。就有关临时中央政府和各州政府之間权限划分的个别条款达成了协議。最后，外长会議批准了 1947 年 2 月 25 日管制委員会通过的关于廢除普魯士国家的法令。

但是，如上面所說的，因为西方国家采取了破坏一致商定的决議和建立同德国其他部分分立的西德国家的方針，甚至連莫斯科会議同意了的决議也沒有执行。

美国反动杂志《新聞周刊》暴露了美国政策的眞正目的，該杂志在莫斯科会議結束后不久写道："华盛頓的官方人士认为，四大国現行制度的继續将导致共产主义在德国全境的胜利。应当努力为西方国家那怕是拯救出

德国的一部分也好。所以現在正在研究成立单独的西德政府的可能性。"①

以后不久，受命就德国情况草拟备忘录的哈里曼(杜魯門的代表)向美国总統汇报說："我們必須在西部从我們目前在那里所拥有的开始"②。

外长会議第五次会議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倫敦举行的(1947年11月25日到12月15日)。它完全证实了西方国家在德国問題上的单独方針。

倫敦会議的議程是下列一些問題：对德和約的准备、处置德国的經济原則、临时德国政治組織的形式和范圍、外长会議莫斯科会議关于非軍国主义化問題的决議的执行、关于德国非軍国主义化的条約草案。

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間的基本分歧点是德国統一和締結对德和約問題。苏联的路綫和美英法三国的路綫之間最尖銳的矛盾也表現在这里。

苏联代表团在头几天就提出了原則性的建議——譴責在德国建立单独政府的計划，以外长会議的名义声明，它"认为关于建立德国这些或那些占領区的政府的建議是不对的，因为这样做違反英美苏法四国政府关于必須建立应代表作为統一的民主国家的德国的全德政府这一观点"③。

西方国家的代表拒絕了这个建議，从而表明分裂德国已成为美英法三国政府的实踐任务。

它們的代表来参加会議的时候，口袋里带有分裂德国和在西德建立单独政府的現成計划。双占区管制委員会的代表还在11月27日就向报界人士說，克萊将軍制定了建立"西德独立政府"的計划。他声称，联合占領

---

① «Newsweek», July 14, 1947.

② «Allierter Kontrollrat und Aussenminister-Konferenzen», S. 35.

③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опрос о единстве Германии и мирном договоре с Германией», М., 1952, стр. 40.

区的經济机关容易变成未来西德政府的各部①。这些計划也規定了西方国家在外长会議倫敦会議上的行动路綫。

苏联认为准备締結对德和約是四大国的主要任务。就德国問題締結和約和召开和会的建議在苏联政府为苏联代表团制定的指令中占中心地位。在苏联代表团于 11 月 27 日提出的决議草案中建議：

"(1) 承认根据波茨坦会議的决議建立全德民主政府是刻不容緩的任务。

(2) 規定在和会上給予德国政府对和約陈叙自己的意見的机会。

(3) 和約必須由全德政府签字并由它提交德国議会批准。

(4) 和会将由英国、苏联、美国、法国、中国、与德国毗邻的盟国以及以自己的武装部队参加对德共同作战的盟国的代表組成……。

(5) 对德和約以雅尔塔会議和波茨坦会議的决議为基础"②。

12月3日，苏联代表团建議規定，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政府在两个月的期限內向外长会議提出对德和約的原則草案。

西方国家的代表或者力图从議程上完全撤消对德和平安排的問題，或者力图把这个問題当作次要的事情。他們从这个整体問題中重新挑出了德国边界問題，也象从前一样这只是为了使談判陷入僵局并最終破坏談判。馬歇尔要求从波兰的管轄下分出西里西亚省，把它置于国际管制之下。他同貝文一道重复了建立边界問題委員会来修改波茨坦协定的建議③。

---

① 《Die Neue Zeitung》, 28. XI. 1947.

② 同上书第 39 頁。

③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 p. 568—569.

在討論德国統一問題时，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团也是奉行这种破坏会議工作的路綫的。如上面指出的，苏联代表团提出了着手組織全德政府的建議。可是西方国家的代表拒絕了这个建議。于是苏联代表团建議至少履行波茨坦会議关于建立若干德国中央部門的决議。最后，苏联代表团指出，必須在柏林成立德国諮議委員会，委員会由各州和全德民主党派的代表以及自由工会和其他大型反納粹組織的代表組成。这些建議也被西方国家拒絕了。

苏联认为，在討論德国統一及和約問題时，必須考虑德国人自己的意見。所以，苏联支持1947年12月初成立的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要求，建議接納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以便听取德国人民民主代表的意見。但是西方国家拒絕了这个建議，并利用它作为破坏会議的借口。

12月15日美国国务卿馬歇尔声明，他认为会議不可能继續工作了，这样会議就被破坏了。如西德历史学家科尔尼德斯所指出的，"会議根据馬歇尔的建議中断得如此突然，以致員文都沒有来得及发表他准备好了的演說"①。急急忙忙这样做的原因是，西方国家事先已着手实际实施它們分裂德国的計划，害怕通过任何协議。倫敦会議完全证实了西方国家在德国問題上的这种分裂方針。

苏联在1945—1947年期間为民主解决德国問題所作的斗爭对于和平的命运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苏联在实际上证明，它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强制欧洲各国人民接受帝国主义和平、把德国人民和欧洲其他国家居民变为帝国主义反苏侵略計划的順从执行者的企图。苏联的斗爭动員了一切国家的人民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并向他們指出了建立公正的民主和平的道路。帝国主义者打算把他們的权力扩大到整个德国領土，在德国全境恢复壟断資本和容克地主的統治，即两次把世界推入流血战爭的侵略势力的統治，但是苏联的反对粉碎了这种打算。苏联的民主政策团結

① *W. Cornides.* Die Weltmächte und Deutschland. Geschichte der jüngsten Vergangenheit. 1945—1955. Tübingen, 1957, S. 184.

了德国人民的进步人士，促进了德国和平和民主的牢固基础的建立。

四、从建立双占区到西德单独实施币制改革

美英法三国政府在外长会議倫敦会議之后在德国西方占領区采取的措施，旨在加速完成德国的分裂和在德国西部建立軍国主义的分立国家。

西方国家的政策离开各大国以前关于德国問題一致商定的决議越来越远了。尼·謝·赫魯曉夫說："无論是雅尔塔宣言，还是波茨坦协定，都明确規定，占領德国必須有助于德国人民消除軍国主义和納粹主义。西方国家破坏了在雅尔塔和波茨坦为占領德国所議定的一切原則。西方国家在1946年底关于合并两个占領区的勾当是分裂德国和在西德复活軍国主义分子和复仇主义分子的統治的开始"①。

1946年12月2日签訂的关于合并美国和英国占領区的协定（后来在1947年12月17日作了补充）于1947年1月1日开始生效。

这个协定指出："两个占領区对于一切經济目的来說应当視为統一的領土"，"两国政府的宗旨是要在1949年底以前为这片領土建立自給的經济"②。协定規定在华盛頓組織英美进出口机构和英美联合委員会。根据协定还建立了德国双占区行政管理机构：工业机构（設在明登）、农业和粮食机构（設在斯图加特）、交通机构（設在比勒菲尔特）、財政机构（設在巴特一葛姆堡）、邮电机构（設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③

---

① 1961年8月8日《消息报》。

②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 p. 528—531.

③ *W. Cornides.* Die Weltmächte und Deutschland, S. 136—137.

双占区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在完全分裂德国的道路上迈出的巨大一步，而且也标志着英国在德国的方針服从美国的方針。在美国和英国之間已經形成的力量对比之下，美国应当在双占区起統治作用。

在建立西德分立国家的道路上的下一阶段是有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参与的、美英法三国关于德国問題的倫敦会議。这次会議是在1948年2月23日到3月6日以及4月20日到6月1日举行的。三大国这一次商定了許多新的单独措施(币制改革、召开制宪会議来制定未来西德国家的宪法等等)。1948年6月7日发表的公报指出，未来的国家应該建立在“联邦制政体”的基础上。① 会議通过了关于德国經济在欧洲經济中的作用以及鲁尔管制的特别决議。这个决議意味着准备把西德納入“馬歇尔計划”和建立美国对鲁尔的控制。对鲁尔的所謂“国际共管机构”建立起来了。美国在这个机构中的統治地位是有保障的。

在倫敦会議上西方国家决定从經济方面和政治方面彻底分裂德国。在这次会議后，它們破坏了波茨坦会議建立的管制机构。当苏联代表要求西方国家把倫敦会議的决議通知管制委員会的时候，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占領軍司令拒絕提供这种情报。他們也不肯保证倫敦会議通过的单独决議不違背波茨坦决議和四国管制德国的原則。于是显然不正常的情况产生了：苏联代表定期地把自己的行动通知西方国家的代表，而后者却拒絕向苏联代表提供这种情报，并終于走上了通过单独决議的道路。这就使四国管制德国的机构土崩瓦解了。在管制委員会3月20日的会議上，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声明：“这三个代表团用自己的行动再一次证明，作为实现四国管制德国的最高权力机关的管制委員会实际上已不存

①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 p.577.

在了”①。

苏联政府为防止德国分裂作了一切努力。关于倫敦会議的消息令人毫不怀疑，西方国家打算开始实行具体措施，把西德和东德分割开来，并在西方占領区实行特种貨币。所以，苏联政府为爭取全德的財政改革和反对西方国家准备的单独改革进行了始終不渝的斗爭。

1948年6月18日根据单独的倫敦会議的决議頒布的币制改革法令实行了新的貨币——“西馬克”。在德国出現了两种不同的貨币，代替过去統一的貨币。这样一来，苏联占領区和西方占領区之間的区际界綫实际上变成了国家界綫。从而西方占領区变为特殊的西德国家的决定性前提制造出来了。币制改革大大加强了德国工业壟断組織的地位。

西方报紙企图把这种币制改革說成是为了“挽救西德的經济”。似乎实行这种改革必定会使西德建立起“自足的”經济。实际上策划和实行这种改革是为了完成德国在經济上的分裂，并在西德創造恢复德国帝国主义的前提。

五、华沙会議和社会主义陣营国家的新建議

西方六国倫敦会議和紧跟着采取的对德单独措施，是西方大国完全和彻底拒絕就德国問題采取任何同苏联一致商定的措施的表現。这是当时已經大体上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共同政策。为了同这个集团相对抗，形成了由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陣营。1948年6月24日发表的、主要涉及德国問題的华沙声明是它們在对外政策上的第一个联合行动。

①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Берл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Документы), вып.I, M., 1948, стр. 24.

华沙会議的参加国尖銳地譴責六国倫敦会議关于分裂德国的决議。八国外长就倫敦会議关于德国的决議所发表的华沙声明說："倫敦决議，目的并不在于預防德国新侵略的可能性，而是要把西德、特别是魯尔的重工业变为重建德国战爭潜力的工具，用来进一步达成美英的战略目的。这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計划不能不造成了德国侵略复活的有利条件。"①

华沙会議的声明揭露了倫敦决議的实质，表明了这个决議对和平和国际合作的巨大危險性。声明指出，倫敦决議旨在完成分裂德国和分割德国，旨在破坏締結对德和約。华沙会議的参加国声明，它們不承认倫敦会議的决議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和任何道义上的权威。

华沙会議通过了民主解决德国問題的具体积极綱領，它包括下列原則：

第一，根据英苏法美四国之間的协議实行确保德国非軍国主义化的措施。

第二，建立英苏法美四大国对魯尔重工业的定期管制，以便发展魯尔的和平工业，和防止德国作战潜力的恢复。

第三，根据英苏法美四国政府之間的协議，由德国民主党派和团体的代表組成一个临时的全德民主和平政府，以便造成防止德国侵略再起的保证。

第四，根据波茨坦决議締結对德和約，以便各大国的占領軍都在和約締結后一年內撤离德国。②

从这几条可以看出，华沙綱領完全符合盟国在雅尔塔和波茨坦通过的各項决議。它为恢复被西方国家的单独行动破坏了的四

---

① 《德国問題文件汇編》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45 頁。

②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8 год»,ч. 1, стр. 247—248。(参見《德国問題文件汇編》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51 頁。——譯者)

大国一致商定的对德政策指出了道路。

华沙声明指出的原则到現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德国問題上的政策的基础。特别重要的是要求締結对德和約。华沙声明帮助了和平民主力量为保障欧洲和平而斗爭。

六、"柏林危机"和外长会議巴黎会議

西方国家的分裂措施对东德和位置在当时苏联占領区中心的柏林的經济造成了威胁。苏联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对策，使东占領区和柏林不受西方国家单独措施、首先是单独币制改革的极有害的后果的影响。問題在于，美英法三国政府不仅仅限于实現德国的經济分裂，而且还把自己的分裂行动扩大到柏林。它們在西柏林发行了自己的单独貨币，从而破坏了这个城市的正常生活。

1948 年 10 月 2 日管制委員会的苏联代表的声明指出，美国、英国和法国代表的行动"旨在扰乱金融、使苏联占領区的經济解体"①。为此，苏联軍政府在柏林和西方占領区之間的交通孔道上加强了防护措施。

1948 年 4 月 1 日，在柏林—海姆斯泰德公路綫上和两条铁路綫上(在馬里安博恩和諾瓦維斯)設置了檢查站。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防止柏林經济遭受搶劫性破坏，防止运走貴重設备、原料和其他貴重物，以及防止投机分子、破坏分子等等从西方占領区非法进入柏林。

苏联軍政府在 1948 年 6 月 19 日告德国居民书中声明，禁止把西方占領区发行的新貨币带进苏联占領区和大柏林区，軍政府为了保卫苏联占領区和大柏林区居民的利益将采取由于既成局势所引起的一切必要措施。②苏联軍政府在柏林和西方占領区之間的交通孔道上采取限制措施以后，完全保证了对柏林全体居民的粮食和燃料供应。

①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Берл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ып. I, стр.81.

② 同上书第 26 頁。

駐柏林的英美法当局继續执行其分裂方針，用完全隔离西柏林区来回答这些措施。他們禁止西柏林区的居民从东柏林区得到食品和燃料。同时西方国家当局严格禁止西柏林区的企业和商号同东柏林区的企业进行貿易。西柏林区的工业企业失去了原料、燃料和电力，在这时以前它們是从苏联占領区得到这些物資的。

1948年6月底，西方国家宣布組織从西方占領区到柏林的所謂"空中桥梁"来供应西柏林区粮食、燃料和原料。这一举动的規模是不难設想的，因为在西柏林区集中了全部柏林居民的62%（約二百二十万人）。为了供应这个数量的人口，每天要派出一千架飞机。根据1949年10月发表的官方材料，关于"空中桥梁"的开支为二亿五千二百五十万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貨物运到机場的費用、維持收发运貨的服务人員的費用等等。

組織"空中桥梁"是为了完成分裂柏林，破坏全柏林的供应体系，建立經济上隔离的市区，把它納入西德供应体系。

在"空中桥梁"通航期間，西区居民的物质状况大大恶化了。根据西柏林市政局劳动部門的領导人报道，从1948年7月起（即从組織"空中桥梁"的时候起）到1949年9月止，西柏林的失业人数由四万七千人增加到二十二万八千人。在1950年初失业人数已經达到三十万人。西区每三个劳动者当中就有一个失业。

西方国家的外交人士利用"柏林危机"来达到更广泛的政治目的。他們关心的是，暫时尽量加剧危机，为实現他們的侵略方針制造借口。

可是在这个問題上，西方国家內部并不是一致的。特别是在英国和法国，头脑最清醒的政治家懂得，柏林的冒險首先孕育着对西欧資本主义国家的災难，这些国家可能被卷入为了美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进行的战爭。"柏林危机"加深了英国和法国对美国的政治和軍事依賴，这也引起了这些国家統治集团中相当大一部分人的不滿。英国、法国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輿論坚决抗議西方国家的挑衅行为，要求停止柏林冒險并使德国局势正常化。

所有这一切促使西方国家在1948年7月初建議苏联政府共同討論柏林局势和与此有关的更广泛的問題。

美国政府任命美国駐莫斯科大使貝德尔·史密斯为它的談判代表。在史密斯的回忆录中詳細記載了同苏联代表的第一次会晤。照回忆录作者的話說，苏联代表强調指出，苏联政府的措施是自卫的行动，是西方国家的单独行动所引起的。这些措施的目的不是从柏林"排挤"西方国家，尽管在它們破坏了四国的协議之后它們在法律上已失去了留在柏林的权利。苏联政府建議寻找解决爭执問題的妥协道路，① 并表示同意就柏林問題开始談判。1948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了談判。

談判的結果是，8月30日給四国占領軍总司令頒发了一項一致同意的訓令，指出在四国总司令达成协議的条件下应当在柏林同时实行下列措施：

(1) 取消最近在柏林和西占区間实施的交通、运輸和貿易限制，以及貨物运进和运出德境苏占区的限制；

(2) 苏占区的德国馬克定为柏林通用的唯一貨币，西占区"Б"字馬克停止在柏林流通。

协議指出，柏林貨币流通的調整应当由苏联占領区的德国发行銀行来进行。为了监督有关柏林单一貨币发行与流通的金融措施的实施，应由四国总司令的代表組成金融委員会。②

四国总司令根据这个协議开始了談判，他們务必在1948年9月7日提出关于执行8月30日的訓令的报告。可是西方国家继續执行分裂柏林的政策，破坏了談判。1948年9月18日苏联政府給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的备忘录指出："苏联总司令在柏林談判中准确地遵循了一致同意的訓令和苏联政府在这項訓令在莫斯科制定时所作的解釋。苏联政府对柏林談判的一切材料所作的研究表明，在柏林談判时发生分歧的原因是美国、联

① *W. B. Smith.* Moscow mission. 1946—1949. London, 1950, p. 235.

② 参見《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Берл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ып. I стр. 60—62。

合王国和法国的总司令力图片面地解释在莫斯科議定的訓令，給訓令作出在制定时不曾規定过的、意味着破坏它的、苏联政府不能同意的解释"①。

西方国家一方面向要求寻求妥协途徑来克服"柏林危机"的輿論让步，另一方面，采取了分裂柏林和把西柏林变成它們在东部占領区中心的軍事据点的方針。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消除"柏林危机"是不可能的。恰恰相反，在1948年下半年和1949年头几个月，由于西方国家采取了新的分裂措施，柏林的局势更加尖銳化了。

西方国家的政府取消了統一的市政管理机构，于是柏林被分裂为两个部分。这种分裂包括在西方国家总的政治和战略考虑中，它們力图在西德和西柏林建立德国反动軍国主义势力的支柱以及帝国主义者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战爭准备的据点。

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分裂柏林后，采取了在德国西部正式建立单独国家的方針。1949年4月8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在华盛頓发表联合公报，談到德国未来的命运和三国政府在实現其政治計划中賦予西德的作用。公报指出，三国外长同意并决定把規定未来西德国家机关和美英法占領当局之間的关系的占領法規提交給在波恩市的德国議院委員会。当时还签訂了"关于盟国实現其权利和义务的基本原則以及关于盟国三方共管制度的协定"②。占領法規和这个协定巩固了美英法占領当局在西德政治和經济生活中的統治作用。

华盛頓决議使德国的局势进一步尖銳化了。西方国家的分裂措施造成了孕育战爭的严重国际危机的危險。在这种情况下，消除德国的极端紧張局势和克服"柏林危机"的問題成了关心維护和平的力量的最重要任务。苏联致力于为德国局势正常化和消除籠罩欧洲上空的战爭威胁寻求新的妥协道路。

1949年1月底，苏联政府建議就柏林問題重开談判。1949年5月4日在紐約举行的談判达成了协議，規定取消当时在柏林和

① 参見《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Берл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вып. I, стр. 64。

②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 p. 585—590.

德国西部占領区之間以及在德国西部占領区和东部占領区之間实行的交通、运輸和貿易限制。另外还决定于5月23日在巴黎召开外长会議来审查德国問題和由于柏林局势引起的諸問題，包括柏林貨币問題在內。①

广大的世界社会人士认为四国协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为极广泛的国际問題达成一致商定的决議开辟了可能性。

外长会議根据紐約协定于5月23日在巴黎开会。会議討論了有关德国的下列問題：（1）德国的統一，包括經济原則、政治原則和盟国管制；（2）柏林和币制問題；（3）准备对德和約。

西方三国在外长会議巴黎会議上的綱領，表述在美英法三国外长艾奇逊、貝文和舒曼为答复苏联代表团关于德国統一問題的建議所提出的备忘录中。西方三国在备忘录中建議，东部占領区干脆"参加"波恩的宪法，接受占領法規，換句話說，听从西方三国政府的指揮。

为了同这个綱領相对抗，苏联代表团建議用和平的办法处理德国問題，恢复德国的統一，以及在波茨坦原則的基础上加速准备和締結对德和約。

巴黎会議工作中的重要問題是审查对德和約的准备問題。苏联政府坚决爭取加速准备和締結和約。在討論議程第一項的时候苏联代表团就建議民主选举可以作为全德政府雛型的全德国务委員会。在討論对德和約的准备問題时，苏联代表团建議：美英法苏四国政府在三个月期限內向外长会議提出对德和約草案；在草案中規定所有国家的占領軍队在和約締結后一年內从德国撤退；在外长会議巴黎会議上就結束和約准备程序的审查。②

---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стр. 99。

② 参見《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опрос о единстве Германии и мирном договоре с Германией》, стр. 58。

上述各种政治和經济理由迫使西方国家就許多有关德国的問題达成协議，同意以苏联的建議作为基础。

1949 年 6 月 21 日发表的外长会議公报证明了这一点。在公报中完全根据苏联的建議指出："按照各外长准备继續努力以求达到恢复德国的經济与政治的統一的意願，德境各占領当局应于柏林在四国基础之上共同会商"①。

公报規定：四国就管理柏林和德国問題进行协商，德国专家参加这种协商，东部占領区和西部占領区的德国領导机关之間建立更加密切的經济联系，扩大东西占領区之間以及柏林和各占領区之間的貿易。②

巴黎会議的最重要結果是，使国际关系尖銳化的方針遭到明显的失敗，改善国际关系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方針取得了无疑的胜利。

虽然巴黎会議促进了德国局势的正常化，但沒有达成关于恢复德国統一的具体协議。德国的分裂已成事实。在西德事态朝着正式宣布成立单独的西德国家的方向发展。可是在西方国家的分裂措施所造成的极度紧張局势下，苏联成功地找到了維护和平的道路，尽管帝国主义侵略集团企图利用德国的紧張局势和"柏林危机"来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外长会議巴黎会議在这方面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它再一次表明，談判的道路是克服大国之間的分歧的唯一可能的道路，特别是在孕育战爭的国际危机时期。

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完成德国的政治分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

1948 年 6 月和 1949 年 4 月西方国家单独举行的倫敦会議和

① 《德国問題文件汇編》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65 頁。

②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111—112.

华盛頓会議的决議是完成德国政治分裂的起点。第一个会議通过了一項决議，授权西德各州州长召开制宪会議，为未来的西德国家制定根本法。第二个会議制定和批准了占領法規，确定了西德国家和美英法三个西方占領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的原則。

根据倫敦会議的决議，在德国某些州的代表之間开始了制定根本法的談判。7月8日，西德各州州长在科布倫次开会，决定成立所謂的議院委員会——为西德制定宪法的机关。在議院委員会开始工作以前，西德各州州长在西方三国軍事长官的参加下举行会議，确定了未来宪法的原則。留給議会委員会的工作只是澄清实际上是由西方国家授意的原則。議院委員会从1948年9月1日起开会，到1949年5月8日閉会。議院委員会的領导人选擇这一天結束議院委員会的工作（同时通过宪法草案）不是偶然的。这一天是法西斯德国投降的日子。波恩的領导人想用这种象征性的巧合着重說明，他們认为投降的条件以及与此有关的盟国决議、即波茨坦决議是"过了时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宪法是由西方国家的三个軍事长官的同意而生效的。这似乎也强調說明了未来西德国家对西方国家的依附关系。

1949年5月23日，議院委員会制定的根本法为西德各州議会所批准。① 根据根本法中規定的程序，西德的单独国家开始从宪法上固定下来。1949年8月14日举行了議会选举，壟断資本的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取得了大多数席位。9月7日举行第一次联邦議院会議，选举了特奧多尔·豪斯为联邦总統，康拉德·阿登納为联邦总理。一个命名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新国家就这样出世了。

这个国家的成立不能不引起世界輿論的严重不安。第一，它标志着西方国家同四大国在德国問題上一致同意的政策原則完全

① 巴伐利亚州議会以一百零一票对六十三票否决了宪法草案，但是，因为其他州批准了草案，它还是发生效力。

决裂。从此，在三分之二的德国土地上，事态的发展一方面取决于美英法壟断势力的勾結，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西德。同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最終形成的、資本主义世界中两个最富于侵略性的壟断集团——美国和西德壟断集团的联合有着主要的意义。从这种联合产生的政策沒有为欧洲和全世界的国际关系的发展作任何好事。

第二，西德联邦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在德国的一部分，在集中德国基本工业力量的一部分，帝国主义的統治得到了国家和法律的体現。国家的权力重新交給了两次把人类推入世界大战的壟断势力。因此，德国軍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溃敗沒有导致永远消除德国侵略的威胁，因为給这种侵略的罪犯留下了活动的基地——西德国家。消灭德国軍国主义这个迫切和現实的目的由于西方国家的过錯而被放过了。这孕育着对欧洲和平事业的最严重后果。

建立这个新国家的意义和后果在苏联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交給美英法三国大使的致美英法三国政府的照会中作了分析。苏联政府照会說明，导致单独西德国家建立的西方国家的政策是"恢复西德反动的軍国主义和复仇主义分子的統治地位的政策，他們过去曾充当德国軍国主义和希特勒制度的支柱，在一到西德国家成立后又立刻重新抬头"①。

苏联政府指出，在西德建立单独国家是分裂德国的完成，这是美国、英国和法国早就力图做到的事情。苏联的照会說："在最近几年內，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不仅沒有履行它們根据波茨坦协定所承担的义务，而且直接破坏了这些义务，执行分裂德国和尽量拖延締結对德和約的政策，破坏四国关于德国民主化和非軍国主义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стр. 168—169.

化的共同决議，現在由于建立单独西德国家并把它交給昨天的希特勒制度的走卒而完成了这种反民主政策的实現"①。

遭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毀灭的德国軍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只有在外国帝国主义的积极扶持下，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的盟国才得以复活。这是德国軍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地位不同于它在1914—1918年的战爭后的地位的区别之一。在二十年代，为了扶植德国壟断資本，只需美国比較有限的帮助就足够了。而現在美英法三个主要資本主义国家的一切政治和軍事力量都动員起来扶持西德的壟断資本。德国軍国主义国家复活的过程是在西方三国的占領势力、首先是美帝国主义的保护和庇护下进行的。

对此还应当补充下述一点：西方国家的統治集团設想复活起来的德国軍国主义只是它們手中的馴服工具。它們企图用义务的罗网来网住它，它們认为，这些义务必定会防止使西欧国家成为德国侵略的首批牺牲者的事件重演。

可以"排除"德国扩張的旧的幻想以空前的力量复活了。这种幻想体現在国策中，成为建立西德国家时期西方外交人士一切实际行动的基础。这些行动的用意就在于，用对西方国家的"撕毀不了的"义务捆住西德，把它变为可靠的反苏前哨，或者形象地說，把它变为只能朝一个方向即朝东方发射的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德国軍国主义过程的这些特点，反映在标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的主要文件中，首先反映在宪法和占領法規中②。

---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стр. 169—170.

②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 p. 586—588. 占領法規保持到1955年巴黎协定生效为止，这时它被所謂的"一般性条約"代替了，該条約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为北大西洋联盟組織成員的新阶段上調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西方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

1949 年 9 月 20 日西德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納在联邦議院宣布的政府宣言，清楚地表明了这个新国家的政策的基本傾向。宣言证明，西德政府打算在对內政策方面走复活軍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道路，在对外政策方面走复仇主义和侵略的道路。

就这样在德国西部，在法西斯帝国的廢墟上形成了新的侵略的、軍国主义的国家。正如事实所证明的，国际安全的威胁在欧洲中心的再起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政策的直接結果。

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西德国家的建立給德国民主力量提出了新的特别重要的任务。苏联政府在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照会中，說明在德国西部成立单独国家后德国所产生的局势时强調指出："……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声明，上述的分立政府已在波恩成立，因此在德国造成了新的情况，这使得实现下列任务特别重要，即恢复德国的統一，使之成为一个民主与爱好和平的国家，并保证德国履行四国波茨坦协定所加諸它的义务"①。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爱国力量沒有其他道路可走，只有在国家的东部組織德国和平民主发展的可靠国家堡垒，来抵制德国西部事态的极有害的发展和实現德国人民的眞正和平願望。

建立民主德国的原始基础是爭取統一与公正和約的人民代表大会。还在 1947 年底，由于西方国家破坏倫敦外长会議后明显表現出来的分裂德国的危險，这个代表大会就在东德成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成了反对軍国主义和战爭、爭取德国和平民主发展的爱国运动的領导机关。

1949 年 5 月举行了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这次选举鮮明

① 《德国問題文件汇編》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73 頁。

地表現了东德居民反对西德軍国主义势力的分裂行动和保卫德国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意志。第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民主德国宪法草案，后来这个宪法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宪法。

还在1948年3月举行的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德国人民委員会，它是在人民代表大会閉会期間爭取統一与和平的爱国运动的領导机关。該委員会由四百人組成。

1949年10月7日德国人民委員会在德国首都柏林召开第九次会議。議程包括下列問題：(一)民主德国全国陣綫宣言，(二)对政局的估計以及通过必要的措施。

德国人民委員会第九次会議通过了筹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性决議。会議向当时在紐約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四国外长提出了呼吁。呼吁书中指出，德国人民要求“成立德国民主政府，它的任务是确保德国的和平的、民主的恢复，向占領国提出德国人民关于締結和約和撤退占領軍的要求”①。

德国人民委員会在第九次会議上，根据它通过的和第三次德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49年5月30日批准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宣布自己为临时人民議院。德国人民委員会第九次会議在告各州議会书中建議于10月10日召开州議会特別会議，选举参議院的代表。

德国統一社会党主席威廉·皮克在会議上就第二項議程——“对政局的估計和通过必要的措施”——讲了話。

威廉·皮克詳述了波恩单独国家成立对德国人民造成的严重局势。他强調指出，德国人民身負着重大的責任——从已經形成的局势中作出相应的結論。“現在已有必要……在这里——东德設立一个这样的机构，它必須代表德国人民实現民主的任务，轉化經

①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Герман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50, стр. 15.

济，使之能够保障人民的生活，首先注意使那为希特勒政府及其所进行的战爭所沾污了的德国人的声誉，重新取得其他各国人民的信任。这必須由人民委員会来作，建立一个能代表德国人民的眞正的民族、經济、政治与文化利益的政府”①。

一切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的代表都支持成立人民議院和民主政府的建議。

10月7日临时人民議院举行第一次会議（成立大会），通过了标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誕生的最重要法令。

人民議院批准了宪法，通过了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法令，委托最大的議会党团——德国統一社会党党团的代表奥托·格罗提渥組織政府。10月11日临时参議院举行成立大会。同一天，两院召开联席会議，选举威廉·皮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統。

共和国的国家机关就这样組成了。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德国土地上产生了眞正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

这个新国家的民主性质規定在宪法中。宪法第五条强調指出：“保持对一切民族的友好关系是国家政权的义务。”宪法禁止战爭宣傳和种族宣傳。第六条說：“唆使抵制民主制度及民主机关，唆使杀害民主政治家、傳布对宗教信仰、种族、民族的仇恨、宣傳軍事、鼓动战爭以及一切其他破坏权利平等的行为，在刑法意义上都是犯罪行为”。

这些原則鮮明地說明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同波恩国家的区别。在西德軍国主义势力的統治加强了。在德国土地上建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样一种国家政权，它宣布和平和国际合作是它的对外政策的基础。

---

① 《德国問題文件汇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12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西方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前者从最初起就是建立在平等和互助原則之上的。

1949年10月11日，駐德国的苏联軍政府鉴于德国人民委員会通过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和在柏林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决議，发表了一項声明。声明指出，苏联政府决定把从前屬于苏联軍政府的管理职能交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苏联管制委員会来代替軍政府。

随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展現了为欧洲和平而斗爭的新前景。德国人民的命运有了根本的轉折，它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整个欧洲具有历史意义。

第十九章

远东的战后和平安排和日本

一、日本的被击溃与和平安排問題

由于反法西斯联盟各国人民的斗爭，帝国主义的日本被击溃了。日本軍国主义匪帮得到了同欧洲法西斯头目一样的可耻下場。

苏联为战胜日本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貢献。日本帝国主义的敌視侵略政策迫使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保持着近四十个师来防卫自己的远东边界。这牽制了一支强大的关东軍，它在某几个时期拥有七十五万到一百一十万人，配备着最新的装备（約占全部日本空軍的一半，炮兵的三分之一，等等）。①

① 参見1946年10月11日《消息报》。

在这种条件下，日本不可能在南亚和东南亚采取进一步有效的軍事行动，这就帮助了美国武装部队在战爭初期阶段失敗后恢复元气和随后动員力量轉入反攻。

美国的外交竭力爭取苏联参加太平洋战爭。在罗斯福給苏联政府首脑的函件中①，在国务卿赫尔同苏联大使的談話中②，在德黑兰和雅尔塔国际会議上都提出过这个問題。

1945年夏天，美国軍事专家认为，单靠封鎖和轰炸不能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③ 美国最高統帅部也沒有指望使用原子彈会使日本迅速投降。④ 甚至在1945年7月16日进行原子彈試驗爆炸后，在波茨坦会議前夕，杜魯門也承认爭取苏联参加远东战爭是美国外交在波茨坦的重要任务⑤。

苏联代表团在波茨坦会議上重申苏联对日宣战的雅尔塔义务。苏联参战預先决定了集中在中国东北的最大一支日本軍队的失敗。苏联軍队給予关东軍的致命打击，也使得到此时为止坚持继續作战的日本軍事領导人承认投降不可避免。

苏联在击潰日本侵略者方面的杰出作用对亚洲一切国家的战后发展起了巨大影响。日本殖民帝国瓦解了。朝鮮不再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国的东北和台灣归还了中国。苏联恢复了它在庫頁島南部的权利；曾經是日本在太平洋西北部軍事战略基地的千島群島也交給了苏联。日本軍国主义的崩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获得成就，促进了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緬甸、菲律宾以及亚洲其他

---

① 参見《1941—1945年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苏联部长会議主席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版第12—13、22頁。

②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 II, p. 1111—1112.

③ 《Foreign Affairs》, January 1957, p. 334—335.

④ *H. Stimson* and *M.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New York, 1948, p. 618.

⑤ 同上书第411頁。

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①。

結果形成了进行和平民主安排以保障远东各国人民的持久和平和独立的有利条件。解决这个任务的最重要条件是使日本变成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

战后对日本的和平安排的重要問題已在1943年美英中开罗宣言和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克里米亚协定中得到解决。克里米亚协定規定，恢复1904年以前屬于俄国的权利，即把庫頁島南部及邻近一切島屿归还苏联，把千島群島交給苏联。② 盟国同意大連商港国际化。此外还决定苏联和中国共同經营当时用俄国人民的錢建造的和被日本人强占去的中东铁路和南滿铁路，恢复苏联租用旅順港为海軍基地③。

那时中国是反动的国民党政府掌握政权；它不止一次地想进行反苏冒險。因此苏联政府事先不得不預防关于利用邻近我国的中国領土反对我們国家的可能的企图。

开罗会議和克里米亚会議的决議沒有包括应当对战敗国日本采用的政治原則。可是，处置战敗的侵略国家的原則性規定已在克里米亚会議上根据德国的情况确定下来。剩下来的工作是把这些原則性規定加以具体化，使之适用于日本。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签訂的波茨坦公告实現了这一点。

公告的基本原則归納如下：

(一)公告說，消除那些“欺騙及錯誤領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的人們的威权和势力；根除軍国主义。

(二)日本的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将予决定

① 参見本书第四章和第二、三篇。

② 美国副国务卿薩姆納·威尔斯承认，必須把千島群島和庫頁島交給俄国是为了苏联政府“能够保证西伯利亚的安全”。

③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6 год》,стр.90—91。

的其他不太大的島屿。

(三)解除日本武装，給軍人以"返其家乡"和过和平劳动生活的机会。

(四)惩办日本战犯，"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确立"言論、宗教及思想的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視。"

(五)发展和平工业，保证日本获得原料及参加国际貿易。

(六)占領日本，直到实現上述目的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志"成立一个傾向和平和負責的政府时为止。①

虽然公告的某些規定不够具体，但它的原則可以成为把日本改造为和平民主国家和保证远东安全和持久和平的基础。苏联政府从这一点出发，于1945年8月8日正式参加了这个公告。

苏联坚决为实現波茨坦公告的条件而斗爭，竭力巩固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和侵略势力的胜利，以便保证远东的巩固和持久的和平。为此苏联政府认为，必須实現日本的非軍国主义化和民主化，还必須同日本締結为日本人民的和平、民主和独立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和約。可是，远东問題的公正的和平安排受到美国和同它結成同盟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的阻碍。

亚洲各国人民在战爭年代反对日本軍国主义的斗爭具有为摆脫整个帝国主义統治而战斗的性质，有可能推翻整个殖民統治的体系。所以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竭力鎮压亚洲民族革命的发展。它們企图不让苏維埃国家在太平洋沿岸加强自己的陣地。美国帝国主义策划建立它对远东和东南亚国家的主要原料产地和市場的单一控制，排挤老的殖民国家——英国、法国和荷兰。

在美国統治集团中間，对于达到这些目的的方法有两种观点。在战爭

① 参見《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77—78頁。

的最后阶段，所謂的“中国派”享有最大的影响。属于这一派的是罗斯福“新政”的許多拥护者，著名的經济学家科尔文·爱德华茲、T·比逊、拉铁摩尔、新聞工作者A·魯特、M·海恩等等。这一派受到在亚洲市場上同日本人竞爭的垄断資本家的支持。“中国派”的主要理論家是拉铁摩尔，表达这一派的观点的是《美亚》(月刊)杂志。

“中国派”认为，美国在亚洲的目的可以通过“培养”像国民党中国这样的“民族主义的第三种力量”和削弱同美国对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办法来达到。美国著名的远东事务专家哈罗德·維納克写道：“美国远东政策的出发点是，战后中国将成为远东的主导力量，将在同美国友好的政府領导下得到团結和稳定。日本被視为美国的危险的帝国主义对手，因此对日本的政策是由‘削弱’它的計划来規定的”①。

但是，在美国还有所謂的“日本派”，以原先美国駐日本大使、在1944年任副国务卿职务的格魯为首。根据格魯及其拥护者的意图，日本应当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基本支柱，成为亚洲反革命堡垒。

实际上，两派追求着同一个目的，即加强美国在远东的統治和鎮压民族解放运动。它們之間的分歧不过是达到这种目的的形式和方法問題。在战后头几年，“中国派”由于主张比較灵活的斗爭方法，被提到了第一位。

二、美国对日本的控制权的确立

1945年9月2日，对日作战的所有大国的代表在日本投降书上签了字。太平洋美軍司令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和其他大国的盟国占領軍总司令。美国政府窃取了其他盟国的权利。它拒絕苏联关于苏軍参加占領日本領土、特别是北海道北半部的建議。② 除美国以外，只有英国在日本有数量不大的占領

① *H. Vinac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 1945—1951, p.77.

② 参看《1941—1945年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苏联部长会議主席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版第267—268頁。

軍。华盛頓不急于建立某种联合机构来实現对被占領的日本的共同政策，而企图在沒有其他大国参加的情况下管制日本。1945年9月2日，在投降书签字后，日本外务省从麦克阿瑟总部收到关于在日本整个領土上行使美国軍政最高权力的指令。这引起了日本当局的反对。日本統治集团想保持行政管理权，即使是在美国的最高监督之下也好。他們希望用这种办法保存自己的政权，然后恢复自己的国际地位。

日本人事先已經开始准备实現自己的計划。还在1945年8月17日成立了以天皇家族成員东久邇为首的政府。在日本侵华时期主持政府和实現政治制度法西斯化的近卫被任命为副首相。內閣中保留着"大东亚"大臣、陆軍大臣、軍需大臣和海軍大臣的职位。新政府认为，不許国家民主化和人民运动发展是它的基本战略任务。日本統治集团十分害怕革命①。

还在占領軍开始行动之前，政府就采取了保存大資产阶級財政基础的措施：在两个星期之內赶紧把軍队手中的大量物資財富（总数約为一千亿日元）分給了产业公司。这些公司还由于日本政府因投降而撤消定貨，得到了大量的賠偿，等等②。

东久邇政府在从投降到占領开始的这段时間赶紧遣散軍队，把軍官保存在国家机构系統和軍事工业公司中。数量巨大的、仅在日本本土就有四百万人（总共七百万人）的日本軍队开始迅速复員。日本統治集团在制定战敗条件下的政策方針时，打算利用苏联和美国之間的矛盾。在投降签字后立刻举行的樞密院会議上，前外务相芳澤謙吉声称："形成了苏美两国在东亚展开斗爭和相互牵制的局面。"从这个前提出发，他认为日本"应該采取爭取美国好意的方針"③。

---

① 还在1945年2月，前首相和天皇最亲近的顾問近卫在呈交天皇的奏折中分析局势时，得出了这样的結論："我国內外的形势，目前正以极快的速度走向共产主义革命"。（引自《太平洋战爭史》第4卷商务印书館1962年版第180頁。）

② 参見《太平洋战爭史》第5卷商务印书館1963年版第65頁。

③ 同上书第66頁。

麦克阿瑟起初不理睬天皇，以及在日本国内和国外发出的要求天皇负战犯責任的呼声，这种情况使得宫廷的官僚惊慌起来。九月底吉田外务相竭力組織麦克阿瑟同天皇的会晤，并且安排好了他們之間的接触。

日本政府关于同占領当局合作和促进占領政策实現的建議为美国所接受。美国已不再考虑战时一致同意的决議了。美国国务院会同陆軍部和海軍部拟定的、1945 年 9 月 23 日以《占領初期美国对日政策基本原則》的名称发表的文件相当露骨地申述了这一点。① "基本原則"指示盟国总司令实行首先符合美国需要而不考虑其他国家利益的政策。

"虽然将作一切努力通过协商和建立相应的协商机关的途徑来規定占領和管制日本的政策，这一政策会使主要盟国滿意，但是在它們之間存在某些分歧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仍将占統治地位。"② 另外規定，总司令"将通过日本政府机构，包括天皇在內，来实現自己的权力"。只承认日本人民"有权自由改变日本的管理"，但这种改变不得違背美軍的安全和占領政策的目的③。

因此，美国統治集团沒有考虑波茨坦公告，明确地宣布了使日本服从它的单独控制和把日本变为它的亚洲軍事跳板之一的意图。

但是在反法西斯战爭胜利結束、日本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蓬勃高漲的条件下，美国政府不可能完全拒絕民主的改革和改造。它答应使日本非軍国主义化，消除軍国主义和侵略的思想体系，保证发展和平經济④。同时美帝国主义打算通过某些改造来削弱它的日本竞爭者，給这个竞爭者以額外的打击，同时把日本人民的革命民主运动引入平靜的資产阶級改良的軌道。美国想找同美国壟断組織竞爭的工业部門无关的某些日本資产阶級阶

① 参見《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1943—1946》,стр.43。
② 同上书第 44 頁。
③ 同上书第 45 頁。
④ 同上书第 46—49 頁。

层作为实现这种路綫的社会支柱。

1945年10月4日，麦克阿瑟总部发布了关于取消对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的限制的法令。“維持治安”、“軍机保护”等警察法令以及其他限制信仰、言論、集会等等自由的法令被廢除了。政治犯从监獄里釋放了，虽然只是迟到1945年10月才釋放。

坐了十五年和更多年限监牢的許多共产党員(德田球一、志賀义雄等等)获得了自由。他們立刻为廢除天皇制、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扩大工人的权利等等展开了斗爭。1945年10月20日，《赤旗报》第一号出版了。共产党成了民主力量活动的中心。

为了同民主运动相对抗，日本右翼改良主义和亲法西斯的分子在資产阶級和占領当局的直接支持下开始拼凑劳动总同盟，使工人运动走上有限的、不威胁資产阶級統治的經济斗爭軌道。占領当局欣然承认这种工会是“民主的”，尽量阻撓成立代表工人阶級眞正利益的工会。美国占領者力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由于战爭失敗而瘫痪的日本管理体制，使它具有最适合自己的形式，使日本的壟断組織——財閥服从自己的控制，同时用装点門面的民主措施在日本国內外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国当局忠于自由和民主的原則。

三、莫斯科三外长会議。苏联在远东委員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員会爭取日本民主化和非軍国主义化的斗爭

苏联以充分的理由并根据战时国际协定中規定的权利，坚持参加临时占領投降了的日本，参加規定占領政策。美国外交却企图爭取苏联同意建立一种沒有任何权限只是形式上体現盟国共同

管制被占領的日本这一原則的协商机关。

1945年9月24日，苏联政府要求由美英苏中四国代表成立管制日本委員会。①

苏联外交部长在1945年10月1日給美国国务卿的信中說，苏联政府非常重視建立盟国管制日本的机构。信件指出，苏联政府认为，除了管制日本委員会以外，还应当建立除四个主要盟国外也包括其他积极参加对日作战的国家的盟国协商委員会②。

美国政府拒絕了这个倡議。苏联政府曾經建議在倫敦外长会議第一次会議上（1945年9月）討論关于管制日本委員会的問題。国务卿貝尔納斯拒絕討論这个問題。美国外交决定使苏联和其他国家面临既成事实。1945年10月宣布成立远东諮詢委員会，由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新西兰、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九个国家，即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組成。委員会沒有实际权限。它的使命是向总司令提出建議，但总司令对于建議可以不予考虑。此外，美国及其盟国在委員会中占絕对統治地位。苏联政府断然拒絕参加这个委員会。

美国的立場受到了世界輿論的譴責。美国感到兴趣的是，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合作解决若干問題，其中包括对德国的盟国的和約問題。所有这些情况都迫使美国政府放棄了它的不法立場。

由于美苏之間的协議，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議，会上三国就实現波茨坦公告規定的日本投降条件的原則达成了折衷协議。

美国被迫同意解散远东諮詢委員会和成立两个新的机构：远东委員会，由苏联、美国、英国、中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十一国代表組成，会址設在华盛頓；管制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5 год»,стр.72.

② 同上。

日本委員会，由苏美英中四大国代表組成。

远东委員会的职能是，制定日本履行投降条件所規定的义务时应遵守的政策路綫、原則和总的依据。① 委員会的决議由包括苏美英中四国代表在內的多数表决通过。这样就确立了在解决日本問題时大国一致的原則。

同时，也对美国政府的权限作了規定。它的权限是：草拟指令并交給总司令去执行，但草拟的指令必須符合远东委員会的政策路綫。还特别規定，凡涉及重大变化，即涉及宪法、管制制度、政府更迭等的指令，須事先取得委員会的同意才能頒发。如果說远东委員会是居于盟軍总司令之上，那么管制日本委員会則主要是拥有建議机关的职能，即向总司令提出建議和监督他的行动。总司令"就重大問題发布命令之前"，务必同管制委員会磋商。② 管制委員会的每个委員都有权制止总司令就重大問題所采取的行动，并把爭議提交远东委員会討論。

莫斯科会議证明，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1943年开罗宣言、1945年克里米亚会議决議和1945年波茨坦公告等文件所規定的盟国关于战后和平安排的共同协議是不可动摇的。苏联外交捍卫战后民主安排原則的斗爭，在那个阶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莫斯科外长会議决定建立的共同管制体制很复杂，而且层次很多。这是苏美立場之間互相让步的結果。虽然这种体制很复杂，有个别缺点，但仍然为盟国共同管制和实現基本占領任务，即为使日本民主化和非軍国主义化，使日本变成爱好和平的、不奉行侵略和暴力政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可是被迫签訂这个协議的美国統治集团，实际上根本不打算执行它。它們在实行占領政策时并不想放棄自己的帝国主义目的。只是在苏联的压力下，在全世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5 год», стр.158.

② 同上书第159頁。

界民主力量支持苏联立場的情况下，在日本国内人民行动的影响下，美国才不得不宣布和采取某些在客观上促进日本民主化过程的措施。

苏联的对日政策根本不同于美国的方針。正如盟国在战时的共同决議所規定的那样，苏联政策的基础是想把日本变成独立、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苏联政府力图通过盟国管制机关——远东委員会和管制日本委員会来实現自己的政策方針，并尽力使这些机关成为眞正的国际合作的机关，一貫努力提高这些机关的威信。美国政府則恰恰相反，认为这些机关是实現其計划的障碍。美国政府愈是背离盟国一致同意的决議，它就愈加公开地蔑視这些机关，竭力使它們的积极性化为烏有，并且完全排斥苏联和其他国家参与解决有关在日本实現占領政策的問題。

关于远东委員会在各个时期通过的政治决議的数字材料是可以說明問題的。例如，在这个委員会工作的头十五个月內，即从1946年2月26日到1947年7月10日，通过了四十一个决議；在其后的十八个月內，即从1947年7月10日到1948年12月23日，通过了十三个决議，而在1948年12月24日到1950年6月30日，总共只通过了九个决議。①

为了拟定和最后确定对日占領政策的目的和任务，廢除美国当局想把日本变成它的亚洲政策的馴服工具的片面方針，远东委員会費了一年多的时間。委員会于1947年6月19日通过的“对投降后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議規定了民主改造日本和不許它重新軍国主义化的任务。

該文件指出，占領政策必須“保証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导致尽快地“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的政府，以履行其国际責任，尊重他

①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August 21, 1950.

国的权利并支持联合国之目标。此政府应根据日本人民自由表达之意志而建立之。"①

决議强調指出，解除武装和非軍国主义化是占領的最重要任务，必須迅速而坚决地予以实現。决議要求撤銷具有軍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活跃分子的社会职务，解散和禁止极端民族主义的或軍国主义的社会、政治、职业和商业的团体与組織，惩办战犯。决議指出，必須消除妨碍日本人民民主傾向恢复和加强的障碍，鼓励民主党派和工会。

决議接着說，为了消灭日本軍国主义的經济基础，将实現一种綱領，即禁止生产武器，其中包括軍舰和飞机，以及取消可以使日本重新武装以发动战爭的工业部門。决議規定了监督这項条款的执行办法，規定解散大的工业和銀行联合組織，并且規定考虑到受侵略国家的物力和人力損失的大小以及这些国家对击溃日本的事业所作的貢献給予它們以賠偿。②

远东委員会关于日本新宪法的基本原則、关于組織日本工会的原則、关于土地改革、关于修改日本教育制度的政策、关于远东战犯的逮捕、审訊和惩处等項决議，促进了日本的非軍国主义化和民主化。

1947年8月14日"关于減縮日本軍需工业潜力"的决議③认为必須銷毁专用于制造作战装备的机器和設备。

可是美国政府，尤其是从1948年起开始露骨地、粗暴地无視远东委員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員会。苏联駐盟国管制日本委員会的代表提出了許多实現占領政策的基本問題，如：关于消灭康采恩的进度問題、关于实行土地改革的問題、关于清洗日本的国家和社会机关团体的問題、关于日本軍官团的問題、关于改革警察制度的問題、关于取締法西斯和軍国主义书籍的問題、关于消灭武装和軍需物資的进度問題、关于选举地方自治机关的問題、关于公共保健状

① 《日本問題文件汇編》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13頁。

② 参見同上书第16—18頁。

③ 据《日本問題文件汇編》一书此决議的名称为《关于摧毁日本軍需工业的决議》。——譯者

况的問題等等。把这些問題提到盟国管制日本委員会上去討論，对于制定日本非軍国主义化和民主化的具体办法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引起了日本和所有其他各国輿論对于美国政策的注意。

美国占領当局千方百計地阻撓苏联代表的行动，降低盟国管制日本委員会的作用，把它变成記載美国总司令的行动和决定的无言記录机。在1946年8月管制委員会第十二次会議上，美国代表艾奇逊就曾經企图修改三大国关于盟国管制委員会的协定。他建議扩大管制委員会的成員，把参加远东委員会的其他七个盟国代表拉进来。苏联代表坚决反对修改三国外长的决定。[①] 管制委員会的其他成員也不支持美国代表。占領軍总司令部长期拖延或者根本不向管制委員会的成員提供他們所要求的情报。麦克阿瑟在发布指示之前不同管制委員会磋商。在这种情况下，管制委員会的成員愈来愈难于执行他們所承担的义务。从1948年下半年起到1949年底，盟国管制委員会几乎无所作为。

虽然远东委員会和盟国管制日本委員会中苏联代表的建議在大多数情况下为美国及其同伙所拒絕，但是苏联外交在这些机构中的斗爭并不是沒有益处的。对占領当局的行动和美国政府的指令的批評以及苏联的具体建議，都促进了个别民主措施的实現，揭露了美国占領当局同日本反动派的勾結，帮助了日本进步党派和团体爭取国家民主发展道路的斗爭。

四、日本的政治和經济改革

圍繞日本新宪法草案展开的斗爭，对于远东的和平安排具有重要意义。美国占領当局认为，天皇制可以成为实現美国政策的方便工具。

① 参見《Сборник заявлений 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й члена Союзного совета для Японии от СССР». М., 1949,стр.26。

为了赋予天皇某些"民主的"外貌，麦克阿瑟建議天皇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天子。天皇照办了。随后，天皇按照麦克阿瑟的指示巡視全国，表示他的"民主性"。麦克阿瑟委派近卫主持修改1889年宪法的工作。近卫的草案保存着天皇制和参議院。自由党和进步党拟定的草案同近卫的草案差别很少。社会党的草案是把最高权力在議会和天皇之間作了分割。

日本資产阶級政党的宪法草案在日本国内和国外引起了尖銳的批評。苏联和澳大利亚主張廢除天皇制；中国也同意这一点。甚至美国国内的"中国派"也主張廢除日本的天皇制。在日本国内，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組織都积极反对天皇制。

1946年2月初占領軍总部建議仿照英国，保存天皇作为一种象征。1946年2月麦克阿瑟对币原首相說："象征天皇制和放棄战爭——这乃是不容变更的两大原則；这是唯一能够拒絕苏联的草案和保存天皇制的道路"。①麦克阿瑟同意限制天皇的权力，承认他不得不向主張日本民主化和非軍国主义化的苏联让步。日本人民的民主运动对此也起了作用。放棄战爭的原則被列入了草案，目的是要削弱日本，使日本不能东山再起，在太平洋上同美国竞爭。在麦克阿瑟及其顧問們的头脑里，战爭初期的慘重失敗是記忆犹新的。

各政党制定的宪法草案都作了某些修改，例如列入了放棄用战爭作为解决冲突的方法以及禁止日本拥有武装这类条文。天皇的特权只限于代表性的职能。宣布人民享有基本公民自由。宪法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是人民群众斗爭的結果。同时，它也負有以民主詞藻削弱人民革命运动的使命。

1946年9月19日，远东委員会苏联代表在討論宪法草案时坚持在宪法中更明确地規定人民的主权，坚持就这一点列入专門一条。苏联代表要求扩大国会的权限，例如給予国会不仅任命首相、而且任命其他內閣大臣以及选举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苏联代表

① 引自《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т. V. стр, 120。

团同意两院制，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参議院不得站在众議院之上。[1] 可是这些建議沒有被盟国接受。

1946 年 10 月国会两院批准了宪法草案，1947 年 5 月 3 日宪法生效。

战后头几年，美国当局在日本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从国家机关中清除战犯，虽然这些措施沒有貫彻到底。他們也不得不同意实行土地改革。尽管这种改革有局限性，但它基本上消灭了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在工会立法方面也作了有利于工人运动发展的必要的改进。

日本的和平安排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像德国一样，除了民主化和非軍国主义化以外，就是解散壟断組織，消灭經济力量的过分集中。日本的壟断組織是侵略的主要鼓舞者，在战爭期間获得了巨額利潤。战爭失敗后，日本的經济陷入了完全混乱的状态。可是在美国占領的条件下，日本壟断資本很快恢复了元气，进行了改組，保存了自己的陣地。

1946 年 8 月成立了股份公司整理委員会。委員会檢查了八十三家头号公司的股份和五十六个家族財閥代表的財产，如三井、三菱、安田、住友、日产、大倉、古川、淺野、中島、野村等等。沒收了总数为九十一亿日元的两亿股份。但是这些措施并沒有导致財閥的解体，因为占領当局不想消灭財閥，而是要它們服从美国壟断資本的指揮。

苏联政府不能容忍这一点。1947 年 5 月 12 日，盟国管制委員会苏联代表建議让盟国管制日本委員会的盟国代表监督公司整理委員会的工作。麦克阿瑟认为不能忽視苏联的立場。1947 年 7 月頒布了“关于禁止壟断”的法令，1947 年 12 月頒布了“关于消灭經

① 参見《Сборник заявлений,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и запросов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СССР в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М., 1950, стр. 17—18。

济过分集中”的法令。

可是这些法令实际上沒有触动大的壟断联合組織。改組实际上只涉及二十八个公司：最大的日本托拉斯分成了若干个大的托拉斯。“解散財閥”的措施便利了美国壟断組織同日本壟断組織建立密切联系。

美国政府的政策違反了建立和平民主日本的任务。占領当局的行动旨在不让日本人民有机会自由选擇管理形式，不让他們成立能在經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一切領域內彻底实現民主改革的政府。可是国內和国际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使得日本的民主运动空前高漲。因此，在国內实現了許多重要改革。尽管占領当局的措施具有不彻底和殘缺不全的性质，还是消除了日本的武装力量，取消了日本的軍国主义和法西斯組織，实現了反封建的农业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工立法实行了某些民主化。日本人民得到了某些民主权利和一般公民自由。宪法的反战性质給民主力量提供了反抗反动派的法律根据。

五、中国解放运动的胜利和美国在日本的政策

1948年初，美国統治集团对依靠国民党中国作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支柱这一点失去了信心。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获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在中国，国民党分子尽管有美国的广泛援助，仍然遭到了失敗。

因此，美国統治集团公开宣布一項任务：把日本变为美国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經济基地、变为反对亚洲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首先是反对中国人民革命的堡垒。

为此目的，美国派遣陆軍部副部长德莱伯到东京，委托他确定对日經济政策的原則。日本首相芦田向他提出了給予日本十亿美元貸款的要求。1948年3月24日占領軍总部的特别声明透露，德

莱伯主張从三方面加强日本帝国主义的經济地位：增加最重要物資的生产；发展对外貿易；編制平衡的預算。①

日本統治集团着手积极执行美国的建議。政府撥出了一大笔补助費来发展重工业和扩大对外貿易。实行通貨膨脹和增加賦稅的政策的目的，就是用恶化劳动人民的状况的办法来平衡預算。

1948年7月24日，麦克阿瑟沒有同盟国管制日本委員会磋商，就写給芦田首相一封信，要求修改关于国家和社会服务的法律，剝夺国家机关和社会机构的职工罢工和訂立集体合同的权利。② 政府奴顏婢膝地声称，"麦克阿瑟的信高于一切法律"，并于7月31日发布一項指令，剝夺了三百五十万职工的合法权利。原先訂立的一切集体合同都被廢除了。③

瘋狂的迫害开始了：罢工工人被大批解雇，大批罢工工人被逮捕。占領当局把工人提交軍事法庭审判。他們鎮压罢工，甚至动用坦克。

苏联政府起而坚决捍卫日本工人的民主权利。苏联代表在他要求召开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員会特别会議上，指出麦克阿瑟的行动是破坏波茨坦公告的原則和远东委員会的基本政治决議，要求取消上述非法的指令。④ 苏联代表在远东委員会上也一再提出这个問題。⑤

美国政府无視苏联的抗議，继續执行反民主的方針。1948年

---

① 参見《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т. V. стр. 205。

② 《East Asia. 1947—1950》. Selected Documents on Asian Affairs. Oxford, 1958, p. 579.

③ 参見《Сборник заявлений,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и запросов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СССР в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комиссии》, стр. 19。

④ 参見《Сборник заявлений 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й члена Союзного совета для Японии от СССР》, стр. 66—70。

⑤ 参見《Сборник заявлений,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и запросов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СССР в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комиссии》, стр. 19—21。

秋，日本的矿工、电气工人、私营铁路工人展开了尖銳的斗爭。芦田一西尾联合內閣宣布了所謂“中間路綫”，也未能制止工人阶級的运动。于是美国人成立了以吉田为首的反动露骨的內閣。显然，美国政府改变了它在远东的战略，越来越公开地企图把日本变成它的軍事基地，完全控制日本經济。

苏联代表团在远东委員会里坚决反对美国把日本变为它的侵略政策工具的企图。1948年9月23日，苏联代表在远东委員会发表了关于日本工业发展水平的声明。这是爭取使日本經济独立的广泛綱領。

但是，美国政府再次反对实現这个綱領。1948年11月11日，美国代表直截了当地声称，采納苏联的建議不会带来好处，說什么苏联的建議是重复远东委員会先前的决議，不属于委員会的职权范围之內。

在1949—1950年期間，苏联代表团在远东委員会里一再提到日本工业发展水平的問題。那时美国为日本制定了臭名昭著的所謂“經济稳定”計划。这个計划的主要目的是在加强美日統治集团联盟的基础上恢复日本壟断組織。

如果說，在日本，美国在許多方面阻碍了民主力量的增长，那么，它的亚洲政策整个說来却遭到了严重危机：中国人民解放軍的总反攻表明，国民党統治的日子屈指可数了。1948年11月6日，美国駐中国的軍事代表們一致对他們的政府說，“不管美国給予蔣介石以何种援助，局势只有靠直接出动美軍才能挽回”①。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統治集团便急于把日本变为它的侵略政策的远东堡垒，变为它的战略跳板之一。沒有“强有力的”反动政府，很难指望完成这种任务。

1949年1月，日本举行大选。在国会解散前夕实行的新选举法大大地限制了竞选集会和候选人活动的数量。在上届国会中共

①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p. 537.

产党只有四个代表，而这次选举的結果，它仍然得到了三十五席。①宣傳"中間道路"的社会党和其他政党遭到了严重失敗。

吉田成立了他的第三届內閣。这就是負有使命在占領軍支持下执行美国对日政策任务的"稳定"內閣。吉田也得到指望在国內外恢复自己陣地的日本壟断資本家的支持。

六、战后头几年对日和約問題

苏联一貫主張同日本签訂公正的和約，以确保日本沿着和平和民主的道路发展。战时盟国之間的协定所規定的正是这种和平安排。

苏联政府认为，根据波茨坦协定，准备对日和約的工作須由苏美英中四国外长会議来負責，因为迫使日本接受的投降条件是以这四国的名义签署的。

美国政府在准备对日和約时极力迴避外长会議，因为会議确立了大国即会議成員国一致的原則。美国建議用远东委員会十一个成員国代表会議来代替外长会議，指望利用表决机器保证通过有利于自己的决議。

1947年7月11日，美国駐莫斯科大使通知苏联政府：美国政府建議于1947年8月19日就草拟对日和約問題召开远东委員会十一个成員国代表議会。美国外交不等苏联作出答复，也沒有同英国和中国商量，就开始单方面地准备和会，同远东委員会成員国代表进行談判。这样，美国就无視了規定战后和平安排的筹备程序的协定。

1947年7月22日，苏联政府声明，它不能接受这个建議，要求在苏美中英四国参加的外长会議上事先予以研究。②美国继續坚持己見，随意解

① 参見 *Х. Г. Эйдус.* Очерки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Японии, стр. 270。

② 参見《日本問題文件汇編》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154頁。

释关于成立外长会議的波茨坦协定。①

在美国影响下的远东委員会的其他成員国，同意美国的立場，只是提出某些保留。例如，国民党中国政府提出新的表决程序，即代表会議上的决議須由包括四大国中三国的肯定表决在内的三分之二的多数表决通过。国民党外交提出的建議只是在外表上具有折衷的性质。实际上这种表决程序仍然使資本主义国家集团有可能忽視苏联的利益。

1947 年 11 月 17 日，蔣介石外交被迫考虑到美国对日路綫不得人心，建議召开远东委員会成員国事前会議。会議本应采用远东委員会的程序，即决議須由包括四大国一致表决的多数表决通过。

苏联政府拒絕了这个提案，建議在 1948 年 1 月召开外长会議②。

英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建議召开制定和約的事前代表会議，凡是"不仅由于对击敗日本作出貢献，而且由于日本侵略遭受莫大損失，由于对太平洋地区未来和平发展的迫切重要利益而特别关心对日安排的"一切国家均应参加。英国政府反对大国一致同意的原則，主張会議的决議由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③英国和美国深信它們会得到必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从而作出有利于它們的决議。

美国政府未能做到避开外长会議来召开和会，所以把締結对日和約的問題擱置下来了。苏联政府关心于保障日本的民主发展，决定利用外长会議长期中断后于 1949 年 5—6 月在巴黎举行

① 参見《Сборник нот и заявлен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СССР, США, Китая, Англии 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по вопросу мир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для Японии». М., 1951, стр. 36—38。

② 参見《日本問題文件汇編》世界知識社 1955 年版第 156 頁。

③ 参見《Сборник нот и заявлен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СССР, США, Китая, Англии 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стр. 56—58。

的会議，提出召开有中国参加的特别会議来討論对日和約問題。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反对1949年5月23日提出的这个建議。美国继續否认在外长会議上討論这个問題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日本統治集团同美国資产阶級的合作，逐漸地变成了以彼此在鎮压日本民主力量和恢复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势力方面的共同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同盟。因此，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在战后的头几年就竭力破坏实实在在的对日媾和。他們用尽一切手段阻撓在远东确立持久和平体系。这是他們煽动"冷战"和拼凑侵略性反苏集团的总方針的表現之一。

第二十章

对德国前盟国和約的准备工作

一、对德国前盟国和平安排的特点

同希特勒德国前盟国締結和約是战后最初几年国际生活中的一項迫切任务。早在战爭期間，反希特勒联盟的主要国家——苏联、美国和英国就已談妥在同法西斯集团的首要国家德国和日本締結和約之前先同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締結和約。这一协議載入了波茨坦会議議定书中，协議指出："作为当前之重要任务，会議（指外长会議。——作者）将受命准备对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及芬兰之和約……"①。

决定在同德国和日本两国締結和約之前先同希特勒德国前盟国签訂和約是有很多原因的。第一，德国的僕从国在德国和日本之前很久就退出了战爭。意大利于1943年退出战爭。其他参加法

① 《苏美英三国柏林（波茨坦）会議議定书》，見《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80頁。

西斯集团的国家在1944年也退出了战争。所有这些国家后来都对希特勒德国宣战(意大利在1943年10月，罗馬尼亚在8月，保加利亚在9月，匈牙利在1944年12月，芬兰在1945年3月)。罗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战爭的結束阶段对联合国家的胜利作出了不小的貢献。例如，保加利亚軍队参加了解放南斯拉夫、匈牙利和奥地利境內的战役。在1944—1945年間巴尔干半島的历次軍事行动中保加利亚参加的軍队共达十二个师；在这些軍事行动中保加利亚軍队死伤和失踪的約三万二千人。兵員达二十九个师的罗馬尼亚軍队在罗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內作过战。

决定尽先准备对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和約的第二个原因是，这些国家已經建立了临时最高权力的立法和行政机关。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議会和政府在战爭末期就已經实施了一系列旨在根除法西斯主义的措施。这些措施在保加利亚、罗馬尼亚和匈牙利尤为彻底。

和約应該使这些国家在民主化方面已經取得的成就巩固下来，并且促进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民主人士、各进步政党和团体都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他們主張尽快調整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格·米·季米特洛夫1947年2月在闡述对保和約的意义时說道："祖国陣綫、政府、人民，特别是我們党迄今为止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調整我們国家的国际地位……

"在这方面，在我們的道路上有着許多困难和障碍。但是，今天，我作为我党中央委員会的成員和保加利亚部长会議主席可以說，这些困难和障碍已經克服了。"①

最后，第三个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同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所签訂的停战协定中，已将有关对

---

① *Г. Димитр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 XIII, София, 1955, стр. 81.

这些国家的和約的許多重要問題預先作了規定。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德国和日本退出战爭是屬于无条件投降的性质，而同它們的盟国所签訂的停战协定却包含了这些国家退出战爭的若干条件。同罗馬尼亚(1944年9月12日)、芬兰(1944年9月19日)、保加利亚(1944年10月28日)和匈牙利(1945年1月20日)签訂的停战协定特别具体。在苏联、美国和英国代表所有联合国家签署的这些停战协定里，对将来就領土、政治、經济和軍事問題进行和平安排做出了重要决定。例如，关于同芬兰停战的协定直截了当地写道："停战协定中列有关于未来和約的某些条款将有助于和約的签訂。"① 事情还不仅如此。

早在战爭期間，投降了的德国的前盟国已經开始实际履行停战协定。以疆界問題为例。在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准备和約以前很久，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疆界，实际上已分别根据停战协定中的領土規定作了变更。或以賠偿問題为例。早在1944—1945年間，罗馬尼亚、芬兰和匈牙利即已开始偿付賠款。

反希特勒联盟的主要国家經过长期的談判和尖銳的政治斗爭，最后終于制定了希特勒德国的所有盟国退出战爭的条件。在这方面苏联起了杰出的作用。例如，对罗馬尼亚和芬兰的停战协定就是根据苏联1944年年初向芬兰和罗馬尼亚的法西斯政府提出的条件来制定的。

对匈牙利的停战协定也反映了苏联在最重要問題上对这一国家进行和平安排的观点。苏联政府对于匈牙利人民的处境有深刻的理解。匈牙利按照其法西斯上层人物的意志成了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国，直至1945年初才签訂停战协定。苏联政府认为，关于匈牙利的未来問題应由匈牙利人民自己来解决。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I, стр. 215.

在对保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中，苏联表現了巨大毅力和坚定性。只是从1944年9月起苏联才同保加利亚处于战爭状态，而英国是从1941年，美国是从1942年就同保加利亚处于战爭状态的。因此，英国和美国企图迫使保加利亚接受它們提出的停战方案，这一方案包含了把保加利亚置于較德国的其他盟国处境恶劣的地位的許多条款。然而，苏联沒有容許对保加利亚加以歧視。对保加利亚的协定也是按照对其他国家的停战协定所依据的同一基础而签訂的。

苏联外交也积极参与制定盟国对于意大利的共同政策。尽管对意大利的停战协定文本是美国和英国政府准备的，应該特别指出，正是由于苏联政府的倡議，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議（1943年）才通过了关于意大利的宣言，这一宣言后来成为对意大利停战协定的最重要的补充。①

由此可見，对德国前盟国和平安排的特点在于，有关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和約的一些极重要决定，是在战爭条件下依靠苏美英三国的有效的軍事政治合作而作出的。在波茨坦会議上，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指示外长們继續完成关于和平安排的工作。

二、历次外长会議上所进行的和約草案的准备工作

在下述三次国际会議上进行了关于草拟对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和約草案的工作，这三次会議是：倫敦外长会議（1945年9—10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議（1945年12月）和巴黎外长会議（1946年4—7月）。此外，各种专家和顾問委員会以及副外长常会还詳尽地研究了对德国前盟国和平安

① 参見本书第十七章。

排的某些問題。

倫敦外长会議在这几次会議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倫敦会議不仅是第一次外长会議，而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議。

在倫敦外长会議的三十三次会議上完成了不少工作。作为对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和約草案討論基础的是苏联的提案，作为对意大利和約草案討論基础的是美国和英国的提案。会議成功地解决了許多重要問題。例如，对意和約草案的許多規定和对其余四国和約草案的大多数条款是为外长会議的所有成員一致贊同的。最后，在某些一般性問題上也达成了协議。尽管如此，倫敦外长会議还是以失敗而告終了。

問題在于：西方国家的代表团企图粗暴地破坏波茨坦会議所規定的和約准备工作的程序。波茨坦議定书規定，在制定每一和約草案时外长会議成員将包括盟方在敌国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的代表，而对于意大利，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国家的权利也給予法国。这就是說，对意和約的准备工作将由苏、美、英、法四国外长参加，对罗、保、匈和約的准备工作将由苏、美、英三国外长参加，而对芬和約則将由苏联和英国的外长来准备。

但是，外长会議剛一着手审議和約草案，美、英代表团就企图破坏上述程序。西方国家的这种立場证明他們背棄了自己以前所承担的义务。苏联采取了坚定的原則性的立場，沒有同意破坏波茨坦协定的行徑。

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政府，在討論其他問題时也企图破坏已經取得协議的决定。美国代表通常采取了极端敌視苏联的态度。在討論苏联对意大利的賠償要求时就是这样。美国国务卿貝尔納斯在英国外交大臣貝文的支持下，借口意大利无力履行这些賠償要求否决了苏联的建議。

美国代表团的反苏立場，在倫敦会議討論对苏联邻国的和約草案时暴露得极其明显。美国代表团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对保加利亚、罗馬尼亚和匈牙利的民主政府进行了誹謗和攻击，并且声称只有这些国家的現任政府辞职，它才参加討論对这三国的和約。这是图謀干涉其他国家內政的露骨表現。美国代表团的一个成員对西方国家的立場是这样描繪的："美国和

英国所面临的問題是：在关于和平安排的談判过程中，它們会不会得到它們在停战期間所力爭未获的东西，就是插足东欧。"①

苏联代表团在倫敦外长会議上坚持不懈地努力爭取通过一些已取得一致意見的决議。但其他代表团，尤其是美国代表团，則力图把前已达成的协議一笔勾銷，它們的反苏立場未能使会議順利完成工作。

外长会議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是西方国家放棄了作为反希特勒联盟基础的合作原則。这鮮明地表現在关于同希特勒德国盟国締結和約的談判上。

倫敦外长会議的失敗引起了世界公众輿論的失望。美国政府及其同伙的政策到处(包括在美、英、法本国)遭到严厉的批評。世界公众輿論要求恢复大国之間的談判。同时，华盛頓、倫敦和巴黎的統治集团了解，拖延同东欧各国締結和約，只能导致西方国家影响的进一步削弱和使它們被排除于对欧洲这一地区有关和平安排的一些极重要問題的解决之外。1945 年 12 月，在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議上，西方国家同意恢复和約的准备工作，并就对德国前盟国进行和平安排的一系列重大問題进行了商討。

經过长期的艰巨的工作，相互让步和妥协，有关对意、罗、保、匈、芬五国和平安排的絕大多数問題到 1946 年夏季終于順利解决了。例如，对意和約草案这一最复杂的文件的七十八項条款中，将近七十款是完全一致同意的，其中包括几乎全部有关領土、政治和軍事的規定。在对其余四国的和約草案中，未取得一致同意的条款为数更少。外长会議所准备的对意、罗、保、匈、芬五国和約草案乃提交巴黎和会审議。

① *J. Campbell.*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5—1947. Washington, 1949, p. 66.

三、巴黎和会

会議于 1946 年 7 月 29 日在卢森堡宫开幕。会議的任务是：討論(外长会議所准备的)对意、罗、保、匈、芬五国和約草案和制定有关这些草案的建議案。

1946年的巴黎会議就其性质来說同以前的和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所有和意、罗、保、匈、芬和平安排实际有关的国家都参加了会議。这些国家是：苏、美、中、英、法五大国和以自己的軍事人員积极参加对欧洲敌国作战的澳大利亚、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荷兰、希腊、印度、加拿大、新西兰、挪威、波兰、烏克兰、捷克斯洛伐克、埃塞俄比亚、南斯拉夫、南非联邦等其他十六个国家。此外，"被邀請国"——奥地利、阿尔巴尼亚、埃及、伊拉克、伊朗、古巴和墨西哥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議，这些国家有权参加討論和申述自己的观点。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議。

在和会上給予战敗国以这样大的可能来維护自己的立場，这样的例子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不多的。只要回忆一下 1919 年巴黎会議曾把怎样侮辱性的程序加在战敗国代表团的身上就够了。

会議的最后决議、它的建議案不是由成員有限的什么委員会或会議作出的，而是由包括和会所有成員国代表的全体会議作出的。

但是，1946 年巴黎和会同凡尔賽"和平"安排的主要区别在于会議实质本身。1919年是以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和平来結束帝国主义的非正义的战爭的，而 1946 年这一次却是由于反法西斯的正义的战爭的結果而实現和平安排的。世界上最富于侵略性的反动势力的被击潰这件事本身，就使和平安排的任务具有完全另一种性质。苏联在战爭中从而在爭取民主的和平安排的斗爭中所起的

决定性作用，不能不給有关締結和約的外交活动規定下有着原則区别的另一种性质。

1919 年在巴黎所进行的帝国主义之間的斗爭，是与建立持久和平的利益毫无共同之处。而 1946 年在巴黎所进行的却是在和平安排方面两种路綫——民主路綫和帝国主义路綫——之間的斗爭。而且这一斗爭是在极力爭取持久和平的各国人民的自覚性和积极性空前增长的条件下，全世界民主和进步力量巨大高漲和增强的情况下展开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在决定性的程度上預先决定了有关締結对德国前盟国和約問題的斗爭的結局。

在巴黎，和平安排的两种傾向发生了冲突。一种是以美国外交为其最突出的代表的帝国主义傾向，另一种是以苏联所坚定奉行的民主傾向。以前，在外长会議范圍內进行关于和約准备工作的談判时，美国代表还感到自己要受以前的共同决定所約束。在外长会議上，他們还不敢公开反对反希特勒联盟的主要国家进行合作。可是，現在在巴黎和会上，他們想报复，为此，利用由于各种原因依附美国的小国的票数。这些小的附屬国的代表被指使来充当发起人，提議重新审議以前四大国已經取得一致意見的各种問題。

最曠日持久的、最激烈的爭論，是对会上的投票程序所展开的爭論。形式上这是个程序問題，其实这是一場政治性的爭論。

外长会議决定，和会須有三分之二的法定多数才能通过有关討論的实质性問題的提案。毫无疑义，按此程序，提案将比按簡单多数进行表决反映更多得多的国家的意志，因而也将带有更加民主的性质。但是，澳大利亚和荷兰的代表反对外长会議規定的程序，要求按簡单多数进行表决。美国国务卿貝尔納斯立即表示支持他們。在 1946 年 7 月 30 日的程序委員会的会議上，貝尔納斯声称，如果和会通过与外长会議的决議不同的提案，美国将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来維护这些提案。

苏联代表强烈地反对美国代表团玩弄的花招。苏联代表团捍卫了法

定多数的原則，因而也就維护了前此四大国一致同意的和約条款。苏联代表团不止一次地指出所謂"表决游戏"包含着的巨大危險。苏联代表团一面贊成按会議参加国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来表决建議案，一面仍力求做到意見一致、相互諒解和互作明智的让步，因为它清楚地了解，不如此就不能有效地解决国际事务。苏联的观点得到了其他許多代表团的支持。

英美集团不顧前已通过的一致同意的决定，利用多数票，强迫会議接受簡单多数的表决程序，在美英代表团看来，这种簡单多数的表决程序可以保证通过一切合乎美英統治集团心意的决議。美英統治集团对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采取的"强硬方針"政策就表現于此。建議案的这种表决方式是巴黎和会順利进行工作的严重障碍。

在其他許多問題上，美英也力图竭尽全力来阻撓締結民主条約。他們不遺余力地保护即将与之締約的国家的反动势力。它們不惜任何代价地力图使和平安排具有帝国主义性质。

在維护民主的和平安排的基本原則方面，苏联外交显示了坚定性。同时，苏联外交行动灵活，实行妥协，甚至在有助于整个和平安排获得成就的地方作出重大让步。美国代表沒有能够将前此一致同意的主要决議加以修改。这是会議的重大成功，是民主力量的成功，是苏联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的成功。

巴黎和会于1946年10月15日以全部通过关于五个和約草案的建議而結束了自己的工作。紐約外长会議（1946年11月—12月）完成了和約的最后工作。这一会議审議了巴黎和会的建議，制定了对意、罗、保、匈、芬五国和約的最后文本，对这五国的和約在1947年2月签了字。

四、和約的政治条款

对意、罗、保、匈、芬和約的政治条款，对于这些国家的未来具有特殊重要意义。这些条款实质上規定了曾經处于法西斯主义压

迫下的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和約的政治条款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解放的、反法西斯的性质密不可分的。它們也反映了战爭和战爭后果所引起的国际舞台上政治力量对比方面的变化。正如列宁在1916年所指出的："……結束任何战爭的和約，也只能是計算和記載这次战爭的进程和結果所达到的力量的实际变化。"①

和約草案的政治条款規定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首先必須保证它們的所有公民，不分种族、性别、語言或宗教，均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言論、新聞和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政治信仰自由和公开集会自由。

政治条款中有些条文具有特别意义，这些条文禁止一切法西斯組織以及其他进行敌視联合国家的宣傳的組織从事任何活动。条文不仅为这些国家的民主发展創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促使它們改善同邻国的相互关系。禁止各种法西斯組織的活动的条文，是根据战爭期間主要的反希特勒联盟国家的各种宣言而定出的。这些国家不止一次地宣布消灭法西斯主义是联合国家的目标。这里只要提到規定彻底根除納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克里米亚会議的决定就够了。同时应該指出，对所有前敌对国家的停战协定也都包括了关于禁止法西斯組織的条款。

尽管如此，英美集团的代表团在巴黎会議上仍千方百計地反对将根除法西斯主义的条文載入对意和約中。他們举不出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論据，而是毫无根据地硬說将这些条文載入对意和約沒有足够的理由。实际上，当时在意大利发生了多起法西斯的、沙文主义的示威游行，进行了各种旨在反对意大利人民所爭得的民主自由的挑衅活动。

这就是烏克兰和波兰的代表团建議巴黎会議将禁止法西斯主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頁。

义的条文載入对意和約的原因。在討論这一問題时，苏联、烏克兰、波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举出大量事实来证明将这些条文載入对意和約是正确的。特别提到新法西斯組織"普通人陣綫"的活动，这一組織的成立甚至英国的《泰晤士报》也认为是"法西斯思想的复活"。但是，美国代表团不顾波兰和烏克兰的理由确凿的合理建議，竟然使关于禁止意大利法西斯組織的条文未能列入和約。

和約的政治条款中还包括关于战爭罪犯的条文。根据这些条文，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应当采取措施将下列人員逮捕幷交付法庭审判，这些人是：被控犯有破坏和平和違反人道的战爭罪行的人，以及盟国的被控叛国的国民。

对意、罗、保、匈、芬五国和約的政治条款，沒有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条款沒有强迫它們接受某种形式的政治結构。条款只不过是为排除法西斯秩序复活的可能性創立了条件。

对希特勒德国前盟国的和約的政治条款，鮮明地反映了战爭的解放的、反法西斯的性质。在战爭結束以前，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法西斯或半法西斯制度之下。他們被剝夺了基本的民主权利。和約給予意大利、芬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馬尼亚的人民从今以后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可能性。凡是反动势力未能阻撓和約中反法西斯政治条款的执行的地方，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进行了深刻的民主改革，而这些改革归根結底使世界地图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

由于匈牙利、罗馬尼亚和保加利亚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結果，在欧洲出現了一些已成为持久和平的可靠支柱的国家。如果說凡尔賽和約曾把中欧和东南欧的小国这个地区变成經常冲突和糾紛的根源，那么从今以后在这里却出現了持久和平的地区。因此，对德国前盟国的和約促使欧洲国际关系体系获得根本改善。

五、和約的領土問題

領土問題也是和平安排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問題。

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认为，居民的意志，即实行民族自决权，是規定国家疆界或决定任何領土命运的基础。換句話說，在規定国家疆界时应首先考虑有关民族的自願表达的主权意志，而不管其表現形式如何。

但是，自决权、居民的爱好不是絕对的，也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种民主要求。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一书中强調指出："自决权是一种民主要求，它自然应当服从一般的民主利益。"①

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始終不渝地以列宁的这些教导为指南来解决具体的疆界問題。苏联政府在对意、罗、保、匈、芬和平安排期間討論領土問題时也是以列宁的这些教导为指南的。摆在反法西斯联盟的領导力量苏联面前的任务是：肃清法西斯侵略的后果，其中包括宣告法西斯分子强制实行的对欧洲領土的重新划分为无效。

法西斯侵略者曾經消灭了一系列国家和剝夺了欧亚两洲許多国家人民的主权。阿尔巴尼亚、奥地利不再作为独立国家而存在了；南斯拉夫从欧洲地图上消失了。在它們的廢墟上建立了完全隶屬于"軸心"国的形形色色的傀儡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被分割为两部分：捷克被划入德意志帝国版图，而在斯洛伐克建立了由法西斯代理人組成的"政府"。波兰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經受了最殘酷的考驗，他們的国家丧失了主权和独立。

在同西方各国政府談判过程中，苏联力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

---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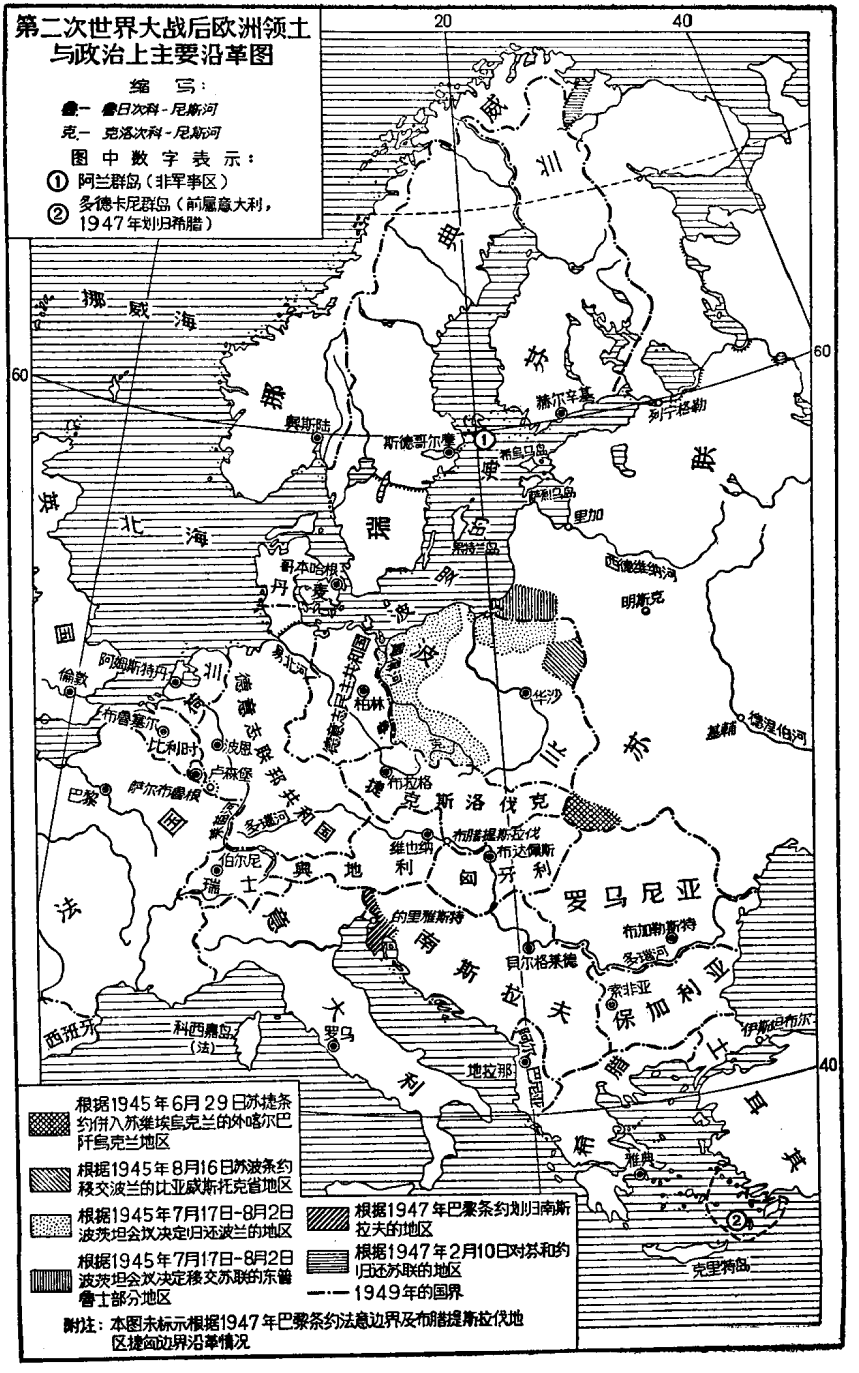
后的某些不公正的領土規定予以廢除，包括消除在年輕的苏維埃国家成立的最初年代里对它犯下的历史上的不公正行为。最后，在对德国前盟国和平安排期間，苏联极力爭取規定出能为邻国之間的友好关系創造良好条件的公正的疆界。

苏联在領土問題上的立場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反对。它們設法强使东欧接受将在該地区重新引起冲突和紧張气氛的領土决定。它們力图离間东欧各国之間的关系，主要的是想唆使东欧国家反对苏联，企图重建那臭名昭著的"防疫綫"。此外，西方帝国主义者阻撓在国际法上肯定苏联在希特勒德国进攻前夕所建立的疆界。

在准备和約的預备阶段上以及在巴黎会議上曾經引起頑强的、持久的外交斗爭的一个最复杂的領土問題，是規定意大利同南斯拉夫之間的疆界。苏联政府坚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南斯拉夫采取的不公正行为应予糾正，整个尤利亚克腊伊納，包括其中心——的里雅斯特城，应归还南斯拉夫。苏联专家建議的意南疆界是首先考虑了民族方面的情况而拟定的。同时，苏联专家在規定这条疆界綫时也从这样一点出发，即尽管在尤利亚克腊伊納存在着意大利人占多数的个别居民点，但应把这整个地区看作是政治和經济的統一体。苏联政府还考虑了尤利亚克腊伊納的大部分地区是由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的这一情况。

苏联为滿足南斯拉夫和尤利亚克腊伊納土著斯拉夫居民的正义要求而进行的持續不懈的坚决斗爭，受到許多国家、首先是南斯拉夫本身的热烈贊許。南斯拉夫代表团团长1946年9月16日在巴黎会議上說："任何一个南斯拉夫人不論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記苏联支持这个要求的事实，因为这个要求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从斯拉夫人为爭取自己的解放、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为爭取統一而进行斗爭的那个时候起就有的要求。沒有任何一个南斯拉夫人不为这个支持而对苏联充滿感激之情。"

美、英、法政府采取了另一种立場。他們頑固地反对把整个尤利亚克腊伊納交給南斯拉夫，而建議将它划分为两部分，东边的一部分給南斯拉夫，西边的一部分連同的里雅斯特城仍留給意大利。对于規定未来的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领土与政治上主要沿革图
缩写：
喀— 喀日次科-尼斯河
克— 克洛次科-尼斯河
图中数字表示：
① 阿兰群岛（非军事区）
② 多德卡尼群岛（前属意大利，1947年划归希腊）
20
40
60
40
挪威海
北海
瑞典
芬兰
苏联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立陶宛
波兰
德国
丹麦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法国
瑞士
奥地利
匈牙利
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南斯拉夫
意大利
西班牙
希腊
土耳其
斯德哥尔摩
奥斯陆
哥本哈根
阿姆斯特丹
柏林
华沙
明斯克
列宁格勒
维也纳
布拉格
布加勒斯特
贝尔格莱德
雅典
巴黎
伯尔尼
的里雅斯特
克里特岛
根据1945年6月29日苏捷条约併入苏维埃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
根据1945年8月16日苏波条约移交波兰的比亚威斯托克省地区
根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波茨坦会议决定归还波兰的地区
根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波茨坦会议决定移交苏联的东普鲁士部分地区
根据1947年巴黎条约划归南斯拉夫的地区
根据1947年2月10日对芬和约归还苏联的地区
1949年的国界
附注：本图未标示根据1947年巴黎条约法意边界及布朗提斯拉伐地区捷匈边界沿革情况

南疆界綫，西方三国的意見不一致。对南斯拉夫最为不利的是美国的建議，根据这个建議，在划归意大利的領土上住有二十万零九千名南斯拉夫人，而在划归南斯拉夫的領土上則仅有五万五千名意大利人。英国提議的疆界綫大体上是重复美国的，所不同的是在伊斯的利亚半島的南部南斯拉夫得到的是比美国建議稍大一些的伊斯的利亚的东南部分。对南斯拉夫比較有利的是法国建議的疆界綫，虽然这条綫远沒有全面考虑到尤利亚克腊伊納的民族、經济以及其他特点。

在关于意南疆界問題曠日持久的討論过程中达成了如下的妥协：尤利亚克腊伊納东面較大部分交給南斯拉夫，西面（根据所謂法国提議的杜伊諾—諾維格勒疆界綫划分）較小部分定名为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由联合国組織管理。誠然，这个决定沒有經受住时間的考驗，生活对它作了一定修改。1954年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締結了关于的里雅斯特区意南疆界的新协定；所謂的里雅斯特自由区的北面部分連同的里雅斯特城划归意大利，南面部分划归南斯拉夫。

自然，在外长会議准备工作期間和在巴黎和会上，由于領土問題也产生了其他一些爭論。

希腊政府援引"战略理由"要求保加利亚放棄它的領土的十分之一。如果滿足希腊的要求，就会使馬里乍河流域，这个保加利亚的谷仓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就会使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和按規模来說是保加利亚第二个經济文化中心的普罗夫迪夫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使保希疆界推进到距索非亚九十五公里、距普罗夫迪夫三十五公里的地方。保加利亚将失去天然的防御綫。

苏联在其他民主国家的支持下激烈反对希腊統治集团的毫无根据的領土要求。想夺去保加利亚一部分領土的企图遭到了破产；保加利亚的疆界是坚不可摧的。

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国家的代表还企图修改停战协定已作了規定的匈罗疆界和苏芬疆界。例如，美国代表团团員、參議員范登堡在会上主張重新审議苏联同芬兰的疆界（这一疆界是由1944年9月締結的对芬停战协定所規定的）。

美国极力利用历史上长期遺留下来的对領土的分歧意見，离間东欧国家彼此之間的关系。

在对意、罗、保、匈、芬和約的准备过程中，宣告法西斯国家所改划的欧洲地图无效，廢除了凡尔賽体系中某些不公正的領土决定，由于1941年德国的进攻而遭到破坏的苏联新的疆界在一些和約中被固定了下来。

六、和約中有关賠偿和其他經济問題

解决战爭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物质要求和爭議，也是一个极复杂的和平安排問題。在国际关系史上因战爭造成的軍事損失有多种賠偿形式。这些賠偿形式与战爭的原因和性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都不会怀疑法西斯国家对战爭造成的全部物质損失負有責任。苏联政府在战爭年代里不止一次地声明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在这方面有責任。苏联最高苏維埃主席团1942年11月2日关于成立国家非常委員会的命令中写道："德国法西斯侵略者及其同謀者犯下的全部滔天罪行，以及他們使苏联公民、集体农庄、合作社和其他社会組織、苏联国家企业和事业单位遭受的全部物质損失，将由罪恶的希特勒政府、德軍統帅部及其同謀者負担全部刑事上的和物质上的責任。"①

美英政府的历次声明，其中包括罗斯福1942年8月21日和10月7日以及丘吉尔1942年9月8日的演說等等，也都提到法西斯侵略者的責任。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英苏美就此問題所作的共同宣言。其中包括1942年1月13日联合国家关于惩处战爭罪行的宣言、宣布法西斯国家对联合国家的所有权和利益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 стр. 323.

进行的任何交易为无效的1943年1月5日宣言以及其他一些宣言。

苏联和反希特勒联盟的其他国家有一切国际法根据来要求完全补偿法西斯国家給它們造成的战爭損失。这一問題对于苏联具有特殊意义。苏联由于战爭而遭受巨大的損失，其数額連同軍費开支和占領区暫时失去的工农业收入共达二万五千六百九十亿卢布①。德国及其盟国使苏联遭受的一項直接損失，在暫时被占領地区即为一千二百八十亿美元②。

在討論对德国前盟国和約中的賠償及其他經济問題时，再次显明地暴露了和平安排的方法上的不同。苏联以部分賠償本国遭受的損失的原則作为自己的賠償要求的基础。同时，苏联政府极力使賠償的履行有助于恢复前敌国經济的和平部門。因此，苏联提議賠款的支付可以采取提供当前生产的产品的形式。苏联方面答应根据規定的办法保证供应有关国家为完成苏联訂貨所需的原料。

西方国家遭受的战爭損失要小得多，它們把自己整个的賠償政策服从于壟断組織的利益。这些国家企图建立自己对德国前盟国的經济的控制，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迫战敗国接受的帝国

① 参見1958年9月24日《眞理报》。

② 根据1945年巴黎賠償委員会各成員国提供給委員会的材料，德国及其欧洲盟国使委員会十八个成員国遭受的直接損失估計有五百三十四亿美元。这項損失分摊如下(单位：百万美元)：

法国	21,143	比利时	2,278
南斯拉夫	9,145	美国	1,267
英国	6,383	挪威	1,260
荷兰	4,472	其余九国(阿尔巴尼亚、卢森堡、加拿大、丹麦、印度、埃及、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南非联邦)	679
捷克斯洛伐克	4,202		
希腊	2,545		

波兰的損失共計为其国家財产的38%。波兰未参加上述会議，因为它的賠償要求是由苏联从德国得到的賠償額中来予以滿足的。

主义和平的方法。西方国家的統治集团甚至毫不掩飾自己对战敗国的經济政策的目的。

罗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的賠償数額，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政府在同这些国家締結的停战协定中早就規定了。在外长会議准备工作期間和巴黎和会上只剩商定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的賠償义务了。苏联把对意大利的賠償要求定为一亿美元。意大利的軍队曾和希特勒軍队一起使苏联国民經济遭受了严重損失，而賠償数額仅达法西斯意大利使苏联所受損失的二十五分之一。同时，在和約准备过程中，苏联政府維护了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对意大利的为数二亿美元的公正的賠償要求。苏联政府还主張意大利应賠償埃塞俄比亚。經过多月討論之后，外长会議只就意大利付給苏联的賠償数額达成了协議。

意大利应偿付其他受害国的賠償数額以及四国也未取得一致协議的关于保加利亚的賠償义务，均应在和会上作出規定。显然，在和会上正是圍繞着这些問題展开了特别尖銳的討論。在会議的参加国中，有的企图重新审議四国已經商定的关于偿付給苏联的賠款的决定。

在巴黎和会上，除了企图使苏联的本来就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化为烏有以外，还以隐蔽的形式对决定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会上有人提出：緩期决定賠償問題，成立特别委員会来"研究"这一問題，重新审議已由实踐证明正确的支付賠款的形式，通过仲裁确定充作賠償用的物資的"公正价格"，等等。澳大利亚代表团特别卖力。例如，它建議在和約中（仿照凡尔賽条約）不写明賠款总額和賠款的分配，而是設立一个賠償特别委員会，不仅要委托它监督賠償的执行情况，而且授权它从以前的敌国那里收集賠款并予以分配。

如果采納澳大利亚的建議，就将意味着在公正地滿足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物质要求方面后退了一步。建立賠償特别委員会就会引起对外长会議所做的全部辛勤工作的怀疑。此外，建立这种国际委員会不仅違反四国关于意大利給苏联賠償問題的决定，而且違反战时做出的有关罗

馬尼亚、匈牙利、芬兰的賠償义务的其他决定。

因此，苏联代表团有一切理由在巴黎声明，如果采納澳大利亚的建議，就将埋葬賠償問題，就将使侵略者給某些盟国造成的巨大損失得不到賠償①。

澳大利亚代表团建議在对意和約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和約中写上（同以前在凡尔賽条約中所規定的一样）用外汇而不是用实物来支付賠償費的原則。它完全沒有考虑到用外汇支付賠償一方面将引起外汇收支上的困难，另一方面需要保证出口市場，这就要重演凡尔賽賠償政策曾經导致的一切严重困难。

至于以美元或英鎊支付賠償，只会对美英及其附屬国的壟断資本集团有利。

反对外长会議已取得协議的苏联要求的賠償数額的人們，无論是实行正面交鋒或是采取迂迴策略，在巴黎和会上都沒有获得成功。这些决議以及四国取得协議的其他許多决議最終都为和会所贊同，并載入和約中。

在审議苏联的賠償要求时，西方国家代表团假装关心戚輕前敌对国家的遭遇，而自己却对这些国家提出过分的要求。例如，当巴黎和会的对意經济委員会轉而討論对其他国家的賠償問題时，許多代表团在对意大利提出"要求"方面总是竭力想叫自己超过对方。

帝国主义国家竭力設法把許多經济条款写进条約里面，因为这些条款可以使它們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战后尚未恢复元气的一些經济不发达国家。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坚持在对意、罗、保、匈、芬和約中載入一些条件，用以保证西方壟断資本在所有这些国家的"貿易自由"和"机会均等"。一句話，西方国家所捍卫的是帝国主义的和平綱領。这个綱領，正如列宁早在1916年就指出

① 参見《Советские делегации на Париж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 1947, стр.107。

的，“只能巩固、扩大和加重财政資本对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压迫。”①

苏联对西方国家想在和約中載入奴役性的經济条款的一切企图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爭。苏联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坚决揭露了关于在国际貿易方面“机会均等”的各种欺騙性口号的帝国主义本质。苏联政府坚定地保护小国利益，极力創造最有利的条件，使这些国家的經济得到独立自主的发展。在处理有关对前敌对国家和平安排的經济問題上的不同态度，在审議諸如联合国家在意、罗、保、匈、芬的财产所受損失的賠償数額，这些国家同联合国家今后的經济关系，前敌对国家的外資命运以及其他一些問題时显明地表現了出来。和会是在尖銳的政治斗爭情况下討論这些問題的。

当討論联合国家在前敌对国家的财产問題时，特别突出地表現出美、英、法壟断資本的自私意图，它們不仅想完全恢复自己在那些国家的陣地，而且想大大加强这些陣地。

苏联的观点是賠償在意、罗、保、匈、芬的外国财产所受損失的一部分。这种部分賠償不会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肩負不能忍受的重担。在規定賠償費时，应該考虑到这些国家的人民在战爭的結束阶段曾参加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爭以及他們在战爭中所遭受的損失。

根据这种情况，苏联政府建議按外国财产所受損失的三分之一支付賠償費。而美、英、法政府却要求全部地、百分之百地賠償損失。下面的例子可以证明它們的要求是太过分了：据匈牙利报刊的估計，如果采納了西方国家提出的对外国财产所有者的賠償办法的全部建議，那末匈牙利需要付給这些财产所有者的款数至少超过匈牙利支付給苏联的款額的八倍。苏联在这个問題上的立場得到了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等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3頁。

国政府的充分理解。

最后，西方国家不得不放棄全部賠償联合国家在国外財产所受損失的原則，而同意采取折衷的办法，即賠償一部分，其数額为所受損失的三分之二。

对于恢复前敌对国家的經济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这些国家在联合国家領土上的財产的命运。意大利对此特别关心，因为意大利在联合国家的財产达到极其可观的数額。例如，意大利在美国的財产总值在1946年年初（根据美国前財政部长溫逊的材料）超过了一亿三千万美元。英国报刊估計意大利在英国的財产为五千五百万到六千万美元。意大利在中国的財产总值差不多达到五千万美元。意大利在法国、比利时和东欧各国都有大量財产。

在外长会議討論这一問題时，美国政府建議用联合国家掌握下的由存放在有关国家的銀行中的現款、企业、海輪及其他各种財产所构成的全部意大利財产来抵償联合国的有关会員国对意大利的"軍事要求"。当苏联代表团在巴黎外长会議上試图問明所謂"軍事要求"的含义和如何决定其范圍时，美国代表团解釋說，这是指其財产在对意战爭中由于某种原因而受到損失的美国公民提出的任何要求。

苏联政府坚决反对对德国前盟国提出这种过分的貪求，认为必須限制过分广义地解釋关于賠償損失的要求。如果采納关于无限制地扣留前敌对国家在国外的財产的建議，就会給这些国家的經济带来巨大損失，就会使那些甚至沒有經受被占領之苦和未直接参加战爭的国家也有广泛的可能来不受监督地沒收这些国家的国外財产。考虑到这一点，苏联从原則上反对这个建議。

例如，苏联政府在它所准备的对罗、保、匈、芬的和約草案中就未列入关于沒收它們国外財产的要求。相反，它建議：既然战爭期間前敌对国家及其自然人和法人在联合国家領土上的財产和其他資产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在和約生效后这些权利就应当予以恢复。

在其他許多問題上，苏联也維护了民主和平的原則和与之締結和約的那些国家的人民的利益。例如，当討論对意和約的有关工业、文学和艺术

财产的特别附件时，美国代表团提出了严重損害意大利利益的补充，但是遭到了苏联代表的强烈回击。苏联的这种立場完全符合意大利的利益。意大利政府在提交給和会的一項备忘录中說："意大利代表团认为苏联代表团的建議是公正的。"苏联在防范意外事件問題以及其他一系列政治和經济問題上的立場，同样地得到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代表团的完全贊同。

在1945—1946年討論对意、罗、保、匈、芬五国和約中的經济問題时，已經看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根本不可能把帝国主义的和平条件强加給各国。苏联的坚定的原則立場，它的国际威望和威力，全世界民主力量的增长——所有这一切使得西方国家想利用和平安排中的經济問題在政治上和經济上奴役德国前盟国的多次企图都遭到了破产。

七、一九四七年和約

对意、罗、保、匈、芬五国和約的准备工作持續了一年以上。这五个和約于1947年2月10日在巴黎签字，苏、美、英、法政府批准后于1947年9月15日生效。

这些和約①具有相同的結构。它們包括如下几个主要部分：导言；領土条款；政治条款；陆軍、海軍和空軍条款；由战爭而引起的要求(賠償)；財产、权利和利益；一般經济关系；爭議的处理，等等。和約的締結方为：前敌对国家为一方，与該国处于战爭状态的同盟国和参与国为另一方。

在和約的导言中宣布停止战爭状态，有的指出前敌对国家参加反对德国的战爭，以及包括这样的內容，即同盟国有責任支持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关于接受它們参加联合国組織的要求。

和約的領土条款宣告法西斯国家所改划的欧洲地图完全无效，并把欧

① 各条約全文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7 год》，ч. I，стр. 64—360。

洲国家的某些新的疆界固定下来。

对意和約規定对法意疆界在四个地段（小圣伯尔納隘口，西尼斯山高原，泰补尔查伯頓山，帖尼河、維苏比河与洛亚河各上游）作了有利于法国的不大的改变；对意南疆界作了有利于南斯拉夫的重大改变（在伊斯的里亚半島、尤利亚克腊伊納一部分、阜姆市（里耶卡）、札拉鎮連同附近小島、帕里各薩島連同附近小島）。的里雅斯特連同周圍的不大地区划为的里雅斯特自由区。多德卡尼群島按照和約由意大利让給希腊。

意大利被剝夺了"对非洲的各屬地的一切权利和法律依据。"前意大利殖民地——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屬索馬里兰的命运在和約签訂后就已解决了。

1951 年底利比亚宣布为独立的联邦国家，由的黎波里坦尼亚、昔兰尼加和裴贊等三个省組成。关于索馬里兰，根据联合国大会的决定，从 1950 年 12 月 2 日起交意大利托管十年。厄立特里亚在 1952 年 9 月 15 日作为自治单位并入埃塞俄比亚。

罗馬尼亚疆界除罗匈疆界外恢复到 1941 年 1 月 1 日的原有状况。維也納仲裁（1940 年 8 月 30 日）关于将北德兰斯瓦尼亚割让給匈牙利的裁决应予廢止，而恢复 1938 年 1 月 1 日罗馬尼亚和匈牙利之間原有的疆界。苏罗疆界是依照 1940 年 6 月 28 日苏联和罗馬尼亚关于比薩拉比亚和布科維納北部的协定和 1945 年 6 月 29 日苏捷关于外喀尔巴阡山烏克兰的条約确定下来的。

保加利亚疆界未变，仍为1941年 1 月 1 日原有的疆界。对保和約巩固了 1940 年 9 月 7 日在克拉瓦底所訂的罗保条約关于将南多布魯查割让給保加利亚的規定。

匈牙利的疆界恢复到 1938 年 1 月 1 日原有的状况；維也納仲裁的裁决廢除了。匈捷疆界作了不大的改变：布腊提斯拉伐区的不大一块領土割让給捷克斯洛伐克。

根据对芬和約，芬兰的疆界仍为 1941 年 1 月 1 日原有的状况。同时，芬兰确认将苏联根据 1920 年 10 月 14 日和 1940 年 3 月 12 日的和約自願割让給芬兰的貝柴摩（彼阡加）省归还給苏联。把波卡拉一烏德地区①租

給苏联管理，租期五十年。

政治条款在和約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性质前面已經談过。

和約的海軍、陆軍与空軍条款对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武装力量和軍事生产均作了限制。这些条款規定应清除某些永久要塞和軍事設置。前敌对国家不得生产任何原子武器、任何自动推进或有人操纵的飞彈以及其他一些形式的武装。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的陆軍、海軍、空軍人数規定为这些国家的防务所必需的最低額。意大利軍队的官兵人数規定为二十五万人，罗馬尼亚为十二万人，保加利亚为五万五千人，匈牙利为六万五千人，芬兰为三万四千四百人。

許多条款处理了由于战爭而引起的各种物质要求。这些条款規定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有义务部分賠償被它們的武装部队为了侵略目的而侵入的国家所遭受的經济損失。

意大利的賠償义务規定为：賠償南斯拉夫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希腊一亿零五百万美元，苏联一亿美元，埃塞俄比亚二千五百万美元，阿尔巴尼亚五百万美元。罗馬尼亚賠償苏联三亿美元。保加利亚賠償希腊四千五百万美元，賠償南斯拉夫二千五百万美元。匈牙利賠償苏联二亿美元，賠償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一亿美元。芬兰賠償苏联三亿美元。其他国家的賠償要求主要以在他們領土上的战敗国的財产来滿足。

对意、罗、保、匈、芬五国和約具有公正的民主的性质。这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功績和胜利。由于苏联外交的坚定而灵活的路綫，使得这些国家获得了独立的自由的发展，其中一部分国家——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还永远消灭了資产阶級制度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对意、罗、保、匈、芬五国和約的締結，对欧洲的和平安排事业作出了重大貢献。

制定和約工作的順利完成证明，不同社会經济制度国家之間的政治合作不仅在战爭期間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是可能的和卓著成

① 1955年苏联政府提前放棄了苏联的租借权，并在1956年初从該地撤出苏联軍队。

效的。

对意、罗、保、匈、芬的和平安排的参加者，不仅制定了对上述国家的和約的一般政治原則，而且解决了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有关領土、經济和軍事等問題。这些决定中的絕大多数都經受住了时間的考驗，并对意大利、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恢复民族独立和自主起了促进作用。

不应忘記，和平安排的参加者不得不研究既同資本主义的意大利和芬兰有关，又同逐漸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罗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有关的各問題。尤其有价值的是对希特勒德国前盟国进行和平安排的外交經驗。

战后最初几年的外交史证明，美国統治集团在准备和約期間企图对苏联采取的蛮横办法是毫无道理的。

第二十一章

联合国組織的成立。1945—1949年联合国的活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法西斯主义被粉碎以后，由于全世界民主力量巨大高漲的結果，出現了成立国际組織的客观条件。这种国际組織的使命是：保证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防止新战爭的爆发。苏联在粉碎侵略者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和各国人民群众对世界政治空前增长的影响，均有助于这一組織的成立。

在成立联合国的准备工作和联合国的活动当中反映出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趋势，首先反映出对战后和平安排各項問題上的两条路綫的斗爭。拥护战后实行民主安排和成立有效国际組織的人，其中最积极的是苏联，不得不进行紧張的斗爭，来克服那些坚

持使战后世界組織具有帝国主义目的的反动势力的反抗。对于这些反动势力来說，国际联盟时代仍旧是他們的理想。

一、成立联合国的准备工作

在联合国成立之前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准备工作。它证明战爭期間大国以及所有联合国家进行合作是一項肯定而有益的經驗。

苏联所提出的为各国人民的普遍利益进行国际合作的原則构成了联合国宪章的基础。这无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苏联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很久就开始为建立巩固的国际安全体系而斗爭了。

1941年9月24日，苏联政府在盟国倫敦会議的宣言中提出了下列任务："……确定建立国际关系和战后世界組織的途徑和方法，以便使各国人民和我們的下一代摆脫那种和人类文化不相容的、罪恶的、血腥的納粹主义。"①

1941年12月4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說，在消灭侵略者以后，只有在联合各民主国家为一个巩固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組織，才能保障持久的和公正的和平，又說在成立这样的組織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必須是尊重国际法②。

西方首先是美国所竭力追求的却是另一种类型的組織。在准备敦巴頓橡树园会議期間美国国会所拟的各种計划，是以当时美国統治集团中极为流行的一种观念为依据的，即建立一个实际上由美国控制的"超国家"的国际組織，美国将主要通过这一未来組織的主席和秘书长来实行自己的控制。

---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 стр. 164.

② 同上书第192頁。

美国国务院的一个特别小組在1943—1944年間就詳細地制訂了有关建議案。正如P·魯塞尔在他所著《联合国宪章史》一书中所記述的，在美国国务院为对联合国宪章草案提出建議而准备的文件中，最初談到的并不是通常所指的秘书处，而实质上是个政治性的主要机构，領导这个机构的或者称为总裁，或者称为总理，或者称为秘书长，或者称为"世界議长"("World's Moderator")。照有关文件的起草人的想法，这个人应該拥有非常广泛的权限，包括重要的政治职能，尤其是在和平受到破坏的时候。此外，还打算設立后来称为"联合国主席"的总主席职位。甚至提弗兰克林·罗斯福或丘吉尔为这种主席①。根据这項計划，"联合国主席"理应是美英世界大帝国的首脑。

至于英国关于未来組織的計划，丘吉尔在1943年5月訪問美国后曾概述了这个未来組織的基础。按照他的主意，战后世界的整个权力应該轉归英美将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世界最高会議"。丘吉尔建議在世界会議下轄有三个区域性会議(欧洲的、美洲大陆的和太平洋地区的)②。

战爭期間，在西方首先是在美国出現許多建立国际安全組織的其他方案。这是些形形色色的方案，从主張在精神上、宗教上感化侵略国家的空想計划起到极其具体而又相当反动的方案止。大多数計划都是用建立美国控制下的各种各样超国家的世界性联合組織来宣揚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霸权。但是，这些計划是注定实現不了的。在那些年代里，西方国家的反动势力被迫实行退却。对于这些国家的統治集团来說，唯一可能的政策是支持以其軍事威力决定了全人类命运的苏联。

苏美英三外长莫斯科会議(1943年10月)是关于建立国际和平与安全組織的談判的重要阶段。会議向建立联合国組織迈出了事实上的第一步，并首次規定了它的基础③。

---

① *R. Russel*.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45. Washington, 1958, p. 375.

② 参見 *G. Goodw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London, 1957, p.7—8。

③ "联合国"一詞是和1942年年初签署的二十六国宣言的出現有关联的。从那时起就这样称呼反希特勒联盟的各参加国。

三国外长以及特邀的中国代表签署了会議制定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强調了大国必須合作和一致行动，这种合作和一致行动应該看作是不仅可以决定尽速消灭侵略者、而且可以决定最迅速而有組織地由战爭过渡到和平的条件，必須在軍备所占用的人力和物力最少的情况下来保障和平。

莫斯科会議的参加国还声明它們在战胜敌人以后为建立和維持和平与安全而进行相互合作的决心。它們承认“有必要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內，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則建立一个普遍性的維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組織，这些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論大小，都可以加入成为会員国。”①

一切国家（不論其社会經济制度如何）都有同等主权，把这个原則宣布为未来国际組織的基础，其意义是难以估計的。这一原則之具有眞正民主的內容，应当归功于苏联。苏維埃外交多年来一貫进行的原則性斗爭获得了成功：这一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則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就已被資产阶級国家所确认，其后便体現在联合国宪章中。

1943年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領导人在德黑兰签署了宣言，重申1943年莫斯科会議的决定。宣言表达了三国决心：“……在战爭中和随后的和平时期，都将一起合作。”德黑兰宣言包含一些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有关三大国合作是战后时期和平的保证的条款，以及有关三大国和全体联合国家“所負的締造和平的无上責任”的条款，“这种和平必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絕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好感，并在未来許多世代中，消除战爭的災禍和恐怖”②。

---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 стр. 415.

② 《苏美英三国德黑兰宣言》，見《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言选集》第1集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461—462頁。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的敦巴頓橡树园(在华盛頓附近)会議是准备新国际組織的最重要阶段。参加会議的有苏、美、英的代表(在談判的第二阶段上，中国代表也参加了)。敦巴頓橡树园的談判带有非正式的性质，在法律地位上是个专家会議。会議的决定作为建議提交有关政府批准，并且作为"苏联、美国和联合王国代表团在华盛頓就建立国际安全組織問題进行預备談判的結果公报"①刊登在苏联的和世界性的报刊上。

敦巴頓橡树园的談判是在莫斯科会議和德黑兰会議决議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以反希特勒联盟的三个主要国家在范圍极为广泛的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而告結束。会議参加者建議成立称为"联合国"的国际組織，并草拟了这一組織的章程的輪廓。敦巴頓橡树园会議的建議案基本上正确地，即考虑到当时的条件解决了建立这样一个組織的任务，这个組織应以国际法的眞正民主的原則为基础，并且有眞正有效的領导机构和享有必要的权力。同时也考虑到大国对維持和平的特别重要的作用和責任，这表現在賦予大国以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席位和确认安全理事会决定問題时大国一致和采取一致行动的原則。这一决定完全符合战时各大国合作的历史經驗，并为以和平共处原則为出发点的有效的国际安全体系提供了最完善的基础。

但是安全理事会內的表决程序問題在敦巴頓橡树园会議上并沒有得到最后解决，因为各方面对于安全理事会是否在决定一切問題时，尤其是当爭議的一方为常任理事国时，都应一貫采取大国一致原則有不同意見。敦巴頓橡树园会議所草拟的文件指出，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問題将继續研究。

敦巴頓橡树园会議的工作得到了反希特勒联盟各国的政府和广泛輿論的高度評价。

实际上，成立联合国的問題是在1945年2月苏、美、英三个盟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I, стр. 243—259.

国領导人的克里米亚会議上解决了的。克里米亚会議达成了协議，决定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議，以便根据敦巴頓橡树园会議的建議案制定联合国宪章。

在克里米亚，对于联合国結构和活动程序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首先应該提到克里米亚会議参加国一致贊同美国代表团所准备的关于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建議案的折衷方案。

把烏克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列为联合国創始会員国的决議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确认烏克兰人民和白俄罗斯人民对战胜共同敌人的事业作出杰出貢献的证明。对法西斯侵略者宣战的所有其他国家均被邀請参加旧金山会議（除了中国和法国，克里米亚会議决定建議这两国和三大国一起邀請其他国家参加会議）①。在克里米亚还达成了这样的协議，即規定了托管制度以代替国际联盟的委任統治制度。

所有这些建議案都包括在向参加旧金山会議的国家发出的邀請书中，后来又在联合国宪章中固定了下来。

二、旧金山会議和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会議于1945年4月25日在旧金山开幕。

出席会議的有五十个国家的代表。二百八十二名代表和各个代表团的一千五百名以上的顾問、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員，在两个月內进行了大量工作来草拟联合国宪章的最后文本②。

---

① 法国政府答复同意参加会議，但是拒絕作为邀請其他国家的发起人。法国政府借口說它沒有参加敦巴頓橡树园和克里米亚的談判，建議不要将这些会談所通过的建議案作为制定国际組織章程的基础，而仅作为进一步談判的基础。三大国未同意这一对已經进行的大量工作表示怀疑的意見。

② 参見 *С. Б. Крылов.* История со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М., 1960; «Documents on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an-Francisco. 1945». London-New York, 1945. v.I—XIII。

在会議的各小組和各委員会以及在会外掀起了激烈的爭論。許多国家，例如澳大利亚、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希腊、菲律宾、荷兰等国的代表提出了許多修正案，力图削弱安全理事会，破坏大国一致原則。

仅澳大利亚一个代表团就对宪章提出了三十八項修正案，企图限制大国和安全理事会的作用，尤其是想取消大国一致原則，規定国际法院在范圍极为广泛的問題上有强制审判权，和保护殖民国家的权利，等等①。

这些問題的提出本身受到了美英代表团的不够一貫的立場所鼓励，而且有时它們还直接支持这种建議。这不能不使原来就已相当复杂的战后和平問題的解决更加复杂化。出現了不少由于一些国家的利益不同、它們的社会經济制度和国家制度不同而产生的困难。反对建立有效的国际安全組織的人利用这些理所当然的困难，借口維护正义和小国利益，以欺騙性的辞句进行掩飾，化費很多精力来毒化会議气氛和阻撓会議順利进行工作。它們散播悲观主义的論調，預告会議"失敗"，利用每个困难来談論"危机"，捏造和歪曲苏联立場。

但是，首先由于苏联代表团的努力而保持的大国意見和行动的一致带来了完全的胜利，而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国家的人民群众对于它們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点。

1945 年 6 月 26 日会議的参加国在旧金山的退伍軍人大厦签署了联合国宪章②。同年 10 月 24 日，宪章在五大国和参加这一組織的其他大多数国家批准并把批准证书交去存档以后生效。每年的这一天便作为联合国日来加以庆祝。

在联合国宪章这一极重要的国际文献中，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眞正进步的、民主的原則得到了承认和巩固。宪章的每一条款都证明不能忘記历史的教訓，尤其是不能忘記国际联盟的可悲經驗。

---

① *N. Harper* and *D. Sissons*.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1959, P.79.

② 关于联合国的成立和活动的文件参見 *В. Н. Дурденевский* и *С. Б. Крылов*.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56.

各国的和平共处是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这些国家应該"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邻之道和睦相处。"① 联合国各会員国必須奉行爱好和平的政策，不得以武力相威胁和使用武力，不得干涉别国事务，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来防止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和侵略行为，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爭端。

宪章責成这一組織的各会員国发展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主权和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他国領土神圣不可侵犯和不得干涉别国事务，也是国际交往中的最重要原则。联合国会員国应該在一切方面实行广泛的国际合作，促进經济和社会进步，保证所有人的平等，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根据公认的和为許多世紀的傳統所尊崇的国际法原则，宪章宣布所有国家必須无条件地履行它們所承担的义务。

作为联合国的目的之一，宪章指出必須創造条件，使得能够維护正义，尊重由条約和国际法的其他依据而引起的义务，从而使法制在国际关系中得到胜利。

联合国宪章还有这样一个宗旨，即充当协調中心，使各国为达到共同目标而采取一致的行动。

关于联合国的实质問題具有重大意义。美、英、法和其他某些西方国家的代表极力为他們在联合国內推行强制和舞弊的政策作辯护，加紧宣傳联合国似乎具有議会性质的思想。

例如，艾德萊·史蒂文森在美国参議院外交委員会上說什么联合国是"根据西方議会傳統而建立的。"他說，取消这个特性就是取消联合国机构本身②。史蒂文森公然企图把願望当作現实，极力强使联合国具有資产阶

① 《联合国宪章》，見《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 年版第36頁。

② 《The New York Times》, 21. I. 1961.

級政客所衷心喜悅的資产阶級議会制度的声名狼籍的性质。

显而易見，这种立場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把資产阶級議会的性质强加于联合国的企图是沒有任何根据的。尼·謝·赫魯曉夫强調指出，联合国"不是議会，而是国际集議場所，成立它的目的是为了要这样解决問題，即它的解决办法要无害于参加这一場所的任何一个国家。"①

联合国按其本质来說，不像某些反动的法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具备有国家組織(无論是单独的国家或某种"超国家")所固有的特征。联合国是主权国家的組織，是为了有利于持久和平的合作而建立的，它的活动只能以尊重所有参加国的主权和考虑到它們的利益为基础。

联合国的最重要的特点，它的基础的基础，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原則。② 尼·謝·赫魯曉夫說："这样做不是偶然的。这說明联合国組織的倡議者和創立者是英明的，他們考虑到了当时的現实国际形势。"③

苏联——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一道获得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意味着首先承认"一切国家，特别是那些决定新的世界大战是否爆发的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則。"④这也意味着实际上和法律上承认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平等这个現阶段国际关系的唯一正确的基本原則。

联合国宪章中規定的一致原則，說明这一組織能够在事实上

---

① *Н. С. Хрущев.* За мир, за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за свободу народов. М., 1960, стр. 175.

② 参見 *Н. А. Ушаков.* Принцип единогласия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 1956。

③ *Н. С. Хрущев.* За мир, за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за свободу народов. стр. 156.

④ 同上书第 294 頁。

而不是口头上保证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一致原则的使命是使联合国不可能成为某一国家集团的工具。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大国合作的历史經驗的实际体現。这一經驗能够而且必須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延續下去。

最近几年国际合作的敌人所猛烈攻击的正是大国一致原則。提一提下述情况是适宜的：在准备联合国宪章时期，西方国家統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对这一原則采取肯定的态度。美国前国务卿斯退丁紐斯在当时向总統作的关于旧金山会議的总結报告中写道："敦巴頓橡树园会議把这样一点看做是一个公理，即反軸心国偉大联盟的核心国家的一致是世界安全的基石，旧金山会議的各邀請国仍然坚持这一观点。"①

而且，大家知道，美国政府曾以接受关于一致原則的建議作为它加入联合国的条件②。关于这一点，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紐斯曾說："不应忘記，把大国否决权問題載入联合国宪章，对于爭取美国人民和参議院批准这一宪章是必需的。"③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意見一致和一致行动，是联合国切实而順利实現宪章所宣布的目标的最重要条件。西方国家迴避和違反这一原則，正如下面指出的，导致了在一定阶段上安全理事会的活动不能为巩固和平的利益服务。

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也包括中国，虽然在联合国成立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已經不能代表全国人民。1949 年中国人民的偉大胜利消灭了反动的蔣介石政权，建立了新的人民民主国家——中

①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on the Results of the San-Francisco Conference. Publication 2349 (June 26, 1945), p. 68.

② 参見 *Н. А. Ушаков.* Принцип единогласия великих держав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тр. 18—19。

③ 参見 1947 年 9 月 15 日《眞理报》。

华人民共和国。从那个时候起，美国及其同伙对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就开始执行一种阻撓的政策，而使政治僵尸——蔣介石傀儡仍然保持联合国的席位。

在对联合国宪章作了簡单的分析以后，就可正当地指出，西方大多数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在联合国和国际联盟之間划上等号，其論据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这两个国际組織在本质上有着根本区别。国际联盟是給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爭收場的凡尔賽体系的有机組成部分，一成立就是反民主的、反动的。联合国則是由于正义的解放战爭的結果，在眞正民主的、进步的原則基础之上而誕生的。

国际联盟的成立是和帝国主义者的反苏陰謀联系在一起的，在十四年中它企图无視苏联，而联合国的成立及其活动，則同苏联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分不开的，也正是由于苏联的参加才能使上述原則在联合国宪章中固定下来，才能使联合国获得某些积极成果。帝国主义者已經不能像他們对待国际联盟那样，而使联合国完全屈从自己并使它变成对付社会主义与民主的順从工具。而且，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巩固使得和平力量能够在联合国中展开揭露壟断資本反动势力的斗爭，能够利用联合国組織作为动員所有国家的广大公众来保卫和平的手段。

联合国是建立在比国际联盟广泛得多的基础之上的。国际联盟的創始会員国只有二十六个独立国家（其中二十个是欧洲国家，美国拒絕参加国际联盟），而在旧金山联合国成立会議的閉幕会上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就有五十个国家（后来波兰也被承认为創始会員国，即第五十一个会員国），其中有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国家。

国际联盟盟約未包括无条件的禁止侵略。实际上它使訴諸于战爭的行动合法化，而不管战爭的性质和目的如何，它只規定要履行一定程序和暫緩（三个月）采取軍事行动。而联合国宪章的每一个字不仅宣布侵略战爭为非法，而且宣布国际关系方面的武力威胁为非法。

成为国际联盟基础的假的民主平等的有害后果之一，是把国际联盟变为无聊的"清談場所"。在許多情况下，甚至盟約中为国联积极干預生活提

供某种可能性的少数条款也被大肆歪曲，以致变成了相反的涵义。如上所述，联合国宪章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意見一致的重要原則固定了下来。如果这一原則能够得到始終一貫的遵守，那末就可以在平等原則的基础上，考虑到世界上有着两种社会制度和最强大的国家对和平的命运負有特殊責任的情况，来解决各种国际問題。

同时应該指出，和国际联盟盟約不同，联合国宪章还包括采取措施制止侵略的重要条款。在这方面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国际联盟盟約規定会員国有权自行决定該組織的某一成員国是否違背它所承担的义务和应否对它采取强制措施，而联合国宪章却将此項权利列为安全理事会的不可剝夺的特权之一。

联合国宪章明确划分了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大会的职权，这就消除了国际联盟活动中曾經有过的并产生过极其不良影响的竞爭因素。和国际联盟行政院（每年应召集会議三到四次，每次为期不超过一周）不同，联合国宪章規定安全理事会的活动具有經常的性质，这就着重說明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机构中占有特殊地位和对維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負有特殊責任。

还应該指出，国际联盟盟約中根本沒有諸如人的民主权利、民族自决权、区域性安全組織、国际經济和社会合作这样一些条款，而联合国宪章却有关于这些問題的詳尽条款，反映了世界上发生的质变和实行广泛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由此可見，企图把联合国宪章看作是国际联盟盟約的某种翻版，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联合国存在的經驗证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則是不可动摇的。严重妨害联合国活动的唯一因素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它們蔑視这些原則，宁願奉行"实力地位"政策。

同时应該指出，在一些具体問題上，联合国宪章需要加以改善。在这方面，应該指出，国际托管制度和宪章中关于非自治領土的条款，正如十五年来的經驗所表明的，是站不住脚的。取消托管制度，正像消灭一切可耻的殖民主义制度一样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殖民国家的敌对行为使得托管制度完全成为殖民主义的变种，而持有托管领土和非自治领土的殖民国家公然蔑視联合国宪章責成它們所担負的义务。結果，宪章的有关章节成了一紙空文，而托管領土和非自治領土的实际情况則与各国人民和民族平等自决的原則这样一些联合国的基本原則完全相違背。

三、联合国的活动

創建联合国的各国是联合国的創始会員国①。

联合国的首次大会于1946年1月10日在倫敦举行。决定第一届会議的第一期会議选举各机构，第二期会議审議联合国职权內的各种問題。但是，国际紧張局势迫使大会去討論最严重的国际問題。結果，第一期会議延长到1946年2月14日結束，而第二期会議則从1946年10月23日开到12月15日。

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議一开始就选举会議主席、副主席、各委員会主席和馬上就要开始活动的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接着选举經济及社会理事会、国际法院、联合国秘书长。通过了有关大会各委員会之間分工的决議，关于联合国的語言、秘书处机构、特权和豁免权及其永久会址等規定。

随后大会召开关于巴勒斯坦問題的特别会議②（1947年4月28日到5月15日）。大会第二届会議于1947年9月16日到11月29日举行。1948年4月16日到5月14日又举行特别会議③

---

① 联合国的創始会員国（五十一个国家）为：澳大利亚、英国、阿根廷、白俄罗斯、比利时、玻利維亚、巴西、委內瑞拉、海地、危地馬拉、荷兰、洪都拉斯、希腊、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印度、伊拉克、伊朗、加拿大、中国、哥倫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利比里亚、黎巴嫩、卢森堡、墨西哥、尼加拉瓜、新西兰、挪威、巴拿馬、巴拉圭、秘魯、波兰、薩尔瓦多、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苏联、美国、土耳其、烏拉圭、烏克兰、菲律宾、法国、捷克斯洛伐克、智利、厄瓜多尔、埃塞俄比亚、南斯拉夫、南非联邦。

② 此次特别会議称第一届特别会議。——譯者

(再次討論巴勒斯坦問題)。1948年9月21日到12月12日和1949年4月5日到5月18日举行大会第三届会議。1949年9月20日到12月10日举行大会第四届会議。

到1950年为止的这个时期內,联合国的成員有所增加。1946年大会第一届会議接納瑞典、阿富汗、冰島和泰国加入联合国。1947年大会接納巴基斯坦和也門加入联合国,1948年接納緬甸,1949年接納以色列,1950年接納印度尼西亚。苏联严格遵循宪章,一貫投票贊成接納新会員加入联合国,尽管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与苏联不同。

美国和西方其他某些国家却采取了另一种立場。他們根据狹隘的政治动机,公开歧視人民民主国家。多年来西方国家强使有关接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联合国的問題擱置下来,尽管这些国家是第一批提出申請加入联合国的,是符合宪章所規定的一切必需要求的。

在1949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問題。早在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通知联合国,它已經剝夺了蔣介石分子在联合国各个机构中的代表权,因为他們已經沒有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权利。

美国及西方集团的其他一些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实行抵制。起初他們企图以这样的說法来解釋自己的立場,即硬将这事說成是接納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問題。这种論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是联合国的創始国之一,根据联合国宪章,中国有权在安全理事会占有席位。无可爭辯的是,只有受到全中国人民拥护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才有权在整个的国际关系中,其中也包括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由于革命的結果,在中国

---

③ 此次特別会議称第二届特別会議。——譯者

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蒋介石反动集团被赶出大陆，无論在什么地方它已丧失了在事实上和法律上代表中国人民的权利。

国际法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国家。政府的更迭不能引起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利的怀疑。过去中国是、而革命后人民自由选出的新政府所代表的中国現在仍旧是国际法的主体和联合国会員国。因此，任何支持蒋介石分子充任中国人民正式代表的企图是沒有任何法律根据的。

还在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議上和安全理事会开始工作初期，苏联就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建議案①，这些建議案有可能改善国际局势和保证政治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为了服务这一目的，苏联还提出了許多有关裁軍和禁止热核武器，譴責新战爭的准备，締結五大国和約，通过消除新战爭威胁的宣言，以及巩固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緩和国际紧張局势和发展国际合作的措施等建議案。

苏联以自己的建議案开辟了这样的現实可能性，即不仅有可能消除战爭的威胁，而且有可能协調一切国家的合作，以有利于和平。苏联还使力图加剧国际紧張局势的侵略势力的阴謀詭計不能得逞。苏联的建議案和資产阶級外交为了贏得准备侵略所必需的时間而經常玩弄的假和平主义詞藻毫无共同之处。如果通过苏联的建議案就会立即減少战爭威胁，緩和国际紧張局势，縮減軍事預算而使每个国家騰出大部分資源用于和平目的。

---

① 参見《Делегации СССР, УССР и БССР на II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борник речей и выступлений. Сентябрь-ноябрь 1947 г. М., 1948; *А. С. Протопоп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СССР за мир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народов (1945—1957 гг.). М., 1957; *Г. И. Морозов.*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К 15-летию Устава ООН). М., 1960。

苏联的建議一貫反映着全体进步人类的意志。但是，如果說这些建議一直受到所有国家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致贊同，那末在联合国里它們却总是遭到西方国家的頑固抗拒。

同时西方国家常常企图捏造苏联立場的含义，并通过各种各样的誹謗将形成国际紧張局势的过錯轉嫁到社会主义国家身上。西方外交家由于惧怕討論苏联的建議，往往竭力根本不让这些建議列入大会或安全理事会会議的議事日程，而在不可能这样做的时候，則采取其慣用的手段，即开动"表决机器"，阻撓議案的通过。因而，联合国在重要关头表現得軟弱无力并給它的威望带来了严重損失。

但是，对苏联提出的問題进行討論，不言而喻，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因为情况将会广泛宣揚出去，世界报刊和輿論将会加以热烈評述。苏联的裁軍和禁止热核武器的方案、締結和平公約的建議都得到了所有国家和各大洲千百万和平拥护者的响应和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各国保卫和平大会、群众集会和和平拥护者会議不倦地要求西方国家、要求联合国采取坚决措施来緩和国际紧張局势。

联合国在它活动的前一段时期所审議的具体問題当中，可以划分出一批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有关的問題，包括諸如交出和惩处战犯的問題。大会第一届会議关于这一点通过的决議包含有关于将战犯交付审判的建議。同时，还通过了关于尽速把难民和被迁移的人送还他們祖国的决議以及其他某些决定。

一些新的国际問題在当时即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些問題的产生，一部分是由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在战后时期所采取的侵略方針，另一部分是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漲。按照联合国主要机构討論这些問題的程序来审議这些問題是适宜的。

安全理事会是在1946年1月19日从审議所謂伊朗問題来开始自己

的活动的。西方反动势力所煽起的这个問題的实质是：伊朗政府挑衅性地控訴事实上不存在的所謂苏联干涉伊朗內政。控訴的荒誕无稽是如此明显，以致在討論过程中伊朗代表不得不請求从安全理事会議事日程上撤消这一控訴，但是，西方国家却加以反对，徒劳地企图利用这种誣蔑来作为扩大反苏叫囂的借口。但是他們的企图沒有达到任何結果：不容爭辯的事实表明，对苏联的任何責难都是完全沒有根据的。

这样，安全理事会工作的开端就說明，西方国家企图把安全理事会的活动立即納入同巩固和平的利益毫不相干的軌道。这个把戏的破产同时也证明了苏联的国际陣地是如何强大。

1946年1月，根据烏克兰苏維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議，安全理事会审議了印度尼西亚問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斗爭席卷了全国。英国和荷兰的軍队开始了反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軍事行动。虽然殖民国家，首先是英国和法国（在审議这一問題时，安全理事会的法国代表使用了否决权）加以反对，安全理事会对这一問題几乎討論了三年之久，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冲突的解决和有助于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国家。

1946年2月安全理事会开始討論外国軍队非法留駐黎巴嫩領土的問題。这一問題是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写給安全理事会的信中提出的，信中要求英国和法国軍队撤出上述两国。虽然西方国家阻撓安全理事会支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合法要求（苏联表示支持这一要求），但这一問題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英国和法国軍队于1946年12月撤出叙利亚和黎巴嫩。

1947年1月安全理事会审議了同科孚海峽事件有关的一些問題。1946年10月两艘英国軍舰侵犯阿尔巴尼亚主权，开进科孚海峽，碰上战爭期間德国人所敷設的水雷而炸毀了。英国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訴，其目的是想逃避对这一事件所应負的責任。苏联所采取的坚定立場阻止了它。案件被移交給国际法院去处理，1949年4月国际法院证实，英国犯有侵犯别国領海的罪行。

1947年7月埃及向安全理事会呼吁，要求英国軍队撤出埃及和苏丹，因为英国軍队的留駐該地，正如埃及的呼吁书中所指出的，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对这一問題的討論与干預，后来促使英国軍队撤走

了。

1948年1月印度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訴，控告巴基斯坦的侵略行为：策动和鼓励入侵查謨与克什米尔領土。巴基斯坦方面則控訴印度非法合并上述土邦。1948年初，安全理事会成立了由五个国家的代表(根据印度的要求委員会的成員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組成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委員会。委員会的大多数成員处于西方的影响之下，阻撓有利于和平和安全地解决克什米尔問題。对印度提出的具体問題不加审議，反而审議了复杂的印巴关系問題①。

大会第一届会議在第一批問題中，首先审議南非联邦境內印度人的地位問題。这一問題以及关于南非联邦的种族歧視和种族偏見的整个問題，都一直列在大会的許多届会議的議事日程之上。大会譴責南非联邦政府的声名狼藉的政策的許多决議，由于西方国家的阻撓，被擱置一旁，因而联合国未能制止南非联邦殘暴的种族歧視和民族歧視政策。

1947年在大会第二届会議上，苏联代表团提出了重要倡議，建議对新战爭宣傳加以譴責。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建議，通过了特别决議，决議說，大会：

"一、譴責无論在哪一个国家进行的旨在挑起或可能挑起或鼓励对于和平之威胁、对于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的一切形式的宣傳；

"二、請各会員国政府在其宪法范圍內采取适当办法：甲、以其所有的一切宣傳手段，促进以宪章的宗旨和原則为基础的各国之間的友好关系；乙、鼓励傳播旨在表达所有人民对于和平的眞正願望的新聞。"②

联合国大会的这一重要决議是符合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切身利益、国际合作任务的。

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紧接着大会决議之后很快地通过了保卫和平法，規定禁止战爭宣傳，違犯者予以严厉的刑事处分。但是，西方国家并沒有根据这項决議作出任何結論，在这些国家里，在所討論的这一段时期內

① 参見本书第十章。

② 参見《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发言选集》第1集世界知識社1955年版第279—280頁。

战爭宣傳仍继續进行，并愈演愈烈。

在1949年4—5月的大会第三届第二期会議上审議了前意大利殖民地的命运問題。决定：利比亚将不迟于1952年1月1日获得独立，索馬里在有关对該領土的托管协定（就这一問題同意大利签訂的协定于1950年12月批准）批准之日起期滿十年时独立。至于厄立特里亚，1950年大会第五届会議規定在該地建立一个按照联邦原則同埃塞俄比亚合并的自治机构，其最高权力屬于埃塞俄比亚皇帝。

在那些年代里，无論是在安全理事会还是在联合国大会，"冷战"的卫士們不止一次地企图利用崇高的讲坛来誣蔑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关心"基本自由"为借口組織对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馬尼亚內政的干涉，似乎在这些国家內"基本自由"已經遭到破坏。在1949年春大会第三届会議上，玻利維亚和澳大利亚明显地按照美国的指示，作了这种挑撥性的发言；接着智利对苏联也提出了同样毫无道理的指責。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地利用联合国讲坛来煽起对社会主义各国的敌意。

在"冷战"年代里这样的企图是很多的。这些企图不断遭到不容許对自己的主权有任何侵犯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反击。

除了上面簡单叙述的分别由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审議的各問題外，还有一些問題是这两个机构都討論过的。在这些問題中首先是希腊問題。战爭期間开入希腊的英国軍队，在侵略者被歼灭以后不仅不撤走，反而在美国政府协助下开始公开干涉希腊內政，展开反对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斗爭。这就造成了希腊的紧張局势和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1946年1月希腊問題由于苏联的动議被列入安全理事会的議事日程。同年8月，乌克兰在联合国的代表将关于希腊阿尔巴尼亚边界的挑衅事件的事实眞相向安全理事会作了报告。这些事件乃是外国軍队留駐希腊的結果。

西方国家企图摆脫責任，煽起了对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其他邻国的虛构的責难，說它們"帮助希腊游击队"。由于美国未能强使安全理事会通过有关决議，乃将案件轉移到大会去討論。总的說来，联合国对希腊問題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达成良好結果和制止英美的武装干涉。

在那些年代里，巴勒斯坦問題在联合国的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

根据国际联盟委任統治制度对巴勒斯坦統治的彻底破产，迫使巴勒斯坦向联合国提出申訴。苏联遵循列宁民族政策的原則，建議結束英国委任統治制，撤出英国軍队，在联合国宪章所确定下来的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解决巴勒斯坦問題。对这一問題的审議由于企图拖延結束委任統治制度的英国的立場和力图在巴勒斯坦取得特权的美国的立場而变得极其复杂化。联合国經过长时期的討論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議。

所謂朝鮮問題长时期来一直列在联合国大会的議事日程上。安全理事会也討論过这一問題。人所共知，朝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分割为两部分。在北朝鮮，人民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南朝鮮，建立了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傀儡政权。早在 1947 年，苏联就建議到 1948 年年初所有外国軍队均自朝鮮撤出，以便朝鮮人民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在南朝鮮駐有軍队的美国反对这个建議。而苏联則于 1948 年 12 月单方面把自己的軍队撤出北朝鮮。

朝鮮問題产生的本身和它后来的复杂化，是由于美国力图保持南朝鮮作为自己在亚洲的軍事进攻基地而引起的。

在联合国最初五年其他一些最重要的活动当中应該指出 1948 年 12 月 10 日大会所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宣布在政治、經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人的民主权利和义务，乃是一个頗值得贊許的事实。但宣言沒有規定如何实現它所載的权利的任何保证，这是宣言的重大缺点。通过庄严的宣布人权，特别明显地暴露出資本主义国家表面存在的民主权利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无权地位、政治迫害及民族歧視等等之間的矛盾。

例如，世界人权宣言譴責和禁止对人的任何歧視，无論根据何种理由或因其人"所隶国家或地区之政治、法律或国际地位之不同"，"无論該地区是否独立、托管、非自治或受有其他主权上之限制。"①

这里必須指出，无論在托管方面，还是在对待非自治領土方面，联合国的活动从一开始就辜負了殖民地人民的期望，和完全不符合联合国宪章所

① «Всеобщ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утвержденная и провозглашенная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ей ООН 10 декабря 1948 года». Департамент информации ООН Нью-Йорк,1949.

規定的有关这方面的庄严义务。負責管理托管領土的国家的实际行动远远地沒有履行联合国宪章責成受托国承担的义务。占多数的亲美的国家在大会第一届会議上所通过的托管协定本身，证实了殖民主义者在新的幌子下保持以前的殖民制度的意图。例如，这些托管协定規定，托管領土的管理机构是受托国領土的組成部分。結果，被托管領土的人民仍旧像过去一样处于殖民地的无权和被剝削的难以忍受的沉重条件之下。

美国違反联合国宪章，很快在自己托管的太平洋島屿上着手建立軍事基地。作为受托国的南非联邦在西南非洲建立了殖民制度，它甚至认为不需要向联合国提出托管协定草案，公然表明了想吞并这块領土的意图。

苏联不止一次地出来保护被托管領土的人民，建議托管理事会要求管理当局履行自己的义务。但是，西方国家对殖民主义者反加以鼓励，而使托管理事会陷于无能为力和使它变成默默庇护管理当局所犯暴行的机构。联合国未能找到方法和可能性，来迫使受托国充分地履行联合国宪章关于国际托管制度的条款，以及履行大会第四届会議的决議，这个决議譴責殖民国家粗暴地違反联合国宪章并建議采取一系列符合宪章要求的措施。

非自治領土（名符其实的殖民地）的状况也相类似。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关于非自治領土之宣言”沒有得到履行。殖民国家对于联合国想对它們在殖民地的作为进行微小监督的任何企图都加以坚决的反抗。

四、圍繞联合国宪章原則的斗爭

联合国的历史从其存在的最初几年起就充滿了圍繞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則的斗爭。苏联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所共同奉行并且得到其他爱好和平国家支持的保证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政策，始終包含着爭取联合国宪章民主原則的斗爭。苏联坚持联合国在审議一切問題时应严格遵守这些原則，从而一貫地捍卫着联合国的威信和威望。这个事实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联合国宪章的原則不断遭到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这些势力蔑視宪章責成联合国各会員国所承担的义务，这表現在：实行各种扩張主义的“綱領”和

"計划"，建立以社会主义陣营为对象的侵略性、排他性軍事政治集团，进行軍备竞賽和在别国領土上設立軍事基地网。除了这些粗暴違反联合国宪章的侵略措施外，还屡次企图破坏联合国組織，使它变成反动的帝国主义集团的工具。

首先遭到剧烈进攻的是大国一致原则，这一原则是企图利用联合国为自己的侵略政策服务的、反对国际合作的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西方反动分子极力詆毀苏联的政策，責难苏联在安全理事会濫用否决权，但他們并未获得預期的結果。苏联在安全理事会所采取的严格符合联合国宪章的明确立場，一貫得到世界广大輿論的拥护，因为苏联的立場始終是以保证各国人民之間的和平和合作的利益为目标的。

提出关于苏联似乎濫用否决权这一毫无道理的責难的人們，举不出任何一个事实来证明这一点，因为这样的事实是不存在的。

苏联代表在安全理事会每次使用否决权时，其目的都是为了維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条款，使之免于被試图違反，撇开或濫用它們。估計到这样的客观事实，提出西方国家濫用其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权利的問題将是正确的。它們利用这些权利来損害联合国原则和整个和平事业。苏联的否决权永远意味着保卫这些原则。只消回忆一下苏联在有关联合国接納会員国問題上使用否决权的情况就够了。

大家知道，西方国家对于这些問題表現了怎样的片面立場。許多年来，西方国家反对接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加入联合国，这样做是違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合作的利益的，联合国只有在具有眞正的广泛性的时候才能有效地促进国际合作。西方国家力图仅仅限制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进入联合国。苏联的否决权阻止了用变联合国为"思想一致者俱乐部"的办法使联合国的国际性质化为烏有的企图。

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努力，大会第十届会議同时接納了十六个国家加入

联合国，其中有四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做，联合国是否得到好处呢？国际合作的利益是否得到好处呢？无疑，西方也普遍承认这一点。英国里德大学的艾倫·德·呂塞指出："目前比任何时候看得更清楚，联合国史上的最重要的轉折点是1955年的决議，这一决議克服了接納新会員国問題上的僵局，它向遍布全世界的相克和相成的利益、思想、希望和恐惧敞开了进入这一組織的大門。"①

苏联使用否决权的其他場合的情况也相类似。对于那些不顾联合国宪章企图干涉主权国家的內政，并强使其接受实质上是使殖民行为和霸占其他国家領土的举动合法化的决議的人来說，苏联的否决权是他們前进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

早在旧金山会議起草联合国宪章期間，就有人发言反对一致原則②。但是，由于那次会議是在同法西斯主义作战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当时大国的一致行动对于西方国家本身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这些国家的統治集团沒有公开支持这样的发言。

随着时間的推移，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国外交家开始則借助于附庸国，继而在联合国公开进行爭取修改、实际上是取消一致原則的斗爭③。

大家知道，宪章中有两条是关于对联合国宪章的修改的。即第一百零八条和第一百零九条。規定在下述情况下可以使用这两条款，即国际形势和联合国的实际活动导致有必要对宪章进行修正和修改。依此使宪章更加完善，使联合国这一負有促进广泛国际

---

① *Alan de Russet*. General Assembly. A New Assessment. «United Nations News», 1960, № 1, p.7.

② 参見 *С. Б. Крылов*. История со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тр.86—87。

③ 美国在这一方面的建議是人所共知的，美国人古德斯比德指出："大多数这样的修正都是美国提出的。"（*S. S. Goodspeed*.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New York, 1959, p. 614）

合作、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命的国际組織的基本原則得到巩固和完善。提出不屬于上述情况的建議，就意味着使国际安全組織的思想受到怀疑，歪曲联合国基础。那些形式上援引宪章的有关条款，企图强行作出将导致取消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一致原則的修改的人們，正是这样行事的。

旨在破坏联合国宪章、修正宪章基本条款的运动，从联合国活动的第一步起早就进行着了。这一运动的鼓舞者一向是美国政府的和非官方的各色各样的組織。

企图修正联合国宪章的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官方的性质。美国参議院于1948年春提出这一問題。当时参議院外交委員会审議了提出修正联合国宪章的八个議案。結果，在1948年6月通过了范登堡議案，其中指明必須限制安全理事会的一致原則。

1950年美国国会审議了一百四十余名議員提出的一系列議案，并建立了专門的小型委員会来研究这一問題。伴随着广泛展开的企图修正宪章的运动的，还有：各州小型委員会的公众集会；各州議会通过有关决議；出版許多专門小册子。积极参加运动的有科学协会和卡內基基金会之类的組織。

在西方其他国家也开始了类似的运动。例如，加拿大外交部就建立了研究修正联合国宪章問題的专門的工作組，比利时和荷兰的外交部也設立了专門的委員会①。

在联合国組織的內部不止一次地有人企图破坏联合国宪章。

早在1946年10月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議上，澳大利亚、菲律宾、阿根廷和秘魯的代表就曾提出一系列提案，其意图在于大大限制或取消安全理事会的一致原則。仅仅由于各主要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代表团的支持，这些提案才得以列入会議的議事日程。

在討論过程中，美国、英国、法国的代表团和国民党分子主張取消否决

① *F. Wilcox, C. Marcy.* Proposals for Chang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 1955, p. 44.

权。苏联的原则立場粉碎了这一企图。大会第一届会議对这一問題的討論，清楚地显示了企图取消一致原則的运动的反苏傾向，证明了这里所涉及的是世界政治方面的两条路綫的斗爭。一条路綫是維护联合国宪章所固定下来的所有国家国际合作的原則，另一条路綫却是力图取消这个原則，好让自己有夺取世界霸权的自由。

美国代表团把关于設立"联合国大会和平与安全临时委員会"，又称"小型联大"或"两届会議之間的委員会"的議案提交1947年10—11月①大会第二届会議审議。美国报刊頗为露骨地揭示了这个議案的含义。《紐約时报》說，設立"临时委員会"就有可能更加肯定地达到那些坚持取消一致原則的人們所提出的目标②。

帝国主义者力图在联合国体制內設立宪章所沒有規定的新机构，其目的是削弱、代替和撇开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只能設立其任务在于协助大会执行职能的輔助机构；而在当时情况下所提議建立的却实际上是联合国新的主要机构。这一机构将被賦予的职能，实质上类似安全理事会的职能，而在好些情况下甚至更为广泛。这样，"两届会議之間的委員会"的职权就应包括审議維持和平与安全的問題，包括組織調查和为此目的而委派的各种委員会，监督大会决議案的执行情况。"两届会議之間的委員会"的职能在这方面将不受限制。

苏联代表团在会議上发言反对"两届会議之間的委員会"这一主張，确凿有据地证明了这一机构是完全非法的，揭露了有意破坏国际合作和联合国組織的这一企图的制造者。

"两届会議之間的委員会"在大会第二届和第三届会議上是作为"在一定时期"內的机构而設立的，可是在第四届会議上就被改組为常設机构。但是，"两届会議之間的委員会"的倡議者对建立这个委員会所抱的希望，是注定实現不了的。这些希望由于苏联和联合国其他許多国家的坚决拒絕参加这一非法机构的工作而宣告破灭了。

在联合国活动的第一阶段，修改联合国宪章的信徒們力图做

① 联合国大会通常在9月的第三个星期二开幕。——譯者

② 《The New York Post》, 19. IX. 1947.

到使安全理事会服从于国际法院的咨詢意見。西方国家估計到苏联在国际法院中将居于少数，因而指望撇开联合国宪章，对安全理事会施加压力。但是，这一企图也沒有得到什么結果。苏联代表团阻止了联合国各机构向国际法院提出一些毫无道理的质詢，同时，国际法院本身也以其一系列的咨詢意見劝阻了西方国家想借助于国际法院来破坏一致原則的企图。

早在那个时期即有人企图破坏联合国宪章上禁止干涉屬于国家內部职权的事务的各条款了。"捷克斯洛伐克"問題和"柏林"問題就是这样出現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議事日程上的；"联合国朝鮮統一复兴委員会"也是抱着同样目的而成立的。

賦予大会以安全理事会职权，实际上也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違反，其目的是想避开一致原則和利用大会的"表决机器"。

可以回忆一下大会第五届会議关于具有蠱惑性名称的"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决議案①。美国国会所准备的这項决議案規定：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达不成一致时，根据安全理事会任何七个理事国的請求，大会在二十四小时內就应召集会議来討論当前局势和通过关于集体措施，包括国际軍事制裁在內的建議案。决議案規定，联合国各会員国在自己的武装力量中必須保持应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建議可以提供来組成联合国軍的专門部队。

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团和其他許多国家的代表团正确地估計了大会第五届会議的这个决議，认为是粗暴地違反联合国宪章，是企图取消大国一致原則。由大会篡夺安全理事会的不可剝夺的特权所孕育的对和平事业的严重威胁，从后来的事件中还可得到证明。根据"保障和平的联合行动"的决議案，通过了一些严重損害国际合作的决議，例如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关于錯誤地指責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朝鮮的声名狼藉的决議，1951年

①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Резолюц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с 19 сентября по 15 декабря 1950 г.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V сессия, доп. № 20». Ньо-Йфк, № 377, 1950, стр. 11—14.

5月18日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决議。根据"保障和平联合行动"决議案还成立了違反宪章的"集体措施委員会"，这个委員会被賦予只屬于安全理事会及其所轄的軍事參謀团的各項职权。"集体措施委員会"被賦予这样的职权，例如，它不仅可以在联合国各会員国搜集軍事性质的情报，調查它們的軍事資源和武装部队的后备，而且可以拟定集体軍事行动計划。

提交大会第六届会議的"委員会"的报告，建議剝夺安全理事会的权利和特权而将其轉交給大会。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建議案的性质，議案建議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四十八款，将安全理事会关于通过联合国集体軍事行动的决議的权利、授予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以这种全权的权利，轉交給大会。根据下面情况不难看出"委員会"的性质，該委員会編制了禁止輸往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物資清单，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日本的出口商品中已經这样实行。

但是，像这样的一些措施是不現实的。这些措施是和人类压倒多数的利益不相容的，而目前不考虑这一点是不行的。西方集团的大多数国家借口各种原因規避參加根据"保障和平联合行动"决議案而建議实行的各項措施。例如，上面提到的"委員会"建議六十个国家參加建立联合国"武装部队"，其中只有四个国家表示同意，而且最为积极的是泰国①。

甚至英国也表現了深深的忧虑，担心根据"保障和平联合行动"决議案而建立的机构将助长"把联合国变为美国控制下的世界的馴服工具"这一趋向，助长"与其說能贏得未加入集团的国家的支持和友誼，不如說会吓跑这些国家"②的趋向。

在大会第六届会議上被迫贊同"集体措施委員会"的建議案和有关决議的許多代表团，竭尽全力爭取通过一些修正案，以使它們可以不參加这一"委員会"，目的在于利用联合国做幌子来掩盖五角大楼的侵略陰謀的活动。

---

① *W. R. Frye.* United Nations Peace Force. London, 1957, p. 59.

② *G. L. Goodw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London, 1957, p. 255.

結果，臭名远揚的“集体措施”綱領在大会第六届会議上遭到了惨敗。在这一个問題上所通过的决議，并未使美国有可能迫使联合国各会員国提供自己的資源和軍队来实現侵略計划。

我們只提到了某些具体問題，对于这些問題的审議证明着在国际政治中存在着关于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否决权的两个方針的斗爭。这个斗爭在国际紧張局势加剧的时期就变得尖銳起来，而当国际气氛明朗时就趋于緩和。

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其数目在联合国中正不断增加着）对于反对联合国宪章基础的人的猛烈进攻始終不渝地予以回击。尼·謝·赫魯曉夫指出：“某些人反对否决权。但是如果沒有否决权，那末也就沒有这一国际組織，它将宣告解体。否决权原則責成各大国就所有需要安全理事会审議的問題，达成能够保证有效地維持和平的意見一致的决議。达成大国意見一致的决議总比用武力解决国际問題为好。”①

战后年代圍繞联合国宪章原則的斗爭，证明了美国外交家指望借助“机械多数”在大会上为所欲为的打算是沒有前途的。美国对联合国其他代表团施加压力，即人們恰当地称之謂“扭胳臂”的策略，越来越落空了。早在联合国成立初期，亚洲和非洲执行独立政策的年輕国家的票数就已开始对大会的活动发生引人注意的影响了。随着时間的推移，这种影响愈来愈增长；而主要的是，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同中立国家代表团的协同行动使得西方国家后来在大会上开始失去“多数”。

按照古德里奇的看法，西方国家想把联合国全部活动的重心轉移到大

① Речь Н. С. Хрущева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ООН 18 сентября 1959 г. В кн.: «Жить в мире и дружбе». Пребывание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Н. С. Хрущева в США 15—27 сентября 1959 г. М., 1959, стр. 180.

会的意图，“由于表决时往往采取敌視西方立場的亚非国家日益增长的作用所形成的新的局势”而沒有达到預期的結果。“实际上，亚非国家随着它們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扩大，对大会的决議开始拥有潛在的否决权。結果，对西方提交大会的决議的贊同更加不能看作是某种可靠的事情了。”①

联合国崇高职能的順利执行，首先取决于它的結构是否同世界上現实存在的条件相适应。在联合国存在的年代里世界舞台上发生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尼·謝·赫魯曉夫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議上提出了要使联合国能符合世界的实际形势的建議②。赫魯曉夫說：“我們认为，应該改善联合国，使之成为以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为目的的国际机构。为此，首先要回到在成立联合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时所确定的思想和原則上来，即承认一切国家、特别是那些决定新的世界大战是否爆发的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則。”③

苏联在大会第十五届会議提出的改組联合国的建議案，发展和巩固着作为联合国基础的思想和原則。生活本身提示了改变的必要性。苏联的这一創議也是苏联在联合国执行保卫全世界和平的政策和为人类的光輝理想而斗爭的一个证明。

联合国成立的最初几年证明，其政策与地球上絕大多数人民

---

① *L. M. Goodrich.* The U. N. Security Council.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1958, № 33, p. 284.

② 必須首先以由三个秘书組成的集体执行机构来代替秘书长的一人掌权，这三个秘书代表現今世界上三个不同类别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資本主义国家、中立主义国家。而对現今世界上所有类别国家的利益，联合国将一律加以考虑和維护，这就是說，联合国将应份地执行自己的宗旨。

考虑到过去曾是大国的某些国家发生巨大变化这一情况，那些已剷除殖民主义并在大国的行列里占有应有地位的世界上的最偉大的国家，应拥有不比英法为小的占有安全理事会常任席位的权利。这权利首先屬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不能继續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剝夺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③ *Н. С. Хрущев.* За мир, за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за свободу народов, стр. 294.

切身利益相抵触的侵略势力，不仅阻撓联合国履行其任务，而且在許多情况下把联合国变为加剧各国之間关系的工具和損害联合国的威望。

美国資本在联合国的代表利用一系列国家經济上、政治上对美国資本的依賴性，凭借机械的多数票，很快就开始反对在国际組織內理智地耐心地寻求一致同意的决議。这样美帝国主义就获得了达成对它有利的决議，从而損害联合国利益和整个国际合作事业的可能性。同时，这自然也給其他一些国家带来巨大損失，这些国家的統治集团为討好美国而出卖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利益。

尼·謝·赫魯曉夫指出："不用說，如果国际組織內部有几个国家执行将某一些国家的意志强加于另一些国家的政策，这一組織就不可能起有利于和平的有实效的作用。这种政策将腐蝕联合国的基础。如果情况将朝着可以称作具有派别情緒的趋向继續发展下去，那末将不是导致各国之間关系的改善，而是导致关系的恶化。联合国有可能从表达其所有会員国的利益的机构变成某一些国家的机构，它执行这些国家的政策，而不是执行保证全世界和平的政策。"①

在說明联合国活动中的一定的积极因素时，应該注意到下列因素的巨大社会影响，即最尖銳最紧要的国际問題一貫是联合国这样广泛的集会場所的討論課題。

一貫捍卫和平及和平共处利益的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立場，不仅促进了联合国对一些重大問題的解决，而且促进动員世界广泛輿論来保卫和平。

---

① «Жить в мире и дружбе», стр. 179.

第二十二章

战后最初年代的裁軍問題

一、战爭的結束和裁軍問題

苏維埃国家认为裁軍是最重要的和平因素，因此战后它坚持不懈地爭取实現縮減和限制軍备。它致力于就此問題同反希特勒联盟的其他参加国达成原則协議。1943 年 10 月 30日在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議上通过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指出，苏联、美国、英国和中国政府“将彼此幷与联合国家中其他国家会商及合作，俾对战后时期的軍备的管制，获得一实际可行的普遍协議。”① 宣言着重說明，战爭結束后，应按反希特勒联盟大国一致的精神来解决裁軍問題。

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各自不同地来解釋“調整軍备”一詞。苏联认为有必要实行全面裁軍或至少縮減軍备、禁止和銷毀大規模毀灭性武器，而美国和英国的統治集团則主要打算促使苏联裁軍和削弱苏联，以便为它們自己造成重大的軍事优势。

在战后的最初年代里，清楚地显露出对待裁軍問題的两种不同态度。苏联提出和平共处和有效裁軍的办法。資本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則死抓住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伎俩不放，企图以原子彈进行恫吓，开始了新的軍备竞賽。美国統治集团打算用原子訛詐来为自己鋪平取得世界霸权的道路②。

---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 I, стр. 415.

② 参見本书第十四章。

在对日战爭終了时，美国在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原子彈，就是这种政策的开端。1945年8月6日美国轰炸机投擲的原子彈的爆炸，毁灭了日本广島市。日本的历史学家这样描繪爆炸的后果："整个城市像是一座廢墟。这是历史上前所未見的可怖景象。到处堆积着燒焦的和燒毁的尸体，其中有許多尸体呈現出遇难时的姿态。在只剩一个骨架的电車里挤滿了紧抓着皮带的尸体。而幸存者当中，許多人因布滿全身的燒伤而呻吟不止。到处可以看到令人想起地獄生活的情景。"① 8月9日美国对长崎投擲了第二顆原子彈。

这种原子轰炸是否有軍事上的必要呢？不。溫斯頓·丘吉尔承认說："认为日本的命运是由原子彈决定的看法是錯誤的。日本的失敗早在第一个原子彈落下以前就已决定了。"②

美国政府在試驗原子彈爆炸(1945年7月16日)以前很久就已决定对日本投擲原子彈。

以詹姆士·弗兰克为首的芝加哥实驗室的許多科学家，早在1945年6月就坚决反对原子轰炸并呼吁銷毁原子武器。弗兰克在报告中說，如使用原子彈，就将招致丧失信任并引起其他国家的恐惧和厌恶。"如果美国第一个对人类使用这一新的大規模毁灭性武器，美国就将失去全世界公众的支持，引起軍备竞賽。"③

美国統治集团悍然不顧这些警告和反对，仍旧决定对日本的和平居民进行野蛮的原子轰炸。杜魯門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誠然，我了解原子爆炸将意味着巨大的物质損失和空前的人命伤亡。"④

美国統治集团既然預先知道他們的行为要受到道义上的譴責，为什么还去謀杀数十万的日本人呢？毫无疑問，美国政府打算借助"原子王牌"来保证美国壟断資本在最大限度上影响世界性問

① «История войны на Тихом океане», т. IV, стр. 202.

②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VI, p. 559.

③ «A Report to Secretary of War. June 1945».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1. V. 1946. p. 16.

④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 p. 419.

題的解决。早在美国关于利用原子能的正式政府报告中就已特别强調指出，原子武器对“未来战爭和国际关系的影响是異常巨大的”①。

美国統治集团暗示，原子彈可能是旨在反对苏联的。在关于軍事利用原子能的政府报告中指出，美国已制造了“一种武器，是那样极其理想地利用它来进行一瞬間的突然襲击，以致任何国家的最大城市都能在一夜間被毀灭掉。”② 这种威胁证明：美国統治集团开始奉行“原子外交”。英国的布莱克特教授十分公正地写道：“投擲原子彈与其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的軍事行动，不如說是反对俄国的外交冷战的第一个大战役。”③

美国壟断資本家以原子彈威胁来进行訛詐，企图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締結的一系列国际协定，首先是 1945 年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議决定和联合国宪章，使之对自己有利。

随着原子武器的出現，战軍概念所包含的內容有了本质的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特别是 1945 年所使用的武器，大大不同于战前时期以至战爭最初年代的武器。

显然，在新的世界大战情况下，人类将不得不遭受大大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慘禍的災难。可能的未来战爭的后果对于許許多多国家的人民将是悲慘的。如果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中，甚至在后方已感到不安全，那末在未来的战爭中，前方和后方在危險和牺牲方面将变成一个統一体。

由于所有这一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軍的概念也就改变了。

---

① *Г. Д. Смит.*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 для военных целей.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о разработке атомной бомбы под наблюдение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ША.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46, стр. 237.

② 同上书第 234 頁。

③ *P. M. Blackett.* Fear, War and the Bomb. Millitary 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Atomic Energy. New York, 1949, p. 139.

全面裁軍的主要之点已經是禁止和銷毀大規模毀灭性手段，特别是原子武器。

随着战后年代里裁軍概念內容的改变，无疑的，使得裁軍問題的解决复杂化了，变得更加困难了。第一，在战后的最初几年，美国壟断了原子武器——最强大的新式武器。軍国主义和侵略成性的集团的一小撮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拥有着原子武器，这些集团所关心的是美国称霸世界，而不是裁軍。第二，常規軍备的改进和新的原子武器的出現，使得对裁軍实行监督在技术上更加复杂化。軍国主义分子开始蠱惑性地叫嚷，实行监督是复杂的和不可能的。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系列重要結果，增加了实行全面裁軍的可能性。

苏联的威力和威望增长了，社会主义力量加强了，已成为全世界和平支柱的社会主义陣营形成了。随着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和帝国主义失去其昔日的地位，对裁軍获得成功和国际安全得到巩固的希望也大大增长起来。新的独立国家的出現，欧洲大多数資产阶級国家反动势力的地位的削弱也促进了这一点。由于战爭的全部教訓和災难，以及在战爭引起的各种变化的条件下，各国人民对待战爭的态度和从前不同了。他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他們爭取和平和裁軍的斗爭空前加强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締結关于全面裁軍的国际协定的可能性。

裁軍、特别是禁止和銷毀原子武器已成为战后时期的全民要求。

二、苏联爭取禁止和銷毀原子武器的斗爭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苏联馬上在联合国內外为爭取全面裁軍进行了坚定不懈的斗爭。从大規模毀灭性武器出現时起，苏联就坚决要求加以禁止和銷毀。

早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苏联政府就預見到軍备竞賽可能导致大規模毀灭性武器的更加完善，导致使这种武器变为可能毀灭千百万人民、破坏物质財富、对世界文化带来无可挽救的損失的工具。为了全人类、所有国家与人民的利益，苏联立即提出了可以永远使世界免于原子災难的可靠的和可信賴的保证：实現裁軍，首先是禁止和銷毀原子武器。

苏联以自己的爱好和平政策证明，它确实是关心裁軍的。眞誠的爭取和平和裁軍的斗爭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論而来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还在十九世紀末就說过："裁軍，从而保证和平，是可能的。"① 弗·伊·列宁宣布"廢除武装是社会主义的理想"②，他第一个在历史上提出裁軍的口号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任务。

苏維埃国家从它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就一直进行着爭取裁軍的斗爭。这个斗爭經历了以不同形式发展着的許多阶段。但它始終不变地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基础之一。尼·謝·赫魯曉夫說："我們为爭取裁軍而斗爭，这不是个策略手段。我們眞誠地要求裁軍。在这里我們是完全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③

帝国主义的宣傳散播一种虛构的論調，硬說社会主义革命必定是战爭的結果，因此似乎为了确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战爭。这种誹謗和实际情况沒有任何共同之处。苏联共产党綱領指出，"共产党人从来沒有认为，現在也不认为，走向革命的道路一定要通过国与国之間的战爭。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和战爭相联系。虽然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都以社会主义革命而結束，但是沒有

---

①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т. XVI, ч. II, стр. 338.

② 《列宁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3 頁。

③ *Н. С. Хрущев.* За новые победы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тр. 37.

战爭，革命是完全可能的。工人阶級的偉大目标可以不經过世界战爭而实現。"①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的社会制度是和平的坚韧不拔的捍卫者，在这一制度下沒有也不可能有热衷于发动和进行战爭的任何力量。这种制度的主要任务是和平經济建設，建立和巩固新的正义的社会制度。帝国主义者所发动的各种战爭是这种建設道路上的基本障碍。反对这样一些战爭的斗爭是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主要內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社会主义力量愈来愈超过帝国主义力量、和平力量愈来愈超过战爭力量的条件下，当社会主义在世界所有国家还沒有取得完全胜利以前，会出現把世界战爭排除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的現实可能性。共产主义愈来愈接近于实現自己的历史使命——消灭战爭、在地球上确立永久和平。世界社会主义认为裁軍問題的解决是自己在这个道路上的主要任务。苏联共产党綱領指出，"保证持久和平的根本途徑是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实現全面彻底裁軍。帝国主义把前所未聞的軍备重担加在人民的肩上。社会主义认为自己对人类应負的責任，就是使人类免除这种对国民財富的无謂浪費。完成这一任务将对人类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人民通过积极而坚决的斗爭，能够并且应該迫使帝国主义者裁减軍备。"②

由此可見，爭取裁軍的斗爭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积极的斗爭，是爭取縮小帝国主义軍事力量的斗爭。壟断資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战爭的准备、軍备竞賽成了本国經济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追逐利潤、对暴利和剝削的貪得无饜的企求，是这种政策的基础。軍备和进行侵略战爭，永远是資产阶級国家不可分割的一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94 頁。

② 同上书第 211 頁。

个方面，是它的最主要的职能，而在国家壟断資本主义发展时期則有着空前的規模和意义。帝国主义国家甚至在和平时期也保持着龐大的武装力量。軍費开支吞食着国家預算的愈来愈大的部分。資产阶級国家正在变成軍国主义的、軍事政治的国家；軍国主义决定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部生活。帝国主义力图延长自己的寿命，正准备着反对人类的最駭人听聞的罪行，即准备着会毀灭許許多多国家的人民的世界原子战爭。

但是，历史条件对帝国主义国家并不有利。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远比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爭的能力增长得快。裁軍口号正成为具体的現实。据此，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首先是苏联政府在整个战后年代里坚持不懈地为爭取裁軍而斗爭。苏联在战后很快就展开了这一斗爭。

苏联坚决主張裁軍，在这段时期內首先提出了关于禁止和銷毀原子武器的要求。这一要求在美国帝国主义集团竭尽全力来加剧国际紧張局势的时候就显得特别迫切。

美国一面在口头上贊成“国际监督”，实际上在战后立即就企图建立同苏联相对抗的西方国家的統一的“原子战綫”。

1945年11月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政府首脑的华盛頓会議解决了美国的这一任务，这次会議实际上是旨在反对苏联的。苏联被排斥参加会議。

早在这次会議上，美国就强把关于原子能管制的特别作用、关于限制一些国家进行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权利等等論題加进华盛頓宣言中。归根結底这些建議的目的在于千方百計使其他国家难于有可能掌握原子武器秘密。美国政府力求达到西方国家在原子能問題上的“完全一致”，妄图今后从美国原子壟断的立場来解决一切国际問題。

苏联坚决反对这种政策，要求通过关于禁止大規模毀灭性手

段的决定。由于苏联外交的努力，1945年12月底苏美英三外长莫斯科会議在达成这一决定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步驟中的一步。会議决定建議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議設立原子能委員会。1946年1月24日，第一届会議一致通过了莫斯科会議所建議的决議文本。

根据这一决議，原子能委員会由安全理事会所有理事国的代表以及在加拿大未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时的加拿大代表組成。委員会必須按照安全理事会的指示和指令进行工作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委員会应对下述事項提出明确建議，即"从国家軍备中取消原子武器和其他一切大規模毀灭性的主要武器"①，以及拟定措施"在必要范圍內管制原子能以保证其仅用于和平目的"，和保证各国間科学情报的交換。

苏联政府渴望持久和平，建議原子能委員会提議永远禁止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大規模毀灭性武器。

苏联在1946年6月19日原子能委員会的会議上提出了"禁止制造和使用各种以大規模毀灭为目的的原子武器的国际公約草案"。草案規定的义务如下：无限期地禁止使用、制造和儲存原子武器，三个月內銷毀"一切現在的已制成或未制成的原子武器。"②違反这些义务的行为即視为最严重的反对人类的国际罪行。公約宣布任何国家，不論是联合国会員国或非会員国均可加入，本公約一俟安全理事会核准及条約参加国半数批准后应即生效。

原子能委員会初期的具体工作計划，在苏联"关于原子能监督委員会工作的組織"的提案中曾作了規定。

計划規定設立两个委員会：交換科学情报委員会和防止利用原子能危害人类委員会。后者的任务是寻求排除使用、制造和儲存原子武器的可能性的办法。这个委員会应当起草宣布原子武器非法的国际公約和制定监督原子能的方式方法以及非法利用原子

① 《裁軍問題文件选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5頁。

② 同上书第6頁。

能的惩处办法。

这就是苏联提出的宣布大規模毁灭性武器非法的实际計划，它規定一切国家和民族拥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如果通过并实現苏联的建議，就会防止原子軍备竞賽，促进全面裁軍，就会有可能靠大大縮減軍費开支来提高世界各国人民的福利。

苏联始終主張对禁止原子武器的执行情况建立最严格而有效的国际监督。苏联代表从 1946 年开始就不止一次地声明了这一点。苏联在 1947 年 6 月 11 日原子能委員会会議上提出关于监督实施禁止原子武器国际公約的建議，即可作为例证。苏联外交界經常强調监督办法和关于禁止与銷毁原子武器的决議具有相互依存性。在这一計划中，苏联的建設性建議規定建立国际监督委員会，进行严格监督，使原子能仅用于和平目的。在苏联的建議中明确規定了国际监督委員会的具体任务，詳細拟定了委員会的权利和义务，同时还考虑到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国家內政的必要性①。遇有違反禁止原子武器公約的嫌疑事件发生时，国际监督委員会应进行专門調查，并且有責任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防止和制止違反禁止原子武器和监督原子能公約的措施。

按照苏联的建議，国际监督委員会拥有广泛权利：許可进入并有权熟悉任何原子企业；有权对原子原料、材料和半成品加以衡量、丈量和分析；有权要求各国政府提供关于原子企业活动的各項資料、报告和說明书，并加以审核；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反对違反禁止原子武器和监督原子能公約的措施。

如果实現苏联的严格监督的計划，就会为消灭原子武器創造条件，就会促进締結大大縮減常規軍备的协定。

按照联合国宪章，原子能国际监督委員会应建立在安全理事

---

① 参見《裁軍問題文件选輯》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39—41 頁。

会体制內。苏联关于监督的建議补充和发展了苏联1946年6月19日提出的禁止原子武器公約草案。

甚至一些資本主义国家——加拿大、英国、巴西——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建議內某些条款的积极性。①巴西代表指出，“苏联的草案是个同一的、首尾一貫的整体，可以成为在构成草案基础的各項原則的范圍內解决重大监督問題的基石。大体上这一草案可以认为是最易于接受的，因为它不伴随着对国家主权的大量限制。”②但是在美国代表团的压力下，原子能委員会中的多数代表未經认眞討論就于1948年春否决了苏联的建議。

苏联政府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議上又展开了禁止原子武器的斗爭。苏联的决議草案指出：“大会建議禁止原子武器，因为这是供侵略目的，而不是供防御目的之用的武器。”③苏联政府坚决主張通过自己的草案，并拟定了切实实現草案的各項建設性步驟。无論是在政治委員会会議上，或是在大会全体会議上，苏联代表团都提出过决議草案，草案建議安全理事会和原子能委員会继續按1946年1月24日大会决議指出的方向进行工作。苏联坚决反对中止原子能委員会活动的西方国家的单方面的行动。

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議上，苏联政府建議：“起草禁止原子武器公約及建立有效之原子能国际监督公約，上述两个公約应同时签訂并同时付諸实施。”④苏联的建議是积极解决原子能問題的重大步驟，它駁倒了美国的臆造，說什么苏联反对建立监督。

---

① 参見《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Комиссия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Второй год.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дополнение. Второй доклад Совет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1 сентября 1947 года》. Нью-Йорк, 1947, стр. 127—128, 136—138, 144—145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Второй доклад…》)。

② 同上书第144頁。

③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8 год》, ч. II. М., 1951, стр.225.

④ 《裁軍問題文件选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58年版第52頁。

大会第三届会議結束后苏联继續在安全理事会和原子能委員会竭力爭取通过禁止原子武器的实际办法。

三、"巴魯克計划"——美国的世界原子独霸計划

和苏联禁止原子武器的建議相对立，美国統治集团制定了建立自己的世界原子独霸的計划。"巴魯克計划"就是一个达到这些深远目的的尝試。

作为美国原子"裁軍"計划的巴魯克計划，不是見于一个文件中，在1946—1947年間巴魯克本人的一系列发言中，美国政府的备忘录和联合国原子能委員会的大多数建議案中都曾表达过。

"巴魯克計划"的使命是：第一，不容許禁止原子武器；第二，不得阻撓美国軍事巨头改进这一大規模毀灭性武器并准备大批生产这种武器；第三，无論如何要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苏联制造自己本国的原子武器。

正如計划起草人本人所坦率承认的，"巴魯克計划"的通过决不是导致禁止，也不是导致銷毀原子武器，相反地，是帮助美国积聚原子彈。美国分期监督的建議，不仅是針对着削弱美国的潜在的"敌人"，而且是針对着削弱其最亲近的"盟国"，首先是英国。

按实质說，"巴魯克計划"是美国关于原子裁軍問題的最广泛的計划，虽然，实际上这一計划和解决裁軍問題并无任何关系。

廸·艾奇逊在致貝尔納斯的信中强調說："計划不要求美国由于計划的建議或是由于国际机构的开始活动而停止这方面的生产（指原子武器的生产。——作者）。"①

"巴魯克計划"建議监督，但不規定裁軍，而监督的目的是使其

① 《A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Washington》. London, 1946, p. VI.

它国家沒有可能来打破美国的原子壟断。这一計划的基础是建立新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形式上是在联合国范圍之內，实际上是既不从屬于大会也不从屬于安全理事会，同时也不用考虑各国政府的意志。按照巴魯克的意思，这一"国际"监督机构不仅拥有"世界政府"的极其广泛的权利、权力和特权，而且变成世界工业壟断組織，变成数以百計的工厂、制造厂、矿山的所有者，对世界的整个經济建立起自己的专制法律和規則。

美国統治集团为"国际"监督机构頑固地爭取广泛的权利和权力。他們指望利用自己在資本主义世界的巨大軍事和經济优势，以及指望利用不仅小国、而且像英国与法国这样的国家經济上对美国的严重依賴性。同时还考虑到美国的原子壟断和資本主义世界的"团結"，以及資本主义世界对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惧。美国領导人不是沒有理由地指望，在战后最初年代里特别有可能迫使整个資本主义世界完全接受自己的意志和按照自己的意見来利用所有資本主义国家的票数，这些国家当时在"国际"监督机构內是会形成有保证的多数的。美国統治集团采取一切措施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优势。

"巴魯克計划"的起草人詳細地制定了关于监督机构編制的各款。他們規定在"确实內行"的基础上和"尽量"在国际性的基础上征用"国际"监督組織的工作人員。1946—1947年間美国是唯一拥有原子生产經驗的国家。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美国集中了一批从西欧移入的优秀的科学工作者①。因此，十分明显的是，美国外交基于"合法的根据"可以用美国人或从屬于美国的人来配备"国际"监督机构編制內的几乎全部人員，这样，就使国际监督变成純粹的美国监督。

按照"巴魯克計划"，"国际"监督机构被賦予壟断世界上現有的所有原子原料、原子物資和原子企业，以及与此有关的各工业部門的生产的权利。这种世界性的原子壟断实质上将处于美国一小撮的亿万富翁——原子工

① 参見《Борьб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 разоружение. 1946—1960 годы》. Под ред. В. А. Зорина. М., 1961, стр. 104—105。

业巨头的完全控制之下。"国际"监督机构的权力不仅将包括原子物資的生产，而且将包括对这些物資的分配、儲存和运輸。

美国外交认为完全有必要禁止个别国家和个人有权在原子能方面进行任何工作，有权自行儲存原子物資、拥有选矿厂、原子原料、未制成品、核燃料等等。所有这些都准备移交給实际受美国原子巨头控制的"国际"监督机构完全壟断占有。

如果說"巴魯克計划"也承认某些国家有权拥有原子原始物資的矿藏，那末这只是在地下。一旦矿物（包括鈾、釷和原子能生产所必須的其它元素）自地下开采出来了，那它就不再归这一国家所有；可見，原子原料矿藏的国家"所有"是带着完全空头的、虛假的性质的。

按照巴魯克的意思，"国际"监督机构应該成为一切同原子能生产有关的东西的唯一的主人和完全的、壟断的占有者。这样的机构将具有这样的可能性，就是說使所有国家的經济隶屬于自己并粗暴地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

"巴魯克計划"不信任个别国家可以保护他們本国領土上的原子企业：将这一任务委托給"国际"监督机构的特别武装警卫队。这样，美帝国主义就将有权軍事占領地球上的任何国家，就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輕易地利用这个权利来干涉任何国家的內政。"国际"监督机构被授权規定个别国家开采原子原料和生产原子物資的种类和限額①。

关于原子原料的产地和儲存量的全部情报应該报告給"国际"监督机构，并且正如美国外交所建議的，通过对地球上所有国家領土进行詳細調查的办法来获得此項情报。"国际"监督机构在很多情况下能够"不經通知有关国家就对一切工程、矿場、装置或場所进行檢查，并不让这一国家有可能派出自己的代表。"②这些建議的企图是想把地球的一大部分变为处于"国际的"、实质是美国的管制之下的殖民地区。

美国关于报告和核查个别国家行动的建議，同眞正的监督与視察沒有

① 参見《Второй доклад…》，стр. 23。

② 参見同上书第41頁。

任何共同之处，它們追求的目的归根結底只是保证供应美国軍事和經济情报。

美国壟断資本家担心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在研究原子能方面获得較大成就，超过美国的科学，使美国失去原子壟断地位。因此，“巴魯克計划”的起草人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賦予“国际”监督机构最广泛的权力，实质上，即是賦予在原子能科学研究活动方面操纵一切的特权。在原子能委員会的第一次会議上，巴魯克宣称，“国际”监督机构“应該成为原子科学和原子能实际生产方面的世界領导者。”① “国际”监督机构应該有权根据自己的意見停止任何国家的关于原子能的科学工作，把任何原子装置、任何原子企业收归自己支配，如果认为它們具有危險性的話。科学家的活动也将受到最严格的控制和监督。

美国“监督”計划的基本方面之一，是关于臭名远揚的“秘密活动嫌疑”的論題。“国际”监督机构利用这一条款就能够对任何一国的全部領土和經济进行彻底視察。美国提案以小規模秘密生产原子武器不可能被发現为根据，建議把任何冶金工厂、化学工厂或其他工厂与作坊的存在視作构成“秘密活动嫌疑”② 的理由。原子能委員会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經美国的多数通过的第一报告說，“高度熟练的和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人員的任何行动……都可能成为指明秘密生产原子彈的地点的路标。”③

分期或分阶段监督的原則是“巴魯克計划”的“要点”。对原子原料的监督被定为第一阶段。美国計划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建立对原子彈生产的监督。由监督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期限沒有确定，而含混地規定在遙远的未来，并且由“国际”监督机构，換句話說，就是由美国的統治集团来加以决定。艾奇逊—李連塞尔报告說，“在整个过渡时期，一切原子企

---

①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Комиссия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 1. Первое заседание 14 июня 1946 г.», Нью-Йорк, 1946, стр. 4.

②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Комиссия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дополнение. Первый доклад Совет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Нью-Йорк, 1946, стр. 43.

③ 同上。

业均将照旧安置在美国。这样，在整个过渡时期的任何时候，不論計划遭到怎样的失敗，我們(即美国)将仍然保持原子武器方面的优势地位。"①

美国政府在"巴魯克計划"中列入了实际上使"国际"监督机构独立于安全理事会之外，并且排斥"国际"监督机构通过决定时的大国一致原则的規定。这就是說，苏联将沒有任何可能来阻止美国操纵这一将变成美国順从工具的监督机构。

苏联政府坚决不接受"巴魯克計划"，也沒有断然要求通过自己的建議，而是竭力采取妥协的办法，即利用部分美国建議作为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和眞正的国际监督原子能的未来条約的基础。苏联外交一面揭露"巴魯克計划"的帝国主义目的，一面提出一系列可以促进达成妥协性协定的建設性建議。

苏联对原子能委員会向安全理事会的第一报告提出的修正案，是这样打算的：第一、未来国际公約的基础应是禁止和銷毀原子武器，而不仅仅是原子能的国际监督；第二、建議立即对原子武器生产的所有各阶段进行监督和視察，而不是分阶段地进行；第三、苏联的修正案，其目的是反对把国际监督机构变成某种"世界"政府，建議在安全理事会体制內設立这一机构并保留审議原子問題② 时的"否决权"。

在美国外交的粗暴压力下，西方国家阴謀抵制在安全理事会討論苏联的修正案。在 1947 年 2 月 18 日的会議上，美国代表奧斯汀断然地說，"委員会在关于第一报告方面的工作已經結束。"③英国代表亚历山大·賈德幹随声附和，硬說原子能委員会的第一

① 《A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p. 41.

② 参見《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Комиссия по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Третий год.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дополнение. Третий доклад Совет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7 мая 1948 г.》, Нью-Йорк, 1948, стр. 14—16.

③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Второй год. № 15. 18 февраля 1947 г.》, Нью-Йорк, 1947, стр. 175.

报告“不可能加以改变”①。苏联外交作了巨大的努力，以便达到在原子能委員会討論自己的修正案。但是，美国統治集团利用机械多数，强迫通过了“巴魯克計划”，从而把原子能委員会拖进了死胡同。

同时，美国政府尽力設法把談判破裂的責任轉嫁到苏联身上，把苏联說成是裁軍的敌人。美国所掀起的这种宣傳的叫囂，美国政客的蠱惑性的說法只是用来掩盖暗中破坏禁止和銷毁原子武器的談判，掩盖无論如何要保持美国原子壟断地位的图謀。

四、美国原子壟断的破产

美国的原子壟断不可能是永久的。苏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原子研究方面迅速地取得了巨大成就。早在1947年11月6日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三十周年的庆祝会上，苏联就正式宣布原子彈的秘密已不再存在。在1948年秋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議上又重申了这一点。

美国統治集团根据自己专家的断定，认为苏联科学家不可能很快地設計出原子彈，因此相信美国的原子壟断地位是长期的。但是早在1949年9月，美国总統杜魯門以及英国和加拿大政府就被迫正式承认，苏联已掌握了生产原子武器的秘密并进行了原子爆炸。

1949年9月25日塔斯社发布声明，再次证实从1947年以来原子彈的秘密对于苏联即已不再存在。声明同时强調說，苏联政府“信守着而且打算今后仍然信守它原来的无条件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的立場。

至于监督原子武器，必須說：这一监督对于檢查禁止生产原子

①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Второй год. № 15. 18 Февраля 1947 г.», Нью-Йорк,1947, стр. 178.

武器决議的履行，将是必須的。"①

苏联制造原子武器一事使得美国的原子壟断破灭了，給声名狼藉的美国原子外交带来了沉重打击。地球上最爱好和平的国家苏联拥有了原子武器这件事意味着和平事业的偉大成就。

美国失去对原子武器的壟断具有巨大意义。华盛頓从此就失去了使用訛詐和压力的可能性。关于禁止原子武器的談判現在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才能开展起来。

美国原子壟断的破产使人有根据认为，美国将放棄"巴魯克計划"中使人不能接受的原則并尽力同苏联就原子能問題达成协議。华尔特·李普曼建議国务院在談判中估計到目前美国的原子壟断已經結束，地球上有着两个大国拥有原子武器。李普曼提出了美国对待原子問題的新态度这一問題②。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在稍后些时被迫承认："苏联制造出原子武器，应該看作是它的巨大成就。苏联由于迅速地結束了我們对于原子武器的壟断，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战略形势，使它更处于有利地位。美国原子襲击俄国的能力現在已大大地为苏联原子反击的可能性所平衡。"③

美国統治集团終究是固执不变的。美国政府并沒有放棄原子外交，沒有着手寻求相互能够接受的国际原子能协定。相反地，它呼吁进行原子軍备竞賽，声称苏联无論在原子武器的数量方面或是在威力方面永远不会赶上美国，原子領先地位还是在美国手中。

美国統治集团继續认为，原子能应該主要用于軍事方面，并希望把自己暫时的原子領先地位变为永久的。因此，他們要求制造新的"絕对武器"——"魔王"炸彈：在那些年代里人們这样称呼氫彈。关于原子軍备竞賽的呼吁，同頑固地拒絕改变"巴魯克計划"的基

① 1949年9月25日《眞理报》。

②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7. II 1950.

③ *J. F. Dulles.* War or Peace. New York, 1957. p. 151.

本原則，同拒絕承认其他国家在利用原子能方面的平等权利配合在一起。

五、苏联爭取裁减常規軍备的斗爭

苏联爭取全面裁軍、爭取禁止和銷毀原子武器的斗爭是同它旨在裁减常規軍备和縮减軍費开支的不倦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苏联政府在1946年年底建議联合国大会为了巩固和平和国际安全而确认普遍裁减軍备的必要性。其中首先应該禁止为軍事目的生产和利用原子能。苏联草案規定設立专門的視察机构——裁軍决議执行情形监督委員会和禁止原子能用于軍事目的委員会①。

苏联政府建議，联合国所有会員国在安全理事会开始审議普遍裁减軍备建議的时候，应向它提供有关設在本国領土上的武装力量和軍备的情报②，因为这将便于准备裁軍的实际措施。

苏联代表建議还要采取其他促进裁軍的措施，包括与一些国家的武装部队留駐在外国境內有关的措施。美国和英国的武装部队对欧洲和亚洲許多国家的占領一再拖延，这妨碍了这些国家的人民按照自己的意願解决內部生活問題。美国反动派在国外建立了数以百計的軍事基地，其目的是要用这些基地来包圍苏联領土，并唆使小国进行反苏冒險和挑衅行为。外国軍事基地被利用来援助內部反动势力，这些軍事基地在战后年代妨碍了进步和民主事业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軍队和軍事基地就成了对国际关系正常发展的严重威胁，促进了軍备竞賽的加剧，阻碍了裁軍的談判。

---

① 据提案原文，禁止原子能用于軍事目的委員会全称为"禁止原子能用于軍事目的决議执行情形监督委員会"。——譯者

②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6 год》, стр. 429—430。

早在1946年8月，苏联駐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建議責成联合国各会員国提供如下情报：在除前敌国領土以外的其他国家境內，什么地方駐有联合国其他会員国的武装部队，什么地点設置有屬于联合国其他会員国的空軍基地和海軍基地，駐軍的数量有多少。

后来，苏联代表团在1946年11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些建議补充了特别条款，規定应該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关于在前敌国境內駐扎有联合国各会員国武装部队的情报①。

关于普遍裁減軍备的建議是苏联爱好和平的令人信服的证据，因为如果苏联想要奉行别的政策，那末它就不会建議裁減軍备和武装部队。况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軍队，其中大部分駐在欧洲的最中心。在1945到1948年期間內，苏联軍队分几批实行了复員。同时，苏联的工业已轉为和平生产。軍費开支在苏联国家預算中所占比重大大縮小。这种情况就促使物价下降，促使苏联人民的物质福利获得提高。

由于苏維埃国家坚持努力的結果，联合国大会于1946年12月14日通过了关于普遍調整和裁減軍备的原則的决議。决議号召同裁軍問題有关的联合国的所有机构坚决地加速进行禁止原子武器的实际措施，加速从国家軍备中取消原子武器和裁減軍备。决議包含建議一切国家从前敌国領土以及从其他国家即联合国会員国領土上加速撤出自己的軍队。决議对监督和視察关于禁止原子武器和裁減軍备的共同商定的决議的执行情况給予了深切的关注。

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这一决議是苏联对外政策的巨大成就。但是苏联政府并不滿足于在形式上通过一个决議，而要求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禁止原子武器和裁減軍备。因此早在1946年12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6 год》, стр. 464。

月28日苏联代表就呼吁安全理事会就如何履行大会1946年12月14日决議的問題制定实际措施，并将这一問題列入安全理事会12月31日例会的議事日程中。苏联政府提議設立一个由安全理事会理事国代表組成的委員会。委員会負責在一个月到两个月或者至多三个月的期間內起草并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自己的建議①。

美国方面反对苏联的建議。它頑固地要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将大会"关于普遍調整和裁減軍备的原則"的决議擱置不予討論。苏联和人民波兰的代表坚决表示反对②。美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未能获得支持以后，就轉換目标，提出了自己的决議草案，根据該草案实质上只有原子能委員会才有討論原子能問題的壟断权利。美国的草案剝夺了新的常規軍备委員会审議同原子武器有关問題的任何权利。

在1947年2月13日安全理事会設立的常規軍备委員会的会議上，苏联外交坚决爭取通过委員会的、旨在切实解决普遍裁減軍备問題的工作方案。苏联方案規定要确立裁減軍备和确定每个国家軍备水平的一般原則，"同时并考虑到要禁止原子武器"③。

苏联代表坚决主張审議裁減軍事生产和确定每一个国家的軍事生产的限度問題，这里还注意到"只允許为和平目的来生产和利用原子能"④。苏联方案規定了具体措施，不允許为了軍事需要来利用和平的工业部門和运輸部門。

最后，苏联代表团建議审議关于分布武裝部队和削減軍事基地网的問題。

---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6 год》,стр.629。

② 参見《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Второй год, № 6. 20 января 1947 года». Нью-Йорк, стр. 68。

③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Второй год, № 55», Нью-Йорк, 1947, стр.6.

④ 同上。

这样一来，苏联的建議就构成了实际准备关于普遍裁减軍备和禁止原子武器的协定的具体計划，即准备眞正的和平安排、巩固和平和保证国际安全的計划。

同苏联的方案相反，美国外交界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建議只是抽象地审議“关于整頓軍备和武装部队的一般原則”①。极其含糊不清地提出了关于整頓和裁减軍备建議的措詞問題，其中“整頓”一詞被提到首要地位。在美国外交的压力下通过的这个方案导致常規軍备委員会不去准备实际措施，实质上，这就是建議委員会走上空泛爭辯的道路。美国方案的目的明显地是在于反对裁軍协定。

苏联外交揭露了西方国家利用国际联盟的“先安全、后裁軍”原則的陈腐方法所进行的暗中破坏裁軍事业的行为。西方国家政府在履行联合国宪章的幌子下，开始强使其他各国接受建立“国际軍队”計划。这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以“反对破坏和平行动”的必要性为掩护，建議建立完全受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武装部队，这种部队的目的事实上是反对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反对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关于建立武装部队“来維持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問題，无論是在軍事參謀团②的会議上或是在安全理事会討論时，均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場。在有关向安全理事会提供的武装部队的編制方法这一問題上，苏联代表团和西方国家的代表之間出現了严重的意見分歧。苏联建議如下：“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依照軍队的总兵力和組成的平等原則提供軍队(陆、海、空軍)”③。

西方国家的外交家反对苏联的建議，硬說如果通过这个建議就将削弱

①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Второй год. Дополнение № 14.», Нью-Йорк, 1947, стр.4.

②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七条，軍事參謀团应由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的參謀总长或其代表組成并在安全理事会的管轄之下。

③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7 год», ч. II, стр.337.

划給安全理事会的武装部队的力量。苏联代表安·安·葛罗米柯在1947年6月6日安全理事会的会議上回答說：在提供軍队的数量問題上需要注意到"普遍裁減軍备的决議和需要在确定提供軍队的人数时作出相应的实际結論"①。

苏联关于提供軍队的建議是从普遍裁減軍备的必要性出发的，而西方国家的建議所追求的却是軍备竞賽和保证美国的軍事霸权。

常規軍备委員会活动的实际停止和原子能委員会工作的毫无进展证明，美国政府頑固地破坏达成平等的公正的裁軍协定。

在国际形势尖銳化的情况下，苏联为了寻求同西方达成相互能接受的协定和改善国际形势的新的建設性办法，1948年9月25日建議联合国大会第三届会議向安全理事会各常任理事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和中国建議，作为第一步，在一年內裁減其現有陆、海、空軍的三分之一。同时应該禁止原子武器，在安全理事会范圍內設立国际监督机构。

資本主义国家的代表一面对裁軍实行暗中破坏，一面极力反对苏联的建議。

裁減軍备的敌人利用联合国內追随美国对外政策的形式上的多数，强使大会于1948年11月19日通过了称为"禁止原子武器及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軍备与武器部队各裁減三分之一"②的决議。但是决議文本和它的名称毫无共同之处：决議中无論是关于禁止原子武器，还是关于五大国的軍备各裁減三分之一都沒有一字提到。这是資产阶級外交的慣用手法，往往企图在响亮的、令人抱有希望的名称下掩盖着空洞的貧乏的內容，沒有任何具体建議和实际措施。为了揭露这一欺騙行为，苏联和各社会主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7 год», ч.II, стр.339.

② «Объединенные Нации.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третье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Резолюции 21 сентября—12 декабря 1948 года», Париж, стр. 13.

义国家的代表对該决議投了反对票。

苏联不能漠不关心地对待西方国家所进行的明目張胆的破坏裁軍事业的行为。1949年2月8日苏联代表建議安全理事会通过关于規定在禁止原子武器和普遍裁减軍备的道路上的实际步驟的决議。苏联方案建議責成常規軍备委員会到1949年6月1日拟訂出关于五大国在一年內（在1950年3月1日以前）裁减軍备三分之一的計划。原子能委員会也应当在1949年6月1日以前拟訂出关于禁止原子武器的公約草案和关于管制原子能的公約草案。苏联方案的最末一項条款认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1949年3月31日以前提供有关它們的武裝部队和包括原子武器在內的各种类型的軍备的全面材料是必要的。"① 苏联代表团提出了具体措施和实現这些措施的最短的准确期限。

西方国家的代表否决了苏联的整个决議草案，特别激烈地反对关于提供武裝部队和常規軍备以及关于原子武器的情报的建議。按平等原則提供关于各种类型軍备的全部眞实情报的建議显然不会使美国統治集团滿意，因此美国代表奧斯汀竭力拒絕苏联的决議草案。在奧斯汀的压力下，安全理事会未經討論就将1948年11月19日大会第三届会議的决議轉交常規軍备委員会去討論。

在常規軍备委員会（最后一次会議于1949年8月初召开）和安全理事会，西方国家代表于1949年10月竭力强使通过关于仅仅提供常規軍备情报的决議。这样的情报——片面的軍事情报——主要对美国軍事集团有利，因为这些情报不涉及原子武器。美国軍国主义就想用这样的办法取得重要的軍事优势。苏維埃国家对于想利用裁軍問題来取得軍事优势的企图进行了駁斥，并继續坚决主張采取禁止原子武器和普遍裁减軍备的实际措施。

---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стр. 281.

由于侵略性北大西洋軍事集团的組成，1949 年秋天国际局势紧張化了，苏联呼吁大会第四届会議再一次譴責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所展开的新战爭的准备工作；确认使用原子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毀灭性手段"是和各国人民的良知和荣誉相抵触的，是同联合国会員国的称号不相容的"①；确认继續拖延采取实际措施来无条件地禁止原子武器和建立相应的严格的国际监督是完全不能容許的。苏联政府建議五大国——美国、英国、中国、法国和苏联联合自己的力量来防止新战爭，締結巩固和平公約。

但是忙于拼凑軍事侵略集团的西方国家反对苏联的建議，它們使国际气氛紧張化，制造战爭危險的局势。它們阴謀破坏能够导致全面裁軍、禁止和銷毀大規模毀灭性武器的一切努力。

苏联的对外政策則与此截然不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单方面地大大裁減了自己的武装部队、軍备和縮減了軍費开支。在 1945—1947 年間苏联从許多外国領土上(朝鮮、伊朗、丹麦、挪威、保加利亚)撤出了軍队。1945年 5 月苏联軍队为一千一百三十六万五千人，到 1948 年已只有二百八十七万四千人，即減少了八百四十九万一千人或減少了75%。尼·謝·赫魯曉夫在 1960 年 1 月 14 日最高苏維埃会議上的报告中說："苏联大大裁減了自己的武装部队，希望西方国家也能以維持和平和友誼的思想为指針，巩固反希特勒联盟国家之間所形成的关系。"②

苏联过去和現在都为裁軍而进行坚决的斗爭，如果沒有裁軍，也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

---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стр.449.

② *Н. С. Хрущев.*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60 год, т. I. М., 1961, стр.33.

第六篇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展开"冷战"并凑帝国主义軍事集团

在本书前几篇里已經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美帝国主义的經济、政治和軍事战略是按着两条路綫展开的。一方面，美国力图破坏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力图巩固整个資本主义、特别是欧洲資本主义被削弱了的陣地。另一方面，它推行使其它資本主义国家屈从自己、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的路綫。

"实力地位"政策成了实现这些目的的主要手段，它表现在各种事件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馬歇尔計划"和組織侵略性軍事集团，其核心就是北大西洋联盟。帝国主义各国战后外交政策发展的新阶段开始了。

先是"馬歇尔計划"，其后是各个侵略性集团，本来就是要充当反对世界社会主义、首先是反对苏联的最重要的斗爭武器，充当鎮压資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級的革命运动和殖民地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手段的。这一政策导致国际紧張局势的急剧恶化，导致"冷战"的爆发。

在推行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方面，"馬歇尔計划"占有重要的地位。"馬歇尔計划"是为了加强資本主义在西欧急剧削弱的陣地而提出的。它也是为了加深欧洲各国对美国的依賴，使它

們不能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它的使命是为美国壟断組織保证重要的欧洲銷售市場，使它們能够巩固和扩大自己在西欧各国經济中的地位。根据"馬歇尔計划"提出的經济"援助"的口号，是为美国的經济、政治和軍事扩張打掩护。

在推行"馬歇尔計划"方面，美帝国主义凭借着許多客观的經济因素。战爭結束以后，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的經济地位大大增强了。同时，当美国大壟断組織在战爭年代中发財致富时，美帝国主义的各西欧对手不是完全丧失了竞爭力，就是严重削弱了。面对着革命和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漲，西欧各国的統治集团战战兢兢，把美国的援助看作是保存自己統治的最重要手段。为了这一点，他們願意放棄构成自己独立的最重要的因素，願意屈从美国。

"馬歇尔計划"对西欧各国的經济的和政治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帮助恢复和加强了大壟断組織的地位，帮助鎮压民主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馬歇尔計划"和在它基础上建立的"欧洲經济合作組織"，是为組織侵略性的大西洋集团进行的經济上和政治上的准备。

北大西洋联盟从它一成立的那个时候起，就成为这个联盟各参加国对外、对內政策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在和平时期，資本主义国家的联合具有統一的武装力量和共同的指揮机构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面前感到的恐惧促使西方各国的統治集团竭力克服使它們分裂的矛盾，并建立起从未有过的軍事組織来同解放运动进行斗爭。

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从帝国主义压力的間接的經济形式("馬歇尔計划")轉向直接的軍事—政治形式(北大西洋集团)，可以由一系列的原因加以說明。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者想使苏联在經济上衰竭和削弱的打算落空了，它們想阻撓人民民主制度在东欧各国获得巩固、阻撓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企图破产

了。許多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在这个时期已經开始領会到对付不了民族解放运动。最后，世界軍事力量的对比变得越来越不利于西方国家，美国統治集团是把美帝国主义对核武器的不稳固的壟断当作这一力量对比的基础的。对"絕对武器"所抱的幻想既然动摇了，就出現了必須在美国的領导下，把各資本主义国家的軍事潜力联合起来的問題。美国統治集团順利地建立了这样的帝国主义軍事集团，在这个集团里首先联合了所有重要的資本主义大国。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帝国主义也不能够組成一个可以同整个資本主义世界体系相称的軍事—政治集团。亚洲、非洲絕大多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获得独立的年輕主权国家都拒絕参加这种集团。尽管有美国的压力，一系列的欧洲資本主义国家也不参加。

大西洋联盟引起了空前的軍备竞賽，而軍备竞賽則把沉重的負担加到人民大众的肩上。西欧变成了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战爭的主要战略基地。北大西洋集团开始在加剧国际紧張局势、加强"冷战"以及准备发动采用大規模毀灭性武器的新世界大战方面极力发揮作用。

美国想在它的領导之下联合資本主义力量来进行反对社会主义体系的战爭准备，这个企图同建立美国金融寡头的世界霸权的計划有着联系。但是，欧洲壟断組織力量的恢复，使得美国的壟断組織同西欧的壟断組織之間的竞爭斗爭重新爆发。

这样，在美帝国主义領导之下，針对世界社会主义、針对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西方国家軍事集团的建立，不曾而且也不能消灭資本主义各国之間各种矛盾趋向尖銳化的客观基础，尽管这些矛盾現在是以在北大西洋集团內的新的、特殊的形式展开的。因此，就連要把資本主义一切力量联合在一个統一的軍事—政治陣营中的尝試本身都再一次证明，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能消

除的。

要是对"馬歇尔計划"的实施和北大西洋集团的成立的結果回过头来加以評价，那就应当强調指出，"实力地位"政策的这两个工具都沒能够保证美国統治集团达到它的首要目的——改变两个体系之間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資本主义，以及使美帝国主义获得世界霸权。

本卷所考察的，是战后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已經表現出，美国壟断資本尽管实現了自己外交政策中个别的、部分的目的，但对时代的主要趋势——社会主义世界体系成为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的趋势，却絲毫也不能够起什么眞正的影响。

这一矛盾預先决定了，"实力地位"政策以及为推行这一政策而成立的各帝国主义集团体系在后来的年代里发生的深刻危机。

第二十三章

"馬歇尔計划"。美国統治集团联合帝国主义反动力量的打算

一、"馬歇尔計划"的主要目的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說明战后初期年代历史情况的性质时强調指出："……以美国反动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战爭結束之后立刻就开始实行'实力地位'政策，这种政策反映出这些国家中最富有侵略性的分子力图鎮压工人运动、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力图破坏社会主义陣营和建立他們的世界霸权。这种政策实际上就是：无限制地扩張軍备；沿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境建立美国軍事基地；拼湊針对社会主义陣营国家的侵略

集团；展开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謂‘冷战’；准备新的流血战争。”①

“馬歇尔計划”是这个侵略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美帝国主义矛头針对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战后政策中，这个“計划”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馬歇尔計划”成为“实力地位”政策武器之一，靠了它的帮助，为組織侵略性的北大西洋軍事集团鋪平了道路。

通过“馬歇尔計划”表現出来的政策，早在該計划正式問世之前就已經詳細制訂好了和部分地付諸实行了。还在战爭的末期、特别是在战爭剛一結束之后，美国的領导人物就已經說明了未来的“馬歇尔計划”的根本原則。

陆軍部长亨·史汀生在1945年7月22日呈杜魯門总統的备忘录里建議，美国利用欧洲各国的战后困难，并且在“复兴欧洲”的旗帜下面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霸权。史汀生写道：“我坚决地主張，要为欧洲的經济复兴制訂全盘协調的計划……应当把一切資源都集中于一个机构，这样才能为了达到既定的目标充分利用我們的全部力量。”②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馬歇尔于劍桥对哈佛大学同学会发表的演讲中，闡明了几条根本原則，这些根本原則由美国壟断資本的代言人詳細規定和表达出来，后来成为“馬歇尔計划”的基础。

馬歇尔指出，欧洲是一片廢墟。战爭造成了巨大的生命牺牲，城市、工厂、矿山、铁路被破坏了。在欧洲各国，生产不出足够数量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員会总結报告的决議》，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編》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59頁。

② *H. Stimson* and *M.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 p. 595.

的商品，粮食、原料和燃料都感到严重缺乏，装备十分破旧。馬歇尔描述了一幅彻底破坏的景象，把美国的“援助”說成是主要的并且似乎是唯一的条件，仿佛少了它欧洲各国就不能够恢复自己那遭到战爭影响和德国法西斯横行霸道破坏的經济。馬歇尔宣称，“在未来三、四年內，欧洲对外来的——首先是美国的——粮食和其它必需品的需求超出它現有的支付能力，以至于它或者必需获得重要的另外的援助，或者就得面临具有威胁性的經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考驗。”①

当然，在美国国务卿的声明中，并沒有透露所以出現“馬歇尔計划”的眞正原因。“馬歇尔計划”之提出，首先是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和在世界舞台上出現的阶級斗爭的新条件的需要。

民主和社会主义陣地的发展和全面巩固，帝国主义的解体以及資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日益动摇，战后，在欧洲特别明显地表現出来。

如果从前欧洲曾經是資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和堡垒，那末在战后，帝国主义压迫的鎖鏈在欧洲大陆中部和东南部全面被突破了，这就使得帝国主义丧失了过去对很大一部分欧洲領土的統治。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系列国家的胜利，欧洲的政治地图从根本上改观了。帝国主义剝削的范圍大大地縮小了。欧洲約有一半的人口摆脫了資本主义制度。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已經表現出，他們无力阻撓社会主义关系在欧洲大陆成批国家里发展与胜利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过程。

在还保存着資本主义制度的那一部分欧洲，战爭也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欧洲資产阶級不能够在短期內独立自主地医好战爭創

---

①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une 15, 1947, p. 1159—1160.

伤和清除德国法西斯横行霸道所造成的后果，这明显地表現了它的破产。它們毫无例外地推行对經济复兴进行怠工破坏的政策，拒絕同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广泛的經济合作。与此同时，削弱了的西欧資产阶級不得不考虑各国人民要求革新社会—政治生活、要求实行深刻的社会—經济改造的願望。这显著地表現在在西欧一系列国家里通过了新宪法，对企业、銀行、整个的經济部門实行国有化上面。

在这些年代里，西欧大国的工人阶級在共产党的領导下，在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进行了坚决的斗爭，爭取消灭壟断資本統治的經济、政治基础，爭取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爭取建立依靠人民，能够进行根本的民主改革、保证經济复兴、改善劳动者处境的眞正民主的政府。①

1948 年 2 月 14 日，馬歇尔在德莫因发表的演說，反映了美国壟断組織面临社会主义力量在欧洲增长所感到的恐惧，馬歇尔在演說里承认，“西欧連同它的工业潜力和高度发达的技术，落到同东欧各国同一的‘势力’范圍里面去”（这就是說，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可能的，那时，整个“欧洲大陆就轉而处于公开敌視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政体的制度的控制之下”。② 亿万富豪阿·哈里曼在估計对美国說来如此悲观的前途的后果时强調指出：“在經济領域里，我們将不能实現美好的希望……在政治上，我們将陷于孤立。在战略上，我們的处境将同等地严重。”③

美国先于“馬歇尔計划”在西欧采取的首批重大行动的使命，就是要防止当时对美帝国主义实际存在的这种危險。根据被称为“勃魯姆—貝尔納斯协定”的 1946 年 5 月 28 日的法—美协定，美国向法国提供了三亿美元

① 参見本书第三章。

② 引自 *А. Клод.*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М., 1950, стр. 51。

③ «Saturday Evening Post», 17. V. 1947.

的貸款，这一协定表明，美帝国主义者公开干預法国的政治生活，支持它国内的反动派。在这个协定签訂之后三天，《紐約时报》写道："美国如果不用自己的实力和資源去鼓励法国国內溫和的自由主义分子和树立对于我們的前途和法国的前途同样休戚相关的秩序，那末它就是执行不合理的和眼光极度短淺的政策了。"①

1947年12月，美国国会根据所謂"1947年对外援助法案"撥款五亿二千二百万美元給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如报刊所指出的，这一"紧急援助"，在某种程度上說来是"馬歇尔計划的預演"。1947年5月，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法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差不多同时排斥了共产党的代表，在两国組成了沒有共产党部长的內閣。②

美国对法国和意大利的新政府的"紧急援助"附有两个主要的条件，它們由美国众議院同时通过的相应的修正案表达出来。修正案之一說，根据提供临时援助之前締結的双边协定，法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承担責任不把本援助中任何部分分給共产党人，并且不准許假手共产党的組織来对本援助进行分配。另一修正案說，如果法国和意大利由受共产党人影响的政府掌握政权，美国总統就終止对它們的援助。③

在世界舞台上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社会体系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过去資本家在对革命的工人阶級进行斗爭中慣于采用的双边的"互助"和"国际支持"的局部性措施，像战后美国給予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英国的那样类型的借款和信貸，一再证明是不够有效了。它們已不能阻止反对帝国主义力量的增长，阻止革命过程在欧洲以及在全世界的进一步推进。正是由于这个原故，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不得不采取新的、非常的措施。

"馬歇尔計划"体現了美帝国主义的二位一体战略：首先，拯救

---

① 《The New York Times》, 31. V. 1946.

② 参見本书第十五、十七章。

③ 参見 *Ж. Сориа.* Станет ли Франц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олонией. Перев. с франц. М., 1948, стр. 101—102。

和稳定欧洲資本主义，力求联合世界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全部力量，其次，利用欧洲財政寡头地位的遭到削弱，使美国壟断資本渗入欧洲，并在最后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这一战略的两个方面的每一个，都有其政治、經济以及軍事的任务，这些任务是根据美帝国主义集团战后对外政策的目标而产生的。

美国壟断組織在战后时期的經济扩張，是同美国的軍事战略措施以及政治措施密切交織在一起的，在西欧是这样，在世界其余地区也是这样。美国总統的关于对外"援助"問題的顧問委員会的一个特别报告里直率地强調，不可以单从經济因素的观点来审查美利坚合众国在欧洲的利益：它們同样具有战略和政治的性质。①

在政治方面，"馬歇尔計划"发展了由"杜魯門主义"表現出来的"冷战"观点。它实质上是"杜魯門主义"的直接延續，适应战后欧洲条件的新翻版。威廉·福斯特写过："事实上，'馬歇尔計划'不是一个欧洲复兴的綱領。它的实质在于，那些既操纵着共和党、也操纵着民主党的美利坚合众国大公司，企图确立自己对欧洲的控制，而这正是它們称霸世界的广泛計划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战爭計划。"②

"馬歇尔計划"是美帝国主义者和西欧帝国主义者背着欧洲各国人民策划的、反对他們根本的切身利益的反动陰謀。这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工人阶級的勾結，但这是不平等的勾結。美帝国主义利用"强者的权利"，强迫西欧資产阶級接受它提出的，使壟断組織复活、經济复兴和欧洲資本主义"得救"的条件。

1960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声明指出："美帝国主义利用軍事集团的和經济'援助'的政策作为

---

① «European Recovery and American Aid». A Report by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Foreign Aid. Washington, November 1947, p. 11.

② *W. Z. Foster*. Labor and the Marshall Plan. New York, 1948, p. 2.

主要手段，力图使許多国家屈服于它的統治。它也破坏着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的主权。高度发达的資本主义国家中占統治地位的壟断資产阶級，同美帝国主义結成联盟，牺牲本国的主权，指望依靠美帝国主义者的支持，鎮压革命的解放力量，剝夺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阻撓人民群众爭取社会进步的斗爭。"①

在近几十年中，欧洲資产阶級曾不止一次邀請外国軍队鎮压自己国家里的人民运动。弗·伊·列宁在1918年曾指出："……当問題涉及阶級利益的时候，資产阶級就同任何外国人勾搭，背叛人民，出卖祖国。"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西欧一系列国家的壟断資产阶級由于害怕面对人民，在反对工人阶級的斗爭中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援助和外国的軍队身上，指望以此来保存自己的阶級特权、統治地位和高額利潤。西欧国家的統治集团正是因此才同意加入"馬歇尔計划"，尽管这个計划用財政經济以及其它方面的对美国依賴的罗网来束縛它們，侵犯它們国家的主权，使美帝国主义者能够干涉它們的內政。

美帝国主义企图强迫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欧洲各人民民主国家复辟資本主义制度，这是"馬歇尔計划"的目的之一。美国統治集团想强迫各人民民主国家接受这样的获得信貸的条件，这些条件会导致这些人民民主国家放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使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保存其农业性质，使它們丧失其政治的和經济的独立性，而最后則取消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企图在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恢复旧秩序的阴謀毫无結果。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坚决拒絕参加"馬歇尔計划"表明了，凡是工人阶級同农民結成联盟掌握

①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議声明》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頁。

② 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員会、莫斯科苏維埃、工厂委員会和工会联席会議上的演說》，見《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頁。

政权的地方，民族主权是絕不出卖也絕不能被收买的。

准备組織旨在反对世界社会主义和解放运动的侵略性的軍事一政治集团，在西欧土地上建立美帝国主义的基地和据点，在西德复活軍国主义，这些是“馬歇尔計划”的直接的軍事战略目标。西欧各国参加了“馬歇尔計划”，結果很快就被拉进侵略性的集团和联盟，把本国的領土提供来作美国武装力量的軍事基地，这直接損害了自己的民族利益和安全。

这些就是“馬歇尔計划”的深远的軍事一政治目标。在美国、特别是在其它国家，曾經以明显的否定态度对待“杜魯門主义”，而賦予“馬歇尔計划”以一个“純經济性的方案”的外表，正是为了应付这种态度的。

但是，就連“馬歇尔計划”的經济目的的本身也是仔細地加以伪装的。說到“馬歇尔計划”的經济方面，这个計划的眞正涵义在于，向西欧国家提供美元貸款以換取这些国家部分地放棄經济自主，換取美国資本积极滲入到西欧經济中去的权利。

美帝国主义集团終止了对某些国家的“援助”，并且决定了不再“分散”自己的借款和貸款之后，就抱定目标，建立一个西欧国家的国家壟断組織联盟，这个联盟将对美国商标的貨物敞开关税的大門。作为在“馬歇尔計划”基础上获得美国貸款的必要条件，西欧国家把資源和力量联合起来，这就使美国壟断組織易于实現滲入西欧經济的任务。美帝国主义就打算这样同时解决它所面临的两个任务：第一，給削弱了的欧洲資本主义机体灌輸經济力量，以此防止它垮台，其次，攫取西欧各国的經济命脉。

二、“馬歇尔計划”和美国在西欧的經济政策

在經济方面，“馬歇尔計划”的作用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根

据"馬歇尔計划"輸送到西欧去的貨物与資本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克服战爭遺留下来的經济后果。另一方面，毫无疑問的，美国"援助"的性质和条件对西欧各国的經济发生了消极的影响，破坏和阻碍了它的复兴，破坏了經济結构和国民經济的比例，促进了这些国家主要是軍事工业潜力的发展。"馬歇尔計划"使欧洲資本主义国家走上适应美国的經济、政治和軍事战略目标的道路，这給西欧各国人民造成了最不利的后果。

美国的"拯救"欧洲資本主义的政策，是隶屬于美国統治集团的总方針的，即把一切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力量糾集在美帝国主义的庇护下，确立它的世界霸权。問題不在于单純地复兴西欧的經济，而在于要在美国的条件下来使它恢复。美帝国主义者看得明白，他們扶植欧洲資本主义，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其竞爭对手的复兴，帮助他們在其后夺回世界市場上的新陣地。因此，美国壟断資产阶級力图把欧洲資本主义国家經济的恢复限制在这样的范圍內，即它既使欧洲資本主义能够站得稳，但又不致給美国壟断組織的世界經济地位造成威胁。

关于"馬歇尔計划"的法律草案于 1948 年 4 月 3 日以三百九十八票对七十五票的多数为美国国会通过，第二天，經美国总統签署后，法案生效。賦予"馬歇尔計划"的正式名称是《1948 年援外法案》。

根据这个法案，建立了一套編制龐大而分支繁多的机构，以实行"欧洲复兴方案"。在这些机构里的关鍵性的、决定性的位置，都授給了美国壟断組織的知名代表人物。

"馬歇尔計划"貨币—金融机构的根本原則可归結如下：美国的国家机关依靠联邦預算每年对所謂"欧洲复兴方案"的撥款，用高价主要从美国壟断組織购买它們所生产的产品，然后把产品轉給欧洲国家——"馬歇尔計划"参加国的国家机关。既然撥款給这一"計划"的預算开支是依靠賦税抵

补的，“馬歇尔計划”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加重对美国劳动人民的捐稅掠夺，使美国的資本主义壟断組織进一步发財致富，因为它們获得了銷售自己“剩余”产品的有保证的市場。

美国政府轉交給欧洲国家——“馬歇尔計划”参加国的貨物，按照昂貴的市場价格在这些国家銷售，出售貨物所得到的錢，积存在各中央发行銀行的特别賬戶上，而且，只有得到美国当局的同意，才能动用这种“对等基金賬戶”的款項。

由于在美国，銷售問題变得尖銳起来，欧洲市場开始对他們起重大作用。美国壟断組織的打算是，扩大了它們自己在西欧国家的陣地之后，它們也能够更容易地向这些国家的殖民領地滲入和在那里巩固下来。

資产阶級的經济学者在好多书籍和論文中直率地談到“馬歇尔計划”在經济上的必要性。例如，西摩·哈里斯指出，“經济复兴方案是拯救美国免于萧条（指1948—1949年的經济危机。——作者）的一种尝試”。①英国政論家У·斯提德說，“馬歇尔計划并不是一种单方面的慈善事业。看起来，美国本身对这个計划的热中并不下于欧洲”。②

美帝国主义指望利用“馬歇尔計划”进行广泛扩張来解决战后在美国深化了的經济矛盾，减輕市場問題的紧張，緩和1948—1949年的生产过剩危机。美国壟断組織打算推銷掉在国內市場上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大量商品，从而扩大輸出。在經济上，这是一个国家輸出商业資本和借貸資本的信貸計划，一个国家資助商品輸出的計划，一个广泛利用国际間的国家信貸的夺取新的銷售市場、原料来源和投資范圍的方案。

“馬歇尔計划”沒有实現其克服危机的任务。1948—1949年美国爆发了經济危机，那是正当按照这一“計划”的商品供应額达到最高峰的时候。“馬歇尔計划”的規模同摆在它面前的目标不相

① *S. E. Harris.* 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Massachusetts, 1948, p. 3.

② *W. Steed.* Economic Aspects of World Recovery. June 1947.

称。"馬歇尔計划"的开支，平均每年仅占美国国民总产品的1%左右。如果估計1948年美国工业产值为一千七百五十亿美元，那末在1948—1949年危机时期，美国工业产值就縮减了整整一百八十亿美元。① 由此得出結論，美国每年根据"馬歇尔計划"用在补充輸出方面的、靠美国納税人出錢的三十几亿美元开支，相对地縮小了国内市場，对于防止經济危机起不了什么重大作用。

美国統治集团把經济"援助"变成了推行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他們不是向那些遭受战爭和法西斯侵略災害最慘重的国家提供經济"援助"，却首先向那些他們在推行侵略政策方面，得到其統治力量协助的国家提供。

英国外交大臣欧·貝文和法国外交部长乔·皮杜尔，以及西欧国家的其他一些国务活动家，都曾就馬歇尔的这个建議进行过狂热的活动。根据他們的倡議，1947年6月27日—7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苏联、法国、英国三国外长会議上討論了这一建議。在这次会議上，作为美国建立世界霸权政策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的苏联揭露了"馬歇尔計划"以及为实現这一計划的法英方案的眞正含义。这个方案規定，为欧洲建立一个由大国組成的所謂"領导委員会"——一个新的机构，它站在欧洲国家之上，并且賦有干涉这些国家内政，直到决定如像主要工业部門的发展方針这类問題的权利。同时，英国和法国希望在这个"委員会"里取得統治地位。

在英国和法国的建議中，在欧洲經济复兴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地位不是指派給这些国家自己，而是指派給美国及其援助。如苏联声明所指出的，根据美国政府建議的条件所建立的这类組織，会給欧洲各国的主权带来严重的損害。

在巴黎会議上，苏联拒絕参加实現这种目标的活动。苏联就如何在平等的、民主的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最快地促进欧洲經济的

① 《World Economic Report 1949—1950》.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January 29,1953, p. 13.

复兴提出了自己的具体建議。这一建議遭到法国和英国的否决，会議以未获結果而告終。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以及芬兰，同苏联一起拒絕参加"馬歇尔計划"。

很快地，在1947年7月12—15日，接受了美国"援助"条件的国家在巴黎召开了会議。参加会議的有十六个国家的代表——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瑞士、挪威、丹麦、冰島、爱尔兰、葡萄牙、奥地利、瑞典、希腊和土耳其。其后西德和的里雅斯特自由区也参加了"馬歇尔計划"。根据1949—1951年間的人口調查材料或估計，这些国家的人口約为二亿七千五百万人，或者說比欧洲当时的全部人口的一半少一些。会議成立了欧洲經济合作委員会，它的任务是編纂出关于这些国家經济資源的总报告，以及确定它們申請美"援"的共同申請书。

欧洲資本主义国家之进入"馬歇尔計划"体系，是以它們接受对美国貸款者的一系列沉重的义务为条件的。美国提供"援助"的条件使得美国壟断資本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强迫一些国家——"馬歇尔計划"参加国接受对它有利的政策，其中包括經济政策。

这些条件和要求，在《援外法案》中，以及在美国政府同每一个"馬歇尔化"了的国家政府于1948年6—7月締結的、差不多整个地再版这一法案的个别条文的所謂"双边协定"中，有着最概括的表現。在所有的"双边协定"中都提出，每一个国家——"馬歇尔計划"参加国的政府，都贊成美国法案的目的与原則，并且"确认其今后也始終同意該法案之目的与原則之意願"。①这在实际上等于承认，美国不仅有权确定該法案的目的的具体含意何在，而且有权决定西欧国家所采取的措施究竟符合这些目的到何种程度。

这些"双边协定"实际上对所有国家——"馬歇尔計划"的参加国都是相同的，其中明显地反映出資本主义体系所固有的那种主宰与隶屬的关系。

---

① 引自 *А. Клод.*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стр. 99，参見，例如，1948年6月28日杜尔以法国政府名义签字并于1948年7月8日經国民議会批准的法美协定的序文及一条二款。

在这一时期，欧洲一系列国家都編制了为期四年的“国民生产計划”（如法国的“摩納計划”等等），这些計划，当然同眞正的国民經济計划沒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实施“馬歇尔計划”，这些“計划”就必須取得美国当局的同意，这就便于美国壟断組織实現它加紧渗入西欧經济的任务。

每一个国家——“馬歇尔計划”的参加国都承担义务，要“在复兴方案的范圍內”有效地利用自己国家的資源以及美国的貸款。因此，“馬歇尔計划”执行机构就有可能对西欧国家实行的一些經济措施进行“审查”，而只推荐其中有利于美国壟断組織的那一些。

美国壟断資本家还在“稳定”西欧国家貨币流通和平衡它們的国家預算的借口之下，为自己取得了干涉这些国家貨币金融政策的“权力”。事实上，他們完全不打算使西欧国家的貨币流通“稳定”或者“正常化”，而是竭力使西欧的貨币附屬于美元，建立美元在西欧的統治地位。

美国壟断組織利用在“馬歇尔計划”的基础上提供“援助”的条件，使自己在对西欧国家的貿易中占便宜，降低或者撤銷关稅壁垒和特惠，并且还压縮这些国家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貿易。美国統治集团所关心的，完全不是保证“国际自由貿易”和“商品的多边交換”。他們拚命使美国产品充斥西欧市場。

在实行“馬歇尔計划”方面以及其它一些与此同时生效的貸款計划方面，从1948年4月1日起至1952年6月30日止，美国支出总数为一百三十三亿美元。

美国推行“馬歇尔計划”以及对西欧的其它貸款計划的开支①

（单位：百万美元）

1948年4月3日—1949年6月30日……5,891.3

① 据《Operations Report》,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s. Washington, May 27,1955, p. 74, 75。

1949年7月1日—1950年6月30日……3,523.1
1950年7月1日—1951年6月30日……2,453.8
1951年7月1日—1952年6月30日……1,420.6

"欧洲經济合作委員会"最初把"馬歇尔計划"各参加国四年內(1948年初起至1951年底)的赤字大致确定为二百九十二亿美元。①在美国代表的压力下,根据"馬歇尔計划"申請的"援助"縮減到二百二十四亿四千万美元。美国国会在拒絕預先确定实行"馬歇尔計划"的整个时期內的貸款总数后,于1948年7月通过决議,在这一"計划"生效的最初十五个月期間(这就是說,到1949年6月30日止),开支四十亿美元。其后,国会每年确定撥款数目时,每次都加以削減。

美国根据"馬歇尔計划"給予西欧的"援助"平均每年三十亿美元多一些。这笔"援助"只勉强抵銷西欧国家对美国貿易总額中的逆差,而比起落到参加北大西洋集团的欧洲国家身上的沉重軍事开支来,这笔"援助"只及其几分之一。

还在"馬歇尔計划"生效的初期的正式文件中,就規定了到1952年,欧洲資本主义国家国际收支逆差总数为三十亿美元。但是,在实际上,到1952年,也就是实行"馬歇尔計划"期滿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美元赤字比規定的数目大四分之一。

因此,"馬歇尔計划"沒有消除欧洲的"美元荒"。尽管到这个时候,西欧国家恢复了自己的經济并且超过了战前的工业生产水平,它們国际收支中的逆差仍保持不变。1952年初,美国国务院对"馬歇尔計划"进行总結时确认,"在欧洲經济的画面上,还有着許多污点。所有污点中最污秽的是美元亏損,它由于自由世界(国务院如此称呼資本主义陣营。——作者)革新設备計划的通貨膨脹影响而日益扩大"②。

① «The New York Times», 26. VIII.1947.
②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14,1952, p. 45.

无論是"援助"的規模，或主要地是"援助"的本身性质，都露骨地证明，美帝国主义是不关心西欧經济的眞正复兴的。美国作为"計划"規定的貸款提供給西欧国家的首先是那类消費物品，这些消費物品归根到底是这些国家自己能够生产的或是可以从欧洲內部其它来源方面获得的。当然，为了消除饥饉和燃料危机，必須向西欧国家提供粮食和煤。但是，从这些国家前途的长远观点来看，除了那些以外，为了恢复和发展机器制造业、冶金业和其它重要工业部門以及农业，生产資料——机床、設备、农业机器以及其它生产資料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这类产品在美国提供的商品中占极其不足道的地位。

在美国实行"馬歇尔計划"的总开支中，生产設备所占的比重大約10%(工业設备——8%，拖拉机和农业机器——約2%)，而粮食、飼料和肥料約25%，原料和半制成品近30%，燃料大約14%。在实行"馬歇尔計划"的年份里，运到欧洲去的：落花生(按价值計算)多于发电机和电动机；牛奶几乎同发动机和渦輪机一样多；烟草比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多3.6倍，比冶金的、采矿的和建筑的設备多1.6倍；紡織品比电机工业設备多0.7倍，等等。① 美国壟断資本家不供应紡織机器而供应棉織品，不供应磨粉工业机器而供应面粉。美国壟断組織利用"馬歇尔計划"逐漸破坏了西欧国家一系列經济部門的竞爭能力。由于"馬歇尔計划"，生产輸出品的部門受到損害，在这些国家里造成相当严重的外汇—財政困难。在实行这一"計划"的年代里，西欧关閉了千百个工厂和制造厂，解雇了千万名工人。

美国壟断組織不仅拒絕把必需的生产資料供应給西欧国家，而且还拚命阻止它們自己在本国經济中实行任何起作用的投資。

① 計算根据：《Paid Shipments》. Mutual Security Agency. Division of Statistics and Reports. Data as of February 29, 1952, p. 6—7。

在《哈里曼报告》中直率地强調指出，"欧洲十六个国家应当放棄对工业实行迅速扩大或現代化，或对农业实行广泛的机械化。"①

例如，法国为了恢复自己的工业，首先需要机器設备和机床，而美国却首先供应它农产品、石油和石油产品，强迫它从美国輸入飞机、汽車、輪船和車厢，以及烟草和紡織品。这导致工业生产能力长期开工不足現象的加剧。

"馬歇尔計划"也給意大利国民經济带来損害。帕尔米罗·陶里亚蒂曾指出，"实际上，这是无数中小企业的倒閉，是大工厂的千百万工人要被解雇的威胁。"②美国的机器制造公司根据"馬歇尔計划"向意大利推銷輪船、电汽的和无綫电的配件、印刷机和其它产品，使意大利的許多机器制造部門陷于毫无作用的地步。意大利的冶金工业遭到巨大的困难，輕工业，以及一部分食品工业也是如此。

英国的采煤工业經历了长期的停滞和下降，它迫切需要設备来恢复这一工业。但是美国壟断組織企图在西欧市場上推銷自己的煤，差不多完全剝夺了英国的矿井設备的供应。美国工业的竞爭在英国的机器制造企业生产中造成額外的困难，特别在那些生产飞机、船只、汽車和拖拉机的企业中，以及在建筑工业和采掘工业中。美国資本的扩張最强烈地反映在英国的对外貿易和外汇情况上。

西欧国家經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农业生产被破坏了：耕种面积、主要农业作物的生产水平及收获都縮减了，牲畜头数及其产品率都下降了。为了恢复农业經济，西欧国家首先需要拖拉机和农业机器，需要肥料。这些国家的代表在編纂"复兴方案"的最初方案时，曾規定在实行"馬歇尔計划"的第一年，欧洲的資本主义部分对农业工具的需要为三亿七千万美元。③

但是，美国壟断組織希望扩大本国农产品的市場，把西欧国家的申請

---

① 《European Recovery and American Aid》.

② 1948年8月15日《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

③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Cooperation, General Report》, vol. I, p. 114.

压縮到一亿三千三百万美元，而在实际上到1949年6月30日，对这些国家供应的农业机器只有四千万美元。①从1948年4月3日到1955年3月31日，参加"馬歇尔計划"的国家总共获得一亿二千万美元的拖拉机（占全部商品供应的1%），一亿五千万美元的农业机器和工具，六千四百万美元的肥料（占全部商品供应的0.5%）。

在推行"馬歇尔計划"的年代里，美国壟断資本对欧洲資本主义国家的經济的破坏作用大体上就是这样。

就連美国和西欧的某些資产阶級权威报刊也承认（总的說来，它們还是竭力粉飾"馬歇尔計划"的結果的），經过了四年的"馬歇尔化"以后，西欧的經济遭到了严重的困难。

例如，倫敦的《經济学家》在題为《"馬歇尔計划"的最后一幕》的編輯部的文章里写道："經过了四年的合作以后，欧洲結果仍处于同1947年差不多一样的情况中。欧洲仍然經受着美元荒；大多数国家的海外收支重新明显地出現赤字；各国仍同前此一样徒劳无功地力求克服通貨膨脹，同时，提高生产率的必要性仍然同四年前一样迫切。"②

美国的資产阶級經济学家在吹捧"馬歇尔計划"的成就时，总是引证西欧工业生产的某些增长。但是，被他們充作"馬歇尔計划"的成績的这些增长，在实际上是違反这一"計划"的目的和使命而取得的，这是西欧經济在遭受战爭破坏后自发地恢复的过程的結果，是內部經济力量发生作用的結果。据巴塞尔国际清算銀行的統計，美国根据"馬歇尔計划"的"援助"，总共只占"計划"参加国国民收入总数的3.5%。③

① 《Paid Shipments》,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Statistics and Reports. Data as of June 30, 1949, p. 9.

② 《The Economist》, January 5, 1952, p. 8.

③ 《Twety First Annual Report》.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asel, June 11, 1951, p. 15.

认为西欧后来在經济发展速度上超过了美国，其結果是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生产中的份額开始下降到接近于战前的水平，而在这方面，“馬歇尔計划”有决定性的功績，这种想法是毫无根据的。更近于眞实的是，美帝国主义不能够阻止在欧洲和在世界經济中展开的这一过程。①

根据“馬歇尔計划”提供經济“援助”的实踐还再次证明了，这一“計划”同加强欧洲的經济合作和友好关系的任务毫无共同之处。它在欧洲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上造成分裂和敌对，使劳动人民的物质状况整个地恶化，給欧洲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带来損害。“馬歇尔計划”意味着在“援助”欧洲的幌子下实現美帝国主义的經济目的。在这个“計划”之下，掩盖着的是美国壟断資本要把西欧国家吸引到它的帝国主义政策的軌道上去的政策，要进行新战爭准备的政策。

三、“馬歇尔計划”的軍事战略作用

正如已經指出的，在“馬歇尔計划”中，美国壟断組織在西欧进行經济扩張的使命是同軍事—政治目的密切交織在一起的。“馬歇尔計划”从一开始实行的时候起，就是使西欧經济軍事化的工具，就促成大批軍事基地的建立，并为美国壟断組織和美国政府在西欧国家及其殖民地攫取战略原料。“馬歇尔計划”在很大程度上替北大西洋集团、“西欧联盟”和别的軍事同盟的建立进行了准备，也为“欧洲煤鋼联营”和作为各軍事集团的工业基础的其它一些国家壟断組織的建立作了准备。这个計划促进了西德軍事工业潜力的恢复和軍国主义的复活。

美国統治集团制定“馬歇尔計划”时，規定西欧国家的經济联合将由这些国家的軍事—政治联合加以补充，并且，在这种联合

① 参見本书第十五、十六、十七章。

中，軍国主义化了的西德将占据中心地位，而領导則将由美帝国主义来担当。美国統治集团向欧洲資本主义国家提供自己的“援助”，是以建立在美国領导之下的侵略性的軍事集团为条件的。“馬歇尔計划”的經济組織必須成为軍事同盟的工业基础。

美帝国主义在西欧的、同“馬歇尔計划”有关的軍事—經济的以及战略的措施，完全不是如資产阶級作者所断言的那样是防御性的，而是具有侵略性的。它們是直接从“美国領导世界”的概念产生出来的。

一方面，是美国对欧洲資本主义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家的直接軍事开支的官方統計数字，把它們拿来对照一下，就可以证明，“馬歇尔計划”是以軍事侵略的目的为其基础的（参見下表）。

美国貸款和北大西洋集团欧洲成員国的直接軍事开支①

（单位：10亿美元）

国家		北大西洋集团全体欧洲成員国家	其中：英国	法国	西德*	意大利
1949年	直接軍事开支	4.8	2.2	1.4	1.0	0.5
	美国“援助”	5.9	1.6	1.3	0.6	0.7
1950年	直接軍事开支	5.4	2.4	1.6	1.0	0.6
	美国“援助”	3.5	0.9	0.7	0.3	0.4
1951年	直接軍事开支	7.6	3.2	2.5	1.2	0.7
	美国“援助”	2.5	0.3	0.4	0.4	0.2

① 表內所列数字引自：《Коммунист》，1953年，第2期，第102頁；《Economist》，1953年12月19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制的軍事开支的官方估計）；《Financial Times》，1954年12月18日；《Operations Report》.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1955年5月27日，第74—75頁。表內数字是按四舍五入計算的。此外，美国“援助”数目是按財政年度計算的，而軍事开支則是按日历年度計算的。再者，在美国对北大西洋集团欧洲成員国的貸款数字中，包括給“欧洲經济合作組織”参加国的。西德到1955年才成为北大西洋集团参加国，在軍事开支的总数中沒有把西德的包括进去。

1952年	直接軍事开支	10.3	4.4	3.7	2.0	0.8
	美国“援助”	1.5	0.4	0.3	0.09	0.2
1953年	直接軍事开支	11.1	4.7	4.1	2.7	0.8
	美国“援助”	1.4	0.4	0.4	0.08	0.1
1954年	直接軍事开支	10.3	4.8	3.4	2.2	0.9
	美国“援助”	0.7	0.2	0.09	0.02	0.02
1949—1954年	直接軍事开支	49.5	21.7	16.7	10.1	4.3
	合計美国“援助”	15.5	3.8	3.2	1.5	1.6

* 軍事开支是按財政年度計算的。

如果說，同其它軍事的和国际經济的計划一道实行的“馬歇尔計划”的第一阶段內，約摸到 1950 年年中止，它的目标在于阻遏西欧經济的某些关鍵性部門——冶金、机器制造、造船以及其它一些部門的发展，这样好让美国壟断組織更容易地滲入西欧国家的經济，那末，在随后的年份里，当美国壟断資本已經滲入西欧国家許多重要工业部門以后，注意力就轉移到直接发展这些国家的軍事工业潜力上去了。美帝国主义在欧洲的資本主义国家中鼓吹軍备竞賽，也就使这些国家的物資和人力从生产性使用方面抽走，从而使西欧不能增强在世界市場上的竞爭能力而危害美国壟断組織。

在实行“馬歇尔計划”的第二阶段，軍事—政治的因素显然占了主要地位。美国商业部的刊物《对外貿易周刊》于 1951 年初承认，“很难找到馬歇尔計划撥款的什么目标不是这样或那样地为重整軍备事业服务的。”①

在美国国防部长約翰逊 1950 年 2 月的一个报告里，公开强調指出，美国“軍事机构同国务院和馬歇尔計划执行机构密切合作，制定向外国提供軍事援助的方案”。1950 年 10 月 7 日，“欧洲經济合作組織”的理事会发表了一項声明，强調必須加紧把西欧各国的經济轉上軍事軌道。②那时，实

① 《Foreign Commerce Weekly》, February 26, 1951.

② 《Tenth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For the Quarter Ended September 30, 1950.

行“馬歇尔計划”的机关已經在事实上变成了北大西洋集团的一个經济机构。1951年3月，代替保尔·霍夫曼任美国“馬歇尔計划”执行机构的首脑职务的福斯特确认，这个“計划”完全“脫掉了工作服而換上了軍装”。

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理事会1950年12月布魯塞尔会議上，通过了决議，把“欧洲經济合作組織”的主要职务轉給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机构。“欧洲經济合作組織”本来被解釋为賦有这样一种机构的任务，即它的使命仿佛是要以“在美国領导下的合理的国际經济协作关系来代替資本主义生产的自发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而这样一来，它就在事实上变成了純粹的軍事机构了。“馬歇尔計划”为北大西洋公約的成立鋪平了道路后，就变成它的附屬物。

自1952—1953年起，美国总的“軍事援助”开始超过“經济援助”差不多一倍，而在西欧，超过两倍多。因此，如果在朝鮮战爭前的五年期間內“軍事援助”仅占美国全部“援助”的5%，而經济的則占95%，那么在随后的五年中，“軍事援助”的份額就扩大到53%，而經济的份額則縮減到47%。但即使是“經济援助”本身也在事实上成为軍事的了。自1951年7月1日起，甚至在美国的官方文件中它也不称为“經济援助”，而改称为“共同防务撥款”（“mutual defense financing”）或“防务支持”（“defense support”）。

按照“馬歇尔計划”条件，美国提供給西欧国家的貸款中的很大数目也是用于建立許許多多的美国軍事基地上的，这些基地散布在那些国家的本土和它們的殖民領地上。而根据貸款提供的很大一部分款項，恰好被美国应为軍事基地租借土地偿付的租金抵銷掉了。

北大西洋公約签訂以后，按“馬歇尔計划”实行的商品供应也具有明白表現出来的軍事性质。消費物品、粮食和农产品在供应的总数中所占的份額大大降低了，而为在欧洲資本主义国家进行扩張軍备和軍事战略建筑所必需的軍事物資和生产資料的份額急

剧增加了。现在，在商品供应中，給西欧軍事工厂和同它們协作的企业——其中許多是受到美国資本的控制的——的車床和其它装备，以及为建造和改建飞机場、軍用海港、战略铁路和公路、軍需庫所需的車床和其它装备占据了一个主要的地位。

在"馬歇尔計划"的第二阶段，在"对等基金帳戶"使用上的軍事性质也加强了。

美国資产阶級的統計学家竭力证明，仿佛从这种帳戶上撥用的絕大部分資金都是花費在和平目的上的——用于巩固欧洲資本主义国家的財政体系、鼓励这些国家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发展运輸、"社会福利"、旅行等等。"共同安全署"的官員玩弄数字，作出"統計"說，从1948年4月3日至1952年1月31日期間，用于軍事目的的資金似乎总共只占存入"馬歇尔計划"各参加国"对等基金帳戶"款項的2%。①在实际上，从"馬歇尔計划"一开始生效起，这些資金的絕大部分就是以直接的或間接的方式用于实行侵略性計划，发展軍事生产，建筑和改建战略铁路和公路、港灣和港口，装备飞机場和其它軍事战略設施并使之現代化，在西欧各国准备战爭的进攻基地，用于間諜活动以及其它类似的目的。

靠了"对等基金帳戶"的帮助，同隐蔽的、間接的軍事开支一起，也給直接的軍事开支撥了經費。在1951—1952和1952—1953財政年度，以各国貨币存入"对等基金帳戶"上的可动用的資金总数約为二十五亿九千五百万美元，用作对西欧各国直接軍事开支撥款的花了九亿九千二百万美元。②如美国官方文件所承认的，这些資金中的絕大部分是用于生产和购储軍用飞机、舰只、軍火、通訊工具等等。③在"对等基金帳戶"上可动用的

① «Monthly Report for the Public Advisory Board». Mutual Security Agency. Data as of January 31,1952. Washington, p. 43.

② «Monthly Report on the European and Far East Programs to the Public Advisory Board».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Data as of June 30, 1953, p. 42.

③ «Local Currency Counterpart Funds». Mutual Security Agency. European Program. Division of Statistics and Reports, February 29, 1952, p. 1.

資金数中，直接軍事开支所占的份額一年年地不断增加。它从1951—1952年的28%增加到1952—1953年的57%，1953—1954年的64%，1954年后半年的66%。①

美国壟断組織在北大西洋集团建立起来以后，大大扩大了在西欧的軍事工业建設計划。作为美国資本滲入西欧各国的途徑之一的所謂"工业設施方案"("Industrial Project Program")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这个方案規定，在根据"馬歇尔計划"和根据美国的欧洲盟国的軍备計划所撥的資金中，用于具有軍事意义的大工业設施的建設、現代化和装备的当不少于十亿美元。

从1948年4月3日至1953年6月30日期間，美国政府批准了十三个欧洲資本主义国家的一百三十五項軍事工业設施的建造和扩建，总值共二十六亿二千四百五十万美元。同时，美国从自己的基金中撥給这种建設五亿八千八百三十万美元，并提供了四亿四千九百七十万美元的物資、原料和装备。

在"馬歇尔計划"的一大套軍事—經济措施中，由美国壟断組織攫取和利用西欧国家及其屬地的原料資源和其它具有头等軍事意义的資源这一点，占有重要的地位。

美国資本利用"馬歇尔計划"这个机器，建立起自己对丰富的矿产的控制——"法兰西联邦"各国的錳、荷兰殖民地的錫、剛果的鈾矿、馬来亚的橡胶、土耳其的鉻等等。作为对自己的美元貸款的"报酬"，美帝国主义者得以进入資本主义世界許多国家的稀有原料产地和軍事战略原料产地。

从1948年4月3日至1953年9月，根据"馬歇尔計划"和"共同安全"計划，对扩大西欧各国特别是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战略原料开采以

①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Mutual Security Program》. For the six months Ended June 30, 1954, p. 15. 《Operations Report》.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March 25, 1955, p. 32.

及新原料泉源的勘查和发現的撥款一共是二亿四千九百六十万美元(实际开支是一亿九千二百一十万美元)。其中用于美国自己购儲战略原料的达一亿一千五百五十万美元。①

撥作勘查天然富源和扩大战略原料开采的資金是用在购买美国装备上的。这些資金,以及从"对等基金帳戶"上提取的款子,都落到西欧各国的大殖民公司的掌握之中,首先是那些同美国資本有联系或是处于美国資本控制之下的那些大殖民公司的掌握之中,还落到那些在西欧各国的殖民領地营业的美国壟断組織的掌握之中。这些款項,照例以低价供应稀有的軍事战略原料的方式带着巨大的利潤返回美国。此外,美国壟断組織还获得事先規定的利息。

"馬歇尔計划"和其它形式的美国"援助"带給西欧一些大壟断組織一定的利益。它們由于从"对等基金帳戶"資金中获得資助而发財了。这种帳戶的撥款的一部分还以支付公債利息的形式流給了它們。最后,它們还从美国的軍事訂貨中賺到錢。但是,这些有限的好处,同由于美国資本向西欧及其殖民領地加紧滲透而給西欧各国的資产阶級带来的損失比起来,却是得不偿失的。

整个看来,"馬歇尔計划"和美帝国主义的扩張,对西欧資本家的高額利潤和世界地位造成严重的威胁。美国壟断組織的政策更进一步使市場問題尖銳化,縮小了資本主义迴旋的余地,严重地影响了欧洲資本主义国家。美国資本在西欧国家扩張的自然結果,是使这些国家为一方、美国为另一方的冲突深刻化了。矛盾的增强使整个資本主义体系削弱,使資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使国际帝国主义矛盾增长。

美国壟断組織在其扩張活动上获得的最大"胜利"是在1948—

① «Monthly Operations Report».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Data as of August 31, 1953, p. 17, 33.

1949 年。正是这两年，可以看作仿佛是一种分界綫，在这以后，美国在資本主义世界經济中所占的份額尽管是慢慢地，但总归是开始逐步下降了，同时，它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分量也下降了。西欧国家随着自己經济的恢复和力量的积聚，对于美帝国主义的扩張政策也相应地予以越来越剧烈的抵抗。

这样，美国和一系列西欧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靠了"馬歇尔計划"的帮助达到了某些目的。但是，"馬歇尔計划"在实現主要的战略任务上——这就是，改变两种社会制度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資本主义上，却表現出是无能为力。

美国壟断資本沒有能够使西欧各国人民向自己屈服，使他們变成自己計划的順从的执行者。各国人民群众爭取和平、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忘我的斗爭，他們的勇敢的、积极有效的发动是实現欧洲"馬歇尔化"政策的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这一政策遭到了一个接一个的失敗。

"馬歇尔計划"和美帝国主义在西欧的全部扩張活动导致帝国主义陣营里的斗爭的加剧，导致美国同欧洲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以及西欧各国之間的矛盾和冲突的尖銳化。

第二十四章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軍事集团的方針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性质和特点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壟断集团在战后头几年已經开始拼凑鋒芒指向苏联、人民民主国家、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侵略性的軍

事集团。苏联共产党綱領指出："美国的財政巨头拼凑帝国主义者的'神圣同盟'，建立侵略性的軍事集团。"① 这些集团的特点是什么，它們的結构和相互联系以及它們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怎样呢？

資本主义国家早在帝国主义时代以前就建立过軍事联盟和集团作为准备和进行战爭的工具。在帝国主义阶段，資本主义国家結成軍事联盟和集团已成为国际关系发展的突出特点之一。弗·伊·列宁还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白热化的时候就指出，帝国主义国家的軍事"合作"加上財政資本的溶合，是帝国主义联盟的形式之一，"建立大帝国的帝国主义傾向"是在这种联盟的范圍內实現的。②

在二十世紀初，协約国和三国同盟就是这种軍事"合作"的典型例子。它們在重新分割世界的斗爭中的冲突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資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帝国主义軍事集团具有更加露骨的侵略性质。1918—1920年对苏維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十四国联盟"、"反共产国际协定"或"柏林—罗馬—东京三角同盟"可以作为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所执行的拼凑侵略性軍事集团的方針，是它們的"傳統"政策的直接继續。这首先涉及它們的侵略的、掠夺的目的，也涉及各个强国参加这些集团的条件。这些条件一直是由侵略集团每个参加国的力量、它的資本实力、它的軍事机器来决定的。同时，战后的帝国主义方針也有許多重要特点。最大的特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帝国主义軍事集团的范圍內，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分成对立的集团，而是相反，一切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以及后来的西德和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7頁。

② 《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頁。

日本在內，都联合在一起。产生了包括一切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內的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軍事陣营。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央条約組織”、“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約組織”等軍事集团以及美日或美国—西班牙这一类的双边軍事同盟都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在战略上相互补充的。它們构成了帝国主义軍事集团体系。这些集团的主导作用一直就是屬于一个国家——美国，这就决定了这个体系內各个环节的相互联系。

但是，帝国主义就是这样也未能做到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的統一。首先是几乎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的亚非新兴国家都在集团体系之外。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走着不同于老資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它們拒絕参加帝国主义集团，而走上了中立主义的道路。某些老資本主义国家，如瑞典、奥地利、瑞士、芬兰也仍然保持中立的立場，而沒有被卷入帝国主义集团体系。

当然，軍事集团体系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参加国之間的帝国主义矛盾的消除。但是，如果說过去这种矛盾正好导致对立的軍事集团的产生，那末現在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是在軍事集团范圍內发展的，在一定程度上受着主要資本主义国家利益的共同性所制約。在各国人民爭取社会主义、爭取民族独立、爭取自由和民主的斗爭取得巨大成就的面前，力图把沒有祖国的壟断資本势力糾集起来拼成某种“統一的”軍事政治机构，这就是美国卵翼下的帝国主义軍事集团体系产生的基本原因。

战后帝国主义集团从它們产生的第一天起到現在一直是同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公开为敌的。这些軍事集团是侵略势力的工具；它們的活动使各国之間的关系尖銳化，加剧国际紧張局势，产生新的世界战爭威胁。

帝国主义国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間除了对付德国和日本的侵略威胁可能再起的互助条約以外，还沒有締結任何軍事协定的

时候，着手拼凑它們的軍事集团的。这个事实特别清楚地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对发动“冷战”負有全部責任。在世界大战結束后，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帝国主义国家首先开始建立自己的軍事陣营。这迫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后来采取措施来加强自己的安全。

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样，最强大的資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主要中心——美国的統治集团在战后年代拼凑和領导帝国主义軍事集团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可是，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西德在建立集团方面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在許多情况下，这些国家的統治集团表現了自己的主动性。

西欧大資产阶級在建立軍事集团体系的得失考虑上，就主要的方面說，即就同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作斗爭方面来說，是与美国統治集团的利益相一致的。同时西欧帝国主义資产阶級也打算借助軍事集团和在这些集团的范圍內达到自己特殊的、并非經常和美国壟断組織的利益相一致的目的。

这首先对英国說来是如此。英国領导集团力图利用同更强大的美国的联盟，来恢复自己在西欧的陣地和影响，参加对西欧的控制，加强自己在世界其他地区的陣地，从而重新加强英国在資本主义国家体系中的作用。英国壟断資产阶級指望軍事集团帮助它在世界上建立美英联合統治，而不是建立美国的統治。在拼凑軍事集团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統治集团之間产生了某些有时是十分严重的分歧，当然这些分歧并不涉及集团的总方向，而只涉及具体組織問題以及各个国家参加这些組織的条件問題。

法国壟断集团也企图在軍事集团体系范圍內达到某些特殊目的。誠然，在战后头几年，法国資产阶級由于相对軟弱在这方面是十分謹小慎微的。可是即使在这时候，它已經企图利用軍事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把西欧大陆的其他国家团結在法国的周圍，这主要是为了对付英国和它在西欧建立美英統治的方針。

西德壟断組織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挺过了"第三帝国"投降的痛苦以后，就打算参加新的軍事集团来恢复它原先在欧洲的势力。西德壟断組織一开始就利用参加这些集团的問題作为对美英法統治集团施加压力的杠杆。

当然，这些局部的分歧在拼凑軍事集团的时候不是、也不可能是决定性的东西。在軍事集团活动的主要目的、主要方向方面，即在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全世界的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方面，主要帝国主义伙伴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深信，資本主义国家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結成統一的軍事集团体系，像美国国务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后来所說的，可以"排挤"、"摒棄"苏联以及窒息全世界的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

但是，不言而喻，帝国主义軍事集团的組織者不可能公开宣布他們的侵略目的。他們不得不采取政治欺騙。帝国主义者展开了誹謗运动，譴責苏联具有"侵略意图"。帝国主义宣傳粗暴地歪曲东欧国家的劳动人民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斗爭的事实（特别是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件），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在那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違反东欧各国人民的意志的。西方国家的統治集团誹謗地說，似乎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正在为苏軍的到来准备土壤。同时，資本主义的宣傳机器被利用来賦予軍事集团以某种"思想体系的"外形，使广大的輿論界相信，似乎这些集团只具有"防御的"性质，以保障和平为目的，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西方文明"国家密切合作的历史傳統。

二、美—英—加拿大軍事合作的恢复

在战后初期帝国主义国家建立軍事集团的活动中，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軍事合作的恢复具有重要意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这种合作对于击潰法西斯侵略

者的共同事业有过一定的貢献，所以符合反希特勒联盟的利益。在战后的年代，当这种合作专門用来服务于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和建立"实力地位"的政策时，它就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

这种軍事合作的特点是从最初起就具有其"不定形"性质。在战后年代，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之間的軍事联系的建立不是根据什么正式的条約或协定，而是根据"执行协定"、"协議"、"相互制約"等等。这样，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政府就避免了議会审查有关的"君子协定"，实际上是不让广大的輿論界知道这种协定。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关于武器标准化的談判导致在1949年12月(已經是大西洋集团建立以后)就这个問題签訂一項"君子协定"，这些国家的議会也沒有审查这一协定。

在战后初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在原子能方面也恢复了合作。大家知道，在战爭年代这种合作具有极不公平的性质，因为美国积极利用英国和加拿大的科学家和物資制造原子彈，但不同英国和加拿大分享在軍事上利用原子能方面的最重要发明。在战后，这种合作也仍然是不公平的。这种合作是在原子政策問題联合委員会①的范圍內实現的，这个委員会建立于1943年，在1946—1947年間制定了新的原子能技术合作計划。②1948年9月，在英国原子中心哈威尔举行了美英加最著名的原子能科学家的会議，会上制定了三方面合作的进一步措施。

在1947—1949年間制定了一套利用加拿大的軍事工业来滿足美国軍事机器需要的办法。根据这个計划，加拿大应該成为美国軍事經济上的、随后是战略上的"北方补充"。美加关系新体制的初步內容在1948年8月15—16日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福莱斯特訪問渥太华的时候进行了討論和协商。福莱斯特同加拿大国防部长克拉克斯頓談判的結果，后来成立了美国加拿大工业动員联合委員会③。

① 即1943年在华盛頓成立的美英加三国联合政策委員会，簡称"联合政策委員会"。——譯者

② 原子政策問題委員会的委員在战后头几年是美国国务卿、美国原子能委員会主席、駐华盛頓的英国大使和加拿大大使。

③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49, p. 9988.

美国同英国在軍事方面的合作当时也已經十分密切。“不沉的航空母舰”政策正是在这时奠定基础的，在华盛頓认为，这个政策后来使英国成了美国展开装备有原子彈的战略空軍的欧洲最重要跳板。

在1947年年中，关于美国在英国領土上建立空軍基地的談判，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先在軍事当局之間，然后又在政府一級上进行。很快作出了例行的“君子协定”，这是战后时期以反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为目的的最重要軍事协定之一。

根据这个协定，1948年7月16日在倫敦和华盛頓宣布，两大队空軍（每个大队由美国B-29中型轰炸机三个中队組成）到达英国，“为执行临时任务作短时期停留”。① 甚至在美国和英国，当时都不是所有的政治观察家注意到了美国轰炸机到达英国机場的这个簡短消息。

在1948年7月16日发布消息的几个月以后，无論在美国或英国，誰也不想故作姿态，說这是什么暫时措施了。而且，美国政府从最初起就是打算美国飞机无限期駐扎英国領土的。

詹姆斯·福萊斯特在1948年7月15日的一則日記中十分明确地写道：“現在我們有可能派出这些飞机（到英国。——作者）。它們一旦被派出，就可能成为类似协議固定的东西；而欧洲局势的恶化可能引起一种思潮，使英国将不得不站在与現在完全相反的立場上”②。

后来，在英国的机場上，一批批的美国飞机为另外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多的飞机所替換；新的原子彈和氫彈儲存庫建立起来了，并且作为这种政策的自然結果开始了火箭基地的建設。

战后年代恢复了的美英加拿大合作是拼凑帝国主义軍事集团的政策在时間上最早的、实质上极重要的結果之一。

---

① 两大队总共有B-29轰炸机六十架，这种轰炸机专門用于載送原子彈到达目标。

② 《The Forrestal Diaries》, p. 457.

三、美洲国家間互助条約

美国領导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的头几年，除了同英国和加拿大恢复了軍事合作以外，还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个軍事政治集团。按照他們的打算，这个集团应該成为美国壟断組織在拉丁美洲实行經济和政治扩張的工具，同时应該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后方战略基地和远距离軍事跳板。美国政府建立这种集团时，在拉丁美洲国家依靠的是同美国壟断組織有密切联系的当地的地主和买办集团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下，美国达到了强制拉丁美洲国家的政策同华盛頓的政策配合起来，这是拉丁美洲国家至少在以往的二十年期間所坚决反对的。

第二次美洲国家外长协商会議（1940年7月20—30日于哈瓦那），根据美国的倡議，通过了《关于任何一个美洲国家遭到任何一个非美洲国家侵略时美洲国家实行互助》的宣言。实际上，这个宣言后来与其說是被美国用来动員拉丁美洲国家的力量进行反对法西斯德国及其侵略同盟者的战爭，勿宁說是被美国用来准备在拉丁美洲建立美国軍事基地。

在第三次外长协商会議上作出了下一步驟，这次会議是在1942年1月15—28日，即在美国参战以后，在里約热內卢举行的。会議的結果，成立了美洲国家防务委員会，其任务是制定战时的共同軍事措施。

1945年2月21日到3月8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关于和平与战爭問題的美洲国家会議上通过了“关于美洲国家互助和团結”的所謂查普德庇克議定书，該議定书已經包括了一項直接建議，要求所有美洲国家的政府締結多边的軍事政治条約。这次会議还通过了“关于重組、巩固和加强美洲国家間的体系”的协議，規定（在泛美联盟的基础上）为未来美洲大陆各国間的軍事政治条約建立机构。

---

① 参見本书第十二章。

在1947年美洲国家会議上(8月15日到9月2日在里約热內卢附近的皮特罗普利斯举行),作为对查普德庇克議定书的发展,制定和签署了美洲国家共同防御条約①,这是一个篇幅大(包括一个序言和二十六項条款)、行文巧妙的文件,美洲大陆国家的軍事政治集团就是在这个文件的基础上建立的。

虽然美洲国家防御条約中的某些規定也賦予这个条約以区域性安全协定的特点,②形式上符合联合国宪章五十二条关于区域性协定的精神和字句,但实际上这个条約使美国有实际可能把拉丁美洲国家拖入它的侵略政策。

只要說明这样一点就够了:这个条約的参加国加入了軍事政治联盟,而这个条約里并沒有指明这个联盟是針对着誰的。所以,最强大的参加国——在当前就是美国就能够在实际履行联盟軍事义务方面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这当然絲毫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关于区域性安全协定的規定。此外,在美洲国家条約中沒有提到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三条所明确要求的,即除了是針对德国或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之再实施侵略政策所采取的行动外,条約参加国只有得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允許或指示才可以对其他国家采用軍事力量。1948年12月3日生效的这个美洲国家条約的特点后来被广泛地用来吸引拉丁美洲国家参加美国在世界各个地区的侵略行动。

在这个美洲国家条約生效的前几个月,美洲国家的波哥大会議(1948年4月30日—5月1日)通过了几項决議,以便加强正在建立中的美洲大陆国家軍事政治集团的組織基础,賦予它以更明确的政治方向。这些决議之一是批准了根据1945年美洲国家会議通过的决議而建立的美洲国家組織的章程③。

---

① 即《美洲国家間互助条約》,簡称《里約热內卢条約》。——譯者

② 所有美洲国家,唯有加拿大例外,都参加了美洲国家共同防御条約;大多数从签署条約的时候起参加,其余国家过了一个时期才参加。加拿大虽然沒有参加这个条約,可是从来未反对这个条約的签訂,并且不认为这个条約是針对它的安全的。条約参加国一再暗示,如果加拿大願意参加,它就可以参加进来。(《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47, p. 8611, 8883)

沒有常設的軍事机关，美国就难于把美洲国家組織当作軍事集团加以利用。所以，美国的外交在波哥大会議上采用狡猾的手段通过了一項决議，把仅仅为战时建立的美洲国家防务委員会的权限无限期地延长。根据决議，这个防务委員会应該同美洲国家組織平行活动，而不是美洲国家組織的組成部分。可是实际上美洲国家防务委員会很快同美洲国家組織結合在一起，成为它的主要机构之一。

波哥大会議的另一項决議是"关于維护和保卫美洲民主"的决議，对于美洲国家集团的政治上的組成是一項重要的决議。决議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对西半球国家的虛假的"滲透"，号召所有美洲国家全力反对这种"滲透"。美洲国家共同防御条約的矛头从而指向社会主义陣营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革命运动。

这样，到1948年年中，美洲国家軍事政治集团的組成已告完竣。美国領导集团着手拼凑由西欧国家参加的帝国主义軍事集团。这时，在西欧已經建立了——主要是根据英国的創議，虽然也是在美国的支持下——"局部性"的軍事集团、所謂的西欧联盟。

四、英法敦刻尔克条約④。布魯塞尔条約的签訂和西欧联盟的建立

英帝国主义力图加强它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削弱了的国际陣地，不让社会主义在欧洲国家取得胜利，于是在战爭結束后立刻采取了把西欧資本主义国家联合在英国周圍的方針⑤。英国政府指望西欧大陆国家——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和其他国家——

---

③ 美洲国家組織章程見 *A. J. Peaslee*: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vol. II, p. 545—559。

④ 又譯《邓扣克条約》。——譯者

⑤ 参見本书第十五章。

同意盲目追从英国的政策，即使是为了在英国的帮助下来麻痹其影响大大扩大了的民主力量的积极性而同意。

英国統治集团达成了两个軍事条約的签訂，起先是英法敦刻尔克条約，然后是英法比荷卢五国布魯塞尔条約以及西欧联盟在这个条約基础上的建立。

英国和法国政府还在1946年就討論了英法同盟条約問題，可是那时关于对德政策的根本分歧阻碍了这个条約的签訂。到1947年初，情况有了变化，1947年1月13—15日法国总理列昂·布魯姆訪問了倫敦。他同当时的首相艾德礼取得了协議：尽管在对德政策的某些具体問題（关于魯尔、薩尔、賠款）上存在分歧，在最近时期签訂英法同盟条約。根据这个协議，大不列顛和法兰西共和国之間于1947年3月4日在敦刻尔克签訂了同盟互助条約。

这个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集团建立以前起了中間协定作用的敦刻尔克条約①，在形式上是作为关于防止德国侵略再起的措施的条約而签訂的。

該条約的序言中已經强調指出，英国和法国决定“于德国倘再侵略的时候采取互助措施”。第一条說，如果英国或法国的安全受到“来自德国采取的侵略政策”的威胁，那么締約双方“彼此协商并在相应的場合与負有对德国采取行动責任的其他国家协商”，以便采取措施“制止这种威胁”。第二条說，如果締約一方再度卷入“对德冲突”，締約另一方将立即以所有一切軍事的和其他手段給予援助和支持。

在敦刻尔克条約的序言中提到，条約中包含的义务决不与在1942年和1944年分别締結的英苏和苏法互助条約相抵触。当然，形式上是这样的。此外，从这些义务的字面来看，敦刻尔克条約甚至好像是这些条約的补充。苏联和英国、苏联和法国、英国和法国等双边条約按照所宣布的目

① 条約全文見《国际条約集(1945—1947)》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437頁。

的是同一类型的，于是产生了一种三国体系。如果英国和法国政府眞想遵循敦刻尔克条約中所指出的目的，就可以有效地利用这种三国体系来制定和实現旨在执行关于德国的波茨坦协定的、欧洲三大国一致的政策。

可是事实上恰恰相反。在敦刻尔克条約签訂后，英国和法国开始更加迅速地离开波茨坦协定，千方百計地迴避同苏联在德国問題上采取任何共同步驟。英国和法国很快同美国完全一致行动，采取分裂德国的方針。不到一年，英国政府就建議将敦刻尔克条約作为建立一个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公开对立的西欧国家軍事集团的基础。

1948年1月22日外交大臣欧內斯特·貝文在下議院提出了这个計划。他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了許多粗暴的攻击以后說："政府力求西欧更加紧密地团結成統一的整体……"①。貝文表示，英国、法国、比、荷、卢和某些西欧国家应該成为这种"团結"的核心，并提出了一种"思想"論据：西欧国家屬于同一种"文明"，从政治体系、政治生活的性质等等来看有很大的相同点。这种"論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集团組織者的自我揭露，因为他們公开承认，欧洲資本主义国家集团将以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为目的。

貝文建議，在上面提到的所有西欧国家之間締結各种相同的双边条約或一个多边公約作为对敦刻尔克条約的补充来实現这个新集团的建立。同时，他表示，德国以后也必須加入"团結起来的西欧"。他說："在这个新的决定中，德国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应得到自己的地位，但是……它不应当走在它的受害者的前面。"②

貝文把德国包入西方軍事集团的思想当然指的是西德，因为到1948年初，美国和英国在西德执行的、受到法国支持的反波茨坦方針已經充分暴露出来。③貝文的声明表明，在那时候，在帝国主义軍事集团体系建立的最初阶段，西方国家的領导集团已經在这种体系中給它們所复活的德国軍国主义划出了主要地位。

英国政府关于建立西欧国家集团的建議立刻受到法国、比利时、荷兰

①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48, p.9063.

② 同上。

和卢森堡政府的支持。斯堪的納維亚国家的政府相反，对这个主張持极端慎重的态度，沒有表示参加实現这种主張的意願④。对于还处在占領制度条件下的奥地利，对于在此以前不久被联合国譴責其政府为法西斯的西班牙，对于公开的法西斯政府执政的葡萄牙，对于剛剛与之签訂和約的意大利，英国政府当时认为不可能提出关于参加这个集团的建議。因此，紧跟在貝文讲話之后，关于建立这个集团的談判只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五国之間进行。

从最初起，美国政府就在西欧五国談判的幕后积极进行活动。1948年1月23日，在貝文在下議院发表"团結西欧"計划后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支持貝文建議的正式通告。

在这方面美国領导集团认为，貝文建議中的主要思想是联合西欧国家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虽然英国打算加强它在这个国家集团中的領导地位，这不是美国政府所支持的，可是这一点并不太使美国政府不安。华盛頓并不怀疑美国在适当的时候能够建立自己对这个集团的控制。

在实現貝文建議的談判过程中，美国政府通过談判参加国，竭力使这

---

③ 到1948年初，在德境西方占領区，实际上已破坏了波茨坦决議关于非軍国主义化和非納粹化、关于政治生活民主化以及关于經济非卡特尔化和消灭德国侵略壟断組織的規定的执行。美国和英国占領区已融合为单独的构成物——享有"国家"某些外部特征的双占区；并已达成了关于法国占領区并入双占区的协議。所有三个占領区都包括在"馬歇尔計划"的体系之中。从1947年底起，西方国家就在准备召开单独会議来确定分裂德国和把西德变为西方国家反苏反社会主义政策的主要跳板和基地的方針。1948年2月23日到3月6日，这个会議在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代表参加下在倫敦召开了。会議上通过的决議結束了西方国家在德国問題上同苏联的任何合作，造成了四国对德管制委員会的破坏，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并随后为德国軍国主义的复活鋪平了道路。（参見《Правда о политике западных держав в германском вопросе》, стр. 21—23）

④ 丹麦和瑞典政府分别在1948年1月30日和2月4日直接声明，它們不参加实施貝文建議的談判。挪威政府在1948年2月7日作了意思相同但形式上較为慎重的声明。接着，在1948年2月8日到10日，斯堪的納維亚三国首相——赫托夫（丹麦）、埃兰德（瑞典）和基哈德森（挪威）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議，討論了当时的局势，但他們只限于主張发展北欧国家的傳統經济合作。（《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48, p. 9117.）

个新集团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它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被用作"实力地位"政策的工具，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正是为了这种目的，美国国务卿乔治·馬歇尔在談判的第一阶段就"建議"談判参加国不要以敦刻尔克条約，而要以美洲国家間共同防御条約作为建立新集团的条約楷模，与此相适应，把軍事义务列入条約的規定不要針对德国侵略再起的情况，而要針对"任何侵略"发生的情况。馬歇尔的这个"建議"为談判参加国所接受。

英国、法国和比、荷、卢国家关于建立五国軍事集团的談判結果，在1948年3月17日在布魯塞尔会議上签訂一个經济、社会和文化合作和集体自卫的条約，这个条約通常叫作西欧联盟布魯塞尔条約①。

布魯塞尔条約的特点是締約国根据馬歇尔"建議"承担的軍事义务的广泛性和执行这些义务的机械性。条約序言中关于德国可能再度执行侵略政策的表面言詞实际上并沒有改变西欧联盟的性质。事情在于建立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集团。布魯塞尔条約的整个結构，包括締約国的事先諮詢以及締約国軍事义务执行上的机械性，正是服从于这种目的的。从这种意义上可以理解到，为什么这个条約直接地和无条件地要求一切締約国对于卷入軍事行动的任何一国立即給予"一切軍事的和其他的援助和协助"。

必須指出，西方国家的任何其他多边軍事条約，不管是以前締結的美洲国家間互助条約，还是后来签訂的北大西洋公約、东南亚"防务"条約、巴格达条約，都不像布魯塞尔条約規定着軍事义务执行上这样高度的机械性。

締結布魯塞尔条約和在这个条約基础上建立特殊排他性的西欧国家軍事集团——西欧联盟，是違反英国和法国根据双边互助条約对苏联所承担的义务的。这种情况当然并不因为布魯塞尔条約第六条作了一种笨拙的嚐試，企图把英国和法国根据它們同苏

① 条約全文見《国际条約集(1948—1949)》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48頁。

联的互助条約所承担的义务同它們作为反苏西欧联盟成員国的义务"調和起来"而有所改变。

自然，布魯塞尔軍事条約的締結对苏联政府提出了一个問題：以后怎样处理苏英和苏法互助条約。苏联政府提請过有关国家和世界輿論注意締結布魯塞尔条約和建立西欧联盟的明显非和平目的和危險后果。

还在布魯塞尔条約签訂以前，苏联政府在1948年3月6日給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照会中就指出，英国的建立西欧联盟計划是同"馬歇尔計划"密切不可分的，它将导致欧洲的政治分裂①。

以后不久，在1949年1月29日，苏联政府在苏联外交部关于北大西洋公約的声明中对西欧联盟作了更詳細的估計②。声明十分清楚地表明，締結布魯塞尔条約和建立西欧联盟证明英国、法国和其他締約国放棄了雅尔塔会議和波茨坦会議的政治方針，证明这些国家轉到了"一种对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非常危險的新政策，其目的就在于确立他們对欧洲其他各国人民的統治，甚至于不惜为了这些目的，而利用自战爭結束以来一直处在他們支配之下的、昨天的侵略者"。

声明强調指出，与反侵略的苏英和苏法互助条約不同，"西方五国的軍事同盟对德国漫不經心，而只是想法来利用他們所組織的西方国家集团以反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曾是他們盟邦的那些国家"。声明还指出，布魯塞尔条約是帝国主义者为了鎮压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种勾結。

以后的整个事态发展证明，苏联政府对布魯塞尔条約的这种估計是有根据的。

---

① 参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8 год». ч. I, стр 145—148。

② 参見《欧洲安全和德国問題文件汇編》第1集世界知識社1956年版第87頁。

而西方联盟的最初实际步驟表明，这是一个威胁欧洲和平的軍事集团。

1948年4月17日，西欧联盟諮詢理事会(布魯塞尔条約第七条規定为这个集团主要政治机关)在巴黎举行第一次会議①。会上主要是討論組織問題，可是这些問題按其性质具有明显的軍事色彩。例如，会議的最重要决議是建立由締約国的陆軍部长組成的西欧联盟防务委員会。西欧联盟的軍事机构由此开始形成。在1948年4月30日在倫敦举行的防务委員会第一次会議上，英国、法国和比、荷、卢国家的陆軍部长即已着手制定西欧联盟总的战略計划。1948年7月19—20日在海牙举行的西欧联盟諮詢理事会第二次会議贊同了防务委員会的这种活动方向。

1948年9月28日，防务委員会第二次会議决定建立常設"西欧联盟防务組織"("Western Union Defence Organization-Uniforce")，即布魯塞尔条約五个締約国的联合軍事总部，地址設在法国的楓丹白露；同时决定任命英国蒙哥馬利元帅为西欧联盟参謀长委員会常任軍事主席，任命法国拉特尔·德·塔西尼将軍为陆軍总司令，任命英国空軍副元帅詹姆斯·罗勃爵士为空軍总司令，任命法国海軍中将罗貝尔·若札尔为西欧联盟海軍司令。这些軍事領导人随后都成立了自己的总部，并附設各种部門和单位，配备有締約国的軍官(主要是英国和法国的軍官)。西欧联盟的軍事机构开始像雨后春笋般地增加。

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在誰都沒有威胁西欧国家的时候，許多国家的集团建立了联合軍事侵略机构，这种机构的存在本身不可能不毒化国际气氛。

西欧联盟的联合軍事机构的措施表明，这个集团的領导集团展开了直接的备战活动。从这时起，西欧开始变为軍事陣营。后来在美国参加和領导下的大西洋集团的建立，使西方国家的备战活动具有了和平时期条件下不曾有过的規模。

---

① 西欧联盟諮詢理事会会議一直是在外交部长一級举行。

五、美国和西欧联盟。范登堡决議

在布魯塞尔条約签訂后的头几个月已經很清楚，西欧联盟只是建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軍事集团的中間阶梯①。当时西欧联盟的任何一个参加国(包括英国在內)都沒有自己的原子武器，誰都沒有得到美国的原子武器，誰都沒有必要的財政經济手段来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英国想充当西欧联盟盟主的角色，但不能解决这个联盟的基本軍事任务。只有美国可以做到这一点②。

英国的伙伴也表現不願意承认英国是西欧的軍事和政治首領。

法国和荷比卢国家的統治集团宁願直接同美国打交道，把美国当作西方的主导国家，而不願通过英国的中介。法国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还在1948年3月4日，在布魯塞尔会議开幕的那一天，就給美国国务卿馬歇尔打了一个电报，內称："老世界和新世界之間在政治方面和尽快在軍事方面加强合作的时刻到来了"③。換句話說，法国政府对于限制在西欧范圍內的軍事集团迅速轉到美国直接参加的更广泛軍事集团表示了兴趣。

可是英国領导集团不打算輕易放棄保证英国充当西欧联盟盟主、也就是西欧首領的計划。剛剛相反，他們指望利用美国壟断組織对共同加强帝国主义軍事陣营的兴趣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想迫使美国"为英国工作"，給予西欧联盟以軍事援助和"原子保证"。

---

① 参見本书第十四章。

② 后来，美国政府自己帶着一种对英国幸災乐禍的心情确认了这一点。美国国务院在《我們建設和平》的声明中說："根据这个条約(指布魯塞尔条約。——作者)所承担的义务大有益于加强西欧的实力和統一的前景。可是涉及防务的規定只是部分有效的……。其原因是布魯塞尔条約締結国的联合資源現在不可能保证足够的軍事力量……。为了完全实現这个条約作为和平工具(！)的潜在可能性，必須从外部給予援助。"(《The New York Times》15.I.1949)

③ *Z. Ismay.* NATO. The First Five Years. 1949—1954, Paris, 1954, p.8.

1948年3月貝文給美国国务卿馬歇尔的信件正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这封信陈述了英国政府希望“尽快开始討論北大西洋区域安全問題”的要求。在美国国防部长福萊斯特的日記中，英国政府的这封信被說成是“外交大臣貝文对‘大西洋安全計划’的建議，即这种安全必須建立在五国布魯塞尔条約的基础上”①。

美国政府进行了自己的賭博。布魯塞尔条約签訂后不到一个月，1948年4月11日，国务卿馬歇尔和他的副手罗維特同参議院首領范登堡和康納利举行了第一次会議来审查“北大西洋区域防务”的問題，这特别是同上面提到的、皮杜尔和貝文希望美国政府給西欧联盟以“保证”和軍事援助的要求相联系的。第一次会議后紧接着又举行了几次会議。

这些会議的結果是制定了“关于美国参加区域性协定和其他集体协定”的决議，这个决議于1948年6月11日由美国参議院通过，后来以“范登堡决議”而聞名②。

“范登堡决議”的通过实际上意味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完全放棄了美国在和平时期不参加美洲大陆外的任何軍事联盟的傳統政策。他們这样做，是指望用建立帝国主义軍事集团体系的办法，为执行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地位”政策，为最終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保证更有利的条件。

“范登堡决議”为美国領导集团拼凑帝国主义軍事集团体系提出了“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在决議第一、第五和第六条中所闡述的“最高綱領”規定把联合国組織变为美国領导的机构。为此在决議中指出，美国政府必須爭取取消安全理事会中的否决权，即在由于危及和平的爭端和情势而作出决定时，在接受国家加入联合国时（第一条），在通过尽快建立联合国武装部队时（第五条第一部分）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对联合国宪章作相应

① 《The Forrestal Diaries》, p.422.

②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407—408.

修改时(第六条)的大国一致的原则。不难看出,这样"改組"联合国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美国在联合国拥有机械的多数,就可以利用联合国的武装部队作为侵略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

美国領导集团当然明白,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实現这样的綱領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們在"范登堡决議"里还規定了一个綱領,参議員范登堡本人于1948年6月11日在他的参議院演說中把它叫做"在联合国范圍以內……但在否决权影响范圍以外的……美国实际合作計划"①。在这里,关于联合国宪章范圍的說法当然是无稽之談,因为整个"范登堡决議"彻头彻尾地違反联合国宪章;可是美国力图"在否决权范圍以外"行动的招供却是足够彰明較著的。

当然,只有規避联合国宪章,破坏它的最重要原則,即在解决威胁和平和安全的国际問題时大国一致的原則,侵略性軍事集团才能拼凑起来。在"范登堡决議"的第二、第三和第四条中,建立这样的集团被宣布为美国政府的目的。第二条讲发展"关于单独和集体自卫的区域性协定和其他集体协定",第三条讲"美国通过立宪的方法参加这种区域性协定和其他集体协定",第四条讲"它(美国政府。——作者)决定利用单独和集体自卫的权利"。这些經过愼重斟酌的条文清楚地暴露了在联合国之外和規避联合国宪章建立完整的軍事集团体系来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計划。

拼凑美国卵翼下的欧洲軍事集团的实际重要步驟是1948年7月6日美国政府同西欧联盟成員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以及加拿大就建立大西洋集团进入秘密談判②。"范登堡决議"的美国評論人之一就这一点指出:"在我們的民族史上很少从这样小的鸡蛋这样快地孵出这样大的雛鸡"③。

1948年年中,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着手建立北大西洋联盟——

①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410.

② 在华盛頓进行的这些談判中,美国的代表是副国务卿罗維特,加拿大的代表是副外长皮尔逊,英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代表是它們駐华盛頓的大使,而卢森堡的代表是它駐华盛頓的公使。

③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411.

整个帝国主义軍事集团体系的核心。

第二十五章

北大西洋集团——帝国主义扩張和侵略的主要工具

一、北大西洋集团建立前夕

美国、加拿大和西欧联盟五个参加国政府之間的华盛頓談判奠定了主要帝国主义軍事集团——北大西洋联盟——的軍事、政治和組織基础，美洲和欧洲的所有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联合在这个集团的范圍內。

北大西洋集团的組織者并不隐瞞，美国建立这个集团的軍事目的首先在于利用西欧作为准备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爭的主要軍事跳板①。例如杜魯門政府的空軍部长托馬斯·芬勒特在他的《实力和政策》一书中公开写道："我們需要在北大西洋联盟成員国的領土上建立基地，以便为我們的战略空軍保证行动的可能性"②。

---

① 《大西洋集团》的思想从1943年开始就在美国的某些集团中酝釀。例如，这种思想表述在李普曼的书中（*W. Lippman.* U. 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Boston, 1943; *W. Lippman.* U. S. War Aims. Boston 1944）。李普曼那时已經提出了成为北大西洋联盟政治和軍事主張的基础的三个基本思想：一、"在德国……停止作为欧洲大陆上的大国存在后，我們的主要任务必須是，維持反对俄国的欧洲秩序"（«U. S. Foreign Policy», p. 146）。二、"命运决定美国在西方文明中占中心的……地位。美国的基本必要任务正是从此产生的"（«U. S. War Aims», p. 208）。三、"老世界的大国集团按力量說超过美国。这迫使考虑同老世界的許多国家联合的必要性，考虑同这些国家建立可靠的联盟"。李普曼采用了"大西洋集团"这个詞語来表現基于这些"思想"的特定概念。

② *Th. K.Finletter.* Power and Policy. U. S.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Hydrogen Age. New York, 1954, p. 37.

当然，美国同西欧国家的軍事联盟对华盛頓的好处比对它的伙伴大得多，因此，它們之間的勾結不是平等的。所以，締結这个軍事联盟要求美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压力。美国政府并沒有忘記为此利用西欧国家經过“馬歇尔計划”这时已經陷入的經济依附状况。无怪乎那位芬勒特在他的书里写道：“如果起先沒有馬歇尔計划出現，北大西洋联盟决不可能誕生”①。

但是在北大西洋联盟范圍內同美国进行軍事政治勾結，也是由西欧国家統治集团的自私利益所决定的。这种勾結有助于西欧国家的帝国主义資产阶級对本国的民主运动和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展开进攻。

当然，相互的利益并不排斥对于参加北大西洋联盟的条件存在重大分歧。这些分歧发生在几个方面。

在談判过程中，最大的爭論問題之一是美国对西欧国家的軍事义务执行上的机械性問題，也就是說，美国是不以它的意願为轉移負有义务站在北大西洋联盟的欧洲盟国一边参加作战呢，还是可以根据情况作出它认为必要的决定。

在美国的欧洲伙伴看来，这是一个重要問題。因为西欧国家根据条約所負的义务具有十分广泛的性质，实际上在軍事方面和政治方面把这些国家同美国紧紧地系在一起。对他們来說重要的是相信美国不会把他們的国家卷入任何对外冒險、尤其是軍事冒險后，把自己的伙伴抛在一旁，听任命运摆布。所以，参加談判的西欧国家爭取相互执行軍事义务具有最大限度的机械性，不让美国有可能逃避这些义务的执行。

与此相反，美国政府决不打算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用死結把美国同它的欧洲伙伴系在一起。

① *Th. K. Finletter.* Power and Policy. U. S. Foreign Policy and Military Power in the Hydrogen Age. New York, 1954, p. 41.

在联盟执行軍事义务具有机械性的情况下，美国也可能碰到由于北大西洋联盟中任何伙伴的冒險行动而被卷入战爭的威胁；并且在美国統治集团沒有作好战爭准备的条件下，这种胁威也可能发生。

以參議院塔夫特为首的、有势力的美国"新孤立主义者"集团也断然反对拟議中的美国对西欧国家的联盟在执行軍事义务上带有任何机械性。杜魯門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必須考虑"新孤立主义者"集团的这种立場。

在华盛頓談判的过程中，西欧国家对联盟执行軍事义务的机械程度問題基本上是站在一条战綫上对付美国的，只有加拿大支持美国；而在其他問題的爭論中，力量的对比就有些不同了。在美国和英国之間发生了一系列的分歧，并且法国和參加談判的某些其他国家多半傾向华盛頓的立場。

美国和英国之間的分歧主要涉及两个問題：西欧联盟在北大西洋集团范圍內的作用和北大西洋集团參加国的組成。

在建立北大西洋集团的談判过程中，英国政府力图达成决議，保证英国領导下的西欧联盟成为更广泛的新軍事集团的最重要部分之一。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政府为最大限度地活跃西欧联盟的活动作了許多努力。

1948年9月，在防务委員会的会議上成立了西欧联盟的常設軍事机构，任命了以蒙哥馬利元帅为首的联盟最高軍事領导人。在通过这些决定的防务委員会会議上还討論了西欧联盟的所謂"战略理論"和建軍計划。

1948年10月25日到26日在巴黎举行的西欧联盟諮詢理事会第三次会議批准了防务委員会的軍事任命，同意了这个委員会制定的軍事綱領。这次会議还討論了华盛頓談判的进程，并决定同意"締結北大西洋防务公約的思想和在这方面应当采取的当前步驟"。

1949年1月27日到28日在倫敦举行的西欧联盟諮詢理事会第四次会議就总的軍事和对外政策問題交換了意見，并通过了成立"欧洲委員会"的决議。

1949年3月14日到15日，当締結北大西洋公約的談判已經快要結束的时候，西欧联盟諮詢理事会又在倫敦举行了一次会議，重新审查軍事綱領和討論建立北大西洋集团的談判进程。

这些活动是要造成一种印象，即西欧联盟不仅沒有衰落，沒有退居次要地位，反而在加强，在欧洲事务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然而美国政府不打算支持英国把西欧联盟变成北大西洋集团基本核心的路綫。它坚决彻底地是要直接吞沒西欧联盟和把美国保护下的北大西洋联盟提到第一位。美国的这种路綫最終占了上風。

在北大西洋联盟参加国的組成問題上，英国也不得不向美国让步。英国的最初观点是，北大西洋联盟参加国的范圍必須限于进行华盛頓談判的七个国家，即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

英国統治集团认为，参加国的这个范圍的任何扩大都会降低英国在新的集团中作为西欧联盟强国的作用。并且某些西欧国家留在北大西洋联盟之外，英国就有較大的可能保持它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如果它們参加北大西洋联盟，就会立刻落入美国的軍事和政治控制之下。

可是美国政府最关心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北大西洋联盟参加国的組成，在参加国范圍更加广泛的情况下，第一，美国可以得到在欧洲布置美国軍事基地的补充可能性；第二，可以得到数量大的人力为自己支配；第三，可以扩大它在西欧的軍事和政治控制的范圍；第四，可以利用西欧国家爭取美国軍事援助的竞爭和斗爭以达到自己的利益。

华盛頓从这些考虑出发，建議除了就北大西洋联盟問題进行談判的七国以外，还吸收意大利、瑞典、挪威、丹麦、冰島、希腊、土耳其、葡萄牙和爱尔兰参加北大西洋联盟。英国对此表示了反对。接着进行了頑强的爭論，最后决定暫时不向希腊和土耳其提出参加北大西洋联盟的問題，但考虑到意大利、斯堪的納維亚国家、冰島、葡萄牙和爱尔兰的特殊重要战略意义，决定采取措施吸收它們参加。1948年12月就这一点达成了最終协議，此后通过外交途徑同这些国家开始了談判。

被决定吸收参加北大西洋联盟的国家的反映是各不相同的。

意大利政府立刻表示了同意，因为还在1948年11月阿尔契德·加斯貝利总理和卡罗·斯福尔查外长就主动地对意大利参加这个集团的可能

性进行了試探。意大利統治集团指望，意大利加入北大西洋联盟可以使它开始对国内的民主力量进攻，此外，可以使它重新获得它在許多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战前地位。①

葡萄牙政府也对参加北大西洋联盟的"邀請"作出了迅速的肯定答复。薩拉查法西斯政权认为这是加强自己的地位的机会。

爱尔兰政府的反映則不同。爱尔兰政府贊同北大西洋联盟的軍事和政治目的，可是考虑到它同英国关于北爱尔兰的冲突，而拒絕加入这个联盟。1949年2月14日，爱尔兰外交部长麦克布賴德的正式声明指出了这一点。

在斯堪的納維亚国家中，冰島立刻同意参加北大西洋联盟。挪威、丹麦和瑞典从1948年3月起就建立所謂的"斯堪的納維亚防御联盟"进行了談判。在談判过程中发現了根本分歧。挪威政府傾向于同西方国家进行軍事"合作"，而瑞典却力图在比較中立的基础上建立"斯堪的納維亚集团"。

像1949年2月9日埃兰德首相在向議会作的政府声明中所讲的，瑞典主張三个斯堪的納維亚国家締結为期十年的"防御公約"，締約国"締結这个公約后，就沒有权利参加同其他任何国家的軍事联盟"②。

这个建議沒有得到北大西洋集团組織者的同情。如挪威外交大臣兰基1949年2月24日在議会所說的，美国和英国政府明确表示，"独立的斯堪的納維亚防御联盟不可能指望从西方得到任何政治和軍事的支持"。

挪威和丹麦政府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的路綫。1949年1月29—30日瑞典、挪威和丹麦的首相在奥斯陆举行第三次会議后，建立"斯堪的納維亚防御联盟"的談判就停止了。

---

① 意大利政府决定意大利参加北大西洋集团是直接違反1947年的和約的。苏联政府在1949年7月20日的照会中提請意大利政府注意这种情况以及由于它参加侵略性北大西洋集团对破坏和約所負的責任。

② 这个問題在下列会議上作了討論：1948年9月8—9日斯堪的納維亚三国外交大臣斯德哥尔摩会議，1948年10月15日三国国防大臣斯德哥尔摩会議，1948年11月17日"斯堪的納維亚防务委員会"会議；挪威、丹麦和瑞典政府首脑1949年1月5—6日卡耳斯塔德会議，1949年1月22—24日克里斯田堡会議和1949年1月29—30日奥斯陆会議。

接着，瑞典政府宣布它仍然持不参加軍事集团的立場，而挪威和丹麦政府向美国表示同意参加北大西洋集团。在这方面，挪威政府承担了特殊的責任，因为挪威在当时是建立北大西洋集团的国家中同苏联有直接边界綫的唯一国家。1949年2月5日苏联政府建議締結苏挪互不侵犯条約①。1949年3月3日挪威政府拒絕了这个建議，最后决定参加北大西洋集团。

1949年2月底到3月初，有十二个国家确定坚决走上参加北大西洋集团道路。这就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挪威、丹麦、冰島和葡萄牙。

1949年初，制定北大西洋公約草案的工作已經結束。1949年1月14日，美国国务院为締結这个公約准备輿論，发表了一个蠱惑人的大吹大擂声明："我們建設和平。北大西洋区域的集体安全"②。这个声明中为建立北大西洋集团辯护的基本"論据"随后重复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国家領导人的一切声明中，并規定着整整許多年的西方宣傳方針。

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我們建設和平"为建立北大西洋集团提出了四个主要論据或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仿佛西方国家的安全受到"潜在侵略者"的威胁，并暗示这个侵略者是苏联。当然，对这种明明是捏造的理由沒有举出、并且不可能举出任何令人信服的根据。

另一个"理由"是，仿佛西方国家的安全受到苏联的威胁，而它們不可能指望通过联合国来消除这种威胁，因为苏联会利用"搗乱"的方法来瘫痪联合国的活动(这里指的是苏联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在許多情况下利用常任理事一致的准則)。

为建立北大西洋集团辯护的其他两个"理由"是：西方国家采取这种步驟是为了寻找"維护和平的补充手段"以及北大西洋公約并不違背联合国宪章。这些"理由"同样是虛假的。

① 参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1949 год》, стр. 72—76。

② 《The New York Times》, 15.I. 1949.

1949年1月29日苏联外交部关于北大西洋公約的声明詳細分析和揭露了这些"論据"的謊謬性和虛假性①。

声明指出，"实际上，北大西洋公約是少数国家的侵略意图的最深远表現，首先是美国和英国統治集团的意图的表現，它們想在这种或那种程度上使順从它們或直接依附它們的其他国家政府的政策符合于实現它們的这种目的"。声明强調指出，北大西洋联盟不是防御和加强安全的工具，而是"强行建立英美世界統治"的工具。如声明所指出的，准备締結北大西洋公約是和建立美国軍事基地和跳板的世界体系这个总方針直接相联系的，是和在許多外国的領土上、不仅是原先的敌国而且是联合国成員国的領土上保持美国軍队直接相联系的。

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完全支持这个声明对北大西洋联盟所作的評价，这个軍事集团对它們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国际工人运动的先进队伍——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反对拼凑北大西洋联盟。1949年2月底到3月初，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比利时、荷兰和其他許多国家的共产党都发表声明，譴責北大西洋集团組織者的危險政策方針。它們强調指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級和劳动人民将永远不同苏联打仗。

各国共产党号召本国人民展开反对締結北大西洋公約的群众斗爭。这种斗爭在意大利、法国和丹麦是特别紧張的。在意大利，共产党人是同社会党人一道行动的；在丹麦，除了共产党人以外，激进党人和一部分"公平党"的代表也反对自己的国家参加北大西洋集团。

可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統治集团拒絕听取进步輿論界的声音，拒絕改变它們建立北大西洋集团的計划。1949年3月18

① 参看《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стр. 46—71.

日北大西洋公約草案公布；而在1949年4月4日，十二国的外交部长就在华盛頓签訂了这个公約。

二、北大西洋公約——美国帝国主义集团侵略政策的工具

北大西洋公約具有"防御"联盟协定的形式①。公約的序言和所有涉及締約国軍事义务的条文都只是談"防御"、"自卫"、"恢复和維持安全"的措施、反对"武装进攻"的措施等等。可是这种詞句上的"防御"外衣只是证明北大西洋公約創建者的口是心非。这个公約为締約国規定的实际軍事义务是从侵略目的出发的。

像在美洲国家間互助条約和西欧联盟布魯塞尔条約中一样，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条所表述的义务故意賦予广泛的性质。这一条款写道："各締約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締約国之武装攻击，应視为对締約国全体之攻击。因此，締約国同意如此种武装攻击发生，每一締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承认之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之行使，应单独幷会同其他締約国采取視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幷維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此等武装攻击及因此而采取之一切措施，均应立即呈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安全理事会采取恢复幷維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措施时，此项措施应即終止。"

因为无論在当时或后来，北大西洋公約締約国中的任何一国都沒有受到誰的侵略威胁，所以很清楚，軍事义务具有广泛性质是为了便于在适当的时刻利用这些义务来发动侵略战爭。

美国參議員塔夫特、当时美国壟断資产阶級"新孤立主义者"的首領指出了这一点。他从"新孤立主义者"的立場批評北大西洋公約时，揭示了由于公約軍事义务的广泛性对締約国所产生的深刻危險。塔夫特說："如果

① 公約文本参見：《国际条約集(1948—1949年)》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191頁。

締約国之一挑起攻击，即使是在借助于我們不能贊同的行动而挑起攻击的情况下，我們仍将……負有义务来保卫它。"①塔夫特的这些話实质上表明了可能利用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条的"防御"义务来发动侵略战爭的全部不难看出的实质：任何一个締約国，如美国，都可能通过通常的挑衅，把事情說成是别国进攻它，开始按"自卫"程序采取軍事行动，把自己的条約伙伴卷入这种行动，从而发动世界大战。

同一位參議員塔夫特得出了結論，如他在1949年7月11日在參議院的演說中所說的，北大西洋公約"将鼓舞世界上的战爭，而不是鼓舞和平"②。塔夫特还指出，如果苏联认为北大西洋集团在苏联国境周圍建立軍事基地体系是准备对它进攻，那么，苏联是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这样說的。

十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敦刻尔克条約，甚至也不同于布魯塞尔条約，北大西洋公約沒有包含防止德国侵略再起的詞句，即使是簡单的詞句也沒有。

布魯塞尔条約还有这样的詞句，而在布魯塞尔条約签訂后的一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領导集团在德国問題上就离开波茨坦政策更远了。它們力图更快地完成德国的分裂和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4月8日，对西德的占領法規宣布生效；而在1949年5月，美国、英国和法国駐德軍政长官就批准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宪法。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十分負責的人士这时已經初步討論了复活西德軍国主义的計划，酝釀了把复活起来的德国国防軍納入北大西洋集团作为这个集团在欧洲的武装力量的基本核心这种思想。在这种条件下，建立这个新集团的国家的政府即使为了掩盖也不可能談防止德国侵略再起的問題了。北大西洋公約的侵略性质从而更加清楚地暴露出来。

北大西洋公約的侵略性质从第三条来看也是清楚的，这一条說："为更有效地达成本条約之目标起見，締約国得个别或集体以不断的而有效的自助及互助方法，維持幷发展其单独及集体抵抗

①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 XCV, № 123, p. 9385.

② 同上书第9383頁。

武装攻击之能力。”如果从这一条揭去作掩护的“防御”术語的画皮，就会发現它的眞正意思是参加国負有义务展开軍备竞賽。

从北大西洋公約第十条产生的这个联盟的特殊排他性再一次证明，北大西洋联盟是“实力地位”政策的工具，是侵略的工具。这一条說：“欧洲任何其他国家，凡能发揚本公約原則，幷对北大西洋区域安全有所貢献者，經締約各国之一致同意，得邀請其加入本公約。”

因此，事先已經規定，北大西洋公約新的参加国将由原先的成員国从願意追随它們的侵略方針的欧洲国家中仔細地加以挑选，幷且即使是接受这样的国家也得經一切締約国的一致同意。西欧联盟从最初起也是排他性的集团，可是在这个联盟中还規定着稍許不同的、比較“自由的”接受新成員的制度①。

北大西洋公約是以反对苏联为目的的，从最初起就彰明較著地、不可容忍地違反苏英和苏法互助条約，同样違反規定着大国对建立和加强战后和平的基本問題的总政策方針的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

所有这一切使苏联政府有充分根据在1949年3月31日的备忘录中向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加拿大政府声明：“北大西洋公約同参加国的自卫目的沒有任何共同之处，因为誰都沒有威胁它們，誰都沒有打算进攻它們。恰恰相反，这个公約具有明显的侵略性，是以反对苏联为目的的；連公約参加国的官方代表在他們的公开言論中都不隐諱这一点”。备忘录还指出：“北大西洋公約不仅不会促进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加强（这是联合国所

① 西欧联盟布魯塞尔条約第九条說：“在締約各国和被邀請国同意的条件下，締約各国得共同邀請任何其他国家加入本条約”。在这里至少規定，被邀請加入西欧联盟的国家可以就它参加这个集团的条件进行談判。北大西洋公約的原文連这种保留条件都沒有。

有成員国的义务），而且直接違反联合国宪章的原則和目的，导致联合国組織的破坏”①。

北大西洋集团不仅是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地位”政策的工具，而且是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殖民主义者集团，是反对全世界民主运动的壟断資产阶級联盟。

第一，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葡萄牙等殖民主义国家成了北大西洋集团的成員。美国參議員梅隆当时指出，“毫无疑問，北大西洋公約将保证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体系不受侵犯”②。

第二，北大西洋公約是在美国麦卡錫主义和反共歇斯底里囂張以及西欧各国一切反动势力猖獗的气氛中締結的。

第三，随着北大西洋公約的締結，在整个西欧展开了資产阶級对劳动人民在反法西斯主义的严酷斗爭中取得的政治和經济成就的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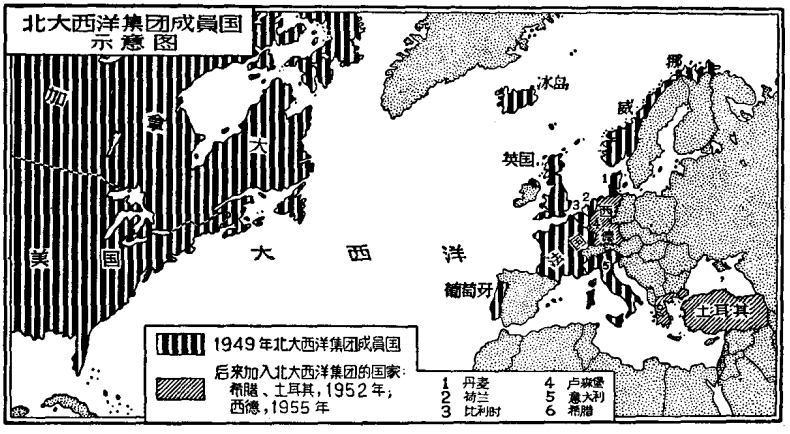
北大西洋公約的締結奠定了帝国主义軍事集团体系的基础。后来，随着其他帝国主义軍事集团（东南亚条約組織、中央条約組織、西欧联盟）的建立，这种体系扩大了，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包括在它的范圍之內，可是北大西洋集团一直是这种体系的中心。

北大西洋公約的締結导致欧洲和全世界紧張局势的极端尖銳化，导致軍备竞賽的展开，导致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的尖銳化。

同时，北大西洋集团的建立标志着战后头五年形成的西方国家陣营內部力量分布的巩固。美国更加加强了它作为“西方首領”的地位。而英国、尤其是法国則轉到美国小伙伴的地位。像意大利、比利时、挪威和丹麦这样一些国家則处于更加依附美国的地位。《紐約时报》的著名观察家苏茲貝格承认：“认为我們沒有次等同盟国，难道不是愚蠢的嗎？……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认，我們有头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стр.89—94.

②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49年, №4, p. 65.



等，次等和第三等的同盟国”①。

北大西洋公約本身包含着实质上把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国置于不同地位的規定。

这首先涉及規定参加国执行軍事义务的机械程度的第五条。美国不顾西欧国家的要求，只同意这一条的規定使自己在执行对欧洲参加国的軍事义务方面实际上保有行动自由。

北大西洋公約的締結导致在欧洲参加国的領土上建立整批美国的或“共同的”軍事基地、据点等等，而在美国的領土上沒有建立、也不打算建立任何欧洲的或“共同的”軍事基地。在这种条件下，北大西洋集团欧洲参加国的处境是，第五条規定的义务对它們具有执行上的机械性：它們即使想規避也不能規避义务的执行；而对于美国来說，这种情况可就不可能发生。

西欧国家把自己的領土、人力和物力置于美国的軍事控制之下，把它們参加战爭問題的决定权交給美国統治集团的手里，而换来的却是显然沒有价值的美国“保证”。

在北大西洋公約中，关于美国軍事援助的問題也是在显然不利于西欧国家的条件下解决的。涉及这个問題的第三条包含着在加强武装方面“互

① *C. L. Sulzberger*. What's Wrong with U. 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59, p. 142.

相援助”的規定，換句話說，包含着美国給它的欧洲盟国以軍事援助的义务。英国、法国、意大利、挪威和参加北大西洋集团的其他欧洲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同意，它們只能按自己对軍备竞賽的貢献使美国政府感到滿意的情况和程度，来取得美国的軍事援助。如同第五条是美国在这个联盟內的特权地位的法律基础一样，第三条成了美国就軍备竞賽問題对北大西洋集团的伙伴施加最大压力的法律基础。

因此，旨在反对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全世界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北大西洋公約，从最初起同时成了美国在西欧建立軍事和政治統治的工具。

三、北大西洋集团战略主張的制定。美国軍事援助的第一个綱領

北大西洋公約在签字后的四个月零二十天，即1949年8月24日开始生效。苏联和所有国家爱好和平的人士都反对这个对和平事业极端危險的公約。在就北大西洋公約批准問題作斗爭的时期，在西欧許多国家——英国和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挪威和丹麦——举行了群众大会、示威和抗議罢工。

在法国和意大利的議会，和值得注意的在美国参議院①，北大西洋公約的批准受到最大的抵制。

可是美国和北大西洋集团西欧参加国的領导集团遵循“冷战”方針，强制本国議会批准了这个公約。

当西欧国家的政府强制議会通过北大西洋公約的时候，美国軍国主义者已开始准备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机器。

---

① 至于美国参議院，在这里反对批准北大西洋公約的是相当精干的“新孤立主义者”派。在1949年7月21日就这个問題进行表决时，贊成批准的参議員是八十二人（民主党五十人、共和党三十二人），反对批准的是十三人（共和党十一人，民主党二人）。

1949 年 9 月 17 日，北大西洋联盟理事会在华盛頓举行第一次会議。[①] 这次会議确认由所有参加国外交部长組成的理事会为北大西洋集团的主要机关。在北大西洋集团以后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集团的总政策方針的基本問題正是在理事会中討論的，长远的軍事計划和其他一切机关的具体活动方向也正是在理事会中确定的。当时决定理事会会議一年至少举行一次。实际上，理事会会議一年通常举行两次，而在北大西洋集团存在的初期举行得更頻繁(在某些情况下是在大使級举行的)。

在理事会第一次会議上成立了北大西洋集团的中央軍事机关：由所有参加国的国防部长組成的防务委員会、由所有参加国的总参謀长組成的軍事委員会、由美英法的軍事代表組成的軍事委員会常設委員会。

防务委員会負責准备关于增加武装力量和装备以及关于战略計划的建議。

軍事委員会負責对这些建議作軍事技术上的研究。軍事委員会常設委員会的任务是，“协調和統一”为北大西洋集团各个行动范圍区拟定的“防务計划”，向軍事委員会提供相应的建議草案以便提到防务委員会和理事会討論。常設委員会的地址設在华盛頓。

后来，关于北大西洋集团战略規划的全部工作的重心集中到了这个集团的二等成員国沒有代表参加的軍事委員会常設委員会(五角大楼从来不打算向它們介紹自己的战略計划)。在这种情况下，軍事委員会、甚至防务委員会都成了給决議草案盖章的机关，而决議草案是由美国将軍事先在常設委員会的范圍內同英国人和法国人进行某些磋商后制作出来的。北大西洋集团的“一級”伙伴不容許比較弱小的成員进入这个战略“厨房”，这在当时已經引起它們的不滿[②]。

在北大西洋联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議上还成立了这个集团的地区軍事

---

① 北大西洋联盟理事会是根据北大西洋公約第九条設立的。这一条指出，“締約各国应各派代表組織一理事会，以考虑有关实施本公約之事宜。理事会之組織，須能使其能随时迅速集会”。

机关，这就是所謂的“区域設計小組”。在这次会議上决定成立五个这样的小組：北欧区域設計小組（丹麦、挪威、英国）、西欧区域設計小組（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南欧及西地中海区域設計小組③（英国、法国、意大利）、北大西洋区域設計小組（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葡萄牙、冰島）、美国和加拿大“区域設計小組”。④

各“区域設計小組”的任务是，就北大西洋集团的相应行动范圍区的事宜为軍事委員会常設委員会准备建議材料和建議草案。实际上，这是后来的各个联合司令部的萌芽，不过暫且还沒有把任何軍队交給它們管轄。

北大西洋联盟理事会第一次会議的参加者原則上商妥了成立軍事生产和供应的管理部門以及关于防务、財政和經济問題的委員会。这两个机关最后在1949年11月18日在华盛頓举行的理事会第二次会議上組成了。

在理事会第一次会議上宣布建立作为这个集团一切軍事和政治机关总和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而在第二次会議上这項工作就完成了。

在那时候，北大西洋集团的大多数机关（除了常設委員会和“区域設計小組”以外）具有委員会的性质，一年召开一两次会議。这些机关的軍事人員和官員是比較少的。可是在后来，北大西洋联盟的机构不断增长，漸漸轉为常設的了。

起初，当北大西洋集团的机构还沒有加强的时候，英国政府继續試图加强西欧联盟及其已經形成的軍事机构在北大西洋集团中的特殊地位。在整个1949年和1950年的一大部分时間內，举行了西欧联盟各种机关的会議，举行了联盟参加国武装力量的联合演习，并在西欧联盟机构范圍內

② 在較后的时期，当北大西洋联盟的所有战略規划开始根据核武器的特点重新审查的时候，常設委員会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下去，因为美国和英国作为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开始在美英双方的基础上規定北大西洋集团的战略，不要法国参加。于是，法国政府也开始对抛开它决定北大西洋联盟战略規划的主要問題表示不滿。

③ 一般称南欧及地中海区域設計小組。——譯者

④ 一般称北美区域設計小組。——譯者

继續研究軍事計划。

1949 年 6 月 17—18 日，西欧联盟諮詢理事会在卢森堡举行第六次会議，重新审查了这个集团的軍事計划。1949 年 6 月 25 日—7月 3 日，在西欧联盟許多成員国的空軍以及駐扎在英国領土上的美国空軍的参加下，在英国举行了空軍演习。1949 年 7 月 4—7 日，在比斯开灣和英吉利海峽举行了西欧联盟海軍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有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軍舰一百多艘）。1949 年 7 月 15 日，西欧联盟参謀长委員会常任軍事主席蒙哥馬利元帅在荷兰皇家軍人协会发表了长篇演說，并且在这个演說中頌揚西欧联盟占了主要地位。在同一天，西欧联盟国家的国防部长在卢森堡举行会議，如所宣布的，会議同意了"五国防务增强的一致計划"。1949 年 10 月 28 日，在法国奥尔良区举行了西欧联盟空軍演习。1949 年 11 月 7 日，西欧联盟諮詢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了第七次会議。1949 年 12 月 21 日，西欧联盟国家在倫敦签訂了关于駐扎在相互領土上的軍事人員地位的协定。最后，1950年 4 月 16—17 日，西欧联盟諮詢理事会在布魯塞尔又举行了一次会議，即第八次会議。

西欧联盟的所有这些措施在涉及純軍事問題方面（进行軍队訓练和演习，規定軍事供应方面的需要等等）的結果，后来为北大西洋集团的机关所利用。至于英国政府加强西欧联盟在北大西洋集团內的特殊地位的意图，最終遭到了完全失敗。

西欧联盟諮詢理事会第七次会議（1949 年 11 月 7 日）的公报已經指出，这次会議"审查了为北大西洋公約的目的运用根据布魯塞尔条約建立的防务机构的問題"。而諮詢理事会第八次会議（1950 年 4 月 16—17 日）在公报中直接写道，它研究了把西欧联盟制定的軍事計划納入"更广泛的北大西洋集团范圍"的問題。

在 1949 年底到 1950 年初，西欧联盟开始丧失它的独立意义。又过了一年，当建立北大西洋集团联合武装力量的問題实际出現的时候，西欧联盟終于陷入"冬眠"。它的一切职能被北大西洋集团夺去，英国政府复活西欧联盟的路綫最終失去任何意义。誠然，几年以后（1954 年底），西欧联盟突然"复苏"，但这一次是为了执行同以前的英国計划沒有任何关系的任

务。在这个时期，西欧联盟所负的任务是对西德在北大西洋集团范圍內重新武装实行所謂的"监督"，实际上是掩盖德国帝国主义侵略軍事机器的重新开动。

与建立北大西洋集团軍事政治机构的基础的同时，北大西洋公約生效后的头几个月被这个集团的各国領导集团利用来制定它的軍事理論或基本战略主張。这个主張在1949年12月1日为防务委員会通过，并在1950年1月6日在北大西洋联盟理事会第三次会議上批准①。

北大西洋集团的著名活动家之一伊斯迈爵士②在1954年写道，"北大西洋理事会在1950年1月通过的战略主張认为，北大西洋联盟武装力量的主要任务在于制止侵略。只有在这种任务的执行不生效力的情况下，这种武装力量才可以用来反对武装攻击"③。这种軍事主張是美国政府大致在同一个时期宣布的"遏制国际共产主义"这一理論的战略等价物，从外表上看它好像是"防御性的"。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不是它的这种外部形式，而是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遏制"的战略主張直接地、明确地規定执行迅速增加北大西洋集团成員国的武装力量这个方針。

当然，当北大西洋公約剛剛生效的时候，这个公約的参加国的軍事預算不能立刻增加几倍。可是，在1950年，北大西洋集团成員国的軍事預算总数已經从一百八十七亿美元增加到二百零四亿美元，即大約增加10%；而在1951年就增加到四百二十二亿美元，即等于1950年水平的206.8%。

扩大軍事預算、經济軍事化、在和平时期兴建軍队、生产各种类型的新武器、制定軍事基地分布計划，这就是北大西洋集团的战

① «Handbuch der NATO», Frankfurt/Main,1957, S. 64, 376.

② 伊斯迈爵士在战爭年代是丘吉尔私人軍事办公室主任，在1952—1957年任北大西洋联盟秘书长。

③ *H. Z. Ismay.* NATO. The First Five Years. 1949—1954, p. 101.

1949—1951年北大西洋集团各成員国軍事开支的增长①

国　　家	貨币和計算单位	1949年	1950年	1951年
美　国……	百万美元	13,580	14,559	33,398
英　国……	百万英鎊	779	849	1,149
法　国……	十亿法郎	479	559	881
加拿大……	百万加元	372	495	1,220
意大利……	十亿里拉	301	353	457
比利时……	百万比法郎	7,653	8,256	13,387
荷　兰……	百万盾	680	901	1,060
挪　威……	百万克罗納	370	357	572
丹　麦……	百万克罗納	360	359	475
葡萄牙……	百万埃士庫多	1,419	1,516	1,553
卢森堡……	百万卢法郎	112	170	264
冰　島* ……				

* 冰島自己沒有武装力量，因此沒有軍事預算。

略主張在1949—1950年已經表現出来的东西。

北大西洋集团的战略主張具体地表現在"劍与盾"这种露骨的軍事侵略理論中，这种理論的主要思想是北大西洋集团的机关在活动初期就制定了的。"劍与盾"的理論实质是，西方国家的軍事集团必須始終拥有核力量形式的"劍"和陆海空軍形式的"盾"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前者用来对"可能出現的敌国"領土給予战略性的打击，后者用来在欧洲战場进行軍事行动以补充主要的战略性打击。同时，"劍"的力量主要由美国保证，而"盾"的力量主要由美国的欧洲伙伴保证。这种侵略理論也就成了北大西洋集团战略計划的基础。

"劍与盾"的理論給美国的伙伴确定了为北大西洋集团的欧洲之"盾"提供"炮灰"的角色。美国参謀长联席会議主席布莱德雷将

① 資料来源：《Handbuch der NATO》, S. 944。

軍在 1949 年 7 月 29 日在众議院外交委員会声称："战略轰炸将是美国的义务……。我們认为，欧洲将提供現有的主要陆軍"①。

1949年 4 月 5 日，北大西洋公約签訂后的第二天，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和卢森堡的政府就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軍事援助的要求。华盛頓很快在原則上作了肯定回答。1949 年 4 月 21 日，杜魯門政府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年撥款十一亿三千万美元給北大西洋集团西欧成員国作軍事援助的法案。这个法案規定，軍事援助将主要以美国軍火供应的形式給予。

在以后的几个月內，美国国会的各种委員会詳細地、同时故意挑剔地审查了北大西洋集团成員国要求軍事援助的声明书以及杜魯門政府关于提供这种援助的法案。在这方面，議員們和政府代表們甚至不太掩盖这种勾結的性质。例如布萊德雷将軍 7 月29日在众議院外交委員会的演說中无耻地暗示，这就是直接收买欧洲的軍队。这位将軍說："大西洋公約欧洲参加国的人口总共有一亿五千多万。如果給他們的士兵以武器，他們就可以保证西欧任何地面防御的基础"②。

在这个法案的討論过程中通过了范登堡一杜勒斯的修正案。这个修正案的意思是，如果某个受援国家执行不符合美国人的政策，美国国会可以像美国总統一样，以两院的簡单多数票在任何时候停止执行軍事援助計划。

10 月 6 日，軍事援助法案由杜魯門总統签字，成为"1949 年防御互助法" (Mutual Defence Assistance Act of 1949)。这个法案給北大西洋集团欧洲成員国的撥款总数規定为十亿美元，比美国政府請求的数字少一亿三千万美元③。

---

①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uly 28, 29, August 1,2,5,8, 1949, p. 71.

② 同上书第 69 頁。

1950 年 1 月27日，美国同北大西洋集团八个欧洲成員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挪威、丹麦和卢森堡——在华盛頓签訂了美国軍事援助双边协定。

这些协定的签訂是北大西洋集团国家展开軍备竞賽和加剧国际紧張局势的新阶段的开始。同时，严格根据“防御互助法”制定的美国軍事援助协定实际上把北大西洋集团西欧成員国的軍事經济和对外政策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

根据这些协定的条件，得到美国軍事援助的国家負有义务仅仅根据北大西洋联盟机关給它們規定的任务使用提供的武器（第二条）；不經美国的同意不得把这种武器轉交和卖給任何人，同样不得把有关这种武器的任何情报告知任何人（第三条和第五条）；以优惠的条件給美国提供战略原料和半制成品（第四条）；支付有关提供軍火的行政开支（第七条）；容許美国使团进入自己的領土“視察”軍火供应工作的“改进情况”以及为这些使团执行任务給予一切必要的手段和情报（第九条）。

这样，美国把軍事援助給予它的北大西洋集团伙伴后，又建立了一个与“馬歇尔計划”体制平行的、控制它們的体制。同时，这是实現軍备竞賽和把西欧变成准备反社会主义国家侵略战爭的主要跳板的体制。

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立即开始的、拼凑軍事侵略集团的政策，随着 1950 年初北大西洋集团軍事政治机构的建立和它的基本战略理論的制定結束了第一阶段。在以后的年代，帝国主义国家的統治集团頑固地实行加强这个体系和把它扩大到其他大陆和地区的方針。这使得国际紧張局势越来越尖銳，使得“冷战”越来越加强。

③ 此外，这个法案根据“杜魯門主义”規定撥款二亿一千一百万美元給希腊和土耳其作軍事援助（給它們的軍事援助从1948 年开始），二千七百六十万美元給南朝鮮、菲律宾和伊朗作軍事援助，七千五百万美元給蔣介石分子作軍事援助。

第 七 篇

1945—1949年的国际关系和意識形态的斗爭

在战后年代里，一方面，两个对立的社会經济体系間进行着意識形态的斗爭，另一方面，同一种阶級結构的国家間思想的一致和它們之間的联系，这两方面的情况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恩格斯曾經指出过，阶級斗爭經常在三个方面展开：在經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意識形态方面。列宁曾强調这一原理对于后来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就是在我們时代，这一原理也完全具有現实意义。只要地球上还同时存在着資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并存着两个对立的社会經济体系，这三方面的阶級斗爭就貫穿于它們之間的相互关系，并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

在全世界范圍內已展开了爭取人們心灵的斗爭。在这一斗爭中起着最重要作用的，不仅有两种意識形态所固有的理論、概念和观点上的冲突，不仅有宣傳，同时还有社会主义国家和資本主义国家的全部政策和活动。

苏联的国际威望和影响的增长，社会主义陣营的形成和成就，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尖銳化，殖民主义的瓦解以及防止新战爭的迫切必要性——所有这一切，急剧加强了各国人民对国际生活中各項問題的注意，大大改变了战后世界政治方面的意識形态斗爭的

性质。

远在战后第一个五年里(1945—1949 年)，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問題就已經定形了，和平与战爭力量之間，进步与反动力量之間，早已就这么一些問題展开了頑强的意識形态的斗爭，这些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結論，"冷战"产生的原因，世界舞台上力量对比的变化，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則，破坏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

防止社会主义体系和資本主义体系发生軍事冲突，把它們之間的阶級斗爭限制在和平經济竞賽、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的范圍之內——这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实际任务。这項任务在共产主义运动的綱領性文件中已有明确的反映。用說服而不用武力来保证思想获胜，这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口号。"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取得的胜利越多，世界資本主义的危机越深，阶級斗爭越尖銳，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团結和动員群众为共产主义而斗爭这一方面的作用就越大。意識形态的斗爭是无产阶級的阶級斗爭的极重要的組成部分。"①

馬克思主义的国际問題专家，在强調世界舞台上意識形态斗爭的意义的时候，总是注意广大人民群众的覚悟，对国际事件及其过程給予深刻和全面的科学分析，并說明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在战后年代里，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和成就对于千百万人民，对于資本主义国家中的进步人士都发生着巨大的影响。在不久前才踏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年輕的国家里，有許多思想家主張和平共处和中立政策的原則。甚至在帝国主义营垒內部，也不时有号召对当前国际形势給以現实評价的呼声。

---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05 頁。

帝国主义集团提不出什么眞正的理想来同先进的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相抗衡，便用煽动战爭和反共歇斯底里，鼓吹仇視人类的思想来回答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力量的胜利。

資产阶級的"政治学"說明和解釋国际关系时，总是力图以"心理战"这个概念来替代意識形态的斗爭，来模糊群众的认識，助长人們的下意識本能，特别是那些卑鄙的本能。資产阶級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就是这样曲解經济和政治过程的眞正意义和內容。

当反动的、侵略的和战爭的势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愈益削弱，便"更加全面地"动用起帝国主义的一切手段，包括帝国主义的全部思想武庫和整个宣傳机器来巩固和維护它們的地位。資本主义并不想通过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平經济竞賽和思想斗爭的途徑来保持住自己的生存，因之，日益使自己的思想武器服从于軍事和政治的目的。最反动的好战的思想和理論，受到資本主义世界的眞正主宰的贊許和支持，变成为統治的思想。早在战后初期，"心理战"就已成为帝国主义"冷战"的不可分割的特征，走上了替"实力地位"政策和"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等等論证和辯解的道路。

苏联共产党綱領指出："帝国主义反动派采取一切从思想上影响群众的手段，企图詆毀共产主义及其崇高思想，維护資本主义。帝国主义所用的主要思想政治武器是反共主义，其主要內容是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共产党的政策和目的，歪曲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現在，社会进步的一切敌人——財政寡头和軍閥、法西斯分子和反动教权主义者、殖民主义者和地主以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一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帮凶，都在这面黑旗下联合起来了。反共主义是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的极度衰退的反映。"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局和1945—1949年期間发生的許多事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5頁。

件，完全出乎帝国主义集团及其思想家的意料之外。他們不願意承认这些事件的規律性，也不想从中得出相应的結論，从而走上歪曲和否认世界舞台上发生的主要进程的冒險道路。同时，他們极其注意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战后侵略方針辯护，誹謗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从"理論上"論证"实力政策"和战爭的"不可避免"，等等。

現在，壟断組織正在直接或間接地，公开或秘密地，使用收买或恐吓的手段，通过国家机关或各种他們資助的"研究中心"，使大多数資产阶級历史学家、經济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为其服务。随着資产阶級学者的从屬于壟断資本，他們在同社会主义进行意識形态的斗爭中更广泛地采用各种"卑鄙的手段"。

在西方，对于最重要的国际生活問題的論述起主要影响作用的，是帝国主义列强，首先是美国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他們提出这种或那种冒險口号，例如提出"甩掉"共产主义），是資产阶級的观察家和評論員（他們任意抓住个别事实或用詆毀造成喧囂一时的宣傳陣势），是最大的实业家和将軍們（把国际生活的一切現象都归結到他們的行話：美元和武器的名下）。大多数撰述对外政策問題的資产阶級作家，他們既不概括，也不詳細地解釋眞实的过程和事件，只是凭借于偶然的和主观的估計，非但不去喚醒人民群众，反而帮助愚弄和蒙蔽群众。

在这些情况下，揭穿資产阶級历史編纂学的主要学說，指出現代帝国主义辯护者的宣傳詭計中的机械論，分析幷拆穿名目繁多的社会"学說"、地緣政治学武断的定理、历史的公式化和历史比拟以及經济的"核算"等等，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資产阶級的作者广泛利用这些来歪曲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幷頌揚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方針。

同反动的資产阶級意識形态、同"冷战"宣傳者、同恶毒的历史

伪造者、同社会主义爱好和平政策的誹謗者、同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辯护者进行斗爭，是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在国际关系方面最重要的任务。

第二十六章

在战后国际关系中意識形态斗爭的作用的加强。帝国主义集团所挑起的反对和平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心理战"

一、在国际关系中意識形态斗爭的作用不断加强的基本原因

国际关系历来就是在某种程度上的意識形态斗爭的舞台。一方面，在国內圍繞同制訂对外政策方針有关的問題展开着这种斗爭，在这里統治阶級力图将他們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观点、主張和措施强加于本国人民。另方面，在对外关系中也利用了意識形态斗爭的方法。这些方法的采用是为了爭取其它国家作为盟友，促使他們的中立，同时也是为了削弱敌人的反抗力量，破坏它的后方和瓦解它的軍队。

在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历史上誕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后，国际关系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以后，当意識形态斗爭的范圍已經大大的扩大以后，这些变化更为加深。

首先，国际舞台上的意識形态的斗爭不是簡单的不同思想、观念的冲突，而是具有在我們时代里彼此之間展开着基本斗爭的两个阶級——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两种相互对立的意識形态

和世界观的冲突的性质。

其次，目前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意識形态的斗爭的目标，与其說是为了得到其它国家統治阶級的支持或中立的保证，勿宁說是为了爭取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心灵，把他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和世界之分裂为两大陣营，决定了国际关系中意識形态的斗爭演变为两个相对立的阶級意識形态的直接冲突。在这一时期中，国际舞台上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前者力图恢复自己对世界的統治，而后者不仅要竭力击退帝国主义者的攻击，同时还要保卫和巩固世界和平，爭取和平解决一切最尖銳的国际問題，并維护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

自然，这并不取消国际舞台上的其它矛盾：諸如帝国主义列强之間的矛盾，强大的帝国主义掠夺者同較弱的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以及宗主国同殖民地之間的矛盾等等。然而，基本的矛盾仍是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間的矛盾。

这在国际舞台上的整个意識形态的斗爭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正如苏联共产党綱領中所說的，意識形态的斗爭已成为共产主义的和資产阶級的两种意識形态間的激烈冲突。这一冲突是"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反映。"①

国际关系中的意識形态的斗爭，就其范圍和意义来說，也具有了新的性质。意識形态的斗爭已經超出了对外政策輔助工具的范圍，而成为两种世界体系相互关系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这是因为它們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由阶級斗爭所决定。而阶級斗爭进行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意識形态的斗爭。

两个体系之間的阶級斗爭，是客观的，不取决于政府、政党和国务活动

①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204 頁。

家的意志的确定不移的事实。但是这种斗爭可以采取各种方法来进行。

如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采取了異常尖銳的孕育着战爭危險和实际上指向战爭准备的阶級斗爭的形式和方法。这些形式和方法被称为"冷战"。自然，这些形式和方法深刻地影响着国际舞台上的意識形态的斗爭。帝国主义者选擇了导致国际紧張局势、加剧和加重对和平的威胁的斗爭道路。

社会主义国家自始就反对"冷战"，认为可以，而且应当在和平共处的原則基础上建立資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間的关系。这些原則要求不仅要放棄"热战"，而且还要使国际局势健康化建立睦邻关系及經济和文化合作。社会主义陣营在提出这样的綱領时，从来也沒有幻想过这一綱領的实現，可能意味着国际舞台上两大体系之間的阶級斗爭的停止。这个斗爭，反映着当代的最深刻的社会过程与全人类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相联系着的过程。

社会主义国家要求放棄在国际舞台上采取"冷战"所固有的意識形态斗爭的方法(关于这些下面将加以論述)，但是从来也沒有抱定目的要結束这种斗爭本身。意識形态的斗爭是在还不是所有国家都过渡到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时期的必然特征。

我們时代的这个特点，使意識形态的斗爭变成了国际关系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斗爭的內容。

人民群众是对外政策中的新生力量。如众所周知，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眞正創造者，論证了不是皇帝，也不是那些知名将領及立法者，而是千百万普通人民才永远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人民群众对事变进程的作用也不尽然相同。总的来說，在社会历史的过程中这种作用在不断增长着，但是只有在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压迫制度崩溃以后，这种作用才能充分表現出来。人民群众在各个不同的社会生活方面的作用也不相同。例如，在物质生产方面他們永远是决定性的力量。相反，自从脑力劳动脫离了体力劳动以来，人民群众

对精神文化发展的影响则只能是間接的。至于說在政治方面，一般說来，在轉折关头，特别是在社会革命进程中，以及在要求有大批軍队参加的战时，人民群众的作用是巨大的。在剝削者社会"和平的"进化发展时期，人民群众对政治的作用只能是間接的——通过自己的阶級斗爭，对統治阶級的反抗。显然，在这样的时期里，群众对剝削者国家政治上的影响力量，取决于他們的組織性，觉悟程度和战斗力，它不可能是决定性的力量，否則压迫者的制度連一天也保存不了。

这特别是对对外政策而言。长时期以来对外政策已成为职业政客和外交家的不可侵犯的活动园地，普通人，劳动者是被禁止参与的。自然，并不是因为对外政策問題不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反，統治阶級所实行的对外政策一貫是損害劳动者利益的，使劳动者付出流血和忍受困苦的代价。正因为如此，剝削阶級經常处心积虑地把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圍隔絕起来，保持极大秘密，欺騙人民并千方百計地掩飾对外政策的动力和战爭的眞正原因。如列宁所指出的："最重要的問題，如战爭、和平、外交等，都是由一小撮資本家用欺騙群众的办法、甚至常常是用欺騙議会的办法来决定的。"①

在資本主义总危机时代，当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进程还未在全世界范圍內实現时，国际关系呈現着极其复杂的局面。其中有旧的，也有新的，有資本主义及由它所产生的国际关系，也有社会主义和各国人民間新的社会主义的关系的各种因素交織在一起。互相斗爭着并相互作用着。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空前增长，这首先是由于下述几种情况：

第一，在历史舞台上出現了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彻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6頁。

底地反映了不仅社会主义国家的，而且全世界劳动者的利益和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的意志。

第二，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中——人类的絕大多数，不久前还只是帝国主义掠夺者的对外政策的对象——开始了对独立的国家和政治生活蓬勃的觉醒过程。在年輕的民族主义国家里，并不是都有着能使劳动群众发揮积极的政治作用的社会条件。虽然如此，但經驗已证明其中許多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群众对于和平、民族独立以及同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願望。

第三，在資本主义总危机时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帝国主义国家內部，虽然其政权日益集中在壟断組織的手中，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正在加强，他們对于对外政策的压力也在增强。

如所周知，国际舞台上的事件的进程，在許多方面取决于对和平和民族独立造成威胁的国家的劳动者对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有效影响如何。

如果說，在資本主义条件下，人民群众影响对外政策的唯一途徑，是斗爭的途徑，那么，斗爭愈积极，則这种影响也就愈强。但是人民群众为爭取这种或那种对外政策方針而斗爭的有效性和积极性又取决于什么呢？首先取决于他們的实际力量。在資本主义总危机时期，特别是在危机的第二、第三阶段，人民群众的实际力量已大为加强了。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資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級和所有劳动者的組織性和战斗力的加强，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影响的增长，另方面也是由于在国际舞台上，資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現在有了社会主义陣营这个强大的同盟者。

資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为爭取实現对外政策要求而斗爭的积极性，取决于他們对于解决这些或那些对外政策問題的关心程度。当然，劳动群众甚至在拥有反抗压迫者的强大力量时，他們首先要

把这种力量运用到圍繞着同他們的切身利益眞正有关的問題的斗爭中去。这里还有另外一点：为了要进行斗爭，群众不仅应当关心这个或那个外交政策問題的解决，他們还应当意識到自身的这种利害关系。在过去，曾不止一次发生过，劳动者由于沒有意識到資产阶級政府某些对外政策行动的作用或后果，而持消极态度。

資本主义总危机的时代，特别是現代历史的战后时期，使两个决定性的因素（人民群众对待对外政策的实际上的关心和他們意識到自己在对外政策上的利害关系）发生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是同进行战爭的新形式和方法（特别是同火箭—核武器的出現）以及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所产生的眞正公开的外交有关。

在所有外交政策的問題中，特别强烈和直接触及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是战爭。首先，引起人們对于对外政策的注意，总归是同战爭有关。通常在大战期間和大战之后，国际关系問題几乎必定成为广大輿論界的注意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所知的一切战爭之中毀灭最多，破坏最大的战爭，直接触及到我們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战爭——尤其如此。1945年以后，諸如改組国际关系，确立反对新战爭的保障，寻求解决对外政策問題新途徑等問題成为人类絕大多数所深切关怀的問題，这是不足为奇的。千百万人民充滿信心一定要防止新的災难。

广大群众对于对外政策的这种积极关心，不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发生的那样，随着日月而消逝。那时，帝国主义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麻痹人民的警惕性和他們的行动意志。情况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創伤更难于医治，以及劳动者已获得了无可估量的丰富的政治經驗。核武器的发明和实际使用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的这一事实，也具有着重大的意义。这种武器，不仅使武装斗爭的形式和方法，同时也使国际关系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

弗·恩格斯在分析軍事技术进步时，在《反杜林論》一书中曾做了极为重要的方法論上的指示："火器的引用，不但革命地影响了作战的本身，而且还影响了統治和压迫的政治关系。"① 这一指示，可以使人們以眞正科学的态度来評价核武器和火箭武器对于事件进程的影响。

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观点同那些資产阶級社会学者的观点有着原則的区别，后者在技术，包括軍事技术之中寻求解釋一切社会和政治現象的钥匙。資产阶級社会学者在技术和政治之間建立了一条直接的联系，忽視了阶級关系一貫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与此相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是結合着新技术对这些或那些阶級的地位，以及对这些阶級間相互关系所产生的变化，来考察新技术的政治后果的。

由資产阶級的社会关系和資产阶級統治者的政策所产生的軍国主义，已經成为社会現象。这种現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及如恩格斯所强調指出的，有着自己的发展辯证法。恩格斯写道："軍队变成了国家的主要目的，它变成了自我的目的，人民之所以存在只是为着补充和供养士兵。軍国主义支配着欧洲幷吞噬着欧洲。可是这种軍国主义本身包含着自己毀灭的萌芽。"②

恩格斯特别强調指出，各个国家的相互竞爭，迫使他們"更多地采取全国征兵制，因而結果就教会全体人民去使用武器，这样人民就获得在一定时机反对軍事指揮长官，来实現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当人民大众（城市和乡村的工人与农民）具有自己的意志之时，这样的时机就要来临。在这时候，君侯的軍队将轉变为人民的軍队，机器将拒絕效劳，軍国主义将由于自身的辯证发展而趋于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72 頁。

② 同上书第 175 頁。

毁灭。"①

恩格斯的这个預見是否已經在实現呢？新式武器的出現在这方面有何意义呢？

在十九世紀末叶，軍队已变为数以百万計的軍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战爭的破坏性。由于統治阶級的对外政策的冒險，使人民群众不得不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流血牺牲和物质上的貧困。这不能不加深劳动者对压迫者——新战爭禍首的阶級仇恨。此外，有大批軍队参战的战爭，逐漸变成为"总体战"，在一定的条件下，导致了資本政权的削弱，导致政权的解体。

这些因素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它們加剧資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激发工人阶級和全体劳动者的革命行动，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对产生軍国主义的資产阶級制度的斗爭。

恩格斯在上一世紀末关于軍国主义的命运所做的理論性的結論，現在已为历史經驗所充分证实了。近百年来由侵略的資产阶級所挑起的一切大战，都伴随着以工人阶級为首的劳动群众的强大的革命行动。巴黎公社是1870—1871年法普战爭的結果之一。俄日战爭加速了1905—1907年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以許多国家內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俄国的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結果，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是个非常明显的肯定的規律：在資本主义社会阶級对抗尖銳化的条件下，有大批軍队参战的战爭，在日益众多的国家里經常是以导致軍国主义及产生它的社会制度的灭亡的革命而告終的。当然，这并不是說战爭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但是近百年来由大批軍队参战的战爭，刺激了产生革命的过程，加速了这一过程并按照自己的方式促进其获得成功。

帝国主义的政客、軍人和理論家早就了解到大規模的軍队对他們說来是孕育着何种危險。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資产阶級軍事理論发展中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5頁。

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寻求由少数职业軍队操纵的机械化装备来代替大批軍队的途徑。在这方面可以举出：意大利人杜黑和美国人米契尔的"空中战爭"主义或英国人富勒和德国人古德里安的"坦克战爭"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力地証明了，以飞机、坦克和其它机械化装备武装的軍队并不能使資产阶級摆脱人民武装起来的情况，相反地将加强那些使大批軍队变成不合帝国主义者心意的軍队的因素。在1945年8月，第一次使用了原子彈。俟后这些年来，核武器的威力日益加强了，并且出現了新的更为完善的命中目标的載运工具，开始是噴气式飞机而后是火箭。

也許这就是反动的政客和将軍們多少年来所幻想的武器吧？或許这就是会使帝国主义者逃避人民的正义审判的"电紐战爭"吧？大家都知道，西方有些政治家和軍事家就曾經抱有这种幻想。但是他們很快就清醒过来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帝国主义的首脑們經过几年之后就已經得出結論：大批軍队仍是必要的，特别是如果要想侵占和控制他国領土的話。主要的在于，大規模毀灭性武器的发明和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后果——必然要把軍国主义进一步推向死亡的后果。

大規模毀灭性武器是为战爭制造的。同旧的、"傳統"的武器相比，无疑它曾为侵略者提供了一定的优势。但是大規模毀灭性武器也还有其另外一些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战爭与和平的問題——对外政策的中心問題——已成为有史以来同广大劳动群众空前地休戚相关的問題。使用大規模毀灭性武器的威胁，唤起了广大人民对对外政策問題的深切注意。此外，帝国主义所造成的这种威胁，已成为劳动人民对資本主义制度的阶級仇恨的主要根源之一，成为推动群众从事反对帝国主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因素。这就大大扩大了反对軍国主义的战士的队伍，因为这使得非常有必要在軍国主义犯下新的罪行——挑起战爭之前，而不是在其后，就把它消灭掉。

这种观点使共产党人同資产阶級的"恐怖均衡論"的信徒有着根本的区别。后者认为，原子武器及其所造成的对許多国家人民生存的威胁，会自动地保障着和平。实际上在"恐怖均衡"的条件下，也即是說继續軍备竞賽的条件下的和平，是非常不巩固的和平，很可能为随便一种偶然性或錯誤所破坏。何况这不仅是靠不住的和平，而且是很坏的需要人民付出不可

估量的代价的和平。而在这种和平的条件下，使和平不巩固的国际紧張局势仍然保持着，惊人的巨額軍費开支还会继續，軍国主义这个孕育着一切反动势力和黑暗势力的溫床也会保存。

由此可見，原子武器本身并不能保障和平。但是它使最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限制和进一步鏟除軍国主义、为裁軍、为改变国际关系，以便使文明人类所应有的交往准則，而不是帝国主义所推行的暴力法則在国际关系中占統治地位的斗爭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一斗爭中可以在資本主义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之前就爭取实現許多要求，尤其是可以防止新的战爭。根据克魯普斯卡婭的证明，列宁早就談过这种远景，指出新式的破坏性武器本身将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促进这种可能。列宁預見到："将会出現这样的时期，那时，战爭的破坏性已达到一般說来不会爆发战爭的程度。"

在反对战爭威胁的斗爭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开外交起着巨大的作用。

剝削統治阶級，經常以极大的秘密来掩盖外交行动，特别是千方百計地伪造他們的对外政策的动力和眞正目的。列宁曾把資产阶級的外交比拟为是"那些喜欢渾水摸魚或者不得不渾水摸魚的个人、阶級、政党和集团故意制造的迷魂陣"①。近几十年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剝削阶級在这方面的可能性已大为減少了。

这种历史性的变化是同根本上新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的誕生，同它的影响和威信的巨大增长有关的。苏維埃国家从其存在的最初期起就宣布了公开的外交。問題不仅在于社会主义国家无須对人民群众掩飾自己的对外政策的目的，还在于他有意識地利用外交手段来揭穿对外政策秘密，帮助工人阶級及全体劳动人民认清外交政策的詭計，意識到自己的眞正利益，以便教会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者的冒險行动予以有效的反抗。

就在十月革命的次日，列宁在論述社会主义外交的原則性方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339—340 頁。

針时指出："我們不願意秘密談判。我們願意政府时时受到本国輿論的监督。"①

苏維埃政府实現着这一原則，在其第一个对外文件中就写道："本政府廢除秘密外交，决意在全体人民面前公开进行一切談判，并立即着手公布全部秘密条約……"。秘密条約的公布，揭穿了被各国的資产阶級描繪成正义的、防御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骯髒內幕。苏联政府的这一步驟，大大促进了反战情緒的增长，在反对战爭的斗爭中起了巨大作用。

列宁关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应該面向全世界各国劳动群众的思想，关于必須帮助他們积极干預国际事务的思想，成为苏維埃外交的基础。后来的全部历史已证实了列宁的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所发生的变化已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完全新的形势下爆发的，即当时世界的輿論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已动員起来反对法西斯侵略者。这是帝国主义者发动的战爭，随着其发展而获得了解放性质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也是使之結成反对希特勒暴徒的强大的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因素之一。最后，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战后发展的整个进程，阻止了帝国主义者仅以照例地瓜分世界来結束战爭，并促进了那些已改变我們这个星球面目的进步的解放的趋势取得胜利。

在战后年代里，社会主义已作为一系列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出現。他們的外交，是教育全世界的人民群众，动員人民同帝国主义者的对外冒險政策进行斗爭的强大手段。这是資产阶級的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所不喜欢的。他們总是責难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說这些人在外交会議上，在联合国及其它国际机构中以"共产主义宣傳"来代替"事务"。的确，共产党人无論在什么地方，包括国际場合，从不背叛自己的原則，认为隐瞞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行为，不干違背自己良心的事。难道有什么理由能将这种立場同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232 頁。

"事务"对立起来嗎？自然沒有，如果不是把事务理解为牺牲人民利益的幕后勾結，而是理解成为了劳动者的利益，为了和平和进步的眞正斗爭。社会主义的公开外交帮助人民了解国际关系，揭露和平的敌人及其阴謀，因而正是它对这一事业作出了巨大貢献。

在資本主义总危机的条件下，意識形态的斗爭已成为对外政策的主要組成部分。不但如此，外交和对外政策已經愈来愈經常地和更多地为意識形态的斗爭服务。就是資产阶級的研究者，不管他們是多么希望回到小圈子的秘密外交和政策时期，他們也不得不承认这点。如斯特劳斯一胡佩曾写道："在外交方面，其任务早已不是为了預見到对方所要采取的步驟，而是要預見到这一或那一步驟对本国以及敌对国家的群众的心理会引起什么样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中居于統治地位的資产阶級的代表人物相当迅速地认識到了我們时代的这些現实。他們开始愈来愈高談闊論起"意識形态化"，談論起对外政策的"激动化"。

虽然最初有些研究者，特别是政治活动家曾有一定幻想，认为只要认眞地干一場，西方就会在爭取人們心灵的全世界范圍的斗爭中获胜，但是，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很快就开始以深深怀疑态度来估計这一斗爭的前景。有些人甚至于已看到了国际关系的改变了的性质，因为国际关系中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包含着对美国以及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說来是相当严重威胁的意識形态的斗爭。

例如，赫德耳斯頓①在談到人民群众和意識形态斗爭在对外政策中日益增长的作用时曾表示，这种变化比原子彈更危險，而"完全有可能恰恰成为以'homo sapiens' ②（万物之灵）著称的生物用来进行种族自杀和退出自己的領导地位的方法。"

华·李普曼在其《社会哲学》一书中迴避这种明显的比拟。但是实质并沒有改变——他认为，輿論界对政治，其中特别是对对外政策方面的日益

① 国际問題評論員，英美报刊联合会主席，1952年逝世。

② Homo Sapiens，拉丁語，生物学中人的新学名称，直譯为"有智能的人"，有汉語"万物之灵"含义。——譯者

增长的作用，对于資本主义讲来，是最严重的政治灾难和变化的根源。他以耽心的口吻指出，“在我們这个世紀，群众的輿論有着日益增长的力量”，“輿論已成为一种决定生存或死亡的可怕力量”。他写道：这些新現象的根源是，群众企图对被选出的領导人的特权采取“雅各宾党人的傳統”。

群众对于对外政策的影响的增长之所以引起資产阶級理論家的不滿，是有其极严重的根据的。因为人民群众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愈大，則帝国主义者去推行他們所愜意的对外政策方針时就愈益困难。在这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而不利于帝国主义。这是很容易明白的，因为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截然不同的力量源泉。列宁曾指出：对于資本主义来說，“只有当群众盲目去进行屠杀的时候……”才算是力量。“而我們对力量的概念却不同。在我們看来，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覚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覚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①

二、“心理战”，其机构及基本方針

在帝国主义的活动家之中曾有不少这样的人，他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碰到了国际生活中的新現象，但是他們不願意承认这些現象，曾幻想，认为群众对于对外政策日益增长的影响，仅是由于各别的錯誤和失策而引起的“偶然性”和“反常現象”。他們聊以自慰地认为，一切将会“改变”，会像往常一样。

但是他們很快被迫丢掉这些幻想。在帝国主义的战略家和政治家面前非常尖銳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問題：下一步怎么办？于是他們狂热地寻求在現代条件下进行意識形态斗爭的綱領，制訂斗爭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建立国际宣傳机器。虽然这番工作，特别是由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34頁。

于帝国主义在爭取人們心灵的斗爭中屡遭失敗，直到現在还远未完成，但是这一工作的主要方針早在1945—1949年就已肯定了。

在过去，帝国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在战时才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有系統的宣傳活动。第一次广泛展开这种宣傳活动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战后，这种活动曾大为減少，在許多資本主义国家里很长时期未再恢复，只有个别例外（如像在1922年英国組織了一个广播协会，它也有国外的組織）。

在和平时期，第一个組織了大規模国外宣傳的帝国主义国家，就是希特勒德国。美国和英国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或战爭开始前不久才进行的。战爭結束后，这些国家里的对外宣傳业务并未縮小，仅是进行了改組，展开了更为加强的活动，而且很快就远远超过了战时相应的努力。

在美国和許多其它帝国主义国家里，把国外宣傳称之为"心理战"。这个术語，不仅反映出了喜欢选用刺目名称的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意識形态斗爭的一定的观点。根据美国政治辞典的解釋，"心理战"——这决不是任何宣傳（正像政治战不是任何政治，經济战也不是任何經济关系一样）。因之，很长时期把它称之为仅仅同进行战爭有关的宣傳，是一种不仅其直接目的，而且其方法以及所謂的自己的学說均不同于一般宣傳的宣傳。

"心理战"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完全不擇手段和方法。除了进行公开的（或者"白色的"）宣傳，公开企图說服人們，使人們站到他們这方面来之外，还广泛采取所謂"灰色的"和"黑色的"宣傳（即隐蔽来源的宣傳）。正如同美国心理学家博林在《武装力量的心理学》这本教科书中所解釋的，这种宣傳有着"无責任的优点，因为它可以散布謠言和糾葛，而且无損于本国政府的体面。"①

① *A. Boring.* Psychology for the Armed Services. Washington, 1945, p. 493.

"心理战"的另一特点在于，有决定性意义的并不是簡单地向人們灌輸一定的思想和观点，而是毒化人們的意識，其結果能直接产生有利于宣傳者的行动和作为(張皇失措、恐惧、潰逃、怠工、破坏行为等等)。

最后，在进行"心理战"时，除口头宣傳外，最广泛利用各种挑撥，企图引起預期的"心理上的"反应。"心理战积极地制造并利用事件，把这作为未来行动的核心。"①美国心理学家威廉斯在《目前心理学的趋势和世界危机》一书中就做过这样的解釋。

为了說明这里所談的問題，我們列举二次世界大战史中的一些事例(根据某些可以理解的原因，战爭末期的一些事情还保守着秘密)。这些行动之一，如对德国許多地区，特别是有許多外国工人的地方，从飞机上空投下数百万个輕便纵火装置的傳单，傳单上指出如何利用这些装置来纵火。这种作法的目的，与其說是为了帮助破坏敌人的后方，勿宁說是为了引起警察大規模鎮压外国工人，从而促使他們中間不滿情緒的增长，降低生产率，并造成一种有利于滋长对立情緒的"心理"气氛。在敌人后方擲下大批指导自殘肢体和佯装有病的手册，也有着类似的目的。这类行动的組織者认为，这些行为会引起医疗机关不仅怀疑和挑剔那些佯装有病者，同时还会去怀疑和挑剔那些确实有病的人。这就会引起居民的不滿，破坏他們的士气。(順便提提，在 1954 年美国报刊上曾透露过关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領土內曾大量秘密散发过类似的佯装有病的指导手册。)

当然，美帝国主义者及其盟友在战后所进行的对外宣傳，远不止于这种方式或仅仅采取"灰色的"和"黑色的"宣傳方法。但是这些方式和方法被广泛使用。也許更重要的是——作为"典型的""心理战"学說特点的全部思想体系和出发点，已經对于和平时期的"心理战"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更何况这些思想出发点和思想体系本身就是对于意識形态斗爭的态度的完全直接了当的充分的反映，而这种态度已在帝国主义思想和政治理論中居于統治地位。

帝国主义时期以前的資产阶級，完全相信自己的思想的力量，相信他

① *B. Williams* and oth. Modern Trends in Psychology and the World Emergency. Pittsburg, 1952, p. 141.

們的思想本身就能够影响群众。他們的"自由竞爭"思想的政策，在意識形态方面"自由发展"(laissez faire)个性的政策就是由此产生的。对于意識形态斗爭的这种态度，在盎格魯撒克逊的国家，特别是美国有着极其明显的表現。而过去在美国，国家不干預意識形态斗爭的旧自由主义傳統曾起过作用。

这种思想上"无忧无虑"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資产阶級統治的深刻危机表現在各个方面，包括精神方面。壟断資产阶級意識到自己思想意識陣地的动摇，在思想"自由竞爭"的条件下，已不能站得稳了。当然，資产阶級歪曲地来了解这些生活的現实。大多数資产阶級的思想家把事情描繪成似乎是这里的过錯不在于壟断資本的政策和思想，不在于資产阶級在社会中已改变了的状况，不在于其思想，而在于群众，人的本性。如果說过去，資产阶級思想家还把人的本性描写成为尽善尽美的美德，那么現在，它已被描写成为集盲从、破坏性情緒、破坏的嗜好和无理性之大成了。

对于人的本性和群众的这种观点，是为了論证在政治上，以及在意識形态斗爭中的既定原則。赫德耳斯頓写道："'自由发展'的旧原則，已永远消失了。"代之而产生了对人和人的意識加以有意操纵的主張。实际上这意味着，第一，不能容忍不称心意的思想，大力加强各式各样的資产阶級活动家在思想方面，在毒化社会輿論方面的活动。第二，重新修正思想划分的标准，以及宣傳的出发点的标准。过去的唯理論，現在一点也看不到了，資产阶級不是訴諸人們的理性，而是訴諸人們的最卑劣的情感，嗜好和本能，一切努力的重心已轉向改善宣傳的技术和方法。

法西斯主义是这种宣傳主張最充分的反映。直到不久以前，在許多保持着形式上民主的資本主义国家里，只是在战爭时期才公开允許广泛采用这些"原則"，方式和方法。从資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阶段开始，当对壟断組織又重新提出了意識形态斗爭的問題时，于是全部宣傳工作，不仅因襲了战时的露骨的称呼，而且因襲了"心理战"的学說、方式、方法，这是不足为奇的。

意識形态斗爭的这种改变（包括在国际舞台上的意識形态斗爭）基本上是在1945—1949年在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美国进行的。也就是在

这个时期，形成了帝国主义国际宣傳机构的基本特点。

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心理战”——这絕不仅仅是“舌战”。它还包括广泛使用各式各样影响人們理性的、政治的、經济的甚至軍事的手段。

当我們研究“心理战”机构时，应当看到，許多政府机关，非政府机关，其中包括外交部門、偵察机关、司法机关、最大的壟断組織、各种“研究”中心等等广泛参与帝国主义者所进行的这种意識形态的斗爭。他們早就以自己的日常活动参与意識形态的斗爭；此外他們有时还专門采取一些措施，以影响輿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国家机关活动中的这些“心理战”的观点，已表現得极为明显。它們經常被提到首要地位，并連續不断地采取一定的內政，外交步驟，其主要的目的是影响輿論界（如美国、加拿大及某些資本主义国家的“間諜审判”，美国經济“援助”特别法令等）。

此外，战后时期也建立了专門从事国际宣傳的龐大机构。这个机构从它在1949年形成的形式来說，大体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政府的，冒充私人的（即以非政府名义伪装起来的）和私人的（即直接从屬于壟断組織的）。

最强大的，散布最广的“心理战”机构掌握在資本主义主要堡垒——美国之手，它直接或間接地也控制着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国外的宣傳。这种情况是同作为世界反动派主要意識形态堡垒的美帝国主义的作用相适应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剛一結束，美国立即对其在国外的宣傳体系进行了改組。解散了軍事情报局——在战爭年代里进行这种宣傳的主要机关。軍队的“心理战”机构只在被占領国（西德、日本、奥地利、南朝鮮）保持着自己的职能，既便就是在这些地区，其机构也划归相应的軍事行政的部門。大部分的宣傳职能移交給了私人組織（报刊、图书出版和广播等壟断組織以及电影公司等等），而他們的工作同国务院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过了一两年以后，美国統治集团由于要加强“冷战”，便提出了重新扩大在外国的宣傳机构，把它們集中到政府的手里，并由大壟断組織直接控制的問題。根据1948年国会所通过的史密斯—蒙特法，整个官方的国外宣傳，交由国务院管轄，于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明文規定組織和平时期最龐大的宣傳机构。

此外，还根据該法令第601—603款，成立了情报問題諮詢委員会和教育交流問題諮詢委員会。这两委員会的职权是："草拟并向国务卿推荐有关这些方面的政策和方案"。而事实上，这两个委員会是要充当壟断組織对整个宣傳进行监督的工具。法令中明文規定，情报問題委員会(起着較重要作用的委員会)应由"实业界"的代表来組成。委員会的成員由美国总統征得参議院的同意后任命，任期为三年。

情报問題委員会的第一任主席是美国資产阶級报紙之一《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編輯康汉，他覬覦取得美国大資本的官方思想家的地位。委員会的成員，有"通用电气公司"理事长菲利普·李德、"全国广播一电視业协会"理事长查士丁一米勒（他是在美国国会已經注册的广播一电視公司为資本家进行收买議員活动的分子）、反动期刊《星期六晚邮报》(美国出版份数最大的期刊之一)的編輯希布斯等。在諮詢委員会范圍內所設的"一般事务問題委員会"的第一届成員之中有："紐約花旗銀行"的执行委員会主席伯吉斯、"新澤西美孚石油公司"代表謝泼德、"通用食品公司"副經理罗宾斯、"美国捷运公司"經理拉尔夫·李德、"横断大陆和西方航空公司"理事长皮尔逊、"吉勒特安全剃刀公司"經理斯庸、"可口可乐出口公司"理事长法尔利等人。

在政府活动中受这个委員会监督的部分首先是包括国外的广播（"美国之音"），还有在国外的"情报中心"网和特派代表的工作。他們的任务是：在当地直接进行宣傳，出版并散发书刊，設立图书館，举办展覽会，放映电影等等。同时还利用所在国的报刊、广播及其它宣傳机构。

从一开始，"心理战"的組織者即极为重視在教育方面的所謂交流，特别是人員交流的这种方式。这里所指的是，美国把外国的学生、文化和科学工作者以及其他能够对其本国輿論界发生影响的人邀請到美国来并对他們进行专門的宣傳工作。例如在1949年一位美国宣傳专家累斯特·馬克耳曾解釋說：美国"应当竭力在外国建立一些能够帮助向其本国同胞說明美国情况的专家組織"。①

① *L. Markel.*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49, p. 174.

这种宣傳方法和网罗代理人的方法本身在美国早已不是什么新的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类活动的开展达到了空前的規模。1946年議会通过的作为《1944年剩余財产法》附件的富布賴特法是这种活动的基础。根据富布賴特法，从出售美国在战爭年代里运到外国的剩余軍事物資的，归由美国总統支配的資金中撥出一定数目（每国两千万美元以內）用于教育交流方面。为了监督实現这一交流計划，根据法律，美国总統任命了一个"外国奖学金管理委員会"。此外，总統还被授予全权同外国签訂有关交流的行政协定。已經同六十个国家签訂有这类协定。美国政府还主持私人的交流計划，据此，每年大約有四万余人到美国去。

至于說这种"教育交流"全部活动的实质，那么在富布賴特本人也是著者之一的一本小册子中承认，它使許多人所产生的印象正是"不多不少的在文化方面的帝国主义"①。"教育交流"所追逐的目的就是，在国外建立亲美的代理机关。美国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經济不发达的国家）所开办的学校中对学生的教育，也是服从于这个任务的。

政府的"心理战"机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受美国軍事部門的領导。每一个兵种——陆、海、空軍，都有自己的"心理战"机关和訓练宣傳人員的学校。在和平时期，他們不仅对美軍在国外駐扎地区和有美軍事基地的地方进行宣傳，而且还利用自己无数的电台向外国广播自己的宣傳节目，或轉播"美国之音"的节目。

中央情报局也进行宣傳活动。它是极为秘密的。如所周知，就是在战爭年代里，"战略事务局"也有自己的"精神战"处②，这个处的任务就是进行破坏活动的宣傳。代替"战略事务局"而成立的"中央情报局"仍然保留了这些任务。《紐約时报》的观察家科洛克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中央情报局在"进行秘密的战略战的地方"，③即首先在社会主义陣营国家里进行宣傳。

此外，国务院，軍事部門以及諜报机关还掌握着为在国外进行宣傳而

① 《How Can We Correct World's Misconceptions about America》. Chicago, 1949, p. 3.

② *D. Lerner*. Sykewar. New York, 1949, p. 400.

③ 《The New York Times》, 24. VI. 1951.

特建的許多伪装私人的組織。他們的任务——担負着最骯髒的职能，如果是由政府机关履行这些职能的話，那么很可能使这个国家的声誉一敗塗地。

这里，首先应該提到的是参加在1949年建立的"爭取自由十字軍""运动"的各式各样的組織。这个"运动"的倡議者是一伙最大的壟断資本家("美洲銀行"的經理Л·基安尼尼、洛克菲勒的"大通銀行"經理А·佩季等)、軍方的代表(特别是克萊将軍，他同时又是"大陆制罐公司"和"化学銀行信托公司"的董事长)、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宗教界人士(斯培尔曼紅衣主教)及一些亲法西斯政党和集团的首脑("美国軍团"的領导人Д·克萊格)等等①。

"爭取自由十字軍"的目的，就是募集資金，建立有間諜一宣傳性质的組織，这些組織負有促使社会主义国家"解放"的使命(也就是在这些国家里使資本主义复辟，由美帝国主义者去进行殖民統治)。所有这些組織实质上都是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的分支机构，由美国的外交人員和間諜人員領导的。这些組織主要是由一群法西斯化了的亡命之徒組成的。

"爭取自由欧洲全国委員会"便是这类組織中最大的一个。参加这个委員会的有約一百五十名美国人，二百名"逃亡者"，即从社会主义国家流亡出去的一些叛国者，其中有米柯拉契克、前保加利亚农业党②党魁格麦托·季米特洛夫、前匈牙利总理納吉·費倫茨、前罗馬尼亚总理腊狄斯庫、前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甄克尔等等。这个委員会的創始人是約翰·福·杜勒斯，他曾自夸和直言不諱地声称，委員会的建立"是得到国务院的支持的"③。用美国壟断組織的資金，委員会在西德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电台"。在对社会主义陣营各国广播中进行卑鄙的污蔑宣傳。委員会还把一些带有煽动性的宣傳品偷运到人民民主国家，散布謠言，制造挑衅等等。

---

① 《Daily Worker》(New York), 5. IX. 1950.

② 原文为"农业党"。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編《关于美国政府对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敌对与侵略政策的文件》一书称"农民联盟"。——譯者

③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14. XII. 1949.

为了在亚洲各国进行类似活动，一年以后，建立了“爭取自由亚洲委員会”。这个委員会的头子是前“馬歇尔計划”在中国的全权代表，在亚洲有重大“利益”的財政家，前旧金山商会会长，最大的进出口公司經理維尔伯格等人。“爭取自由亚洲委員会”成立的那一年，“爭取自由十字軍”就撥給它三百五十万美元的經費①。

除上述的組織以外，在美国还有許多其它特务宣傳組織。这就是“波一美委員会”、“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委員会”、“立陶宛美国委員会”、“俄罗斯民族解放美国委員会”、“反布尔什維克国际联盟”等等。屬于这一类的还有在西德和西柏林建立的許多組織，如“反对无人道斗爭小組”、“自由法律工作者协会”等，这些組織都是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間諜、挑撥及其它各种破坏活动的。

美帝国主义另外一大批宣傳組織为了某些其它目的而打着“私人的”幌子。美国的官方宣傳在其它国家，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还包括資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眼目中，很快就丧失了信任。为了恢复信任和挽回美国的威望，則打着“私人的”和“社会团体”組織的招牌，力图掩飾这些宣傳的来源。“在美国国旗未露面的地方，我們取得了远为重大的成就”，——主管宣傳的助理国务卿曾向国会这样来說明这一策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就已經存在的这类組織有“道德革新会”和“共同事业社”等等。較后，建立了“文化自由委員会”，专門在西欧、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知識分子中間进行宣傳。“和平与自由”組織在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及其它西欧国家中进行煽动性的反共主义宣傳。根据美国情报机关向国会报告中所提供的材料，在1954年上半年，已有三百四十二个这类組織在进行活动。

美国帝国主义的国外宣傳机构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是各种私营公司，首先是报刊、杂志、图书发行，影片、无綫电广播等公司。这些壟断組織企业，从自己产品的出口中获得了巨額利潤。但是，这里所說的不是一般的商业活动，而是“心理战”的渠道之一，有組織的国外宣傳。連美国的作者們也

① 《The New York Times》, 19. V. 1951.

承认这点。由馬克耳主編的《輿論和对外政策》这本文集中就談到："凡是針对外国輿論的各种各样的私人活动，都同宣傳有联系"①。"虽然这些活动是由私人开支的，但是它是促进外国更好地了解美国的許多措施之中重要的部分"②，而在某些国家里則是它的最重要的部分。

美国政府机关对这些私营公司給予了广泛的多种形式的援助。首先表現在采取許多外交步驟，为美国壟断組織清除向外輸出"意識形态产品"道路上的障碍。美国的外交在"情报自由"（这是貿易方面的"門戶开放"主义在意識形态方面的变种）的口号下进行这种斗爭，在这一斗爭中也利用着联合国。

連資产阶級的作者也并不掩飾这种"情报自由"拥护者的眞实企图。如布魯克在談到美国的通訊社、报刊托拉斯等等的勒索时写道："这些情报組織名为公众服务；而实际上是在寻求利潤。更糟的是它們散布自己主子的个人的政治观点和經济观点"③。

許多官方的外交文件，帮助了参加"心理战"的美国壟断組織的活动，如《勃魯姆—貝尔納斯协定》，其中将法国影院提供給好萊塢进行扩張之用，或者是在絕大多数有关經济"援助"的协定中列上专門条款，規定对于美国的书报、期刊，影片等等的散发提供优惠的条件。

从事意識形态扩張的公司，享有經济上的特惠权利。美国政府，特别是国务院有責保护他們的利潤。在史密斯—蒙特法中，作了特别的規定（第502款）来防止在国外的政府宣傳同私人宣傳发生竞爭。当"通过私人途徑便足以展开相应的情报工作时"，政府应該減少它在这方面的活动。

这就是美帝国主义者国外宣傳机构的概况。据美国的統計，其經費每年为十多亿美元④。为了把所有各个环节集中于一个領导中心，在1949年成立了一个受国务卿領导的心理战略局。

战后，其它帝国主义国家也开始建立自己的国外宣傳机构，同时常常是全部或者部分地交由美国来控制了。

① *L. Markel*.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p. 181—182.

② 同上书第180頁。

③ *H. Brucker*. Freeldom of Information. New York, 1949, p. 23.

④ *J. Burnham*. Containment or Liberation, p. 34.

战后英国曾成立“中央情报局”，其任务就是在国外进行宣傳，不列顛广播公司下設立了国外广播部門，它的經費占該公司全部經費的三分之一。在外交部和联邦关系事务部領导下有“不列顛委員会”——这是从事国外宣傳的“文化合作組織”。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甚至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这样一些成員国，諸如土耳其，都建立了对国外宣傳的机构。

可以认为，到1949年时，“心理战”的机构已基本形成。在这一期間，其某些主要“战略方針”已經显露出来了。

*　　*　　*

“冷战”及其心理上的附产物，是資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同时它是产生在資本主义总危机的这样阶段，即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軍已不能再描写为“历史的偶然曲折”，“形势的不幸汇合”。不仅有观察力的思想家，有阶級觉悟的工人，而且各国亿万普通人們已开始意識到我們时代的基本事实——帝国主义将要灭亡，新社会将取而代之。广大群众日益相信社会主义优越于資本主义。

在这种条件下，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极其尖銳地提出了維护自己的思想陣地的任务。同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斗爭，对于他們来說，有着直接的切身意义。这使得帝国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宣傳明显地表現着他們的世界观的特点。

在这方面，帝国主义者选擇了反共主义作为主要的思想政治武器。其主要內容是：誹謗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共产党的政策和目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說；积极鼓吹各种假科学的政治和社会理論（世界主义、种族主义、新馬尔薩斯学說等），宣傳教权主义，伪造历史等等。問題的实质就是，帝国主义者企图使社会上整个精神生活都服从于其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各国人民解放运动的目的。

我們現在来看看这些同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直接有关的他們的国际宣傳方針。这首先就是所謂的“恐怖战略”，即以虛构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危險来恫吓人民为目的的宣傳。在本书所研究的这一历史时期中，这一宣傳方針已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美国和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战爭剛剛

結束，就立即面临着下述的事实：

1. 这些国家的人民满怀着信任苏联的心情走出了战争。苏联以自己反法西斯的英勇斗爭，坚持不渝地履行同盟者的义务而博得了广大社会阶层的深切尊敬。这个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人民群众眼目中的威望有了无限的增长。

2. 經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慘禍的人民，坚定不移地深切期望防止爆发新的战爭，期望达到能够确保世界持久和平的国际問題的解决。

当帝国主义者在策划旨在反对苏联（然后是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新的侵略計划时，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些情緒。战爭結束以后，帝国主义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們，便立即把反对这些情緒的斗爭列为头等的最重要的任务，以便扭轉这些情緒，从思想上和心理上使人們作好新的战爭冒險准备。加紧完成这一任务，已成为"心理战"的主要方針。

这种宣傳，不仅仅服务于帝国主义者已实行的政策。当战爭剛一結束，这个政策本身就竭力幷尽可能地适应于以改变人民的思想趋向为目的的"心理攻势"的需要。"遏制"共产主义的这种主張的思想实质即在于此。

当然，在制訂或者支持这种政策的理論家和政治活动家之中，可能有些人只不过是被社会主义的胜利进軍吓破了胆，而一心想着"遏制"它。但是，总的来說这一政策的意义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几年之后所展开的对"遏制"政策批評的內容，便非常明显地有利于說明这个結論。当时帝国主义最富于侵略的代表要求以"解放"政策来代替"遏制"政策，即是要求在"解放"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幌子下公开向社会主义进軍。

伯納姆，这个最知名的"心理战"理論家。反共主义思想家在其于1952年出版的《遏制还是解放》一书中，大罵那些在当时仍然站在"遏制"主义立場上的人，說他們是"目光短淺"，不了解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伯納姆反对凱南发表在《外交季刊》杂志上的許多篇著名文章中所第一次系統地論述遏制主張的那些观点。但是他也幷不否定"遏制"政策。他认为，"遏制"政策"現在"（即在1952年）已經过时了，但是"在1947年它形成的时候，是对当时已形成的国际形势的自然回答"。

伯納姆在說明自己的思想时，提到罗斯福执政时的“粗心大意”，自由党人和“同路人”的飞揚跋扈，談到人民在战爭年代里已习慣于“尊敬和热爱紅軍指揮官”，斯达哈諾夫工人，抗敌英雄和苏維埃民主……的情緒。紧接着他又提到人民对于战爭所固有的否定态度。他引用了美国地緣政治学奠基人斯皮克曼的話：“一个民族只有为了国防，才肯貢献出自己子孙的生命”，并从而得出結論：“作为摆脫困境的暫时出路，可以說一些遏制的好处。在 1946—1947 年，当时美国和他的盟友們在政治上，道义上以及理智上并未做好反对苏維埃国家的积极战略准备……掩盖着周期循环的防御性的手腕很可能推迟敌人的进展，因而是适宜的，看来也是达到了最大的可能。”①

帝国主义陣营的首脑們，正是把这一点看成是“遏制”政策的基本使命。从他們的观点看来，这个政策应該是意味着使其对外政策方針开始发生根本变化的重大手段，以便不仅在政治上，經济上，軍事上，而且还在意識形态上都准备好轉向更加富于侵略性的方針。在“遏制”政策这个范圍內，帝国主义的宣傳任务，就是煽动对苏联的不信任和仇視，制造一种对臆造出来的苏联“侵略性”抱恐惧气氛。这种宣傳方針即名之为“恐怖战略”。

“恐怖战略”不仅为帝国主义者，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者的深远的目的服务，而且为其直接的目的服务。恐惧，这是保证壟断組織取得惊人利潤的軍备竞賽的心理論据。散布关于“共产主义威胁”的神話，还可以掩飾向民主的进攻。帝国主义需要关于“共产主义威胁”、“苏联侵略”的神話，也是要把它作为烟幕，在这个烟幕下，更容易同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斗爭。

帝国主义者利用“恐怖战略”，也是为了麻痹資本主义国家人民对于在美帝国主义庇护下結成新的侵略集团体系的反抗。

最后，“恐怖战略”可以帮助美帝在經济上、政治上奴役所有其它資本主义国家。战后，美国担負了“世界警察”的角色，以煽动对“苏联威胁”的歇斯底里来为其干涉它国实現进步的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寻找根源。这是“遏制”政策最为明显的特点之一。正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和由于美国的支持，战后不久，在意大利、法国和其他許多国家里，在同法西斯强盜斗爭中

① *J. Burnham.* Containment or Liberation, p. 29—30, 35.

起了光輝作用的最先进的人民力量的代表，共产党人被排除政府之外。正是在美国的帮助下，这些国家的反动集团轉而对人民的民主成果展开了进攻。

“恐怖战略”——这远不是帝国主义宣傳在战后立即采取的唯一方針。在这个时期，早已大規模展开了頌揚美国，美国生活方式的宣傳，以此来論证这个国家的帝国主义者在資本主义世界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使命”。反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破坏宣傳正在展开。“心理战”的另外的方針也正在策划。社会科学日益适应于“心理战”的需要。資产阶級关于国际关系問題的著作，实质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宣傳机器的組成部分了。

第二十七章

資产阶級思想家对于1945—1949年国际关系特点和实质的伪造

甲、現代資产阶級著作中研究对外政策問題的目的、方針及方法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結、研究战后初期国际关系的特点，特别是产生“冷战”的根源等問題，已成为战后时期国际舞台上日益尖銳的意識形态斗爭的中心。

資产阶級作家、学者所写的許多探討这些問題的著作都证明，資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科学，主要是替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辯解，歪曲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自然，在資本主义世界各国中也有一些政治活动家、科学家、評論家和国际問題专家，他們并不贊同共产主义的意識形态，但是对于苏联在粉碎法西斯侵略者，在战后的民主調整，在維护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中所做的决定性貢献給予了

客观的評价。他們主張停止軍备竞賽、和緩国际紧張局势、主張通过談判来解决世界政治中的爭端問題。

在原来是殖民地或附屬国中的民族資产阶級一定集团的代表人物，中小資产阶級和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在他們的著作中竭力論证中立、不参加軍事集团和維护和平的政策，这种和平不仅对其国家的发展是必要的，而且对其国家存在的本身都是必要的。

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里有一些怀有进步傾向或只是現实地观察問題的著作者，他們也承认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主張为了維护和平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国家間达成协議。有一些絕不是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关系問題专家，他們已开始接近这样一些思想：关于把战爭作为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从社会生活中排除的必要性，以及关于承认和平共处政策的必要性的思想。还有一些著名的著作家，他們也批評战后"实力地位"、"冷战"政策的这种或那种观点，如詹·华伯和Д·斯蒂尔(美国)、К·齐里阿庫斯和艾·休斯(英国)、Б·拉維尔恩(法国)、Г·劳什宁和Э·古比(西德)等等。

但是也不能无視这一事实：在資本主义世界中，統治阶級的思想，首先是实力最大的壟断集团的思想，是居于統治地位的思想。二次世界大战后，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也加剧了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的危机。虽然其形式多种多样，但是有一个共同基础——好战的反共主义，有一个目的——維护陈腐的資本主义制度。"从思想上論证壟断組織的統治，为剝削制度辯护，詆毀公有制和集体主义，歌頌軍国主义和战爭，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辯护，燃起民族仇恨——这就是貫穿在現代資产阶級的政治經济理論中，哲学和社会学中，倫理学和美学中的思想。"①

① 参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07頁。

社会科学的总的思想观点和状况，也决定着其各个部門，包括国际关系理論在內的状况。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对国际問題，对外政策問題的研究和闡述，是服从于宣傳反动的、侵略的仇視人类的思想的，在战后年代里，它已成为"心理战"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除了极力歪曲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实质之外，还加紧动員国家和資本的力量以便"从思想上巩固"其后方，这是帝国主义者对于战后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吸引力的日益增长，对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觉悟程度的日益提高的直接回答。美国和其它資本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部門，日益担負起"說明"国际形势的任务，建立了許多进行"心理战"的机构，許多"基金委員会"、"中心"、"委員会"、"国际关系研究所"都被吸收参加这一活动。在意識形态范疇中，特别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战后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和闡述中的国家壟断的趋势也表現在：統治集团的代表——总理、总統、外交部长、将軍、最大的壟断資本家以及政治活动家們，愈来愈多地扮演帝国主义指导思想家的角色，扮演在国际关系方面的許多"理論"、"主义"的杜撰者的角色，他們不仅左右着半官方的宣傳，而且一般地还影响着資本主义国家的全部精神生活。

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杜魯門、戴高乐将軍的回忆录，貝尔納斯、艾奇逊、杜勒斯及艾登的著作①，以及西方其它主要的政治活动家的著作，不仅是个人的回忆和思想，辯护和頌揚作者本人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些著作从美英法的国家政策和利益出发，对四十年代国际生活中最重要

①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I. London, 1952—1954; «The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II; *Ch. de Gaulle.* Memoirs de guerre, t. I—III. Paris, 1954—1959; *J.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 *J. F. Byrnes.* All in One Lifetime. New York, 1958; *D. Acheson.* A Democrat Looks at his Party. New York, 1955; *J. F. Dulles.* War or Peace; *A. Eden.* Selected Speeches and Addresses, vol. I—II. Boston, 1948—1950 и др.

的事件和因素作了全面的描述和評价。同时闡述了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集团的現代对外政策的主張。

目前西方广泛利用相应的国家"控制"使用对外政策档案，和公布有关国际生活問題的文件的办法来加强官方的对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实质的解釋。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如隐瞞，甚至毁坏大部分罗斯福的文件，伪造出版德黑兰会議、雅尔塔会議和波茨坦会議的文件等等。

美、英、法及其它資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要員对解釋我們时代国际关系进行"示范"，直截了当地要求資产阶級的学者追随他們，号召公开贊揚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为"实力政策"辯解等等。而反动的資产阶級的历史学家、經济学家、社会学家等，他們自己也經常公开宣称自己在同"共产主义威胁"作斗爭，在动員"自由世界"力量方面的"使命"。

美国历史学家协会会长康涅斯·李德的演說，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在1949年美国历史学家大会上曾以《历史学家的社会責任》为題发表了一篇演說。康·李德說道："无論是热的还是冷的总体战，都要动員所有的人，并且要求每一个人都认清自己的崗位。历史学家所应当履行的义务，至少不应少于物理学家"①。

著名的法国社会学家，評論家，国际問題专家雷蒙·阿隆，盲目跟随在美国同行之后，簡直引以为荣地认为，他的《严重的分裂》一书的寿命，将同"好战的世界"并存。"如果对长时期的冷战的期望不能实現，那末，不言而喻，这本书将失去任何意义……但是要知道，好战的世界并不能因列强会議或胜利的停战所能中断的"②。这位作家叫嚷的說道，他用自己的著作来論证"冷战"、軍备竞賽，以至最終的"热战"的必然性。

仇視人类和悲观主义，是現代沒落的阶級——資产阶級反动思想家許多著作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

① *C. Ree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es of the Historia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January 1950, p.275.

② *R. Aron.* Le grand schisme. Paris, 1948, p. 10.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吸引大批著作家，其中包括一些大科学家来研究和闡述国际关系問題并不能引起数量到质量的变化：发表出来的絕大多数著作的科学水平极低。这首先是由阶級局限性所决定的，由資产阶級思想家在說明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时的极端实用主义的观点所决定的。

被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历史性胜利吓破了胆的資产阶級思想家，日益陷入时常是公开和僧侶主义結合在一起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他們不断提出世界和历史事件的不可知論的命題，傳播宿命論、听命于"先知的意志"，鼓吹"战爭边緣政策"的不可避免等。

現代資产阶級作家的大多数著作的方法論基础，是极反动的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和直观主义的哲学，它替那种为了某种利益，而公开曲解历史事件，并以今天的观点"研究"和"評价"这些历史事件的行为辯解。

使資产阶級的意識形态服从于帝国主义集团的对外政策目的和其好战的宣傳，和日益增多的資产阶級学者采取統一的反动方法，其結果导致他們关于战后国际問題的著作，明显地趋于統一。形势的要求在著作中印上了較之书的作者在名义上是屬于这个或那个資产阶級"学派"的更大的烙印。在資本主义国家中許多"学派"的存在，证明在不同的資产阶級思想家之間有着一定的竞爭。但是这种"竞爭的斗爭"决不是为了多少較为客观地論述世界政治問題，而首先是为了力求如何更好地滿足統治阶級的要求。最受帝国主义国家統治集团欢迎和支持的，是那些比别人更好地論证并贊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战后的侵略方針，曲解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爱好和平政策的派别。

有相当多的資产阶級国际問題专家，无論是在政府中任职的，或是在

外表上还保持着独立地位的，都可以恰当地称为是現代資产阶級著作中的"半官方"派。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严格遵守官方对事件的說法和解釋，大量引用政府的声明和文件，政府官員的声明，并加以注釋等等。

还有許多資产阶級的大学者，研究对外政策的高等学校的教員，也是屬于"半官方"派的。其中許多人似乎是站在官方派和学院派两者之間，他們的特点是，力求在表面上对論述、用詞、資料引証等等方面，装出客观的样子。但是資产阶級"学院"派科学家的著作中的基本內容和結論，通常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官方对事件的解釋雷同的。

在"学院派"內部还有各流派。这是由于在某些資产阶級科学有名的代表人物周圍，形成了这一或那一夥人集团的緣故。（如美国的比尔德、英国的湯因比、法国的雷努文等等）有时从"学院派"中实际上又分出不同的流派，它們提出自己对国际关系史和对外政策的独特公式和見解。至于以后如何——这些流派走向繁荣还是衰落——这在資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依然是取决于它的观点符合于統治集团的利益和适应于"冷战"形势要求的程度如何。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所謂"現实政治家"派的迅速出現及其影响的日益扩大，是最能說明資产阶級研究国际关系問題科学的現状。作为国际关系中"实力政策"的主要理論家和宣傳者的"現实政治家"所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证明，凡是不从"实力地位"出发，任何对外政策方針，其中自然也包括不同社会經济制度的国家間，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陣营間，苏联同美国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賽方針，是"站不住脚的"。

"冷战"的倡导者——美帝国主义集团，庇护"現实政治家"派，热烈贊揚这个学派的言論。"現实政治家"的大多数好战主張，已成为其它資产阶級学派和思想流派代表的武器了。有許多国事活动家、外交官、軍人、評論家等的观点已公开接近于"現实政治家"。另方面，也有不少最著名的"現实政治家"，已轉而直接效劳于帝国主义国家和壟断組織。

在美国"現实政治家"的主要研究中心和堡垒是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頓大学。美国最著名的"实力政策"的理論家，有大哲学家兼社会学家 P·尼布尔，詹·伯納姆，Г·摩根索教授和 P·奧斯古德教授（芝加哥），著名的

外交家和历史学家乔·凯南，Г·基辛格(普林斯頓)，有名的軍事观察家，評論員汉森·鮑德溫（《紐約时报》），还有一位同姓的虽然不像他那么聞名，但是也同样好战的雷林德·鮑德溫(匹茲堡大学历史学教授)等人。

在英、法、比利时等其它資产阶級国际問題专家的許多著作中，也可以感覚到"現实政治家"的影响。至于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那里，"实力政策"的鼓吹者无論在"心理战"机构中，或是在資产阶級的科学中早已取得了統治的地位。

現代帝国主义意識形态的許多流派，是同現有的不同資产阶級政党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工党派，自由党派，法国的社会党派，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其他許多国家內的社会民主党派等)。参加这些党派的著作家，主要是以自己的著作来为本党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問題的公开立場作辯解。在历史編纂学中，天主教派的影响近年来日益扩大。它同梵蒂岡，美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天主教圣秩，以及同欧洲各天主教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法国的人民共和党，意大利的天主教民主党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对于居于統治地位的反动資产阶級的意識形态和在現代国际关系問題上的宣傳具有代表性的，是它的各派按照統治阶級所希望的方向来影响人民群众时所采取的一系列共同的方法。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辯护士，为了混淆事实，以虛假的报道来欺騙讀者，"激励"他們，广泛地采用臆造的和完全无根据的历史事件比拟方法，把大不列顛帝国和美国同古罗馬对比，又把苏联同沙俄和希特勒德国相比拟。他們把一些历史上的术語（"侵略者"、"集体安全"、"綏靖"等等)，硬加在今天发生的在意义上完全相反的事件上去。而且这些方法已濫用到这种程度，有着极其卑鄙蠱惑的性质，甚至于引起了各别的和并不怀有进步傾向的資产阶級的大科学家的憤懣(当然，遺憾的是，这种情况很少見)。

如所周知，"实力地位"政策的拥护者，极猛烈地攻击苏联、美国和英国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有成效的合作，攻击西方国家同苏联在战后时期进行明智談判的一切尝試，說这是与可悲的慕尼黑事件相似的"綏靖政策"。美国科学家 K·斯奈德和 Э·佛尔尼斯在指出这些論断的荒謬时，得出了正确的結論說，如果根据这些說法做出"邏輯的結論，那么任何和平地解决苏美之間的冲突都将是不可能的，除非苏联在所有問題上完全投降。"①（当然，任何人也不会对此信以为眞。）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麦克斯·比洛夫尖銳地批評了把苏联同希特勒德国进行伪造的比拟，并抨击了其它类似的假理論。例如，他在揭露許多資产阶級作家所固有的，抱着自私自利的"功利主义"目的解釋各种历史事实和原則的企图时写道："在美国，現在最具有征兆性的例子也許就是人人都知道的关于联合国否决权的无稽之談。把否决权說成是苏联为了使联合国失去作用这一特别目的，而在联合国中任意制定的。但是这点是极为清楚的：无論哪一个大国，几乎所有的大国如果沒有这种預防办法是永远不会批准联合国宪章的，而且如果美国处在只有少数票拥护其政策的情况下，那么它也会不得不使用否决权，使用的次数也会像它指摘俄国人的那样頻繁"②。

另一方面，許多資产阶級著作家攻击这些眞正科学而明确的概念，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軍国主义"等等。他們利用語义学的公式力图证明，美国、英国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有着"人民的"、"进步的"性质，同侵占他国領土，奴役和剝削附屬国，半附屬国，同准备和进行非正义战爭是无任何共同之点的。美国最大的資产阶級历史学家之一戴克斯特·佩金斯甚至写了一本专著《美国对对外政策的見解》来論证其"非帝国主义性质。"③

---

① *K. C. Snyder* and *E. S. Furniss*. J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mulation, Principles and Programs. New York, 1954, p. 560—561.

② *M. Beloff*. Foreign Policy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Baltimore, 1955, p. 112—113.

③ *D. Perkins*. 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ass.), 1954.

为了易于"美化"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軍国主义，絕大多数現代資产阶級国际問題专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公开迴避研究对內政策同对外政策間的，經济因素同政治因素間的，政府的政策同壟断組織及軍事集团利益之間的任何联系。帝国主义的思想家——經济学家、历史家、哲学家等等，有意地竭力人为地把对国际关系，对外政策的研究同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割裂开来。把它局限在仅仅某一个方面，如法学方面等等。

里尔大学教授 Ж.-Б.杜罗塞尔在其所著《自 1919 年至今的外交史》一书中写道："我們在这里不可能探討深奥的哲学，也不可能分析外交史（名副其实的外交史）同其它历史方面之間存在的联系，如同經济和社会的因素，同資本家和工会的影响，同投資政策，輿論的潮流，同选举和宣傳的社会学，同宗教和意識形态的流派的关系。这个任务是完全超出我們的論述范圍和我們的可能的"①。显然，这个任务是要求涉及到帝国主义国家外交的眞实的，但絕非正直的那些根源。而这恰恰是帝国主义国家外交的歌頌者最不願意涉及的。

現代資产阶級思想家掩盖着这些事实：战后帝国主义陣营的政策是由一群为数不多的，但是实力极为强大的財政工业寡头、貿易、殖民和軍事巨头的阶級利益和物质利益来决定的，这些人不肯放棄自己的利潤、領地和奢望，而且力图阻撓历史的进步。这些思想家們还力图掩盖这种政策在 1945—1949 年在国际关系发展中轉折时期所起的有害作用。他們不断玩弄那些已經陈腐的句子，"維护自由世界，西方文明，基督教"，"美国的崇高的領导使命"等等，企图把国际关系恶化的責任推委到苏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身上，推委到共产主义，工人和民族解放运动上去。

① *J.-B. Duroselle.*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1919 á nos jours. Paris, 1957, p. 9.

資产阶級思想家在曲解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面使用一整套极其恶毒的捏造方法。虽然这一切早已不是什么新东西，已被多次拆穿过，但是它在資产阶級的著作中还是頗有生命力的。其中之一就是离开具体情况而"抽出"历史事实，为辯护某种捏造制造"論据"。列宁在当时就曾揭穿过这种为伪造历史实例来收集"事实"的方法。①但是直到現在，伪造者还在广泛使用这种方法。

故意曲解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另一个方法是随意引证，甚至有时資产阶級著作家还"发明"一些臆想出来的引证。特别是当談到苏联政策的爱好和平的性质，談到列宁在制訂苏联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則等問題上，更是經常使用这种方法。历史的伪造者把实际上沒有說过的話强加到列宁身上，用以"证明"苏联的扩張企图及其侵略性等等。

同时应該指出，捏造苏联对外政策的不同派别之間的明显矛盾。如有些帝国主义思想家为了散布拒絕同苏联合作和談判的必要性的思想，宣称苏联是軟弱的，战爭已使它一蹶不振，因之会接受美国的一切要求，这也即是在論证"实力政策"和单方面强制的政策。

而另外有些人則喧嚷苏联"可怕的"强大和苏联的"侵略性"，說苏联几乎在粉碎了希特勒德国的次日，就似乎力图挑起战爭等等。他們自己也同样号召对苏联采取"实力政策"，持"坚决的态度"。資产阶級的伪造者就是这样从两个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前提出发，得出了一致的結論，得出了一个为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反动势力所期望的实际建議。

在1945年以后，論述国际关系方面的資产阶級著作接踵問世，它們对事件的叙述采取了这样一个公式：由于苏联的某种"侵略的"或是"扩張的"行为（随便什么都可以加上这个标題），西方国家不得不采取某种对策。对于帝国主义国家一切最危及和平事业的危險行为的贊揚，只不过是一些毫无根据的詭辯罢了。

T·貝利提供了伪造战后历史和产生"冷战"原因的典型例子。他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都被认为是知名的"学院派"国际問題专家，他的代表作

---

① 参見《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78—280頁。

《美国人民的外交史》一书已刊行了六版。他在該书第809頁中对1945—1949年上述事件做了如下的概括："这样一来，只經过了几年，俄国共产主义的威胁，便使得美国对外政策进行了根本的革命。美国重新修改了自己的門罗主义对希腊采取了杜魯門主义。美国放棄了不干涉政策，提出了馬歇尔計划。締結了大西洋公約，从而抛棄了不参加对其有約束力的联盟的傳統。在和平时期，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并且通过了巨額軍事預算。他們之所以采取这些改变，絕非本願，主要是出自自卫的本能"①。

T·貝利的以及所有居于統治地位的資产阶級历史編纂学的捏造，主要是把战后世界舞台上发生的事件的主要特点，如以"实力政策"代替国际合作描写成为仅只是由于虛构的苏联的"威胁"行为，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予以必然的回答。而事实上，美英在战后最初几年的对外政策方針，如本书有关章节中所述的，正是产生"冷战"的主要原因，这是有意識采取的方針，是有計划地孕育着阻撓革命改造和以帝国主义統治的条件强加于世界的方針。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之前，在反动的資产阶級的著作中就已經不再借口臆想的"苏联威胁"而展开了对这种方針的公开辯論。

乙、資产阶級历史編纂学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結論的歪曲。为帝国主义的战后世界計划而辯护

一、对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伪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爭剛剛結束时，美、英出版了大量著作，其中都指出，苏联承担了战爭的主要重担，在第二次世界大

① *T. A.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p. 809.

战的决定性战役中，苏联士兵取得了許多輝煌的胜利。Г·康默杰和Г·維尔納茲斯基等人都写过这些情况。①

从当时西方国家的許多官方文件，国务活动家的声明中也可以看到这类評价。弗·罗斯福在1942年写道："苏联承担了斗爭的主要重担。"② 在战爭結束前不久，1945年2月23日溫·丘吉尔承认苏联士兵的偉大功績，他們"决定了德国軍国主义的命运"。

但是，就在当时，也出現了一些貶低苏軍的胜利和避而不談这些言論和书籍。在"冷战"开始以后，对于苏联在反法西斯联盟共同事业中的决定性的軍事、政治貢献的伪造，便成了帝国主义在意識形态上向社会主义大肆进攻的不可分割部分。这种攻击一直延續到今天，其主要任务是，力图詆毀苏联的巨大的国际威望，削弱战后年代里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还利用类似的各种各样的伪造文件来毒化輿論，首先是以侵略的軍国主义精神来毒化資本主义国家的青年。

前希特勒将軍斯派达尔（現在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駐欧洲的陆軍統帅）在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写道：出版这些书，有助于"改善北大西洋联盟的武装力量的軍事的和政治的准备"③。这种說法絕不是偶然的。

1947年出版的Р·舍格和Г·戴維尔德合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④，显然力图把苏軍的决定性战役和胜利，說成是在世界大战进程中的

---

① *H. Commager*. The 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Boston, 1945, p. 188—232; *G. Vernadsky*. A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1946, p. 453—493.

② 《1941—1945年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苏联部长会議主席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

③ «Entscheidungsschlacht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Frankfunt am Main, 1960, S. 5.

④ *R. Shugg* and *H. Deweerd*.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1947.

次要的事件。从西方出版的許多其他人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对苏联在战爭中的作用的类似解釋。

西方的历史編纂学，首先是美国的，一方面竭力貶低苏联的軍事貢献的意义，同时又千方百計地力图夸耀同盟国的胜利。С·摩里逊、Ф·普腊特、Э·戈耳德曼等人①都抱有这个目的。他們把在大西洋和北非的战斗，評价为几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Ф·普腊特在其《战爭改变了历史》一书中，把美英士兵所进行的默默无聞的战斗同苏联战士在伏尔加河、庫尔斯克、奥廖尔等地取得的决定性胜利等量齐观。②据丘吉尔的最亲密的助手和顾問伊斯迈的观点来看，是文萊門之役"奠定了同盟国胜利的基础"③。

值得注意的是，西德的資产阶級历史学家中有些人写了許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专著，根据切身的經驗对战爭有更多的了解，他們比在大西洋彼岸的同行更快地就承认了斯大林格勒之战的意义。在西德公布的一些前希特勒将軍和軍事历史家的文集中，甚至承认斯大林格勒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轉折点"④。

西方的反动的著作家們，利用各种伪造方法力图貶低伏尔加河两岸胜利的意义。其中有許多人把斯大林格勒的胜利（当然，还包括苏軍的其它許多胜利）的原因說成是由于所謂的"自然的因素"——俄国冬季的严寒条件。Е·霍尔特、Ф·弗兰克⑤等人都提到这个原因。美国布萊德雷将軍在他的回忆录中⑥也持有这种观点。Ф·普腊特也认为，如果不是在1941年冬天希特勒的軍队損失了那么多的坦克，那么他很可能还会站得住脚。

---

① *S. Morrison.* American Contribution to the Strategy of the World War II. London, 1958; *F. Pratt.* The Battles, that change History. New York, 1956; *E. Goldmann.* The Crucial Decade. America 1945—1955. New York, 1956.

② *F. Pratt.* The Battles, that change History, p.316

③ «The Memoirs of General Lord Ismay». New York,1960, p.282.

④ «Entscheidungsschlacht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S. 311.

⑤ *E. Halt.* The World in the War 1939—1945. London, 1956; *F. Frank.*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60, p.426.

⑥ *О. Брэдли.* Записки солдата, стр.208.

很难确定，到底誰是对于苏联在战爭中取得胜利的原因做出这种“深刻”的解釋的首創者：是那些当时在希特勒面前为自己在莫斯科近郊和伏尔加两岸遭到敗北而辯护的納粹将軍們（現在他們努力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領导人表示自己具有高度軍事素养）呢，还是力图貶低苏軍在粉碎希特勒主义中的作用的美英反动历史学家。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前者也好，后者也好，都是根据自己今天的目的有意地伪造历史。

十分明显，在战后資产阶級的著作中，广泛傳播着的关于苏軍战胜希特勒强盜是由于“自然条件”所致的这种对历史事件的解釋，是同科学的分析毫无共同之处的。当然，苏軍的胜利，不能够用严寒的冬季来解釋，因为双方是处在同一条件下的。莫斯科城下的胜利，及其后的胜利是由于許多因素的总合：苏軍的坚强和軍事技术的日益提高、苏軍的装备、国家經济状况以及苏联人民的道德政治上的团結一致等等。在苏联的許多著作里，已經詳細地分析了所有这些因素，并且揭穿了那些貶低苏联人民在战爭中取得的胜利的資产阶級思想家的虛假論断。

反动的西方著作家，在談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远东战場上的进程时，也明显地曲解事实。他們在这方面也力图歪曲眞正的历史事件，否认苏联在粉碎日本軍队方面的作用等等。如伊斯迈在其回忆录中就认为，苏联的对日行动，“在軍事上是徒劳无益的”①。

但是，第一，在先粉碎希特勒德国，之后粉碎他的主要同盟者——日本，之間是存在着直接的联系的。苏联的对德斗爭，对粉碎侵略者的共同事业做出了巨大貢献。其次，尽人皆知，苏軍击溃了日本的最强大的軍队之一——关东軍，这部份軍队一直駐扎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帶。美国迪安将軍曾写道，在关东軍还存在的情况下，美国軍事統帅部对取得最后胜利是沒有信心的②。

許多資产阶級作家夸大在长崎和广島投下原子彈对于日本投降的作用。但是現在全世界已經非常清楚，这种作法并不是出于軍事的，而是出自政治的考虑。

---

① 《The Memoirs of General Lord Ismay》, p.403.

② *J.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 New York, 1947, p.225.

从資产阶級的伪造者关于苏联和西方国家在粉碎法西斯侵略者的貢献的論断中，除了軍事方面外，还可以明显地看出其政治方面：力图表明，似乎領导同法西斯斗爭的，不是苏联，而是美国或英国。

西方的历史学家（特别是美国的）經常把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特别同美国在經济方面的援助联系在一起。P·格林費尔德和A·魯宾斯坦等人說，如果不是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物資，則苏联軍队不可能取得輝煌的成就①。

誰也不否认美国对于反希特勒同盟者所給予的帮助的意义。但是认为只是由于这种援助，苏联才能在战爭中取胜，这是滑稽可笑的。只要看看H·沃茲涅先斯基②或其他人所写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包括美国的）就足以使人确信，是苏联的軍事經济，即保证了战爭的順利进行，也保证了战胜法西斯侵略者。

資产阶級伪造者的相反論断，都有其隐蔽的目的。他們力图使世界輿論界相信，苏联的胜利并不是必然的，对苏联来說，很可能有另外一种战爭的結局。他們这样做，是为了向人們灌輸这种思想，似乎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可能战胜苏联，社会主义已并不那么强大，它可以被消灭，只要动用帝国主义的軍事机器来反对它。但是战爭和侵略的辯护者的这种論調并沒有也不会使任何人相信苏联的"輭弱"。无論資产阶級思想家怎样揑造，但是人們的心里却永远感激苏联——承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重担的反法西斯斗爭的領导者。

苏联人民以自己的英勇斗爭，不仅捍卫了自己祖国的独立，同时还解放了許多被希特勒分子占領的欧洲国家，帮助了世界上其

① *R. Greenfield.* The Historian and the Army. New Brunswick, 1954, p.70—90; *A. Rubinste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p.161.

② *Н.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Во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тр.74.

它地区粉碎了侵略者，从法西斯主义的万恶瘟疫中拯救了世界的文明。同时应当指出，苏联无論是在战爭的任何阶段，或是在整个自己存在的过程中，毫无任何掠夺其他国家和人民的企图，也无任何想在国际舞台上扩大自己統治的計划。苏联在自己的战后計划中，經常考虑到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合作，坚决避免采取任何有可能在反希特勒联盟的参加者——联合国的成員間造成关系恶化的行动，造成各国人民之間互不信任和在二次世界大战后造成紧張国际局势的行动。

但是并非所有反希特勒联盟的参与者都这样忠于自己对盟国的义务。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西方的某些集团即拟訂并宣傳了同建立正义的持久和平毫无共同之点的帝国主义的計划。

二、帝国主义的"美国世界"的宣傳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剛剛开始时，在美帝国主义集团中就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认为：由于别的国家相互削弱的結果，美国在世界政治上和經济上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时刻終于来临了。因之，下述情况絕非偶然，从 1940 年起，美国就接連不断出版了許多"著作"，书中計算未来的利潤，論证建立美国世界霸权的計划和描述"美国世紀"的美妙絕倫。

也正是在此时期，在美国提出了，并发展了許多后来成为整个資产阶級历史編纂学的标准理論中的一种理論。按照这种理論，美国早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即已成为世界上的头等强国了（这本身是无可非議的）。美国成为世界利益的主宰者，但是它似乎拒絕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相应地承担任何世界义务和任何責任，仍然固守"孤立"政策。正是由于美国的这种虛伪的不参与世界政治的政策，許多国家犯了无数錯誤，以致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这种理論，不仅掩盖了美国壟断組織和統治集团在协助法西斯侵略者

方面的眞正責任，而且又論证了美国今后和永远負有"关怀"全世界的权利和义务。

1940年春出版的《孤立的美国》①一书，对这一理論做了极詳尽的发揮。該书作者是国际关系問題委員会的領导人，著名历史学家雷蒙德·来斯利·布埃耳。当时出版的 Д·К·霍华德写的《美国和新世界秩序》，也提出了这种理論②。最后，1941年初問世的卢斯所著轰动一时的小册子《美国的世紀》，也論述了这种理論。

亨利·卢斯写道："下述事实，过去是，現在仍然是美国在国家政策方面的主要困难：在二十世紀，我国已成为最强大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国家，但是美国人无論在理論上或是实踐上都还不能适应这种状况。其結果造成，美国未能起其世界大国的作用——遇到挫敗，这不仅对美国人本身，而且对全世界都带来致命的后果。为了糾正这种状况，应当坦率地承认，作为地球上最强大和最富有生命力的我們这个民族的責任和我們的可能性，因之，应竭尽全力来发揮我們对世界的影响作用以期用我們认为适当的方法来达到我們所預期的目的。"③

《美国的世界》的最初綱領草案，就已证明，美帝国主义力图取得世界仲裁者和剝削者的地位。作为战后世界組織的主要的、必然的特点是，規定經济上最强大的美国壟断組織，美国資本的活动享有完全自由。稳定通貨、取消貿易壁垒、貿易"自由"、殖民地"国际化"、鼓励外国資本投資、到处傳播"私人企业主的活动和他們的倡議"，建立全世界的和地区性的維护美国財政寡头的統治和利潤的軍事政治組織——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成为未来美国帝国的不可分割的标志。

《美国的世紀》的鼓吹者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两种可能的結果："軸心国"取得胜利，或是与其相对抗的集团，在美国支持下，也就是在它的

① *R. L. Buell*. Isolated America. New York-London, 1940.

② *D. K. Howard*. America and a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1940.

③ *H.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p.22—23.

統治作用下，获得凱旋。

美国"大企业"的辯护人之一米勒认为只存在着"两种未来世界結构的选擇，德国的調整或是美国的調整。

……只有一个大国将拥有机械化装备、原料、金融和动力以便重建战后的世界，只有美国，将拥有一切必要的实力、資源和进行領导的能力……我們无須为英国的和平目的担忧；到战爭結束时，希望迎合我們的欢心，将成为他們的主要目的。誰也不会妨碍我們"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形成的以苏、美、英为首的反法西斯的战斗联盟，社会主义国家同資本主义国家間的有成就的合作以及战爭結束后建立民主世界的远景，这些都是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的反动壟断組織集团所不喜欢的。他們千方百計地想孤立并削弱苏联，阻撓順利地成立联合国，坚持自己的战后世界調整的帝国主义計划。在1942—1945年，美国的著作大肆宣傳推行战后的世界受美国庇护的方針。

美国前总統赫·胡佛和X·吉布逊所著《持久和平的問題》一书已暢銷十余版，著名評論員Г·麦克尼耳的名之为《美国的和平》一书②，还有其他等人的著作，都在宣揚按照美国的"方式"，并在各种"国际"形式掩飾之下的美国的监督下建立世界的最后秩序。

正当苏联、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綫上进行英勇斗爭反对法西斯侵略者，彻底消除希特勒制度及其一切特征的时候，希特勒制度不可分割的部分之一，帝国主义战爭思想論据的充滿侵略和种族主义精神的仇視人类的反

① *D. Miller.* You can't do Business with Hitler. New York, 1942, p. 160—162, 166—167.

② *H. Hoover* and *H. Gibson.* The Problems of Lasting Peace. Garden City, 1943; *H. MacNeil.* An American Peace. New York, 1944.

动地緣政治学，在美国找到了新的隐身所。

在1942年美国地緣政治学家的一本重要著作，H·斯皮克曼的《美国的世界政治战略》①一书問世以后，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思想武庫中"实力政策"的宣傳，便占据了巩固的重要地位。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最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問題专家P·斯特劳斯一胡佩，反动的活动家、評論員Э·卡耳伯森，X·阿本德，P·卡林德等人便展开了这种宣傳。②

某些美国"迷信实力"的崇拜者，出于威信的考虑，力图否认自己和希特勒的地緣政治学是同源。但是他們在宣布了自己对"实力均衡論"、"生活空間論"的譴責之后，却立即开始鼓吹这类的观点，只不过是把"实力的統治中心"从"欧亚大陆"轉移到"大洋之間"，即美国罢了。此外，美国的地緣政治学家們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将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实力統治中心。因此，就是那些主張根据經典的"实力均衡"原則使战后世界成立地区性組織的人，也主張美国在維护"均衡"方面应当起"調解的"和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在西半球，而且包括所有其余地区之間的，甚至于每一个地区內部的，如欧洲、亚洲等等地区的"均衡"。

这方面最明显的证明，就是1942年出版的P·斯特劳斯一胡佩所著《地緣政治学。爭夺空間和实力的斗爭》。P·斯特劳斯一胡佩本来写书的目的是要揭露納粹分子如何利用地緣政治学作为"征服世界的綱領"，并把全部注意力几乎都放到这方面之后，却突然出人意料地得出結論說，地緣政治学是"革命的"科学，把它应用到历史上，国家之間的相互关系上可能是完全合理和"正确的"。按照P·斯特劳斯一胡佩的話来說，希特勒地緣政

① *N. Spykman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② *R. Strausz-Hupé*. Geopolitics: 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 New York, 1942; *R. Strausz-Hupé*. The Balance of Tomorrow. A Reappraisal of Basic Trends in World Politics. Philadelphia, 1945; *E. Culbertson*. Total Peace. What Makes Wars and How to Organize Peace. Garden City, 1943; *H. Abend*. Pacific Charter. Our Destiny in Asia. Garden City, 1943; *R. Callender*. A Preface to Peace. New York, 1944.

治学巨子K·豪斯霍弗的論断，只要根据后来的科学技术成就稍加修正即可用，而話就可以这样說："工艺学和地理学都一样指明美国是国际警察力量的主要武庫和基地"，其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后，組織并維持"世界上的新秩序"①。

地緣政治学者是最早公开攻击美、苏、英合作政策的人，他們提出了如果不能够早一些，那么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結束，必須立即取消这种合作的主張。

X·阿本德声称："如果誰期待，隨着和平的到来会出現自然形成的謀求公共福利的世界同盟之类的东西，那他必将彻底地失望。甚至于就是在战胜国中間，也不会出現齐心为善的乐土之类的东西……只有当战胜国中間最强者（X·阿本德在自己整部书里始終认为美国就是这种最强者。——作者）除了实力之外能表現出領导和行动的决心，世界上才会有秩序、有正义"②。由此可見破坏战后国际合作，强使其它国家接受美国专制的方針，远在取得胜利以前，即已有所論证和辯护，并且把它說成是美国的英明政策。

美国許多地緣政治学者从"爭夺实力斗爭"的观点出发，来研究一切国际生活現象。最終都是把"总体战"、"不断的战爭"和"預防性战爭"看成是国家間經济、政治、意識形态关系发展的必然的周期性的結果。

如卡耳伯森曾就这样的問題制造了混乱：即在未来将有人来爭夺美国壟断組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曾准备取得的在世界上的統治地位。他声称："美国的实力时期的限度，不会超过二十五年。但是为了确保其未来，美国能够利用目前实力时期的实际限度，不会多于五年（斜体〔中文用仿宋体〕是卡耳伯森所标。——作者）"③。因此，卡耳伯森坚决

① *R. Strausz-Hupé.* Geopolitics, p.195.
② *H. Abend.* Pacific Charter, p.300.
③ *E. Culbertson.* Total Peace, p.57.

要求立即考虑，美国应不惜任何代价，包括新战爭的代价，迫使世界建立一种能够排除未来在世界上某个地区，欧洲或亚洲出現新的"实力中心"的生存方式。他竟厚顏无耻地写道："实力均衡的机械，不是为防止战爭效劳，而是使先发制人的战爭成为有效的。"①

不难了解，地緣政治学家所鼓吹的理論，是以怎样的后果在威胁着独立国家和人民，威胁着普遍和平的事业。根据这一理論，美国不仅应当把所有其它各国的对外政策，而且把对內政策，以及这些国家的发展都統統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实力政策"的辯护者揚言，新独立国的出現，"社会进步"，即革命的变化，以及其它国家的工业发展是对"实力均衡"的破坏，是对美国的"危險"，因之他們竭力阻撓这些国家的經济发展，力图使世界上保持陈旧的社会关系并阻止民族解放和民主运动的发展，——所有这一切是为了巩固資本主义制度，确保美帝国主义的阶級的、政治的和財政的利益，为了建立美国的在世界上的工业和財政、軍事和政治的壟断。

Э·卡耳伯森和其他地緣政治学家借口关心确保美国在战后的"安全"，而坚持主張在战后，应当以享有"如同目前我們（即美国）在百慕大群島和古巴的現有基地中那种长期的非帝国主义(!)的条件"那样，在整个拉丁美洲，在冰島、格陵兰，在亚速尔群島和加那利群島，在馬德拉群島和佛德角群島，海南島和台灣，在朝鮮、千島群島，在新喀里多尼亚島，帝汶島和琉球群島，在印度支那和"暫时被占領的"泰国等地向美国提供軍事基地②。

Э·卡耳伯森描繪出了一幅为美国軍国主义分子所十分中意的图画："对美国大陆唯一有效的纵深防御，就是在数千浬的辽闊无际的海洋上的武装的不沉的航空母舰网。在这个坚固的网里，配备有新型的舰只，超級战斗飞机……在大西洋，这个网由冰島經过亚速尔群島到达佛德角群島环繞着欧洲、非洲海岸。在太平洋上，这个网从珍珠港和特魯克群島經过菲

① *E. Culbertson.* Total Peace, p. 73—74.

② 同上书第326—327，333—334頁。

律宾、荷屬东印度到亚洲大陆的印度支那和泰国的軍事基地构成一座桥梁。事实上整个巨大的基地网已經建成，其中許多早已或是很快即将为美国人所占領。

美国拥有了这样的战略区，就不仅能够防御通向美国大陆的要冲，同时还能迅速有效地实現其对欧洲，以及亚洲的干涉"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在美国除了号召美国成为世界的"实力中心"和仲裁者之外，还广泛散播着各种各样在美帝国主义庇护下的西方"民主国家"团結的計划，其目的是为了維护旧的資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秩序，和在世界上建立实力最雄厚的財政寡头集团的专政。

在战后世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者"統治的最激烈的辯护者，是美国資产阶級著作中很風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派的信徒。屬于此类的，主要是美国那些同不列顛帝国在經济上和政治上有密切联系的有势力的壟断資本家和政界人士。他們认为，虽然美英之間在許多問題上有很大矛盾，但是从双方的政治和資源联合中所得到的，要比从双方"平行行动"中所得到的要多。

美国記者、社会活动家克拉倫斯·施特賴特，在美国和英国被看作是、而且的的确确是現代英美联盟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他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几个月出版的著作《是建立联盟的时候了》（«Union Now»）。是这一运动的眞正宣言。这本书在短短时間內就再版了几十次，仅在美国，在战爭期間总共发行了三十余万册。在1943年，克·施特賴特还創立了至今还存在着的和用同一名称的协会，它是"大西洋团結"和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性的露骨的宣傳者②。

著名的評論家約翰·麦科馬克，前国务院經济顧問和未来的資产阶級

① *E. Culbertson.* Total Peace, p. 208—209.

② *C. K. Streit.* Freedom's Frontier. Atlantie Union Now. New York, 1961.

大历史学家赫伯特·費斯，K·哈契森等人①也都提出了主張美英間在战后締結紧密联盟的建議和結論。

約翰·麦科馬克在其《美国和世界統治》一书中，非常詳尽地发展了在資产阶級的历史編纂学中广泛流行的以"美国世界"来代替"英国世界"的历史公式。根据这个公式，在整个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大不列顛依靠自己的工业壟断、帝国和舰队来統治世界。連西半球也是在"不列顛盾牌"的掩护之下，在那里，美国順利地在发展、巩固，并准备登上世界舞台。麦科馬克等人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起，大英帝国就已开始衰落，但是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不能让它从盎格魯撒克逊人之手中溜掉。"日益明显地可以看出，美国不仅应当領导讲英語的各民族以便贏得这次战爭，取得这次战爭的奖品——自由世界，而且应当准备在贏得战爭之后来管理这个世界……随着英国在世界上統治地位的削弱，美国的統治地位应当加强。同时隨着英国領地的縮小，美国的領地应当扩大，在英国統治結束的地方，应当开始美国的强制。"②

英美同盟的美国信徒和宣傳者，害怕"分裂的盎格魯撒克逊人不再能把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对抗斯拉夫人和条頓人。"③尽管这有多么奇怪，但是在1942年，当苏联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和努力的代价从希特勒强盜手中挽救了世界文明的时候，美国有一些最狂热的种族主义分子就曾发出了这种叫囂。

克·施特賴特为了把他的美英霸权的主意弄得能叫其他国家听来比較順耳和动心，他提出了創立"十五民主国联盟"的口号，十五国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联邦、爱尔兰、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他公然承认說，創立英美联盟的方案带有太明显的帝国主义色彩，为了吸引"較小民主国家"向它靠攏，应当把方

① *J. MacCormac.* America and World Mastery; The Fu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New York,1942; *H. Fels.* Sinews of Peace. New York, 1944; *K. Hutchison.* Rival Partners. America and Britain in the Postwar World. New York, 1946.

② *J. MacCormac.* America and World Mastery, p.6—7.

③ 同上书第330頁。

案弄得"委婉"些。此外，比利时和荷兰之所以引起美国的兴趣，与其說是由于它們本身的原因，不如說是因为它們拥有龐大的殖民領地，这些殖民領地也必須参加"联盟"，但它們的居民，也像印度、緬甸、非洲各国和其他各地一样，不享有任何权利（公民权、投票权等等）。这样一来，設計中的"民主国家神圣同盟"的眞正性质就馬上昭然若揭了，尽管"个人权利"呀、"自由"呀、"尊重法律"呀之类的漂亮字眼数不胜数。

正是这位克·施特賴特，第一次提出了在战后倍受西方国家領导人热爱的术語"北大西洋联盟"。但是1940—1944年的克·施特賴特已不同于后来的克·施特賴特了，他在1946—1949年出版的著作，已經不再用"苏联的威胁"和"保卫自由世界"的神話打掩护，而是明目張胆地号召为了确立美英寡头統治的世界霸权而建立这种联盟。

用克·施特賴特的話来讲，有十五个担任"創始国"的北大西洋"民主国家"就足够"确保一个在财政上、金融上、經济上和政治上拥有必要实力的世界政府的核心"。克·施特賴特在談到拟議中的"联盟"的实力时写道："这十五个国家合在一起，几乎拥有半个地球，控制着所有的大洋洲，几乎統治着人类的一半，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二都掌握在他們的手里……他們可以操纵几乎所有主要資源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們控制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軍事上所必需的物資，如石油、銅、鉛、鉄、鋼、煤炭、錫、棉花、羊毛、紙浆、船只。他們几乎完全操纵着这些关鍵部門，如鎳、橡胶和汽車的生产。他們实际上控制着世界上全部黃金儲备和銀行資产。他們現有的武装力量是这样的，只要联合起来，即便縮減自己的装备，也能够比任何其它两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占优势……联盟在实力上的优势一經建立，只是通过局外企业参加联盟的办法，就会使优势不断增长"①。

美国著名的有影响的評論員华尔特·李普曼在1944年出版的《美国的軍事目的》②一书中对于按照美国統治集团的帝国主义意图进行战后世

① *C. K. Streit.* Union Now. The Proposal for Inter-Democracy Federal Union. New York, 1942, p. 10.

② *W. Lippmann.* U. S. War Aims; *W. Lippmann.* U. S. Foreign Policy: Shield of the Republic.

界政治組織的計划，做了最概括的闡述。

这个計划包括了美英的著名国务活动家、“西方文明”的辯护者以及地緣政治学者所拟定的战后方案中的許多具体的因素。这个計划的基础是在美国庇护下建立西方資本主义国家的强大的經济、軍事和政治联盟，即所謂的“大西洋国家联邦”。因之維护“西方文明”和战后“世界秩序”的任务，正是落在“联邦”和其“天然領袖”，美国的头上了，也即是說美帝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起統治作用的条件下，来維护資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制度。华·李普曼排除了战后美苏間，“大西洋国家联邦”同“俄国軌道”間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从而，他实质上早已論证了在战后美国敌視苏联的侵略的对外政策方針，“实力地位”政策和对所有爱好和平、爱好自由的各国人民的强制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美国有势力的壟断集团的代表人物，不仅想到在战后建立美帝国，加强世界資本主义的地位，剝削和奴役地球上其它各国人民，从世界市場上排挤掉危險的竞爭者，把世界市場变成为自己“自由”活动的場所，他們还早在1941—1945年就策划了战后美国經济軍事化的計划。就是在当时在美国相当广泛傳播着一种虛伪的最危險的关于“不断的軍事繁荣”可能性的“理論”，关于在和平时期将美国大部分經济部門去从事軍火生产，便可确保經济“无危机”的发展，并能保证取得高額的固定利潤的理論。

在M·約翰逊(大軍火工业家，順便提提，战后他曾在美国陆軍部里任过要职)和Ч·哈文根据特邀而編写的《爭取常胜》，和K·考德威尔的《空軍力量和总体战》①等书中，最明显不过地反映出了对“武装的世界”的

① *M. M. Johnson* and *C. T. Haven*. For Permanent Victory. The Case for an American Arsenal of Peace. New York, 1942; *C. Caldwell*. Air Power and Total War. New York, 1943.

鼓吹。

軍火商的辯护人，为了論证美国經济不断軍事化的必要性，他們把战爭的"不可避免"和战爭"永恒性"問題作为盾牌，似乎战爭是一切社会所固有的，是由人的本性所引起的。

K·考德威尔說："在这次战爭結束时銷毁掉所有装备，这只能保证在未来的战爭开始时将利用在斗爭中所能动用的一切……重要的是应当了解到，这次冲突之后，产生战爭的根源并不会消失。这些根源仍然存在，还会同它們打交道的。认为对待这些根源可以像对待那些抽象的概念，如正义、倫理，消息灵通的輿論或宗教一样，这就是对全部历史和現实的忽視……战爭的能力是人民群众中所原有的(!)"①。

从上述这种仇視人类的論断中，可以引伸出相应的实际結論。M·約翰逊和Ч·哈文写道："美国的工业現在已开始考虑，如何滿足自己的最新的消費者——武装力量的需求。另方面，这个最大的、挑剔最多的买主，在工业家中找到了熟练的、有毅力的、有发明才干和果断的战友……直到現在为止，工业从来沒有发展和利用自己的这些能力，无論是发明也好，或是生产軍事装备也好。这是一种偶然性，而非必然性"②。这种"偶然性"不应当再出現了，工业和武装力量的"合作"，壟断資本家同将軍們的"合作"，从現在起就应当成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不可分割的特征。"武装世界"的宣傳者摊开了自己的底牌"如果在战后，我們坚持拆毀汽車企业中生产坦克的車間，那么将犯下眞正悲剧性的錯誤"③。

由此可見，美国最反动的侵略集团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里，就不顧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緒，違背联合国家反法西斯联盟的目的，不仅蓄謀，而且在当时的美国著作中业已广泛宣傳了在战后建立美国世界霸权，反对世界上革命的改造，推行"实力政策"和国家經济的軍事化的計划。早在1940—1945年，就已經全力地为未

① *C. Caldwell.* Air Power and Total War, p. 13—15.

② *M. M. Johnson* and *C. T. Haven.* For Permanent Victory, p. 213—214.

③ 同上书第215—216頁。

来的"冷战"进行了思想准备。到目前为止，在他們的思想准备中唯一缺少的部分，就是当年曾被法西斯宣傳利用过的关于"苏联威胁"的无稽之談。

三、英帝国統治阶級的战后奢望

在英国資产阶級的著作中，对于战后世界的組織問題的注意比較少些，而且問題的提法本身也比美国更为謹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英国的統治集团很难指望，在战爭結束以后，英帝国不进一步衰落，宗主国的国际地位不进一步削弱。英国在世界"力量对比"中比重的削弱明显地妨碍了它采取积极的"实力均衡"和"实力地位"政策。

但是，那种鼓吹帝国主义的战后世界組織，或是建立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之上，或是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霸权基础之上的主張，在英国也有其地位。同时，英国的作者竭力强調保持英国在不列顛帝国、在欧洲、中近东和非洲各地統治地位的必要性。

地緣政治学的"始祖"之一，赫尔弗德·麦金德的代表作《民主的理想和現实》一书，在战爭年代里曾在英美数次再版。按該书作者的話来說，該书的再版，应該成为"对現实主义的号召"，这种現实主义将使战后"讲英語的各民族的頗聞名的理想主义的浪潮"得到"平衡"①。伴随着这种"对現实主义的号召"而来的是，重复地緣政治学的原理，好似战爭結束以后"国际紧張局势的重新加剧"是不可避免的，因之建議英国的国务活动家在准备迎接和平时，应当据此来确定方向。

在战爭年代里，英国有許多著作深受地緣政治学观点的影响，其中如最著名的資产阶級历史学家之一Э·卡尔教授的《和平的条件》。在书中大部分談經济問題之外，Э·卡尔也相当明确地論述了英国有势力集团对

① *H.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1944, p. VI.

世界政治組織的观点。他写道："就是在新的(战后)世界，也如同在旧的世界一样，必須考虑現实的力量……二十世紀的世界，归根結底将发現其中心是在大西洋彼岸，也許它会有几个这样的中心……大不列顛現状的革命变化可以这样来形容，即它不再是世界上唯一强大的国家的时候，它将成为两三个，或是更多世界大国之中的一个"①。

Э·卡尔对于美国在战爭进程中可能成为"最强大的世界强国"的远景无法提出任何異議。不但如此，他还主張"美国更积极地参与"战后世界的建議，认为这一点的主要保障是"美国在其它国家領土上，特别是英国領土上获得軍事基地"②。在往下的論述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他是希望"美国积极参与世界的事务"，首先要能对英帝国主义有利。Э·卡尔写道："显然，在远东，大不列顛的作用总的說来应当是輔助性的。在这里当美国还沒有发揮全部影响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有效地进行活动，大不列顛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这里的主要倡議权将屬于华盛頓。但是在世界上其余地区，从經济上和政治上的观点来看，完全可以期望，美国提出的一切，对大不列顛說来也是注定的。如果大不列顛能采取明智的政策，能重新抱着唯一能使其免于衰亡的那种負有历史使命的感情的話，那么它就仍然能够在欧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在中近东起着領导的和統治的作用。它在这里能取得成就的大小，毫无疑問，将取决于世界上其它地区讲英語的民族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对它的支持程度而定。英国的明确的坚决的政策，贏得美国和一些自治領的积极合作，不是有很少可能，而是有很大可能"③。

Э·卡尔认为，正是大不列顛应当来填补欧洲在德国失敗后所出現的"眞空"，因为法国在欧洲的"力量对比"中已不可能再起任何重大作用，而欧洲的其它小国，他們本身，正是这种"眞空"。Э·卡尔以那种不同于他們的"直爽的"美国同事的，为英国資产阶級作者所慣用的含混不清的詞句，提出了限制苏联参加战后东欧的世界組織的思想，同时也提出了在未来可以吸收德国"作为伙伴参加到某个大規模的，大不列顛也参加在其中的联

① *E. H. Carr.* Conditions of Peace, p. 166, 173.
② 同上书第182頁。
③ 同上书第224頁。

合組織之中"①的想法。

在英国也有一些英美联盟、即"大西洋"联盟的积极拥护者认为，英美不互相支持，便不可能完成他們在地球各地的无数"义务"。乔治·凯特林教授是这种主張的最早的、最明确的宣傳者之一，直到現在，他还一再重彈陈調，現在又补加上了对苏联的誹謗，以便建立"大西洋民主国家"的世界統治。②

凯特林教授根本无視現实，他一貫认为，二十世紀完全可以作为"英美世紀"載入文明史册。他的許多著作的目的"宣傳大西洋世界的有机联合，而这个世界上讲英語的部分是其生命的核心"，并把大西洋世界的联合作为建立"世界組織和世界政府"③的第一步。在"大西洋联盟"領导下，还应随着欧洲各国人民从法西斯桎梏下获得解放，在东、西、北欧建立区域性联盟。而"英联邦"应成为所有这些組織之間的，美国同法国間的，泛欧联盟同泛美联盟等等之間的联系的調节的环节。

凯特林教授完全贊同克·施特賴特的观点，认为世界上的任何力量，任何国家和任何革命运动都不能同"大西洋民主国家"联盟对抗。他写道："英美联盟将永远意味着，俄国不能成为世界上的統治力量……欧洲发生的任何革命都将由西方来組織，而不会使欧洲陷入斯拉夫人的混乱(！)"④。

在战爭期間，英国出版的著作里广泛傳播了各种帝国主义的組織世界的計划和維持旧的社会秩序的計划。这些計划的傳播同破坏反法西斯联盟的总路綫直接有关。而美英反动集团所奉行的这条总路綫已在一定程度上在这些国家的軍事政策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

---

① *E. H. Carr*. Conditions of Peace, p. 186.

② *G. Catlin*. Anglo-Saxon Tradition. London, 1939; *G. Catlin*. One Anglo-American Nation. London, 1941; *G. Catl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London, 1959.

③ *G. Catl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 p. 31.

④ 同上书第97頁。

四、反动集团对于反法西斯联盟各国合作政策、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的抨击

在反动的資产阶級的著作中，恶毒地曲解反法西斯联盟的历史，曲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同盟国在共同的会議上所通过的許多决議的內容和意义。最經常遭到歪曲的一个主要問題，就是基本上在雅尔塔和波茨坦所規划的战后和平安排。对雅尔塔和波茨坦决議（如所周知，它們在当时曾得到全世界的热烈拥护）① 的批評，首先是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同时美英在战爭年代里所实行的保证了同苏联合作和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协議的对外政策方針也遭到了攻击。

雅尔塔和波茨坦，奠定了战后民主发展的基础，战后时期同盟国平等合作的基础。反动的"批評"的火力正是指向这些基础的。

对于苏联对待同盟国协議态度的捏造，采取了两种显然相互矛盾的基本态度："雅尔塔只是对俄国人有利，因此应当拒絕它"，或是"俄国人并未履行克里米亚会議的决議，因此我們也应該无視它們"。

"实力地位"政策的著名拥护者之一、汉·鮑德溫所著的轰动一时的《战爭的重大錯誤》一书，对于战后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对外政策方針的抨击，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这本著作里提出了，美国获得了战爭的胜利，但却輸掉了"世界"的論点，明显地反映了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以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力量的胜利而发生的根本的进步变革，对于美国企图成为"世界仲裁者"的打算的破产，深为不滿。

---

① 如丘吉尔曾写道，雅尔塔是政府首脑最有結果的会晤之一（参見《1941—1945年苏联偉大卫国战爭期間苏联部长会議主席同美国总統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第307頁）。

汉·鲍德溫为了把反动計划的失敗，解釋为純粹是由于主观因素——罗斯福政府的"缺乏远見"的政策，便在他的著作里发展了为資产阶級历史編纂学广泛傳播的眞正令人发笑的論調：似乎苏联在战爭进程中追逐着一定的政治目的，而美国考虑的則仅是如何尽速、彻底地从軍事上粉碎德国和日本。

他写道："毫无疑問，为了英、美和世界的利益，应当促使，甚至于应当鼓励两个大独裁国家相互格斗，直到两敗俱伤。这个斗爭将使共产主义和納粹主义同时削弱，它将使民主国家成为世界上的統治力量……1941 年 6 月22日，当德国侵犯俄国时，正是民主国家建立持久和平(！)的大好时机，但是我們錯过了这个机会。英美不去以装备和武器援助俄国，——当然不可太多，——又不去轰炸和封鎖德国，——当然不可太剧烈，——反而在珍珠港事件后，完全卷入爭取无条件投降的斗爭中去了。"①对于反法西斯的斗士們和正义的和平理想侮辱再沒有更甚于此的了。这里，已經把对于不久前还被汉·鲍德溫称之为"文明的英雄捍卫者"的恶毒攻击，同对于美英人民在反法西斯侵略者的斗爭中所做貢献的猛烈抨击結合在一起了。

汉·鲍德溫把罗斯福相信苏联的領导人力求同資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希望战后在联合国范圍內組織国际合作和美国軍事集团承认苏联为了尽快取得对日的胜利参加对日的斗爭的必要性等等都称为美国政策的"虛假前提"。这里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鲍德溫同《紐約时报》軍事評論員的汉·鲍德溫竟說出截然不同的話，这一点并不使他感到害羞。汉·鲍德溫在《战爭的重大錯誤》一书中說，美国的領导人于 1945 年 2 月在雅尔塔认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将挽救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这就大錯特錯了。"到雅尔塔会議以前，日本就已經被打垮了"。②也是这位汉·鲍德溫，在 1950 年 3 月 26 日，在《紐約时报》上发表的一篇論述日本冲绳之役的文章《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海空之战》中写道："迄今为止，我們的海軍从来沒有在这么狹窄的地区遭到过如此巨大的損失；迄今为止，美国人从来沒有在这么短促的时間，在地球上这样一小块地方洒过这么多的鮮血"。从 1945 年

① *H. W. Baldwin.* Great Mistakes of the War. London,1950, p. 9—10.

② 同上书第 73 頁。

3月中旬到7月初，美国人在这里伤亡四万九千人，被击沉的軍舰有三十六艘，击伤三百六十八艘。

汉·鮑德溫认为，由于美英的"錯誤"，特别是他們的"无条件投降"的政策和同苏联签訂的协定，完全破坏了欧、亚的"力量对比"，并造成了德、日的"实力眞空"。而且似乎是这个"眞空"已經被"苏联的共产主义"所填补了。汉·鮑德溫沉痛地抱怨美英"失掉"了东欧、中欧和中国，"削弱了"自己在柏林和維也納的地位。他否认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力量取得成就的必然性，把这都"归咎"于"英美唯心主义者"，說他們不善于"同俄国人打交道"等等。这位最著名的美国"实力政策"的辯护者之一，在1949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結果就是这样"重新估价"的。

美国許多"实力政策"的公开喉舌和实际上屬于这一类的美国著作家①，对战后美苏英及其它国家共处和合作的协議和計划，"从右面"展开了抨击。在1953年共和党执政后，麦卡錫主义猖狂时期，这种抨击便成了美国反共主义歇斯底里的不可分割的特点。甚至罗斯福总統、国务卿斯退丁紐斯、財政部长摩根索、馬歇尔将軍和参加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議的其他美国人都被指責为"同情共产主义"，"出卖美国民族利益"等等。

"預防性"战爭的宣傳者之一У·普尔斯頓曾写道："总統对于建立联合国組織的灏于狂热的程度，以致造成他向俄国人做了重大让步，甚至于也許(罗斯福)对于共产主义的某些特征有一定的同情(！)"②。

美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P·塔夫特和阿·范登堡对于抨击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議，做出了非常重大的"貢献"。他們所以出版自己的著作，有两

---

① *S. F. Bemi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1959; *H.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Potsdam Conference. Princeton, 1960; *S. E. Morison.* Strategy and Compromise. Boston, 1958.

② *W. D. Pulestone.* The Influence of Force in Foreign Relations. Toronto—New York—London, 1955, p. 186.

个目的：一方面他們力图加强对苏联的思想进攻，曲解并貶低苏联在战后事务中的作用，另方面作为共和党的代表，他們利用抨击民主党人所签訂的同盟国协議，为其在美国国会选举时进行竞选总統活动的投机的自私自利的目的服务。①

《馬耳他和雅尔塔会議》②文件集的編輯和出版，則有着更大的目的。美国国务院公布了伪造的雅尔塔会議文件，有着双重的目的：第一，为曲解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它在战后調整中的作用，为扩大和加剧反苏思想战，制造"文件"根据。第二，为辯解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失敗找到新"論据"，把失敗的責任推到罗斯福身上。这些"文件"，是在决定举行日內瓦四国首脑会談的时候公布的，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破坏会談。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所轄部門的这些文件的編纂者，事先就已为"說明"日內瓦会議的失敗制造了根据。他們企图使輿論界相信，似乎同苏联不可能达成什么协議。所援引的例子……就是雅尔塔。

某些美国法学家甚至于怀疑克里米亚协議的国际法基础。他們利用各种伪造的手法，声称美国不受雅尔塔通过的各項义务的約束，因为这些义务是罗斯福个人承担的，而不是美国政府承担的。根据美国法学家盖尔柏特·布里格斯的意見，可以不承认雅尔塔协定，因为罗斯福签訂这些协定事先未征詢，事后亦未得到議会的批准。③

不是别人，正是这位杜勒斯暴露了"从右面"对罗斯福政策，对整个国际条約体系猛烈攻击的实际意图，他直截了当地提出問題："現在战爭已經結束"，美国是否还需要"保持同苏联协議的外表"？是否还需要"战爭年代的緩靖状态继續以和平的緩靖形式保持下去呢？"④

① *R. Taft.* 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ns. New York, 1951;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②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Washington, 1955. 在1960—1961年，美国还专門公布了德黑兰会議、波茨坦会議的詳細的官方文件。

③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46, №2, p. 381.

④ 杜勒斯：《战爭或和平》世界知識出版社1959年版第28頁。

反动的資产阶級历史編纂学为了攻击英美苏合作的政策和同盟国关于战后世界調整的协議，于是就伪造历史，以迎合美帝国主义当前的侵略方針，迎合他們复活德、日軍国主义的可耻政策及其倒轉历史进程的企图。在这些作家的描述中，“战敗者”，不是法西斯主义和战爭，而是具有不同社会經济和意識形态体系的各国間的和平共处和合作的政策，“战胜者”則是“实力政策”和“冷战”。

在現代英国資产阶級历史編纂学中，通常是把研究英美苏在战爭年代里的合作和协定的問題，同“从右面”批判，或是同替丘吉尔的反苏路綫的“預見性”作辯护相联系起来。在对社会主义的阶級仇視上，和献身于維护不列顛帝国的利益方面，看来很难有誰能超过大不列顛的这位最知名的保守党活动家。然而在战后，在“冷战”熾烈的时候，連丘吉尔也因对苏联“让步”而遇到了猛烈的攻击。英国亲法西斯的极右分子和工党中个别力图在仇視苏联方面超过保守党同事的反动分子，也对丘吉尔进行这样的攻击，同时也攻击反希特勒联盟参加国的合作所取得的成就。他們尤其不滿意为肅清德国帝国主义和軍国主义所采取的措施，在他們看来，軍国主义首先是在欧洲的反苏、反共的堡垒。

英国的“法学家”M·巴瑟斯特和 Д·辛普森在倫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鼓励下，出版了《德国和北大西洋集团》一书。他們公开对于在德国根除希特勒主义的全部政策表示“怀疑”。在这些先生看来，“占領当局超出簡单停止各种机构活动，和实际上解散这些机构的作法，尽管这些机构多么不好，是否恰当还是个問題。”他們接着写道：“国家社会党和它的組織同德国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之，它們的解散意味着德国国家的性质和政体的根本改变”①，而对这一点“从純法学的观点来看”！是很难找到证明的。

① *M. E. Bathurst* and *J. L. Simpson*. Germany and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London, 1956, p. 15; *M. Hankey*. Politics, Trials, and Errors. Chicago, 1950.

除了丘吉尔本人的回忆录，A·柯克帕特里克和英国其它国务活动家的回忆录①之外，英国化了的美国人佛吉尼亚·考耳斯的《溫斯頓·丘吉尔、时代和人》一书，也可以做为抨击同盟国关于战后世界組織的协議，和替丘吉尔辯护的例子。丘吉尔被认为是"現实的政治家"，事先就預見到反法西斯联盟的瓦解和开始了反苏的"冷战"。佛·考耳斯在她所著的书中写道，丘吉尔本来希望"英美同盟将会是足够的密切和强大"，以致能把自己的战后組織的計划强加于苏联。②佛·考耳斯把丘吉尔反苏陰謀失敗的責任，推諉到美国人身上，力图掩飾他們的陰謀所以破产眞正原因；是苏联在击敗"第三帝国"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欧洲大陆及英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高漲。欧洲大陆和英国的輿論曾一再尖銳譴責过丘吉尔对苏联的不友好的立場。

英国的学院式的历史著作，特别是由湯因比主編的《1939—1946年国际关系評論》丛刊在叙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的国际协議和国际会議的观点时，明显地考虑到上述情况，这文集中对国际协議的"修正"，多借口于对战敗的敌人有必要表現"寬容"，"溫和"，"容忍"，做"某些妥协"，以及英国資产阶級，不列顛帝国的辯护者一貫用来巧妙地掩飾其眞正目的和利益的一些蠱惑号召。

如M·巴耳弗和Д·梅尔的巨著《1945—1946年对德、奥的四国监督》一书，就是从这种"寬容"的立場来进行論述的。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学者們"忘記了"丘吉尔曾在同盟国协議上签过字，而孜孜不倦地把自己对战敗国——德国的观点同苏联的，法国的，甚至于美国的立場对立起来。

对于M·巴耳弗和Д·梅尔来說，"波茨坦会議的結果极不能令人滿意"。英国的資产阶級著作家对于丘吉尔的建議未能实現，一再表示遺憾。丘吉尔主張，直到苏联向英美帝国主义者投降以前，英美的軍队不应撤回到同盟国协議的分界綫以后。M·巴耳弗和Д·梅尔承认，如果丘吉尔的

---

①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I—VI; «The Innet Circle». The Memoirs of Ivone Kirkpatrick. London, 1959.

② *V. Cowles*. Winston Churchill. The Era and the Man. London, 1953, p. 322.

建議实現，那么，波茨坦会議大概根本开不成。但是他們认为，这样可能会"更好些"①！

英国著名的杂志《二十世紀》的出版者之一Д·阿諾德也从"現实主义"、"寬容"和"和平主义"的立場出发，激烈抨击德黑兰协定、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他尤其不滿的是英国帝国主义集团未能迫使盟国接受自己的关于欧洲和全世界战后調整的反动观点。

"波茨坦协定草率地勾消了欧洲十个世紀的历史——Д·阿諾德遺憾地写道，显然所指的是千年来德国人'向东方进軍'("Drang nach Osten")所遇到的結果——……这也标志着，监督从那些曾經希望欧洲的战爭只是为了有限的目的，而战爭的結局給全欧洲的均衡带来最少的破坏的人手中溜掉了。(也即是說，从一貫采取唆使自己的主要对手互相冲突的政策的英国統治集团的手中溜掉了。——作者)"②

法国資产阶級的著作从民族主义和反动的立場出发来批評德黑兰协定、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如从法国"被排除"参加"三巨头"会議的观点，从对于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所达成的大多数宣言、协定中的民主性质不滿的立場出发等等。

在戴高乐将軍的回忆录，前教育部长斯特拉斯堡教育学院教授M·-Э·納歇朗的著作《法国的偉大和孤独》等书中③，都极明显地表示出对法国尊严所遇到的"損害"不滿。作者由于不滿而曲解許多重大事实，否认法国由于同苏联一道参加反希特勒联盟而取得的最宝貴的东西。人人都知道，苏联不同于美英，它第一个承认了法国临时政府，承认它的世界大国地位，一貫維护法国的民族利益和未来的安全，主張法苏平等合作和友好。法国本身之所以能从希特勒占領下解放出来，只能是由于在苏德战綫上粉碎了

① *M. Balfour* and *J. Mair*. Four-Power Control in Germany and Austria 1945—1946. Oxford, 1956, p.91.

② *G. L. Arnold*. The Pattern of World Conflict. New York, 1955, p.4.

③ *Ch. de Gaulle*. Memoirs de guerre, t. III; *M.-E. Naegelen*. Grandeur et solitude de la France. Paris, 1956; *J. Chastenet*. Winston Churchill et l'Angleterre du XX-e siècle. Paris, 1956.

"第三帝国"的基本力量的結果。从这些事实来看，像认为"罗斯福在雅尔塔的最大的錯誤不在于他忽視了那些为热爱自由、民主而忍受痛苦和立下功劳的国家"，而在于同苏联合作①的这种說法眞正是聳人听聞的。

外交史教授罗哲·塞雷竟然把雅尔塔同慕尼黑相比拟！他指責美、英的国务活动家对苏联实行"綏靖"，把西方进步輿論对于战后同苏联进行合作的願望，叫做"幻想"，同时事实上宣布联合国是无用的組織②。罗·塞雷教授及其他法国資产阶級作家之所以攻击"三巨头"协議，其基础是，法国資产阶級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在阶級、殖民地、經济和政治等方面地位的削弱的不滿。他們不是在自己的成为大国沙文主义和出卖民族利益的混合物的缺乏远見的政策中去寻找这种状况的眞正原因，而是在"共产主义的詭計"中去寻找。

近几年来，反动的西德的著作也日益积极地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和战后的事件，頌揚"冷战"，并挑唆各民族之間的仇視。随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壟断資本、軍国主义和复仇主义集团的地位日益强大，在西德的历史著作中那些未被击溃的法西斯思想家們就日益囂張。

如果說在初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反动作家仅限于恶毒地誹謗苏联，为复活德国軍国主义的方針"論证"，那么后期便轉而公开攻击整个反法西斯联盟，攻击1943—1945年同盟国所达成的全部协定。如果說前些时在德国对于美英参加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协定的攻击，主要是假他人之手，如翻譯并广泛傳播美、英"現实政治家"和"自由派"的相应著作，那么現在戈培尔的继承人对待"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务活动家則在用詞上已无所顧忌，因为这些活动家領导过反对"軸心"国的战爭并且担心过德国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复仇主义思想，是西德历史編纂学的理論基础。它的特点是，几乎全

① *M.-E. Naegelen.* Grandeur et solitude de la France, p.100.

② *R. Céré.* La technique de la paix et l'Europe. Paris, 1954, p.74.

部承襲了希特勒时代法西斯历史編纂学中的"傳統"。这种继承，不仅表現在鼓吹这些傳統，同时还表現在以同样的方法和常常是同样的人来实現这些傳統。如在希特勒时的前东欧研究所所长Г·考赫教授，現在是慕尼黑同一研究所的所长。在他的領导下，已經出版过，現在还在出版一些宣揚"东进"("Drang nach Osten")思想的著作①。

前希特勒的外交官鮑勒·罗尔巴赫的回忆录中，把同盟国消灭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軍国主义的斗爭同"第三帝国"反对苏联人民的"总体"战相提并論，虛假地把粉碎法西斯軍队和惩罰战犯同"奴役"，甚至"消灭"德国人民混为一談。

鮑·罗尔巴赫不仅誹謗反法西斯联盟，同时还为希特勒辯解。他厚顏无耻地声称："同盟国对待德国人的錯誤，正向希特勒对俄国人所犯的錯誤一样。1943年1月15日卡薩布兰卡会議通过了錯誤的决定。罗斯福在这里提出了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起初，丘吉尔感到为难，但后来同意了罗斯福的意見……"鮑·罗尔巴赫教誨西方的活动家說："英国及其同盟者进行战爭的政治目的，不在于消灭德国，而在于恢复欧洲的实力均衡"②。

这个虛假和笨拙的論点在現代西德的著作中得到了广泛的傳播，它是指望着当他們不談"消灭德国人"，也不談"实力均衡"而大談什么挽救全人类，包括德国在內免于褐色的瘟疫时，人們会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慘痛教訓忘得一干二凈。这是对于鏟除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軍国主义，糾正因千年来"向东进軍"所引起的历史上的非正义行为和建立持久的民主和平的全部政策进行攻击的出发点。

前戈培尔的助手麦克斯·瓦尔特·克劳斯，也不落在上述納粹外交家之后。他恰如其份地提出了"美国人应对在接受馬歇尔計划，建立大西洋联盟前的欧洲状况負責任"的問題③。麦·瓦·克劳斯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后主張同苏联合作的"罪过"，不仅在于罗斯福一个人身上，

① *H. Koch*. Sowjetbuch. Köln, 1958.

② *P. Rohrbach*. Um des Teufels Handschrift. Zwei Menschenalter erlebter Weltgeschichte. Hamburg, 1953, S. 498—499.

③ *M. W. Clauss*. Der Weg nach Jalta. Präsident Roosevelts Verantwortung. Heidelberg, 1952, S.16.

还有他的"拉斯普庭"①——霍布金斯和沉醉于"青年热狂之中的"考·赫尔等人。他責备美英的国务活动家，說他們不是去"維护德国人和德国的土地免遭俄国人的报复，不是为了西方的防御去挖掘德国的潜力"，而是在1945年(!)就执行了摩根索計划——"想在第三帝国遭到軍事崩溃的决定关头时，使同盟国的軍事行动能为世界的犹太复仇行为效劳"②。麦·瓦·克劳斯和其他西德作家的这类警言，明显地证明从他們的"反共主义"，直到法西斯主义的其它各种丑恶的表現——复仇主义，反犹太人主义等等，只不过是一步之差。

虽然丘吉尔在西德的历史著作中所得的評价，如同在所有反动的历史著作一样，要比罗斯福高得多。但是，他也由于参加反希特勒德国的战爭、参加同盟国討論战后世界組織的会議而遭到卑无忌憚的复仇主义者的謾駡。关于丘吉尔对于德国复仇主义和軍国主义者的"罪过"，彼特·克莱斯特的"著作"：《你也有份！懺悔和希望录》一书的书名就已說明了。在这本书里，把民主的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协定同帝国主义的凡尔賽和約③虛伪地做了比拟。

彼·克莱斯特大量引用了戈培尔和希特勒关于"来自东方的威胁"的"論断"，"指責"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沒有听取他們的意見！彼·克莱斯特极明显地暗示，如果說凡尔賽"迫使"德国走上法西斯主义和战爭的道路，那么雅尔塔和波茨坦也可能带来同样的結果，也就是說它以新的世界災禍威胁着德帝国主义的敌人。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科学院的和大学的历史編纂学的代表人物，通过各种形式来发揮德国負有"維护西方文明"的"历史使命"的理論，同时一直向自己的讀者灌輸关于对德国的战后占領和解除德国武装等等协議是"錯誤的"这种結論。西德的著名学者威廉·科尔尼德斯在評价这些协議是在

---

① 拉斯普庭是活跃于俄国宫廷的騙子手，是尼古拉二世的寵臣，对宫廷事务有很大的影响。——譯者

② *M. W. Clauss*. Der Weg nach Jalta. Präsident Roosevelts Verantwortung, Heidelberg, 1952, S. 16.

③ *P. Kleist*. Auch du warst dabei! Ein Buch des Ärgernisses und der Hoffnung. Heiderberg, 1952.

1945年力量对比不利于西方的产物时，实质上是对这些协定的"合法性"和"永恒性"提出怀疑，暗示在"力量对比"①有利于西方的情况下，需要重新审查这些协定。

丙、"冷战"的辯护者反对和平共处政策的斗爭

一、資产阶級关于"冷战"起源的理論

战后时期，反动的資产阶級思想家力图把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描写成为是遭到广大群众仇視的"冷战"的禍首。資产阶級作家力图不惜任何代价，替以美帝国主义——反动勢力、殖民主义和軍国主义的主要堡垒——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后侵略、冒險政策辯护，把关于"苏联侵略"的无稽之談說成确有其事的样子，他們广泛利用老的手法：把战后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革命变革，都归咎为"莫斯科的阴謀詭計"。

布法罗大学教授塞力格·阿德勒的著作《孤立主义的动机。它在二十世紀的反动性》一书，可作为在这方面伪造战后历史的典型例子之一。他在論证美国的現代"全球"政策时写道："在战后第一个十年里，英国和法国进行了反对亚洲共产主义(!)的眞正战爭，而美国不得不在实际上支持他們的努力……

但是，美国的新政策不是什么别的，只是力求麻痺莫斯科的政治力量。有賴于战爭所造成的繁荣(!)使自由实业家体系的声望已达到了极高水平。美国人民不希望，也不可能让自己在已經集体化了的世界中保持資本主义隐士的地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我們认为維护主要非馬克思主义国家中的制度和意識形态的現状是适宜的"②。

① *W. Cornides.* Die Weltmächte und Deutschland, S. 15.

② *S. Adler.* The Isolationist Impulse. Its Twentieth-Century Rea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1957, p. 390, 398—400.

由此可見，虽然塞·阿德勒力图以美国人民的名义来加以掩飾，但是他并不隐諱，美国統治集团在1945—1947年公开采取了只要有可能便竭力挽救資本主义制度、封建制度以及殖民制度的方針。这对美国統治集团之所以需要，是为了保持美国資本广泛的活动余地，为了巩固它在美国的阶級統治，并建立对所有"非馬克思主义"国家的控制，为了不致陷于"集体化了的世界"之中。为了这个目的，美帝国主义采取了建立軍事集团，并以武器和金錢供应这些集团的路綫。

至于說"苏联的威胁"，那么从塞·阿德勒所发明的捏造"苏联威胁"的万灵药方中，也可一目了然：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亚洲的共产主义"，大多数欧洲无产阶級消灭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願望——是"莫斯科的阴謀詭計"，希腊人民爭取民主的斗爭——是"苏联的干涉"，苏联合法使用"否决权"——是对"和平的威胁"等等。

虛伪地指責苏联的侵略和破坏同盟国的协定，这是大多数美国資产阶級作者，企图提出自己虛构的产生"冷战"的說法的出发点。

布魯金斯研究所的作品，特别是У·А·布朗和Р·欧彼合著的《美国的对外援助》，У·雷采尔、М·卡普兰、К·柯布倫茨三人合写的《1945—1955年的美国对外政策》等书，可以視为是美国資产阶級著作中对1945—1947年事件半官方解釋的作为标准的例子。

这些作家的論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时，美国已处在实力空前强大，威望空前提高的地位"，他們說，美国根据自己"坚定不移的原則"，起初考虑的完全是力求利用自己的財富和威力为世界謀求和平，提高其它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維护他們的主权。但是，他們接着写道："美国給偉大同盟所带来的，后来在联合国宪章以及自己的計划、政策中所提出的这种乐观主义的思想，并未成为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重要的有力的动因。战爭时期的协議，本可如所期望的那样，为国际生活新准則奠定基础，但是却从未超出空談的阶段(!)。因之，重新审查美国的立場，是必不可免的"①。

重新审查的含义是什么呢？"在1947年初，苏联面临着英美軍事合作非正式地复活的局面……采取了对苏联'强硬的方針'，但是这种强硬，仅

① *W. Reitzel, M. A. Kaplan, C. G. Coblenz.*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55. Washington, 1956, p. 9—10, 83—84.

应用于根据其产生有特殊性的一些問題……这种思想的用意在于，苏联有可能被教訓（！）看到根据美国对国际义务了解的精神而履行自己国际义务的重要性"①。

由此可見，如半官方的历史学家所承认，虽然有許多附带条件，但是美国对外政策对战后形势的"适应"表現在对苏联采取"强硬的方針"，表現在企图以帝国主义者所期望的行动路綫强加于苏联。美国对外政策的辯护者避而不談在这里所指的在全世界建立美国"监督"的企图，但是他們关于苏联是这种計划的主要反对者的这种看法却是正确的。起先他們說美国"不希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舞台上使用自己的实力，但是在最后却对于"美国为了实現大胆的外交方針除了炸彈（原子彈）之外，缺乏軍事潜力（！）"② 深表遺憾。

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資产阶級作者，尽管他們都力图千方百計地把战后国际关系恶化的責任推諉到苏联身上，但是他們也不得不把在广島爆炸原子彈的日子，丘吉尔 1946 年 3 月在富尔頓发表演說，以及 1947 年 3 月"杜魯門主义"出籠的日子說成是"冷战"开始的日子。

"冷战"这个名詞是由美国的反动政論家赫伯特·斯沃普发明的。是早在 1946 年初，他在为貝納德·巴魯克拟定的一篇公开演說的讲稿中提出的。当时貝·巴魯克和赫·斯沃普同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們，即美国的国务活动家們商議后决定晚一些时候再向苏联公开宣布"冷战"。但是在"杜魯門主义"出籠以后，于 1947 年 4 月 16 日，貝·巴魯克在哥倫比亚、南卡罗来納州演說时，就大胆地提出了美国处在"冷战方酣之中"③这个新提法，很快就得到了美国报界和議員們的承认，因为它确切地表現出了美国同苏联的关系間由美帝国主义的战后侵略活动所引起的敌視和紧张的情况。

---

① *W. Reitzel, M. A. Kaplan, C. G. Coblenz.*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55. Washington, 1956, p. 87—89.

② 同上书第 92 頁。

③ *E. F. Goldman.* The Crucial Decade. America 1945—1955, p. 60.

从美国是"冷战"的組織者，是两个参加冷战的力量的主角之一的这个无可爭辯的事实来看，美国著名的学者罗斯托著作中所发展的"冷战"起源的理論是十分奇異的。根据华尔特·罗斯托的說法，"把新的强国推上世界舞台，和破坏了 1815（!）年的和平，所有这一切是同冷战的产生密切相关的"①。华·罗斯托这个理論的主要"独特"之处在于，在华·罗斯托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国际紧張局势的历史公式中，无論如何不包括美国在內……十年之間，这些"实力中心"，如俄国、日本、德国和中国的兴衰——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均衡"的彻底破坏。

至于說美国，华·罗斯托教授写道："美国对战后世界的主張，具体說来同苏联那种大肆扩張自己在东、中欧实力的目的，同中国力图粉碎敌对政党的做法，以及同英国力求恢复帝国，保持自己在同美国的联盟中作为世界舞台上的强大力量，是毫无共同之处的。"②无需說明，所有这类的"冷战"起源的公式是何等无根据和伪造的了。但是必須指出，那种在現代美国資产阶級历史著作中傳播得最广，要把美国說成似乎是战后国际事件发展中的消极客体的企图，在华·罗斯托教授的著作中得到了最高的表現并达到了荒謬的地步。"冷战"、"保卫自由世界"、以及"世界領袖地位"——所有这一切，按照許多資产阶級作者的說法，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顧美国的意願而强加于它的。

美国的反动政客們，公开宣称自己在破坏苏美的良好关系，和在宣布战后建立美国世界霸权方針等方面的功績，这同时也就不打自招地承认了誰、何时、何地发动了"冷战"。如参議員阿·范登堡在他的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本人、杜勒斯、洛克菲勒和美国在旧金山联合国創始会議中的其他代表，甚至于新任总統杜魯門，都力求結束对苏联的"綏靖"态度，这种"綏靖"态度指的是，同苏联进行平等談判和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协議的政策。在 1945 年 4 月 24

① *W. W. Rostow.*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An Essay in Recent History. New York, 1960, p. 141.

② 同上书第 142 頁。

日，阿·范登堡写道："对俄国人的罗斯福的綏靖政策已經結束了。俄国人可以滾开了（从旧金山会議中。——作者）。果眞能如此，会議就可以在沒有俄国人参加的情况下继續进行"（斜体〔中文用仿宋体〕是范登堡所标。——作者）①。不久之后，他又写道："美国应当恰如其份地以世界上第一大国的面目出現"②。

考虑到参議員阿·范登堡在美国制訂"两党的"战后对外政策方面的声望和影响，就不能对于公开向苏联宣布"冷战"和对于美帝国主义明白宣称自己覬覦世界霸权的事实估計不足。如果說有一些"客观的"資产阶級作者，避免引证阿·范登堡的类似言論，以及美国許多其他活动家的言論③，那么这也只能再一次证明，他們力图伪造产生"冷战"的原因的問題。而冷战的产生，首先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动的侵略集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企图停止历史的时钟，借口"苏联的威胁"阻撓世界革命进程合乎規律的发展的結果。

二、反动的思想家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过程的歪曲

在現代資产阶級的著作中，大概找不到有哪一本书不对战后社会主义在国际舞台上的傳播問題、欧亚許多国家誕生人民民主制度問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的問題加以歪曲的。阶級仇視，对于苏联对外政策的詆毀，对于美英企图主宰东欧的帝国主义計划遭到破产的惋惜，企图否认人类社会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規律——这就是几乎所有資产阶級作家，在他們的著作

①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p. 176.

② 同上书第267頁。

③ 《The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vol. I—II; 《The Forrestal Diaries》; *H. Arnold*. Global Mission и др.

談到社会主义陣营形成和在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問題时的出发点。

对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欧亚許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的伪造，首先是作为資产阶級著作中对苏联战后全部对外政策进行曲解的基础。虛伪地指責苏联干涉这些国家的內政——这是散布战后"共产主义威胁"、"苏联侵略"等謊言的出发点。

有許多书籍和文章，实质上是西方对于世界上发生的根本的革命改造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在意識形态上的反应。这些书籍和文章不仅誹謗苏联，为美英旨在顚覆年輕的人民民主国家，使資产阶級一地主制度复辟的对外政策活动辯解，同时还为这些活动制造特别完善的意識形态的綱領。

如同西方国家的战后政策一样，这些著作的主要鋒芒自然是針对着苏联，宣傳資本主义在东欧的复辟。乔治·凱南① 在1947年就公开談过这些，他根据自己的"遏制政策"，主張让同苏联接壤的各国担当起現代反共"防疫綫"的作用。

凱南声称，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借助政治上和經济上的压力，把人民民主国家吸引到自己方面来。②美国历史学家哈·維納克曾写道，在美国尚未强大到足以"迫使苏联政府就欧、亚爭端达成协議……"③以前，美国应当一直推行这种政策。

从四十年代末期，資产阶級科学界，首先是美国的，开始广泛地有組織地談論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同这个体系的关系等問題，这些談論继續了很多年。

美国一群教授在向美国参議院所做的題为《意識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报告中，对这种談論的目的曾写道："美国力图能同共产主义范圍內的知識

① 《Foreign Affairs》, 1947, № 4, p. 566—582.

② 同上。

③ *H. Vinack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ar East. 1941—1951, p.128.

分子广泛接触，最后能同中級的和高級的政治家接触，以便能逐步对他們的思想信仰发生影响。”

反动的資产阶級思想家和宣傳家力图在人民民主国家中一部分不坚定的知識分子中間散布怀疑和动摇不定的情緒，同时也企图使美国、西欧及其它国家輿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以及他們的对外政策产生謬誤的观点。Г·罗伯茨、华·罗斯托、С·柯蒂斯、Ф·舒曼、К·布热津斯基、Ф·莫斯里、В·庫勒斯基、А·魯宾斯坦、К·布莱克等許多人的著作都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①

美国的領导人和对外政策的辯护者，为了替自己的反对人民民主国家行动辯解，广泛利用人民民主制度产生的“偶然性”作为“論据”。多数資产阶級作家，对于人民民主国家产生的过程有着各种各样的曲解，但是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他們都否认从資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进行革命过渡的規律性，把人民民主制度說成是偶然的，意外的，“非固有”的現象。从而得出結論說：社会主义国家能重新返回“自由世界”，由西方国家在相应方面来“影响”波兰、捷克、匈牙利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是可能和必要的。

同这种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产生“偶然性”的論断有密切关系的，还有腐朽的已不值一駁的“革命輸出”論。Ф·莫斯里《克里姆林宮和世界政治》、Я·弗謝拉吉《共产主义的經济战略：中、东欧的作用》、К·布热津斯基《苏联集团》以及布魯塞尔社会学研究所教授А·汪戴斯的著作（他企图否认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規律性）②，都相当全面地提出了上述論断。

Ф·莫斯里、Г·罗伯茨、А·魯宾斯坦及其他西方历史学家，企图证明人民民主制度建立的“偶然性”，硬說在东欧国家中并沒有建立这种制度的

---

① *H. L. Roberts*. Satellis in Eastern Europe. Philadelphia, 1958; *W. Rostow*. The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1954; *Ph. Mosely*. The Kremlin and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1960; *J. Wszelaki*. Communist Economic Strategy: the Role of East-Central Europe. Washington, 1959; *K. Z. Brzezinsky*. The Soviet Blok. Unity and Conflict. Cambridge, 1960; *A. Z. Rubinstei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W. W. Kulski*. Peaceful Coexistence.

② *A. Wanders*. Le communisme de Mao Tse-tung. Bruxelles, 1957.

内部力量。他們认为，工人阶級受着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的影响，农民在接受农民党的影响。而这些党，如所周知，并不图謀什么社会主义。这些历史学家在这里采取了資产阶級慣用的捏造方法：用混淆历史年代的办法，把对战前国内力量的一般估計，推广到战爭期間，以及战后的最初年代。資产阶級思想家否认从法西斯統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有进行革命的可能性，硬說这些国家本身不具有实現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从而得出"結論"：革命是由苏联輸出到这里来的，因之是"不合乎規律的"。

倫敦大学俄国历史学教授休·塞頓—沃森在《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一书中就散布着类似的对苏联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誹謗。①他的論題——《可以影响共产主义胜利的条件》，最典型地反映出了否认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規律的資产阶級思想家的主观主义的观点。

共产党人早已闡明了自己对"革命輸出"的观点。列宁說过："革命不是按定单进行的，也不会正好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发生，革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漸成熟起来的，是在許多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湊在一起的时候爆发的"②。在1945—1949年，欧亚許多人民民主国家的情况就是如此。③

資产阶級的作家們說，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由于苏軍的干涉，苏联对被解放国家内政干涉的結果。④但是众所周知，例如在捷克，工人阶級战胜反革命势力是在苏軍尚未到达該地之前。相反地，在奥地利，虽然苏軍已进駐該地，但是那里并沒有发生革命，因为那里有不同的条件，即有不同

① *H. Seton-Watson.* The History of World Communism. New York, 1960.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4頁。

③ 参見本书第6、7章。

④ *C. Black.* Challenge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1954; *S. Kertesz.* The Fate of East-Central Europe: Hopes and Failur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tre Dame, 1956; *S. Fischer- Galati.* Romania. New York, 1956; *J. Campbell.*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5—1947; и др.

的內部阶級力量对比。

如果說外部势力干涉东欧国家的內部事务，那么应当提到的是西方国家的无数次顛覆活动，他們竭尽全力企图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这是极明显的反革命輸出陰謀。但是时代、力量对比(許多国家內部的，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已經发生了变化。进行干涉，像在1919年对匈牙利苏維埃所做的那样，在1947年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帝国主义已无能为力阻擋欧亚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①。

企图通过非常狡黠的手段，特别是經济手段把人民民主国家重新吸引到資本主义关系体系中去的陰謀也遭彻底的失敗。帝国主义对于"馬歇尔計划"的宣傳，对于其眞正历史和实质的伪造在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識形态斗爭中据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并非是偶然的。

当社会主义国家弄清楚了欧洲"复兴"計划的眞正目的拒絕参加以后，西方的著作中展开了对东欧国家对外政策的大肆誹謗运动，散布許多虛伪的論調，說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似乎已同意接受"馬歇尔計划"，后来由于苏联的"压力"才表示拒絕等等。②伪造者在这里也如同在許多类似的情况下一样，采取了人所共知的手法：把少数反动分子的意見說成是全民的、全国的意見。

的确，在1947年捷克斯洛伐克和东欧許多国家里反动势力曾企图利用"馬歇尔計划"使本国的发展倒退，重踏資本主义的道路，使它倒向西方。

---

① «Программ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борьбы за мир, демократию и социализм», стр. 39.

② *S. H. Thomson.* Czechoslovakia in European History. Princeton, 1953; *J. Brown.* Who's Next? The Lesson of Czechoslovakia. London, 1951; *J. Tayl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Poland. 1939—1950. London, 1952.

后来他們流亡国外时发表的許多著作都公开談到这点。①但是在1947年中，这些势力在政治上已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已經脱离于人民。正因如此，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政府拒絕参加"馬歇尔計划"，从而确保了自己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独立发展。

資产阶級作者对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形成年代里人民民主国家对外政策的曲解，是同他們在思想上对于这些国家的国内反动派的支持密切相联的。以阿諾德·湯因比②为首的大資产阶級历史学家同最高的政治活动家，例如杜勒斯一道，参与了这种宣傳攻势。③

有时，針对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个事件而展开的恶毒的誹謗活动，竟会变成为"冷战"思想家进行反共宣傳的长期不断提出的題目。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当1948年2月，蓄謀的反革命叛乱被粉碎后，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学家Я·舍迪維和К·科札尔科娃写道："随着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反动派的失敗，帝国主义国家統治集团破坏和阻撓中、南、东欧国家发展进程的計划就破产了"④。同时，在經济上最发达的这样一个欧洲国家里卓有成效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范例，对于西欧各国人民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的。正因此，歪曲1948年2月事件成了反共宣傳的必定的一条，同时也成了許多資产阶級历史学家、社会学者"研究"的对象⑤。

---

① *H. Ripka.* Eastern Europe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1961, p. 75.

② «The Realignment of Europe». Ed. by A. and V. Toynbee.

③ 杜勒斯在其于1950年出版的《战爭或和平》一书中明显地替匈牙利反动头子納吉、明晉蒂(关于1949年的审判)以及东欧其它国家反动派辯护。

④ *Я. Шедивый* и *К. Коржалков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1945—1960 гг., стр. 59.

⑤ *O. Friedman.* The Break-up of Czech Democracy. London, 1950.

反动的資产阶級著作无視历史事实，把1948年2月布拉格事件描繪成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变(当然，是"偶然的"和"不合規律的")，而不是无产阶級阻止了反动派的活动(正是反动派企图实行政变)，并且夺取了政权的革命行动。

資产阶級的作者，这些反共专家們并沒有什么独創之处可以夸耀的，因之几乎他們每一个人，无論是讲米柯拉契克在波兰选举中的失敗，或是叙述納吉从匈牙利逃跑，以及拉德斯庫将軍反动政府在罗馬尼亚的失敗，都使用"政变"这样的标签。

許多西方的思想家把人民民主力量战胜反动派的事实，作为他們詆毀社会主义国家要求加入联合国的借口。在长时期內，美英反动作家的著作中还在替美国在1948—1949年和以后阻撓接納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馬尼亚加入联合国的活动"找論据"，虽然在1947年英美就在对这些国家的和約上签了字，其中規定要支持这些国家加入联合国的申請。在从联合国的讲坛上发出对这三个国家的誹謗的同时，在西方的著作中还散布着許多虛伪的論調，說什么保加利亚对希腊进行"間接侵略"，东欧国家破坏人权，以及似乎他們采取的是依附的对外政策等等。

許多資产阶級作者的著作中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于社会主义陣营在其誕生时期(1945—1949年)的团結一致問題特别注意。

这类著作的目的有三：一、"寻找"社会主义国家間不存在的矛盾；二、使讀者相信这类"矛盾"正日益加深；三、給予匈牙利、波兰和其它人民民主国家中的資产阶級民族主义分子提供养料，支持这些分子，反对共产党人所进行的对資产阶級民族主义的斗爭。

西方的历史著作在这方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法，例如，反动的資产阶級作者采取嫁禍于人的手法，說实力的观念是社会主义国家間相互关系的基础；按照他們的說法，实力观念也决定着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上所有其它国家的关系。为了证明他們的关于在1947—1949年人民民主国家間似乎存在着矛盾的臆造，他們引证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間在东欧資产阶級一地主国家間确实存在过的那些紛爭。M·伊彭在他的《今日世界共产

主义》一书①，K·布热津斯基等人的著作中都使用这种方法。

資产阶級的捏造者說，罗馬尼亚和匈牙利之間在战后五年多的时間內对于特兰斯瓦尼亚問題一直是爭論不休，虽然众所周知，这个問題早在1945年就已經解决了。他們还臆造說东欧国家間在經济关系上是不平等的。如K·布热津斯基說，捷克斯洛伐克同波兰的經济协定(1947年)巩固了这两国在中欧的地位，但是有損于其它人民民主国家。②还可以举出許多恶意伪造的統計和夸大或縮小材料的例子。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間存在的摩擦、矛盾和不平等。

如果說新型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形成，这个复杂的在国际关系实踐中完全嶄新的过程是平坦的，无任何困难的，这也是不对的。的确，在1945—1949年存在过一定的困难，这是同过去国家之間相互关系的殘余，同民族主义有关，但是所有这一切是过渡时期的困难而且已經順利地克服了；人民民主国家的新的社会主义本性和新型国际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的确立，为此創造了条件。

資产阶級的作家喜欢談論自己对东欧"被奴役民族"的"担忧"和"关怀"，談論自己对他們的"友誼"情感等等。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們极其激烈地反对这些国家的眞正民族利益，反对这些国家的权利、安全和主权。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反动的資产阶級著作对欧洲战后边界問題所采取的立場。早在1947—1948年資产阶級作家中，特别是美国的作家，就已經表示出支持西德复仇主义集团对于东欧国家，首先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野心的趋势。特别是在美英，散布出一种必須"修改"奥德—尼斯河边界的論調。而这一边界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就已为西方同盟国所承认过，并且在波茨坦协定中已經确认了的。

受到大西洋彼岸支持所鼓舞的西德的复仇主义分子，决不会放过利用这些支持，为了在思想上、軍事上和政治上作好新的战爭的准备而进行更

① *M. Ebon*. World Communism Today. New York, 1948.

② *K. Z. Brzezinsky*. The Soviet Blok. Unity and Conflict, p. 57.

加肆无忌憚的活动。同时，西德的反动作家們，正在充分利用那些作为反共主义思想武器的，美国捏造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时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早在1947年，在西德就成立了一个所謂"格廷根工人小組"(联合夫劳兹拉夫和布拉格各大学前德国教授)，这个小組在宣傳"收复"德国东部土地方面展开了疯狂的活动。东欧問題——这是目前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向东方进軍"体系中許多組織的基本宗旨。

在P·馬伍拉赫、Г·烏伯斯貝尔格、B·菲利浦和B·哈尔瀑等人的著作中（当年他們曾为希特勒侵略苏联做思想上的論证），在B·加尔維克、鮑·迈斯納尔、Э·馬蒂雅斯等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公开宣揚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复仇的思想。复仇主义是目前在西德反动著作中居于統治地位的傾向。

有一些著作，可能稍有不同，但是这仅只是方法上的差異。所有这些著作的目的是一致的。如П·文格尔的《是誰得到了德国》一书，宣揚在形式上看来較为"溫和"的复仇綱領。特别是，为适应波兰的情况，这个綱領提出不要通过侵略的方式公开侵占波兰的領土，而主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波兰結成"联邦"！同时文格尔还认为，在"包罗万象的整个东、中欧建立新秩序的綱領"的范圍內，是有可能实現这个計划的。①

某些西德复仇主义的思想家，企图掩飾自己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宣傳，但是这并不能遮盖这一事实：公开反动的势力早已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整个的資产阶級著作中居于主导地位，他們主張修改在1945年已实現的和平調整，主張对社会主义陣营国家采取"实力政策"，主張准备新的复仇主义的战爭，虽然这个战爭将首先威胁着德国本身遭受热核的災禍。

三、对和平共处原則的歪曲

苏联国际威信的增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共产主义的

① *P. Wenger.* Wer gewinnt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59, S. 35.

对外政策原則对于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影响的加强——这一切，使得帝国主义及其思想家对于战后苏联爱好和平政策的成就，极为惊恐。国际舞台上嶄新的原則所取得的胜利，使帝国主义者大为不安，因为这些原則威胁着过去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間的实力与专横、掠夺与剝削、欺騙与扩張、侵略与战爭等相互关系的本身存在。所以，他們猛烈攻击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对外政策原則，攻击其总方針——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間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賽的政策。

国际关系中的一些問題，遭到資产阶級如此无孔不入的捏造，譬如像苏維埃政权从其存在的第一天起就执行的和平解决爭端問題的政策、平等的經济合作政策、各国家間建立友好的往来关系、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賽等政策。

有許多专門的著作談論这些問題。同时很难找到有哪一位資产阶級作者，尽管他是間接涉及到苏联的对外政策問題，但是对和平共处問題不加注意的。現代反动資产阶級著作的目的，不仅要证明和平共处的"不可能"，还要曲解旨在确立这个原則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苏联的全部对外活动的意义。

資产阶級作家作为出发点的这个主要論題在于否认和平共处这个苏联一貫坚持的对外政策原則。"和平共处，这是苏联出于策略考虑而提出的口号"——这就是西方历史学家論断的基础。英国的历史学家塞頓一沃森在其备受推崇的《不战不和》①一书中，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就是如此論述的。

資产阶級的历史著作认为，如果說苏联主張过和平共处原則，那么这仅是在一定时期。在战后头五年（1945—1949年）苏联的对外政策并不是旨在和平共处，当时的政策是"侵略的政策"等等，西方的政客和思想家有

① *H. Seton-Watson.* Neither War, nor Peace. London, 1960.

意識地忽視許多事实和具体的事件。而这些事实和事件都无可爭辯地证明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整个时期里所执行的对外政策的爱好和平的性质。据密执安大学У·华尔希教授的說法，苏联提出和平共处的論点并沒有多久。①M·鮑尔、К·布莱克、Е·赫姆莱希等也持同样观点。②至于說1917年10月頒布的列宁的和平法令，以及后来旨在同其它国家建立和平关系的苏联所有对外政策文件，在資产阶級作家看来，这都是"共产主义的宣傳"。

資产阶級思想家为了替自己关于苏联在战后初期"侵略"的臆想寻找"证据"，便在苏联誕生的历史，甚至于沙俄的历史上大做文章。他們提出了經不住任何批評的論点：說沙皇俄国的那些政策的原則，是苏联的对外政策的基础。而这种主張竟然在資产阶級著作中得到了广泛傳播。值得注意的是，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这种观点特别流行。在現代資产阶級历史編纂学泰斗，阿諾德·湯因比(英国)③的著作中，在Ж·皮朗(比利时)的七卷集《世界历史的主要趋势》④，以及在华·罗斯托和А·列文(美国)合著的《苏联社会的动力》⑤等书中，都有这种观点。

所有这些作家，都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来发展下述观点：似乎"目前苏联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建立在沙皇所創立的政治的和思想的傳統之上的"⑥。Б·穆尔⑦、Ф·莫斯里⑧也在宣揚这种思想。后者认为，"1450年俄罗

---

① *W. Walsh.*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Michigan),1958, p. 554.

② *M. Ball.* NATO and the European Union Movement. New York, 1959, p. 94; *C. Black* and *E. Helmreich.*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New York, 1959, p. 749 и др.

③ *A. Toynbee.* The World and the West. London, 1953; *A.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1960.

④ *J. Pirenne.* Les grands courants de l'histoire universelle, t. VII. Paris, 1956, p. 190—195.

⑤ *W. Rostow* and *A. Levin.* The Dynamics of Soviet Society. New York, 1953, p. 135.

⑥ «Soviet Power and Policy». New York, 1955, p. 373.

⑦ *B. Moore.* Soviet Politics. The Dilemma of Power. Cambridge, 1951, p. 215.

⑧ *Ph. Mosely.* The Kremlin and World Politics.

斯帝国主义(!?)"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淵源。莫斯里的《克里姆林宫和世界政治》一书中有些文章是早在1938年就发表过了的,这是頗值得玩味的。

資产阶級的思想家采取种种方法来曲解和平共处政策的眞正思想。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和平共处似乎是同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背道而馳的。

大概奥地利哲学家,最著名的反共主义思想家古斯达夫·維特尔过去是,現在仍然是西方作家中最重視这个問題的人。按照維特尔的說法,和平共处原則与馬克思主义相抵触之处在于,馬克思主义者认为可以用暴力突破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維特尔从而得出了完全虛假的結論:不能期望长时期的和平共处。①

值得注意的是,伪善者維特尔的見解竟同法国修正主义者皮埃尔·爱尔威的观点不謀而合。皮埃尔·爱尔威不惜直接誹謗,說列宁只是用暴力手段进行无产阶級革命的拥护者,反对任何共处②。

由于对苏联对外政策和和平共处政策的捏造,在現代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著作中,对美国同苏联相互关系的全部历史也进行了歪曲。在战后年代里,苏美关系已成了世界政治的中心,整个国际关系体系的总的形势,直接取决于苏美关系。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全世界的領导作用的辯护者,以美国資本主义的"优越論"和"万能論"为基础,接連地出版了不少书籍,宣傳拒絕同苏联合作。在詹·伯納姆③、赫·胡佛④等人的著作中尤为明显。他們虛伪地以同苏联"不可能"談判等等为借口,从思想上論证对苏联采取"实力政策"的必要性。

資产阶級的历史著作,为了加剧"冷战",恶毒地歪曲无数足以证明过去和現在苏美間卓有成效地实現和平共处和合作原則的事例。譬如在西

① *G. A. Wetter.* Der dialektische Materialismus, seine Geschichte und sein System in der Sowjetunion. Wien, 1956, S. 177.

② *P. Hervé.* Ce que je crois. Paris,1958, p. 127—128.

③ *J. Burnham.*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J. Burnham.* Containment or Liberation?

④ *H. Hoover.* Addresses upon the American Road. 1945—1948.

方談到联合国問題的著作中，除了最明显的片面闡述这个組織成立的过程之外，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种极明显的趋势：曲解苏联的对外政策，它在爭取战后持久和平斗爭中的作用，它对于同西方国家进行平等有效合作的願望。这种趋势在布魯金研究所研究員魯塞尔女士的著作中得到了最明显的反映。她的著作得到了梅隆基金委員会的贊助，并且国务院特别允許她查閱了档案①。P·魯塞尔如同赫·費斯②、У·兰格、C·格利森③及美国历史編纂学中其他半官方的，学院派历史学家一样，在自己的著作中的出发点是，不是认为参与創建联合国組織的各国是平等的，而是认为似乎美国在准备战后的和平調整，制訂联合国宪章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她貶低有时甚至完全否认苏联对于創建联合国組織的作用。此外，美国資产阶級历史学家还认为，似乎是苏联給美国在这方面的工作造成了"困难"，而且一直是国际合作的反对者。当然，他們同时也就抹煞了那些完全足以揭露这种虛假观念的許多眞实的历史事实和文件。

資产阶級的历史著作还曲解了苏联在同前納粹分子的同盟者准备和締結巴黎和約方面的作用。众所周知，正是由于苏联外交积极活动，才得以在巴黎締結条約。这些条約确保了反对反法西斯联盟的参战国的民主发展。但是休里亚教授却认为，（当然沒有举出任何证据，因为事实上本来不存在证据）不是由于苏联参加了巴黎会議，才决定了会議的民主性质。决定其性质的，是西方国家的作用④。但是，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早在1948年美国代表团团員坎貝尔就公开写过，西方国家在巴黎的主要任务是图謀向东欧滲透⑤。

战后初期，反动的資产阶級著作竭尽努力来根除美国人民对

---

① *R. B. Russel.*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45.

② *H. Feis* Churchill—Roosevelt—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③ *W. Langer.* and *S.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 New York—London, 1953.

④ *E. Ciurea.* Le traité de paix avec la Roumanie. Paris, 1954, p.25—39.

⑤ *J. Campbell.*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5—1947, p. 60.

苏联的友好态度，为“冷战”奠定意識形态的基础。挑起各国人民之間的不信任和敌視，不仅成为宣傳“心理战”的机构的特点，同时也已成为所有現代資产阶級意識形态，特别是資产阶級国际关系理論的特点。

四、为帝国主义的战后侵略政策辯护

随着战后西方国家侵略方針的发展，在資产阶級著作的基本潮流中，半官方的和学院派的历史著作間的区别，“实力政策”的公开宣揚者和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科学家之間的区别，实际上已經日益消失。絕大多数現代反动的資产阶級作家，都以自己的文笔来为政府、壟断組織和軍人集团服务。他們不去深入地研究国际关系，而是千篇一律地替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陣营的几乎全部对外活动进行辯护。

洛克菲勒基金会董事之一，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肯莱特·湯普逊实质上承认，在美国統治集团內部，以及在美国的資产阶級著作中对于“实力政策”問題的“分歧”，不是“贊成”还是“反对”的問題，而是是否应該公开的宣揚并維护这个政策还是小心謹慎地以道德的及其它各种“詞句”来粉飾这一政策的問題。“現实的政治家”或“政治上的現实主义者”——如肯·湯普逊所称呼的——的派别“都是对于主要是由法律和道德所决定的观点的反应”。他接着写道：“有一些社会活动家，公开支持新的观点，特别是当他們在政府里任职期間。但是其中許多人，甚至于可能在比他們自己意識到的更大的程度大，受着体現在新的傳統上的見解的影响……看来，全面了解这种观点的基本哲理是必要的，如果美国的国务活动家和科学家认为，他們的任务是提高社会对現实国际生活的了解和认識水平，消除領导人的所想和所为同人們对于他們的活动的想像之間的鴻沟的話”①。換句

① *K. W. Thompson.* Political Realism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An American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1960, p. VII.

話說，即肯·湯普逊号召美国資产阶級政客和科学家，不仅公开一致信奉"实力政策"崇拜者的观点，同时还要把它强加于美国人民。

"蓄意的冒險"——这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最初的，也是最典型的名称之一。美国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問題专家，美国統治集团最有影响的外事刊物《外交季刊》的主編Г·阿姆斯特朗，在1947年就出版过一本以上述名称命名的著作。

Г·阿姆斯特朗写道："現在，虽然我們的陆海空軍在各海洋、大陆上高奏凱歌，虽然我們的国务活动家順利地領导了联合国的創建，虽然我們掌握着无可爭辯的工业实力和令人恐怖的原子彈，但是我們仍然为感觉到不肯定、不滿意、有未完成的工作和还沒有征服世界而担忧"①。接着他解釋說，特别是由于联合国工作的"不好"引起了这种感觉。例如由于使用"否决权"，使联合国未能通过"巴魯克計划"，以及用假"調查"之名干涉他国內政的阴謀遭到了破产。

"实力政策"的拥护者看到，美帝国主义在野蛮地轰炸了长崎、广島之后，他們寄以极大希望的"原子外交"，在反对苏联的爱好和平的外交政策，和反对人民运动方面显得軟弱无力，因之，他們現在加强活动利用一切手段和方法，反对世界上的革命变化，反对苏联——所有爱好和平、自由各国人民的堡垒。

Г·阿姆斯特朗和他的后台，美帝国主义集团无視現实中的明显事实，而固执地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如他們所期望的那样去"征服世界"。因之，他們不去寻求同苏联达成协議，承认各国人民有和平、自由与进步的权利，而是提出了"蓄意的冒險"——使联合国成为听命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的方針，进行軍备竞賽和奴役他国的方針，建立西方国家的单独集团和軍事集团的方針，总之，是准备和挑起新战爭的方針。

---

① *H. F. Armstrong*. The Calculated Risk. New York, 1947, p. X.

"蓄意的冒險"和"遏制共产主义"政策的辯护者，热烈欢迎"杜魯門主义"——这是进一步公开宣布美国赤裸裸干涉他国事务，以美元和武器的力量来反对进步和解放思想的方針。在反动的历史著作中对"杜魯門主义"的贊揚的范圍是很广的——从把它描写为是对"維护西方文明"微小但是宝貴的貢献，直到承认它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向"冷战"方面"勇敢的"决定性的轉折。但是，在資产阶級的著作中就其过多和过分的頌揚来看，居于首位的当推"馬歇尔計划"——美国对欧洲"无私的"、"慷慨的"、"史无先例的"战后經济"援助"綱領。資产阶級作家掩飾美帝国主义的西欧政策的长远目标，說美国統治集团願意对整个欧洲，包括苏联在內提供"援助"，似乎他們唯一关怀的是欧洲的"恢复"。这些作家竭力隐諱这些事实："馬歇尔計划"旨在挽救西欧的資本主义，分裂欧洲，使西欧屈从于美国資本，为建立西欧国家，包括西德在內軍事联盟和軍国主义化創造基础。他們企图隐瞞"馬歇尔計划"是反对和平和社会主义的"冷战"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在 У·布朗和 Р·欧彼的著作中，曾直截了当地把美国政府对其它国家的"援助"，称为"是达到美国所宣布的对外政策目的"的手段之一①。但是就是这两位作家，也千百次地重复着在現代資产阶級著作中所慣用的捏造公式：即在战后的任何阶段，美国对外政策中軍事和經济因素的对比的关系，是取决于来自苏联方面的"侵略的威胁"程度而定。在"威胁"最大的地方，軍事因素就成为主要的，在"威胁"主要以"顛覆活动"形式出現的地方，則經济因素便成为主要的。

У. 布朗和 Р. 欧彼写道："当采取力求主要以經济的方法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时候，人們就广泛承认，政治上的成就取决于苏联的立場。而援助方面的軍事因素，虽然它早已存在，却一直隐蔽着，直到苏联的政策向

① *W. A. Brown* and *R. Opie*. American Foreign Assistance. Washington, 1953, p. 1.

未迫使西欧参加自卫的組織，尚未迫使美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之时止。"①

美帝国主义的辯护者，不惜一切代价力图在世界輿論面前替美国建立軍事基地、軍事同盟的不光彩的危險方針进行辯解。他們接二連三地进行臆造，有时連自己也不察觉，自己已落到多么荒唐的地步。因为，如果相信他們关于美国战后政策和"援助"中的軍事和經济因素的对比关系的公式，那么势必得出这样結論：在美洲各国在里約热內卢締結了軍事联盟的1947年是西半球各国遭受着"苏联入侵"最严重威胁的时候。

实际上美国統治集团坚持要締結这个条約，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拉丁美洲各国的經济、軍事和政治上的統治地位。同时他們也是为了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从同苏联合作轉变到建立侵略的軍事同盟的外交政策，做好輿論准备。美国政府认为，国会将很快同意进一步"发揚""門罗主义"和泛美主义，然后，便可根据里約热內卢条約的先例，无視任何傳統，批准美国参加和平时期的同欧洲和亚洲各国的常設軍事同盟。此外，美帝国主义者并不反对把他們所建立的西半球国家的"防御"和"合作"体系，提出作为全世界的典范。

例如前助理国务卿，不久前还担任着拉丁美洲事务特别顧問的哥倫比亚大学教授阿·貝尔利，竟然毫不觉难堪地写道："美国对于自己可以很好地担当世界領袖作用的最充分有力的理由，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的：即美国基本上能在其西半球邻国的影响下，在当地建立起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摆脫了恐怖并享有自由的区域。这个区域至少可以使人期望，摆脫貧困的日子将会到来"②。大概再沒有比这种强盜对其受害者的嘲弄，更为厚顏无耻的了。但是，美帝国主义战后的全部政策，使人絲毫不怀疑，美帝国主

① *W. A. Brown* and *R. Opie*. American Foreign Assistance. Washington, 1953, p. 127.

② *A. A. Berle*. Tides of Crisis, p. 65.

义准备，并且力图逐步地把世界上的各地区一个一个地变为自己独断专横的場所。

在資产阶級的著作中，通常是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視为是"冷战"初期阶段杜魯門—艾奇逊政策的最大成就。在許多論述这个帝国主义的主要侵略联盟的創建、历史和前途的著作中，都歌頌那些通过暴力和欺騙手段开辟了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道路的美国国务活动家的"坚定性"，歌頌西欧政治家的"英明"，他們实現了从1947年的敦刻尔克条約，通过布魯塞尔条約和"經济复兴"綱領，最后达到了北大西洋公約的演进。

不論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和維护者如何評价西方国家战后的这个或那个对外行动，几乎其中每一个人都认为有責强調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澎湃发展的面前，联合旧世界的所有力量的必要性，主張帝国主义伙伴在剝削各国人民、进行民族压迫和殖民掠夺方面应采取"阶級团結"和"友好协商"，号召在美国的庇护下，建立資本主义国家"偉大同盟"，并贊揚这个同盟的重要基础——北大西洋公約。

托馬斯·芬萊特在《对外政策：下一个步驟》一书中写道："西方須要有一个偉大的同盟，虽然还沒有一个确定的明文規定的形式，但是同盟是早已存在了。偉大的同盟——这是所有西方社会在对外关系、政治、經济、以及軍事等各方面的联盟。因之，偉大的同盟不仅应包括目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員国，还应当包括欧洲和西半球的其它国家。"①

許多英国資产阶級作家力图縮小欧洲資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在挑起"冷战"中的作用，把它們說成是在1945—1948年危机时期国际关系发展中的某种消极客体。他們极力强調大不列顛对

① *T. K. Finletter*. Foreign Policy: the Next Phase, p. 20.

于"暴力行为"的虚假的"厌恶"，經常企图以"防御的"和"經济的"原因来解釋大不列顛之被拖上美帝国主义的黷武政策的軌道。

1947—1948年間的《国际关系概述》的編著者和出版者П·卡尔沃科列希写道："在1947—1948年，西欧政治主要变化的特点是，既然而又坚决地放棄对同苏联合作的可能性的信念……一方面是經济上的貧困，另方面是对共产主义和战爭的恐惧，两者結合在一起，就使西欧宁願同美国結成同盟，而不在冷战的两个主角之間采取中間独立的立場。这些考虑又使往昔的統一欧洲的幻想，重新复苏了。"①

随着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間愈远，在英国的資产阶級著作中，便愈益加强了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那些符合于不列顛帝国的阶級利益和殖民利益的，并且使英国資本家可以从中取利的对外行动的贊揚。如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出版的Г·古德溫所著《大不列顛和联合国》一书，实质上是取消了作为战后国际合作組織的联合国的作用，把英美同盟描写成对大英帝国有着"重大意义"。

Г·古德溫写道："欧洲經济合作組織，对于联合王国对于西欧繁荣的貢献提出了明证(!)。布魯塞尔条約，使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坚定地担負起維护西欧的使命……由于布魯塞尔条約的建立，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种子发出了幼芽……首先，北大西洋公約联盟是一个工具，英国借助于此，可以使自己在欧洲的利益和义务同自己与美国和加拿大的联系和諧一致。一則，从英国的观点来看，北大西洋联盟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理想的国际組織的典型(!)，是为列强实現領导提供适当机会的理想的政府之間的組織的典型……更为重要的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不仅是在发生战爭时取得美国援助的保障，它同时还是建立对苏联实力的有效平衡的骨干……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比联合国更快地成为英国对外政策的中心。"②

①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7—1948» By P. Calvocoressi. Oxford, 1952, p. 62.

② *G. L. Goodwin.* Britai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p. 53—54, 57.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侵略方針和欧洲"合作"方針在英国的許多最忠实的拥护者，他們也无法掩飾自己对于威胁着把英国降低到美国順从的卫星国的方案，抱着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对于把英国同拟議中的"統一的欧洲"溶合为一的企图持否定态度。因此，在絕大部分英国資产阶級的著作中有一种居于統治地位的趋势——为大不列顛拒絕参加战后的"超国家"的欧洲联合論证，贊揚英国以美国主要的甚至平等的伙伴、帝国的中心和欧洲的仲裁者的身份在"国家間"的世界联盟中的作用。

A·納丁在《欧洲将不等待。警告和出路》一书中，論证了大不列顛在欧洲事务中，以及在"大英联邦"和大西洋联盟体系中的領导作用。A·納丁毫无道理地責难欧內斯特·貝文的工党政府忽視"冷战将要来临的征兆"，他說，在1945年及以后年代里，"英国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成为欧洲的領袖，因为这些条件都是由英国想到而提出的"①。A·納丁认为，工党的領袖們"像着了魔似地坚持維护英美联盟，把这作为是独一无二的……同时，英国在对待任何新的联合的义务上，也决不超越美国一步"，这是犯罪的行为②。

A·納丁之所以批評英国工党政府，并非因为它采取了旨在反对和平和人民利益的反苏政策，而是因为政府缺乏独立自主行事，未能更有力地維护不列顛帝国主义的利益，使之不受美国以及欧洲大陆的資本主义联合組織的損害。

反动的英国作家，坚决不願意承认，在原子—氫武器的世紀里，对英国来說，"实力平衡"政策是自杀的政策，他們公开主張在整个資本主义世界范圍內加剧进行軍备竞賽，妄图建立对社会主义陣营、民族解放运动的"实力优势"。

在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当时的領导人之一，Д·雅各布少将主持下

① *A. Nutting*. Europe Will not Wait. A Warning and a Way Out. London, 1960, p. 3.

② 同上书第5頁。

所写的一篇报告《冷战中的防御。自由世界的任务》中說：加强西方各国的軍事集团和把它們武装到牙齿，应当成为"民主国家"的首要問題。在这个报告的撰写人看来，"和平竞賽"即意味着"采取外交的、經济的、心理的、軍事的以及警察的(!)方法在冷战中进行竞賽。西方的民主国家应当认識到，只有先着手建立半軍事状态，他們才能在这場竞賽中生存下去"。①

由此可見反动的英国作家总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竞賽"看成是造成新冲突威胁的軍备竞賽，旨在絞杀民族解放运动的"警察手段"，和一場"冷战"。但是，把这样的政策称之为"和平竞賽"，即意味着：第一，粉飾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給人民自由和和平事业带来极严重威胁的侵略政策；第二，完全歪曲苏联政策的意义。苏联的政策，是主張沒有軍备竞賽，沒有反对人民爭取独立的"警察行为"，沒有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演成"热战"的"冷战"的眞正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賽。眞正的和平竞賽，不能，也不应該包括任何侵略战爭和任何維持世界上現存的腐朽社会制度和殖民制度的企图，仅管帝国主义的維护者們如何渴望和祈求这些。

法国各派資产阶級著作者的絕大多数，由一个共同的思想感情結合起来，即是对本国人民的恐惧，好战的反共主义。如果說，英美帝国主义分子主要是以"苏联的威胁"的謊言为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对外政策辯护，那么法国的資产阶級，則首先是在这种威胁的掩飾下，联合所有国外的阶級同盟者来反对法国本土的，以及殖民地的"內部敌人"。

法国統治集团的反共产主义政策，使这个国家在1940年6月遭受了民族災难，接連不断地給法国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最慘痛的失敗和战后的屈辱。但是法国的反动著作对于法国的西方"朋友們"所給予它的无数欺侮緘默不語，却极力贊揚把世界拖入"冷战"

① 《Defence in the Cold War. The Task for the Free World》, p. 15; 并参見 G. J. Jones. Challenge to the Peacemakers. London, 1951 и др.

的反苏的"大西洋"侵略政策。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爭中，一切手段都好——这是法国反动的历史著作的口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剛剛結束后不久，阿隆就写道，如果說过去我們曾同共产党人一道反对过法西斯主义，那么現在"为了同共产党人进行斗爭，就需要同法西斯分子合作"①。

雷·阿隆重复着資产阶級对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陈旧的誹謗，說这些运动都是由莫斯科煽动的，是苏联的对外政策的工具。他直截了当地推断，"冷战"的产生，是由于世界的"两极"結构，由于資本主义国家中阶級斗爭的結果。同許多其他現代反动的思想家一样，雷·阿隆也主張，为了确保和平，人民应当放棄阶級斗爭和民族解放斗爭。他把資本主义国家內部的政治斗爭……說成是不同社会經济体系国家間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他宣称："本身不一定引起两个集团发生冲突的阶級斗爭，妨碍着資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間的信任和合作"。②

雷·阿隆反映着世界資产阶級一部分人的观点，即认为，与其使自己的特权遭受損害，則勿宁使全人类灭亡，期望借助原子彈和"恐怖均势"来阻止进步。雷·阿隆在其著作中，坚持宣傳这种思想，即說什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結束而开始的当前时代里，"武装的和平"或是一般所謂的某种"介乎战爭与和平之間的中間状态"，是人类唯一可能的状态。根据他的說法，实力均衡的"不稳定"和全球冲突結局的"不可知"（世界反动派，就是經常威胁要以这种冲突来回答每一次新的革命），是"有利于世界（好战的世界）的"③。

許多法国极著名的作者，贊同由雷·阿隆发展了的关于战后世界新形式——"恐怖的世界"的观点。如里尔大学教授Ж·-Б·杜罗塞尔认为，正是"这种恐怖"，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在阻撓着"冷战"发展成为第三次世

① *R. Aron.* Le grand schisme, p. 92.

② *R. Aron.* On War. Atomic Weapons and Global Diplomacy. London, 1958, p. 19.

③ *R. Aron.* Le grand schisme, p. 30.

界大战。在他看来，联合国在“重要关头不能通过决議”①，不仅是由于有“否决权”，还因为在欧洲(西欧)各国处在“非常軟弱的地位”的情况下，联合国内又有了亚洲和非洲成員国。因此 Ж·-Б·杜罗塞尔重彈“苏联威胁”的謊言，实质上是为西方国家，包括法国在內，在 1945—1947 年离开了同苏联合作的政策而辯护。

以“冷战”来代替反希特勒联盟同盟者之間合作的政策，也深为罗·塞雷教授所贊許。他兴高采烈地說，“为了組織世界，然后保证世界长期維持‘三大国’和联合国而建立的两个体系，已經在旧的体系，借助于盟国的援助而实現实力均衡的旧体系的面前后退了”②。罗·塞雷认为，不是各国外长会議或联合国，而是布魯塞尔协定，北大西洋公約这些軍事同盟才是西方的最大成就，认定只有这些才是为走向“巨大进步”开辟道路的“新的国际政策和組織”的“現实”的基础③。

反动的法国作家极力替美国战后政策吹捧，說它挽救了西欧的資本主义，使西欧成为反苏，反对整个社会主义陣营的斗爭場所。他們不仅宣揚美国的“慷慨”，同时还心甘情願地替美国明显地干涉他国內政进行辯护。

雷·阿隆写道：“不是为了主义，而是出自必要，美国的外交才决定組織和改組希腊历届政府。”④雷·阿隆“忘記了”，在 1947—1948 年为美帝国主义者“改組”的，不仅有希腊、意大利，还有法国的內閣。他企图使自己的讀者相信，似乎是“远方的、謙逊的(！)海上强国的統治，容許有最大限度的自治权……华盛頓的領导人并不要求我們割让出我們的任何一点財富和我們的主权”⑤。这样，捏造历史的行为就变成了直接拜倒在可用以防范人民群众义憤危害有产者政权的銀币和刺刀的持有者脚下的丑行了。

---

① *J.-B. Duroselle.*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1919 à nos jours, p. 723—724.

② *R. Céré.* Entre la guerre et la paix (1944—1949). Paris, 1949, p. 115.

③ *R. Céré.* La technique de la paix et l'Europe, p. 183—184; 并参見 *H. Peyret.* Le réarmement et la paix. Paris, 1951。

④ *R. Aron.* Le grand schisme, p. 42.

⑤ 同上书第 74 頁。

反动的天主教的历史著作，在替“冷战”政策辯护中也有其貢献。天主教教阶制度的代表人物，利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广大居民阶层对教会的信仰，在战后年代里公开干預进步与反动、战爭与和平之間的尖銳的政治斗爭和意識形态的斗爭。同时，他們极力拉出“圣者列傳”来为黷武的反共主义、軍备竞賽、建立帝国主义联盟等等这些同天主教毫不相干的事做辯护。他們利用教会来祖护西方国家的那些最不受欢迎的对外行动，諸如复活德帝国主义和殖民战爭等等。

天主教徒雷內·巴耳杜在其《从旧欧洲到新欧洲》一书中①，以“維护天主教教义”的观点，論证了資本主义欧洲联合的必要性。替这个书撰序的不是别人，正是許多欧洲壟断集团的創建者之一，罗·舒曼。

这位热心的天主教徒，雷·巴耳杜在暢談了圣徒、神秘主义者和上帝之后，便轉而談到“爭取欧洲統一的十字軍进軍”的世俗因緣。戴高乐、丘吉尔和杜勒斯成为他的主角。他主張从經济上、軍事和政治上加强資本主义的欧洲，主張武装欧洲，建立“共同市場”，反对共产主义，“解放”东欧，使亚洲和非洲“欧洲化”，主張在美洲和俄国傳布天主教。

如同許多其他法国的反动作家一样，雷·巴耳杜主張西德，主要是其軍队参加保护“天主教的欧洲”。为了把所有反动的和战爭的力量糾合在一起，这位热心的天主教徒准备作出他所能做的“最大的牺牲”：同篤誠的信仰的叛徒——新教徒“和解”。談到战后法德关系問題，雷·巴耳杜力图使讀者相信，“問題不是关于优越性，‘領袖作用’的問題，而是关于联盟，关于共同性的問題。应当把把戏耍到底（！），德国的新教不会再吞沒我們了”②。

虽然如此，但是大多数法国資产阶級作家都无法掩飾，法国人民对于国內統治集团在战后采取的目光短淺的侵略政策的严重不

① *R. Baltus*. De la vieille à la nouvelle Europe. Paris, 1953.

② 同上书第105頁。

滿和忧虑，也无法掩盖法国資产阶級本身对于美英不断損害其利益的不滿。因之，在法国的著作中，除了宣傳反共主义，"冷战"之外，也不时出現有号召采取"独立自主的民族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建立"第三种力量"和号召在法帝国主义庇护下，西欧大陆国家联合起来的著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論是具有民族主义情感的作家，天主教作家还是"社会主义者"的作家，都提出了这类口号，但是他們同时又竭力掩飾这样的事实：他們所主張的"独立自主"政策，并不能使国际局势緩和，也不能确保和平、安全和法国的眞正民族利益，这种政策只能导致帝国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尖銳化，导致軍备竞賽以及新的联盟的建立。

不管打着什么招牌来推行恢复西德軍国主义，同它建立同盟，加强軍事力量，同民主和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斗爭的政策，这种政策依然是同法国人民，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完全相違和敌对的。

在西德的反动著作里，在各式各样关于"冷战"的观点中傳播最广的，是美英主張同"从前的敌人"勾結，来反对自己过去反法西斯联盟的伙伴的政策。正在复活的德国帝国主义、軍国主义和复仇主义的思想家們，非常热心地为摆脫波茨坦协議的每一措施而辯护，甚至于还不断批評西方国家在武装西德、使西德在一切国际問題上，包括制訂和实現"全球政策"上，享有"平等权利"等方面"太緩慢"或"不彻底"。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并得到大肆吹捧的Ф·К·阿勒曼《波恩并非魏馬》一书中，公开贊揚复活德国軍国主义的方針。阿里曼完全是替西方分裂德国的政策，"割裂"德国东部的政策辯护。他认为这一政策的主要收获是，西方国家抛棄了同苏联达成的协議后，已踏上了同德国壟断組織、反动派合作的道路。他承认："正是由于德国的分裂，才使德国人，至少是

在西部地区获得了一定的机会。如果大国想在德国的土地上互相爭斗，并且想取得胜利的話，那么只有当他得到德国的帮助时才有可能"。接着Ф·К·阿勒曼公开表示欢迎"西方大国同抱有反共情緒的德国人之間在利益上的共同性"①。

西德的著作，对于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組成之前，德国壟断資本家，反动派和复仇主义分子对于加剧战后国际紧張局势所做的"貢献"，給予了极高的評价。如Ф·К·阿勒曼就极力称贊这些"德国人——更确切地說，那些在柏林的有远見的政治家和官員"在1948年挑起柏林危机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写道："在西柏林使用馬克，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德国人干預的結果。当西方国家曾就达成妥协的問題，于8月間在莫斯科，9月間在柏林举行談判，并准备在貨币政策問題上作出进一步让步时，又是由于西柏林人有效地警告了(美、英、法)这种投降可能产生的后果，而使得西方代表团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路綫。"②

德国"无条件投降"宣言的墨迹还未干，受到西方国家鼓励的德国反动派和复仇主义分子，就已在国际舞台上开始进行敌視和平和自由的活动了。由于自身的力量还不足，他們首先是在背后，然后是在同他們的大西洋彼岸的庇护者結成联盟来进行險恶的活动。因之，頌揚"美国和德国的一致性"，歌頌美国战后对外政策中最富侵略性的活动，已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了建立和加强华盛頓—波恩"軸心"进行意識形态运动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錯誤"之后主張美、德建立"新"友誼的最明显的例子之一，是德籍美国人恩斯特·耶克教授所著《1926—1951年的美国和我們。美德思想联盟》。这位作者，早就支持并宣傳把美德联盟作为資本主义国家"全球"联合或是"全宇宙的"联合的基础，欢迎美苏合作在1945年的

① *F. K. Allemann*. Bonn ist nicht Weimar. Köln, 1956, S. 44, 48.

② 同上书第63—64頁。

結束，和由此而产生的"美国和我們"①，即美、德帝国主义者，新合成的可能性。

耶克称杜魯門的"历史使命"是把西德包括到"大西洋"政策和同盟的范圍之中。反动的德国作家們，为了适应新的条件，把自己过去的地緣政治学理論加以变形，承认目前美国还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他們同时已公开宣布，"欧洲的中心"是西德。

战后美帝国主义者同西德帝国主义者的"接近"，是建立在完全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在反对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斗爭中和在企图"重新审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結和阻撓历史进步中的"利益的共同性"。西德的反动人物为了換取美援和美国对其复仇主义要求的支持，他們对美国的任何活动都一律表示同情，只要这些活动能在国际舞台上制造紧張的和好战的气氛，能阻撓和平解决尚未解决的問題，其中包括签訂对德和約問題。"冷战"的局面，很容易把"新的（！）德国"提交到"大西洋集团"中平等的角色的地位②。

西德的反动著作比其他国家的著作更多地頌揚"由于第一次使用了使战爭的进行发生革命化的原子武器而开辟的原子时代——縮短了世界战爭的长期性"③！在西德对外政策科学研究所的一部論述裁軍問題的重要著作里，公开为"实力政策"辯解，論证說，不管是什么，"和平最强有力的保障"只能是"实际上的实力均衡，装备上的均势"④。提出裁軍的必要的先决条件，是建立实质上无任何限制的监督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即是說，要滿

① *E. Jäckh.* Amerika und wir 1926—1951. Amerikanisch-deutsches Ideen-Bündnis. Stuttgart, 1951. S. 133.

② 同上书第149頁。

③ 同上书第153頁。

④ *H. Volle.* Probleme der internationalen Abrüstung. Eine Darstellung der Bemühungen der Vereinigten Nationen 1945—1955. Frankfurt/Main, 1956, S. XVIII.

足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要求和领土要求。这是意味着事实上号召停止一切关于解决人类最迫切問題所进行的談判。

論述战后头五年期間国际关系問題的資产阶級的著作，当然不限于美英法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版的书籍。在其它資本主义国家里，如意大利、日本、比利时、瑞典、拉丁美洲国家、亚洲各国等等也出版有論述1945—1949年对外政策問題的专著或是部分談到这些問題的作品。但是一般說来，这些著作的作者，是站在維护資本主义和"自由世界"的立場上，利用美英的文献和著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重复和散布美国的或是西欧的反动的国际問題专家們的明显的虛伪主張。

当然，并非所有的資产阶級作者，尽管他們站在非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立場上，并不都是伪造者。如前面早已談到的，就在資本主义国家里，也还有一些人他們拥护对当前国际关系采取清醒的观点，拥护和平共处和中立政策。有一些資产阶級的学者，眞誠地力求客观地評价战后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但是他們的研究方法根据不足，致使他們的著作只能研究一些个别的部分的問題，而不能接触到历史事件的实质，提高到广泛的眞正科学的归納，从而对战后国际关系繪出現实的全面的图景。而且，这些作家所处从事写作的条件(在資产阶級著作中，官方的詭辯的流派屬于完全的无限制的統治地位)也使他們不可能多少自由地，广泛地談出自己的观点。

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家，向来願意同那些眞正想研究和客观地評价这些或那些事件，社会发展中的規律过程，其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等問題的人，进行合作。苏联和資产阶級的著作家間的多次会見，和举行的会議，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同資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学者一道反对宣傳"冷战"的反动的資

产阶級著作，便足以证明这点。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对于一切捏造国际关系史的企图，給予了最坚决的回击，今后仍将給以回击。

对于反动的資产阶級著者和他們的主子說来，意識形态的斗爭——这是"冷战"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妄費心机地企图从理論上維护已經腐朽的社会制度，和国际关系的旧的强盜准則，是未来的侵略行为和"热战"的思想准备。因此，帝国主义的思想家在他們的著作中，頌揚"实力政策"和軍备竞賽，号召建立資本家、殖民者、軍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神圣同盟"，他們是"武装世界"、原子彈、恐惧、恐怖、暴力和公开干涉他国內政、"遏制"共产主义、"保持战爭边緣的平衡"等思想的鼓吹者。

帝国主义的思想家拿不出任何好的东西来反对持久和平、民族解放、社会进步、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些光輝的思想。因之，反动的資产阶級作家只能乞求于歪曲事实，伪造战后国际关系史和其实质，公开使自己的著作服务于"冷战"、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反动政策的目的。

共产党人，馬克思主义的著作家，过去、現在和将来都要进行坚决的反对資产阶級思想家的思想斗爭，其中包括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問題方面的斗爭①。意識形态的斗爭，这对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說，完全是阶級斗爭的适当的，必然的形式。此外，他們还力求通过和平的經济竞賽，文化竞賽道路，借助思想的力量，而不是武器的力量来解决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間，現存的两种世界体系間的对抗性冲突。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問題上所进行的意識形态的斗爭，其目的不是要准备軍事冲突，挑起"冷战"，加剧国际紧張局势，而是为了巩固各国人民的和平、

① 馬克思主义科学著作对战后国际关系基本問題的分析，見本书第三卷。

独立和安全，为了裁軍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賽。

共产党人反映着新兴的阶級和全民的利益，坚信自己的正义事业必定胜利。因之他們特别关心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动力，确切地反映幷眞实地叙述国际生活、世界政治的重要事件和因素，以便捍卫和平——新的人类社会得以順利建設的首要条件。他們在对較久的或不久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規律性和客观現实的认識中，来寻求和求得对当前事件的解釋以及事件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馬克思主义作家以眞理，以建筑在对具体历史进行认眞分析基础之上的自己的深刻的思想信念，来反对資产阶級思想家的恶毒的謊言武器。事实的明确性，結論的科学性——馬克思主义者就是用这些来反对資产阶級的伪造者。用列宁的話来說，就是"历史本身和实际生活的每一个步驟都会证实我們的观点的正确"①。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頁。

参 考 书 目

馬克思列宁主义奠基者的著作

Маркс К. и *Энгельс Ф.* 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изд. 2, т. 4.

Маркс К. 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о Франции.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Соч., изд. 2, т. 10.

Энгельс Ф. Анти-Дюринг. М., 1957.

Ленин В. И. Горючий материал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Соч., изд. 5, т. 17.

Ленин В. И. Воинствующий милитаризм и антимилитаристская тактика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и. Соч., изд. 5, т. 17.

Ленин В. И. Отсталая Европа и передовая Азия. Соч., изд. 5, т. 23.

Ленин В. И. О лозунге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Европы. Соч., изд. 4, т. 21.

Ленин В. 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как высшая стад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Соч., изд. 4, т. 22.

Ленин В. И. Воен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пролетар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Соч., изд. 4, т. 23.

Ленин В. И. Пацифизм буржуазный и пацифизм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Соч., изд. 4, т. 23.

Ленин В. И. О лозунге «разоружения». Соч., изд. 4, т. 23.

Ленин В. И. Война и революция. Соч., изд. 4, т. 24.

Ленин В.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революция. Соч., изд. 4, т. 25.

Ленин В. И. 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фразе. Соч., изд. 4, т. 27.

Ленин В. И. Письмо к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 рабочим. Соч., изд. 4, т. 28.

Ленин В. И. V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 рабочих,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казачьих и красноармей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6—9 ноября 1918 г. Речь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8 ноября. Соч., изд. 4, т. 28.

Ленин В.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 рабочим. Соч., изд. 4, т. 30.

Ленин В. И.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ы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газеты «New York Evening Journal». Соч., изд. 4, т. 30.

Ленин В. И.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ы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а английской газе-

ты «Daily Express». Соч., изд. 4, т. 30.
Ленин В. И. Индий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Соч., изд. 4, т. 31.
Ленин В. И. Письмо к английским рабочим. Соч., изд. 4, т. 31.
Ленин В. И.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ый набросок тезисов п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и колониальному вопросам. (Для второго съезд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Соч., изд. 4, т. 31.
Ленин В. И. Детская болезнь «левизны» в коммунизме. Соч., изд. 4, т. 31.
Ленин В. И. III конгрес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22 июня — 12 июля 1921 г.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а о тактике РКП на III конгресс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Соч., изд. 4, т. 32.
Ленин В. И. 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 23 — 28 декабря 1921 г. 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оч., изд. 4, т. 33.
Ленин В. И. Интервью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у «Обсервер» и «Манчестер гардиан» Фарбману. Соч., изд. 4, т. 33.
Ленин В. И. Лучше меньше, да лучше. Соч., изд. 4, т. 33.
Ленин В. И. XI съезд РКП(б), 27 марта — 2 апреля 1922 г.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КП(б) 27 марта. Соч., изд. 4, т. 33.
Ленин В. И. Письмо в Политбюро по поводу резолюции IX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ъезда Советов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22 декабря 1921 г. Соч., изд. 4, т. 33.
Ленин В. И.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и внутреннем положении Совет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Речь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фракци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ъезда металлистов 6 марта 1922 г. Соч., изд. 4, т. 33.
Ленин В. И. Тетради п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у. М., 1939.
Ленин В. И. Воен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1917 — 1920). М., 1956.
Ленин В. И. Об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военной интервен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 в СССР. М., 1956.
Ленин В. И.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колониальном вопросе. М., 1956.
Ленин В. И. О вос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кризисах. М., 1957.
Ленин В. И. О войне, армии и военной науке.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1957—1958.
Ленин В. И.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к бур-

жуазии и мелкобуржуазным партиям. М., 1958.
Ленин В. И.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праве. М., 1958.
Ленин В. И.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рабочем 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М., 1958.
Ленин В. И. Против ревизионизма. М., 1958.
Ленин В. И.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1960.
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XXXVI. М., 1959.

共产党与工人党的主要文件，苏共与各兄弟党領导人的演讲和著作

«Программ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61.
«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и решениях съездов, 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 пленумов ЦК», ч. III. М., 1954.
«XX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4—25 февраля 1956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I—II. М., 1956.
«Внеочередной XXI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27 января — 5 февраля 1959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I—II. М., 1959.
«XXII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7—31 октября 1961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I—III. М., 1962.
«Резолюции VII Всемирн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а». М., 1935.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некоторых компартий в Польше в конце сентября 1947 г.» М., 1947.
«Документы Совещаний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й, состоявшихся в Москве в ноябре 1957 г.» М., 1959.
«Заявление Совещани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х и рабочих партий (ноябрь 1960 г.). Обращение к народам всего мира». М., 1960.
«IX съезд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М., 1960.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Польши в борьбе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55.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Комунистическа партия в резолюции и решения на конгресите», т. 4. 1944—1954. София, 1954.
«The British road to socialism. Programme adopted by the Exe-

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London, 1951.
«Kształtowanie się, podstaw programowych Polskiej Partii Robotniczej w latach 1942—1945». Warszawa, 1958.
«A MSzMP VII. Kongreszusának jegyzökönyve». Budapest, 1960.
«PPR. Rezolucje, odezwy, instrukcje i okólniki Komitetu Centralnego». VIII. 1944—XII. 1945. Warszawa. 1959; I. 1946—I. 1947. Warszawa. 1961.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Comité Central. Deux années d'activité pour la renaissance économique et politique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Rapprts du Comité Central pour le XI-e congrès national du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 25—28 juin 1947». Paris, 1947.
«Resoluţii şi hotărîri ale Comitetului Central al Partidului muncitoresc romîn». Bucuresti, 1951.
«Die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 Dokumente, B. 1—3. Berlin, 1952.

* *
*

Хрущев Н. С. Речь на четвертой сесси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четвертого созыва 29 декабря 1955 г. М., 1956.
Хрущев Н. С. Отч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XX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 14 февраля 1956 года. М., 1956.
Хрущев Н. С. Сорок лет Великой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М., 1957.
Хрущев Н. С.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и мирное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М., 1958.
Хрущев Н. С. Речь на VII съезде Болгар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3 июня 1958 г. М., 1958.
Хрущев Н. С. Речь на V съезд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единой партии Германии 11 июня 1958 г. М., 1958.
Хрущев Н. С. К победе в мирном соревновании с капитализмом. М., 1959.
Хрущев Н. С. О мирном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М., 1959.
Хрущев Н. С. Мир без оружия — мир без войн.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1960.
Хрущев Н. С. Речь на III съезде Румынской рабочей партии 21 июня 1960 г. Речь на митинге трудящихся в Бухаресте 25 июня 1960 г. М., 1960.
Хрущев Н. С. За мир, за разоружение, за свободу народов. М.,1960.

Хрущев Н. С. За новые победы мирового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М., 1961.

Хрущев Н. С.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60 год.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1961.

Хрущев Н. С. Отче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XXII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 17 октября 1961 года. М., 1961.

Хрущев Н. С. О Программ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Доклад на XXII съезде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8 октября 1961 года. М., 1961.

Хрущев Н. С.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е слово на XXII съезде КПСС 27 октября 1961 года. М., 1961.

Хрущев Н. С. Коммунизм — мир и счастье народов.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1962.

* *
*

«Приветствия XXII съезду КПСС». М., 1961.

Айдит Д. Н. Индонезий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и индонезий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М., 1958.

Арисменди Р. Вторжение доллара в Латинскую Америку. М., 1948.

Георгиу-Деж Г.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1956.

Гомулка В.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М., 1959.

Гхош А.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Индии. М., 1957.

Деннис Ю.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1947—1951). М., 1952.

Димитров Г.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1957.

Живков Т. Отч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Болгар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VII съезду партии. 2 июня 1958 года. М., 1958.

Ибаррури Д. Испанский народ, режим Франко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реакция. М., 1946.

Кадар Я.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М., 1960.

Ким Ир Сен. Торжество идей Великого Октября. М., 1960.

Кодовилья В.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1926—1956. М., 1957.

Мао Цзэ-дун.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четырех томах. М., 1952—1956.

Новотный А. За победу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М., 1960.

Носака Сандзо. Новый Китай и Япония. Токио, 1949 (на японском языке).

Пик В.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М., 1956.
Тольятти П. Итальянска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М., 1959.
Тольятти П. Речи в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М., 1959.
Торез М.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1959.
Ульбрихт В. Борьба за мир, за победу социализма,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Германии как миролюбивого,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1958.
Фостер У. З. История трех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в.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9.
Фостер У. З. Закат мир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 1949.
Фостер У. З. Очерки мирового профсоюз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М., 1956.
Фостер У. З. Очерк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Америки. М., 1953.
Хо Ши Мин.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и речи. М., 1959.
Цеденбал Ю.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М., 1960.
Шаркн Л. Л. Социализм в Австралии. М., 1958.
Buck T. Our fight for Canada. Toronto, 1959.
Codovilla V. Resistira la Argentina al imperialismo yanqui? Buenos Aires, 1948.
Foster W. Z. Labour and the Marshall Plan. N. Y., 1948.
Foster W. Z. The New Europe. N. Y., 1947.
Gottwald K. Vybrané spisy, s. II. Praha, 1955.
Pollit H. Selected articles and speeches, vol. 1—2. London, 1954.
Thorez M. Une politique française. Paris, 1945.

文 献 資 料

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公布的文件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 I—III. М., 1946—1947.
Т. I. 1941—1943 гг. М., 1946.
Т. II. 1944 г. М., 1946.
Т. III. 1945 г. М., 1947.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50—1953.
1946 год. М., 1952.
1947 год, ч. I. М., 1952.
ч. II. М., 1952.
1948 год, ч. I. М., 1950

ч. II. М., 1951.

1949 год. М., 1953.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 I—VI. М., 1944—1947.

Т. V. Июнь 1941 г. — август 1945 г. М., 1947.

Т. VI. Сентябрь 1945 г. — февраль 1947 г. М., 1947.

«Белорусская ССР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договоры, конвенции и соглашения БССР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1944—1959». Минск, 1960.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вопросам борьбы с военным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 и поджигателями войны». М.,1949.

«Заявление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СССР о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м пакте». М., 1949.

К вопросу об англо-советском договоре.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7 год», ч. 1, М., 1952.

«К переговорам меж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СССР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м США по атомной проблеме».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54.

«Материалы к истор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Вып. I. Создание текста Устава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ост. Крылов С. Б. М. — Л., 1949.

Материалы о работе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комиссии (январь — июль 1949 г.).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М., 1953.

Материалы о работе Контрольного совета в Германии (январь — март 1948 г.).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8 год», ч. 1. М., 1950.

Материалы о работе Союзниче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о Австрии (январь—ноябрь 1948 г.).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8 год», ч. 1. М., 1950.

Материалы о Токий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главных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8 год», ч. 1. М., 1950.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корейскому вопросу (апрель — октябрь 1947 г.).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7 год», ч. 2. М.,1952.

Меморанду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ССР о Североатлантическом договоре (31 марта 1949 г.).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9 год». М., 1953.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с Болгарией». М., 1947.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с Венгрией». М., 1947.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с Италией». М., 1947.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с Румынией». М., 1947.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с Финляндией». М., 1947.
«Нюрнберг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главными немецкими военным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семи томах. М.,1957—1960.
«Первый Всемирный конгресс сторонников мира. Париж — Прага. 20—25 апреля 1949 г.». М., 1950.
«Перепис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с президентами США и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м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1958.
Т. I. Переписка с У. Черчиллем и К. Эттли (июль — ноябрь 1945 г.).
Т. II. Переписка с Ф. Рузвельтом и Г. Трумэном (август 1941 г. — декабрь 1945 г.).
«Правда о политике западных держав в Германском вопросе. Об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падных держав за нарушение Потсдамского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милитаризма.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М., 1959.
«Сборник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договоров, соглашений и конвенций, заключенных СССР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Вып. 11—14. М., 1954—1957.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осковской, Тегеранской, Крымской, Берли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консультативной комиссии. 1943—1945 гг.». М., 1946.
«Сборник нот и заявлен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СССР, США, Китая и Англии 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по вопросу мирного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для Японии». М., 1951.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Берлин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окументы). Вып. 1—2. М., 1948—1949.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опрос о единстве Германии и мирном договоре с Германией»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М., 1952.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ко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48.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17—1957».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59.
«Совет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1959.
«Советско-чехословац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60.

Совещание заместителей министр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о Австрии (февраль — апрель 1948 г.).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8 год», ч. 1. М., 1950.

«Совещание министров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вось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в Варшаве (23—24 июля 1948 г.)». М., 1948.

«СССР и арабские страны. 1917—1960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61.

«Фальсификаторы истор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справка)». М., 1948.

* *
*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ьетнам».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48.

«Документы 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Герман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 1958.

«Документы о вражеской и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Болгарии». София, 1952.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Герман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50.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50.

«ČSR a Německo. Výbor dokumentu o československé politice v německe otázce». Praha, 1959.

«Dokumente zur Aussenpolitik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n, 1954. Bd I. Von der Gründun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am 7. Oktober 1949 bis zur Souveränitätserklärung am 25. März 1954.

«Dokumenty československé zahranicní politiky. 1945—1960». Praha, 1960.

«Dokumenty sovetsko-československého prátelství». Praha, 1946.

«Friedensvertrag mit Deutschland. Kleine Dokumentensammlung». Berlin, 1959.

«Magyarország és második világháború. Titkos diplomáciai okmányok a háboru elözményeihez és történetéhez». Budapest, 1959.

«Odbudowa Państwa Polskiego w latach 1944—1946. Najważnjejsze dokumenty i informacje». Warszawa, 1947.

«Oder-Neisse. Eine Dokumentation». Berlin, 1956.

«Prawo międzynarodowe i historia dyplomatyczna». Wybór do-

kumentów. Wstęp i opracowanie L. Gelberga. Tom III. Warszawa, 1960.
«Spaltung und Wiedervereinigung Deutschlands. Kleine Dokumentensammlung». Berlin, 1958—1959.
Bd. 1. 1945—1948.
Bd. 2. 1948—1950.
«Témoignages et documents français relatifs à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au Vietnam». Part IV. Hanoi, 1955.
«Weißbuch über die amerikanisch-englische Interventionspolitik in Westdeutschland und das Wiedererstehen des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Leipzig, 1951.
«Zbiór dokumentów». Warszawa, 1945—1949.

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及其他資本主义国家所公布的文件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United States Plan. June 14, 1946. By Baruch B. M.». N. Y., 1946.
«Basic documen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 Y., 1951.
«Die Bemühungen der Bundesregierung um Wiederherstellung der Einheit Deutschlands durch gesamtdeutsche Wahlen. Dokumente und Akten. Hrsg. vo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amtdeutschen Fragen». Bonn, 1958.
«Burma. Statement of Policy by His Majesty's Government, May 1945». London, 1945.
«The conferences of Malta and Yalta. Department of State». N. Y., 1955.
«Congressional Record». Washington, 1945—1949.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 Washington, 1950.
«Diplomacy in the Near and Middle East. A documentary record. Ed. by Hurewitz J. C.». Princeton, 1956.
«Documents on Polish-Soviet Relations. 1939—1945». Vol. I. 1939—1943. London, 1961.
«Dokumentation zur Abrüstung und Sicherheit von 1943 bis 1959. Von H. Siegler». Bonn — Wien — Zürich, 1960.
«Dokumentation zur Deutschlandfrage. Von der Atlantik — Charta 1941 bis zur Genfer Außenministerkonferenz 1959». Bonn, 1959.
«Documents and speeches on Commonwealth affairs. 1931—1957.

Ed. by N. Mansergh», vol. 1—2. London, 1953.
«Documents français relatifs à l'Allemagne. (Août 1945—février 1947)». Paris, 1947.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vol. III—IX. Boston — Princeton, 1941—1949.
«Documents on Germany under occupation 1945—1954. Selected by R. Oppen». London, 1955.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7—1948». Selected and ed. by M. Carlyle. Preface by A. Toynbee. London—New York, 1952.
«Documents on European recovery and defence. March 1947 — April 1949». London — New York, 1949.
«East Asia. 1947—1950». Selected Documents on Asian Affairs. Oxford, 1958.
Die Einheit Deutschlands. Ihre Erörterung und Behandlung auf den Kriegs und Nachkriegskonferenzen. 1941—1949. Darstellung und Dokumente. Hrsg. von Deuerlein E. Frankfurt/Main — Berlin, 1957.
18-st U. S. Congress. 1-st Session. Senate Document № 123. 1949. Washington, 1950.
«European recovery and American aid». A report by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foreign aid. Washington, 1947.
«France. 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 Annales du Conseil de la République». Documents parlementaires. Paris, 1949.
«Frieden—Wiedervereinigungssicherheit. Eine Zeittafel zur Deutschlandpolitik 1945 — 1958». Bearb. von G. Stoedtner. Hrsg. vom Bundesministerium für gesamtdeutsche Fragen. Bonn, 1958.
«Germany. 1947—49». The story in documents.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56. European and Commonwealth series. Washington, 1950.
«Great Britain.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Parliamentary debates». Official report. London, 1945—1949.
«Inaugural address of the President (Truman), January 20, 1949».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49. Washington, 1949.
«The Inter-American conference on problems of war and peace». Report of Delegation of the USA. Washington, 1946.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ional Defence Program». 79-th Congr.,

2-nd Session. Senate report № 10. Part 5. Washington, 1946.

«Investigation in the National Defence Program». Hearings before Special committee, U. S. Senate, 80-th Congr. Washington, 1948.

«North Atlantic treaty». A decad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s, 1941—1949». Washington, 1950.

«Nothing to Fear. The Selected Addresses of F. D. Roosevelt 1932—1945». N. Y., 1947.

«Occupation of Germany. Policy and progress, 1945—1947». 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2783. European series 23. Washington, 1947.

«Poland in the British Parliament. 1939—1945». Vol. I—II. N. Y., 1946, 1959.

«Post-war foreign policy preparations. 1939 — 1945».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1950.

«Probleme der internationalen Abrüstung. Eine Darstellung der Bemühunge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1945 bis 1955». Dokumente und Berichte des Europe-Archivs. Frankfurt/Main,1956.

«Problem of post-war reconstruction». American council on public affairs. Washington, 1943.

«Report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trol of Atomic Energy. March 16-th». London, 1946.

«Traités et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Reuter P. et Gros A. Paris, 1960.

Schlange-Schöningen H. Im Schatten des Hungers. Dokumentarisches zur Ernährungspolitik und Ernährungswirtschaft in den Jahren 1945—1949. Hamburg — Berlin, 1955.

«Treaty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United Kingdom and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Burma regarding the Recognition of Burmese Independence and Related Matters». London. October 17, 1947. London, 1948.

«Twenty First Annual Report.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Basle, June 11, 1951.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Publication of 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N. Y., 1945—1950.

«United States. 80-th Congr. Final report on foreign aid of 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foreign aid». Washington,

1948.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 Based on the file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1949.
«United States Senate. 81-st Congr.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on North Atlantic treaty». Washington, 1949.
«Von Potsdam bis Bonn. Fünf Jahre deutsche Nachkriegsgeschichte. Porträt, Zeittafel und Dokumentation. 1945—1950. Hrsg. von Schäfer E.». Lahr, 1950.
«The War Reports of General of the Army G. Marshall, General of the Army H. Arnold, Fleet Admiral J. King».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1947.

联合国的文件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Сессия 1-я.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перв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10 января — 14 февраля 1946 г. Лондон, 1946.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Сессия 1-я. Резолюции, принятые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ей на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первой сессии с 10 января по 14 февраля 1946 г.». Лондон, 1946.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Сессия 1-я.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второй части перв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Пленарные заседания.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тчеты 23 октября — 16 декабря 1946. Нью-Йорк, 1947.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Сессия 1-я. Резолюции, принятые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ей на второй части первой сессии с 23 октября по 15 декабря 1946». Нью-Йорк, 1947.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Сессия 2-я.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Резолюции. 16 сентября—29 ноября 1947». Нью-Йорк, 1947.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Сессия 3-я. Официальный отчет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3-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Резолюции. 21 сентября—12 декабря 1948». Париж, 1949.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Сессия 4-я.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Резолюции. 20 сентября—10 декабря 1949 г.». Лейк-Саксес (Нью-Йорк), 1950.
«Совет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Нью-Йорк, 1946—1949.

«Совет по опеке. Резолюции, принятые Советом по опеке». Лейк-Саксес (Нью-Йорк), 1947—1949.
«Специальная сессия, 1-я. Нью-Йорк, 1947.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перв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Нью-Йорк, 1952.
«Специальная сессия. Нью-Йорк, 1947. Резолюции, принятые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ей на перв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сессии с 28 апреля по 15 мая 1947». Нью-Йорк, 1947.
«Специальная сессия, 2-я. Нью-Йорк, 1948.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отчеты втор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сесси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и». Нью-Йорк, 1952.
«Специальная сессия, 2-я. Нью-Йорк, 1948. Резолюции. 16 апреля—14 мая 1948». Нью-Йорк, 1948.
«Устав ООН и ста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уда». Нью-Йорк, 1948.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и Социальный совет. Резолюции». Нью-Йорк, 1947—1949.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N. Y., 1958.
«Constitution of th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of United Nations (with annexes), Quebec. 16-th October 1945». London, 1946.
«Dumbarton-Oaks 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Washington, 1944.
«Handbook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specialised agencies». N. Y., 1951.
«Ten years of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1945 to 1955». A complete catalogue. N. Y., 1955.
«United Nations documents. 1941—1945». London—New York, 194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an Francisco 1945». Selected documents. Washington, 1946.
«The United Nations at work». Basic documents. Boston, 1947.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since the war». Geneva, 1953.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report. Salient features of the 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1945—1947». N. Y., 1948.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Post War Price Relations in trade between Underdeveloped and Industrializes Countries. 1949».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survey of Latin America». Geneva, 1949.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survey of Asia and the Far East». Geneva, 1948.
«United Nations.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 1938—1958». N. Y., 1960.
«United Nations. Survey of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Europe». Geneva, 1948.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registered or filed and recorded with the Secretariat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va, 1947—1949.

資产阶級国务活动家与政治家的演讲、传記、回忆录、日記

Бредли О. Записки солдата.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7; *Де Голль Ш.* Военные мемуары, т. 1—2. Перев. с франц. М., 1957, 1960; *Неру Дж.* Открытие Индии.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5; *Шервуд Р.* Рузвельт и Гопкинс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 т. 1—2.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8; *Acheson D.* A democrat looks at his party. N. Y., 1951; *Beal J. R.* John Foster Dulles. A biography. N. Y., 1957; *Beck J.* Final report (Diplomatic memoirs). N. Y., 1957; *Bowles Ch.* Ambassador's report. N. Y., 1954; *Broad L.* Sir Anthony Eden. London, 1956; *Brown L. H.* A report on Germany. N. Y., 1947; *Bullit W.* The Great Globe itself. N. Y., 1947; Der Bundeskanzler. Der Weg Konrad Adenauers. Frankfurt/Main, 1953; *Byrnes J. F.* Speaking frankly. N. Y., 1947; *Churchill W.* War speeches. 1940—1945. London, 1946; *Churchill W.* Post-war speeches Vol. 1—3, 1945—1950. Boston, 1949—1952; *Churchill W.* The Second World War. 6 vols. London, 1949—1954; *Clay L.* Decision in Germany. N. Y., 1950; *Dulles A.* Germany's underground, N. Y., 1947; *De Gaulle Ch.* Mémoirs de guerre. 3 vols. Paris, 1954—1959; *Dumaine J.* Quai d'Orsay (1945—1951). Paris, 1956; *Eden A.* Selected speeches and addresses, 2 vols. Boston, 1948—1950 (Freedom and order. 1939—1946; Days of decision. 1946—1949); *Eisenhower D.* Crusade in Europe. N. Y., 1951; «Forrestal Diaries. Ed. by W. Millis». N. Y., 1951; «Ghana. The autobiography of Kwame Nkrumah». London, 1957;

Gelsner K. Konrad Adenauer. München, 1957; *Gelsner K.* Heinrich von Brentano. München—Köln, 1957; *Hoover H.* Addresses upon the American road. 1945—1948. Toronto—New York—London, 1949; *Hoover H.* 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 3 vols. N. Y., 1951—1952; *Hughes E.* Winston Churchill. N. Y., 1957; *Hull C.* The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2 vols. N. Y., 1948; *Kirkpatrick I.* The inner circle: memoirs of Ivone Kirkpatrick. London, 1959; *Leahy W.* I was there. London, 1950; «J. Nehru. Independence and After.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1946—1949». N. Y., 1950; *Panikkar K. M.* In two Chinas. Memoirs of a diplomat. London, 1955; *Roosevelt F. D.* 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Vols. X—XIII. Washington, 1950; *Stettinius E.*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 The Yalta conference. N. Y., 1949; *Sherwood R. E.* The White House. Papers of Harry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2 vols. London, 1949; *Smith W. B.* My three years in Moscow. Philadelphia, 1950; *Taft R.* 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ns. N. Y., 1951; *Truman H. S.* Truman speaks. N. Y., 1960; *Truman H. S.* The memoirs by Harry S. Truman. N. Y., 1955—1956 (Vol. 1. Year of decisions. Vol. 2. Years of trial and hope); *Tugwell R. G.* The democratic Roosevelt. A biography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N. Y., 1957; *Vandenberg A. H.* ed. The private papers of senator Vandenberg. Boston, 1952; *Weymar P.* Konrad Adenauer. Die autorisierte Biographie. München, 1955.

书　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结

Айрапетян М. Э. и *Деборин Г. А.* Этап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М., 1961; *Батурин А.* США и Мюнхен. М., 1961; *Баттальа Р.* История итальян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Сопротивления. Перев. с итал. М., 1954; *Блэр Дж., Хаутон Х.* и *Роуз 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48; *Боратынский С.* Дипломатия периода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Перев. с польск. М., 1959; *Варга 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экономике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итог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46; «Воен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и переход к мир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Под ред. И. А. Трахтенберга. М., 1947;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Н.* Во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 1948;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гг.».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Под общ. ред. С. П. Платонова, Н. Г. Павленко, И. В. Паротькина. М., 1958; *Деборин Г. А.*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1958; *Евгеньев В.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репараций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0; *Еременко А. И.* Против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истори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Изд. 2,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М., 1960; *Иванов Л. Н.* Очерк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период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 М., 1958; *Исраэлян В. Л.*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 1959; «История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1—1945», т. 1—3. М., 1960—1961; «Итог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ерев. с нем. М., 1957; *Купша И., Матей Г.* и др. Вклад Румынии в разгром фашистской Германии. Перев. с рум. М., 1959; *Матвеев В.* Провал мюнхен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1938—1939 гг.). М., 1955;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1840—1949)». Под общ. ред. Е. М. Жукова. Изд. 2, испр. и доп. М., 1956; *Мельников Ю. М.* США и гитлеровская Германия. 1933—1939 гг. М., 1959;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ерев. с нем. М., 1957;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 М., 1955; «Поражение герм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Статьи и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д общ. ред. генерал-майора Н. Г Павленко. М., 1960;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9; *Рачинский М. Ю.* и *Розенблат С. 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роцесс главных японских во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ников (1946—1948 гг.) М., 1950; «Советские 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в борьбе за освобожд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Югославии». М., 1960; *Типпельскирх К.*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Перев. с нем. М., 1956; «30 лет жизни и борьбы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ерев. с итал. М., 1952; *Фуллер Дж.*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 1939—1945 гг.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6; *Шейнман М. М.* Ватикан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М., 1951; *Шпигт А. Ю.* Африка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М., 1959; *Яковлев Н. Н.* США и Англия во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е. М., 1961.

Abend H. Pacific Charter. Our Destiny in Asia. Garden City, 1943; *Balfour M.* and *Mair J.* Four-power control in Germany and Austria. 1945—1946. London—New York, 1956; *Bell A.* and *Ivanyi B.* Route to Potsdam. The story of the peace aims. 1939—1945. London, 1945; *Bittel K.* Von Potsdamer Abkommen zur Viermächte—Konferenz. Der Weg zur friedlichen Lösung der deutschen Frage. Berlin, 1953; *Callender H.* A Preface to Peace. N. Y., 1944; *Carr E. H.* Condition of Peace. London, 1942; *Castilion R.* Les réparations allemandes. Deux expériences. 1919—1923. 1945—1952. Paris, 1953; *Catroux Gen.* Dans la bataille de Méditerranée, Egypt, Lewant, Afrique du Nord, 1940—1944. Paris, 1949; *Chamberlain W. H.* America: partner in world rule. N. Y., 1945; *Champenois J.* Le peuple russe et la guerre. Paris, 1947; *Ciurea E.* Le traité de paix avec la Roumanie du 10 février 1947. Paris, 1954; *Clauss M. W.* Der Weg nach Yalta. Präsident Roosevelts Verantwortung. Heidelberg, 1952; *Cole G. D.* Europe, Russia and the future. London, 1942; *Cole G. D.* Great Britain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1942; *Commager H.* The 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Boston, 1945; *Culbertson E.* Total peace. What makes wars and how to organize peace. Garden City, 1943; *Dallin D. J.* The Big Three.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Russia. London, 1946; *Deane Y.* The Strange Alliance. N. Y., 1947; *Dulles J. F.* War or peace. N. Y., 1950; «L'effort de la France. Quelques aspects du role de la France dans la guerre». N. Y., 1945; «Entscheidungsschlachten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Frankfurt/Main, 1960; «Étude sur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de l'Europe depuis la guerre». Genève, 1953; *Faust F.* Das Potsdamer Abkommen und seine völkerrechtliche Bedeutung. Frankfurt/Main, 1959; *Feis H.*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Potsdam Conference. Princeton, 1960; *Feis H.*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thought. London, 1957; *Feis H.* Sinews of Peace. N. Y., 1944; *Harris M.*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 Y., 1946; «Hitler's Europe. Ed. by A. and V. Toynbee». London, 1954; *Holt E.* The World in the War

1939—1945. London, 1956; *Hoover H.* and *Gibson H.* The problems of lasting peace. N. Y., 1943; *Jaksch W.* Europas Weg nach Potsdam. Stuttgart, 1958; *Klafkowski A.* Umowa Poczdamska z dnia 2. VIII. 1945. Podstawy prawne likwidacji skutków wojny polsko-niemieckiej z lat 1939—1945. Warszawa, 1960; *Kokot J.* Logika Poczdamu. Katowice. 1961. *Lippman W.* United States. War Aims. Boston, 1945; *Lorwin L. L.* Postwar pla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N. Y., 1943; *Mackinder H. Y.*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 Y., 1944; *Miller D.* You can't do Business with Hitler. N. Y., 1942; *Newmann W. L.* Making the peace. 1941—1945. The diplomacy of the wartime conference. Washington, 1950; «Official histoir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1949—1960; *Pratt F.* The Battles, that change History. N. Y., 1956; *Ratchford B. U.* and *Rons W. D.* Berlin reparation assignments. Round one of the German peace settlement. London, 1947; *Rhode G.* and *Wagner W.* Quellen zur Entstehung der Oder—Neiße—Linie in den diplomatischen Verhandlungen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Stuttgart, 1956; *Robinson E.* The Roosevelt Leadership 1933—1945.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1955; «Sesja naukowa poświęcona wojnie wyzwoleńczej narodu polskiego 1939—1945 (4—6. X. 1958)». Materialy. Warszawa, 1961. *Shugg R.* and *Deweerd H.* World War II. Washington, 1947; *Spykman N. J.*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 Y., 1943; *Toynbee A.* and *Toynbee V.*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39—1945. The realignment of Europe. London, 1955; *Wittner F.* The Yalta betrayal. N. Y., 1953.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

«Вопрос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тран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лагеря». М., 1958; *Глунин В. 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Китае. М., 1960;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ьетнам. 1945—1960». М., 1960; «10 лет Герман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9;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59; «История Болгарии», т. II. М., 1955; «История Польши», т. III. М., 1958; «История Чехослова-

кии», т. III. М., 1960; «Корейская 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М., 1954; *Малков А. С.* Рабоче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1938—1958). Алма-Ата, 1958; *Мельников Д.* Борьба за еди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ую,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ую, миролюбивую Германию. М., 1951; «Миров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хозяйств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8;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60; «О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в странах Европ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д общ. ред. Ф. Т.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а. М., 1956; «Основы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М., 1959; «15 лет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ьетнам». М., 1960; «Пятнадцать лет народной Болгарии». М., 1959; «15 лет народной Польш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9; «15 лет свободной Венгр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60; «15 лет свободной Румын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9; «15 лет свободной Чехословаки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60; *Сергеев С. Д.*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ь стран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лагеря. Изд. 2,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М., 1959;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взаимопомощь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М., 1958.

* *
*

«Dezvoltarea economiei RPR pe drumul socialismului. 1948—1957». Bucureşti, 1958; *Karpinski A.* i *Rakowski M.* Gospodarka Polski na tle gospodarki swiata. Wyd. 2-ie. Warszawa, 1959; *Kubát V.* Mezinárodni vztahy v dobé utváreni svetové socialistické soustavy (1945—1949). Praha, 1957; «O budownictwie socializmu w Polsce». Warszawa, 1955.

苏联对外政策

Багинян К. А. Борьб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против агрессии. М., 1959; «Борьб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 разоружение. 1946—1960 годы». Под ред. В. А. Зорина. М., 1961;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СССР с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М., 1957;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СССР со странами Азии, Африки и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М., 1958; «Вопрос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д ред. Л. Ф. Ильичева. М., 1958; *Выгодский С.*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политика

мир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 1958; *Ефремов А.* Советско-австр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8; *Ивашин И. Ф.*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М., 1958;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Эпоха социализма (1917—1957 гг.). М., 195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945—1949». Под ред. Г. А. Деборина. М., 1958;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превращения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мировую систему (1945—1949)». М., 1956; «Против буржуазной фальсификации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М., 1960; *Протопопов 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СССР за мир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народов (1945—1957). М., 1957; *Хвостов В. М.* 40 лет борьбы за мир.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М., 1958.

* *
*

Beloff M. Soviet policy in the Far East. 1944—1951. London—New York, 1953; *Coates W. P.* and *Coates Z.* A history of Anglo-Soviet relations, vols. 1—2. London, 1958 (vol. 2. 1943—1950); *Cornell M.* Russia and the Western powers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1960; *Erfurt W.* Die sowjetruss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945—55. Esslinger, 1956; *Kennan G. F.* Soviet Foreign Policy 1917—1941. Princeton, 1960; *Kulski W. W.* Peaceful co-existence. An analysi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Chicago, 1959; *Laserson M. M.* Russia and the Western World: the plac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mity of nations. New York—London, 1945; *Meissner B.* Russland, die Westmächte und Deutschland. Die sowjet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1943—1953. Hamburg, 1954; *Rubinstein A.*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Soviet Union. N. Y., 1960; *Rostow W.* and *Levin A.* The Dynamics of Soviet Society. N. Y., 1953; «Soviet Power and Policy». N. Y., 1955; *Schuman F. L.* Russia since 1917. Four decades of Soviet politics. N. Y., 1957; *Vernadsky G.* A History of Russia. London, 1946.

人民民主国家对外政策

Вевюра Б. Польско-германская границ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Перев. с польского. М., 1959; *Гогюль Р.* и *Поль Г.* Одер—

Нейсе, граница мира. Перев. с нем. М., 1960; *Горошкова Г. Н.* Движение Немецкого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нгресса за единство Германии и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1947—1949). М., 1959; *Иванов Н. И.* 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М., 1959; «Из истории Германии нового и новейшего времен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8; *Ким Г.* Борьба коре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за мир,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единство и демократию. М., 1957; *Логунов В. Д.*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ой режим Дуная. М., 1958; *Мхитарян С. А.* Борьба вьетнам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за национальну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демократию и мир. 1945—1953. М., 1957;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в новейшее время». М., 1959; *Пигулевская Е. А.* Корейский народ в борьбе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и демократию. М., 1952; «Польша в борьбе за мир». Варшава, 1950; «Третья граждан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война в Китае». Перев. с кит. М., 1957; *Труонг Шин.* Августов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о Вьетнаме. М., 1954; *Чэнь Бо-да.* Чан Кай-ши — враг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Перев. с кит. М., 1950; *Шабшина Ф. И.* Очерк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Кореи. 1945—1953. М., 1958. *Шедивый Я.* и *Коржалкова К.*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в 1945—1960 гг. М., 1960.

* *
*

Black C. Challenge in Eastern Europe. N. Y., 1954; *Doernberg S.* und *Schulz P.* Deutschland 1945—1949. Kurzer Abriß d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Berlin, 1959; *Dona H.* Prietenia cu URSS garanţia independenţei RPR. Bucureşti, 1948; *Hertz F.* The Economic Problem of the Danubian States. London, 1947; *Kertesz S.* The Fate of East Central Europe. Hopes and Failur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otre Dame, 1956; *Kotyk V.* a *Sedivy* J. 15 let československo-sovětské smlouvy. Praha, 1958; *Mares S.* a *Slavik Zd.* Mirová smlouva s Nemeckem. Praha, 1959; *Modzelewski Z.* Polityka zagraniczna Polski. Warszawa, 1960; *Nemes D.* Magyarország felszabadulása. Magyarország fejlödése a felszabadulás után. Budapest, 1960; *Osmańczyk R.* Niemcy. 1945—50. Warszawa, 1951; «Polen, Deutschland und die Oder—Neisse Grenze». Berlin, 1959; «Proletárský internacionalismus základ jednoty a vzájemnych vztahu socialistických semi a mezinárodniho

hnuti». Praha, 1958; «Resources and Planning Eastern Europe». Indian University, 1958; *Rozek E.* Allied Wartime Diplomacy. A Pattern in Poland. N. Y., 1958; *Seydewitz M.* Deutschland zwischen Oder und Rhein. Ein Beitrag zur neuesten deutschen Geschichte. Berlin, 1958.

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新作用

Аваков Р. М.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Северной Африке. М., 1958; *Аварин В. Я.* Распад 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М., 1957; «Аграр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к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8; *Альберди П.* Кризис экономики Аргентины. М., 1950; *Антясов М. В.*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анамериканизм.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сущность доктрин пан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М., 1960; «Арабы в борьбе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араб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7; *Баскин В. С.* Нефтяные монополии на Ближнем и Среднем Востоке. М., 1957; *Башкиров А. В.* Экспансия английских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в Иране (1941—1953 гг.) М., 1954; «Бирманский Союз». М., 1958; *Вальков В. А.* Индонезия на пути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М., 1960; *Васильева В. Я.* Распад 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1958; «Госкапитализм в странах Восток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60; *Датт П.* Индия сегодня.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48; *Ермолаев В.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и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странах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8; *Жансон К.* и *Ф.* Алжир вне закона. Перев. с франц. М., 1957; *Иванов Н.* В борьбе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черк национально-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тунис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 1957;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за Африку и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родов».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3; *Иванов М. С.*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Ирана. М., 1952; *Лаврентьев А. К.*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Сирии и Иране. М., 1960; *Лаврищев А. А.* Индо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60; *Левковский А. И.* Некотор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Индии до 1947 г. М., 1956; *Луконин Ю. В.* Борьба народов Сирии и Ливана за вывод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войск (1945—1946 гг.). М., 1959; *Мартынов В. А.* Конго под гнетом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бельгийской колонии. М., 1959; *Мельман С. М.* Экономика Индии и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й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1961; *Мельман С. М.* Иностранный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в экономике Индии. М., 1959; «Народы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в борьбе проти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1;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Индия. 10 лет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1947—1957».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8; *Нихамин В. П.* Очерк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Индии. 1947—1957 гг. М., 1959;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Под ред. М. В. Данилевич и А. Ф. Шульговского. М., 1959; «Проблемы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и суверенных слаборазвитых стран Азии». М., 1960; «Против колониализм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60; «Разбуженный Восток». Записки советски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о визите Н. С. Хрущева в Индию, Бирму, Индонезию, Афганистан. I—II. М., 1960; *Ребрикова Н. В.* Очерк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Таиланда. 1918—1959. М., 1960; *Редько И. Б.* Непал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Антифеодальное и анти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1945—1956. М., 1960; *Рымалов В. В.*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экспансия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апмтала США под флагом «помощи». М., 1956; *Скоров Г. Е.*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в Западной Африке. М., 1956; *Тягуненко В. Л.* Война и колонии. Влияние распада колониальной системы на во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ую баз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1957; *Тягуненко В. Л.* Угнетенные народы рвут оковы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1955; *Тюльпанов С.*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 ее распад. М., 1958; *Фучс Х.*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е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трестов в Аргентину. Перев. с испан. М., 1959; *Чека Х. К.* Очерки о странах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Перев. с испан. М., 1960; *Шифрин Э. Л.* Экспанс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Мексике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2; «Южная Коре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1945—1958 гг.» М., 1959; *Ястребова И. П.* Южно-Африканский Союз. М., 1959.

* * *

Alba V. Le mouvement ouvrier en Amérique Latine. P., 1953; *Aqwani M. 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rab world (1945—52). Aligarh, 1955; *Battistini L. H.*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N. Y., 1955; *Benaget H.* L'Afrique française en danger. Paris, 1947; *Behrendt F.*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Latin American. Albuquerque, 1941; *Berkes Ros N.* and *Redi Moninger S.* The diplomacy of India. Ind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United Nations. Stanford, 1958; *Berrely J.* La Péninsule arabique. Terre Sainte de l'Islam, patris de l'Arabisme et empire du pétrole. Paris, 1958; *Bourguiba H.* La Tunisie et la France Vingt cinq ans de lutte pour une coopération libre. Paris, 1954; *Brecher M.* The Struggle for Kashmir. Toronto, 1953; *Cady J.* A History of Modern Burma. N. Y., 1958; *Campbell J. C.* Defence of the Middle East. Problems of American policy. N. Y., 1958; *Chattar S. S.* India and Anglo-Soviet relations. 1917—1947. London, 1959; *Deschamps H.* Les méthodes et les doctrines coloniales de la France. Paris, 1953; «East Asia. China, Korea, Japan. 1947—50». London, 1958;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 1945 to 1954». N. Y., 1955; *Farley M. S.*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dochina. N. Y., 1955; *Fifield R. H.* The diplomacy of Southeast Asia. 1945—1958. N. Y., 1958; Foreign capital in Latin America. N. Y., 1955; *Gdański M.* Bliski i Śródkowy Wschód 1945—1955. Rywalizacja mocarstw zachodnich. Warszawa, 1956; *Glubb J.* Britain and the Arabs. A study of fifty years. London, 1959; *Guernier E.* Le destin de l'Afrique du Nord, t. 1—2. Paris, 1950; *Hunther J.* The Riddle of MacArthur Japan. Korea and the Far East. N. Y., 1950; Haya de la Torre V. R. La defensa continental. Buenos Aires, 1946; *L'Huillier F.* Le Moyen-Orient contemporain (1945—1958). Paris, 1959; *Kahin G.* 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2; *Karunakar Gupta.* Indian foreign policy in defence of national interest. Calcutta, 1956; *Karunakaran K. P.* India in world affairs. August 1947—January 1950. A review of India's foreign relations from Independence Day to Republic Day. Calcutta, 1952; *Krishen R.* Kashmir and the conspiracy against peace. Bombay, 1951; *Kundra J. C.* Indi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4. A study of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 Bloc. Bombay, 1955; *Krouser J. C.* 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Decisive battle-ground of the cold war. N. Y., 1959; *Laure R.* Le

continent africain au milieu du siècle. Paris, 1952; *Lengyel E.* Egypt's role in world affairs. Washington, 1957; *Lewi W.* Free India in Asia. Minneapolis, 1953; *Massis H.* L'Occident et son destin. Paris, 1956; *Menon V. P.* The Story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Indian States. Bombay, 1956; *Meyer A. J.* Middle Eastern capitalism. Nine essays. Cambridge, 1959; «The Middle East. 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urvey». London—New York, 1951; *Millspaugh A. C.* Americans in Persia. Washington, 1946; *Moura A.* Capitais estrangeiros no Brasil. Saõ Paulo, 1959; *Shwadran B.* The Middle East, Oil and the Great Powers. N. Y., 1956; *Speiser E. 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ar East. Cambridge, 1950; *Strachey J.* The End of Empire. London, 1959; *Thakin Nu.* Burma under the Japanese. New York—London, 1954; *Tinker H.* The Union of Burma. A study of the first years of Independence. London—New York, 1957; *Trager F.* Burma's role in the United Nations. 1948—1955. N. Y., 1956; «White Paper on Indian States». New Delhi, 1950; «White Paper on Jammu and Kashmir». New Delhi, 1948; *Wolf Ch.* Foreign aid.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outhern Asia. Princeton, 1960.

資本主义危机的加深。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

Аллен Дж.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монополии и мир. Перев. с англ.М., 1948; *Бердж 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картели.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47; *Брукс М.* Нефть и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49; *Варга Е.* Основные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и политики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Изд. 2-е. М., 1957; *Васильков Н. П.*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 Итал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9; *Вишнев С. М.*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милитаризм и монополии. М., 1952;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7; *Гантман В.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строй Италии. М., 1961; *Датт П.* Кризис Британии и Брит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М., 1959; *Динкевич А. И.* Экономика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Японии (1945—1955). М., 1958; *Драгилев М. С.* Общий кризис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за 40 лет. М., 1957; *Еврейсков А. В.* Кризис валютной системы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М., 1955; *Ефимова А.* Рабочее и профсоюз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о Франц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

вой войны (1945—1953). М., 1954; *Жуков Е. М.* и др. Очерк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М., 1957; *Иноземцев Н. Н.*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5—1954). М., 1954; *Корольков В.* и *Медведев А.* Рабочее и профсоюз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СШ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4; *Крайнов П. А.* Рабочее 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Испан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49; *Кумар В.* 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заговор против Кашмира. М., 1955; *Ландберг Ф.* 60 семейств Америки.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48; *Лемин И. М.* 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1; *Линч Д.* Концентра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мощи в США.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48; *Меньшиков С.*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монополии на мировом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рынке. М., 1958; *Милейковский А. Г.* Канада и 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М., 1958; *Миллс Ф.* Властвующая элита.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9; *Михайлов Б. Я.* Конгресс профсоюзов США. 1935—1955. Из истори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 М., 1959; *Многолетова Н. И.* 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монополии СШ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9; *Молчанов Н. Н.* Саар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5—1957). М., 1958; *Оборина Г. А.* Положение и борьба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Итал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3; *Певзнер Я. Х.* Экономика Япон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5; *Перло В.* Империя финансовых магнатов.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8; *Петрушов А.* Аграр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транах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9; «Положение и борьба трудящихся в странах капитал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6; «Проблемы кризисов и обнищания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атериал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Берлине (1—4 октября 1958 г.). М., 1959;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К 80-летию Е. С. Варга. М., 1959;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ах (1959—1960 гг.)» М., 1961. «Реформизм, ревизионизм и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изма».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 1959; *Рысаков П.* Монополии США и страны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опы. М., 1956; *Санталов А. А.*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борьба за источники сырья. М., 1954; *Солодовников В.* Вывоз капитала. М., 1957;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военная идеология». Под общ. ред. В. А. Васильева и др. М., 1958; *Сущенко В. В.*

Англ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в Канаде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6; *Малыш А. И.* Трудящиеся Западной Германии под гнетом монополий (1945—1955) М., 1956; *Турчинс Я. Б.* Обострение неравномерности развит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итог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3; *Фитуни Л. А.* Торговые договоры и соглашени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М., 1958; *Фрей Л.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расчеты и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е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М., 1954; *Хмельницкая Е.*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Западной Германии. М., 1959; *Шапиро 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экспансия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а США в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е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6.

* *
*

Balfour M. Vier-Mächte-Kontrolle in Deutschland 1945—1946. Düsseldorf, 1959; *Ball M.* NATO and the European Union Movement. N. Y., 1959; *Bathurst M. E.* and *Simpson J. L.* Germany and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London, 1956; *Beveridge W.*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1945; *Catlin G.* The Atlantic Community. London, 1959; «Canada in world affairs», vol. 5. 1946—1949. Toronto, 1959; *Clough S. B.*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 Y., 1959; *Delmas C.* Le monde atlantique. Paris, 1948; *Diebold W.* Trade and pay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study in economic cooperation 1947—1951. N. Y., 1952; *Duroselle J. B.* 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1919 à nos jours. 2-me éd. Paris, 1957; *Grindrod M.* The rebuilding of Ital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1945—1955. London—New York, 1955; *Gunther J.* Inside USA. New York—London, 1947; *Harcourt R.* Dix ans d'efforts pour unir l'Europe. 1945—1955. Paris, 1955; *Harris S. E.* The 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 Cambridge (Mass.), 1948; *Hutchison K.* Rival Partners. America and Britain in the Postwar World. N. Y., 1946; *Jäckh E.* America und wir 1926—1951. Amerikanisch—deutsches Ideen—Bündniss. Stuttgart, 1951; *Kahn A.* Great Britain in the world economic. N. Y., 1946; *Levi M.* American-Australian relations. London, 1947; *Lider J.* NATO. Szkice o historii i doktrynie. Warszawa, 1961; *Mackay R. W.* Western Union in crisis. London, 1949; *Manzocchi B.* Lineamenti

di politica economica in Italia (1945—1959). Roma, 1960; *Mayer R.* Le Pacte de l'Atlantique. Paris, 1952; *Meyer F. V.* Britain, the sterling area, and Europe. Cambridge, 1952; *Proudfoot M.*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aribbean: a comparative study in methods of development. London, 1954; *Sannwald R.* and *Stohler J.* Economic Integration. Princeton, 1959; *Siedler H.* Österreichs Weg zur Souveränität. 1945—1959. Bonn—Wien, 1960; *Taviani P. E.* Solidarietá atlantica e comunitá europea. Firenze, 1957; *Wolff Ph.* Das Nachkriegsjahrzehnt. Politik und Wirtschaft 1946—1955. Zürich, 1956.

美国对外政策

Аварин В. Я. Борьба за Тихий океан. Агрессия США и Англии, и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и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ая борьба народов. М., 1952; *Андреев Г.* Экспорт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Из истории экспорта капитала США как оруд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экспансии. М., 1957; *Астафьев Г. В.* Интервенция США в Китае и ее поражение (1945—1949 гг.). М., 1958; *Беляев И. П.*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 в Саудовской Аравии. М., 1957; *Бухаров Б. И.*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1949—1953). М., 1958; *Вильямс В. Э.* Трагед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60; *Гонионский С. А.* Латинская Америка и США. 1939—1959.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 1960; *Далин С. А.* Воен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монополистический капитализм в США. М., 1961; *Гречев М. А.*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8; *Инюземцев Н. Н.*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эпоху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М., 1960; *Корионов В. Г.* Монополии и народ. М., 1958; *Маршон Д.* Базы и империя. Карта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экспансии.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48; *Мейер Г.* Последняя иллюз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план миров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5; «Очерки новой и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США».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1959—1960; *Потапова А. А.* Экспорт капитала — орудие экспансии США.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8;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е силы США в борьбе за мир и демократию». Сборник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д ред. Н. Васильева. М., 1953; *Родионов В. Н.*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с позиции силы»—угроза миру. М., 1958;

Рысаков П. Агрессив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ША в Северной Европе. М., 1952; *Тарасенко В. А.* Атомная проблема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США (1945—1949). Киев, 1958; *Уилер Д.*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ермании (1945—1950). Сокр. перев. с нем. М., 1960; *Яковлев Н. Н.*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США. 1917—1960. М., 1961.

* *
*

Agar H. The unquiet years: USA. 1945—1955. London, 1957; *Bailey T.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 Y., 1958; *Barron B.* Inside the State Department. N. Y., 1956; *Bemis S. F.*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 Y., 1959; *Berle A.* Tides of crisis. A primer of foreign relations. N. Y., 1957; *Binder P.* USA und wir. Wirtschaft. Aussenhandel. Politik. Stuttgart, 1956; *Burnham J.* Containment or liber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aim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N. Y., 1953; *Campbell J. C.*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affairs. 1945—1947.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F. Dulles. New York—London, 1947; *Davids J.* America and the world of our time. United States Diplomac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 Y., 1960; *Duggan L.* The Americas. The Search for Hemisphere Security. N. Y., 1949; *Finletter T. K.* Foreign Policy: the Next Phase. N. Y., 1958; *Frank F.* America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 Y., 1960; *Freeman R. E.* Postwa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N. Y., 1960; *Furniss E.* and *Snyder K.* An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 Y., 1955; *Goldman E. E.* The crucial decade. America. 1945—1955. N. Y., 1956; *Graber D. A.* Crisis Diplomacy. A History of U. S. Intervention Politics and Practices. Washington, 1959; *Guerrant E. A.* Modern American Diplomacy. Albuquerque, 1954; *Hyde L. 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N. Y., 1960; *Kennan G. F.* American diplomacy. 1900—1950. Chicago, 1951; *Kennan G. F.*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1954; *Lengyel E.* America's role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London, 1946; *Lippman W.*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1952; *McKay D. C.* 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 Cambridge, 1951; *Morgenthau H.* In defenc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cri-

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 Y., 1952; *Perkins D.* The American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ass), 1954; *Pratt I.*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N. Y., 1955; *Reitzel W.* and oth.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55. W., 1956; *Rostow W. W.*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rena. An Essay in Recent History. N. Y., 1960; *Spielman W. C.*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A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N. Y., 1959; *Snyder K. C.* and *Furniss E. S.* J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ormulation. Principles and Programs. N. Y., 1954; *Stone J. K.* The Truman Era. N. Y., 1953; *Sulzberger C.* What's Wrong with U. S. Foreign Policy. N. Y., 1959; *Taft R.* 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ns. N. Y., 1951; *Thompson K. W.* Political Realism and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An American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1960; «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1949.

英国对外政策

Волгин П. Англия и Западная Германия.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в вопросе перевооружения Западной Германии (1949—1955). М., 1957; *Лемин И. М.* Обострение кризиса Британ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1; *Милейковский А. Г.*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М., 1947; *Трухановский В. Г.*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М., 1957; *Трухановский В. Г.*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Англии. М., 1958;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олитика Англии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М., 1958.

* *
*

Amery J.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nd Western Europe. London, 1952; *Branston U.* Some reflection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London, 1959; «Britain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New York, 1956; «British interests in the Mediterranean and Middle East». London, 1958; *Bullard R. W.* Britain and the Middle East. L., 1951; *Chastenet J.* Winston Churchill et l'Angleterre du XX-e siècle. Paris, 1956; *Fitzsimons M. A.*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 1945—1951. London, 1953; *Goodwin G. L.* Britai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London, 1957; *Grigg 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London, 1946; *Heiser H. J.* British policy with regard to the unification efforts o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London, 1959; *Mansergh N.* The Commonwealth and the nations. N. Y., 1948; *Olver A. S. B.* Outline of British policy in East and South Asia. 1945—May 1950. London, 1950; *Roberts H. L.* and *Wilson P. A.*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 Y., 1953; *Tonnelé J.* L'Angleterre en Méditerranée. Paris, 1952; *Webster Ch.* United Kingdom Policy. N. Y., 1950; *Windrich E.* British labour's foreign policy. London, 1952; *Worswick G. D.* and *Ady P. H.* British Economy. 1945—1950. London, 1951.

法国对外政策

Верт А. Франция. 1940—1955. Сокр.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9; *Молчанов Н. Н.*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Франции. 1944—1954 гг. М., 1959; *Потемкин Ю.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олитика Франции в странах Магриба. 1945—1955 гг. М., 1960.

* * *

Cady J. The roots of French imperialism in Eastern Asia. Ithaca, 1954; *Diraks-Dilly J.* La Sarre et son destin. Paris, 1956; *Dumaine J.* Quai d'Orsay (1945—1951). Paris, 1955; *Fauvet J.* La IV-e République. Paris, 1959; «La France en Indochine» (Les données du problème). Paris, 1950; *Freymond J.* Le conflit sarrois. 1945—1955. Brussels, 1959; *Gavin C.* Liberated France. London, 1955; *Halleguen J.* Aux quatre vents du gaullisme. 1940—1952. Paris, 1953; *Kowalski A.* Francja w okowach planu Marshalla. Warszawa, 1950; *Laroche C.* La diplomatie française. Paris, 1946; *Lacour-Gayet R.* La France au XX-e siècle. Paris, 1954; *Lattre A.* Les finances extérieures de la France (1945—1958). Paris, 1959; «Modern France. Problems of the Third and Fourth Republics». Princeton, 1951; *Morin E.* Allemagne notre souci. Paris, 1947; *Mus P.* Viet-Nam. Sociologie d'une guerre. Paris, 1952; *Naegelen M.-E.* Grandeur et solitude de la France. Paris, 1956; *Pickles D.* French politics. The first years of the Fourth Republic. London—New York, 1953; *Schmidt W. E.* Zwischenrufe von der Seine. Die Entwicklung der Europa-Politik und das deutsch-französische Ver-

hältnis. Stuttgart, 1958; *Troux A.*, *Girand A.*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1945. Paris, 1948; *Werth A.* France 1940—1955. With a foreword by G. D. Cole. London, 1956.

战后世界和平安排問題及在各种基本問題上两种方針的斗爭

Аллен Дж.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ия и общество.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М., 1950; *Клод А.*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Перев. с франц. М., 1950; *Коровин Е. А.*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мира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М., 1945; *Коровин Е. А.*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 1959; *Крылов С. Б.* История со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Разработка текста Устава ООН (1944—1945 гг.). М., 1960; *Лаговский А.* Стратегия и экономика. М., 1957; *Морозов Г. 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К 15-летию Устава ООН. Вступит. статья А. В. Топчиева. М., 1960.

* *
*

Acheson D. Power and diplomacy. Harvard, 1958; *Allemann F. K.* Bonn ist nicht Weimar. Köln, 1956; «Alliance policy in the cold war. Ed. by Wolfers A.». London, 1959; *Arnold G.* The pattern of world conflict. London, 1956; *Aron R.* Atomic Weapons and Global Diplomacy. London, 1958; *Aron 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 Paris, 1959; *Bailey T. A.* America faces Russia. N. Y., 1950; *Balfour M.* and *Mair J.* Four-Power Control in Germany and Austria 1945—1946. Oxford, 1956; *Baltus R.* De la vieille à la nouvelle Europe. Paris, 1953; *Beloff M.* Foreign Policy and the Democratic Process. Baltimore, 1955; *Black C.* and *Helmreich E.* Twentieth Century Europe. N. Y., 1959; *Blackett P. M.* Atomic Weapons and East—West Relations. Cambridge, 1956, *Bryant A.* Triumph in the West. London, 1959; *Burchett W.* The cold war in Germany. Melbourne, 1950; *Burnham J.*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London, 1947; *Calvocoressi 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7—1948. London, 1952; *Céré R.* Entre la guerre et la paix (1944—1949). Paris, 1949; *Céré R.* La technique de la paix et l'Europe. Paris, 1954; *Conze W.* Deutschland und Europe. Düsseldorf, 1951; *Cornides W.* Die Westmächte und Deutschland. Geschichte der jungsten Ver-

gangenheit 1945—1955. Tübingen, 1957; *Davidson E.* The death and life of Germany. An account of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N. Y., 1959; *Dean V. M.*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N. Y., 1948; *Dulles J. F.* War or Peace. N. Y., 1957; *Fiedler. R.* Würfelspiel um Deutschland. 1944—1956. Eine kritische Untersuchung der Zerstückelungs-und Wiedervereinigungspolitik. Düsseldorf, 1957; *Goodrich L. M.* The United Nations. N. Y., 1959; *Goodwin G. L.* Britain and the United Nations. London, 1957; *Grewe W.* Deutsche Außenpolitik der Nachkriegszeit. Stuttgart, 1960; *Gruber K.* Zwischen Befreiung und Freiheit. Der Sonderfall Österreich. Wien, 1953; *Herz J. H.*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 Y., 1959; *Hölzle E.* Rußland und Amerika. Aufbruch und Begegnung zweier Weltmächte. München, 1953; *Ingram K.*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London, 1955; *Jones G. J.* Challenge to the Peacemakers. London, 1951; *Knorr K.* The War Potential of Nations. Princeton, 1956; *Langenhove F.* La crise du système securité collective des Nations Unies. 1946—1957. Bruxelles, 1958; *Lerche Ch. O.*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 Y., 1956; *Lippman W.* 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 S. foreign policy. N. Y., 1947; *Martel G.* East versus West. London, 1952; *Marzani C.* We can be friends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N. Y., 1952; *McInnis E.* The Atlantic triangle and the cold war. Toronto, 1959; *McNeil W. H.*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1946. London, 1953; *Millis W., Murray J.* and other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Free Society. N. Y., 1958; *Morgenthau H.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 Y., 1949; *Peyret H.* Le réarmement et la paix. Paris, 1951; *Price H. B.* The Marshall plan and its meaning. N. Y., 1955; *Pritt D. N.*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the cold war. N. Y., 1948; *Rauschning H.* Deutschland zwischen West und Ost. Berlin—Hamburg, 1950; *Robichon J.* et *Ziegeimeyer J.* L'affaire de Berlin 1945—1959. Paris, 1959; *Roberts H. L.* Russia and America. Dangers and prospects. N. Y., 1956; *Roth P.* Deutschland und Polen. München, 1958; *Rothstein A.* Peaceful coexistence. London, 1955; *Schütz W.* Wir wollen überleben. Außenpolitik am Atomzeitalter. Stuttgart, 1956; *Seldes G.*

The people don't know. The American press and the cold war. N. Y., 1949; *Seton-Watson H.* Neither war nor peace. 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1960; *Strausz-Hupé R.* and *Possony 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age of conflict between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2-nd ed. New York—Toronto—London, 1954; *Strausz-Hupé R.* The Balance of Tomorrow. A Reappraisal of Basic Trends in World Politics. Philadelphia, 1945; *Tönnies N.* Zwischen Elbe und Flut. Deutschlands entscheidende Jahre seit 1945. Hamburg, 1956; *Toynbee A.* The World and the West. London, 1953; *Toynbee A.*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1960; «Two worlds in focus: studies of the cold war». London, 1950; *Voll H.* Probleme der internationale Abrüstung. Eine Darstellung der Bemühungen des Vereinigten Nationen 1945—1955. Frankfurt/Main, 1956; *Warburg J. P.* Germany: key to peace. Cambridge, 1953; «Weltgeschehnisse der Nachkriegszeit 1945 bis 1957». Würzburg, 1957; *Wenger P.* Wer gewinnt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59; *Wiart C. E.* de. Chronique de la guerre froide. 1947—1949. Bruxelles, 1950; *Wilcox, C. March.* Proposals for Changes in the United Nations. Washington, 1955; *Wiskemann E.* Germany's eastern neighbours.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Oder—Neisse line and the Czech frontier regions. London—New York, 1956; *Ziliakus K.* Britain, USSR and world peace. London, 1946; *Zink H.* The United States in Germany. 1944—1945. Toronto—London—New York, 1957.

手册、統計資料、书目提要

«Балканские страны». Под ред. Ф. Н. Петрова. М., 1946;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за 1945—1950 гг.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довоенным периодом».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М., 1952;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в трех томах. Т. I. М., 1960; т. 2. М., 1961;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за сорок лет в цифрах». Стат. сборник. М., 1957;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олитик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1958—1962.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справочник. 1945—1960 гг.). Сост. В. Н. Егоров. М., 1961.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правочник. М., 1960; «Народ-

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Болгари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в двух томах. М., 1954, 1958. Сост. Д. Д. Иванов;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Стат. сборник. М., 1956; «Основ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развития СССР» (Краткий стат. справочник). М., 1956; *Попов А. А.*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 политика мира. Указатель литературы. Л., 1956;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важнейших товаров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ах за 1929, 1933, 1937—1950 гг.». Стат. сборник. М., 1951;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1917—1957. М., 1959;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М., 1956; «Страны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М., 1949; «Страны социализма и капитализма в цифрах»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57; «Экономика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тат. сборник. М., 1959.

* * *

«The American annual. 1946—1950. An encyclopedia of the events of 1945—1949». New York — Chicago — Washington, 1946—1950; «L'année politique». Paris, 1945—1949; «Annual Abstract of Statistics. 1935—1946». London, 1948; «Annuaire diplomatique». Genève, 1954; «Annuaire des organisations internationales. 1948—1949». Bruxelles, 1949; «Annuaire du commerce international». Paris, 1948—1949; «The annual register of world events. Reviews of the years 1945—1949». London, 1950; «Anuário estadistico do Brasil». Rio de Janeiro, 1948, 1950; «Anuário estadistico de la República Argentina», t. 1—3. 1949—1950. Buenos Aires, 1954;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1947—1949». London, 1948—1950; «British political yearbook 1947». London, 1947;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irectory of the Middle East». N. Y., 1947; *Conover H. F.* A guide to bibliographic tools for research in foreign affairs. Washington, 1956; «Current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N. Y., 1948; *Hyamson A. M.* A d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1946; «The International Yearbook and Statesmen's Who's Who». London, 1947—1949; «International World Who's Who». N. Y., 1947;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45—1949; *Miller K. W.* Die amerikanische Deutschlandpolitik.

Amtliche amerikanische Publikationen über Deutschland. 1945—1955. Frankfurt/Main, 1956; «New Zealand Official Yearbook. 1946». Wellington, 1948; «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world. 1949». N. Y., 1949; *Roberts H. L.* Foreign affairs bibliography.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list of book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42—1952. N. Y., 1955;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nual report. 1949—1950». London, 1950; «Series symbols for document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London, 1949; *Woolbert R. G.* Foreign affairs bibliography. A selected and annotated list of book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32—1942. New York—London, 1945; «The year book of world affairs». London, 1947—1949.

期 刊、报 紙

«Правда»
«Известия»
«Труд»

«Большевик» (до 1953 г.)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За рубежом»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Коммунис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ир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мир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 (1941—1947 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Новое время»
«Проблемы 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 Прага
«За прочный мир, за народную демократию». (1947—1959)
«Работническо дело». София

«Daily worker». London
«Humanité». Paris
«Neues Deutschland». Berlin
«Rudé právo». Praha
«Scînteia». Bucureşti
«Szabad nép». Budapest. (С 1957 г.— «Népszabadság»)
«Trybuna Ludu». Warszawa
«Unitá». Roma
«Volksstimme». Wien

«Ново време». София
«Cahiers du communisme». Paris
«Einheit». Berlin
«Lupta de clasă». Bucureşti
«Marxism today». London
«New age». New Delhi
«Nowe drogi». Warszawa
«Nova mysl». Praha

«Nueva era». Buenos Aires
«Rinascita». Roma
«Weg und Ziel». Wien

«Figaro». Paris
«Manchester guardian». Manchester
«Monde». Paris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New York
«New York Times». New York
«Times». London
«Welt». Hamburg

«African world». London
«Afrique et le monde». Bruxelles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Lancast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Washington
«Aussenhandel». Berlin
«Aussenpolitik». Stuttgart
«Business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New York
«Business week». New York
«Cahiers internationaux». Paris
«Chroniques étrangères». Paris
«Contemporary review». London
«Current history». Philadelphia
«Démocratie nouvelle». Paris
«Deutsche Aussenpolitik». Berlin
«Deutsches Wirtschaftsinstitut Bericht». Berlin
«Economie et politique». Paris
«Economist». London
«Esteri». Roma
«Etudes économiques». Paris
«Esprit». paris
«Europa-Archiv». Bonn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Foreign commerce weekly». Washington
«Fortune». New York
«France nouvelle». Paris
«Inter-American economic affairs».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London
«Journal officiel». Par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New York
«Mezinárodní politika». Praha
«Middle Eastern affairs». New York
«Mondo economico». Roma
«Nation». New York
«New republic». Washington
«New statesman». London
«Nouvelle revue d'économie contemporaine». Paris
«Osteuropa». Stuttgart
«Pensée». Paris
«Political affairs». New York
«Political quarterly». London
«Politica ed economia». Milano
«Politique étrangère». Paris
«Problèmes économiques». Paris
«Revue de défence national». Paris

«Revue socialiste». Paris
«Rivista storica italiana». Napoli
«Spectator». London
«Spiegel». Hamburg
«Sprawy międzynarodowe». Warszawa
«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Washington
«West Africa». London
«Wirtschaft». Berlin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Berlin
«Zukunft». Wien

名目索引

二 画

几内亚——331 頁。

三 画

万隆会議(1955)——序8、序20頁。

三国首脑波茨坦(柏林)会議(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波茨坦决議——4、131—132、180—181、185、206、424—425、427、451、475—476、480、511、529、531—532、534—535、536—538、540—545、548—551、553、563、567—569、572、574—575、582、584、586、589—590、642、702、719、788、790、793—797頁。

也門——285、289—290、623 頁。

凡尔賽会議(1919);凡尔賽和平——序25、592、596、604、797頁。

土耳其——10、109、289—290、294、297—301、305—306、310—311、314—315、318、393、428—439、465、622、678、729 頁。

广島,长崎,原子轰炸——39、522、641、772、800、816 頁。

大西洋宪章——15、32、106、530頁。

四 画

中立——693 頁。

中立主义,中立主义政策——序20、序26、245—246、258—259、288、637—638、670 頁。

中央条約組織——693、704、720頁。

中国——101、114、187—208、220、248—249、373、567、579、585、623 頁;

～与苏联——128—129、134、167、192、197—120 頁;

～与美国——202—204、381、434—435、438、570、583、729 頁;

～与联合国——207、619—620頁;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35、38、79、81、87—89、128—129 頁;

～共产党——87—88、187—188、189—191、193—195、197—199、207—208 頁;

国内战爭——189—193、196—199 頁;

苏中条約——見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約(1950年2月14日)条;

美国对中国的干涉——190—

191、193—197、198、203—204、434 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序 26、188、198—202、244、619—620 頁。
丹麦——9、43、92—93、97、134、204、370、393、602、622、663、678、703、713—716、726、729頁。
厄瓜多尔——336、338—339、345、622 頁。
巴西——102、334、337、343、345—346、592、622 頁。
巴拉圭——336—337、346—347、622 頁。
巴拿馬——90、622 頁。
巴林群島——289 頁。
巴勒斯坦——249、307—313、458、465、628—629 頁。
巴基斯坦——204、249、254—257、260—268、285、287、374、465、622 頁。
"巴魯克計划"——421—422、650—655、816 頁。
巴黎和会(1946)——167—168、180—181、185、427、478、508、510—514、592—594、598—605、817 頁。
巴黎外长会議(1947)——見苏法英巴黎外长会議条。
日本——序 29、74、152、357—358、370—372 頁；
～共产党——573、583—584 頁；
～与苏联——131—132、568—569、571、573—574、577—580、582—585 頁；
～与美国——132、521、569—576、578—579、581—582、586 頁；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7—8、21—22、38、47、88—89、208—210、220、252—253、269、275—278、567 頁；
～的阶級斗爭——97—98、582—583 頁；
对日媾和問題——131—132、521、577—578、584—585 頁。
比利时——9—10、29、43、79、81、91—93、94—98、108、280、322—323、326、370、393、455、491、602、622、678、702、715—716、726—729 頁。
开罗宣言、开罗会議(1943)——57、131、206、221、568、575 頁。

五 画

世界工会联合会——92—94 頁。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93、151 頁。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序 7—8、序 29、42、48、76、89、92、116—117、128、138、140、172—173、243—246、315、373、435、734—735、808—809 頁；
～的形成——序 1、序 19、115—117、187、237、242 頁；
～的經济发展——241—242 頁；
～与苏联的作用——115—116、125—130、160—163、242—243 頁；

～与和平和战争問題——243—244頁并見和平与战爭問題条；
～与新独立的国家——序8、序19—20、141—142、149、246、248、251頁；
～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序7、124—125、235—236頁；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序3、序7—8、116、149、246、523頁；
社会主义国际主义——5、138—140、236—238、240—241、251頁。
世界資本主义体系——234、356—357、402、690—691頁；
～中的失业現象——96—97、120頁；
～中的罢工运动——97—99頁；
～內的阶級斗爭——見各国；
～內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見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条；
～与民族解放运动——見殖民体系的瓦解条；
～与殖民体系的瓦解——見殖民体系的瓦解条；
～与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序21—22、50—51、59—60、63—68、386—395、405—406頁；
～发展不平衡規律——57—59、72—74、360—362、369—373、377—379、400—401、507、684、720頁；
～的总危机及其发展阶段——序2、3—5、42、75、150、355—356、358—359、381—382、402、691、739頁。
世界保卫和平运动；世界和平理事会——134、151、625頁。
以色列——206、289、313—316、393、622—623頁。
加納——331頁。
加拿大——49—50、55、58—59、73—74、98、103、344、371—372、375、389、513、574、592、602、622、633、646—647、695—697、715、726頁。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見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条。
北大西洋侵略集团——序21—22、序27、290、392—394、418—419、445、457、518—519、540、665—668、684—685、687、693、710、722—729、782—783、818—821、824頁；
～与西德——序29、562、695、718—719、725頁；
～与法国——485、490—495、694、715、722—725頁；
～与英国——459—462、694、711—713、715、724—725頁；
～与美国——445、694、712—713、715—716、721—724頁；
～的軍事开支——685—686、726頁；
～的性质与目的——388、665—667、715、719—720頁；
北大西洋公約的內容——717—719、722—723頁；
各国人民反对～的斗爭——716、

722 頁；
～对苏联与社会主义陣营国家的政策——445、710、719、722頁。
卢森堡——9、92、95、370、393、602、622、678、703—704、715、726、729 頁。
卢旺达—布隆迪——321—323 頁。
卡塔尔——289 頁。
古巴——序 29、92、103、337、348、592、622 頁。
外約旦——307—310、313、457—458、465 頁。
外长会議——318、511、532、584—586、589—590、593—594、603、606 頁；
第一届会議(1945 年 9 月 11 日至 10月2日于伦敦)——175、512、542、574、589—591 頁；
第二届会議(1946 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16 日，6 月 15 日至 7 月12 日于巴黎)——426、511、542—543、589、606 頁；
第三届会議(1946 年 11 月 4 日至 12月 11 日于紐約)——594 頁；
第四届会議(1947 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24 日于莫斯科)——197、429、482—484、544—547 頁；
第五届会議 (1947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5 日于伦敦)——483—484、547—548 頁；
第六届会議(1949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20 日于巴黎) ——557—559、585 頁。
尼泊尔——251 頁。
尼日利亚——104、230—232 頁。
尼加拉瓜——90、336、622 頁。
布拉格会議(1948)——185 頁。
布魯塞尔公約 (条約，1948)——見西方联盟条。
旧金山会議 (1945) ——179、340、615—616、619、802 頁。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約組織——693、704、720 頁。

六 画

亚丁——289—290 頁。
亚洲国家协商会議 (1949) ——284—286 頁。
伊朗——90、92、109、285、289—290、294、296—297、299—306、310、315、439、592、622、626、663、729 頁。
伊拉克——10、285、289—290、293、304、310、592、622 頁。
共产国际——11、76—77 頁。
共产党和工人党——11、77—78、80—83、89—92、157、294 頁；并見各国。
共产党代表情报会議 (1947 年 9 月底于波兰)——167 頁。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27、167—168 頁。
关税和貿易总协定 (1947) ——391—393 頁。
冰島——92、393、622、687、713—715、726 頁。
刚果——55、57、104、323、326—327、333 頁。

匈牙利——序 29、31、37、114、125—127、155—157、159、163—167、178—179、181、185—186、201、242、586—588、601、603、628、808—809 頁。
华沙会議(1948)——167、186、552—554 頁。
印度——102—103、111、204—205、249、252—254、280、285、287、374、447、465、574、592、622頁;
～共产党——253、258 頁;
～与苏联——257、264 頁;
～与英国——104、110、253—268、375、459 頁;
～与美国——54、258—259、266、434 頁;
～与巴基斯坦——254—256、259、261—266 頁;
～与克什米尔問題——260—268、627 頁;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04—107、110、253、602 頁;
～对外政策,根本原則——257—259 頁;
～联邦——256 頁。
印度尼西亚——98、130、204、249、252、287、373、438—439、576、623、626 頁;
～共产党——91、280—282、287 頁;
～爭取独立的斗爭——38、89、109、256—287、457 頁;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276—278 頁;
西伊里安——286—287 頁。
危地馬拉——336、248—249、622 頁。
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議(1957)——序 24、序28 頁。
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莫斯科会議(1960)——序 24、序 28、76、403、672—673 頁。
圭亚那——103 頁。
多哥——321—322 頁。
多瑙河会議(1948)——167、180頁。
多米尼加共和国——90、336、622 頁。
老撾——89、209、211、215、218—219 頁。
西德——序 29、74、92、185、358、371—373、393、485、556—557、561、565、678、684、686 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131、186、557、559—561、702、718 頁。
西班牙——81、184、316、393、456、703 頁。
西方联盟——278、285、444、457、459、480、490—491、518、540、700—709、711—713、718—719、723—726 頁;
布魯塞尔条約(1948)——444、462、518、700—701、704—708、717—719、819、824 頁。
西欧联盟——684、720 頁。
西南非洲——321—323 頁。
西方大国华盛頓会議(1949)——557、560 頁。

七 画

"冷战"——132、354、365、422—430、432、464、536、544、642、666、694、729、736、759、768—769、785、792、795、798—801、807、813—830 頁；

"心理战"——433、732—733、747—760 頁。

利比亚——317—320、608、628 頁。

利比里亚——622 頁。

希腊——79、81—87、92、370、389、428、455、465、592、602—603、622、628、678、729 頁。

"杜魯門主义"——69、298—299、347、364、380、413、418、427—429、439、459、539、672、674、729、800、817 頁。

泛美主义；美洲国家組織——340—341、350、354、437、698—700、818 頁；

泛美条約（1947）——344、347、350、698—700、704、717、818 頁；

查普德庇克公約——339、698頁；

泛美会議：

墨西哥会議（1945）——338—340、698 頁；

里約热內卢会議（1947）——343—344、346、699 頁；

波哥大会議（1948）——347—351、699 頁；

加拉加斯会議（1954）——344 頁。

沙特阿拉伯——109、285、289—290、296—297、439、622 頁。

芬兰——31、92、98、206、246、351、370、586—588、591—592、603—604、693 頁。

苏丹——107、289、539 頁。

苏联

～与日本——131—132、568—569、571、573—576、577—579、582—585 頁；

～与伊朗——134、301—306、663 頁；

～与印度——130、257、638 頁；

～与西德——560—562 頁；

～与芬兰——134—135、588—589、600、605—606 頁；

～与法国——470—475、478、482—484、489、492、495、589—591 頁；

～与波兰——125—127、162—165、167—170、177—181 頁；

～与英国——134、302、462—463、529、588—589 頁；

～与非洲——318—320、330 頁；

～与挪威——663、715 頁；

～与美国——39—40、118—119、121、129、135、223—227、408—409、422—434、529、567、574—575、577—578、583—584、590、600、801 頁；

～与埃及——293 頁；

～与裁軍問題——133、522、640、643—650、654、657—663 頁；

～与緬甸——130 頁；

～与土耳其——298—301、306頁；
～与伊拉克——293頁；
～与匈牙利——125—127、165—168、170—171、179、588—589、605—607頁；
～与叙利亚——130、293、307頁；
～与联合国——130、133、181、312、319—323、610—612、618、622—632、634—635、657—662頁；
～与意大利——134、500、503、508、511—513、589—590、603—607、714頁；
～与黎巴嫩——130、293、307頁；
～与巴基斯坦——130頁；
～与西方联盟——706頁；
～与和平共处——見和平共处条；
～与拉丁美洲——336、346頁；
～与罗馬尼亚——125—127、165—168、170—171、179、242—243、589、605—607頁；
～与保加利亚——127、165—168、170—171、176、179、589、605—607、663頁；
～与南斯拉夫——128、134、162—165、168、598頁；
～与德国問題——見德国問題条；
～与中近东国家——315—316頁；
～与印度尼西亚——130、280、285、638頁；
～与阿尔巴尼亚——165、167頁；
～与战后和平安排——4、125—126、131、179—181、520—522、592—594、597—598、600—606頁；
～与捷克斯洛伐克——37、127、134、162—164、167—170、178頁；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28—129、134、167、192、197—220、567、638頁；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2、7—8、14—20、23—24、26、28—34、37—38、63、82、107、114、117—118、158、293、531、566—567、769—774、793頁；
～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116、124—129、161—162、241—243頁；
～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457、663、716、719頁；
～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566頁；
～与越南(越南民主共和国)——220頁；
～与朝鮮（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29、134、221—227、229—230、629、663頁；
～共产党——見苏联共产党条；
～的經济——25—26、119—123、148頁；
～的对外貿易——134—135頁；
～的对外政策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序7—8、5、116、131、

136、138、236、293、409、645、743—744 頁；
～为和平而斗爭——152—154、624—625 頁；
～在原子能方面的成就——116、123—124、655—656 頁；
～对新兴民族国家的政策——130、140—141 頁；
～对爭取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130、140—142、318—319、330 頁；
～对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經济援助——126、169—171、236、241—242 頁；
苏英条約——見英苏同盟与互助条約条；
苏美条約——見苏美协定条；
和平共处——見和平共处条；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見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条。
苏共綱領——序 2、序 6、序 16、序 24、77、122、187、201、645、692、732、760 頁；
～关于和平共处——序 15、137、154 頁；
～关于裁軍問題——645 頁；
～关于美帝国主义——396、399、401 頁；
～关于民族解放革命——100、110 頁；
～关于苏联卫国战爭——2、25、35 頁；
～关于意識形态斗爭——731、735、760 頁；
～关于新的主权国家——249—251、359 頁；
～关于資本主义总危机——序21—22、序29、59、75、355、363頁；
～关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117、161、239 頁。
苏联共产党——23、80、167—168、207—208 頁；
苏共綱領——見苏共綱領条；
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序 9、序 24、序 27—28、136—137、460、668 頁；
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序 14、序 28 頁；
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序2、序 6、序 14、序 24、序 30、136—137、237 頁。
苏英条約(1942)——見英苏同盟与互助条約条。
苏美协定 (1942 年 6 月 11 日)——30 頁。
苏美經济协定(1945)——433 頁。
苏联伟大卫国战爭——見苏联条。
苏法同盟互助条約(1944)——132、473—474、480、491、530、705、719 頁。
苏法英巴黎外长会議 (1947 年 6 月 27日至 7 月 2 日)——487、677 頁。
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約(1950 年 11 月 14 日)——167、200—201、243 頁。
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約 (1948 年 4 月 6 日)——132—133 頁。

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議(1943)——31、500、503、526、589、612—613、640 頁。
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議(1945)——128—129、130、191、194、222—223、425、542、574—575、589—591、647 頁。
进出口銀行——345 頁。
阿曼——286 頁。
阿根廷——98、102、334、343、345、348—352、622、633 頁。
阿富汗——10、204、259、285、289—290、623 頁。
阿尔巴尼亚——81—85、114、127、156、159、165、167、172、181、185、201、592、597、602—603、626 頁。
阿尔及利亚——84、314、327、329—332、493 頁。
阿拉伯国家联盟——309—310 頁。

八 画

和約(1947)——131、166、180—181、426—427、521、586—588、590—591、594—597、600、604、607、609 頁;
对芬兰～——589—590、608—609頁;
对匈牙利～——125、165、179、589—591、607—610、808 頁;
对意大利～——318—319、511—514、589、594—596、603、608—610、714 頁;
对罗馬尼亚～——125、166、179、590—591、607—610、808 頁;
对保加利亚～——125、166、179、590—591、607—610、808 頁。
和平共处——序8—9、32—33、137、143—145、149、151—153、161、184、240、243—244、416—417、522、524、531、609—610、614、619、630、736、811 頁;
列宁論～——116、142—148 頁;
～与苏联——116、152—154、462、624—625、627 頁;
～与意識形态的斗爭——137、154、730—732、734—736、746、748—750 頁;
阶級斗爭与～——序15—16、137、731、823 頁;
两个体系的竞賽——序14—17、120—124、147、153、731 頁;
資产阶級历史文献論～——144—145、764—765、788—789、811—815、821—822 頁。
和平与战爭問題——序1—3、序8、151、740—742 頁;
裁軍——見裁軍問題条;
～与革命——序15、76—78、146、644—645、741—742 頁;
～与社会主义——序6、136、146、644—645 頁;
～与帝国主义——序9—10、784 頁;
和平共处——見和平共处条及苏联条;
軍国主义的辯证法——序10、739—741 頁;

战争与和平力量的对比——245頁；
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序3、序14、序18、137、244、645、743、760頁。
国际联盟——256、306、321、522、611、615—616、620—621、660頁。
国际合作社联盟——93頁。
国际复兴开发銀行——71、182、390、398、486頁。
国际貨币基金組織——70—71、389—390、398頁。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93、151頁。
国际关系的科学定义——序23—24、734—735頁；
新型的国际关系——5、138—139、141、173、233、235、240—241、244頁；
人民群众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序4、736—739、746頁。
坦噶尼喀——54、107、321—322頁。
委內瑞拉——337、345、350—352頁。
"实力地位政策"——序6、序11、序29、357、399、414—422、436、463、465、664、667、732—733、764—765、768、777—779、783—784、811—817、828—829頁。
"欧洲委員会"——393、491、518頁。
欧洲支付同盟——392頁。
"欧洲煤鋼联营"——393、684頁。
欧洲經济合作組織——393、665、687頁。
法国
苏法条約——見1944年苏法同盟与互助条約条；
～与苏联——470—475、478、482—484、489—490、491—492、495、589—591頁；
～与波兰——183、476、489頁；
～与英国——307—308、470、474—475、478—483、490—491、530、589—590、700—701頁；
～与美国——72、398、475、483、482—488、530、589—591、670—671、678—679、707、729、755頁；
～与联合国——490、615、622頁；
～与印度支那——209、212—214、217—220、252、330、493頁；
～与德国問題——見德国問題条；
～与"馬歇尔計划"——444、486—488、678、681—682頁；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8—9、29、43、79、108、208、470、602頁；
～与越南民主共和国——215—220頁；
～共产党——81—85、91—93、127、167、219、471、485、495、671、716頁；
～对非洲的政策——322—323、327、329—330頁；
～对中近东的政策——109、289、

291、307—309、314、479 頁；
～对殖民地問題的政策——252、325、329—330、380、492—493 頁；
～的阶級斗爭——94—98、486—487 頁；
～的抵抗运动——80—87、471—472 頁；
～的国际地位——73、370—372、470、474—475、491 頁；
～的軍事开支——366、490、685、686、727 頁；
～的对外政策及其基本目的——357、477、489—490、703、825—826 頁。
波兰——37、45、81—83、69、114、125—127、155—160、162—165、167—170、171—172、177、179—186、201、244、319、390、424、427、513、543、546、592、602、622、806—809 頁。
的里雅斯特，的里雅斯特問題——510—513、517、598—600 頁。
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序 16、38—41、99、116、241 頁。
社会主义国家間签定的双边的友好与互助条約——126—127、166—167、242—243 頁。
罗馬尼亚——31、35、85、114、125—127、155—157、159、165—167、178—179、181、185—186、201、242—244、586—589、603、808—809 頁。
罗得西亚——102—104、107、327 頁。
肯尼亚——54、107、322 頁。
英国
～与中国——205—206 頁；
～与日本——574—575、584 頁；
～与印度——104、110、253—268、375、459 頁；
～与苏联——120、301—302、450—451、453、460—463、529、536、702、792—793 頁；
～与法国——57、213、308—309、457、478—482、490—491、530、589—590、700—701 頁；
～与美国——49—58、68—70、72—73、297—298、391、453—455、459、465—469、671、695—696、707—708、713、729、785—787 頁；
～与緬甸——270—274、459 頁；
～与德国問題——見德国問題条；
～与“馬歇尔計划”——454、459、678、681—683 頁；
～与印度尼西亚——278—280、578 頁；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7—9、11—13、15、19、37—40、49、51、62、79、86—87、269—271、446—448、602 頁；
～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各国——125—126、158、174、179—183、455—456 頁；
～共产党——80、92、468、716頁；

～对非洲的政策——57、322—324、329、332頁；
～对中近东的政策——290、297、302、304、307—315、458、465、629頁；
～的对外貿易——56—57、363、375、448頁；
～的阶級斗爭——95—98、450、467—468頁；
～的国际地位——73、370—372、447—448、468—469、785、821頁；
～的軍事开支——366、685—686、726—727頁；
～的殖民政策——57—58、106、253、325、349、380、447、457—458頁；
～的对外政策及其基本目的——357、451—452、455、463—465、700—703、785—787頁。
英苏同盟与互助条約（1942年5月26日）——30—31、132、453、462、526、704—705、719頁。

九　画

保加利亚——35、81—84、114、125—127、155—156、165—167、174—176、178—179、185—186、201、242—244、586—589、600、603、628、808頁。
南非联邦——58、258、321、323、326、331—333、513、592、602、622、627頁。
南斯拉夫——79、81—85、114、128、156、159、162—165、167—168、174、185、351、513、592、597—600、602—603、608、622頁。
叙利亚——109、249、285、289—290、293、307—309、313、331、457—458、479、622、626頁。
帝国主义之間的矛盾——序21、283、326、357、388、666、691、693—694、712、724頁；
英法矛盾——308—310、478—479、541頁；
英美矛盾——291、310—312、460、505頁；
美法矛盾——214—215頁。
挪威——9—10、43、92—93、97、134、206、370、393、592、602、622、663、678、703、714—715、726—729頁。
柬埔寨——209、211、216、218—219頁。
洪都拉斯——336、622頁。
玻利維亚——336—337、345、622、628頁。
科威特——289頁。
突尼斯——249、317、327、329—332頁。
約旦——289—290、314頁。
美国
～与中国——58、190—191、193—199、202—204、380、434—435、438、570、581、583、729頁；
～与日本——132、521、569—576、577—586頁；
～与印度——54、258—259、266

—267、434 頁；
～与苏联——39、118—121、129、135、223—227、408—409、422—434、529、536、567、573—575、577—578、583—584、590、600、802 頁；
～与法国——72—73、214、398、439—444、470、474—478、482、485、487—488、493、530、589—591、670—671、678、729、756 頁；
～与英国——49—58、69—70、72、297、391、397、454、459—460、468、671、695—696、707、729 頁；
～与非洲——54、316—317、326—328、436 頁；
～与朝鮮——220—221、227—230、232 頁；
～与拉丁美洲——334—354、436—437 頁；
～与德国問題——見德国問題条；
～与中近东国家——289、295—315、439、629 頁；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2、12—15、19、22、36—37、40、49、59—62、79、86—87、396、408、602 頁；
～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見北大西洋侵略集团条；
～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125、158、174、179—182、435—436、628、673、803—806 頁；
～共产党——81、404、716 頁；
～的对外“援助”——98、279、345、360、386—398、440—441、671、674—677、680—682、687—691、722、728—729、817—818 頁；
～的对外貿易——52—53、61、103、203、345、363、397—380、382—384、390、397、437—439 頁；
～的阶級斗爭——96—98、402—404 頁；
～的国外投資——296、327、386、397—398、438 頁；
～的“原子外交”——39、124、327、413、418—421、425—427、640—642、656、816 頁；
～的軍事开支——365—366、420、726 頁；
～的新殖民主义政策——410、439—440 頁；
～的对外政策及其基本目的——356—357、395、406—413、667—668、708—709、799—800頁；
～在資本主义世界中的地位——73—74、371—372、395—401、774—776、799 頁；
“門罗主义”——327、340、408、428、818 頁；
“解放主义”——757 頁；
“遏共主义”——430—433、727、756—758、803、817、830 頁；
“馬歇尔計划”——見“馬歇尔計划”条；

"杜魯門主义"——見"杜魯門主义"条。
美国的对外"援助"——98、279、345、360—361、386—398、440—441、671、674—677、680—681、687—691、721—722、728—729、817—818 頁。
美英法代表伦敦会議（1948）——186、484—485、550—553、559—560、703 頁。
美国、英国、加拿大三国首脑华盛頓会議（1945）——646 頁。

十 画

倫敦会議（1941）——見第二次世界大战条。
哥伦比亚——334、337—339、341、347—349、352、622 頁。
哥斯达黎加——347、622 頁。
埃及（阿联）——序29、102—105、107—109、285—290、293—294、297、313、315、317、331、592、602、622、626 頁。
埃尔——見爱尔兰条。
埃立特里亚——318—320、608、628 頁。
埃塞俄比亚——285、319—320、513、592、604、608、622、628頁。
爱尔兰——370、393、678、714 頁。
海地——622 頁。
泰国——90、251、439、623 頁。
烏干达——54、102、107、322 頁。
烏拉圭——339、622 頁。
秘魯——337、348、352、622 頁。
紐伦堡审判——23、535 頁。
索馬里——318—320、608、628 頁。
荷兰——9—10、29、43—45、79、92—93、95、98、108、206、252—253、278—287、351、370、393、438、574、592、602、622、678、702—703、715—716、726、729 頁。
莫三鼻給——326 頁。
莫斯科外长会議（1945）——見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議条。
莫斯科經济会議（1949）——172頁。
馬来亚——81、98、108—109、249、252、287、373 頁。
馬斯喀特——289 頁。
"馬歇尔計划"——序 27、69、126、171、182、246、279、351、364、380、413、418—419、429、439、442、443—444、485、510、539、664—665、670—671、711、729、806、817 頁，并見各国；
～的后果——667、680、683、690—691 頁；
～的供应范围与构成——680—683、689 頁；
～与苏联——135、171、667—668、676—677 頁；
～与《1948年援外法案》——487、675、678 頁；
～与欧洲經济合作組織——見欧洲經济合作組織条；
～提出的原因与目的——442—443、664—665、668—674、686 頁；

根据～美国的开支——676—677、679—680、682—683 頁；
根据～提供的軍事援助——685—688 頁；
根据～所签定的双边条約——299、460、487、516、678 頁。

十一画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序 6、序 12—13、5、75、89、114、118、136、139、141—142、237、408—409、655、734、741、743、812頁。
捷克斯洛伐克——序26、10、37、43、81、85—86、114、127、155—157、159、162—165、167—170、174、177、180—186、201、244、319、513、592、579、602、608、622、806—807 頁。
第一次世界大战——序 25、407—408、415、741、744、747 頁。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西洋宪章——見大西洋宪章条；
开罗会議——見开罗宣言、开罗会議条；
反希特勒（反法西斯）联盟——序13、2、12—13、15、30—33、39—40、47、79、116、132、149、151、157、221、248、253、400、453、496、501、520、524、536、566、640、744、774、776、677、796、823 頁；
日本无条件投降——21、88、220—222、271、570、573 頁；
卡薩布兰卡会議——298 頁；
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1943）——526、613、640 頁；
伏尔加河畔战役——17、31、35、83、496、771 頁；
在远东的軍事行动——21—22、252—253、566—567、772 頁；
庫尔斯克战役——17、31、497、771 頁；
苏联在战爭中的作用——1、2、14—20、28—34、37—38、63、82、107、114、158、293、531、566—567、769—774、793 頁；
抵抗运动——2、3、12、34—36、79—80 頁；并見各国；
波茨坦会議（1943）——見三国首脑波茨坦（柏林）会議条；
英苏协定（1941）——525 頁；
英苏条約（1942年 5 月26日）——見英苏同盟与互助条約条；
战时的非洲——100、316 頁；
战时的中近东——100、109、290、291—294、298—299 頁；
战爭的性质与根源——6—7、11、15、39—40、80、248 頁；
珍珠港——252 頁；
美苏协定（1942年 6 月11日）——見苏美协定条；
美英代表同希特勒德国的单独会談——31、501 頁；
倫敦会議（1941）——32、611 頁；
租借法案——27、51—53、56、72—74、295、363、424、433、454、476、773 頁；

莫斯科会議(1941)——525 頁;
莫斯科会議(1943)——見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議条;
莫斯科近郊战役——17 頁;
第二战場——17、28、33、36 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法西斯德国——2、6—10、16—19、22—24、28、31、34、39、42—48、78—79、156、316 頁;
雅尔塔会議——見雅尔塔(克里米亚)会議条;
慕尼黑——8、461、796 頁;
魁北克会議——36、55、498 頁;
德黑兰会議——見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議条;
德国无条件投降——28、475、827 頁;
德国使联合国家遭受的損失——43—44、118—119、601—603頁。
"第四点計划"——326、381、418—419、440—441 頁。
菲律宾——81、87、98、108、249、285、287、373、437、567、574、622、729 頁。
黃金海岸(加納)——104、108、329—330、332 頁。

十二画

喀麦隆——321—322 頁。
敦刻尔克条約(英法条約1947)——457、480、701—702、718 頁。
智利——92、102、334、337—339、345—349、622、628 頁。
朝鮮——38、76、88—90、189、220—230、567、629 頁;
朝鮮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14、129、189、201、230—232、373、438 頁;
南朝鮮——129、189、222—223、225、438、629 頁。
殖民体系的瓦解——42、100、112—113、140、150、248、287、323、356、358—359、373—374、436、738 頁。
联合国——序13、72、174、181、184、225—226、228、232、256、258、263—268、280—283、286、303、308、313、345、456、522、606、611—613、639、703、715、720、755、795—809、814、824 頁;
～与苏联——見苏联条;
～与英国——611—612、622 頁;
～与美国——178—180、320、611、620、622、633—636、660—662、709、801、816 頁;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207、619—620、623、636、638 頁;
～大会:
第一届会議(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2 月 14 日,10 月 26 日至 12 月 15 日)——184、622—624、625—627、630、633、647、658 頁;
第二届会議(1947 年 9 月 16 日至 11 月 29 日)——184、226—227、312、323、622、626、634 頁;
第三届会議(1948 年 9 月 21 日

至12月12日，1949年4月5日至5月18日)——178—180、229、266、319、323、623、628、649、655、661—662頁；
第四届会議(1949年9月20日至12月10日)——207、319—320、623、630、634、662頁；
第五届会議(1950年11月19日至12月15日)——320、628、635頁；
第十四届会議(1959年9月15日至12月13日)——序19頁；
第十五届会議(1960年9月20日至12月21日)——638頁；
巴勒斯坦問題特別会議（1947年4月28日至5月15日)——622頁；
巴勒斯坦問題特別会議（1948年4月16日至5月14日)——622頁；
～宪章——序8、序13、151、185、321—322、340、451、611、613—622、623、630—637、642、648、699、708—709、717頁；
～国际法院——323、615、626、635頁；
～安全理事会——180、184、280、285、434、614、616、519—526、659頁；
～托管理事会——319、630頁；
～的一致原則——614—616、618—619、631—632、635、637、766頁；
～世界人权宣言——629—630頁；
～常規軍备委員会——659、662頁；
～原子能委員会——184、646—650、654—655、659、661頁；
～經济及社会理事会——184、391、622頁；
旧金山会議——見旧金山会議条；
敦巴頓橡树园会議（1944年8月至10月)——611、614頁。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69頁。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組織——68—69頁。
葡萄牙——92、316、393、678、714—715、726頁。
裁軍問題——序17—19、522、624、640、642—650、654、657—663頁；并見苏联及联合国部分。
越南——38、76、81、88、98、101、189、208—212、249、567頁；
越南民主共和国——114、188—189、201、211—220、373頁；
南越——211、214頁。
雅尔塔(克里米亚)会議(1945年)；雅尔塔协定——4、33、131、185、221、425、451、475、529—531、533、542、544、550、553、567—568、575、595、615、642、719、788—791、794—797頁。

十三画

奥地利——序9、10、92—93、95、

370、389、393、592、597、671、678、693、805 頁。
意大利——序 29、74、152、318—319、370—372、389、393、586—589、598—600、603 頁；
～与苏联——499—500、502—503、508、513、517 頁；
～与法国——517 頁；
～与英国——496—508、510—512、516、518、703 頁；
～与美国——496—512、515—518、671、729 頁；
～与"馬歇尔計划"——444、510、515—518、678、680—681 頁；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31、35、47、496—501、504、603 頁；
～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518—519、713—715、723 頁；
～共产党——82—84、91—93、127、167、497、501—502、506、508—509、515、671、716 頁；
～的阶級斗爭——95—99 頁；
～的抵抗运动——82—86、501—504、507—508 頁；
～的軍事开支——685—686、726 頁；
～的对外政策及其基本目的——357、506、514 頁；
的里雅斯特——見的里雅斯特問題条；
对～和約——見和約(1947)条。
新西兰——53、58、285、375、389、574、592、602、622 頁。
瑞士——92—93、206、389、393、678、693 頁。
瑞典——92—93、206、370、389、678、693、703、713 頁。
塞拉勒窩內——104 頁。
經济互助委員会——172、241 頁。
錫兰——90、204、249、252、285、287、374、459、465 頁。

十四画

蒙古——114、201 頁。
魁北克会議——見第二次世界大战条。

十五画

墨西哥——102、334、339、348、350、592、622 頁。
德国問題——183、185 頁；并見华沙会議、波茨坦会議和雅尔塔会議各条；
苏联与～——131—132、185—186、482、528—529、531、533—534、541—545、547—549、551—555、557—558 頁；
法国与～——476、480—484、494、530、536、540、557 頁；
英国与～——433、456—457、461、536、540、556、702、718頁；
美国与～——426—429、444、535—538、542—552、557、561、718、828 頁；
"柏林危机"(1948 年 3 月至 1949 年5月)——131、554—557、827 頁；
德国的分裂——131、186、427、

481、484、528—529、534—535、537—539、547—552、718頁；
对德和約問題——131、483—484、521、533—534、542—543、545、547—549、558—559頁；
帝国主义在德国問題上的矛盾——536、541、555頁；
德国帝国主义与軍国主义的复活——486、562、718頁。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序26、114、127、172、186、244、564—566頁。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見西德条。
德黑兰三国首脑会議(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4、31、220—221、451、527—529、567、613、794—795頁。
摩洛哥——90、249、317、326—328、329—332頁。
緬甸——81、87、90、109、204、249、252、268—275、287、374、447、459、465、567、623頁。
魯尔問題——479、481—485、540—541、546頁。
黎巴嫩——109、249、285、289—290、291—293、307—309、313、458、478、622、626頁。
澳大利亚——54、58、98、280、285、375、574、579、592、602、622、628、633頁。
薩尔瓦多——336、622頁。
薩尔問題——478、482—484、541、546頁。

人名索引

三 画

三井(财团) 580 頁。
三菱(财团) 580 頁。
土耳其之父基瑪尔 (Ататюрк К.) 299 頁。
大仓(財团) 580 頁。
山大洛夫(Санталов А. А.)53頁。

四 画

中島(財团) 580頁。
韦尔思(Верт А.) 477頁。
韦伯斯特(Уэбстер Ч.) 452 頁。
丹尼斯(Деннис Ю.) 404 頁。
巴利(Парри Ф.) 508頁。
巴莫(Ба Мо) 269頁。
巴耳弗(Бальфур М.) 793頁。
巴耳杜(Бальтю Р.) 825頁。
巴杜林(Батурин А.) 8頁。
巴恩思(Барнс Э.) 175頁。
巴特尔(Бэттл) 433頁。
巴魯克(Барух Б.) 412、650—654、800頁。
巴多里奧(Бадольо П.)497-499頁。
巴甫連科(Павленко Н. Г.)10頁。
巴瑟斯特(Батхерст М.) 792頁。
巴塔里雅(Батталья Р.)83、500頁。
巴錫克-劳伦斯(Петик-Лоуренс) 254頁。
币原 579頁。
戈麦斯(Гомес Л.) 352頁。
戈培尔(Геббельс) 795—796頁。
戈耳德曼(Гоулдмэн Э.) 771頁。
文格尔(Венгер П.) 810頁。
日产(財团) 580頁。
比万(Бивен Э.) 461頁。
比逊(Биссон Т.) 570頁。
比尔德(Бирд Ч.) 764頁。
比洛夫(Белоф М.) 766頁。
比維尔布魯克(Бивербрук)467頁。
毛泽东 129、187、190、200頁。
貝文(Бевин Э.) 175、319、451—453、457—459、464、466—468、480、487、539、545—546、548、558、590、677、702—703、708、821頁。
貝当(Петэн) 208—209、214頁。
貝利(Бейли Т.)413、768—769頁。
貝尔利(Берли А.)343、443、818頁。
貝納泽(Беназе А.) 332頁。
貝奈斯(Бенеш Э.) 177頁。
貝洛夫(Белов П. А.) 45頁。
貝尔納斯(Бирнс Дж.) 175—176、181、222、423、425—427、482、

537—539、543—544、574、590、593、650、670、755、761頁。
貝佛里季(Беверидж У.)65-66頁。
貝斯特里茨基 (Быстрицкий Р.) 391頁。

五 画

丘吉尔 (Черчилль У.) 11—12、21、28、32—33、36、39、49、55、57、65—66、106—108、221、269、274、298、308、393、426、450—451、455、460、463—464、478—479、497—501、503—505、510—511、518、527—528、537、540、601、612、641、726、761、770—771、788、792—797、800、825頁。
兰格(Лангер У.) 814頁。
兰基(Ланге) 714頁。
加尔維克(Гальвег В.) 810頁。
加尔德尔(Гальдер) 10頁。
加萊哥斯(Гальегос Р.) 353頁。
加斯貝利(Гаспери А. де) 507—509、513—519、713頁。
卢斯(Люс Г.) 412、775頁。
卡尔(Кэрр Э.) 57、785—787頁。
卡內基(Карнеги) 633頁。
卡林德(Каллендер Р.) 777頁。
卡普兰(Кэплэн М.) 799頁。
卡耳伯森(Кальбертсон Э.)777—779頁。
卡里阿斯(Кариас) 336頁。
卡德納斯(Карденас Л.) 352頁。
卡斯德拉諾(Кастеллано) 499頁。
卡尔沃科列希(Калвокоресси П.) 820頁。
古川(財团) 580頁。
古比(Куби Э.) 760頁。
古恩(Гуэн Ф.) 471、480頁。
古德逊(Гудзон) 214頁。
古德溫(Гудвин Г.) 820頁。
古德里安(Гудериан) 742頁。
古德里奇(Гудрич Л.) 637頁。
古德斯比德(Гудспид С.) 632頁。
史末資(Смэтс Дж.) 58頁。
史汀生(Стимсон Г.) 425、442、668頁。
史密斯(Смит У. Б.) 499、556頁。
史密斯(Смит Г. Д.) 642頁。
史塔生(Стассен Г.) 440頁。
史蒂克(Стиккер Д.) 283頁。
史蒂文森(Стивенсон Э.) 617頁。
叶尔馬謝夫(Ермашев И. И.) 393頁。
叶甫萊斯科夫(Еврейсков А. В.) 388頁。
尼布尔(Нибур Р.) 764頁。
尼米茲(Нимиц) 267—268頁。
尼赫魯(Неру Дж.)110、205、256—259、264、267-268、280、285頁。
布萊(Булэ) 494頁。
布朗(Браун Л.) 364頁。
布朗(Браун У. А.) 799、817頁。
布立特(Буллит У.) 214頁。
布萊尔(Блэр Дж.) 60頁。
布萊克(Блэк. К.) 804、812頁。
布萊克本(Блэкберн Р.) 124頁。
布萊克特(Блэкетт П.) 642頁。

布莱德雷(Брэдли О.) 29、727—728、771頁。
布埃耳(Бьюэлл Р. Л.) 775 頁。
布魯克(Брукер Х.) 755頁。
布里格斯(Бриггс Г.) 791頁。
布哈罗夫(Бухаров Б. И.)203頁。
布热津斯基(Бжезинский К. З.) 804、809頁。
布拉姆格利亚(Брамуглия)348頁。
弗兰克(Франк Дж.) 641 頁。
弗兰克(Фрэнк Ф.) 771頁。
弗謝拉吉(Вселаки Я.) 804頁。
东久邇 571頁。
瓜里利雅(Гуарилья) 498頁。
瓦加斯(Варгас) 343頁。
瓦尔加(Варга Е.) 69、366頁。
瓦呂伊(Валлюи) 218頁。
甘地(Ганди) 107頁。
皮克(Пик В.) 564—565頁。
皮朗(Пиренн Ж.) 812頁。
皮尔逊(Пирсон) 751頁。
皮尔逊(Пирсон Л.) 709頁。
皮尔逊(Пирсон Д.) 347頁。
皮杜尔(Бидо Ж.) 217—218、457、472、475、482—484、487、490、517、677—678、707—708頁。
艾地(Айдит Д. Н.) 282、287頁。
艾伦(Аллен Д.) 55頁。
艾侖(Аллен) 310頁。
艾登(Иден А.) 32、761頁。
艾奇逊(Ачесон Д.) 353、423、432、435、558、578、586、650、653、761、819頁。
艾德礼(Эттли К.) 206、254—255、268、274、451、462、464、466—468、700、821頁。
艾森豪威尔(Эйзенхауэр Д.) 36、85、291、499、505、753頁。
让松(Жансон К.) 329頁。

六 画

亚当斯(Адамс) 353頁。
亚历山大 (Александер) 254、504頁。
伍修权 434頁。
休斯(Хьюз Э.) 464、760頁。
休里亚(Чиуря Е.) 814頁。
伊彭(Ибон М.) 808頁。
伊巴拉(Ибарра В.) 336頁。
伊斯迈(Исмей Г.) 255、726、771—772頁。
伊万諾夫(Иванов М. С.) 302頁。
伊万諾夫(Иванов К.) 311頁。
伊本·沙特(Ибн-Сауд) 439 頁。
伊諾泽姆采夫(Иноземцев Н. Н.) 418頁。
刘大年 190頁。
列文(Левин А.) 812頁。
列宁(Ленин В. И.) 12、23—24、35、114—116、129—130、136—137、152、173、234、238—239、399、406—407、414、595、597、605、644、673、692、730、737、743—744、746、768、805、813、831頁。
列明(Лемин И. М.) 328頁。
列夫柯夫斯基(Левковский А. И.) 102頁。

列雅格特·阿里汗(Лиакат-Али-Хан) 264頁。
华伯(Уорберг Дж.) 539、760頁。
华尔希(Уэлт У.) 812頁。
华格納(Вагнер) 403頁。
华盛頓(Вашингтон Г.) 444頁。
吉田 572、583—584頁。
吉布逊(Гибсон Х.) 776頁。
因維切貝尔(Инверчэпел) 459頁。
多列士(Торез М.) 82、486頁。
宇素(又譯吳沙)(У Со) 269頁。
安田 580頁。
安德烈(Андрэ М.) 216頁。
安东尼斯庫(Антонеску) 85頁。
托馬斯(Томас Дж. П.) 404頁。
托恩貝格(Торнберг М.) 299頁。
齐美尔曼(Циммерман Б.) 17頁。
齐里阿庫斯(Зиллиакус К.) 452、760頁。
礼薩·汗(Реза-Шах) 302頁。
米勒(Миллер Д.) 776頁。
米勒(Миллер Дж.) 751頁。
米尔斯(Миллс Р.) 403頁。
米利斯(Миллис У.) 422頁。
米契尔(Митчелл Б.) 742頁。
米尔斯坡 (Мильспо А.) 302、439頁。
米柯拉契克 (Миколайчик) 176、753、808頁。
米列伊科夫斯基 (Милейковский А. Г.) 50頁。
考赫(Кох Г.) 796頁。
考耳斯(Каулс В.) 793頁。
考德威尔(Колдуэлл К.) 783頁。
西尾 583頁。
西特林(Ситрин) 94頁。
乔丹(Джордан П.) 158頁。
迈尔曼(Мельман С. М.) 102頁。
迈斯納尔 (Мейсснер Б.) 529、810頁。
达根(Даггэн Л.) 341—342頁。
达尔朗(Дарлан) 208、214頁。
达尙礼(д'Аржанльe) 216頁。
达魯斯曼(Дарусман) 282頁。

七 画

佳友(財团) 580頁。
佐林(Зорин В. А.) 651頁。
佛萊伊(Фрей Л. И.) 392頁。
佛朗哥(Франко) 467頁。
佛尔尼斯(Фэрнис Э.) 766頁。
伯吉斯(Бургес) 751頁。
伯納姆(Бернхэм Дж.) 404、435、757、764、813頁。
克萊(Клей Л.) 426、481、537—538、547、753頁。
克劳斯 (Клаусс М. В.) 796—797頁。
克洛德(Клод А.) 670、678頁。
克萊格(Крейг Д.) 753頁。
克萊頓(Клейтон У.) 339、437頁。
克諾尔(Кнорр К.) 62頁。
克里浦斯(Криппс С.) 254頁。
克萊斯特(Клайст П.) 797頁。
克雷洛夫 (Крылов С. Б.) 615—616、632頁。
克拉克斯頓(Клакстон Б.)696頁。
克魯普斯卡娅 (Крупская Н. К.)

743頁。
吳努(У Ну〔Такин Ну〕) 269、273—275頁。
呂塞(Русс де А.) 632頁。
坎貝尔(Кэмпбелл Д.)429、814頁。
坎貝尔(Кемпбелл Д. Р.) 95頁。
坎貝尔一約翰逊 (Кэмпбелл-Джонсон А.) 263頁。
宋子文 192頁。
希布斯(Гиббс)751頁。
希姆萊(Гиммлер) 10頁。
希特勒(Гитлер) 7—11、20—21、28、31、46、62、157、461、474、498—499、534—535、772、796—797頁。
希門尼斯(Хименес П.) 352頁。
庇隆(Перон Х.) 342頁。
志賀义雄 573頁。
怀特(Уайт У. А.) 69頁。
怀特(Уайт Г.) 88頁。
李度(Литтл) 195頁。
李海(Леги У.) 214、296頁。
李斯(Лиз) 270頁。
李德(Рид Ф.) 751頁。
李德(Рид Р.) 751頁。
李德(Рид К.) 762頁。
李承晚 129、189、220—222、225、229頁。
李普曼(Липпман У.) 430、656、710、745、782—783頁。
李連塞尔 (Лилиенталь Д.) 653頁。
杜邦(財团) (Дюпона〔группа〕) 419頁。
杜黑(Дуэ) 742頁。
杜德(Датт П.) 104、255、325、380、453頁。
杜勒斯(Даллес А.) 498、501頁。
杜勒斯(Даллес Д. Ф.) 340、416、426、484、538、656、695、728、753、761、791、801、807、825頁。
杜特拉(Дутра) 343、346頁。
杜魯門(Трумэн Г.) 13、36、39、53、72、203、206、220、224、268、296、326、341、349、403—405、412、418、423—427、434—435、439—444、477—478、495、509—511、537、547、567、641、655、668、710—712、728—729、761、801、819、828頁。
杜罗塞尔(Дюрозель Ж. Б.) 767、823頁。
杜尔杰涅夫斯基 (Дурденевский В. Н.) 616頁。
汪精卫 79頁。
汪戴斯(Вандерс А.) 804頁。
沃茲涅先斯基(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Н. А.) 25、27、773頁。
沙佐諾(Сарджоно) 282頁。
沙里尔(Шарир) 276頁。
沙里佛丁(Шарифуддин) 276、280—282頁。
沙勃申娜(Шабшина Ф. И.) 223、229頁。
芳泽謙吉 571頁。
芦田 581—582頁。
芬勒特(Финлеттер Т.) 412、710、819頁。

劳合(Ллойд) 7頁。
劳什宁(Раушнинг Г.) 760頁。
苏加諾 (Сукарно) 276—278、283頁。
苏茲貝格 (Сульцбергер С.) 720頁。
辛普森(Симпсон Д.) 792頁。
近卫 571、579頁。
里斯一威廉斯 (Рис-Вильямс А.) 325頁。
里奥(Рио А. дель) 336頁。
阿隆(Арон Р.) 78、144、762、823—824頁。
阿尔芳(Альфан Э.) 487頁。
阿本德(Абенд Х.) 777頁。
阿瓦林(Аварин В. Я.) 109頁。
阿麦尔(Армур Н.) 347頁。
阿勒曼(Аллеман Ф. К.) 826—827頁。
阿諾德(Арнольд Г.) 424頁。
阿諾德(Арнольд Д.) 794頁。
阿斯曼(Ассман К.) 19頁。
阿登納(Аденауэр К.) 461、560、563頁。
阿德勒(Адлер З.) 798頁。
阿卜杜拉(Абдулла) 262頁。
阿齐克韦(Азикиве Н.) 332頁。
阿里奥尔(Ориоль В.) 219頁。
阿雷瓦洛 (Аревало Х.) 337、354頁。
阿里斯門迪 (Арисменди Р.) 342頁。
阿姆斯特朗 (Армстронг Г.) 816頁。
阿伦布魯克(Аланбрук) 38頁。
阿列克謝耶夫(Алексеев А. М.) 44頁。
阿斯塔菲耶夫(АстафьевГ.В.)190頁。
麦休(Мэйхью К.) 462、466頁。
麦耶(Мейер Г.) 501頁。
麦耶(Мейер Р.) 492頁。
麦卡伦(Маккарен П.) 404頁。
麦克基(Макги) 317頁。
麦金德(Маккиндер Х.) 785頁。
麦科馬克(Маккормак Дж.) 780—781頁。
麦克納尼(Макнерни Дж.)539頁。
麦克阿瑟(Макартур Д.) 190、570—573、578—579、580—582頁。
麦克尼耳(Макнейл Г.) 776頁。
麦克布賴德(Макбрайд) 714頁。

八 画

佩季(Пейдж А.) 753頁。
佩金斯(Перкинс Д.) 766頁。
佩尼亚兰达(Пеньяранда Э.) 336頁。
周恩来 194、200、207頁。
季亚科夫 (Дьяков А. М.) 54、254頁。
季米特洛夫(Димитров) 159、174—175、587頁。
帕蒂(Патти) 214頁。
帕耶斯(Паес Л.) 352頁。
张伯伦(Чемберлен Н.) 461頁。
张伯伦(Чемберлин У.) 410頁。
彼得科夫 (Петков Н.) 174—175

頁。
拉馬迪(Рамадье П.) 183、390頁。
拉铁摩尔(Латтимор) 570頁。
拉維尔恩(Лаверньь Б.) 760頁。
拉哥夫斯基 (Лаговский А.) 20、26、46頁。
拉特尔・德・塔西尼 (Латтр де Тассиньи) 490、706頁。
拉施布魯克—威廉斯 (Рашбрук-Вильямс) 260頁。
昂山(Аунг Сан) 269—273頁。
明曾蒂(Миндсенти) 179、807頁。
杰弗逊(Джефферсон Т.) 444頁。
林肯(Линкольн А.) 444頁。
欧彼(Опи Р.) 799、817頁。
浅野 580頁。
法尔利(Фарли) 751頁。
波居(Погью Ф.) 19—20、36頁。
波拉埃(Болаэрт) 214頁。
波索尼(Поссони С.) 415、422—423頁。
波諾米(Бономи И.) 508頁。
波拉廷斯基(Боратынский С.) 32頁。
罗勃(Робб Дж.) 706頁。
罗伯茨(Робертс Г.) 804頁。
罗伯逊(Робертсон) 176頁。
罗果夫(Рогов) 449頁。
罗烏士(Роуз М.) 60頁。
罗宾逊(Робинзон Э.) 422頁。
罗宾斯(Роббинс) 751頁。
罗維特(Ловетт Р.) 226、708—709頁。
罗斯托(Ростоу У.) 801、804、812頁。
罗斯福(Рузвельт Ф. Д.) 33、39—40、49—50、55、57、64—65、107、211、296、335、341、403、405、423、460、498—499、527—528、537、567、601、612、762、770、789—791、795—797、802頁。
罗森堡(Розенберг) 10頁。
罗尔巴赫(Рорбах П.) 796頁。
耶克(Экх Э.) 827—828頁。
肯宁汉(Каннингхэм Д.) 261頁。
舍格(Шэгг Р.) 770頁。
舍迪維(Шедивый Я.) 178、183、807頁。
舍恩布龙 (Шёнбрун Д.) 217、495頁。
若札尔(Жожар Р.) 490、706頁。
范登堡 (Ванденберг) 340、344、400、427、444、600、633、708—709、728、790、801—802頁。
迪安(Дин В. М.) 428、443頁。
迪安(Дин Д.) 772頁。
迪安(Дин Х.) 225頁。
迪亚古年科(Тягуненко В.) 107、376頁。
金(Кинг) 49—50頁。
金日成 230頁。

九 画

保大(Бао Дай) 209、211、219頁。
保罗・繆(Поль Мю) 219頁。
保罗・彭古(Поль-Бонкур)474頁。
勃魯姆(Блюм Л.) 217、477、670、

701、755頁。
南尼(Ненни П.) 508頁。
哈文(Хейвен Ч.) 783頁。
哈达(Хатта) 276—278、281、283、287頁。
哈尔泼(Харпе В.) 810頁。
哈伯勒(Хаберлер Г.) 367頁。
哈里曼(Гарриман А.) 347、424、442、547、670、682頁。
哈里斯(Гаррис С.) 676頁。
哈契森(Хатчисон К.) 781頁。
哈特莱(Хартли Ф.) 403頁。
哈基米(Хакими) 303頁。
哈里法克斯(Галифакс) 7頁。
契尔(Хиле) 267頁。
威尔(Уэйр Э.) 409頁。
威尔逊(Вильсон В.) 408、440頁。
威尔斯(Уэллес С.) 568頁。
威耳奇(Уэлч) 412頁。
威廉斯(Уильямс Б.) 748頁。
威廉斯(Вильямс В Э.) 425頁。
施皮尔特 (Шпирт А. Ю.) 54、57頁。
施特賴特(Стрейт К.) 780—782、787頁。
施瓦尔茨科普夫 (Шварцкопф) 304頁。
查尔沃德(Чальбо Д.) 352頁。
柯明斯(Камминге) 450頁。
柯蒂斯(Кертес С.) 804頁。
柯布倫茨(Кобленц К.) 799頁。
柯克帕特里克 (Киркпатрик А.) 793頁。
柳溫(Льювен Э.) 342頁。
派耳(Пайл) 328頁。
洛文(Лорвин Л.) 67頁。
洛克菲勒 (Рокфеллер Н.) 338、340、801頁。
洛克菲勒 (財团) (Рокфеллера [группа]) 195、419頁。
科洛克(Крок А.) 752頁。
科尔尼德斯 (Корнидес В.) 549、797頁。
科札尔科娃(Коржалкова К.) 178、183、807頁。
約德尔(Йодль А.) 19、24、26頁。
約翰逊(Джонсон А.) 686頁。
約翰逊(Джонсон М.) 783頁。
胡佛(Гувер Г.) 442、776、813頁。
胡阶森(Хатчисон) 205—207頁。
胡志明 88、211—212、216—219頁。

十 画

眞納 (Джинна М.) 254、263—264頁。
倫杜利奇(Рендулич Л.) 33頁。
爱尔威(Эрве П.) 813頁。
爱納克(Эйнак Л.) 493頁。
爱依杜斯(Эйдус Х. Г.) 584頁。
爱德华茲(Эдвардс К.) 570頁。
哥尼昂斯基 (Гонионский С. А.) 336頁。
哥特瓦尔德(Готвальд К.) 177—178頁。
埃兰德(Эрландер) 703、714頁。
埃默利(Эмери Л.) 467頁。
夏庇罗(Шапиро А. И.) 392頁。

庫瑪(Кумар В.) 261頁。
庫伯斯(Куперс) 94頁。
庫勒斯基 (Кульски В.) 145、804頁。
恩格斯 (Энгельс Ф.) 141—142、236、644、730、740—741頁。
恩克魯瑪(Нкрума К.) 108頁。
根室(Гантер Д.) 221頁。
格魯(Грю Дж.) 570頁。
格利森(Глизон С.) 814頁。
格麦托(Гемето) 753頁。
格拉罕(Грэхем) 205頁。
格雷西(Грэйси) 213、265頁。
格林劳德(Гриндрод М.) 508頁。
格罗提渥(Гротеволь О.) 565頁。
格林費尔德 (Гринфильд Р.) 773頁。
桑托斯(Сантос Э.) 342頁。
海恩(Гейн М.) 570頁。
海特(Хэйт Р.) 262頁。
泰勒(Тэйлор М.) 421頁。
烏維科(Убико Х.) 336頁。
烏沙科夫(Ушаков Н. А.) 618—619頁。
烏伯斯貝尔格 (Уберсбергер Г.) 810頁。
特魯希略(Трухильо Р.) 336頁。
特魯哈諾夫斯基 (Трухановский В.) 464頁。
納丁(Наттинг А.) 821頁。
納吉(Надь Ф.) 753、807頁。
納歇朗 (Нежлен М. Э.) 328、794頁。
索里雅(Сориа Ж.) 671頁。
索摩查(Сомоса) 336頁。
索科洛夫斯基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В. Д.) 551頁。
莫戴(Мутэ М.) 216頁。
莫斯里(Мосли Ф.) 804、812頁。
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В. М.)300頁。
莫洛佐夫(Морозов Г. И.) 624頁。
莫泽列夫斯基(Модзелевский З.) 183—184頁。
賈德干(Кадоган А.) 309、654頁。
賈德魯(Катру) 291頁。
陶里亚蒂(Тольятти П.) 497、504、515、518、682頁。
馬汉(Мэхен А.) 414頁。
馬克耳(Маркел Л.) 751、755頁。
馬克思(Маркс К.) 序5、序10、233、236、644頁。
馬歇尔 (Маршалл Дж.) 11、27、191、193—194、197、347—349、427、442、459、486—487、510、516、539、545—546、548—549、668—670、676—678、703—704、707—708、790頁。
馬丁涅斯(Мартинес) 336頁。
馬伍拉赫(Маурах Р.) 810頁。
馬蒂雅斯(Маттиас Э.) 810頁。
馬尔廷諾夫(Мартынов В.А.) 333頁。
馬特維也夫(Матвеев В.) 8頁。

十一画

勒克萊克(Леклерк) 214頁。
基隆(Киллерн) 278頁。
基辛格(Киссингер Г.) 765頁。

基安尼尼(Джаннини Л.) 753頁。
基哈德森(Герхардсен Э.)703頁。
康汉(Кэнхэм) 751頁。
康納尔(Коннелл Дж.) 459頁。
康納利(Коннэли Т.) 427、708頁。
康默杰(Коммеджер Г.) 770頁。
曼涅(Менье) 218頁。
梅尔(Мер Д.) 793—794頁。
梅农(Менон В. П.) 262頁。
盖丹(Гаитан Х. Э.) 337頁。
盖凡姆(Кавам А.) 303頁。
菲利浦(Филип А.) 474頁。
菲利浦(Филипп В.) 810頁。
菲杜尼(Фитуни Л. А.) 391頁。
菲莱尔(Феррелл Р.) 498頁。
菲茨西蒙斯(Фитцсимонс М. А.) 456、467—469頁。
野村(財团) 580頁。
隆哥(Лонго Л.) 502—504頁。

十二画

凱勒(Керль Г.) 20頁。
凱南(Кеннан Дж.)119、430—432、757、765、803頁。
凱恩斯(Кейнс Дж.) 64—65、70、365頁。
凱特尔(Кейтель) 40頁。
凱特林(Кэтлин Д.) 787頁。
凱塞林(Кессельринг) 501頁。
博林(Боринг А.) 747頁。
博德特(Бодет Х. Г.) 348頁。
塔夫特(Тафт Р.) 403、443、712、717—718、790頁。
塔維亚尼 (Тавиани П.) 517 — 518頁。
富特(Фут М.) 452頁。
富勒(Фуллер Дж.) 27頁。
富布賴特(Фулбрайт М.) 752頁。
彭塞(Понсе Ф.) 336頁。
提柏尔斯克西(Типпельскирх К.) 29頁。
斯龐(Спанг) 751頁。
斯通(Стоун И.) 38頁。
斯大林(Сталин И. В.) 17、122、128、130、137、300頁。
斯巴諾(Спано В.) 503頁。
斯沃普(Своуп Г.) 800頁。
斯奈德(Снайдер Дж.) 347頁。
斯奈德(Снайдер К.) 766頁。
斯提德(Стид У.) 676頁。
斯蒂尔(Стил Д.) 760頁。
斯皮克曼(Спикмэн Н.) 416、758、777頁。
斯坦哈特(Штейнгардт) 177頁。
斯派达尔(Шпейдель Г.) 770頁。
斯科洛夫(Скоров Г. Е.) 330頁。
斯培尔曼(Спэллман) 753頁。
斯福尔查，卡罗(又譯史佛卓，卡洛)(Сф.орца К.)319、505、510、517—518、713頁。
斯退丁紐斯(Стеттиниус Э.)619、790頁。
斯特劳斯—胡佩 (Страус-Хюпе Р.) 415、422、745、777頁。
普腊特(Пратт Ф.) 771頁。
普尔斯頓(Пьюлстон У. Д.)28、790頁。
普罗托波波夫(Протопопов А. С.)

624頁。
溫逊(Уинсон) 477頁。
湯因比(Тойнби А.) 764、793、807、812頁。
湯普逊(Томпсон К.)815—816頁。
腊狄斯庫(Радеску) 753頁。
舒曼 (Шуман Р.) 491、558、825頁。
舒曼(Шуман Ф.) 804頁。
葛罗米柯(Громыко А. А.)661頁。
費斯(Фейс Г.) 781、814頁。
雅各比(Джекоби Э.) 88頁。
雅各布(Джекоб Д.) 821頁。
雅各布(Джейкоб Я.) 446頁。
雅斯特列波娃(Ястребова И. П.) 323頁。

十 三 画

塞第(Седий) 213頁。
塞雷(Сере Р.) 795、824頁。
塞頓一沃森 (Сетон-Уотсон Х.) 805、811頁。
奥斯汀(Остин У.) 654、662頁。
奥欽列克(Окинлек К.) 261頁。
奥斯古德(Осгуд Р.) 764頁。
奥德利亚(Одриа М.) 352頁。
蒙(Мон Ж.) 324頁。
蒙巴頓(Маунтбэттен) 262—264、270—271頁。
蒙哥馬利(Монтгомери Б. А.) 39、706、712、725頁。
雷努文(Ренувен) 764頁。
雷采尔(Рейтцель В.) 799頁。
雷馬洛夫(Рымалов В. В.)376頁。

十 四 画

墨索里尼 (Муссолини) 82—83、496—497、499、504頁。
甄克尔(Зенкл) 753頁。
福斯特(Фостер) 687頁。
福斯特(Фостер У. З.) 90、94、405、672頁。
福莱斯特 (Форрестол Дж.) 405、424、429、460、516、697、708頁。
維納克(Винаке Г.)431—432、570、803頁。
維特尔(Веттер Г.) 813頁。
維尔伯格(Уилбург) 754頁。
維尔納茲基 (Вернадский Г.)770頁。
繆泰尔(Мюттер А.) 474頁。
慕梭(Муссо) 282頁。
蔣介石 190—194、197—199、202、215、221、434、583、585、623—624頁。
豪斯(Хейс Т.) 560頁。
豪頓(Хаугтон Х.) 60頁。
豪斯霍弗(Хаусгофер К.) 778頁。
赫尔 (Хэлл К.) 52、526、567、797頁。
赫托夫(Хедтофт) 703頁。
赫姆莱希(Хелмрич Е.) 812頁。
赫魯曉夫(Хрущёв Н. С.) 9、12、29—30、89、118、122、128、137、152、168、237、300、414、460、550、618、637-639、644、663頁。
赫德耳斯頓(Хаддлстон) 745、749頁。

十五画

德古(Дэку) 209頁。
德貝(Дебе) 218頁。
德萊伯(Дрейпер) 581頁。
德欽努(Такин Ну) 見吳努条。
德田球一 573頁。
德欽丹东(Такин Тан Тун) 269、273頁。
德利格佛·賴伊 (Трюгве Ли) 267頁。
摩根(財团) (Моргана [группа]) 419頁。
摩頓(Мортон Л.) 425頁。
摩里逊(Моррисон) 461頁。
摩里逊(Моррисон С.) 771頁。
摩根索(Моргентау Генри) 69—70、790、797頁。
摩根索(Моргентау Ганс) 764頁。
摩林尼哥 (Мориниго И.) 336、346頁。
潘尼迦 (Паниккар К. М.) 204—205頁。
薩拉查(Салазар А.) 714頁。
魯特(Рут А.) 570頁。
魯科宁(Луконин Ю. В.) 307頁。
魯塞尔(Рассел Р.) 612、814頁。
魯宾斯坦(Рубинштейн А.) 143、773、804頁。

十六画

儒奥(Жуо) 94頁。
穆尔(Мур Б.) 812頁。
穆罕默德·礼薩(Мохаммед-Риза) 302頁。
穆罕默德·本·优素福 (Мохаммед бен Юсеф) 332頁。
薛伍德(Шервуд Р.) 505、529頁。
霍季(Ходж) 224頁。
霍夫曼(Гофман П.) 67、687頁。
霍尔特(Хоулт Е.) 771頁。
霍华德(Говард Д. К.) 775頁。
霍布金斯(Гопкинс Г) 528—529、797頁。
鮑尔(Болл М.) 812頁。
鮑萊(Поули) 224頁。
鮑德溫(Болдуин Л.) 765頁。
鮑德溫(Болдуин Х.) 412、765、788—790頁。

十七画

戴高乐(Голль Ш де) 9、36、307—308、470—474、477—479、761、794、825頁。
戴維尔德(Девирд Г.) 770頁。
謝尼斯(Шейнис З.) 311頁。
謝泼德(Шепэрд) 751頁。

十八画

魏刚(Вейган М.) 9頁。
魏地拉(Видела Г.) 346頁。
魏菲尔(Уэйвелл) 254頁。
魏德迈(Ведемейер) 196—197頁。

本书譯者

序言：王济庚等。第一、二、三、四、十三章：禹順云；第五、六、七、八章：张瑞祥；第九、十、十一、十二、十四章：张志；第十五、十六、十七章：錢凡；第十八、十九、二十四、二十五章：范錫鑫；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章：沈宝群；第二十三章：于木；第二十六、二十七章：李樵。

㊀

統一书号：3003·720

定　　价：4.00 元